

1987年美国十六本畅销书之一

生死

方耀光
郑培君
方耀楣·译

在上海

郑念·著
(自传体小说)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求知书刊社编辑 百家出版社出版



ISBN 7-900000-01-1
I·02 定价：4.30元

(内部发行)

生死在上海

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

郑念●著

方耀光
郑培君·译
方耀楣



责任编辑 葛伟昌
封面设计 王申生

生死在上海

郑念 著

方耀光 郑培君 方耀楣 译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9.875 字数39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7--900000—01-1/I·02

定价：4.30元

(内部发行)

**LIFE AND DEATH
IN SHANG HAI**

本书根据 Grafton Books
(A Division of the Collins
Publishing Group) 1987年
海外版译出

求知书刊社编辑

百家出版社出版

(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出 版 说 明

作者曾长期生活在上海。本书是她离开上海定居美国后所写，并在美国出版。它记述了作者“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的亲身遭遇，有时也回溯到其他时期的经历。这些记述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侧面。我们把它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以供有关人士参考。

本书是据英文本翻译的，除个别字句略有删节外，尽量保持了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原貌。

献给梅萍

目 录

第 一 部 革命风暴

- 第 一 章 在劫难逃..... 3
- 第 二 章 风暴前的宁静.....41
- 第 三 章 毛的信徒.....76
- 第 四 章 银铛入狱..... 107

第 二 部 拘留生涯

- 第 五 章 孤独的监禁..... 141
- 第 六 章 审问..... 165
- 第 七 章 一月革命和军管..... 195
- 第 八 章 党派斗争..... 232
- 第 九 章 连续不断的迫害..... 280
- 第 十 章 弟弟的忏悔..... 319
- 第 十 一 章 种种折磨..... 346
- 第 十 二 章 出狱..... 381

第 三 部

- 第 十 三 章 梅萍，您在哪里..... 407
- 第 十 四 章 水落石出..... 437
- 第 十 五 章 与众不同的学生..... 470
- 第 十 六 章 毛泽东之死..... 513
- 第 十 七 章 平反..... 555
- 第 十 八 章 别了，上海..... 583

尾 声

第一部

革命风暴

第一章 在劫难逃

时光仿佛又回到了1966年6月那个炎热的夏夜，那是在我上海老家的书房里。我孤单地在书房里呆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发出徐缓的旋转声。桌上白色乾隆花瓶里的素色的康乃馨已中暑枯萎了。靠墙排列着一些书架，里面是英文和中文的书籍。台灯光下，房间的一半处于阴影之中，柔软的沙发上织锦缎的红色垫子闪烁着光亮。

记得一位在上海经常访问我家的英国朋友称这里为乏味都市中舒适、优雅的绿洲。的确，我的住房虽不是西式的公馆，但它是够舒适的。当城市被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改造时，为保持继续享受高雅的情趣，我便精心安置自己的家，使其成为我和女儿生活中的避风港。

共产党接管这个城市十七年后，在上海，私人很少有象我这样的居住条件。这个一千万人口的城市里，大约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家庭仍保持着老的生活样式：维持着他们原先的家，雇了保姆、佣人。党并没有命令人们如何生活。事实上，1949年，当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后，他们阻止我们解雇家庭佣人，以防加重失业问题。不过定期的政

治运动的震荡使许多从前富裕的人变穷了。他们遭难，被迫支付巨额罚金，或者收入猛然减少。许多工商业者由于政府的安排，当工厂被撤出上海时，家庭也一起被安置到内地。我不愿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标准。上海市人民政府，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对我还是比较礼貌且有些照顾。不管怎样，当时我和女儿生活还算平静。由于相信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对此我们有长期的准备。

现在我时常回想起1966年6月3日午夜前的几个小时，其原因不仅仅因为我怀念着过去的岁月，并回顾与我女儿在一起度过的生活，而且因为这几个小时是我许多年正常生活的最后时光。

都市的夏夜闷热得犹如天空中悬挂着一个罩子。没有一丝风从窗外吹进来，我伏在桌子上，阅读报纸上激烈、带有恐吓的文章，这意味着一个政治运动开始了。我的脸和手臂被汗水弄湿了，宽大的衬衫也粘在背脊上。宣传机构是为了努力制造紧张的气氛和动员群众。经常细致地阅读这些党的积极分子撰写的文章，对运动的趋势及可能波及的受害者会得到某种暗示。因为我以前从来不卷入政治运动，所以我并没有预感到自己将大难临头。不过，在宣传文章里采用如此激烈的语言，始终使我心神不定。

我的佣人老赵为我在咖啡桌上的盘子里放了一只盛冰茶的保温瓶。我一边喝着这清凉的茶，一边把视线停在我丈夫的照片上。他死了，快九年了。由于他的死而留在我心中的空虚仍然存在。每当我对政治形势无法理解时，我

感到孤单和无所适从，我多么需要他的支持。

1935年在伦敦，我们相遇时，他正在攻读哲学博士。我们结婚后，于1939年回到了战时陪都重庆，他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1949年，共产党军队进入了上海，他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共产党的代表章汉夫接管了他的办公室。章邀请他留在新的政府里。于是，在过渡时期他被上海市市长——陈毅元帅新任命为外交事务顾问。后来，他经允许离开人民政府，接受壳牌石油公司的提名，成为它的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壳牌是具有国际水准的少数几个英国企业之一，犹如帝国化学企业、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他们都企图在上海保持一个办事处。壳牌石油公司是希望留在大陆中国的世界性的大公司。

1957年，我丈夫死于癌症。一位新任命的英国籍总经理继位。我应壳牌石油公司的要求成为他的助手，头衔是总经理顾问。以这个资格工作到1966年。

自此，英国总经理依靠我设法使公司躲开了许多陷阱。这些陷阱往往是围绕着在毛泽东中国能否保持住有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办事处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必须面对不是牺牲壳牌石油公司的尊严，就是使中国官方失去面子的选择。我的工作管理职工，做总经理与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工会之间的联络工作，分析工会的要求，拟订妥协的计划。我用中文起草了许多公司与中国政府经理处之间的重要通信。每当总经理回家或去北京与中国政府官方公司交谈时，我就行使总经理的职权。有这样一个能够胜任的工作，我是幸运的。在上海，我为享有在世界著名

的公司里从事高级职位仅有的女性的殊荣而欣喜。

1966年春天，与中国政府经理处谈判并签署了“资产负债协议”后，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它的上海办事处。我们拿走了在上海的资产，中国政府经理处接纳了我们的职工，并许诺聘用他们，提供退职养老金。作为一个管理人员，我的安排没有包括在协议里，它的范围限制为属于壳牌石油公司工会的职工，而壳牌石油公司工会是控制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由政府组织上海总工会的一个分支机构。

协议签署时，我的女儿——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正与她的同事一起在中国北方演出。我想等她回来，就去香港旅行。不过，正在我等待她回来期间，文化革命开始了。我女儿他们被电影厂火急召集回上海，参加文化革命。由于我知道政治运动期间，政府当局不愿作什么决议，政府部门的工作即使还没完全停顿，也已出现普遍怠工现象，我不愿冒被驳回的危险，便没有立即申请去香港旅行。因为予以驳回的决定会变为个人的档案材料，警察就是用它来管理每个人的。而且，这会给今后的申请带来困难。我留在了上海，相信文化革命象通常的政治运动一样，不会超过一年时间。

喝了茶使我有点凉快。我站起来进入我卧房的另一扇门内。淋浴后我躺在床上。尽管炎热异常，我还是睡着了。我的女佣人陈妈轻轻地推醒了我。看了一下床边柜上的钟。刚刚六点敲过，但阳光已从窗外射了进来。房间里的温度上升了。

“你们老办事处的秦和另外一个人来看你。”陈妈说。

“他们想干什么？”我懒洋洋地问她。

“他们没有说。不过举止好象有点不正常。办事处没有关闭前，他们是先在客厅等着，这次直接进入起居室，就坐到沙发上。”陈妈说。

“另外一个人是谁？”当我在浴室里听她说时，我问。秦，我知道他是上海市总工会下属的我们办事处分会的副主席。我经常和他谈判，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似乎是个随和、知理的好人。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我想他可能是一个门卫。”陈妈说，“他又高又瘦。”

从陈妈的叙述中，我猜想此人是壳牌石油公司工会的积极分子。公司的工会里没有党员。从这些积极分子的行为来看，我想他们被鼓励成为上海市总工会在我们办事处的看门狗。尽管我没有与这些不是门卫就是清洁工的积极分子直接接触，但我知道他们是这些部门的头。

有人敲门。老赵——我的男佣，递给陈妈一只盘子，透过半开的门说，“他们讲，要女主人快点。”

“好的，老赵，”我说，“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下来。给他们冷饮和香烟。”

我并不急。我需要时间思考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这两人在大清早来访是不正常的。尽管在中国，无论在哪里，人们必须出席会议，听演讲或政治训导，事先也很少被告之。每当人们被召唤时，为服从政治的需要，任何人都将停止所干的一切事。我奇怪这两人来是不是要我

去听政治教育的演讲会？我知道上海市总工会正为壳牌石油公司以前的职员组织一个班，以便他们在薪水较低的政治机构里任职。当我吃吐司和饮茶时，回想起主持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停业的经过，检查了自己在公司与中国经理处谈判时的态度，尽管在所有的会议中我都陪着总经理，但是我没有参加任何讨论。我仅仅是在回到办事处后，对总经理的工作作些评论并提些忠告。我决定，如果问起有关壳牌石油公司的问题，我将提出得向伦敦写信要资料，拖延一下再说。我穿了一件白的棉布衬衫，一条灰色的便裤和黑色的凉鞋。中国妇女在公共场合穿衣尽量想避免显眼。当我下楼梯时，我想，他们派人一大早来叫我，也许是想让我不得安宁。我走得很慢，竭力显得镇静、沉着。

我走进起居室，看见他们俩手脚伸展地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橘子水。看到我时，秦习惯性地站了起来。看到另一个积极分子仍然留在座位上，秦脸胀得通红，窘迫极了，急切地又坐下了。1949年，共产党进入上海后不久，主管我居住地的警察，第一次不打招呼就闯进我的家门。警察在门前不理睬老赵，就直接进入起居室，并在地毯上吐唾沫。我第一次看到了权势造成的无礼态度，以后，我认识到，党的下级官员往往用这种傲慢无礼的态度来掩饰自己的自卑感。

我不理睬秦的狼狈和另一个人的无礼，坐在椅子上，平静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大清早就来找我？”

“我们是来带你去参加会议。”秦说。

“动作这么慢，这样我们会迟到的。”另外一个人站了

起来，补充道。

“参加什么会议？”我问，“谁组织的？谁派你们来要我参加？”

“不需要问这么多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权威的话，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所有壳牌石油公司从前的职工都参加这个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会议。”积极分子说，用愤怒的音调，他又接着说，“难道你不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吗？”

“文化大革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为商行服务，又不是文化组织。”我说。

“毛主席说，中国的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文化大革命。”秦说。

他们两人一起急切地说，“我们要迟到了。我们必须立即离开。”

秦也站了起来。瞧了一下壁炉上的座钟，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海军蓝的绸阳伞在客厅里等着。

当我从她那里接过东西时，我笑了笑，但她没有用笑来回报我，显得很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想安慰她。

她只是点了点头。

站在一边的老赵打开了前面的门。他看上去也很忧虑，没有说话，在我们后面轻轻地关上了门。

佣人们的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知道毛泽东统治的十七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许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就再

也没有回来。

街上几乎没有人，但公共汽车里挤满了神态严肃的乘客。车子走的是迂回的路线，九点钟过后才到达目的地。

许多年轻的男女聚集在一所技术学校的门口。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他们发现了我们从公共汽车站走来，一些人叫喊着“他们来了！他们来了！”奔进了大楼。

有人对我的护送者急躁地说：“这么晚来？会议讲好是八点开始的。”

两人转过头朝我瞥了一眼，说：“问她。”说着急急忙忙地进了大楼。

刚才出来问话的人现在对我说了，“这儿来。”我跟着他进了会议室。

很大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在房间前排狭窄的木条凳中间我发现了壳牌石油公司的医生和另外一些老职员。在他们的后面还坐着驾驶员、门卫、开电梯的工人、清洁工和办事员。在这些中间还有一大批年轻人，他们可能是学校的学生。相当一批人站在过道上和房间的后面。炎热的阳光透过敞开的窗户射进沉闷的房间，却很少有人使用扇子，屋子里气氛既紧张，也带有一点期待。当我寻找分配给我的第二排的座位，目光掠过那些在同一办公室相处近九年的老职工时，他们没有一个与我打招呼，好象也根本不认识我，许多人扭转了视线，少数人目光与我相遇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我不知道壳牌石油公司关闭办事处后的几个月里，这些人在干些什么。他们是壳牌石油公司和人民政府经理处

之间审定的“资产负债协议”的真正受损者。自从1920年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为壳牌石油公司干了好长时间。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期间，他们大多数人放弃住宅和家庭经过长途跋涉从上海去了战时陪都重庆。留下来的另外一些人，宁愿忍受巨大的经济上的困窘，不愿为接管了壳牌石油公司房产的日本火油公司服务。他们大多数人年近六十，快退休了。这个协议表明，他们将全部到政府机构中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同以往地位相同的工作，只是作为职员或者翻译被录用。工资级别低了，甚至退休养老金也减少了。由于协议是政府要他们接受的，没有人敢反抗协议的条款。总经理和我试图从工会主席那儿获得一种保证，但是我们却被告知，每一位职员对协议的条款都是满意的。

在与壳牌石油公司工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对我说：“每个人对前途都非常满意，因为他们摆脱了为外国商行服务的不正常身份，作为政府机构的工作者，他们将为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只是官方的观点，对此，就连工会主席自己也不太相信。在办事处关闭最后的日子里，一些老职员来到我的办公室，摇着头悲切地讲：“没有法子！”这句非常普通的中国话，意思是“无能为力”、或者说是“没希望”、“没办法”、“没有答案”。

从九点到应该休会的午饭时间得三个多小时。随着时间的流逝，房间里已热得使人难以忍受。我知道自己必须保存能量，等待演讲的结果。坐在狭窄的木条凳上就象战争期间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的燃烧弹钻山洞那样不舒

服。汗从我的脸上滴下。为拿手帕，我打开了包，看到了陈妈放着的小的檀香扇，丝的扇面上有我的绘画老师画的牡丹。我拿起扇子，扇动起来，清除了一些人群里的汗酸气。

突然，后排掀起一阵骚动。几个穿着短袖衫，肥棉布裤的人穿过后门登上了低矮的台。他们中的一个人走向了铺着白布的讲台。另外一些人在他后面的椅子上坐下。在中国以生活中每人的衣服来估价其身份是很难的，因为每个人都穿得象一个无产者。“无产者”这一词在中文中意为“没有财产”。穷对中国人来说，既保险又时髦。我讲不出会议主持者大概的等级和身份，我想他应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官员。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伟大的舵手掌舵，我们定能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对我们来说，形势是大好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我们更加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机会，这样我们的政治觉悟能更快地提高，使我们能正确地地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有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有的则是用笑脸相迎来掩盖他们肮脏的勾当。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妄图把中国人民拉回到水深火热的旧社会去。我们能允许他们的阴谋得逞吗？”

“不允许！一百个不允许！”

“上海解放已经十七年了，直到今天，外国商行还留

在我们的城市。它们的办公室占据了热闹的地段，它们的汽车在街上飞跑。那些外国人和少数丧失国格的中国人平时盛气凌人。我们知道这些商行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妄想继续剥削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关了他们的门，赶走了外国人。在那儿任职的大多数中国人，受到了污染，思想给弄迷惑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彻底反动的。我们必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对他们施行挽救的政策，改造他们。因此，我们要化几个月的时间，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如果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地面对面地承认错误并表示悔改，那就是没法改造了。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为了真正能够自我批评，就必须接受别人的批评帮助。今天的会议就是要批判陶峰并听他的自我批评。

“你们都知道陶峰是何许人。在将近三十五年里，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的忠实走狗。壳牌石油公司是个巨大的国际公司，为榨取利润它的爪牙伸向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依照列宁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企业是最恶劣的形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好比水和火无法相容。陶峰死心塌地地为英国商行的利益服务，他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好的中国公民。长期以来，我们试图帮助他看清楚这一点……”

我惊奇地听到陶峰——我们办事处前任总会计师是大会批判的目标，因为我始终以为党对待他是较厚爱的。他的长子在五十年代被政府选派去苏联和捷克深造。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我知道当一个学生被挑选去国外时，必须

通过审查他的背景，内容包括他父亲的品质、职业和政治观点。陶峰在那次他儿子被选送到国外时，显然是通过了审查的，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现在被挑出来批判。

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建立，我就仔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我觉得在中国，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尝试，对国家的发展并没有明确方向。这恰恰是政府的政策始终象左右摆动的钟摆经常变化的原因。当事情走向极端或出现问题时，北京就采用纠正的手段，这些纠正手段用得过枉，反过来还得纠偏。自然，真正的困难在于一个国家控制的经济窒息了生产，来自北京的经济计划不顾及地方的状况，同时又废除了物质刺激。

当上面的政策改变的时候，价值标准也随之改变。昨天是对的，今天会变成错误的或者不道德的。于是一个党的下级官员的话及作用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才有效。所以我认为参加的这个会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主持者只是党的基层机构派来为壳牌石油公司前职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我想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向“左”摆的秋千，不久，当它摆动得过于远时将会被纠正的。人们得忍受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直到下一次政治运动开始。毛泽东相信，政治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我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接连不断的骚扰中的一个，中国人会忍受的。

用一只耳朵听着发言者的长篇议论，我环顾了房间的周围，看到了墙上的标语，“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陶峰”。他名字的两个字上打上了红色的××，意味着他被当作敌人来揭发。我刚进入房间时，这条标语没有引起我的注

意，只见墙上贴着许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标语，口号在中国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颂扬毛泽东、党、社会主义和任何党需要人民相信的东西；它们劝告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和服从党。在政治运动期间，口号就抨击敌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可以看到标语口号，要读遍看到的所有标语、口号，看来是不可能的。瞥上一眼，管它写了些什么，倒是容易的。

主持人讲到，陶峰颓废的生活道路是长期以来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的结果。他有婚外的不正当关系，嗜好美酒佳肴。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党所不能容忍的。这些指责并不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知道，当抨击一个人时，他会被描写得坏到极点，而且任何错误的举止都归结为受资产阶级的影响。

当此人充分地剖析陶的私生活，揭露资产阶级对他的腐蚀时，他的语调和举止变得更加严肃了。他联系到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讲到陶峰的错误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很少有自制力的贪婪者，更由于他替属于一百多年前曾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的国家的商行服务。这人还讲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好象这只是在一年前发生的。

虽然主持者用一种警告的语言并不时提高嗓子喊叫，他讲话节奏是缓慢的，还时常停下来不是喝茶就是看看笔记。他知道只要会议还在进行，没有一个听众会离开。一个党的官员，尽管他的身份很低，也是党的代表，他的话，就是党的话。他讲了很长时间，房间里热得难以忍受，听众也有些骚动。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十二点钟了。

也许是演讲者也感到疲倦和饥饿了，他突然停止了讲话，告诉我们休会到下午一点半。没等他说完，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涌向出口处。

外面，中午的阳光无情地照在酷热的人行道上。远处，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告诉车夫我的住址，用加倍付费的许诺鼓励他尽快使我离开这里。

这时早上带我进入大楼的人喊我停下，他要我留在这儿，到学校的食堂去吃点东西，怕我下午又要迟到。他急忙抓住三轮车的把手要我留下。我反复地答应他，我会准时赶到。他才让我走。

我的小屋，窗上遮起了布篷，走廊上挂起了绿色的竹帘，比起闷热无风的会议厅，可以说是另一个世界了。我身上的衬衫湿透了，渴得要死。我很快地洗了澡，喝了一杯冰茶，品味起我的高明的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饭菜。躺在床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后，我再次乘坐等着我的那辆三轮车出发。

到达会议厅时，我迟到了，但并不是最后一个到达。我在第二排找了个紧靠台柱的座位，这样当我太疲倦时，可依靠它。我需要支持。我带了一只很大的购物包，里面放了一瓶水、一只杯子和二条巧克力。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我平静地等待着，也不知道演讲者将讲些什么。

大厅渐渐地挤满了人。上午那人又登上了台，坐到他的位子上。这位主持者向后排一些人招手。我惊奇地看见陶峰头戴用纸做的高帽子，被带进会场。帽子上写着“牛鬼蛇神”几个字。假如他脸上没有极端痛苦的表情的话。你

就会觉得他滑稽可笑。

“牛鬼蛇神”是中国神话中的邪恶人物。他们装着人的模样，干恶作剧。一旦被真正的人类认识为魔鬼时，它们便原形毕露了。毛泽东首次将这个措辞用来描述1957年的反右斗争时的知识分子。他说知识分子当他们装出拥护共产党时，就象扮成人模样的妖精。当他们批评党的政策时，又成了邪恶的妖精。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话被迅速地采用，党的组织对任何人进行政治上的诈欺时，就用这一措辞。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称呼又适用于九类敌人：即1950—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抨击的地主；1955年农村合作化过程中被揭露的富农；1950年和1955年肃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反革命；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被逮捕的“坏分子”；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揭露的右派；判徒（被党的组织怀疑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出卖党的秘密的人）；特务（与外国有联系的人）；“走资派”（党的官员不严格地执行毛泽东的左派政策，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通常的措辞简称为“牛”。文化革命中监禁那些政治上有问题者的地方称为“牛棚”。由于这种迫害方式的推广，在中国的任何机构都设有“牛棚”。每个革命组织都有权发配“牛”监禁在那里，用不人道的待遇和残酷的方式迫使“牛”坦白。许多事例表明，比起被关在正规的监狱里，他们日子过得更糟。

陶峰看上去变化很大！当我们在一起工作时，他始终充满自信。如今，他显得那样的疲倦、神经脆弱。他明显地

消瘦了，似乎比数月前老了好多岁。我后面的年轻人在吃吃地笑。当陶被带上台时，为看得清楚，后排群众站了起来，有的还敲打条凳。台上有人向前推出一把椅子，要陶峰立在上面。陶峰登上椅子，头戴纸做的高帽子卑微地站在那里，台下吃吃的笑声变成了无法控制的大笑。

在大厅的角落里，有人站了起来，拿起毛泽东语录小红书(如此称呼，是因为它有塑料的红封面，任何人必须有这本小红书)，把它高高举起，呼喊口号：

“打倒陶峰！”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陶峰！”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笑声现在被谴责声淹没了。每个人都用他的脚助威，且挥动起毛泽东语录小红书。好象只有我没带小红书。我为自己的疏忽而苦恼，渐渐有点手足无措。突然，我惊奇地发现陶峰也举起他的拳头，热忱地呼喊同样的口号，包括那些反对他自己的口号。我刚才把带来的扇子、包、水瓶和杯子从膝盖上拿起放在条凳上站起来时，旁边那人已喊完口号坐了下来。我再一次收起东西，以便坐到座位上，旁边那人疑惑地瞥了我一眼。他从我这边向旁边移动了一下，好象害怕我的举止会玷污了他。

当群众显示了不容犯罪的愤怒以后，陶峰被允许从椅子上走下来。他低头站着时，高帽子掉了下来，青年学生

又一次笑了起来。陶峰用恐惧的目光注视着大会的揭发者。显然是害怕受到故意掉下帽子的指责。当有人拣起帽子放在桌上时，他投去痛苦的目光。

大会主持者叫公司里另外的成员，包括上午来我家的两个人和曾在陶峰的会计部门工作的下级职员上来揭发。他们一个个地上台表示自己的愤慨，重复着主持者在上午讲过的谴责。我知道，批判的范围和程度是党的官员决定的。如果想标新立异或不充分批判而随自己讲些什么那是不明智的。

中国人从自己切身的经历中知道，假如他们自己不去思考问题，只是重复党对他们所讲的，那么党就会更加信任和喜欢他们。我们前职员中的其他人对陶峰的批判进行了很长时间。所有这些被允许发言的人都是工人或下级职员，没有一位高级职员参与，那些高级职员都低着头沉默地坐着。

最后，主持者再次讲话。他告诉大家，陶峰经过积极分子几周的再教育和“帮助”已承认他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受害者这一事实。他用一种学校教师教训顽皮儿童的口气转过来对陶峰讲“是不是这样？国外的帝国主义者给你高薪是收买你做他们的奴隶！因为他们还承诺给你高薪，你就卖身投靠他们，准备为他们干任何肮脏的勾当，这是不是事实？”

每个人都在等待陶峰的反应，房间里一时静寂下来。但是没有戏剧性的、催人落泪的忏悔，他只是点头，看上去比以往更加沮丧了。

我觉得陶峰同意自己为金钱而卖身投靠，那是非常愚蠢的。承认了这一点，就为所有各种更为恶劣的谴责开了路。他会发现再想解脱就困难了。我觉得共产党接管城市后，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职工和以前拿一样的工资。由于政府不干涉，减少职员工资的事实实际上并没发生。陶峰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说法来解释(对此党的官员也很难反驳)，即为外国商行工作，就无法得到在政府机构里为人民服务的喜悦和个人的威望。

“陶峰现在作自我批评，”主持人宣布。

仍然是一种奉承的态度，也没有抬眼看一下观众，陶峰从衣袋里拿出几页纸，没有任何感情地低声读起一份事先准备好的陈述来。他承认主持者列举的罪状，并承认他的堕落是由于对社会主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后悔为外国商行工作了35年之多，虚度了光阴。他供认由于资产阶级的宣传，和壳牌石油公司给予的优厚待遇自己蒙受了欺骗和奴役，为此深感羞愧。他乞求无产阶级原谅他并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他提到他儿子是一位党员，曾被公费送到国外留学。他说，他自己生活堕落是对人民政府忘恩负义的犯罪行为。他向大会保证，现在他已经认识到国外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罪恶阴谋，他定要彻底揭露他们的罪恶计划，以此来表示自己真正的悔改，他说，为交待所犯的罪行，他将写一个详细的过程，为此他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帮助和接受再教育。

这是一个充满谩骂和夸张措辞的长篇陈述，有时他的声音发抖，有时又张口结舌。每当他掀过一页纸时，手在

颤抖。我并不认为，他的紧张是由于恐惧，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罪行。毕竟，壳牌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任何要求，都是人民政府所允许的。在遵守中国政府的法规上，我知道公司是认真、恰当的。对此，陶峰知道得更多，我想主要问题是他精神和物质上的消耗，迫使其人屈服和顺从，所谓“帮助”，我确信就是起码是数天的不停顿地询问，甚至施加压力不允许他睡觉。遭难者到了体力崩溃、精神混乱时便被打倒了，顺从了。在当时环境里，这不过是普通的常识。毛主义称这种不人道的战术为“炮打”。我知道许多人，包括我哥哥，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就有过如此的经历。当残酷迫害导致死亡时，官方就推卸责任，认为这只是群众运动的意外结果。

当陶峰讲完，主持者对大家说，陶峰这些话讲的是否真有诚意，还得观察。主持者还说今天的会议只是这类帮助会的第一次。其他象陶峰一样的人也将安排帮助，陶峰本人还可以再作交待。他停顿下来，用眼睛扫视着观众。我似乎感到他的目光在我的正前方停顿了片刻。他总知道，清除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影响，惩罚人民的敌人是无产阶级的职责。我又一次感到他的目光对准了我。

我以为，我决没有重要到整台戏的上演仅仅是为了针对我，即便如此，也吓唬不了我。

第一次参加“斗争会”给我的感觉是厌恶和羞愧。在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我们可爱的祖国，竟会如此野蛮地对待自己的同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羞耻。

开始呼口号，不过每个人的脚都往门前移动。

那个曾试图不让我回家吃中饭的人在过道里等我，他对我说：“你能不能来这儿一会儿？几位同志想与你讲几句。”

我跟着他到了一个教室，那儿学生的座椅和书桌被堆放在角落上。会议的主持者和在台上的另一个人靠着教师的讲台坐着。有一张空闲的椅子。他们示意我坐下。

“大会的内容你都听清楚了吗？”主持者问我。

我点点头。

“对这个会你认为怎么样？我相信你第一次参加这类会议。”

显然我没法说对会议我已有感想，也不需要说谎或讨好他。

我问，“我能否提些问题？”

他看上去很不高兴，不过他说：“说下去。”

“你代表什么组织？你有什么权力召集这样的会议？除了壳牌石油公司的老职员，另外出席者是谁？”

显然他愤慨我怀疑他的权威。他竭力控制住自己，说道：“我代表无产阶级。举行这个会是由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授权的。”

我要求他解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含义。他说，这是一场革命，目的是清除中国社会中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他反复引用毛泽东的语录，“毒草不锄，香花就无法成长。”他告诉我，在中国任何人都必须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你必须采取老实的态度，下决心努力赶上陶峰，好

好改造自己。”

“我不晓得自己犯了什么罪。”我惊奇地说。

“当你化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后，也许你会改变态度。”另外一个说，“如果你妄想替帝国主义打掩护，后果将是严重的。”

“掩护什么？帝国主义的任何行为都清楚地记录在我们的历史书里，”我回答道。

这人提高了他的嗓音，“你讲些什么？我们不关心以前的事情。我们讲现在，讲你工作过的公司。陶峰全部坦白了。我们知道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是‘挂羊头卖狗肉’（一个中国的成语，意思是表里不一，现象与事实不符）。你别把我们当蠢头。”

“听了你谈的事我简直莫明其妙。”我说，“就我知道的而言，我工作过的公司从来没有干过任何非法的或者是缺德的事情。人民政府有卓越的控制力，即使产生错误，也早就被发现了。”

两个人都盯着我。几乎同时喊道：“你想为帝国主义辩护！？”

我愤慨地说：“你们误解了。我只是陈述我所知道的事实。我为什么要为别人辩护？壳牌石油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已关闭了，英国总经理也离开了。没有谁需要我保护。”

“是，是，英国总经理离开了，不过你仍然在这里。你非常了解他干了些什么。你丈夫担任总经理的位置好多年。他死后你进入了公司，你当然知道有关公司的任何事情。”

“我当然知道上海办事处的任何事情，而且我知道它

从来没有干过任何坏事。”我说。

另外一位插话道，“我看你先回家吧，好好想想这些事情。需要你说时，我们会叫你来的。你的电话号码多少？”

我告诉了电话号码，离开了房间。

屋外，已是一片暮色，掠过一丝爽人的微风。我决定沿着弯曲的林荫道步行回家，活动一下筋骨，也思考一些问题。

走过第一医学院，我看见朋友惠妮从半关的门里出来，后面跟着她的一位同事。我们互相招呼。由于她住在我家附近，就和我一起步行回家。

“你为什么晚上出来散步？”惠妮问我。

“我刚刚出席了一个斗争会。我被通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因为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它的上海办事处？”

“你能和我一起吃饭吗？”我问她。对我的遭遇听听惠妮的意见是有好处的。她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比起我的经历来，她的体会多得多，我想。

“完全可以。我到你家再打个电话。这几天亨利很晚回家。作为一个教授，无论哪次政治运动他都要付出代价。教授始终是靶子。”惠妮说。亨利是她的丈夫，在同济大学教建筑学。

“亨利遇到了麻烦？”我忧虑地问。

“不，还不至于，感谢上帝。”她回答道，顺便拿出包里的梳子理了理头发。“你的佣人看到我来吃晚饭，这么散乱、不整洁，他们会不高兴的。”

尽管已45岁，有了三个子女，惠妮仍保持了苗条的外形和体态。作为医学院的英语和拉丁语教师，她尽管被迫穿着不太合身的“毛制服”和肥大的裤子，看上去仍然还有吸引力。获得新英格兰女子学院英国文学学位后，她与丈夫，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在中日战争结束时回到了中国。亨利被任命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不久成为分院院长。

在旧中国通货飞速膨胀的日子里，一个教授的薪水无法与上涨的物价保持同步。为增加收入，惠妮经常给生活在上海的欧洲人上中文课。由于国民党政府应付急迫的战后经济问题和学校改革的无能，导致其对国民党的幻灭。他们欢迎1949年共产党接管，并带来和平和稳定。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国民党封锁了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新闻，很少有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或毛泽东有真正的了解。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在1942年的延安或在共产党内和军队里清除“国民党和帝国主义间谍”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情景。1949年前有关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唯一信息，是由西欧记者和作家短暂访问后撰写提供的。他们大多数人是无偏见的唯心论者。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人的印象是：严肃、守纪、有毅力，不过并没有深刻理解这些人的性格或指导行动的哲学观点。当共产党通过在国民党控制区的地下组织加强它的宣传攻势，更重要的是最终用军事攻势来控制国家时，共产党重建和平国家、组织包括社会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民主主义的政府形式，听起来比国民党腐败无能的统治要富有吸引力。最终中国

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宣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是正直的，诚实的。

共产党接管上海后，妇女被鼓励参加工作。1950年惠妮成了医学院的一位教师。以后几年，毛泽东渴望所有的大学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开始思想改造运动。惠妮和亨利开始醒悟。虽然他们俩勉强活了下来，但他们忍受了侮辱，不得不就他们的家庭背景，国外接受教育和生活境况作自我批判，并反省亨利教授建筑学的目的和教育方法。他们必须反复坦白自己的生活历史。每一次，党的代表都要求作更加深刻的自我检讨。经受了这种严酷的侮辱之后，亨利被认为不适应继续担任建筑系主任，并改用苏联高等学校的资料作为教材。中国的传统工艺和来自西方的建筑学内容，被认为是封建的和颓废的。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党的书记被任命为各个层次的大学管理者。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教育不多，从来没有当过教师，但控制了教职员工的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亨利和惠妮住在分配给他们的房屋里，接受发给他们的薪水，用党的书记所要求的方法干他们的工作。这两个曾受过良好教育、富有活力和美好理想的年轻人，曾经对共产主义制度充满憧憬，但在毛泽东怀疑詈骂知识分子的政策下，这种热情减低了。不过，他们还算幸运。中国各地高校里的许多人更为倒霉。有的被赶出校门，有的还被送去劳动改造。

当朝鲜战争结束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暂时放松了。前总理周恩来了解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试图改

善他们的处境。作为宽大政策的结果，亨利和惠妮在我家附近得到了一套比较宽敞的宿舍。也很少强迫专家参加活动。惠妮经常跑来看我，不是阅读从香港和英国寄到我办公室来的书籍，就是听听我的录音唱片。

1956年，毛泽东开展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运动，在任何组织里的党的书记，甚至毛泽东本人，鼓励人民坦率而建设性地批评共产党的工作。相信党是真诚地希望改进它的工作。数万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上百万人倾吐了他们的不满和建议。亨利和惠妮不敢公开发表意见。到1957年毛泽东改变政策，发动反右斗争，亨利和惠妮才免遭迫害。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被送去劳动改造；另外一些人被降级减薪。再三邀请作坦率的建设性的批评，然而又严厉地处罚提出批评的人，毛泽东如此奸诈的行为完全吓坏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以至于中国的文化生活处于停滞的状态。

惠妮和我到达家时，我还没按铃，前门就打开了。老赵忧虑地站在那里等我回家。他告诉我，女儿来电话说她不回来吃晚饭。

“请告诉厨师我们等着吃晚饭。”我对老赵说，然后请惠妮上楼淋浴。

老赵为我俩安排一张西餐桌，上面铺着白色的绣花亚麻台布。餐桌中间是一瓶白色的康乃馨。

“厨师说这是清蒸桂鱼外加新鲜蔬菜，还好吗？”老赵问我。我每天吃中餐还是用西餐，完全根据我的厨师能从市场上买到什么食物而定。

我用目光询问她，她说：“很好，我喜欢桂鱼。”

我们坐下后，惠妮仰视着一幅灰暗色的女子肖像画。作者是著名画家林风眠，他曾是国立艺专学院的院长。

这幅画是蓝白色餐厅里的主要装璜。木制的餐具架上陈列着薄胎盘和江西花瓶与餐厅蓝白色的颜色很协调。

“你听说吗？林风眠处境非常困难，”惠妮告诉我。

我感到惊奇。我知道画家能为人民政府赚得巨额外汇。政府用少量的金额买他的画，到香港可卖到二、三十倍的价钱。

“他被谴责推行颓废的西方艺术形式。更加严重的罪状是他主张与外国人联系，提供信息给在上海的外国商店的老板。他邻居中的积极分子看到外国人到他家去。”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巴西嘛。我了解的情况是商店老板来买他的画，”我说。

“另外许多画家处境也太困难了。你们的老教师，彭女士也被批评了。说她曾经画了一枝梅花（一种在晚冬和早春开花的树）笔直地悬下，象征共产党的败落。”

我放下刀叉对惠妮说：“他们是疯子，在画梅花大师的画里，它经常被描绘成悬在峭壁上。这并不是她的发明。”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党的官员也许从未看过老画家的画。主管艺术的官员，不需要了解水彩画与版画的差别。他们多数人不知道。”

我们的谈话显得如此沮丧，以至于压抑了食欲。我们无心欣赏厨师提供的可口饭菜。

当我们在客厅喝茶时，我告诉了惠妮我刚参加过斗争

会。她听了后说：“现在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它的上海办事处，你的待遇也同我们一样了。国外也没有人会知道你出了什么事。”

“你以为他们要我参加会议的目的是什么？”我问她。

“当然是恐吓你啰。”

“我不是容易恐吓的。”

“我想，他们并不了解这些。他们总认为象这样过着舒适生活的富裕女子，以前又没有卷入过政治运动，是容易被吓住的。通常他们都低估我们的勇气。”

“为什么你认为他们要恐吓我？为什么？”

“这是问题的关键，很难说。无论怎样，你要有坏的准备。小心地闭住你的嘴。不管多愤怒，也不能说漏了嘴。”

“那么你自己呢，过得怎样？”我问她。

“我消磨时间。会议和写大字报花去了我的所有时间。课也停了，许多教授和医学专家被揭发了。形势比1957年的反右运动严重得多。”

“你有可能成为批评对象吗？”我问她。

“这不可能。我还没重要到这个地步。我只是个有十六年教龄的讲师，没有升过级和提过薪。我始终小心地接受党的书记的教导，从不放纵自己。甚至明知是错误的也执行他的指示。在思想教育会上我从不讲话，除非要我讲，我也只是简单地重复我们的领导和党的书记说过的话。我觉得自己的举止是可以认为无可指责的。总之，分析下来，你来的年数长，就可能陷入困境。‘树大招风’是一种

确切的说法。”

“亨利怎么了？”

“我正为他烦恼。我想他会象所有其他教授一样被当作‘牛鬼蛇神’揭发批斗。”惠妮无可奈何地说，然后闭上眼睛叹息。

“除了教书他没干过任何事情，出了教室他也很少说话，”我说。

“这倒是的。他从几乎都是右派分子的朋友那里吸取了教训。他只是一个有学问的教授，家庭过去非常富有，他的姐姐在台湾。”

“你们不是没有同他姐姐接触，没有写信给她？”

“问题不是这样。有她存在，又是亨利的姐姐，如果党要追究这个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制止的。”

老赵进来，帮我们倒满了茶。

“在你回卧房前，厨师想给你说句话。”老赵说。

“好的，请他进来吧。”我对他说。

厨师和老赵一起进来了。

“壳牌石油公司工会副主席秦同志，今晚在你回来前又来了。他要我们给你传个话。”厨师说。

“他说什么？”我问他。

“他要我们告诉你，与党的官员讲话要留点神。他说，你离开会场后，他们抱怨你态度粗暴。秦想要你知道党的官员生气了。”厨师说。

“秦是个好人。”老赵插话道。

“好人？你没看见斗争会上他揭发陶峰！”他的丑恶表

演还留在我的心中。

“他无法避免。要他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他就犯不着来对你通风报信。”老赵替秦辩护。

“你是对的，老赵。我会小心的。秦不怕麻烦地跑来，是不容易的。感谢你们俩告诉我这些。”我对老赵和厨师讲。

佣人退去后，惠妮说，“他们真好。你是应该小心点。在政治运动中，触犯直接主管你的人是不值得的。他们有绝对的权威来决定你的命运。假如他们要送你去劳改营，你就必须去。”

“他们怎么能送我去劳改营呢？惠妮？”我说，“我并没有为政府干工作。我也没有触犯过法律！”

“不要天真！假如他们需要，他们就会这么干。你生活在这里，又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不为政府工作的唯一好处就是他们不能减你的工资。”

惠妮站起来告辞。我陪她到前门。

“去年壳牌石油公司申请关闭时，你为什么不去香港？”惠妮问我。

“这个我能告诉你什么呢？谈判期间总经理需要我，他语言不通。所有事情是在中国处理。壳牌石油公司对我很不错，我不能关键时刻离开他。当他们需要我时，我不能不支持他们。”我说。

“但愿他们感谢你的责任心。现在他们不能帮助你。你回去吧。”惠妮说。

“但愿你和亨利象当年反右斗争时一样渡过难关。”我对她说。

“我有时有一种灾难来临的预感。”惠妮悲惨地说，“但想想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就得争取生存下去。”

我们站在门外相互告别。走了几步后，惠妮又转过来对我说，“事态明朗前我不可能再来了，如果你需要，请打电话。”

“我明白。你当心！”我说。

“你也当心！”她激动地说。

关闭前门后，在无云的天空下，我走向房间，一颗颗星星在空中闪烁，多么美丽的夏夜。

我仍然沮丧、困倦，我来到卧室，上了已铺好的床。白天的情景在眼前出现，躺在床上我无法入睡。女儿回来了。

“妈妈，妈妈！”她登上两步楼梯就带着少女的神情喊叫起来。我大声说，我在卧房里。陈妈跟着她进入了我的房间，手里拿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杯牛奶和一盘三明治。

“天啊！我太饿了！早饭后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她拿起杯子喝牛奶，我看见她的手指上沾满了油墨。

“看看你的手指，你打算用这手吃三明治？你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了，可是你的举止行为还象个十岁的小孩子。从前的话，象你这样年龄早就结婚了，说不定已有二、三个孩子了。”陈妈责怪她。

当我女儿还是个小女孩时，陈妈就和我们在一起了。

作为一个老佣人，她能责骂我的女儿。

“现在不是从前！亲爱的陈妈，老派女子！”梅萍抗议道，然后进入我的浴室洗手。

陈妈把三明治放在桌上，转身想离开房间。她对我说：“你不要为老赵、厨师和我发愁，我们始终站在你一边。”

“感谢你，陈妈，你这么关心我。请告诉老赵和厨师不要发愁。”她的话使我感动，我回答道。

“我们烦恼的是你，因为你太孤单了。多么希望先生仍然和我们一起。”她小声说，关上了身后的门。

陈妈确实是老派的。紧要关头她坚信男子的力量和本领。事实上，在我女儿回来以前，躺在黑暗的房间里，我正思念着我的丈夫。自从他死后，我第一次，不为他的死而惋惜。要是他还活着无疑是斗争对象，现在他能免受这种侮辱和迫害，我是欣慰的。

浴室的门关着，加上水流正在冲洗的声音，女儿听不到我们的说话。

女儿梅萍是一位有魅力的聪明女子。生长在共产党中国的环境里，象她那样富有教养的姑娘该享受种种便利的社会已经消失。如今事实上也无法形成每个人都能享有相同的教育和地位平等的社会。新的制度，歧视象她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在她年轻的生活道路上，处处由于家庭背景而受到妨碍。举例而言，想进入好的中学，她入学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80分，而工人、农民的子女只需要60分。

“这是不公平的！”那时，由于女儿遭到歧视感到不满，我喊叫过，“有什么理由作这样不公正的规定？”

“不要烦恼，妈妈！我会考好的！我会得80分！这并不难。”十二岁的孩子尖声说。

“这是不公平的！”我仍然愤慨。

“妈，老师对我们说，工人、农民子女放学后要做家务、烧晚饭。他们的父母又不能帮助做功课。如果你考虑到这些的话，那我受的待遇就是公平的了。”年纪轻轻的她显得非常冷静。

在她想干的任何事情上，这种歧视都会盯着她。无论何时她遇到这种歧视，对于自己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就会产生一种负罪和羞耻的感觉。她和象她一样出身的孩子，必须比工农子女更加努力。他们从小就知道比起资本主义社会来，共产党社会等级制度更加严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想从下层进入上层社会靠的是他自己的努力。由于我女儿的努力，她还算走运。在有声望的市立第二女子中学里读书，她是一位学生干部，赢得了荣誉和奖金。她似乎乐意地交了新朋友，其中不少是来自工人阶级的家庭。虽然她生来就仁爱 and 宽厚，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共产党宣传机构的富人剥削穷人的灌输，使她有一种负罪感，促使她希望帮助工人子女。她经常带她们到家里来，让她们分享自己的食品，帮助她们做功课，甚至有时去她们家帮助做家务。当我认为她的活动有点值得赞扬时，陈妈很不赞成，尤其是当梅萍把她的衣服借给另外的姑娘，然后拿来脏衣服要陈妈洗的时候，她更是不高兴。

从幼儿时，她就显示了对音乐的兴趣。我们为她买了钢琴，放学后为她安排了专门的课程，她十岁时，成了上

海市少年宫的成员。这是一种俱乐部，专门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作为成员。在那儿她演戏，参加音乐活动，因会两国语言，少年宫来了讲英语的外国访问者，她就成了年轻的翻译。在澳大利亚，当她还是个婴儿就学习了游泳，现在成了班级里非正式的游泳老师。十四岁在念中学时，她被上海体育运动协会挑选去上海划船俱乐部接受训练，假日期间她成了上海划船队第一个女子舵手。

虽然我生活在周期性的政治骚动中，一些朋友和邻居的个人悲剧也使我们伤心，我却从来没有为我的女儿烦恼过。我只指望她将进入一个好的大学，毕业后有个适当的工作与一个好的年轻人结婚，他工作收入并不重要，我将贴补她，其实中国的许多父母都这样干。

我希望她毕业后能分配在上海工作，这样她就能住在家里。不过我不敢肯定这一点。我知道有她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常常被送到中国的边远地区，那儿生活条件落后，非常穷。这种情况已在我朋友的子女身上发生了。当我看到女儿从瘦弱的少女变成漂亮的年轻女子时，我是急于想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乐观时，我梦想着把房屋的三楼改装成梅萍和她家庭的公寓，护理小外孙的希望极大地安慰着我。我欣喜地凝视着我这玫瑰色的梦，几乎感到在我的怀抱里这个小小的生命的温暖。

当女儿告诉我，两位著名的电影演员兼新建立的上海电影学校的教师与她商量，建议她去试一下，选择专门人才进入电影学校的入学考试时，我多少有点惊奇。我知道她是乐意被挑选的。不过我希望她干另外的事情，与其发

挥她的身体素质的长处，不如发挥她的知识才干。

“电影学校在虹桥路，老的高尔夫俱乐部附近，周末回家很方便。两位老师告诉我，所有毕业生都安排在上影厂工作。实际上这个学校是附属电影厂的，通过入学考试，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人才。工作地点一限制，反响就大了，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上海生活。”梅萍说。

“你打算成为一名电影演员？”我问她。

“无所谓。我能干这个，这并不难。”这是她对任何问题的标准回答。

“我相信你能干好它，不过你究竟想不想干？”我认为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干的工作是自己乐意干的，那才是幸福的。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想干什么。政府将给我们分配工作，想这些有什么用。老想自己准备干什么，只会使人失望。我的朋友没有人会去考虑职业的。”她说，“国家要我干什么我就乐意干什么，如果我尽最大努力去工作，最后也会喜欢这个工作。”

我推测女儿的态度是受环境的影响。难道一个人被分配掏粪作为终身职业，也会因为他的努力而喜欢上这个工作？

“那么你是决定去试一下入学考试了？”我问她。

“是的，如果你同意。老师是正式对我说的。此外，我想在上海工作。我不愿让你孤单地留在这里，而我只能在每年春节时回家几天。”我的女儿说。

“是的，是的，孩子，这确实是最需要考虑的一点。

我不能让你去内地工作。”我完全理解她的心情。

这样她入了电影学校。三年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电影厂工作，这家电影厂属于文化部电影局管理。

演员职业在共产党中国是有点魅力的。不过干这工作的人工资并不高，也没有比工厂的工人和相同年龄的教师的工作条件好。演员的作用就是要给群众带来欢乐。所以除了拍电影外，她经常随剧团去中国各地方旅行，到工厂、农村、煤矿和油田演出。这是很辛苦的生活。她觉得是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给了她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为报答他们，她要给他们带来快乐。对她来说，这是有意义的生活道路。

她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告诉我电影厂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化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在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我们听说谁写的大字报愈多就证明谁的革命热情愈高，这样每个人都写啊写啊，直到属于我们区域的布告牌和大墙壁的空间全部被贴满为止。”

“为什么不回家吃饭？”

“我们放弃吃中饭和晚饭，显示我们的无产阶级热情。实际上大家都饿得慌，但谁也不肯先离开。”

“你们写些什么？”

“噢，口号和通令，专门针对被标明的牛鬼蛇神和所有中国的敌人，例如，台湾、日本、英国、美国和苏联。”

“你知道怎样写？你收集了材料？”

“有人干。我收集太危险。我们大多数人是从‘头头’那里得到材料。让我收集反动国家的材料。‘头头’，因为

她知道我出生在国外，对外国比较了解。我也不想写针对个人的。我并不了解被揭发人的任何生活情况。我不想说谎和献媚。那些老的男女演员、导演和编剧必须写自我批评。他们许多人已经被揭发，一次又一次地被积极分子在斗争会上揪斗，或者要他们低着头，站或跪在太阳下。”

“多可怕！”我喊叫道。

“是可怕的。我也为他们遗憾。我听说他们以前曾是江青的敌人。毛主席给了他夫人江青很大的权力，可以指挥艺术界的任何人。”我的女儿说。

“她不是提倡京剧现代戏？”

“是的，这就表示她与文化部的负责人意见不合。我听说，当年江青在上海曾经是个女演员，那时比她演得好的那些演员如今都被整理了材料，准备送劳改营。看来她非常残酷和妒忌。不过关于她最好不要议论。”

“可她跟我们相去甚远。她如今可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她为什么担心那些女演员？”

“也许是她们知道很多她过去的的生活，她们说江青在延安与毛主席结婚前，有许多情人甚至有几个丈夫。”

“毛主席也有几个妻子，为什么她不能有几个丈夫？她以为这样才象‘好莱坞’明星。”我笑道。“你在中国受教育，在这些事情上所以就严肃了。告诉我关于你自己的情况？你好象作了自我批评？”

“妈妈，别傻。我可没有这么重要。我只是一个群众。自然，我的家庭背景和我出生在国外可能会遭到批评。不过比起美国和英国，我出生在澳大利亚还算走运吧？！”

“自然没有人会说澳大利亚是个帝国主义国家。”

“不，电影厂的许多人以为澳大利亚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受压迫。他们不知道，澳大利亚人是真正的英国人，只是袋鼠是本地的。”我女儿坦然地笑着说。

她吃完了三明治，站起来去自己的房间。她随便问道，“今天你干了些什么，妈妈？”

“我被叫去参加批判我们办事处以前的总会计师的斗争会，这表示我也必须参加文化革命。我可能成为攻击对象。”我告诉她。

“啊，我的上帝！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由于我的消息，梅萍激动起来。她又坐了下来，催促我告诉她详情。我讲述了一天的经历后，她变得非常烦恼。

她问，“你们的办事处好吗？它干过什么坏事？”

“没有，肯定没有。”我告诉她。

“他们为什么挑选了总会计师？也许是他为了公司的利益违反了外币兑换规定？或许是他没有付税？”

“我们正常付税。在遵守外币兑换规定上，我们是很谨小慎微的。”

我们都觉得迷惑，不过再思索也没用。我催她上床休息。沉默了一阵以后，她说了声晚安离开了房间。她似乎变了一个姑娘，比起刚才进来时老成了许多。

我关了灯，仍然很清醒。我想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女儿第一次经历的政治运动。我想知道这个运动将怎样影响她的未来。过了一些时间，我卧室的房门被轻轻地

打开，我开了灯。

“妈妈，我睡不着。如果我下去弹一会儿钢琴，你在意吗？”梅萍穿着睡衣裤，站在开着的门口问。

“我和你一起去。”我说着从床上起来跟着她下了楼。“拉菲”，梅萍的大波斯猫，在阳台外面。它看见了我们，咪咪叫着想进来。我打开纱门。梅萍快步过去抱起它带进她的书房。她放下“拉菲”，打开钢琴盖，用手触动一些琴键。转向我问：“我弹些什么？”

“什么都行，只要不是革命歌曲。”

她开始弹起肖邦的小夜曲，小声对我说，“好吗？”

我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钢琴下“拉菲”蹦到了梅萍的脚上。这是一幕和睦、平静的家庭生活景象，但是一种无形的威胁正悬在空中。

第二章 风暴前的宁静

首次会议后的数周内，我被相同的人叫去会面了几次。比起第一次来，我们的谈话有些变化。他们要我提供一份我所知道的美国人、欧洲人名册，以及他们的职业、住址和我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他们的。另外有一次，他们要我写我们办事处的活动情况。不过，当我拿给他们我写的纸时，他们只是瞥了一眼。他们又告诫我揭发以前的雇主，但不询问有关公司的具体问题，只是暗示壳牌石油公司干了坏事，并且我也有份。

确实，我有个印象：这些人在拖延时间，等待来自上面的指令，以推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我和其他中国人都不知道，运动趋于迟缓的原因是，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正在应付一场激烈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谁来指导文化革命，是否建立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任命的党的机构和专门委员会。

八月初，事情揭晓。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毛泽东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做：“炮打司令部”。在大字报中他控告政府行政机关（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是负责人）和党

的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为负责人)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他认为，他们的政策保护和适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对党的机构和共产党中国的行政机关最严厉的指控。毛是有能力对刘和邓进行指控的，因为他通过他的门徒国防部长林彪控制了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地位，刘少奇正式作了一个自我批评的报告，说他的经济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小生产，允许自由市场满足城市人民的需要，是鼓励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主张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也许刘少奇认为自己认罪能换回毛的面子，事实上刘少奇的经济政策在1958年—1960年灾难性的大跃进运动以后，把中国从经济崩溃中解脱了出来。然而，刘的认罪证明是一个战术性的错误，这样一来对他极为不利，使毛泽东对他和在政府中的同事的攻击逐步升级。

在中央全会上，毛的胜利使被指定的毛主义左派专门委员会指导文化革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和政府的机构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攻击下瘫痪了。这个委员会成了政府的最高机构，它的成员包括非常贪权的、已被选入政治局的毛夫人江青。在文化革命年代里，江青利用是毛夫人的条件，成了毛的发言人和代表，假借传达毛的命令和愿望，实际上是把毛的话解释为适合他们自己的需要。这位无情的野心勃勃的妇女，几十年来没能参与政治生活。如今她容忍不得任何反对，哪怕是想象中的或者其它方面的抵抗。成千上万个党的官员、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平民百姓因她的多疑被打倒，遭受残酷的迫害。有的含恨死在江青信任的革命群众手中。

在这次八月的中央全会上，国防部长林彪作为毛的最亲密的支持者出现。会议结束的公报中林彪称毛是天才的颂辞被发表。林彪认为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他的功劳，毛泽东应排列在苏维埃领导人的前面，包括在列宁主义的真正成功者斯大林的前面。在文革十年期间，甚至在林彪受耻辱后，这一主张一直被毛主义维持。

中央全会公报发表以后不久，我已故丈夫的一位朋友吴先生来看我。在中国，男子间的友谊是排斥他们的妻子的。我丈夫死后，他的朋友便不再来我家。只有吴先生每到过年时，作一个传统的、礼节性的访问。他一般仅来一会儿，问候过我女儿和我的情况后，希望我们在新年里身体健康、幸福。他始终提到我的丈夫，告诉说，我丈夫如何尊重他，又如何看重他们之间的友谊。离开前，他要在桌子上放一个包着赏钱的红包给我的佣人。这是在共产党控制下只有很少一些守旧的中国人遵守的老习惯。我为他的来访感到欣喜，虽然吴先生有点古怪，但充满迷人的温情色彩。

当老赵通知吴先生来时，我感到意外。我要老赵引他进客厅、待茶。

吴先生自己有一家制造油漆的工厂。他的产品闻名全国，出口香港和东南亚。共产党军队控制上海以后，在政府的监督下继续经营。1956年，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期间，他的工厂被政府接收。政府允诺，对所有资本家每年按他的资产价值偿付百分之七利息，共付十

年。虽然他们企业的赎买价只是实际价值的几分之几，但是资本家没法选择，只好接受。当新任命的党的书记和厂长管理他的工厂时，因他有技术就邀请他作为总工程师和副厂长留在厂里。

由于受到良好的中国式教育，吴先生对西方文明显得无动于衷。他写一手优秀的书法，讲话时常使用成语。共产党政体持排外的态度，他并不烦恼，因为他自己的见识和兴趣没有能超过中国的国界。比起那些在国外受教育的人，党的官方很少怀疑象吴先生那样没有海外联系的人。他对失去工厂的哲学见解和地位下降的逆来顺受一直使我感到吃惊。当许多资本家觉得党的官方委托他们管理的工作难以开展时，吴先生管得不错，他还与取代他当了工厂首脑的党的书记建立了朋友关系。

“我听说你被卷入了最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想知道情况怎么样？”吴先生解释他来访的理由。

“很不好，我很害怕。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正在被审查。我遭询问，而且一定要我参加批评以前的总会计师的斗争会。”我告诉吴先生，“和我谈话的人好象暗示公司的活动也有不正当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实在太玄了。以前我从未卷入过政治运动。”

老赵拿来银茶具、我最好的瓷器和一大盘小冰糕以及英国传统风味的薄薄的三明治。这些东西是我用来招待我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朋友的，他们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好的中午茶点。把吴先生作为尊敬的贵宾来款待是老赵的主意。当他把盘子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

了，他过去接电话，又立刻回来对我说，“又是那些人。他们要你立即赶去谈话。”

“告诉他们我很忙，我可以明天去。”我说。

老赵又走过去，在电话里讲理由。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立即去。他们说事情非常重要。”

“我能不能问一下，叫你去的人是谁？假如重要，不要因为我在这里耽误你去。”吴先生对我说。

“还不是找我谈话的官方。”我告诉他。

“那你得马上去。当这些人要你去时，你绝不能拒绝。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我想知道你更多的情况。我答应过你丈夫，要给你一些帮助。这也是我的责任。对付这些人你没有经验。他们是卑鄙的，他们怀有恶意。你可不能触犯他们。”吴先生说，他显得很发愁。

他打算等着我回来，我很高兴。我非常需要听他说说文化革命和最近的中央全会情况。我离家时下午四点过些，回家时已是晚上八点，吴先生仍在这里。我走进家，他从客厅里出来欢迎我，脸上带着欣喜和安慰的笑容。

“很抱歉，我离开这么长时间。”

“坐下歇会儿。告诉我，去干了些什么？”

老赵沏来一杯热茶。一边慢慢喝茶，一边对吴先生介绍起我与党的官员的谈话——

除往常两人外，还有第三人，他可能是他们的上司。也许是想让新来的人留下印象，他们比往常更加不客气。当我进入房间时，他们中一人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想来？”

“我忙。今天上午不是已通过电话？”

要是过去，有人会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今天他们要我站着。

“一旦我们找你谈话，你就必须立即来。”他冷笑着说。

不管怎样我还是决定坐下来。

“瞧这一长串你的外国朋友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朋友？你肯定是喜欢他们，欣赏他们的文化。”他瞪了我一眼，继续说，“你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生在这里，在这里度过了童年时代，称赞中国文化、讲我们语言，对中国人民友好。但是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的祖先通过鸦片贸易掠夺了财富，他们自己曾拥有工厂、仓库、商店，在中国，在光天化日之下为所欲为。如今他们失去了所有这一切，怎么可能对中国政府有友好的感情呢？是的，当国民党在这里的时候，当他们尽量剥削中国人民的时候，当有可能聚积起巨大的财富时，他们是会喜欢中国的。不过现在他们一定不会喜欢中国。你还说外交官对中国是友好的，这太可笑了！外交官是他们政府派来的间谍，收集情报反对我们。他们怎么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往他们脸上贴金，让他们看上去象仁慈的佛像是无用的。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当然是你的朋友。现在你的立场在哪里不是完全清楚了，是不是？”我结识这些外国人，并非想与他们发展友情，而多半是在我丈夫当外交官和主持上海办事处工作时认识的。

“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了

外国资产阶级公司的总经理。”他挖苦道，“你丈夫的经历是不光彩的。”

“他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是由人民政府的工商部门批准的。是这个部门认可了他的职权。他作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官员，1949年留在上海而不与国民党政府一起去台湾，难道不表明他是支持共产主义革命、是衷心欢迎人民政府的建立？”

“他留下来可能有另外的理由，我们晚点处理他的问题。现在我们要你揭发英帝国主义，坦白你作为他们的忠实代理人为壳牌石油公司干的任何事。”

“我为壳牌干的任何事情，都是按照人民政府的法律和规定。”我强有力地声辩道。

那位新来者没有讲话，不停地抽烟，房间里充满了蹩脚烟草的气味。他把烟屁股扔在地板上，用脚踩碎它。瞧了我一会儿他说：“你的生活是无可指责的？你全部生活都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联在一起。难道可以说，你决没有干过或说过任何不适当的事情和话？”

“不管我干或者说的是不是正确，但是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我坚决地说。

“按照我们的看法，至少你是承认可能说过和做过一些不正确的事。”他冷笑着说。

“不对！我不承认这点！”我说。

这新来者比另外两人更阴险。虽然他话语平缓，没有叫喊，我确信他是在寻找机会耍弄花招。他改变了话题，说：“讲一下你的办事处活动情况。”

我对办事处工作作了简短的说明。当我讲完时，他说，“你告诉我们的，几乎就是你写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记住这些写的东西，你是花了功夫的。为什么这样小心呢？”

“我讲的与写的是相同的，因为事实是相同的。”我说。谈话进行了很长时间，我想到吴先生还等着我，于是我看了看表。

“你饿了，想走了？也许你觉得这次谈话不愉快？”他好象达到了目的，显得很得意。

“我只是觉得你浪费了你的时间。”我说。

“我们并不害怕浪费时间， we 有耐心。我们共产党推翻国民党政府，化了二十多年时间，最后不是成功了！只要我们确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不停地追求，直到最后胜利。”

死一样的寂静。彼此走进了绝境。突然，在斗争会上讲话的那个人恢复了他以前的战术，他喊叫道：“我们不会让你离开！你得提供一份记录你干坏事的单子，来证明你有没有诚意改变立场。否则，后果将是严重的。我们知道你毫无疑问是一名英国间谍。”

他们用“间谍”这个词还是第一次。或许此人太激怒了，讲话超过了所得到的指令，另外两人用意外的目光瞥了他一眼。

我对他的发作觉得可笑，平静地说：“你完全错了。象你们一样，我可不是任何人的间谍。”

新来的那人接着说：“可能你干和说的那些事，不能马上想起来。你为什么不上回家去想想呢？把每件事情都写下

来，不管怎样琐细或者不重要。我们多给你一些时间，两个星期怎么样？”

“两年也一样。我不打算编造任何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个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不过必须这么干。我们伟大领袖比喻承认错误就如动手术，手术是痛苦的，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新人。你难道不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位好公民？你不应该落后于别人。我们要你坦白，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而是希望给你一个显示诚意的机会。”

我想回答他，他疯了。不过我咬了咬嘴唇，沉默了，不希望再延长无意义的对话。

他看到我沉默，知道我在想什么，就顺势解脱着说：“天已经很晚了。回家去考虑考虑我所说的。你花两个星期时间，我们再叫你来。”

内心充满激愤，我走出了大楼。没有三轮车。在车站等了很久之后，我只好步行回家。

吴先生默默地听我叙说。老赵进来招呼吃晚饭。因为吴先生不喜欢欧洲烹调，我的厨师准备了精美的中国饭菜。吃饭时，我们不再讲文化革命这个令人不愉快的课题。我们讨论我的女儿和他的孩子的活动。感到骄傲和欣慰的是，我们的孩子尽管有家庭背景的障碍，他们在社会主义中国还干得不错。

当我们又一次坐在客厅里时，我向吴先生问了一个一直存在心中的问题。

“我的印象是，他们是逼我编造出一个坦白交待的材

料来。是不是这种情况？”

“是的，是的。他们只是要拿到材料，并不关心材料的真实与否。”

“那关键在哪里呢？如果每个人都写一个虚假的材料，他们自己不也搞糊涂了？”我迷惑不解了。

“搞到坦白交待的材料是他们的工作。假如他们搞不到，就会被指责为不支持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什么时候一发生政治运动，许多人就被攻击，许多坦白交待的材料就产生。最后，骚乱过去了，会做些善后工作，他们中一些人的不公平处理，可能给恢复名誉。”

“他们必须等多少时间才能恢复名誉？”我问。

“可能是两年，可能再也不恢复了。每个组织内 占总数百分之三~四的人必须被定为‘敌人’，这个比例是毛主席在一个演讲中叙述的。”

“太可怕了！”我喊道。

“这是很可恶的。并没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反对人民政府。党的官员时常把那些他们厌恶的、爱吵闹、有情绪的人列入敌人的名单。不过，不管压力多大，没有人会作假的坦白。”吴先生说到这儿神情很严肃。他看了看我，似乎要我确信他讲的情况，“在每一次政治运动期间，这始终是我的策略。”

我理解这就是他跑来给我的忠告。他没有很率直地说，“你不能作虚假的坦白，不管多大的压力。”因为在中国的家庭里，佣人在客人来时，始终能听到人们在讲些什么。吴先生不想让老赵听到他告诫我不要乱坦白。他是一个小

心的人，对谁都不轻信。

“有人在高压之下无法再忍受下去，就被引诱写下了一些不真实的事情，用来满足审问者、解脱自己。一旦你开始交待，他们就要你承认更多的罪行，不管是不是虚假的，通过行使压力得到他们所要的。最后，这人就陷入了颠倒黑白的纷乱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看到过这种情况。”吴先生仍在阐述理由，没有说，“你不能。”

他的劝告是适时的、有价值的。本着对我丈夫的友情他不辞辛劳跑来提醒我，我很感动。他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当他明白我已理解他来是想讲些什么，他便谈了政治运动的一般期限。他自称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了，由于经历丰富，他已学会了怎样去应付它。

“你怎么看中央委员会的公报？”我问他。

吴先生摇了摇他的头，打了个手势。片刻后，他说，“毛主席赢了。这并不意外。”他又说，“政治运动开始时，总有一个最坏的时期。几个月以后飓风失去了它的冲力，大约一年后就销声匿迹了。”

“一年！这么长时间！”我说。

吴先生笑我太激动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年算什么？在我们数千年的历史里，这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与你了解的欧洲人相比，并不是一码事。”

“我被指控是英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我知道英国情况。”

“他们的指控仅仅是一种借口，用来愚弄群众。早晚他们将打击每一个不信任的人，也许他们认为现在处理你

是最好的时机。”

吴先生说，一旦我想和他谈些事情，请打电话，说完他站起来打算告辞了。作为最后的劝告，他讲，“几乎所有下级党的官员，都怀有一种自卑感，尽管他们有权控制我们。所以，他们就靠权力压制我们，使我们日子不太平，好让自己安心，这实在太不幸了。你受审时，一定要坚定，当然要有理有节。决不要触犯他们，他们是卑鄙的、狠毒的，他们也是非常残忍的。”

“我生来不会谄媚、奉承。谢谢你的告诫，我会记住的。”我说。

我太专心于自己的问题了，我想应该问问他的情况。

吴先生用一种顺从的态度，富有哲理地说：“我加入了工人的行列。别人担任了我以前的工作。我给党委书记的辞职信中说，象我这样以前的资本家，还留在行政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想到他现在已成了工厂的普通工人，真吓了我一跳，他倒似乎并没尝到苦味。

“当工人不坏。”他说，“在苏联，共产党控制后，我相信全部的资本家都被杀了。我们还活着，还可照料全家三代人。我要求党委书记分配我干最没有技术、下贱的工作。现在我成了一名苦力，推未加工的材料筒，或者装煤车。没有人羡慕或妒忌某人干这种工作。我要求干这种活，党委书记好象也觉得遗憾。我们曾经相处得不坏。”

我回忆起我丈夫曾告诉我，吴先生与党委书记之所以相处得好是因为他干工作，书记获得荣誉。由于管理好和

年产量高，他们的工厂年年赢得了红旗。

“你不是为他干了所有的工作？”

“是的，我干了大部分工作。为振兴工厂我是倾注了全部心血。在1930年刚开厂时，厂里工人很少；到1956年工厂由政府接管时有1400人。我们还为青年技术员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和培训中心。”

“你为什么想作一名苦力？即使是个工人，用你的知识和经验也可以干更多有用的工作。”

他用手做了个否认的姿势：“作苦力，在目前情况下不坏。我们在厂外劳动，在库房里休息。假如发生什么错误，没人会谴责我破坏厂内的机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那以前的资本家更是首先列入了政治运动期间的怀疑名单。”

说了这些精辟的意见后，他告辞了。与我握手时，他又说，“适应它，生活下去。只要你长寿，就能看到我们国家的变化。”

从我佣人们的态度和请吴先生吃的饭菜中，我知道，他们欢迎他的访问。我上楼梯，去自己的卧房。陈妈正在那儿放置我的睡衣和拖鞋。她劝告我，要听吴先生的任何告诫，她声称，吴先生是个好朋友、绅士。

与有同情心的人交谈是令人感到安慰的。现在我更坚定地意识到，决不能为满足党的官员的要求而写任何虚假的坦白。

好几天没人来打扰，情绪多少有点恢复。八月十八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举办一个小型的宴会，庆祝一

下，也想以此消除降临家内的忧郁气氛。我要女儿邀请一些她的老朋友，我自己打电话请老朋友李岑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岑是在1935年秋天，当时我作为一名学生刚到达伦敦。她恰好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名中国政府官员结婚，婚后一起回到中国。在她的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当教授，任学院钢琴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黎是香港的一位中国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在香港殖民地环境中长大，使他憎恶。出自英国作家手笔的有关新的苏维埃社会的报告和涌至英国大学里的各种学说，对他的性格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成了一名激进的爱国民族主义者，同时，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当共产党军队进军上海时，苏黎是庆幸的。他声称祖国复兴的时代和公正的政府在中国开始出现。他拒绝和国民党政府一起去台湾，企图说服他的朋友也热心欢迎共产党接管。1950年，大学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期间，李岑，他的妻子，失去了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的职务。1953年，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时，打击就更大了。这个反贪污、反受贿运动的对象是上海的实业家和象苏黎那种做过国民党经济代理的留用人员。尽管全部的证据表明他是诚实的，苏黎还是成了靶子，他被监禁在办公室里，党的官员转过来盘问他。最后，举行斗争会批判他。

象苏黎这种人是难为一般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的，他们认为革命的要求只能属于穷人和被践踏者。然而，由于朝鲜战争和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人民政府渴望发展与香

港的贸易。苏黎在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许多亲属，利用这次机会，通过与北京直接谈判，使他获释。当北京同意他的要求时，上海当局很爽快地允许他和两个孩子一起离开上海去香港。

对这位竟敢用马克思主义漂亮外衣伪装的富商儿子，本该严惩，但未得逞，于是上海地方当局的共产党干部就借口李岑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拒绝她去香港陪伴丈夫和子女。

她再也没有在丈夫的生前看到他。1957年他死于香港，由于1956年召开的第八届党代会引起的自由气氛，李岑被允许赴香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看望子女。到1960年上海音乐学院邀请她回上海之前，她一直逗留在香港。其间，她的子女被叔父接到了澳大利亚。

李岑回上海时，因毛泽东1958年发动了导致经济上蒙受灾难的大跃进，城市忍受着严重的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上海公安局就排起了长队，等待申请出国的护照。恬不知耻的上海当局认为李岑从富裕的香港来到挨饿的上海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我就是从当地报纸上知道她回来了。通常报纸上只报道党的高级官员和外国贵宾的来访。上海政府欢迎她，把她当作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任命她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

这一机构，是由政府挑选的艺术家、作家、宗教领袖、著名农业家和前国民党官员等组成，作用是响应和支持政府的重大政策，为其它的一些类似组织树立榜样，并造成一种各界人民都支持共产党的印象。反过来，政府

也给这一机构的成员一定的特权，例如，较好的住房和享用专门的餐馆，在那里能得到稀有的食品，也不要定量配给券。

党的官方赞赏的是对他们有用的人，而不是品德高尚的人，尽管他们也会讲到某人的品行如何。早在六年前，当中国忍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和食品短缺时，李岑成了政协委员。现在这些困难过去了，李岑对党的当局的用处也就过去了。此外，党喜欢人民用顺从和溢美来表示对她的感激。对此，李岑完全无能。她告诉我，她以为可以用音乐和教育来表达对毛政策的尊敬。参加会议她讨厌，在会上她保持沉默。作为政协委员，她这样做自然得罪了党的官员。

回想着这些往事时，我接通了给李岑的电话，她快活地接受参加晚宴的邀请，我很高兴。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我很早起床，陈妈已不在屋子里了。她是虔诚的佛教徒，在这一天始终要去静安寺的庙宇为梅萍作祈祷，她太溺爱梅萍了。我是基督教徒，不主张朝拜这些寺庙。考虑到这一点，她总是一清早就溜走很快就回来，希望我不注意到她的不在。我假装不知，也从不对她说起这事。

当我在餐厅里摆弄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在厨房里她用一种不寻常的声音与厨师讲话。她进了客厅，我看见她在用手帕擦眼睛。

“发生了什麼，陈妈？”我叫她。

她沉默了，但走进了我在的房间。

“在寺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

她坐在餐椅上，眼中涌出泪水，“他们正在拆寺庙。”她抽抽噎噎地说。

“谁在拆寺庙？”我问她，“不可能是政府！”

“年轻人。可能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告诉他们不许搞迷信。他们还说，和尚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

“和尚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学生围着他们，有的还挨了打。我去那儿时看到他们都跪在地上，旁观的群众很多。有人告诉我，学生打算象他们在别处干过的那样，拆除寺庙、烧掉佛经。我看到了一些学生爬到了屋顶上，扔下了瓦片。”陈妈说着擦了擦她的眼睛。

“陈妈，你不要太烦恼了。你在家里供拜好了。基督教堂也关闭多年了，基督教徒都在家里做礼拜。你也可以这样，是不是。无论如何，在梅萍的生日，你不要哭。”

“是的，是的，在梅萍的生日，我不能哭。看到这样破坏，我伤心。”她拿起手帕，走出了房间。

厨师进来抱怨道，没办法采购到我要他准备的食品。他还说，在食品市场，他和另外一名厨师被人嘲笑，替富人家庭干活。

“他们当然不愿看到你比他们买得多。不要为这事烦恼，就用你在市场上能采购到的东西来准备宴会好了。我相信你会为梅萍的生日做些好菜的。”我想让他放心。

当我明白了厨师在市场上感受到的阶级憎恨是由于大肆宣传反对资产阶级，从公众看来就是富人而产生的，我

怀疑在寺庙中发生的事情也是政府支持的。其实和尚也是政府的雇员。假如政府决定改变它的政策，寺庙就会被关闭。早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和尚被政府安排干其它工作。事实上，静安寺寺庙是供来自东南亚的访问者参观的场所，以此让人有中国容忍佛教的印象。我虽在报上注意到，大跃进运动以后寺庙重新开放，和尚又被请了回来。我惊奇为何允许学生这么干，上海市政府是否知道静安寺发生的事情。

六点钟，李岑来了。满头白发伴随着恬静的微笑，她有一种恬静且富有个性的学者风度。只有象我这样的老朋友才知晓在她娴静的外表里面是极度的敏感。有些事情，对普通人来说反应冷漠，而对她会引起情绪上的起伏波动。

李岑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和能干的教师。远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有尊重教师的传说。一位献身于教育生涯的好教师好比一颗果实丰裕的大树，这样比喻李岑也是非常合适的。她许多以前的学生已成为钢琴家、演奏家和全国各地的教师。有几位还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获胜，得到国外的重视。我是非常爱李岑的，钦佩她献身于音乐和教育事业。她从香港回来后，我们彼此时常见面。她带来她的音乐，我们一起欣赏唱片。我知道她感到孤单，思念她的女儿。幸运的是，1960年毛泽东从实际的管理工作上退位，刘少奇成为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国家没有出现大的骚动，使李岑也有可能与在澳大利亚的女儿保持联系。

老赵送来冰茶后，我问李岑：“音乐学院里情况怎样？”

“情况不妙。”她沮丧地说，“所有班级都停课了。我们差不多把全部的时间化在文化革命上。每个人都必须写大字报，象我这样的教授还得写自我批评，阅读别人反对我们的大字报。”

“许多人反对你？”我忧虑地问。

比起反对其他人，写反对教授的大字报就多。我不知道是否比其他教授多，我没计算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组织斗争会批判我。我个人的历史比较简单，除了在音乐学院当教师，我没有干过其他工作。

“学院里开了许多批判教授的斗争会？”我问她。

“是的，开了几次。一次是反对一名以前的国民党员，另一次反对一位以前的右派。他们是外系的，所以不太了解他们个人的历史。这两人在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就被揭露出来了。”李岑解释道，“我厌恶斗争会，不知什么缘故，人们喜欢野蛮的动作。”

“你认为自己安全吗？”

“我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从不参与政治。从音乐学院毕业后我去英国学习。归国后我又回到音乐学院任教。我的一切党都了解。我是安全的，为什么不呢？当然，也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这次政治运动同以前有点不同。”

“什么不同？”我问她。

“党的官员的态度。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很自信，抓得很狠。这次他们神经很紧张，几乎不想干什么事。他们也限制了攻击的对象，被批斗的人是以前就揭发出来

的。也许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失败后，党的官员不再确信毛指导政治运动始终是正确的和值得信赖的。”

李岑讲的是非常有趣的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了解内情，事实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义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更多的稳健派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的书记，就是属于刘少奇一派的。当江青要任命一名年轻人来担任学院的书记时，他被拥护江青的造反派迫害致死。

“毛提倡写大字报，实在是一种浪费。用去大量的纸、刷子和墨水，还得在教室里装上特殊的灯光，添置文艺宣传的乐器，这些从来不计算钱。”李岑说。

“针对你的大字报写些什么？”我问她。

“批评我在英国学习，送女儿到澳大利亚，还有我的教育方法。当我们与苏联友好时，鼓励我们教西方音乐，用国际音乐作品训练学生，与苏联关系破裂后，毛主席开始批评西方音乐，我们必须用中国音乐作品作为教材。但是中国乐曲太少了，我不得不化一半时间收集教材。作为一名教师这样做是很辛苦的，现在学生反过来批判我。你可能不知道，他们中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只得写大字报反对我。”

“其实，你不必太介意，也不要为此太痛心。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不得不这样做的。”

“我感到十分悲哀，好象我的全部生活都白白浪费了。”李岑说。

“不要为了这个过于压抑了。在大跃进期间，梅萍学

学校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都必须批判他们的家庭背景。我告诉她应该进步、批判我。她这么干了，教师和同学都赞扬她。这是一个形式，好比演戏。不要为这过于烦恼了。”

“恐怕我不会象你那么乐观。”李岑说。“这太不公道了。”

“政协委员的身份，不能给你一些保护？”我问我的朋友。

“我听说毛主义想废除这个机构。他们称这个机构是‘红萝卜’，外面是红的，里面是白的，他们认为政协委员口头上支持共产党，实际上是反对党的。”她说。

“真是这么说的。”

“谁知道？由于谁讲心里话谁就会遭受惩罚，人们彼此之间根本无法了解对方的想法。”李岑说。我同意她的说法。事实上，生活在共产党中国这么多年，我体会到允许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能得到的好处就是政府准确地知道谁支持它，谁反对它，而一个极权的政府不了解人民的真实想法。

当我告诉她，我已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她的反应和惠妮相同。她说，“现在壳牌石油公司关掉了它的上海办事处，党的官方可能想利用政治运动的机会恐吓你，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控制你。”不过，她认为对我的迫害不会太严重的，“你又没拿政府的工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为了省钱对你降薪。你也没为他们干活，所以也不会解雇你。除了给你恐吓，我想他们对你干不了什么。”

“但愿你还算过得去。”我说。

“你知道，我觉得很灰心，真不想再干下去了。”李岑说。

“你为什么不要求退休？许多人不满六十岁就退休了。拿了养老金，逃避政治。”

“文化革命了结了，我是想退休。”李岑说。

我女儿和她的四个青年朋友来了：孔，一位英俊的男演员，他的父亲是三十年代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一名姓陈的是管弦乐队小提琴手；孙凯，一名技术学院的教师，是梅萍儿童时代的朋友；我的教女何安，是梅萍在澳大利亚结识的幼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对音乐非常有兴趣，经常聚集在我们家中听立体声录音。

年轻人是欢乐的，他们充满活力。虽然他们出身的家庭遭受了文化革命的波及和影响，但谁也不去涉及它。用餐时他们笑谈着音乐和书籍。当梅萍拿着剩余的生日大蛋糕去厨房分给佣人时，陈妈好象恢复了往常的幽默。我听到她在训斥梅萍想舔她手指上的巧克力。用餐后，年轻人去了梅萍的书房，放自己录音唱片，尽情地欢乐。

李岑和我来到了花园。老赵在草地上安置了两把放了垫子的柳条椅子，点上了一盘蚊香，放在椅子中间的盘子上。他为我们泡了菊花茶。舒缓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曲调从窗子内飘来，我瘫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夏夜的星空。

“你享受着中国社会上最西方化的舒适生活，是吗？”李岑说，“我怀疑你可能激怒了党的官员。”

“有可能，审问我的那些人好象恨我。你是不是以为他们相信在中国工人农民穷是我们的过失？”

“我觉得这恰恰是忌妒。人们不可能采用同样的方式生活。我有一套大的住所，这是音乐学院分配的，这说明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都应有一样的生活标准。”李岑说现在她似乎轻松了些。

“你当然与众不同。你为国家干了多少工作。几百名年轻人经你的手培养。他们每个人都由你教会了本领。这还不好吗？”我真心称赞我的朋友李岑。

“我真无法理解那些关于我的议论。无非是说我教颓废的西方音乐毒害青年人。他们忘了想一想，如果政府阻止，我是不会这么干的，在教学以前，所有的教材都是经过党的书记认可的。他们也许忘了，在与苏联友好的十四年间，我一再被鼓励教西方音乐。”李岑很愤慨。我不想再谈她的工作。想让她高兴些，我问起她的女儿。

“关系很疏远，尤其是现在她们结婚了。”她说。

“你不盼望见到她们？”

“想！现在想这个有什么用，政府从来没给过我护照让我去澳大利亚旅行，女儿现在又来不了。”

“也许你不该从香港回来？”我说。

“在那时。这可是干了一件好事。你知道，我是非常依恋音乐学院的，我在那里学习，也要去那里工作。除了孩子，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们一起学习时的同窗学友，他们都写信给我，我的学生也写信给我，党的书记也写信给我，每个人都说音乐学院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对你想回来，苏黎的家庭是怎么想的？”

“苏黎死了以后，他们并不很关心我。他们大多数人还在澳大利亚定居。他们是一个保守的家庭。苏黎的叔父认为苏黎的女儿与我相比更加属于他们的家庭。当然，如果我生活得不好，他们是会照料我的。但我感到气氛令人窒息。”

李岑后来讲的一些话，被街上突然而起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来到花园说，房前走过学生的游行队伍。

年轻人也从房间里出来，站在阳台上。青年演员孔说，“这是红卫兵。前几天，江青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的代表，这表明主席赞成红卫兵组织。”

“谁组织他们的？”我问他，“我从来没听说过有个叫红卫兵的组织。”

“我听说这是文化革命的新生事物，受到江青的鼓励。有人告诉我她秘密地组织了一些清华附中的学生，又借口这是学生自发倡议的。由于她是毛的夫人，这些意见就被采纳。作为主席的代表，她使红卫兵得到官方的承认。”孔又笑着说，“我的父亲曾经说，过去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女演员，当然她现在有了改观。”（后来，当江青处置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遭遇非常凄惨，好不容易才残存下来。）孔本人因他的父亲，许多年没能在任何电影作品中扮演角色。

第二天，我读报时见到毛泽东8月18日接见了第一批红卫兵代表。头版上是一张毛穿黄褐色的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巨幅照片，手臂上戴着红袖章，上面写着三个中国字：红卫兵，字是他自己的笔迹。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的意思是紫禁城的上空平安之门），当接受下面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欢呼时，他微笑着挥手。他给红卫兵的信，使文化

革命的火炬燃烧到中国的各个角落。红卫兵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都能采取革命的行动。全中国的青年人都响应了他们顶礼膜拜的人的号召。在文化革命初期批判的靶子只是资产阶级，这当然也是红卫兵集中攻击的对象。

一群一群的青年学生继续在我门前通过，他们敲打着锣鼓，喊着口号。梅萍和她的朋友出去在这夏夜观看游行；李岑和我来到我的书房。街上的声音非常响，我们无法谈话。注意听时，好象红卫兵喊的口号中有“保卫毛主席”或者“我们将用生命保卫毛主席”的口号。

“是怀疑谁要威胁他？”我问。我们没人能回答。毛处于半神的崇高地位，似乎在人类之上。

“高龄痴呆的病症之一就是猜疑，另外就是偏执狂。”李岑说时，我想起了斯大林的晚年生活，他怀疑许多人企图杀害他。

“我的天！”我惊叫起来。

李岑，刚从外面进来的梅萍和我都站在我的书房里，三人相对无言。我们有点害怕，在中国每个人，包括我们在内，只要毛兴之所至，可怕的现实就会来临。

过了一会儿，李岑说：“我该走了。再过段时间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会看清楚。”

“我送李伯母回家。”梅萍说，“可能已没有公交车了，街道都让游行队伍占用了。”

我送她们到前门，一队少年举着彩旗和标语，举着毛的肖像在我门前街道上走过。锣鼓队在前面开道，每隔几码有个人拿着纸在领呼口号，后面的人大声地呼应。所有

年轻的游行都戴着红棉布袖章，上面写着仿毛字迹的“红卫兵”几个字。游行显得很有组织性，看起来是精心组织的，年轻人自己干还不大可能。我想，在这背后有双权威的手在指挥。

李岑向我道了声“再见”，和梅萍一起走了，梅萍在一边推着她的自行车。我目送着她们，直到游行的年轻人淹没了李岑雪白的头。

这是我与亲爱的老朋友最后的晤面。一个月以后，在一次斗争会上李岑遭受侮辱之后自杀了。红卫兵在音乐学院饭厅横置了一条绳子，要李岑和一批“牛鬼蛇神”们从绳子下面爬过去以表示她曾在英国受教育，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强迫她坦白“热衷于西方音乐”。第二天，发现她坐在钢琴边，已经死了。她打开煤气自杀的。她在笔记本上留下了遗言：“我为学生尽了职。”

佣人们都离去了，我在楼下等着女儿回来。她回来了，我们默默地登上楼梯。在楼梯口，她用手臂紧抱着我道“晚安”。我想对她说“爱”和“安心”之类的话，但是由于深切的悲哀和无法解释的恐惧使我感到窒息。

“好，这确实是一次我不会忘记的生日。”我女儿幽默地说。

女儿去了卧室，我关闭了窗想把街上的声音锁在屋外。声音减弱了，好象他们已经远去。夜晚的凉风也锁在了外面，屋子里非常热。一队队游行者在外面通过。燃烧着革命热情的青年男女坚定的脚步声和激动的喊叫声继续穿墙而入。

我去了书房，从书架上拿来一本书想看一会儿。但是，我安定不下来，思绪无法集中，无目的地在房间之间徘徊。我重新插花，拿掉死的，并往花瓶里加水。我整理挂在墙上的画，取下象牙雕人像认真细看精细的雕刻术。游行队伍一直在外面行走，我还听到有一队游行队伍停了下来，敲了一阵锣鼓。我在屋子里徘徊一阵以后，终于去了梅萍的房间，看看她怎样了，我轻轻地敲了房门，没有回答。我推开了门，发现女儿已经睡着了。她乌黑的头发散在白色的枕头上，她甜蜜的脸庞平静地安睡了。从门的缝隙中透过灯光刚巧落在床边柜上银色的相片架上，这是我丈夫的像片。就是这两个人填补了我全部的心灵世界。一个已经去了，另一个还活着，她的生活刚刚开始。

“保重自己，照顾好梅萍，我真不忍心马上离开你们。”

我又一次听到丈夫在昏迷前微弱的话语声。以后他再也没有醒来。这大约在九年以前。他委托我照顾我们的女儿。我是这么干了，我欣喜地看到女儿长大了，她聪明、漂亮且善良，我决不用为她烦恼。但是，如今文化革命开始了，我们的生活给抹上了阴影，当我推测未来时，一个深深的不安情绪淹没了我。生活中第一次，我觉得无法掌握自己生活的方向和指导女儿。文化革命使我害怕。

自信和乐观地对待生活中的变迁和产生的问题，是我的生活方式。1957年当我丈夫去世时，我的精神崩溃了，因极度悲伤我几乎死去。后来我发现积极地面对一个个的问题，对恢复生活的勇气是有效的、好的。

在旧中国，失去丈夫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她们成了

未亡人，遭受邻居的嘲笑和闲话。虽然1952年人民政府通过的婚姻法从总体上保护妇女，禁止对妇女的歧视，但对寡妇和未婚妇女的偏见仍然存在。中国社会似乎不能容忍妇女自立的要求。

当我开始在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工作时，一些高级中国职员，惊奇一个没有行政经历的妇女来管理他们。我必须三番五次地来证实自己的能力，以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迎接生活的挑战、克服一个个困难来得更令人高兴的了。尽管我失去丈夫，仍能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我是欣慰的、值得自豪的。在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过因文化革命而引起的这种困惑和为难。我知道，一位中国公民在外国公司里被选任高级职位，上海人民政府的工商部门是给予许可的。由于警察掌握了每个人的人事材料，政府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事情，这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理由突然对我进行控告。但是惠妮、李岑和吴先生好象都认为我可能成为被迫害的目标，那么，除了不写假的坦白外，我真不知道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与党的官员对抗，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呢？又将怎样影响我女儿的生活？在女儿的卧房里徘徊，我陷入了困境，感到无依无靠，真想祈求上帝的指点。

毛泽东在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并给他们祝福后，上海的红卫兵接管了街道。报纸上通告说，红卫兵的使命是扫除国家的“四旧——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和旧思想”。“旧”没有明确的限定，留给红卫兵来鉴定。首先，他们改变了街道的名称。沿着外滩的主要大街，被重新命名

为革命大道。另外重要的街道命名为威严的建军纪念日。在苏联领事馆前面的路被命名为反修路，在从前的英国领事馆前的路被改为反帝路。我发现自己的家处在欧阳海路上，起这个名是纪念一名战士，他用自己的生命在迎面而来的列车前牵走了惊呆在铁轨上的骡子。红卫兵争论是否要改变交通灯系统，由于他们认为红色意味前进，而不是停止，于是在此期间，交通灯停止运转。

他们捣毁了花店和古董商店，他们认为只有富翁才有这种闲情逸致。其他的商店被审查。只要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社会不适宜、使人讨厌的东西就毁坏或者没收。标准是非常严厉的。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该坐沙发，所有的沙发被禁止坐。另外一些东西，例如席梦思、丝绸、天鹅绒、化妆品和毛料被认为是西方化的生活用品，全被扔到停在街上的宣传车上运走或者烧毁。中国商店习惯上都有一个象征顺利、吉祥的名字，例如，编织店取名“富丽”，餐馆起名“五芳斋”，卖老年人帽子的店命名为“福寿”，鞋子店叫“舒适”，家具店为“福家”等。1957年政府接管这些商店时，名字并没有改变。现在，受到了红卫兵的谴责，他们必须把商店名改成具有革命的气息。许多商店的负责人不得不采用“东方红”的店名，这是文化革命中颂扬毛泽东的一首颂歌的标题。红卫兵扫除了陈列在橱窗里的商品，改放上了毛的肖像。在商业区街道上散步的人不但要为相同的店名感到糊涂，而且会因为看到一百张毛的脸而产生神秘的观感。

我的佣人逐日地告诉我红卫兵令人难以置信的行为，

我变得非常的好奇，决定冒险外出看看。

在商业区的一家银行里我有两笔到期的存款，我打算取出些现金，放在家里，经验告诉我政治骚动以后，紧接着的是食品和物品的缺乏。为了生活，人们经常去黑市市场，那儿的价格是天文学的数字。我记得毛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我的厨师花了50元买来通常只需2~3元钱的猪肉。

老赵和陈妈提醒我外出要穿合适的衣服，隔壁的女人出去看朋友时，与红卫兵有过不愉快的遭遇。红卫兵没收她的鞋，剪开了她的裤腿。于是，从家里出发去银行前，我穿上了旧衣服，一条向陈妈借的宽松的裤子和自己的运动鞋。由于八月的太阳很烈，陈妈给我一顶宽边的草帽，这是我女儿作为学生被安排去农村公社帮助农民劳动时买回来的。街上很热闹，到处都有红卫兵，也有许多悠闲的旁观者。文化革命主要的敌人是资产阶级，所以大多数人还觉得安稳，对他们来说，红卫兵的活动是新鲜的。许多人沿街闲逛，寻找乐趣。

一群红卫兵正在向围着的一群观众说明文化革命的目的和打算，我听了一会儿。红卫兵对大家讲，由于文化革命他们就得到了“解放”。我不由地迷惑、惊奇起来。1949年共产党控制了中国，人民不是已经获得了“解放”？是否那次解放不好，所以人民必须再次解放？我似乎感到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这是不可想象的。我想也许这不过是年轻的演讲者说漏了嘴，并不重要。事实上，无产阶级再次解放，成为文化革命的主题。毛认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

首的党内的反对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且一直没有被揭露出来。

另外一些红卫兵阻拦公共汽车，分发传单，给乘客演讲。处罚那些穿红卫兵不赞成的衣服者。许多自行车把手上有毛的语录卡。人行道上，红卫兵带领人们喊口号。每一队红卫兵旁边都竖立着复制的大幅毛的肖像，并配有锣鼓。在许多街道的角落里，扩音器不时叫嚷着革命歌曲。由于我穿旧衣服、宽松的裤子，无产阶级的打扮与环境能融合，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我沉着地朝银行走去。突然发现一群红卫兵在我前面拦住一位漂亮的青年妇女。一个人拉住了她，另一位脱掉了她的鞋，第三位剪开了她的裤腿。红卫兵叫喊道，“为什么你穿尖头鞋？为什么你穿狭腿裤？”

“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让我走！”姑娘争辩、抗议。

在冲突中，红卫兵干脆剥掉了她的外面的裤子。许多看热闹的群众围了上来。旁观者嘲笑、取乐。一名红卫兵打了姑娘的脸要她停止挣扎。她坐在满是灰尘的地上，用手臂捂住脸，哽咽着小声说：“我不是资产阶级分子！”

另一位红卫兵打开了她的包，拿出她的工作证检查。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扔给了她。她火急地套上了裤子，不等还她鞋子，就穿着短袜快速地走了。几乎同时，那位红卫兵又拦住了一位青年妇女，喊叫道：“你为什么在头上抹油？”

我没等看到这次遭遇战的结果，便去了银行，在中国每个银行都是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属于国家。那儿没有

黄铜的栏杆和小窗。出纳员坐在粗陋的木制帐柜后面，接待存款人，我走近一个妇女，把我的存款卡放在她前面的帐柜上。

在离家前，我曾考虑过取回多少现钱。两张已过期的存折分别为6000元和20000元。在中国，由于薪水低，生活费用也低，在1966年，6000元是很大一笔钱，20000元可以扮演一个小富翁。银行是政府的一部分。在那里工作的人有责任鼓励人们储蓄，以便使钱能为国家所用。在政治运动期间，尽管存款到期，出纳员也有权拒绝付给存款者。有的时候，他们要求存款者工作单位来信证明取款的理由。为避免有可能拒绝我取款的要求，我决心取回少一些的6000元，另外20000元转期再存几年。

还好，没有碰上任何麻烦。出纳员给了我现金，没讲一个字，没等我数好钱币，她就又拿起编结物了。虽然小银行的墙让文化革命的标语和大字报覆盖了，里面的气氛与街上的红卫兵所引起的紧张状况相比，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我又走进了炽热的人行道，我后悔自己太胆小，没敢取回大笔存款。与此同时，我也庆幸没有遇上麻烦。我往家走去，当转过街角时，差一点被一群情绪激动的红卫兵撞倒。这些红卫兵用一根长绳牵着一个老人。他们叫喊着，用棍棒打他。我迅速退了回来，靠墙站着，让他们通过。突然老人倒在地上，好象实在太疲倦了。衣服被撕破，几缕灰色的头发盖住半闭的眼睛，老人看上去很可怜。红卫兵拉紧绳索，当他不能起来时，他们踩了过去，老人痛苦地尖叫着。“肮脏的资产阶级！工人的剥削者！”

罪该万死！”红卫兵叫喊着。

我的心在猛烈地颤抖。如此突然地与红卫兵相遇，又这么近地看到惨遭凌辱的老人，我惊吓住了，我不由地想到了吴先生。我极想知道他的遭遇。他来访问我后差不多已有两星期过去了。我想应该打个电话给他，问一下他是否平安。我快步往家走。比起一小时前，街上的人更多了。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到处是尖声地抗议和受害者恳求地哭泣。当我看见他们拦住烫了波浪发形的妇女，剪掉了她的头发时，我真心感谢陈妈给了我宽边的草帽，盖住了我卷过的头发。在每一条街上差不多都有一名警察，但是，他们只是在一旁察看。

离开了忙乱的商业区，我感到轻松了些。住宅区平静得多。当我回到居住地，看到我家的门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正在看一张贴在我邻居前门上的大字报。他是上海铝材公司的总工程师。这家公司以前是瑞士公司，早些年由政府接管了。工厂的工人在他的门前张贴大字报，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旁边有一张小些的用小孩子的笔迹写着一些小字，这是由他的两个女儿写的，她们也参与揭发自己的父亲，并发誓要与父亲断绝关系。就是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的孩子写的大字报吸引了围观的人群。

老赵为我打开了门，我问起邻居女儿写传单的事，老赵告诉我，邻居家的佣人告诉他，这是父亲的主意，为的是拯救女儿免遭迫害。

红卫兵的活动愈演愈烈。每过一天他们就要穿过街，

到我邻居的房屋里来。他的妻子拒绝开门，转到花园里用水龙头浇红卫兵。红卫兵撞倒门、夺取了水龙头，用水浇湿了她。由于她反对革命行动，他们更是推倒了她，打她。她女儿为了保护母亲，与红卫兵搏斗。这样她们就成了“瑞士帝国主义走狗的狗崽子”，被迫帮助红卫兵焚烧她们父亲的书。

白天和夜晚都传来锣鼓声，从各方面听到消息，全市到处都在抢劫和搜索私房。我试图用电话与吴先生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与其他的朋友也一样。红卫兵暴行在扩大。我不断听到受害者遭受的侮辱和恐吓，一旦反抗就被打死的消息。报上的文章和毛主义领导人的讲话竭力鼓励红卫兵，祝贺他们的野蛮行径。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的接班人，勉励他们要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按照毛的教导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斗争中勇于排除万难。

我无法可想。我不能阻止家庭的毁灭和财产的损失，女儿变得非常烦恼。她说起用这么点薪水我们无法生活。我决定找机会告诉她我在香港的银行帐单。对她说了，在别处的钱足够付我们的生活开支。我为文化革命开始后女儿的状况深感忧虑。如果新的社会组织中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孙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就象印度的不可接触的人，那么她的生活将是难以想象的。对我来说，这比失去财产还要伤心。

为照顾佣人，在红卫兵到家里来以前，我决定把从银行取回的6000元分给他们。开始他们拒绝接受钱，反复

讲希望留下来照顾梅萍和我。他们还建议把我的珠宝和贵重物品藏到他们家里去。我不想牵连到他们，我拒绝了。我要陈妈、老赵和厨师到我的书房里来，与他们讨论怎样在他们三人间分配钱。因为花园工不是全日雇用，只是偶然来，我只给他 400 元，陈妈建议她比另外两位少拿些，她说：“他们要照顾妻子。”我分了钱后，把给花园工的 400 元放在信封里，等下次他来花园干活时给他。

我对佣人说，假如他们害怕，随时可以离开。他们长期与我相处，文化革命一结束，如果我开支上允许，我将给他们额外的钱。

干完了这些，我等待红卫兵。

第三章 毛的信徒

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势头的冲击，各类机构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举行政治动员会。八月三十日晚上，当红卫兵来抄家时，我女儿正在电影制片厂参加这类会议。我坐在书房里，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此书是我最近从伦敦书店订购来的书籍中的一本。在那个书店我有一个户头，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通过这家书店用包裹将书刊寄给办事处，然后我再得到书。上海书刊检查官对寄给单位的包裹不用打开就可通过。由于办事处收到的大量科学文学书籍都赠送给了中国的研究机构，我的小包裹就不会引起过分的注意。

整幢住房里异常宁静。老赵正坐在餐具室里。陈妈在她的房里，可能已躺在床上睁着眼睡不着。没有一丝动静，仿佛任何东西都屏住呼吸无奈地等待自己的毁灭。我书房的窗子开着。花园里飘来木兰的清香，空气中充盈着夏夜的凉爽、潮湿，我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从街道方向，开始只是传来轻微的声音，渐渐地听到汽车逼近了。我等待着汽车迅速地在屋前通过，但是它愈来愈慢，最后停了下

来。我知道左边的邻居也等待着红卫兵。扔下膝盖上的书，我端坐着静听，亟想知道，哪一家将成为目标。

突然，门铃响了。与此同时，伴随着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口号声，许多拳头在我家前门狂暴地撞打。刺耳的声音告诉我，等待着的时刻到来了。我必须面对红卫兵的恐吓和破坏。老赵屏住呼吸上了楼梯。虽然他知道红卫兵的到来是预料中的事，但是此刻他的脸是灰色的。

“他们来了！”他慌张的声音是畏惧、恐怖的反映。

“请保持镇定，老赵！去打开门，但不要说任何事情。请陈妈和你各自回房间，呆在那里。”我告诉他。

老赵的房间在汽车间上面。我要他们两人离开，免得要他们说任何事情，不让红卫兵有他们忠实于我的感觉。

外面声音更响了。“开门！开门！你们都死了！为什么不开门？”有人在诅咒，有人在踢木门，卡车喇叭狂叫起来。

老赵迅速下了楼梯。我站起来把书放到书架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跃入我的眼帘。我用手拿过宪法，又拣起桌子上的一串钥匙，走下了楼梯。

虽然在我的想象中这一时刻已度过了许多次，我的心仍在乱跳。当然，平时的训练使我能保持镇静的外表，但是当我下楼梯时，我似乎成了中国宿命论的一个信徒。

顷刻间，红卫兵推开了前门，进入了房屋。三、四十个高年级的中学生，年龄都在十五~二十岁之间，由年长的两男一女带领着。虽然他们都佩带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这三个人是教师，他们是陪红卫兵来抄家的。他们挤进了

客厅，其中一人打碎了内窗台上栽着茉莉花的瓷器花盆。散落在地板上的一些白色花瓣被红卫兵的脚践踏踏着。

红卫兵的“头头”，一个有着愤怒目光的瘦长男青年，跨前一步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

虽然知道再怎么说是无济于事的，我还是举起了宪法，平静地说：“没有搜查证，闯入私宅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

年轻人夺过我手上的文献，扔到地板上。眼睛里充满怒火，他说：“这宪法已被废除了。这是由共产党内修正主义者写的东西。我们只承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改变宪法。”我说。

“我们废除它。你又能怎么样？”他挑衅道，两脚分开，抖了抖肩膀，摆出一副傲慢好战的姿势。

一位姑娘走到我跟前说：“你想玩什么花样？你唯一的出路是低头认罪。要不然，你将受到惩罚。”她在我鼻子前挥动了拳头，又在地板上吐了唾沫。

另一个年轻人用木棒把对着前门的红木柜台上的镜子打得粉碎。大量的玻璃碎片落在柜子上康熙年间的青花瓷瓶里，空镜架仍挂在钩子上。他扯下镜架，朝一旁掷去，接着从另一位红卫兵手里拿来一块小黑板，挂在钩子上。黑板上写着毛泽东的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

红卫兵高声朗读语录，仿佛发出了神圣的誓言。随后，

他们要我念语录。有人对着我叫喊：“一个不拿枪的敌人！你就是这种东西。交出你的钥匙！”

我把一串钥匙放在碎玻璃当中。一个红卫兵拣了起来。所有的红卫兵分散到我房屋里的各个部分。一位姑娘推我进入餐室，锁上了门。

我坐在餐桌边，环顾着房间的四周。以往我从没有很好地观察过它，也未体验到它的奇妙。现在这房间好象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漂亮过，锃亮的红木桌也从没有这般闪光过。镶嵌着象牙图形的白色漆器屏风骄傲地站在角落边，这是精湛工艺的象征。古代的瓷器盘和花瓶配以红木底座被安置在最恰当的位置上，以显示他们的美丽。窗帘完全拉上了，没有一点儿皱折。玻璃橱里是白玉雕像，玫瑰色水晶香炉和其他我多年精心收藏的各种宝石、饰品。昂贵的玉石经艺术家的手雕刻成各种美丽的形状。现在，我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向它们一一惜别。从惠妮那儿得知画家林风眠陷入困境，我想挂在餐具架上他的那张仕女图肯定会被无情地毁坏。另外一幅由齐白石画的水墨画命运如何？齐是一位传统风格的伟大艺术家。因为他年轻时是个木匠，共产党给了他荣誉。红卫兵会不会了解齐白石身世后宽恕他的画？我仔细地看画，目光留连在富有力度的笔锋上。这是一幅荷花图，描写荷花是中国艺术家得意的命题，因为荷花象征着纯洁。古代诗人陶渊明在一首著名的诗中用荷花来描绘品格清高的人，说荷花“出污泥而不染”。

我背诵着这首诗，思索着是否每个人都可能不受环境

的影响？这个意思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塑造人。当我听到楼上红卫兵的笑声时，我想也许诗人太理想主义了。红卫兵对自己的毁灭性行动好象非常得意，因为他们确信干这些事情会使他们的上帝——毛泽东满足。他们的举止是从幼年时代起就在共产主义中国受培育的结果。他们接受的宣传摒弃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楼上沉重的撞击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听到许多人上下楼梯的声音、打碎玻璃和敲打墙壁的声音。声音在加强。听上去不仅仅象在劫掠物品，好象要拆毁房屋。我警觉起来，思忖着寻找适当的方法，从房间里出来。

我敲房门。屋里太喧哗了，没人听到我的敲门声。我用力敲。当我听到门外面有动静时，我喊叫道：“开门！”把手被慢慢地转动，门被开了一条狭窄的缝。一个扎长辫子姑娘问我要干什么。我告诉她，我必须去洗手间。她警告我不要妨碍他们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从贮藏室里拿来藏有我父亲的书籍、报纸的柳条箱，企图用钳子打开它。透过客厅的门，我看见梯子上的一位姑娘拆掉了帘子。在房间的中间放了两张大桌子。上面放了红卫兵从各个房间里搜集来的照相机、手表、钟、望远镜和银制品。这些“贵重品”，他们打算献给国家。

上了楼，我惊奇地看到红卫兵从盒子里拿出我收藏的瓷器珍品，一位年轻人在地板上放了四只一套的康熙年间酒杯，然后用脚踩它们。我听到了精致的瓷器在他脚底下嘎扎嘎扎地响，心快被戳碎了。当他抬起脚准备踩另一个酒杯时，我猛地扑过去拖住他的腿。他摇晃着和我一起倒

下了，我的眼睛搜索着另外几只酒杯，还好，我们跌倒时没压碎它们。当那年轻人站起来踢我时，心烦意乱中的我来不及躲闪，正好被踢在胸口上。我大声喊痛。另外的红卫兵停下他们在干的事，围拢过来，忿怒地指责我妨碍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一位教师从地板上拉起我。那年轻人涨红着脸，挥动拳头恐吓我。教师提高了嗓子，才使气氛稍微有点缓和。她对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想保护你的财产？”

“不，不，你们喜欢我的东西，尽可以拿。但是你们不能打碎这些瓷器珍品。它们是年代很久的瓷器，非常有价值，损坏了是无法补偿的。”我屏住呼吸，我的前胸在刺痛。

“住嘴！住嘴！”众多人的声音淹没了我的声音。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摆事实，讲道理，”我鼓起勇气说。然而叫喊声超过了我的说话声。

教师抬起手，要红卫兵平静下来，她说：“我们允许你摆事实讲道理。”红卫兵朝我瞪眼。

我拾起留下的酒杯，放在手掌上，然后伸出手说：“这酒杯差不多有三百年了。你们以为照相机、手表和望远镜有价值，其实最好的照相机，最好的手表，最好的望远镜每年都会制造出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再制造出同这只一样的酒杯。这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此自豪。”

那位被我阻止了破坏性行为的年轻人忿慨地说：“住嘴！这些东西属于旧文化。这些封建皇帝和现代资产阶级

的破烂货对我们无产阶级是没有意义的。这根本不能与照相机和望远镜比较，这些东西在战争时期对我们是非常有用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旧的文化必须毁灭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开辟道路。”

另外一名红卫兵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旧文化。你休想阻止我们！”

我的心在颤动，我竭力寻觅着使人信服的理由来阻止如此愚昧的破坏。还未等我来得及说什么，我看见另一个年轻人从三楼下来，手里拿着一尊瓷的观音菩萨。我转身忧虑地问，“拿这像你打算干什么？”

他摇动着手臂把观音像举到空中，声称道：“这是一个佛教迷信的像。我要把它扔进垃圾箱。”

这尊观音是一只完美的塑像。是真正的福建德化窑的产品，是十七世纪明朝著名的雕刻师郑威的作品，佛像的背面有他的印章。奶白色的形象，其美丽难以用语言描绘。那安详、沉静的脸部表情刚巧被捕获住，栩栩如生。罩袍的折痕太自然了，几乎使人忘了它是雕刻出来的坚硬的瓷器。釉彩上得很白，很丰富，整个佛像看上去光滑、柔和。观音像我一直铺上衬垫后放在盒子里，它实在太贵重了，不想陈列出来。只是当博识的朋友对瓷器有兴趣要求参观时，我才拿出来。

“不，请不！你不能这么干！我求求你。”我太激动了，尖声叫喊着。红卫兵用冷酷的目光凝视着我，继续随便地晃动他的手臂，现在他只用两个指头举起了观音。

恳求是无法打动红卫兵的。假如彼此间想沟通，我必须讲他们的语言。对我来说，是运用外交手腕的时候了。如果红卫兵认为我反对他们，我是阻止不了破坏的。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更多地考虑这些东西是我的财产。只要它们能在毁灭中被拯救出来，从今以后它们属于谁我并不在意。

“请红卫兵相信我，我不反对你们。你们是作为我们伟大领袖的代表来这儿的。我怎么能反对毛主席的代表？我理解文化革命的目的。你们一提出，我不就自愿交出了钥匙？”我说。

“是，你是这么干的。”教师点头承认。红卫兵围拢过来，气氛缓和了些。

由于受了点鼓励，我继续说道：“所有这些旧东西属于过去的时代。过去的就是旧的。必须开辟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道路。不过这些东西不用直接毁坏，你们可以拿走。记住，它们不是由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而是由过去的工人用双手制造的。你们难道不尊重那些工人的劳动？”

在人群后面的一个红卫兵急躁地喊叫道：“不要听她的花言巧语。她想把我们搞糊涂，然后保护她的财产。”

我迅速地转向他说，“不，不！你们到我家来，已经提高了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所有这些漂亮和有价值的东西归我个人所有是错误的。它们应该属于人民，我求求你们送到上海博物馆去。你们可以问问专家，如果专家劝你们毁坏它们，那时就可以这么干。”

一位姑娘说：“上海博物馆关闭了。专家们都在受审

查，他们中有些人是阶级敌人。总之，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是一张皮；知识分子是皮上生长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养了知识分子，所以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现在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自然，知识分子也该打倒。”

她提到毛的语录，我是陌生的，不过已没有时间思考这些。我继续阐述我的意见，“假若这样，可找一些你们信任的人问问，有些还是权威，其中有一个是上海的副市长。这个城市里有许多私人珍藏品。如何处理它们一定会有政策。”

“不！你是一个愚蠢的阶级敌人！你蠢得无法理解。你想说服和劝告我们去向阶级敌人或者政府里的修正主义者请教。你也讲什么政策。唯一有效的政策在这本书里。”这年轻人从衣袋里拿出毛的语录本，举起继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唯一有效的政策。”

改变了争论的方向，我说：“我看到一块招贴栏上写着，‘世界革命万岁。’你们不是打算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红旗飘扬在全世界所有地方，是不是？”

“我们当然要这样！这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是一个阶级敌人。”一个姑娘冷笑着。她转向另外的人，警告道：“她是一个诡计多端的女人。不要听她胡扯。”

顾不得其它了，我说：“你们不相信这些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在香港市场它们可以卖到一笔巨款。用这些钱，可以资助你们的世界革命。”

终于，我所说的话有了反应。红卫兵听着。在国外的

世界舞台上扮演英雄角色的神奇前景迎合了他们自我膨胀的心理。他们为拥有权力而陶醉了。

我抓住他们的这种心理，往下说：“请把这些瓷器放回盒子里，拿到安全的地方。假如你们认为恰当，也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你们可以出售或者送给博物馆。”

也许是年长的缘故，教师有点责任感。她问我，“你确信你的珍藏是有价值的？你说值多少钱？”

“你能发现一本记载着购买日期和我每一次付款金额的本子。它们的价格在专门的世界市场每月都在增加，粗略估计一下，我想至少值一百万元。”我告诉她。

虽然无产阶级不重视价值，但是他们理解价格。红卫兵对“一百万”的数字动心了。教师此刻同我一样设法使珍藏避免毁灭，因此她的心情也同我一样忧虑起来，但是她又恐怕与红卫兵不合拍。终于她发现了一个使红卫兵改变主意的办法，自己也不至于失面子。

“革命小将们！让我们集中一下，讨论这件事。”她讨好红卫兵，叫他们革命小将。这个头衔是毛主义为鼓励红卫兵而采用的。红卫兵明显地高兴，爽快地同意她的建议。她领他们下楼去了餐厅。

我跪下拣起留下的酒杯，放进了盒子。观音留在桌子上。我拿起它和其它的瓷器上了三楼。那儿有一只大的贮藏柜，里面我妥贴地安放着我的珍藏品。地板上是许多破碎的瓷器片，有深红、黄、青釉绿、蓝和白的颜色。面对如此现状我的心下沉了，尽管我不顾一切地努力保存它

们，但是已经晚了，许多盒子都空了。

除了没有尸体，三楼的房间里是类似地震后的景象，白被单和绒毯上的破瓶溢出的红酒与血的颜色相同。

我们生活在物品短缺的国家，因此每一个家庭都要腾出地方安放贮藏柜。在那里我们贮藏每天生活的必需品，例如面粉、糖和可以保存的肉罐头。但是尽管进口物品的关税是天文学数字，我每一次去香港都要带回一箱食品和肥皂，用来填补定额供应的不足。红卫兵弄空了我的贮藏柜。他们从衣箱、抽屉里拿出来大量的衣服上面都有面粉、糖和罐头里倒出来的食品。倒是一些手提皮箱没有被搅乱，然而我发现红卫兵用剪刀处理了毛皮上衣和夜礼服。一些皮毛、丝绸和撕破了的被面、被里在四周飘浮，天花板上的风扇正在旋转。

每一件家具都被搬动过。桌子和椅子被翻倒，东西叠在一起组成了梯子。由于是在夏天，我的地毯用樟脑粉喷洒清洗后卷了起来贮藏在三楼的空卧房里。在一大卷地毯后面，我发现一只购物用的包，里面填塞了我的两件开司米绒线衣和几套新衬衣。这显然是一位小心眼的红卫兵偷偷地藏起来准备自己用的。

在一间最大的客房里，红卫兵在进行剪割、捣毁等破坏性劳动。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用毛的语录谱写成的歌曲。一个女声正在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一种强迫人们注意的音调。这歌不仅对红卫兵，也是对其它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战斗呼唤。我真想关掉收音机，但是它离我太远，除非我能跨

过房间中央堆积如山的碎片。

我无望且冷漠地审视着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红卫兵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虽然我看不到未来，但我也但愿回顾。我猜测红卫兵对于这样的毁坏是喜悦的。难道人的本性中确实具有破坏欲？文明的表层是非常浅薄的。在我们的人性下面潜伏着兽性。如果我是位青年，有工人阶级的背景；如果我崇拜毛，相信他绝对正确，难道我就不会有象红卫兵那样的行为？

与红卫兵在瓷器上的争执耗尽了我的精力。我的胸膛痛得厉害。我极想知道肋骨是否踢断。在浴室里我查看了自己的胸脯，我发现在右边有很大一块伤痕。我来到二楼寻找地方，想躺下休息。我打开了自己卧房的门，和三层楼一样地杂乱。透过打开着的书房的门，我看见我的一些珍宝都放在书桌上。由于红卫兵正在餐室讨论如何处理瓷器，我迅速退了回来，免得他们怀疑我试图取回那些东西。我转动了女儿卧房的门柄，发现这个房间没有受到骚乱。窗外的微风掀动了薄纱窗帘。闩上门，把窗帘拉到一边，往外俯视，我被花园中间燃烧着的明亮、跳跃的火焰吸引了。草地上点起了一堆篝火。红卫兵站在篝火周围往火焰里扔我的书籍。我的心在绞痛。我转身背对着窗，闭上了眼睛，无力地靠在窗台上。但愿这几小时我所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关在窗外。为寻得片刻的安宁，我在内心祈祷起来。

突然，一位红卫兵姑娘出现在门口，她开了灯。“你在这里干什么？谁要你来这里的？你要什么诡计？”她冲着我

接连发问，没等我回答，她说，“跟我来！我们正找你。”

我跟着她去了书房。一些红卫兵已聚集在我的书桌周围。坐在椅子上的姑娘很瘦，剪着短发，穿着褪了色的蓝棉布罩衫，衣服显得很宽大。在社会上，食品是非常宝贵的，人们只能得到官方定额的供应，如果没有额外的来源或上黑市场，那只能是受折磨了。她就是这样女孩。我猜想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生活很拮据，看来她的父母亲没有一个精明能干到能成为党员。她紧张地坐在那儿低着头。我推测当我进入房间里便保持沉默的其他红卫兵，正在询问她。站在姑娘旁边的一位男教师对我说：“拿把椅子来坐下。”

一位红卫兵从我卧房拿来椅子，教师和我两个坐下了。我正好面对着书桌另一边的那位姑娘。当我坐下时，姑娘抬起头，神情恍惚地匆匆瞥了我一眼。这目光一半是恐惧，一半是哀求。我面前的书桌上是我的珠宝首饰盒，一些首饰被放在弄脏了的垫子上。

“这些是不是你所有的珠宝首饰？检查一下，告诉我们是否每一件都在这里。”教师说。

打开盒子，我看到少了几只金戒指、手镯和钻石手表。那教师再次问：“你的珠宝是不是全在这里？老实讲。我们打算也和你的佣人核对一下。你藏掉过没有？一些资产阶级家庭都想把珠宝藏在花园里的花当中。”

气氛很紧张。在房间后面从唱片柜上搬动唱片的年轻人也停下来等待我的回答。我明白眼前的状况。他们都怀疑这个姑娘可能在单独逗留片刻时私藏了一些珠宝。事实

上，她这么干也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保护这个姑娘，然而知道我有什么首饰的佣人不这么干，我岂不是要受藏匿珠宝的谴责？！她看上去那么可怜，我真不想告发她。

“主要的都在这里。比如最有价值的翡翠项圈、金刚钻饰针都在。也少了一些，但不是太有价值的。”我企图为那姑娘解脱一些。

“少了啥？”教师性急地问。

“一只表，几只戒指和金手镯。”

“这表什么式样？哪里制造的？象不象这样？”教师伸出他的手腕。我发现他戴了一只进口的瑞士表，在共产党中国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他以为我有男式表，就象大多数中国妇女那样什么都想同男人一样，以求得平等的权利。我决不会赶这个时髦。

“不，少掉的表是个金刚钻，白金带的小表。是法国货，牌子叫‘爱泼儿’。”

“我希望你不要说谎。你怎么有这种表？瑞士表是最好的，是不是？”当这教师与我交谈时，他示意一位红卫兵到楼下客厅看看这只表是否在照相机和望远镜中间，那红卫兵很快回来摇了摇头。

“这‘爱泼儿’表是1957年我和丈夫在香港时买的。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的礼物。请问问陈妈，她知道这件事。对我的事情她最熟悉了，包括我的珠宝首饰。”

没有人再说什么。这位可怜的姑娘差不多要哭了，她苍白的脸显得如此悲哀和恐惧。这教师又问起我戒指和手镯。我在讲述它们时，突然冒出一个主意。我书房的地板

上，尤其是书桌周围，被包裹纸皱成的纸团，旧杂志撕成的纸片，伦敦时代版的航空邮件、练习本、笔记本和从书桌抽屉倒出来的文具堆得几乎没膝。这些东西都等待着扔到花园的篝火中去。我看了看眼前的姑娘，我说道：“地板上这些纸和书弄得这么乱。也许失踪的表、戒指、手镯会不会掉在了纸片中间。”

这姑娘苍白的脸变红了。一瞬间，她钻到书桌底下，其他红卫兵也钻了进去。教师还留在他的座位上，用迷惑的神情打量我。他好象识破了我的用意，但又不明白我隐匿小偷的动机。孔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在中国并非如此。在标榜唯物主义的社会中人们的举止行为以个人的利益为转移。这教师可能认为我希望从红卫兵那里得到好处。

在纸片中搜查后，红卫兵重新找到了戒指和手镯。那位红卫兵笑了。但是没有手表。可能有人拿走了。

在我卧房的门边，红卫兵在敲打家具。在我的面前，他们正在砸我的唱片。我站起来对教师说：“这些唱片是十八、十九世纪欧洲音乐大师的古典音乐作品，它不是那种被禁止的舞厅和夜总会的音乐。这一类西方音乐在我们的音乐学校里被传授。为什么不留下这些唱片，捐赠给音乐家协会。”

“你好象还生活在昨天，”他说，“你不知道我们伟大领袖认为任何一类西方音乐都是颓废的？最多仅是某部作品的某一节还可以，而决不是整部作品。”他说。

“任何作品的每一段，不都是整部作品不可缺少的部

分？”我抱怨道。

“住嘴！难道工人、农民需要肖邦、莫扎特、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当然不需要！我们要谱写无产阶级自己的颂歌，所谓的音乐家协会，必须解散！”

夜显得这么冗长。我疲倦得几乎无法站立。我要求教师允许我休息一会儿。

“你可以去你女儿的房间。她有自己的薪水是一位独立的电影工作者，我们不对她的房间采取革命行动。”

我回到女儿的房间，躺在她的床上。天仍然很黑，但是通过窗户我看见东方地平线上开始显出微弱的光亮。我闭上眼睛，慢慢地睡了。

当我醒来，太阳光射进了房间。屋子里显得比较宁静。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但是已没有红卫兵在楼上拖家具的声音。房间外面，我看见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和楼梯上吃学校里给他们送来的热包子。红卫兵少了许多，教师也没有了。我走下楼梯去厨房寻找早餐。

厨师从冰箱里腾出食品，他告诉我，红卫兵要把冰箱搬走。我要他给我些咖啡和吐司。

我在厨房桌边坐下了。厨师在我面前放了咖啡滤器、吐司、奶油和一罐果酱。

一位面目俏丽，两条长辫子披在肩上的姑娘走进厨房，在桌子另一边坐下看着我。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后，她拿了起来。杯子里还有些咖啡，她用鼻子闻了闻杯子。

满脸厌恶的表情，她问我：“这是什么？”

“这是咖啡。”我说。

“什么是咖啡？”

我告诉她咖啡是一种象茶一样的饮料，只不过更使人提神。

“这是外国食品？”她“卡嗒”地放下杯子。

“我猜想你以为它是外国食品。”我另外拿起一片吐司，开始放些奶油。

她看着奶油，又拿起英国标签的果酱。她靠在座椅上，凝视着我，一对乌黑的大眼睛充满怒火。“你为什么用外国饮料？你为什么吃外国食品？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外国书？你为什么都用外国货？你屋子里每一间房间里都有进口货，唯独没有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的画像。我们去了许多资产阶级家庭。你这里是最坏的，最反动的。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她的发怒，我觉得好笑。我的房屋同他们劫掠过的其他人家是不相同。文化革命开始时，老赵建议我挂一张毛泽东的肖像。由于大家都这么想，所以我在任何商店都没能买到一张画像，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不管怎样，我想我是可以帮助这位俊丽的姑娘恰当地观察世界的。

“你吃番茄吗？”我问她。

“我当然吃！”她说。番茄在上海非常普通。一旦丰收，价格降到每斤只有几分钱。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成年人和孩子都把番茄当作水果和蔬菜吃。

“番茄也是外国食品。它是由外国人推广到中国来的。又比如西瓜，也是从丝绸之路上的波斯带来的。至于外国书，卡尔·马克思本身就是德国人。如果人们不阅读这些

外国的书，就不会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能把任何事物和想法都封闭在一个国家的国界内，就是在交通闭塞的旧时代也一样。现在，这样做更是不可能。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已经听说中国的学生组织了红卫兵。”

“真的？”她说。她关心了。看来我为她打开了眼界。过一会儿，她说，“你讲得很清楚。你上过大学？”

我满嘴是吐司，于是点了点头，她沉思着说：“我希望高中毕业后能上大学。现在任何大学都不招生了。所有年轻人都得成为军人。”

“你是姑娘。你不是军人。”

“做个姑娘是最不好的！”她的声音很沮丧。

“不管怎么样，现在又不是战争时期，所以你用不着烦恼。”我试图安慰她。

她迅速转过身看了看房门，向正弯腰在水池里洗蔬菜的厨师投去忧虑的目光。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她小声警告说，“不要说这些！说这些危险！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告诫我们，要用人民战争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你决不能宣传和平，这是对抗我们伟大领袖的教导！”

我对她微笑，并点头同意。

厨房门打开了，两个男青年伸进头来问厨师，电冰箱整理好了没有。姑娘的手迅速从我的肩上拿走，站了起来。虽然男青年已经退出去了，她仍然象演戏一样提高嗓音说，“你是阶级敌人。我不想听你胡扯。”

她转身离开了。但是在门口她转身给了我一个甜蜜的

微笑。

在水池边的厨师说，“他们并不都是小傻瓜！”记得厨师最小的儿子是高中生，我问他儿子是否也参加红卫兵组织。

“是的！他怎么会不参加！如不参加被作为叛徒看待就得受处罚。另外，年轻人也确实喜欢学别人的样。当然，他一回家，我妻子就要严厉地询问他是否干了不该干的事情。”

“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情况怎样？”

“他们日子不好过了。他们被弄得无家可归，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线。你知道，年轻人相互之间也是很残忍的。自杀的人在增加。”

厨房外面，我看见一位男人，他昨晚没和红卫兵一起露面。从他自信的态度中我想他是党的官员，年纪四十开外，也许还是内战时的退役老兵。

“我是政府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检查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是我的工作。你是不是被打了或者是受到了虐待？”

惊奇地听到上海市政府正尽力阻止红卫兵的过份行为，是令人高兴的。事实上，缓和运动的努力很快被北京高级领导层中的毛主义者制止了。不过他对我谈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也大难临头，依然用一种很有权威的口气。

“不，一点也没有，”我对他说。“这些红卫兵采取的革命行为，完全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我吃饭和睡觉都是允许的。”红卫兵站在我们周围微笑。

他声称：“这就好，毁灭你的身体不是无产阶级的目

的。我们要通过改造你的思想方法来拯救你的灵魂。”虽然毛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无神论者，但是他们都非常喜欢讲所谓的“灵魂”。在《毛选》里，毛经常涉及人的灵魂的拯救。文化革命期间，“灵魂”被频繁地提及。好多次，国防部长林彪代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说，为提高觉悟，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由于没有人会问毛泽东和林彪他们所讲的人的灵魂的含义应怎么理解，只能靠报上发表的毛主义作者写的文章来发挥创造性了，这些人专门对人民解释领导人的话。联络官抬起手臂，指了指周围整座房子：“在上海住房紧缺的情况下，你和女儿住了九间房，是不是恰当？当木料短缺，其他人都用普通家具时，你每间房都铺上了羊毛地毯，摆满了红木家具是不是恰当？你穿丝绸、毛皮，盖柔软的被子，是不是恰当？你有三个佣人侍候是不是恰当？”

他观察了我片刻。当他发现我不打算与他争论，他继续说，“正如我刚才说的，毁掉你的肉体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你会有足够的衣服穿，使用普通的家具过正常生活。但是，不允许你的生活水平继续超过工人的平均标准。”

他再次观察我的反应。没有发现什么，他继续说：“现在天气很热，但是冬天很快到来。红卫兵要带你上楼把你自己的衣服装一只手提皮箱。装一些可保暖的衣服：你房子里再不要使用暖气设备了，工业很需要煤，不是供资产阶级奢侈享受的。”

他去了餐厅，关上了门。我随红卫兵上了三楼，从杂乱的物品中拣了一些衣服。一位早上离开的男红卫兵回到

了这里。他刚踏上两步楼梯，就对帮助我的姑娘说，“不可思议！真不可思议！你知道我回家发现了什么？他们抄了我的家！他们怎么能这么干？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工人。”

这确实是意外的事情。我们都停止拣选衣服，请他说明白。

“都是我的姨母。日本侵略时期，日本鬼子烧毁了她在南通的住处，她失去了任何东西。战后她借钱摆了一个水果摊。她干得不错，养活了自己和她的女儿。两年前由于年纪太大了，再经营有困难，她就收摊不干了。现在他们说，她是资产阶级，因为她做过个体生意。女儿不在上海，她就与我们住在一起。这一下我们家也被抄了。”

年轻人满怀义愤，几乎要流泪。这一件事对这位出身三代工人阶级家庭，自尊自傲的红卫兵，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也开了眼界。我以为资产阶级之间，资产阶级与其他阶级都是不同的，假如把水果摊主也包括在资产阶级的范畴，在上海，红卫兵要干的事就太多了。

好多红卫兵过来一起听年轻人的故事。我注意到有两个青年悄悄溜走了。毫无疑问他们回家了解情况去了。

想起我的女儿，我要求红卫兵为她拣选些衣服。

“她不是我们革命斗争的对象。我们没有去她的房间。”他们回答。

“她冬天的衣服不在自己的房间。夏天时都收了起来。”我告诉他们。

那位自己家里也被劫掠了的男青年明显地成熟了，他

自愿服务：“我们应该给她装满两只手提箱。”

我女儿和我的衣服被允许各装一只手提箱。一只大号帆布包装寝具。

抄家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红卫兵准备离开。到了中午，留在屋子里的人数不超过十来个。有人叫我去餐厅。

联络官和教师两个坐在餐桌边。餐桌上摊着我祖父写给我父亲的旧信。那还是在1911年中国共和革命前，我父亲是日本海军学院的学生。1962年我守寡的母亲在南京逝世后，这些旧信和其他的家信被拿到我家。我没打开过盒子，因为它们将被送往在北京的我的弟弟那儿。我弟弟是长子，他是合法的继承人。我看见这些信同信封一样由于时间久变黄了，但是我祖父的笔迹没有退色。

用手势示意我坐到空着的椅子后，联络官指着信问我：“你读过这些你祖父写给你父亲的信吗？”

“很久以前，我只有十来岁时，我父亲给我看过。”我告诉他。

“你祖父虽然是个大地主，但他仍然是个爱国者。在1894年反对日本的海战中，中国因战败而受到损害，于是你祖父就送你父亲——他的长子去日本学习，想让他成为海军军官。他也参加过流产的‘宪政运动’。失败以后，他回到了故乡，从事学术活动。你尊敬你的祖父吗？”

我想联络官说我的祖父尽管是大地主，仍然是个爱国者，这是够大胆的。所有大地主都被宣布为是国家的敌人，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枪杀。从没有人试图去证实，他们中是否有爱国者。我记得父亲说，那时管理

地产的叔父还算幸运，他在共产党执政前几年去世了，以致于我祖父在天国也免受了他的一个儿子遭到处决的侮辱。

所有的中国人都尊敬自己的祖先。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祖父，我爱他。所以我对联络官说，“我当然尊敬和热爱我的祖父。”

“那你为什么挑选了为外国商行的工作？你难道不知道外国人对我们从不怀好意？他们为了经济利益剥削中国人民，或者是企图在政治上奴役我们。只有中国人的渣滓才为外国人干活。你知道这些。你应该到外语学院教英文。为什么宁愿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呢？”

我不能告诉他，我决定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是因为我害怕卷入由毛泽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1957年当我决定选择去外语学院教英文还是接受壳牌石油公司的工作时，反右斗争正在进行。运动的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国外留过学，被怀疑对共产主义有敌意的人。我的许多朋友和熟人被揭发出来遭受虐待。有的被送到劳改营，少数去了监狱。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包括外语学院都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干外语学院教师的职业，岂不自找苦吃。尽管我知道为外国商行干活在中国社会既不光彩也没有地位，但我并不后悔接受壳牌石油公司的聘请。

“你也许让外国人给的钱吸引了？”他问。我立即意识到我处于危险的境地。由于持久不断的宣传，在中国普遍的信念是资产阶级分子干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钱，就是犯

罪。

“不。”我说。“我已经有大笔的钱，主要是看中壳牌石油公司的工作条件，比如工作时间短，能用车等。我想我是懒惰的。”我表示了自我批评的态度，因为懒惰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特征。

他站了起来看了看表，“我还要去好多地方，”他说。“你好好想想为外国人干的事，把立场转到人民方面来。毁灭资产阶级分子的肉体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要改造你。你不想加入光荣的无产阶级队伍吗？只要你脱胎换骨，改变生活道路，你是可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无阶级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人们为共同的利益而劳动并享受劳动的成果，人人平等。”

这是一幅富有魅力的理想主义的画面。当我还是学生时，我也相信过。在共产主义中国生活十七年以后，我了解到这样的社会只是梦想，因为那些掌权的人，一定会变成新的富有阶级。他们有权控制人民的生活，迫使人民服从他们的意志。他们用国家的名义控制了一切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他们也喜欢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奢侈的物质生活。

在共产主义的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细节被当作国家秘密不能泄漏。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党的领导人生活在宽敞的公馆里，有许多侍从，从专门的商店获得食品。他们家属获得定制的奢侈品并且只要付名义上的价钱。他们的孩子有汽车送到专门的学校，由经过专门挑选的教师上课。虽然人们都知道这一些，但是没有人敢评论。虽然我们有时必须经过为军队或高级干部服务的专门商店，但

我们会小心地望着别处，避免让人觉得你知道这儿有这种商店。

谁都知道，毛泽东自己住在从前清朝皇帝的故宫里，随员都是经过特殊挑选的，年轻有魅力的妇女做他的私人服务员。他命令红卫兵撕毁宪法，打人、抄家，但是没有人，甚至没有党的领导人胆敢反对他。就象联络官，党内级别很低的官员也可以决定我该有多少短上衣，我今后该怎样生活。他可以作出关于我的生活的专断的决定，教训我，甚至以虚构的罪行谴责我，还不因为他是党员，而我只是普通的市民，他有权，我没有。任你怎样空想，我们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

当联络官离开我家后，红卫兵听说那天没有货车能来把他们劫掠的东西带走，于是就把我的珍品和另外的贵重品放到梅萍的书房，封掉了房门。为了使我不能把东西拿回来，他们委托佣人们看住我。

最后几位红卫兵“砰”地关上前门离去，已是午后了。老赵和厨师想清理覆盖在房间地板上的碎片——碎玻璃片，瓷器、画架和大量的碎纸。我对他们说，不要动它们，也不要扔掉它们，万一红卫兵需要的一些东西丢掉了，他们就会指责我们是有意的。再说他们把碎纸片都堆在中间，房间里已经清理出一条路来了。

我去卧房查看破坏的程度，发现陈妈已坐在我的梳妆台旁，凝视着她周围的混乱景象。我要她帮助我拣起破碎的衣服，放到角落里去，腾出空间，使我可以在房间里走动。我的床单被红卫兵的脚步弄脏了。陈妈拿走了床单，我

们看到红卫兵撕开了床垫子，我卧床的墙上挂着一幅花卉图，有人用口红在上面写了，“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红卫兵在漆器的嵌板上打了孔。从屏风架上悬下了一条写着口号的彩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资产阶级。”我折叠起弄坏的屏风，放在外面的走廊上。当陈妈清扫瓷器台灯的碎片时，我拣起了已弄皱的白色丝绸灯罩。

在浴室里，弄脏的毛巾堆在一起。浴缸里的水染了色，因为红卫兵从医柜里拿来所有药剂注入了进去。我伸手拔去塞子，让水流去。

突然前面的门铃又一次响了。老赵冲上楼，喊叫道，“另外一些红卫兵来了！”

我火急地用手巾擦了擦弄脏的手，走出来。我对他说，“保持镇定，开门。”

“厨师在那儿，”他低声说。

我走下楼。几个穿着蓝布衣服的农夫或室外干活的工人站在客厅里。虽然他们都是中年人，却戴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的头儿，一个手拿皮鞭的人站在我的面前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对你采取革命行动！”

态度是如此荒唐，我觉得可笑，“你们真的是红卫兵？我看你们象红卫兵的父亲，”我站在最底下一格楼梯上说。

皮鞭朝我打来，正好打在我赤裸的臂膀上。一阵刺痛使我咬紧了嘴唇。这些人在显示他们的力量，还不时地看看他们的臂膀。

“拿出钥匙来！我们没有时间站在这儿与你谈话，”他

们的头儿喊叫道。

“我的钥匙被昨晚来的红卫兵拿走了。”

“你藏起来了！”这人又举起了鞭子，如果他想再一次打我，只要用皮鞭尖触我一下臂膀，就够我受了。

另外一人急切地问，“每一件东西都让他们拿走了？”

“不，不是每件东西，”我回答。

有人把我和我的佣人推进厨房，锁在里面。当另外的人收集手提皮箱里的东西时，这人留守在门外。不久，他们慌慌忙忙地离开了，也没来打开厨房的门让我们出来。厨师只好爬出厨房窗口进入花园，又回到屋子里来打开厨房的门。

陈妈又去了我的卧房，为我铺床。我坐在厨桌边喝着厨师为我泡的一杯茶。他坐在桌子的另一边开始削梨。

“刚才发生些什么？”他问。“这样干是非法的。看来谁都可以戴上红卫兵袖章，自称红卫兵跑到别人家里去捞好处。”

“红卫兵在前门贴了大字报。我能不能出去看看写些什么？”老赵又问我。

“好，你去看，”我告诉他。

老赵回来告诉我，因为我与外国人共事，在文化革命中我就成了外国间谍，精确地译成四个中国字是：“里通外国”，意思是在国家里面与外国相通，在任何地方这也许是正常的，无害的。但是在毛主义的中国不通过官方途径与外国相通就是犯罪。

当我听到女儿打开了前门又关上了，然后推着自行车

进入汽车库时，我想着怎样使用一些委婉的话语。

“梅萍回家了！她要心烦煞了！”老赵和厨师大喊起来。（在中国的家庭内，老佣人经常给小孩起名，梅萍就是我的佣人们在她还是小姑娘时叫的。）

我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冷漠地站起来迎接她。

她开了门，站在那里，看到杂乱的状况，她发楞了。她看见了我，冲了过来，伸出手臂绕在我的肩上，小声说，“妈妈，妈妈，你好吗？”

“不要烦恼，”我轻松地说，我控制住了自己，“文化革命结束时，我们会有新的家。它也是漂亮的，不，比这个更漂亮。”

“不，妈妈，不会允许我们再有这样的家了。”她用压抑的声音说。

我们互相搂着腰默默地上了楼梯。我陪她去了卧房，至少在那儿任何东西还保持原样，她走进浴室时，我在单人沙发上坐下了。当我们出来时，老赵已经在我的书房里清理出一个空间，为开晚饭摆好了折叠的桥牌桌。厨师精心烹制了肉丝、青豌豆拌沙司的面条。我开始吃时，才知道自己是多么饥饿。

我边吃饭边告诉女儿，那位联络官说为过象普通工人一样的简单生活，我能留下些一般的家具和必要的器皿。我要求政府让我们住在两层楼，其余的房子让政府分给另外的家庭。这样仍有我的卧房，浴室，梅萍的卧房、浴室和书房。对我们来说也足够了。如果计划可行，就可以早作安排。我准备过低标准的生活。这将是新奇的，可能也

是愉快的，不会有太多的事情需要照料。人类的精神是有弹性的，我生来就是乐观的。

我注意到，由于我讲起今后的打算，梅萍明显地变得轻松了。她告诉我，除了任命联络官监督红卫兵之外，上海党的书记处和市政府通过的“十点决定”，强调要保护重要的文化遗迹；指出搜劫私人住房是违反宪法的。老赵停下所干的活聆听，陈妈从我的卧房走出来，鼓掌。听到这个好消息，他们感到安慰。但是，红卫兵在我家里的所作所为和他们提到的有关政府里有修正主义官员，使我对“十点决定”实施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

我知道女儿看到我忧虑的神情又在为我烦恼。为让她身心舒适，我对她讲起，在国民党时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我如何失掉了全部财产。

“这事发生在1941年夏天的重庆。你爸爸和我准备和第一批中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属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在那儿开设中国公使馆。在离开的前两天，我们遇到了持久的、严重的空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了我们房子前的网球场，掀掉了屋顶，部分房屋倒坍，”我说。

“天呀！你们在哪儿？”我的女儿问。

“我在房屋底下的隐蔽所里，你爸爸在办公室的隐蔽所里。重庆的隐蔽所是在山边开挖的很深的洞，很安全。”

“你们失去了房子里所有的东西？”

“幸运的是，警报响时，我把几只手提皮箱放到楼梯底下。楼梯压在手提箱上。我拿出了三个大些的皮箱。自然，这些箱子已糟透了。当我们去香港时，必须重新购

买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时间从瓦砾堆中找回家具。这一天，我不知所措了，”我告诉她。“如你所知，事实上我几乎失去了我的每一件东西。”

“你以前从未告诉过我这些。”

“事情发生在那么久以前，你还没出生，我当时的年纪比你还小。事实上我已经忘记了。红卫兵来抄家使我又回忆起来。”

“妈妈，这么可怕的事情，你怎么忘了？你失去了每一件东西！”

“是的，我忘了。这是在战争时期。人们在任何地方都得遭受轰炸，受难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再惨的遭遇也必须忍住。”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家今天这种样子，一百万年也不忘记，”我的女儿说。

“朝前看，不要往后看那么一切总是好的。财产算不了什么。这些瓷器，在我收藏以前，它们已经过了许多人的手，又是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残存下来的。我得到它们，是因为有人失去了它们。我收藏时，我高兴；现在别人高兴。生命本身是短暂的，财产并不重要。”

“我高兴你是这样的达观，”她说，回家后她第一次笑了。“自然我们并没有把幸福寄托在财产上。我们相依为命，即使穷，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我们不穷。我告诉过你国外的财产。我们能比中国大多数人生活得好，我看你很疲乏，眼睛下还有黑晕。你最好休息一会儿。”

梅萍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呆呆地思忖着。当她站起来时，她说：“妈妈，我们会一起度过暴风雨的。我相信国家的前途，事情会变化的。他们不会一直这样不公道。党内也有好的领导人，象周总理和许多其他人。”

“他们现在能干些什么呢？听任这么多无罪的人受苦？”

“不要失去信心！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会干事情的。我爱中国！我爱自己的祖国，尽管她并不都好、都正确，”我女儿用坚定的声音说。

她的话使我眼里涌上了泪水。虽然因为阶级地位，我成了一名被遗弃的人，但是我也深深地、永久地爱着这片祖先的土地。

第四章 镣铐入狱

一阵倾盆大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慢慢地，雨点淅淅地变成了毛毛雨。花园里到处是纸灰和撕破的书，模样怪可怜的。我站在大阳台上注视着眼前萧条的景象，心里思忖着又会发生些什么事。

上午的时间总算慢慢地过去了，没有红卫兵的迹象。我无目的地在屋子里漫步。没有书可阅读。现在书房两边的书架上，只有四卷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塑料封面的毛的语录本。我不会干缝纫、编结活；再说红卫兵把什么东西都弄乱了。我不知绒线和针线在哪里。我不能写信或绘画；所有的纸和信封都被撕破了，我也不知道我的笔在哪里。我无法听收音机，因屋里的收音机被当作贵重品封了起来。我只能坐下来凝视每间房里的一大堆碎片，更不能冒险移动它们。

雨在下午停了，太阳也出来了。有一些游行队伍在门前通过，但没有红卫兵再来。老赵拿给我白天发行的上海《解放日报》。它是一份晨报，然而始终要到下午才来。在第一版，醒目地转载了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由于所有中国报纸都是官办的，用来宣传政

府政策，尤其在《人民日报》，所以我知道文章的重要，便仔细地阅读起来。文章用了鼓动性的革命语言，表面上好象目的是鼓励仇恨资产阶级，激励群众参加文化革命。实质上我注意到文章提出了中国许多地方党和政府部门的官员执行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反对毛泽东的领导。文章的作者称那些还没有被点名的官员为“走资派”。文章说，“革命群众”必定能识别这些敌人，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信赖革命群众，他说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文章告诫“革命群众”，资产阶级是狡猾的。并断言资产阶级分子在家里藏了黄金和秘密武器，只要国外攻击中国，他们就会与敌人配合，组成“第五纵队”。文章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称他们为“革命小将”。最后，文章提到存在着反对文化革命和红卫兵的“逆流”。文章告诫大家当心这股逆流，避免受其影响。那些“走资派”都披着“修正主义者”的外衣，他们试图保护受到革命群众处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资产阶级。

这篇文章极端地不负责任，因为它没有向“革命群众”提供敌人和“走资派”的确切定义。从文章中我感觉到十有八九毛泽东和他专门挑选的中央文革小组打算进一步扩大斗争的范围；并对列入名册的受害者加紧使用暴力。那些使人心寒的语调是不能忽视的。由于《人民日报》上的重要文章是必须服从的，上海文化革命的局势一定会进一步扩大。党的书记处和市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执行“十点决定”了。我预感到红卫兵马上会回来，我也预感到他们的态度会更充满敌意和不妥协。我想应该劝佣人们离开这里回到他们的家

里去。

厨师说，他不住在这里，可以任意来去，除非红卫兵要他离开。老赵说，“我不怕留下来。你需要有人去市场买食品，你自己外出是不安全的。我出身穷人家庭，我的儿子是军人，还是党员。我是完全的无产阶级。红卫兵已经捣毁、没收这儿所有的东西，他们还要干什么？如果他们要我离开，我到那时再走不迟。否则我一直留在这里。”陈妈哭着说她要和我的女儿在一起。

在这种时候，我佣人们的忠心是非常高尚的。我深深地感动了。我并不坚持要他们立即离开，不管怎样和他们在一起总比我单独在家等候红卫兵强。我用厨师从商店里买来的纸写信给陈妈住在外省的女儿，要她来接母亲回家。我觉得陈妈比老赵、厨师更可信赖。

女儿回家了，说起红卫兵包围了市政府大楼，要求立即撤销“十点决定”。痛斥“决定”保护资产阶级。我并不感到惊奇。她还告诉我，毛夫人江青的长期伙伴，被任命指导上海的文化革命。

“他的名字叫张春桥，我们电影制片厂有人说，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江青是位女演员时，他是一个记者。制片厂里知道他俩底细的人受到威胁，有些人收拾好行李准备去监狱。他们好象相信张春桥会扣留他们，这样好阻止他们谈论张春桥和江青三十年代的历史。妈妈，你能不能想象这些无辜的男女演员竟准备去监狱？”我的女儿既迷惑不解又感叹、激动。不了解上海三十年代的情况，所以我既很难理解江青、张春桥的恐惧心理，也不了解知道他俩底

细的男女演员会有多么危险。

“今晚你留在家里？”我希望整个晚上都能与她交谈形势，我问她。

“我恐怕不行，妈妈。我奔出来看看你怎么样了，红卫兵是不是又回来了。其他人都留在电影厂里。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我听说这篇文章是与毛主席非常密切的人写的，所以它非常重要，它阐述了毛主席的观点，”她急切地说，看了看表。“晚安！我必须去了！”

老赵送来一碗鸡蛋面，说：“请吃点吧，已经凉了。你不能不吃饭。”

我女儿拿起筷子，挟些面条塞到嘴里，吞了下去。她对老赵说，“非常感谢。我一定得走了。”

她紧紧地抱了我一下，冲出了房间。我想对她说的话太多了，但是说一句话都没有时间。

老赵带给我一只半导体收音机，这样我可以收听晚间新闻。每个电台都在广播《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播音员用一种激动的高音调声音在读它，这种声音在往后的岁月里我是太熟悉了。我拨动收音机，想听听本地新闻，但是什么也没有。无法入睡，我就一遍遍地听着播音员念文章，以致我几乎能把文章背出来。

第二天早上，厨师回来说，市场上食品很少。平时往市场提供蔬菜、鱼、河虾等食品的近邻农民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加入“革命群众”的队伍，参加了文化革命。好多人来到城里，住进了商业区的旅馆，他们的领导人要求胆战

心惊的旅馆经理免费提供食品和服务。他们回到公社后，把旅馆里有热水龙头、弹簧垫子、地毯等奢侈品的消息传出来，妇女和小孩也随男人进城，抓住机会免费渡假。其间，从北京和其他北方城市来的红卫兵已到达火车站，他们要与上海的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同样上海的红卫兵希望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去了北京。为运送他们，在车站、码头留下了正常的旅客和搁浅的货物。红卫兵征用了火车、轮船。由于《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提到“走资派”，党的地方机构因此而瘫痪了。

因“十点决定”受到谴责，上海市政府采取了守势。为避免给红卫兵更多抱怨的理由，政府对来来去去的红卫兵免费提供膳食。许多食品摊在火车站、码头建立起来。所有商店都供应面包，从前的白俄面包房，现在由国家经营，被动员为红卫兵生产面包。

下决心寻找上海官方的错误，红卫兵斥责由面包房生产的西方样式的面包是外国食品而拒绝吃。与此同时，工厂的工人也决定加入革命群众的行列，组织了他们自己的革命团体。使上海官方局促不安的是，他们提出了过分的经济要求。为促使他们继续生产和赢得他们的支持，官方认可支付额外的津贴，使工人受益。几天以后，当地银行储备的现金就用尽了。那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工人非常愤怒，他们与红卫兵一起攻击市政府和它的主要官员。红卫兵和工人反对市政府活动的后面有张春桥的插手。张春桥住在和平饭店一套舒适的房间里，指挥他们的革命行动。一直到第二年“一月革命”推翻上海党的书记处和市政府，

和平饭店成了毛主义领导人来上海时的临时司令部。

我女儿的几个朋友是高中教师。因为他们也戴着红袖章，所以来访问我们没有引起过分的注意。乘红卫兵没来时，老赵也找机会混入街上的人群出去访问他的朋友。厨师的儿子来看望父亲，告诉他单位里的情景。他们叙述的故事是如此的惊罕。上海党和政府的官员动用他们的权力又是多么勉强和不容易。我开始思索起文化革命的目的，似乎不仅仅限于所宣称的消灭残存的资产阶级、净化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队伍。

有一天，梅萍的朋友、中学教员小苏来看望梅萍。梅萍到电影制片厂去了。他告诉我，红卫兵拆除了天主教堂的尖顶，这尖顶是上海的标志。并且说红卫兵捣毁了上海市图书馆，毁坏了大量有价值的书。当红卫兵冲击历史博物馆时，他们没能推倒结实的铁门。于是他们去了馆长的家，把他从病床上揪去开斗争会。

“老人目前在医院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红卫兵已变得非常野蛮。我想你应该让梅萍设法逃到香港去，”他说。

“你认为梅萍想去吗？”我问他这个问题。前不久，他也在我们家，我提到去香港，他和我女儿都说，他们决不去殖民地的香港当二等公民。

“现在情况不同了。文化革命以后，不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在中国没有前途。过去，只要我们比工人子弟更加倍努力，期望也不要过高，我们会有幸福的个人生活的。今后，我们就象印度不可接触的人，这些人的子

女，子女的子子女都得受苦。逃亡是唯一的办法。你有许多朋友在国外，为什么不让梅萍去？”他怂恿我。

“我想现在逃已经太晚了。你知道对企图逃到香港去的人，处罚非常厉害，要判十年到二十年的监禁。”我说。

“不晚。我做过一些调查。现在整个铁路系统处于混乱状态。不用买票或持旅行证，红卫兵就可以坐火车去全国各地。没有人会问什么问题。我去过车站和码头，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检票员。”

“我想不管怎么样我去坐火车就会被认出来，揪回来挨打。”

“你们可以装扮成红卫兵。我给你一些做袖章的红布。给你写上‘红卫兵’三个字。我为学生很快就能干完这些事，”他说。

“我装扮红卫兵不显得太老了？”

“你必须把头发剪得短一些，手上拿本毛主席语录，假装专心地阅读。你不能戴顶帽子盖住头发？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教师。至于梅萍，她很容易装扮红卫兵，”他性急地说。

（1980年，当我从中国出来，在香港再一次遇到了小苏。他告诉我，他试图坐火车去香港，到边境时他转了回来。不过，后来他游到了澳门。在香港几年后，他努力工作储蓄了一些钱。1980年他成了九龙一家玩具厂的股东老板，这家厂的玩具出口到世界各地。由于毛逝世后中国的环境好了，他想回上海探望母亲。）

当我再一次听到前门被疯狂地敲打时，我正在浴室

里。下楼途中，迎面而来的是一位大约十五岁的小姑娘。她穿着黄卡其军服，头上整齐地戴着帽子。帽檐盖住了她的眉毛，眼睛在底下窥视。她细腰里扎了一条有一只发光扣子的宽皮带，手里拿着皮鞭。

“你是这屋子里的阶级敌人？你怎么养得这么好！你的脸这么光滑，你的眼睛这么乌黑。你是靠工人、农民的血汗养肥的。你必须偿还你的罪行！跟我走！”听她的口音，我知道她是北京来的红卫兵。

我跟她下楼。在餐室边的客厅里，有一些相同装饰的男孩和姑娘。她走进房间，我跟着她。

“跪下！”一个男孩叫喊道。同时，他的木棒戳在我的后背上。另一个男孩用木棒敲打玻璃柜门，玻璃被打碎了。他摇动木棒，然后打我的膝后部。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跪，又命令我举起双手。我瘫倒在地板上。

“钱哪儿去了？”有人问。

“上次来的红卫兵拿了。”

“他们都拿走了？”

“不，他们留下100元作为我的生活费。”

“在哪儿？”

“在我书桌的抽屉里。”

那男孩踢开我的腿，和另外一人一起上楼了。那位拿皮鞭的姑娘留下来看守我。她手中的皮鞭在空中前后挥动着，每一次都差点儿打在我的脸上。另外一人拿着抽屉下楼，在餐桌上倒出银行票据。他们要我把脸转向墙壁。我听到他们在数票据。

有更多人进入房屋的声音。我惊奇前门怎么还开着。我听到有人命令老赵去叫陈妈和厨师到客厅来。那人在说，“带他们上楼，审问他们。”

红卫兵走进客厅，又来到了餐室。

“她在这里，”有人说。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我们自己来处理她，”刚才讲话的人说。我听到红卫兵离开了房屋。他们出去时，用木棒和皮鞭打砸墙壁和家具。他们关上了门，如此用力，以致于房屋都摇动起来。

“站起来！到这里来！”那人又叫喊道。

我站起来，转过脸面对新的入侵者。这讲话者中等身材，瘦弱的体格，戴着墨镜。房间里还有另外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虽然他们都穿着棉布长裤、不太合身的衬衣和工人阶级的短上衣，不过从讲话中看来他们受过点教育。在他们的袖章上有三个字：“造反派。”

他们面对着我坐下了。那人对我说，“你是这幢房子里的阶级敌人。你犯有与外国势力合谋的罪行。这些在你门前的大字报上写着。你认不认罪？”

“我当然不认罪！你们究竟是谁？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头衔，”我说。

“你想了解些什么？！我们造反派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在中国是领导阶级，”他扬起头说道。

“中国工人阶级不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吗？”我问。

“住嘴！对你我们不必作任何解释。你是个傲慢的阶级

敌人。你没有权利讨论谁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革命的。这就足够了，”那位女的说。

“你是阶级敌人，你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在北京上了美国资助的大学，然后又上了伦敦的英国大学，所以你早就接受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训练。”

与他谈话是毫无意义的，我保持沉默。

“是不是因为羞耻，你无话好说了？”那位女的问。

“我为什么要羞耻？许多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都成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作为那儿的毕业生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人的走狗。伦敦经济学院是由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建立的左派学院。事实上，在那里我第一次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我告诉她。

“呵，笑话！一个阶级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阅读《共产党宣言》！接下来你打算说你要参加共产党了，”戴墨镜的人讽刺道。

那位女的说：“列宁斥责费边社会主义者是改良派。他们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拥护暴力革命。你休想讨好我们。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待清楚。”

“我是一个受法律保护公民，”我声称。“我为外国商行工作，不接触政府秘密。我不熟悉任何外国政府，他们也不知道我。”

另一位男人说，“你与一个外国政府官员是朋友关系。”

“你不要这么激动。所有外国商行的老职员都承认这点，就是你否认，”另一位男人插话。

“外国政府为什么信任我们？”我问他们。“他们掌握住

象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能获得什么？”

“在国外你有很多钱。你没有对这一点认罪，”那位男的说。

“这是外国人在笼络你。他们会没收你的钱，”女人又说道。

“你们不理解，外国政府不会干涉银行事务。他们不会没收任何人的存款，”我告诉他们。

“那你究竟为什么要把钱存在外面？难道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要把钱存到国外去？”

“我去香港旅行，在那儿就得付食品和旅馆的费用，这你们知道。兑换外币是控制的。我每次出去仅允许换5美元。另外，我必须带点钱到国内的外汇商店来买东西，”我解释道。“我有些钱在外面，但更多的在上海。我这儿有家，有我唯一的女儿，对我来说她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价值。她是一个共青团员。我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呢？”

“即使你女儿是党员，你也是反对共产党的，这是你的阶级本性。”戴墨镜的人说，他象是他们的头头。

另外一些男人、女人进入房间，佣人们跟着。戴墨镜的人看着他们，那些陌生人摇摇头。显然他们没能从我佣人那里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戴墨镜的人采用严厉的音调问我，“你的黄金和武器藏到哪里去了？”

“什么黄金和武器？”我惊奇他的提问，直到我记起《人民日报》的重要文章。文章谴责资产阶级分子隐藏了黄金和

武器，以便国外势力入侵中国时组织第五纵队。

“你是知道黄金和武器的！还是老实交待吧。”

“我既没有黄金也没有武器。红卫兵来过，他们把整个房子都搜遍了，也没有搜到任何黄金和武器。”

“你是个聪明人，你把东西都藏起来了。我们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阶级敌人将黄金和武器都秘密保存起来。他的话不会错。”

“假如你不交待的话，我们搜到黄金和武器，你可要受到严惩。”他们的头头说道。“走！一定藏在这幢房子的什么地方。”

我十分奇怪，他们是真的笃信那篇重要文章，还是只是装出相信的样子。事实上，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不久，个人私藏黄金珠宝就被宣布为非法，拥有黄金珠宝的人必须上交给政府。警察可以进入民宅搜查，原国民党军人和警察一个个地被捕入狱，在劳改营接受“改造”。他们的家属都从自己的房子里搬出去。因此，时至1966年仍说在哪个中国人家里还藏有武器，这真是荒谬之极。

但造反派还是押着我和我的佣人搜遍整幢房子。他们撕破床垫，剪开椅子和沙发的外套，撬开洗澡间的墙砖，跳入壁炉，搜索烟囱，掀起地板，钻进顶棚。跳进天花板下的水箱里摸索，匍伏在地板下检查管道。自始至终，他们留意观察我和佣人们脸上的表情有无异样。

我已经记不得时光的流逝，当他们决定要翻掘花园时，夜色已降临这个城市。天空阴霾密布，又是一个黑暗的夜晚。他们在平台上接了一盏灯，要老赵给他们照着

亮，当来到堆煤棚边时，吩咐我和佣人们把煤搬到花园的一角，那儿他们已搜查过了。潮湿的满是灰土的草地，被踩得都是泥浆水坑，所有的花圃都被掘起，铁锹伸进灌木丛中，到处乱挖。甚至把树木连根拔起。但是在这空无一物的地方自然一无所获。革命造反派，佣人们和我都浑身湿透，泥迹斑斑。最后，体力上的精疲力竭终于战胜了他们的革命热诚。我们被告知回到房里去。他们一个个怒气冲冲，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使他们丢脸。我很清楚，除非我能做些什么换回他们的面子，否则就会迁怒于我。只要我能设法拿出几样金银首饰如戒指、手镯之类的东西，就可以了。我忽然想起被封在梅萍书房里的珠宝首饰。

“红卫兵把我的金戒指和手镯封存在房间里了。你们如果能打开这房间的话，就可以拿走这些东西，不过要让红卫兵知道一下。”我对那女人说。

“不要装疯卖傻，我们是要搜查金条。”她说。

我们都站在客厅里。那个戴墨镜的男人已经把眼镜取下，露出满是血丝的眼睛。他看了一眼厨房门边上瑟瑟发抖的佣人们，望望他身边的造反派喽啰，然后怒视着我，突然大吼一声，“你把黄金和武器藏到哪儿去了？”他威胁着朝我逼近一步。

我疲乏至极，几乎站不住了。勉强支撑着说道，“这儿什么也没有，如有的话，你们不就已经可以找到了吗？”

显而易见他的判断是错误的，但这点使他不能接受，他对我怒目而视，说道，“不对，我们还没有把墙挖开。”

他逼近我，以至看得清他带着冷笑的脸。虽然觉得他

十分可恶，真想后退一、二步，但我还是没有挪动一步，我不想让他觉得我怕他。我只是慢慢的，用一种平常的，毫无敌意的声调说：“你一定能够理解，如果我把什么东西藏到墙壁里去，我一个人是干不了的。就需要重新用泥灰砌墙。所有的工人都是为国营企业工作的，他们就会向支部书记报告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我已累得几乎没有力气说话。

那人怒气冲天，近乎忘形，我的这番话，证明了他毫无道理的。他面色发白，嘴唇颤抖，太阳穴上青筋暴突。他向我挥起手臂。

就在这一瞬间，梅萍的猫“拉菲”从厨房里窜出，从背后朝那人的腿上猛扑过去，一口咬住他的小腿肚子。一阵剧痛，那人提起一条腿，狂跳起来，想把猫甩掉。其他人也想抓住“拉菲”，但是敏捷的猫象一道光似地从法式窗口逃出户外，这窗是我们从花园进屋时打开的。我们都冲到外面去，“拉菲”已悠然蹲在木兰树树杈上，谁也够不着它。占据了安全的位置，“拉菲”看着我们喵喵地叫着。那被咬伤的人气得发狂，从裤腿的破洞里，咬伤的小腿后面血流如注。他拼命摇着树想把猫摇下来。拉菲跳到更高的树杈上，回头对着我们大家轻蔑地一瞥，窜上邻居的屋顶，消失在夜色之中。

我们重新回到屋里，在会客室里，那人跌坐在沙发上，沙发已被江卫兵弄坏了，刚才又遭他自己糟蹋。我让陈妈去取些红药水或过氧水来，她提醒我，红卫兵已经把所有东西洗劫一空。

看着他们的头头，用手帕包着小腿，一副毫无光彩的样子，造反派一个个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佣人们都被赶回厨房，只有我留下观赏他的失败。一位女的把我推到连接会客室和密室之间的门口，说道，“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和同情。你在家养着这么个野猫攻击革命造反派，你会得到惩罚的。我们会召集你的邻居，把这只猫找到，把它弄死。如果你认为让你的猫来咬我们，我们就会屈服的话，你就完全想错了。我们还将继续搜寻黄金和武器。”她转身将门锁上，又跑到大厅将另一扇门也锁上，这样我又被关在餐室里面。

我感到奇怪，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我有黄金和武器？或者他们只是在执行毛主席的命令，要搜查这些东西？如果是后者的话，他们表现得已够充分的了。

我听见老赵在花园里低声呼唤着。我走到窗口，看见他在外面站着。

“厨师已经去电影制片厂告诉妹妹今天晚上不要回家来。你看好吗？”

“谢谢你，老赵，你想得真周到，她不在更好。”

“突然，一阵捶门声传来，老赵赶忙去开门。他回来对我说，第一次已抄过我家的红卫兵又回来了。”

“请回你自己的房里去，让陈妈与你在一起，”我告诉他，等待着更大的灾难。

有许多人的声音，奔上奔下，大声呼喊。从上面传来怒骂声，接着就打了起来。对此，我无能为力，我已听任事态发展。我的整个房子都将被破坏殆尽。把三张椅子并

在一起，我倒在软垫上实在精疲力竭。尽管喧闹、嘈杂，我仍昏昏睡去。

清晨，几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打开房门一拥而入，看来，一场争吵已经结束，一个姑娘吼道：“起来！起来！”

一个女造反派让我赶快到厨房去吃些东西，然后“到楼上来，有事情要做”。我走进楼下的厕所，洗洗手，从洗脸盆上的镜子中望去，我不禁大吃一惊，见到自己蓬乱着头发、一张虚肿苍白的脸，前额和面颊上沾满了泥浆，退后一步，从镜子上我看到衣服上也沾满了泥浆。实际上，我看上去就象在很久之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街头看到的从废墟中挖出来的一具僵尸，那个死去的妇女的样子曾有很长一段时间萦绕在我心头。她显得如此枯槁，似乎无法作些微的努力来掩饰她干枯的躯壳。想到她那死去的躯体，却使我决心要活下去。我意识到，文化革命对我来说是一场斗争，我将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我不仅仅要活下去，而且要象花岗石一般地坚强，这样，不管受到多大磨难，我将不折不扣。我的脸虚肿，因为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喝一口水，我仅剩的一只肾脏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我必须赶快补救。

在厨房里，我喝了两杯水，然后把老赵给我的一碗稀饭和一些菜都吃了。令人惊奇的是这些食物竟如此迅速地转化成力量，并且使我又勇气倍增，我感到好多了。

一个红卫兵打开厨房门嚷道：“你在吃酒席吗？这么长时间！赶快！赶快！”

我和老赵随这些红卫兵上楼去，陈妈也跟我们一起。

我们发现红卫兵和几个留下的革命造反派要我们帮忙把我们的东西打包，以便带走。我乐意帮忙，只是急于想让他们赶快离开这所房屋，这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存在比失去这些财富更使我不能忍受。对我来说，他们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跟这些人我毫无共同语言。

从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眼里看来，老赵不是阶级敌人，只是认为他误入歧途，丧失了社会主义警惕性，替我干活。他们与他随便地闲谈。我发现老赵也尽量装出一副友好的姿态。当我们坐在地板上收捡、包扎散落四周的东西时，我听见那些红卫兵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他们即将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其中有几个已在八月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他们正说着光辉的经历。他们谈到在北京组织接见时军队的作用，部队提供食宿和制服，帮助他们操练，教这些年青年人呼喊由部队干部选定的语录和口号。

我对红卫兵说的这些事产生了兴趣。但遗憾的是，红卫兵没再留下，乘着卡车都走了。

一个女的造反派对我说：“你必须留在家中，不许走出房子一步。红卫兵会回来监督你的。”

我感到震惊和愤怒，我问她：“你有什么权力把我软禁在家里？”我失望之极，浑身战栗。

“我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名义。”

“我要看书面的命令，”我说，竭力控制自己因气愤而颤抖的声音。

“你为什么要外出呢？你想上哪儿去呢？象你这样的

女人到外面去就会被打死，让你软禁在家里，是我们一片好心。会让老赵留下，由他代你购买需要的东西。你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处在进行大革命。”

“我并不是一定要出去，只是这是原则。”

“什么原则？既然你不想出去，为什么还要争辩？你呆在这儿，一直到我们决定如何处置你，这是命令。”

她大模大样地走出房屋。我大发雷霆，但我又无能为力。

给了我一张弹簧床垫，放在地板上当床睡。一个空的橱柜堆了一些换洗的衣服，一只手提箱装了些冬衣，一只绿色粗帆布袋装了一个枕头和毯子，以备天冷时用。东西都放在房间的一角。除了厨房里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还给我留下了二张椅子和一张小咖啡桌。监视我的红卫兵占了这两张椅子，坐在房间外面，这样我只好坐在地上的弹簧床垫上。红卫兵不时地打开房间看看我在干什么，我个人唯一的小天地就是洗澡间了。

我女儿被允许住着自己的房间，但是她回家时不许我去她房间和她说话。虽然大部分时间她必须在电影制片厂参加文化革命，很少有时间回家。但多少个黄昏我悄悄地打开房门希望在她上楼时看她一眼。多少个夜晚，她回家来，我们才能相对无言，互相致意，这样我才感到欣慰和安心，这样我才能安静地入睡。

老赵去市场买食物，不过无论是他还是我女儿都不许与我一起就餐。红卫兵轮流值班，回家吃饭。晚上有一、二个人在我卧室外面打个地铺睡。

我被软禁在家中二天后，陈妈的女儿来接她母亲。我们依依话别。陈妈想把一件她亲手编织的绒线衣给我留下，红卫兵就斥责她丧失了阶级觉悟，不同意她把衣服送给我。

“她衣服不多，过不了冬。你们是知道的，她身体不好。”陈妈向红卫兵苦苦恳求。

“你还不认识？她是你的阶级敌人。你怎么还要担忧她衣服够不够？”红卫兵说。

陈妈的女儿看来被红卫兵吓坏了，催促着她快走，但陈妈说道，“我一定要跟梅萍说声再会。”说着不禁潸然泪下。

有一个红卫兵显得不耐烦了，气势汹汹地对着陈妈说道：“你在这个家庭还没有呆够？她是阶级敌人的女儿，你为什么还要向她道别呢？”

当我最后一次搂着陈妈的肩膀，她终于放声大哭起来。红卫兵把我的手臂扳开，把陈妈和她的女儿推出门外。老赵帮她们拿着行李，随后出去，我听到他为她们叫了辆三轮车。

长久以来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只能贪婪地读着老赵每天放在厨房桌子上的报纸。一天傍晚，我到厨房去吃晚饭，在椅子上看见一张印刷粗糙的红卫兵报。报纸的大字标题写着《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这条新闻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想详细看看。一看周围没人，我捡起这张报纸偷偷塞进口袋里。以后，当我独自一人在洗澡间时，就读了起来。从此以后，我一直留意红卫兵扔掉的所有揉皱的纸片。这些由红卫兵出版的手工刻印

的刊物，虚张声势地登着抨击资产阶级及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批评这些阶级敌人的过程中，往往揭示这样一些事实，即某些党的领导人物从公众中销声匿迹了。我特别有兴趣的是，提及了上海市政府和市委的某个官员试图“违背”或“对抗”毛的指示。看来，在党的领导阶层中，因政见不同，存在的斗争远远地比我想象的要多。这些红卫兵的刊物、传单不经审查，往往无意之中暴露了党的领导阶层中权力斗争的一些事实真相，所谓党的领袖们团结一致为公众的利益勇于献身的神话彻底破灭了。

被禁锢在室内一个星期了，我问红卫兵，还打算将我囚禁着不许外出活动多长时间，并且请求允许我到花园里走走。他们打了个电话请示之后，允许我到花园里散步。我在膝头上抱着“拉菲”，在平台台阶上歇息。咬伤造反派头头的“罪孽”看来对那些年青的红卫兵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也常常与“拉菲”玩耍。

很快梅萍知道，我有幸经常去花园走走，特别是在清晨。只要她晚上回家来，她总是把一张字条卷成一个小球扔在花园里，第二天早晨我去进行每天的户外活动时，就可捡来。在九月的上海，常常下雨，如头天晚上下了雨，纸条就打湿了，粘成一团，我就无法再展开。但是她的片言只语：“我爱您，妈妈”“多加保重”“我们风雨共济，亲爱的妈妈”等等，给了我莫大的慰藉，温暖着我孤独的心。

当我去厨房吃饭时，如果老赵刚好在那儿，就会有红卫兵跟着我，看看我们是不是交谈。但老赵与那个红卫兵可以互相闲聊。很快我就发现，老赵说的很多话，是在

给我传送一些信息，例如，一天他对红卫兵说，“你们常常拷打你们的老师吗？”

听到老赵的发问，我感到震惊，因为八月三十日晚上红卫兵来抄我家时，他们对老师还是十分友好的。我屏住呼吸等着回答。

那个红卫兵漫不经心地回答：“当发现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或坚持用学习压制革命行动时，我们就拷打他们。有些老师对进行文化革命的重要意义还不认识，仍然认为学习书本上的东西很重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们应该从革命运动和生产实践中去学习。我们绝不要那种旧式的学校，那些坚持书本至上的老师显然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这样我们就把他们看作是敌人。”

另外一次，老赵问红卫兵，“你去包围市府大楼了吗？”

“当然了！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上海市委全烂掉了，是修正主义的。”

从老赵与红卫兵的交谈中，从我已捡到的传单和刊物中，给我的印象是成千上万的新的造反派加入了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这些组织就象“雨后春笋”一般到处涌现。或是为着自身的利益，或是仅仅是害怕被人看作政治上反动，人们都不得不纷纷投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去。

对资产阶级家庭的冲击和对知识分子的打击使红卫兵和造反派胃口越来越大，私欲极端膨胀，他们到处横行，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依我看，毛主义领导人就是想利用这种狂热的情绪，将这种愤激的火引向上海市

委和市政府，对此施加压力。因为造反派指责上海市委和市府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毛的政策。多少年来毛的指示得不到贯彻。上海市委和市府的干部对政治运动可不是新手，他们经历了许多次政治风暴和清洗而幸存下来，是老资格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对毛的策略并不陌生。毛惯于利用群众运动，他们自己也去运动群众，迅速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投入文化革命。他们参照毛主义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模式，企图控制上海的局势。为了达到目的，每个组织的口号与行动越来越革命、越来越残忍、越来越“左”。于是，在这种时候，到处在打内战，在流血，但你根本无法确定应该站在谁一边，同时为了表明自己的革命热情，争斗的两派都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大打出手。

暴力行动逐步升级，文化革命冲击的阶级敌人的数量在逐步扩大。有一条新的口号是针对不受欢迎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简单地说，就是由于父母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孩子也就自然成为阶级敌人。在一个标榜坚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国度，出现这种完全建立在唯心论血统论基础上的口号，实在令人震惊。还没有等我有时间和精力去认真思考，这口号一宣布，我女儿梅萍很快被清除出“群众”行列，打入“牛棚”，所有在电影制片厂挨批判的阶级敌人都集中在那儿。毛泽东把所有的阶级敌人称作为“牛鬼蛇神”，于是以此引申开来，有了“牛棚”的叫法。在“牛棚”里“牛”们一天到晚写交待和自我批判，一遍又一遍地反省自己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异端邪说，改过自新。我是通过老赵与一个红卫兵的交谈才知道这一情况的。那天，老赵就在我的卧房外面提高嗓门请求红卫兵允许他拿铺盖和衣服，给我女儿送去，她已经关进电影制片厂的“牛棚”不能回家来了。后来，我去厨房吃晚饭时，尽管难以下咽，我还是装着在吃东西，为的是再能听到一些有关我女儿的情况。老赵没有让我失望，我一坐下来，他就跟一个毫无觉察的红卫兵讲起梅萍的事来。

“我去电影制片厂给她送东西时看见她了。她看上去很好，精神还算振奋。她告诉我正在写自我批判，批判自己和阶级根源。她还说起，所有在‘牛棚’里的人大家都很有友好。她确实还算好，对一切事情都很冷静。她为什么一定要写自我批判呢？她是个共青团员，无论到哪儿她总得到一致好评。她对无产阶级很有感情，很友好。有一次，她还救过一个贫下中农的命，那次那女人患了急病，是她摇着一条小船，穿过道道河又把那妇女送到了县医院。”

“她在国外生的，而且出身这样的家庭，当然要自我批判。”那红卫兵对老赵说。“她就象一个红萝卜，红皮白心。再说，共青团已经解散，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

不久，一队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来搜查她的房间，把她留下的东西都拿走了。对于事态的新的转变，我感到绝望和忧郁。当这些打击只是冲着我一个人时，我还能保持轻快和清醒，但现在梅萍也成了迫害的对象，我感到深重的压抑。

九月二十七日黄昏时分，我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带到一所学校的大楼里。七月份我曾被带到这儿来过。会场上挤满了人，等待着开批判会。那天，我是斗争大会的主要人物，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到我家里来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有壳牌公司过去的职工以及一些被叫来准备向我发问的人，那个戴墨镜的男人主持会议。

会场的布置不同寻常，一排排椅子不规则地围成一个圈，对着讲台，叫我站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个红卫兵押着。那个主持人也是从鸦片战争讲起，有声有色地叙述英国舰队是怎样轰击中国的海岸，侵入中国的。他错误百出的讲演，目的就是要把仇恨的矛头指向我。要我对一百多年前英国人侵犯中国的行为负责。他的话中似乎就是我把英国舰队引进了珠江。随后，他声称壳牌石油公司是个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他说列宁曾经指出这种公司是社会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对听众说，已经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壳牌石油公司就派了许多商人深入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打着给农民供应煤油的幌子，收集对帝国主义有用的情报。他还列举图表证明，壳牌石油公司通过与中国的贸易榨取了巨额利润，并称之为是“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侵略”。他告诉听众英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狡猾，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在台湾的国民党，而英国给人民政府以外交承认，同时在联合国与美国一起投票反对人民政府取得代表席位。

他历数了我的家庭背景，对听众说，我是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后代，我家拥有一万亩肥沃的农田（6亩约合1英

亩)。不象市政府的一位联络官说过的，我祖父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大家说，我祖父是个恶霸地主，而且是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因为在他写的历史书里颂扬了几个皇帝。另外他说，从留下的资料中已有证据表明，他是汉冶萍钢铁企业的创始人和股东。这个企业包括安源煤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亲自组织工人与煤矿的资本家进行斗争。这一指责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即我的祖父是毛主席的对立面。事实上，这两个人完全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继续诉说，我的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年青时在日本生活了多年。他提醒大家，日本对侵略中国负有罪责，在八年战争期间屠杀了一千万无辜的中国百姓和儿童。可是他有意避而不谈，我父亲是在本世纪初去的日本，离开1937年日本人侵略中国相去甚远。他的目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父亲不顾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而去了日本。他指着我说道，我二十岁那年就去英国，在一所大学受训，被英国人培养成一个“忠实的走狗”。我已故的丈夫被说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死有余辜，逃脱了革命造反派的严正审判。

在他讲话过程中，群众不断高呼口号，表示声援和支持。除了文化革命中常用的一些口号，还有许多口号指责我是为外国反华势力服务的“间谍”，有的干脆批判我是一个英国“走狗”。

他的话一讲完，那个带头来抄我家的红卫兵冲到麦克风前，大声揭露我家的“奢侈豪华”。另外一个红卫兵说我是如何“阴谋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与他们斗争以保

“四旧”。一个造反派说我顽固不化，并指责我在家中养了“野蛮动物”，咬伤革命造反派。

原壳牌石油公司的职工也被叫来进一步提供证据。显而易见他们都非常害怕。我思忖着他们必须说些什么。一个人站起来发言，面色苍白，拿着预先准备好的稿纸。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朝我的方向瞧一眼。他们说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但从他们吐露的片言只语中却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即我与在上海的英国人关系都很友好、密切，已经精心编织的一张罗网，布满了对我的怀疑。一个办公室开电梯的人声称，英国经理总是站在一边让我先进电梯。一个司机揭发只要我和经理坐一辆汽车，经理总是让我先上车。这点证明，对“英帝国主义”来说，我有重要价值，因为在共产主义中国，很难想象一个高级人员会让他的女性同事先上车或上电梯。

另外一个职员谈到在经理办公室旁边一间房里保存着一些文件。这个房间除了总经理和我，其他人不准进去的。在壳牌石油公司干了多年的高级职员说，有一份中国地质形成图，标有可能有石油矿藏的地方。这份地图一直保存在那里，因为这份地图对帝国主义很有价值。另一个发言者谈了一段从壳牌石油公司经理的报告中断章取义的摘录。这份报告是国内战争时期（1946年—1949年）在中国的其它地方写的，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都陷在一场战争之中。在这篇报告中提到了两方面部队部署的情况。这一点被用来否定我的观点，即壳牌石油公司只是对生意有兴趣。

我已故的丈夫也遭到严厉的批判。有人指责，只要壳牌石油公司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有矛盾，我和我的丈夫总是站在壳牌公司一边。所有的揭发都是事实与谎言的混合物，颠倒是非、言过其实，愚昧无知导致错误的估计。

会议仍延续下去，全城早就夜色降临。我的这场悲剧如此引人注目。我想他们中大多数人高兴得手足无措，都相信揭露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帝国主义特务。其他人则仅仅装出相信这种推断。我看见那些人在炫耀，带着满意、成功的眼光。

数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次斗争会的日期被一再推迟，是因为组织者希望能让我女儿也来参加，并对我进行批判。尽管压力很大，她还是一再拒绝参加。十月一日国庆节将临，毛主义领导人指示上海的革命造反派要拿出具体的成果，在胜利的气氛中庆祝这一节日。为了对这一指示有所反应，于是掌管我这案子的人就决定举行斗争会，不要我女儿参加了。

当戴墨镜的人觉得已在出席会议的人中间煽动起充分的情绪后，他赞扬了这些男男女女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他还对公司先前的职员讲了溢美之词，扬言他们中大多数人通过再教育清理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他也对那些头脑顽固不化的人发出警告，号召他们要加倍努力进行自我批评，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

他转身向我说道：“你听到了揭发你的大量事实。你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你只有彻底交待你是怎样与英帝国主义者勾结，策划破坏人民政府的。你打算

交待吗？”

“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反对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事情。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设在这儿是应中国政府要求的，允许壳牌石油公司在上海保留办事处的决定是由国务院批准的，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的。壳牌石油公司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始终如一遵守法律的规定。壳牌公司的政策就是不介入政治……”我说。

尽管我说话声调响亮而清晰，但会场里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楚我讲的每句话。愤怒的呼声和尖叫声把我的声音淹没了，“老实交待，老实交待！”“绝不允许阶级敌人诡辩！”歇斯底里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对着我大声威胁，在我面前挥舞着拳头，抓住我的衣服朝我吐口水，一边大声叫骂，“臭特务”，“臭走狗”，“枪毙了你”等等，好几次他们猛推我，我连忙用力顶住才能站稳。

一场风暴过去了，站在讲台上的人都微笑着。戴墨镜的那个人见我落在乌合之众手里吃尽苦头看来特别高兴。我该怎么办呢？企图作无用的申辩比无用的反抗更糟。如果我挪动一步，那些流氓就会跳上台冲到我面前。我只有站在那儿，笔直地望着前方，两眼盯着远处的墙壁，但愿他们的怒气快些平息。

最后，喧闹声稍为平息下去些，那人说道，“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是有罪的，我们可以处你死刑。但是我们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打算老实交待？”

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等着我的回答。我站在那儿，长时间地忍受着凌辱。我想他们每个人都是义愤填膺的。

回想起来，当时我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极度的悲哀。那时，我是多么盼望能见到我的女儿，又感叹无法接近在我周围的群众，使他们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他们被弄糊涂了。不是从文化革命才开始，而是从1949年共产党军队占领上海以来，他们就受到有关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在我们中间建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墙，这不是一时之间能够推倒的。

盯着我看了几秒钟，见我仍保持沉默，那人对人群后面的一个年青人招手示意。那年青人分开人群走到台上，手里拿着一副明晃晃的金属手铐，高高地举着想让我看见。那年青人走到我站的地方，主持会议的那个人又问了一遍：“你是否打算交待？”

我用平静的声音回答：“我从未做过任何反对人民政府的事情。我与任何外国政府没有联系。”

“走！”那个拿着手铐年青人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到了街上，其他人都跟在我们后面。夜晚，稍带凉意的空气非常清新，我感到我的头脑非常的清醒。

一辆上海市公安局的草绿色吉普车就停在学校前门进口处，对上海人来说，这种情景是非常熟悉的，每次政治运动达到高潮时，这种车子就带着警报呼啸声在街上横冲直撞，把一些受害者投入监狱。我们在吉普车边上站住了，还有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壳牌石油公司的前职员和许多停下来看热闹的行人。

“你是否打算交待？”那个戴墨镜的人又再问我。

我默默地在心中背诵着第二十三首赞美诗，“主啊，

是我的业绩，我将不会……”

“你聋了吗？”

“你成了哑巴了？”

“交待！”他们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那个戴墨镜的人和那个公安局的人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虚弱的表现。我想我必须鼓足勇气。事实上，我默诵着赞美诗的词句，信心倍增。整个晚上，直至我站在象征着迫害的草绿色吉普车边上一刹那，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无所畏惧。

我抬起头，用响亮而坚定的声音说道，“我没有罪！我没有什麼要交待的！”

此时此刻，没有一个人再狂呼口号，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参加斗争会的其他人都会被这庄重的气氛镇慑了。当我的话说完后，经戴墨镜的人示意，那位来自公安局的年轻人把我的手反扯到背后，用手铐铐住我的手腕。一个长者不禁一声长叹。

突然，一个姑娘奔到前面，用一种焦躁不安的声调呼唤着，“交待吧！赶快交待吧！他们要把你抓进去了！”她那清脆、年轻的声音就象铃铛声在嘈杂的街道上空回响。这就是那个剪着短发，有一张苍白的脸的姑娘，当红卫兵来我家时，就是她坐在我的书桌边守着我的珠宝首饰。她感情冲动，力图把我从监牢中拯救出来，一个女人立即制止了她，一把抓住她的背部把她带进学校大楼里去。

吉普车司机发动了引擎。

“上车，”那年轻人推我一把。

我刚好坐了进去。望着车外目睹这场悲剧的男男女女的脸，从壳牌石油公司原职员的眼中我得到宽慰。他们多半会感到我这一走，他们的压力将会减轻。其他看热闹的人，对他们来说，好象一场惊险已经结束，他们有幸一睹为快。

那个公安局来的年轻人与司机一起上了车。那个戴墨镜的人坐在我的边上。吉普车向黑沉沉的街道驶去。

第二部

拘留生涯



第五章 孤独的监禁

入夜九点钟的上海街道，再也不象往常那样冷落，行人寥寥，宛如宁静的海洋了。在明晰的秋空下，九月的凉风吹拂，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在马路上观看越来越剧烈的红卫兵活动。到处可见那些临时设立的讲台，年轻的革命造反派正用尖锐和激烈的措辞召唤人们参加革命，引导召开小规模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在街道上随便抓来的男人和妇女，他们仅仅因为没带毛泽东语录的小红书或穿着红卫兵看不惯的服装而受到诅咒。私人住宅和公寓房屋外面，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连续从屋内搬出书籍不断地烧着，烟火高过花园的围墙，空气中弥漫着烧书的烟味。

红卫兵从资本家家里没收来的家庭用品装满了一辆辆的卡车，停在人行道边准备开走。挤满街道的人群向各个方向移动，汽车和自行车只能爬行似地向前。这种因文化革命造成的城市的“正常”生活迅速漫延开去，并愈演愈烈。

在街头巷尾，高音喇叭正大声地播放着新写的革命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如果有人仅仅听到进行曲的音乐节奏而没有听到斗志昂扬的歌词，仅仅看到拥挤的人群而没有看到遭难者和红卫兵，那么，他很容易想象这场面可能是在秋天夜晚举行的文娱集会，而不会认为是一场政治运动。它充满不吉祥的怪调，挑拨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和阶级仇恨。

由于持续的逼迫和紧张，我的身心疲劳之极了。这不仅是因为刚过去的几小时的斗争会，而且因过去两个半月来的折磨，我已经不能推测我被带到了什么地方。我从未做过任何反对人民政府的事情，我为我受到的对待感到愤慨和忿怒。对我所谓犯了反对祖国的控告是如此的滑稽，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处罚我的借口罢了。无非是我竟敢过很好的生活。很明显，我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牺牲者，正如我的朋友惠妮说的，由于壳牌石油公司已经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上海共产党官员中的毛分子相信，他们应该把我的生活水平降低到普通老百姓的水平。

押送我的公安部门的车辆，对城市的老百姓来说是稀奇的。无论什么时候，它在街上作片刻停留，就会有好奇的人群挤到车前盯着看车内的“阶级敌人”。此刻，当一些人用奇怪的目光注视我的时候，另一些人则鼓掌称赞无产阶级的胜利，还揭发其他的“敌人”。我发现，有几个看着我的人表现出担心和忧虑，突然又从他人不祥的眼光中转过身去，因为这眼光是对可能遇到坏命运的预示。在毛泽东的中国，人们被投入监狱和在民主国家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始终被怀疑是有罪的，直到他能确实证明自己无罪。

被告受审判往往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而是由于他们的祖先拥有较多的土地。一大群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头上总是笼罩着怀疑的阴霾。更有甚者，毛泽东已经宣布，民众中的百分之三至五的人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为了证明他的正确，在周期性发起的政治运动中，无论是在政府的一个部门、一家工厂或一所大学、一所中学，每一个组织的百分之三至五的成员，必须被“发现”有罪——以政治上的愚蠢行为或异端思想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些被认为有罪的人，或送去劳动教养或投进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被投入监狱是经常发生的。无罪者被投入监狱后，当权者就不再顾及道德堕落或违背法律的耻辱了。事实上，对政府声称任何一个人的罪行，人们是经常怀疑的。在共产党中国，常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因此，人们对待政治犯富有很多同情心。

在我卷入文化革命的时候起，我就给自己作了决定，不作不符合事实的供认，并作了进监狱的准备。我知道，有许多人包括饱经风霜的共产党员，在高压下作了象征性的忏悔，希望通过服从而避免反党的嫌疑或减少他们的即时的痛苦。也有许多人在压力下精神错乱以至不由自主地作了伪供。当一场政治运动结束时，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恢复了名誉，许多人则没有。在中国，劳动教养所一般设在遥远和荒凉的地方，诸如甘肃和青海。许多无罪的男女，仅仅因为作了承认有罪的伪供而正在那里严酷地服刑。在我看来，无罪而虚假地承认有罪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更合乎伦理和聪明的方法是：面对迫害而不予理会，有的事情

必须忍耐。

当我考虑自己的境遇时，我意识到迫害我的第一步即将结束。无论今后处于什么状况，我将不得不加倍努力，以阻止迫害者控告我的企图得逞。只要他们不能杀死我，我决不投降。因此，当我坐在吉普车上时，我心里想的不是恐惧和失败，而是一种决心。

吉普车到达商业区时，由于人群十分拥挤，车也行进得很慢，车在每一个街口都不得不停住。戴着墨镜的人要驾驶员拉响警报器。这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从高到低，伴着震动的节奏，周而复始，它超过了革命歌曲的声音，也淹没了所有其他声音。当人群为吉普车让路时，每个人都回过头来观望。驾驶员加速了，我们没受到进一步的阻碍而穿过了街道。不久，吉普车在一座有两个解放军哨兵守卫的双重的黑色铁门前停下，哨兵的刺刀在路灯下闪耀着寒光。大门的一边有一块白色的大木板，上面写着黑字：第一看守所。

门开了，吉普车开了进去。里面一片漆黑，凭着吉普车前灯的微光，我看见了车子两旁的柳树，沿路向右拐。一边是一个篮球场，另一边是很多与真人一样大小的假人躺在一些杆子边。它们看上去象人的尸体草率地乱丢着。直至几个月后，当我去一个监狱医院时，凑巧看见日光下的假人，发现它们是看管犯人的卫兵练习用的靶子。

第一看守所是上海关押政治犯最重要的监狱。它经常关押天主教的主教、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大资本家、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不是一所由共产党

政府建造的新监狱，而是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的一座旧式建筑。

对任何独裁统治来说，一个囚禁政治犯的看守所，都是重要的地方。至今为止作为一个观察者，在我舒适的家里，我曾经研究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而现在我恰巧有一种机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直观地来研究它。以一种近乎荒谬的方式进行探究，这点激励着我，并使我暂时忘却我已发现了的自己身处的危险境地。

吉普车沿着车道经过另一道铁门，通过有士兵守卫的看守所的营房，在院子里的一座主要建筑物前停下。两个人跳下车走了进去。一个头戴黄军帽，帽中间有一个红色国徽的女看守领我进入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那里另一个穿制服的妇女正等着。她关上门，打开了我腕上的手铐，说：“脱衣服！”

我脱去衣服，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桌子是房间里唯一的家具。两名妇女彻底地搜查了我的每一件衣服，在我的裤子口袋里，他们发现有四百元钱，这是我放在信封里打算给我的花匠的。

“你为什么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

“那是给我的花匠的。我正等着他到我的房间来给他。但他没有来。也许有谁能替我把这钱给他。”我说。

她把衣服递过来还给我，除了胸罩和一件毛主义分子认为是受西方影响代表颓废的衣服外。我穿好衣服，就由一个女看守领我穿过灯光暗淡的过道，进入另一个房间。

一个肤色象中国北方农民的男子坐在一张桌子的后

面，一只电灯泡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离桌子几步路有一把椅子，那女看守示意了一下，要我坐下。她把装着钱的信封放在桌子上并对那男子说了几句。那男子抬头看了看我。然后用一种意外温和的声音询问我的名字、年龄和住址。他把这些都记在一本本子上，他慢慢地、费力地记着，好象很不在行，用笔记下每个字都很困难。他大概仅有初识文字的文化水平，所以并不使我感到惊异。我知道，中国共产党给人分配工作，不是根据他们受教育的水平，而是根据他们政治上的可靠性。

当他最后写完时，说：“你在这里时，我们将用号码来叫你。你不能再使用你的名字，即使对看守也是如此。知道吗？”

我点点头。

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带着一架有闪光灯的照相机的青年人打断。他走进房间对我说：“起来！”他从不同角度给我拍了几张照片后装模作样地走出了房间。我又坐下了，希望他们快一点，因为我疲倦得要命。

桌子后面的那男子用使人厌烦的声音继续说：“你的号码是1806。今后我们将用1806来叫你，你要记住这号码。”

我又点了点头。

女看守指着墙上贴着的一张纸说：“大声读一下！”

那是一张监狱的规章。第一条是：所有的犯人每天必须学习毛泽东著作来改造思想。第二条是：犯人必须无保留地认罪并揭发卷入犯罪的其他罪犯。第三条是：看到同室犯人对狱规有任何违反必须向看守报告。其余的狱规是

关于膳食、洗衣及在看守所日常其他事情的规定。

当我读完时，女看守说：“你要记住狱规，遵守狱规。”

桌后的男子告诉我，用右手拇指在一只盛满红印泥的印台里蘸一下，再用拇指按在记录本上。我这样做后，请求他给我一张纸以擦净拇指。

“快点！”女看守已在门边不耐烦地大声催促着。那男子却不动声色，拉开抽屉拿出一张皱纹纸递给我。我匆匆擦净拇指跟着女看守走出了房间和大楼。

这样，我以一种从容的方式被关进了第一看守所。那男子和女看守的态度是漫不经心的。对他们来说，我的到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对我来说，跨进监狱的门槛，或许是我为继续生存和正义而斗争的新生活的开始，它使我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更坚强、政治上更成熟的人。通过对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和对自己生活的长时间的反思，使我对我自己和生活在怎样的政治体制下有了更好的理解。自1966年9月27日晚我被关进看守所起，我不断窥视将来，但我并不害怕，相信正直和仁慈的上帝是会把救出深渊的。

我被带了出来，外面是一片黑暗，地上高低不平，我跟着女看守，贪婪地吸着夜晚的新鲜空气。我们绕过主楼，穿过一道亮着微弱灯光的褪色的红门，进入一个小院子，那里有一幢二层楼的房子，这是关押女犯人的地方。

靠近门口的一个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打着呵欠。我被无声地移交给她看管。

“进来，”她睡意朦胧地说。带我穿过一间间挂着重锁

的门的走道。这首先看到的情景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在以后的年月里，在我的梦魇中，我反复地看到这情景：暗淡的灯光下，一间间门长长地排列着，门外是冰冷的插销和锁，我关在门里感到无依无靠和蒙冤受屈。

我们走到走道的尽头时，她打开了左边的门锁，里面是一间空房。

“进去，”她说，“你带来了自己的生活用品吗？”

我摇了摇头。

“明天早晨我们会通知你的家属，要他们把你的生活用品送来。现在睡觉！”

我请求她我是否能上厕所，她指了指靠牢室角落左边的一个水泥便坑说，“我借一些手纸给你。”

她把插销插得铿锵响，锁上了门。我听到她往走道另一头走去。

我四下打量着牢室，心随之往下一沉。蜘蛛网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曾刷白过的墙壁因年久而泛黄，积灰在墙上形成了条条斑痕，裸露的灯泡因积满了尘垢而变得格外昏暗。碎片状的水泥地因潮湿而变得发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霉味。我赶紧去打开那扇唯一的装着已经锈蚀的栅栏的小窗，为了够到它，我不得不踮脚站着。在我拉开插销打开窗户的同时，剥落的石灰象雨一样倾落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三张由粗木板做成的床，一张紧靠着墙，另外两张上下叠在一起。（墙角挖着一个水泥便坑。）在我一生中从未到过甚至从未想到过有这么简陋而又充满污秽的地方。

女看守拿了几张极其粗糙的手纸过来，从门上的方形

小窗递给我，说道：“这是我借给你的，等你拿到生活用品时，必须按同样的数目还给政府。现在睡觉，头必须朝着门的这一边，这是规定。”

我一点都不想碰那张盖满灰尘的床，但我不得不躺下，因为我的腿肿得相当厉害。我把床从肮脏的墙边拉开，用手纸来擦除上面的灰尘，但灰尘积得太厚了，我只能把上面的浮灰擦掉。再也顾不上其他了，我就躺下合上了眼睛。吊在中间的灯泡正好在我的头的上方，尽管灯光不怎么强烈，但使人无法入睡。我环顾牢室四周，找不到开关在什么地方。

“对不起，”我喊道，用手敲着门。

“安静！安静！”看守匆匆赶来，移开了小窗户的遮板。

“我找不到电灯开关，”我告诉她。

“这里晚上是不熄灯的。以后当你有话想和看守说时，要喊‘报告’，不准敲门，也不准说其他的。”

“你能不能借我一把扫帚打扫一下牢房？这里太脏了？”我请求她。

“废话！现在已经半夜两点多钟了，你必须赶快睡觉！”她关上了小窗户，但仍逗留在牢房外，通过观察孔看我是否真的服从了她的命令。

我又躺在了床上，将身子转向布满灰尘的墙壁来避开灯光。我闭上眼睛，那样可以不看见肮脏的墙壁，但我不得不吸入弥漫在我周围的潮湿和难闻的气味。我听到一种街上人群微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逐渐增强。当它不再烦扰我时，我开始为我的女儿担忧。我希望我被关进看守

所遭受任何进一步的迫害将使她获得自由。如果确实是这样，只要她能受到普通群众一样的对待，我准备忍受一切。

突然，一群饥饿的蚊子来袭击我，我坐起来，试图用手臂驱赶它们，但蚊子十分顽固，我仍被叮得很厉害，又痒又痛愈增添了我的不适和烦恼。

只是在黎明前，牢房中的灯光才熄灭了。黑暗中，室中的一切肮脏和丑恶都消失殆尽。我可以想象自己是在另外的地方。这是可以独处而不受干扰和令人宽慰的片刻，我感到一条把我绷得紧紧的带子松开了。然而，这样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这块天地转为灰色继而变白了，阳光慢慢地泻进室内，又呈现出室内的厌恶面目。不管怎么样，我在那牢房度过的整个监狱生涯中，熄灯后黎明前的片刻黑暗始终是我恢复自尊、感到新生的时刻，因为那是我摆脱了看守戒备的目光而拥有片刻宝贵自由的时刻。

走道上的脚步声逼近了。“起床了！起床了！”一个看守在每一牢室门前喊道。我能听到整个监狱犯人起床的骚动声、低低的话语声和我牢室楼上移动脚步声。门上关着的小窗移开了，一个年轻的妇女提着一只有嘴的水壶通过窗洞伸进来，并喊道：“水。”

当我告诉她我没有器皿盛水时，她缩回了盛水的水壶，但她那苍白而年轻的脸仍通过开着的小窗注视着我，当我们的眼光相遇时，她笑了。几天以后，我发觉她的外套前用针别着一块正方形的白布，这表明她是一个“劳动改造”的服刑犯人。从那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有机

会我们就相互微笑，以分担我们作为犯人的痛苦而相互致谢。我在看守所度过的年月里，我和她这种无声的联系，从她那苍白的脸上观察到的微笑，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当她消失时，或许她已服刑满了，我有一种很强的失落感，整天感到沮丧。

那小窗又打开了。推进来一只长方形的铝饭盒，响起一个妇女不耐烦的喊声：“快拿，快拿！”

我从她那里接过饭盒时，她说：“以后吃饭时就在这里等着。”接着，又递给我一双湿淋淋的竹筷，竹筷子经过长期使用已变得很细了。

那被摔得七凸八凹的饭盒中盛着大半盒微热的稀粥，粥的上面漂着有限的几根咸菜。我用卫生纸揩净了饭盒的一边，尝了一口。粥象是烧焦了的，过咸的咸菜使稀粥变得有点发苦。伙食比我想象的要恶劣得多，但我还是下决心尽力喝掉一半。当那个女的再一次打开小窗时，我把饭盒和筷子归还给她。

隔了一会儿，另一个女看守来了。她说：“你为什么 not 喝粥？”

“我已吃了一些。我可以见见负责我的案子的人吗？”我问她。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不喜欢被称作“官员”，除非称他们确切的头衔，象“王部长”、“张处长”。通常，官员被称作“干部”，在汉英词典里翻译为“cadres”。低级的官员通常称作干部或办事员，他们被称作“负责人”。

“这么急干什么？你只是刚到这里。提审员准备好了后，他会喊你的。现在你应该做的是考虑你犯的罪，当他

审问你时，你必须认真招供、真正悔改以求得宽大处理。如果你能告发其他人，你就能为你自己争取一点功劳。”

“我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我断然地声明。

“啊，许多第一次来这里的人都象你这样说，采取这种态度是愚蠢的。你想想，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为什么你被带到这里而不是其他人？你一定犯了罪。”

我与她辩论似乎是无意义的。但她的话使我相信，我将在这里呆一段时间。牢室的肮脏是无法忍受的，以前我却天真地认为我在这里只要呆到另一个晚上。此外，我已注意经常寻找些体力活，来减轻被损伤了的神经的负担。这时我发现我已深陷不幸，非常担忧我的女儿，为减轻精神上的负担，我就请求看守是否能借一把扫帚给我打扫一下室内。

“一般只允许在星期六借一把扫帚给你，因为你刚来，我今天就借给你。”

片刻以后，她带回一把又旧又坏的扫帚，从小窗塞给了我。我把环室而放的床拖开，竖起扫帚清扫天花板上的蜘蛛网，当我扫刷墙壁时，整个牢室都是尘埃。

小窗又被打开了，递给我一张纸，向外看，我发觉一个男看守站在那里。

“我们已经把你昨天晚上带来的钱存入银行了，这是你的存单，允许你用这钱添置一些生活用品，象卫生纸、肥皂和毛巾之类的东西。”他说。

“那些正是我需要的，你能现在就帮我买吗？”我问。

“你可以买你需要的东西，”那人说道。

“请给我买一只脸盆，两只搪瓷杯用来吃饭、喝水，还有针、线、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一些卫生纸。允许我买一些冷霜吗？”

“不，只允许生活必需品。”

不久，他带回了一只印着两朵玫瑰花的脸盆，六块彩色条子的毛巾，一叠卫生纸，六块最廉价的洗衣用的肥皂，两只有盖的搪瓷杯，一支牙刷，一支牙膏和二卷粗棉线。他告诉我，牢室里的犯人不允许有针的，但可在星期六向看守借用。

女看守不得不打开室门把脸盆递给我。门还开着时，另一个女看守把红卫兵委托的从我住宅拿来的衣服和床上用品给了我，还有毛泽东选集和毛语录小红书。我签收这些东西后，这两个看守锁上门走了。

我十分仔细地查看了每一件物品，希望能找到我女儿藏在其中的短信，但什么也没有。我坐在床边，失望和悲哀使我十分疲倦。我渴望见到我的女儿，并为她的安全祈祷。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平静些，我决定对付肮脏的牢室，我急需一些水。

“报告，”我走近门叫道。

那是另一个女看守，她推开小窗严厉地说道：“不许这样叫！你现在想干什么？”

从她说话的语气里，我知道她可能会拒绝我向她提的任何请求。为了先发制人，我迅速背诵起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耻辱。”然后我问她：“能给我一些水清洗牢室吗？”

她没说一句话就走了。我等啊等，终于那劳动改造的姑娘来给了我足够的水，新面盆和从我家带来的其他盛器都盛满了水。首先，我把床彻底地清洗了一遍，然后，我登在卷起的被褥上去擦窗，擦净被灰尘沾污的窗玻璃，以便透进更多的阳光。在我洗刷了设在牢室一角的水泥便坑后，我还有足够的冷水留作自己洗澡和洗涤衬衣用。发开水时，我坐在干净的床上，满怀喜悦地喝着，直率地说，我从未尝到过这么好喝的开水。

午餐是米饭和一些水煮的大白菜。我把一部分米饭用作浆糊，把几张卫生纸粘在墙上，这样当我睡觉时，我和我床上的衣服就不会碰到那脏墙了。这样做后我觉得很好。当看守来告诉我可以在室内踱步运动时，我说，“请问我可以归还扫帚吗？”

她打开小窗接过了扫帚，看到了我粘在墙上的卫生纸。

“这是违反在牢室里的规定的，把它撕掉，”她说。我保持沉默，想知道如果她命令我撕掉卫生纸而我不从，她会有怎样的高招。但她只收去了扫帚，关上了小窗。过了一会儿，我听到她在楼上一室一室地喊道：“运动！运动！”

我能听到在我的上面许多人走来走去脚步声。当运动时间结束看守对每个人喊坐下时，我听到许多犯人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了。显然，在楼上的各种牢室里是没有床的，同室犯人是睡、坐在光秃秃的地上的。我这牢室和隔壁的牢室之间的墙太厚了，以致我听不到一点声音，但我能清楚地听到楼上牢室里大声说话的每一个词。当看守不

在附近时，女犯人在上面运动的声音，抱怨的声音，稍微减轻了我时时而起的寂寞和孤独的感觉。

在正常生活中，颜色和形状的对照以及适合感官的不同声音的混合，在监狱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在监狱里我能看到的任何地方，都是丑陋的形状、一律抑郁的阴影和肮脏的灰色。只有那看守权威的、千篇一律的、冷冰冰的声音打破不祥的沉默。呆在室内我发现，我经常凝视窗口入了迷。我会坐着一动不动地透过铁栅栏凝视狭窄的天空好几个小时。这不仅是那透过窗口进入的日光和新鲜空气能支撑我的生活，而且这窗口是我与外界保持微弱联系的唯一沟通物。经常地，当我的身体坐在室内，我的精神却从窗口逃遁而获得自由。在我的监狱生活中，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观察窗门铁栅栏在水泥地上的影子的移动。当这影子在室内地上慢慢横移时，我观察经过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有时是等待下一顿饭，有时是等待下一次提审，尤其重要的是等待一些政治势力的发展，它能够抑制毛主义革命分子的权势。

日光暗下去了，电灯亮了。我吃着又一份米饭和绿色的大白菜。值班的是又一个女看守。她给了我一张当天的报纸。她的脸对着稍开的门，喊道，“你在里面做什么？”

“我按照毛主席关于卫生方面的教导在打扫卫生，”我回答。

“如果你注意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你为什么会被关在监牢里？”她喊道，“难道毛主席叫你去犯罪？”

“我从来没有犯罪，错误、缺点是有的，这可以通过

调查研究和审查加以澄清。”我说。

“我看得出来你能说会道，你想把你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到这里来，是不是？我劝你少考虑自己的舒适，多考虑自己的犯罪行为。对犯罪要作多方面的反省，当我们叫你时，你只有彻底坦白，才能获得宽大处理。”她关上了小窗，我就不能再回话了。

我对犯人只有坦白才能从宽的说教感到十分厌倦。我想或许它是真的。一个真正的罪犯通过主动坦白，能获得较轻的判决。但我并没有罪。当我没犯罪时，却经常被说成是已经犯了罪，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愤怒。

我拾起报纸，站在微弱的灯光下读起来。象中国的其他报纸一样，上海《解放日报》的发行和经费供应，完全受人民政府的控制。由党的宣传部门委派的新闻工作者是官员，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宣传的目的，选择和经常歪曲新闻，尤其是外国新闻，而写文章颂扬政府的方针政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包括在监狱里，报纸是用来教育人民的。

长期来，中国人民是通过报纸这唯一途径来了解新闻的。他们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既注意已刊出的条目，也注意省略的内容。事实上对中国人来说，真正的新闻来源根本不是报纸，而是经常来自一些不知姓名的人用符号和记号代替的语言，私下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政治流言。这被称作“小道消息”，意思是这新闻不来自公开的主要渠道，即官方途径。过去，在共产党掌管国家之前，它的地下组织已经有效地使用“小道消息”，来逐步破坏中国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现在，共产党自己为之烦恼了。当

人民不信任官方报纸，不能自由地获得新闻时，他们就很自然地热衷于打听并相信从无论什么地方得到的关于政治流言方面的新闻了。

在看守所里，上海《解放日报》是我唯一的关于监狱墙外信息的来源。我很仔细地阅读这份报纸，为了循着文化革命的发展来评价政治的发展有什么变化，有时一条新闻或一篇文章要看两遍。从新闻刊出的方式，特别是文章的标题、社论和某一天使用的毛泽东语录的语气中，我常能辨明毛主义分子希望达到什么或按计划没达到什么。我对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更详细和充分的了解是在我释放以后，我完成了搜集未经审查的红卫兵出版物的工作，并有机会向参加过这场革命运动的青年人提问。

又到了星期六，我向看守借了缝纫针。我把两条新买的毛巾接起来，为水泥便坑做了一个座位，把几层卫生纸缝在一起，做一个用来贮水的脸盆盖子，剪碎手帕做一只晚上遮眼睛的眼罩。当我借用剪刀时，看守站在小窗边注视着我，我一剪完她就收了回去。做这些改进我日常生活的实用事情使我感觉好了些。我发觉，特别是做针线，是一件减轻痛苦的事情。

几天过去了，我每天要求见提审员，没有答复。一个阳光充足的早晨，犯人被告知准备到牢室外活动。看守走到每个牢室前叫道：“放风了！”（到外面吸吸空气！）

渴望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我跳跃起来，放下正读着的毛的书，冲着站到门前。但在轮到我放风前不得不等相当一段时间。为了防止各室犯人相互碰面，第一看守所有一

种煞费苦心的管理办法。我必须等待，直到我隔壁牢室的犯人回到室内看不见了我才被允许离开我的牢室。派驻的看守沿路注视着犯人，领犯人到院子里运动。

我囚禁处的院子是宽敞的，但处于阴郁和疏于管理的状态。墙上碎泥灰下裸露着砖块，地上覆盖着灰尘和石砾。我看见在院子的一角有一些绿色，我发现那是一丛富有韧性为生存而斗争的杂草。在这荒凉的地方看到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令人高兴的，我转而走近观察它们，看到在草茎的顶上有几朵很小的淡红色的花。每一朵花有五瓣完美的花瓣，它们并不比种子大。在灰尘和石砾中间，这杂草傲慢地站立着，沐着阳光，在这死寂的地方显示着生机。凝视着这小花，我真难以相信它们会如此之美，我的精神提了起来。

“来回走动！低着头来回走动！不许在这里停留！”一个站在放风院子墙头平台上的卫兵对我喊道。在平台上有两个岗亭，一个是敞开的，一个用玻璃窗围着。天气晴朗时，卫兵在敞开的岗亭里注视犯人。

我开始绕着院子散步，逐渐地我胸中的沉闷消失了，呼吸更舒畅了。秋天的空气是凉爽和干燥的，照在我脸上的阳光是温暖的。在牢室里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天是无限的长。但在室外院子里时却不是这样。即使在隆冬，我的衣服不能给我饥饿的身体保暖，在凛冽的北风中我不停地颤抖，尽管这样，室外的全部放风时间对我来说还是过去得太快了。

领我回室的男看守不能立刻找到开门的那把钥匙，当

他逐把钥匙试着开锁时，我得到了又一次请求见提审员的机会。

“我来这里已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了，我能见提审员吗？”我问他。

“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了？”他整理着钥匙转过脸来问我，“你胡说，我知道你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算什么，有的人在这里已经几年了，他们的案子还没有解决呢。你为什么如此不耐烦？你老是想见提审员，当你见到他时你准备说什么？你已经准备了充分的供词？”

“我将请求提审员调查我的案子，澄清误解。”

“什么误解？”他显得迷惑不解。

“导致我在这这里的误解。”我说。

“你在这里是因为你犯了反对人民政府的罪，没有误解，你不必跟我打哑谜。”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犯罪。”我坚定地说。

“如果你一点没有犯罪，为什么你被关在监狱里？你在这里证明你已经犯了罪。”

他的逻辑使我震惊。这是掌握权力的党和政府不会搞错的基础。我不能与他辩论党和人民政府是否犯了错误，因此我仅仅说：“凭良心说我并没有犯罪，这是搞错了。”

“也许，你做过的一些事情你已经记不得了，犯人们经常需要提审员的帮助和指点，才会认罪。”

“如果我有罪，我想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告诉他。我回想起我听到过这样的情况，犯人认罪时是按提审员提供的内容说的，提审员抓住和写下这些内容，以防犯人万一

翻案。

“也许在那时你没有意识到你正在犯罪，你可能还相当糊涂，”看守说。他似乎相当直率。

别人认为我有反对政府的犯罪行为而我认为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吗？虽然我已小心地循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试图获得对结局理性的理解，但我从未研究过共产党政府的刑法。我决定毫不耽搁地补上这一遗漏。因此我对看守说：“如果我确实无意中犯了罪，我将研究法律书，能不能把你的法律书借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刚才的话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的，这在本次文化革命中是受到批判的。你想按照法律书和规章来考虑问题？但我们是无产阶级，象这类东西我们是没有的。”他好象很愤慨，仿佛我假定他们有法律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侮辱。

“如果你们没有法律书，那么你们按什么去做？你们怎样决定一个人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他的话是我们的准则。如果他说某一种类型的人是有罪的，你属于这种类型，那么你就是有罪的。这比依靠一本法律书更简单。”对于他，用毛泽东的语录专断地决定人们的命运是无可非议的。语录按照某个特定时期的不同可经常改变，这语录又经常是如此含糊以致地方官员能为他们自己所用。毛语录的一贯正确是他个人崇拜的一部分。但是，我担心如果受害的不是我而是看守，他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

在他又把我锁进牢室后，我没有再要求见提审员，转

而安下心来勤勉、认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我想知道毛的话如何被用来反对我，我想了解我为什么不能用他的话去反驳我的控告人。我认为，当面对提审员的时候来到时，我应学习讲毛的语言，流利地使用他的语录。

一天又一天，许多星期过去了。长久的监禁使我变得更为忧郁。我等待着女儿的消息，我非常想念她，并不断为她担忧。我常常由于郁闷而透不过气来。总象有一块沉重的硬块积在我的胸口，以致我咽食都感到困难。

监狱外，文化革命似乎发展迅猛。附近中学的高音喇叭整天大声喧嚷着。地方官员愤怒的谴责声代替了革命歌曲，杰出的学者受到控诉。当风向是顺向时，我尽力用耳倾听，试图捕捉其中的一个词、一段话。在昏暗的牢室里，我一天学习毛的书好几小时，在暗淡的灯光下，一直读到我的眼光变得模糊。

一天，中午以后当我的眼睛辨别铅印字感到疲劳时，我的眼光从书本抬起凝视在窗口上。我发现一只小蜘蛛爬上了窗上一根锈蚀的栅栏。这小东西只有一粒豌豆大小，如果钉在墙外遮住窗口下半部的木板不漆成黑色，我是看不见这小东西的。我观察它缓慢而坚实地爬向铁栅栏的顶头。我想，对于这小东西来说，这可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当抵达顶端时，它突然摆动起身子，并从身体的另一端抽出线状的细丝来。在它左右摆动之际，它已将丝的一端挂上了另一根栅栏。然后它沿着织成的丝再爬回来又向着另一个方向出发。我注视着小东西着迷似地、干劲愈来愈足地工作着。它似乎确知该做什么，下一根细丝该挂在哪

里，没有犹豫，没有误解，也没有匆忙。它理解自己的劳动，能极有信心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当蜘蛛网的框架形成时，它又开始用多股有规律分开的细丝，着手编织那极其漂亮、相当完美的蜘蛛网了。当蜘蛛网最终完成时，这小东西就到网的中心停息下来。

我看到了由一个怀有绝技的艺术家造就的建筑上的奇迹，内心充满了问题。谁教过它织网的技能呢？是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还是上帝创造它的同时又赋予它获取食物、繁衍后代的能力的呢？这么一个小东西的脑有多大呢？是不是昆虫的本能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它学习并贮存织网的知识？或许有一天我会向昆虫学家请教。目前，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一些美好而向上的东西。不管上帝是否创造了蜘蛛，由于我刚才所看到的一切，我感激它。生命的奇迹已经展示在我的面前，它帮助我看到上帝是支配一切的，毛泽东和他的革命派并不能把我吓倒，希望和信念在我身上复活了。

我的牢室面对西南。在夕阳西下即将沉入地平线之前的短暂时间里，落日的余辉使新织的蜘蛛网上映出璀璨的彩虹。即使我想吓唬蜘蛛离开，我也不敢把手伸到窗门上去的，我只是继续在原地注视着它。不久我发现，它不仅是栖息在那里等待要捕食的动物，而且始终是警戒着的。不管什么时候，网的一角被微风扰乱或撕破，蜘蛛就会在那里随时修复受损的部分。日复一日，蜘蛛经常修复网，有时一部分网是重织的，有时整个网都是重织的。

在观察了蜘蛛的活动、了解了它的习惯以后，我变得格

外喜欢这小东西了。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直至晚上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看看这可爱的小东西还在不在，当我看到它还在那儿时，心里就会感到一种安慰。小小的蜘蛛成了我的难友，我的精神压力也减轻了许多，摆脱了由于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而带来的忧郁感。

十一月悄悄来临了，刮起了西北风。天气常常阴雨绵绵，气温也越来越低。我担忧地注视着小蜘蛛，不想关上窗门而把它关在外面。它继续修理被风撕破的网，耐心地织着新网。一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发现蜘蛛不在了，它的被遗弃的网扯碎了。我感到悲哀，只要它能回来，我倒希望让窗一直开着。然而，我转变视线却看到我的小难友栖息在牢室内天花板一隅新织蜘蛛网的中心。我迅速地关好窗，为我的小难友没有离开我而感到欣慰。

十一月底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浑身发冷，头痛得厉害，鼻子喘着气，感到难受。我坐在床边想知道我是否该请求要一些药片。当给我薄粥时，我指望把它喝完，这热粥可能会使我感到好一些，但中午的米饭和水煮的大白菜使我难以下咽，我把它退给了来自厨房从没接触过的妇女。整个下午，当班的看守通过观察孔频繁地来看我，直到傍晚她没有讲一句挑衅性的话，这时，她突然推开小窗对我说：“你哭什么！”

“噢，不，”我说，“我感冒了。”

“你不在哭么，你哭是因为你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条件，你对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无法忍受，是不是？我们已注意到这些情况并试图加以改进。你也为惦记你的女儿而哭，

你正担心她现在怎样了。”那看守说。

“不，真的，我只是感冒了，能不能给我一点阿司匹灵？”

“阿司匹灵并不能帮助你，你的心被什么搅扰了。仔细考虑你自己的处境，这才是应取的正确态度，否则，是要后悔的。”她说。

入晚，我静坐在牢室里，面孔不对着门，试图不擤鼻涕，不拭眼睛。当递给我晚饭时，我吃了一点，把剩余的倒入了便坑，倒了一些水把它冲走了。然而看守们却相信，由于我不能忍受监狱生活的艰难而哭了。他们认为这对我是一种心理上的折磨，抓住这种机会就可在第二天提审我。

第六章 审 问

黎明的早晨阳光充足。我打开窗门，颇有冷意的新鲜空气扑面而来，我想，冬天就要到了。看守正一室挨一室地叫犯人收床单准备洗涤，这是在晴天每月一次的例行公事。限额外的冷水分发到各个牢室后，犯人们就把床单浸在水里，在湿床单上擦肥皂，然后把床单塞出牢室的小窗，再由那劳动改造姑娘收集起来，在洗衣房里洗干净。

当我正在湿床单上擦肥皂时，一个男看守开了我牢室的门锁，打开门并喝道：“出来！”

“我正给要洗的床单擦肥皂呢，”我说。

“不许辩解，我叫你出来，你就出来。”

当班的女看守也来到了门边，她说：“你可以晚一点擦洗床单，现在必须去接受审问。”

审问！看来我终于要与我的对手面对面了。我匆忙用干毛巾擦干了手。

“快点！带上毛主席语录，”那男看守不耐烦地说。

我跟着他走出牢室，穿过女牢房的院子，来到了监狱犯人区的后面。在去一幢大楼的路上，有一块白色的大木

板，上面写着黑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

我的心激动得急剧地直跳，我的脚步也因期待而急切。长时期等待回答我的疑问和不偏袒地审理我的案件的机会终于就在眼前。我相信，一个代表政府的提审员的行为不可能象一个歇斯底里的红卫兵或一个造反派。他必须是一个受过训练的有责任感的人，能够识别真假罪犯。

在大楼门口边的一间小屋里，几个看守懒洋洋地坐在木椅子上。我被移交给其中的一个看守，他带我穿过一条长走廊，走廊的两旁排列着许多审问室，大多数审问室的门关着，我听到被捂住的声响和偶尔的叫声从一些审问室里传出来。带我的看守在一间审问室前停住了，他打开门喊道：“进去！”

这审问室既狭长又阴暗，只有一扇小窗，它就象我牢室的窗一样，高高地开在墙背上。室内有两个男子，穿着宽大和褪色的蓝棉毛式制服，除了职位很高的官员以外，中国的男子几乎都穿这种制服。他们坐在窗下的一个木桌子后面。面对窗口约二米远，有一张为犯人准备的笨重的木椅。审问室虽然很暗，但从窗口进来的光正好照在犯人坐的地方。我发觉墙上布满了灰尘，水泥地又湿又黑，木桌子和木椅子经多次擦拭呈现出灰暗色。

我进入审问室后，一个男子说道：“打开语录本，读一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选择的语录与红卫兵到我家抢劫时使用的语录是一样的。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我用一种坚定的声音读着语录，意识到两个男子正严密地注视着我，我试图不显示任何神经紧张的迹象，以免又被指控为一种犯罪。

“坐下，”那男子对我指了指椅子说。

我转身坐下时，看到在这椅子后面有一个很象我牢室门上的小窗，或许稍大一点。我断定，在走廊里有人正听着室内的审问。

我坐着注视桌子后的两个男子。由于在室内工作又很少运动，他们的脸色苍白。与我到看守所登记时所遇到的男子不同，他们显示出一种权威、一种有职位男子所共有的自信，尽管他们的外表相当丑陋。他们显得很随便，几乎是心不在焉的。当然，接见一个犯人对他们来说是例行公事。我猜想，与我谈话的那个是提审员，案头有几张纸的那个是书记员。

我坐定后，提审员的眼光通过我的肩膀，朝在我后面小窗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头。看来我起初的感觉是正确的，门外确实有一个人在听对我的审问。这太使我失望了！看来，提审员仅仅是一个中间人，我终究不能见我的真正对手。我多么希望能与他面对面地打交道啊！他如此不公正对待我的行为已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终生难忘。

提审员用一种低沉的、使人厌烦的声音询问我的名字和其他个人细节。然后，他抬起头提高嗓门咄咄逼人地问：“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来这里的人都受到监禁，我想这里不是监狱就是集

中营。”

“你说得相当对。这里是第一看守所，一个囚禁政治犯的监狱，是审查和监禁反对人民政府的反革命罪犯的地方。”

“事实上，我不应该被带到这里来，”我坚定地声明。

我的声明并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继续平静地说，“你被监禁在这里，是因为你犯了反对人民政府的罪。”

“那是错误的，”我说。

“人民政府没有错。”

“你不是一名不负责任的红卫兵，你是一名政府的代表。你不能这样野蛮地控告我。”

“这不是野蛮的控告。”

“要证实你说的话，必须出示证据。”我长期等待的审问，竟是与监禁前遇到过的造反派一样的人周旋，我深深地失望了。

“当然，我们有证据，”审问人无耻地虚张声势。

“请出示证据呀，”我讽刺道，戳穿他的谎言，“为什么浪费审问的时间，为什么不出示证据就处罚犯人？”

“你低估了群众的力量，红卫兵和造反派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证据，什么也别想隐瞒。那些犯了错误或犯了罪的人正在招供，还准备揭发别人。他们想通过招供得到宽大处理，通过控告其他犯罪的人而立功受奖。”

“我不相信你有控告我的任何证据，我十分理解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没有低估群众的力量。我相信，你或其他任何人在我的身上要找出根本不存在的东

西来，是不可能的。我从来没有犯罪，怎么会有证据证明我有罪呢？”我说。由于他说了谎，在道义上我就有了压倒他的优势，这优势加强了 my 自信心。

“提供处罚你的证据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政策。这次审问的目的是帮助你改变立场，给你一个通过彻底坦白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从而你能与犯罪的昨天决裂，成为一个新人。”

“我不是一个魔术师，我不知道怎样来招认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我们是有耐心的，我们能够等待。”他牢牢地盯着我，慢慢地说着。他的话显然是一种威胁，如不从，就将陷入长时期的监禁。

“如果一些事情没有发生，它确实没有发生，一百万年也不会改变，无论你等多长时间也决不会改变。”我也坚定而缓慢地说道。我要使他看到在与我的斗争中，他失败了。

“时间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态度，一个象你这样的女人在这监狱里是持续不了五年的。你的身体会垮掉。最后，你会乞求有一个坦白的机会，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你一定已经死了。”

“我宁愿死也不愿说谎。”

“不，不，想活下去是所有有生命动物的基本天性，人也包括在内。”

“我一定听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这段语录对象你这样的人不适用，它适用于解放军战士，”他愤慨地说。

“林彪元帅说：‘我们伟大领袖的教导有全世界的意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由于提审员的说谎，给了我精神上的优势，我的情绪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现在我开始欣赏这次审问了。与在阴暗、潮湿的牢室里没有人和我交谈相比，这更是一次命运的打赌。

沉默了一会儿，提审员的目光又一次通过我的肩膀……然后他说：“你是个厚脸皮的人，你的交代并不能解脱你的困境，你唯一的出路是采取诚实的态度。我的责任是帮助你充分理解政府的政策，认识到只有彻底交代才是你应选择的显示悔改真诚的道路。不要藐视无产阶级专政，这审问室就是人民法院，你在这里说每一句话必须绝对严肃。”

“我难道不指望人民政府主持正义？”

“正义，正义是什么东西？它只不过是个词而已，一个没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的词汇。对不同阶级的人们来说，正义意味着不同的事情。资产阶级认真考虑并精通它，为的是剥削工人，而工人直接考虑的是受剥削的不正义。不管怎么说，你要求的正义又是什么？当你坐在暖乎乎的房间里而其他人却在雪中颤抖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混淆了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之间的界限。我认为正义是明确的。和我去世的丈夫之所以在1949年留在大陆而不跟国民党去台湾，是因为我们希望人民政府

会改善中国的条件，不再使任何人遭受寒冷和饥饿。”

“总之，我们不去探讨抽象的正义概念。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它们和正义完全无关。你现在所在的监狱，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期间是用来囚禁中国共产党人的，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则用作镇压敌人的工具。资本主义国家使用‘正义’和‘解放’之类的诱人的名词，目的是欺骗人民，防止他们的革命觉醒。你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抛弃你头脑中所有的无聊想法，否则，对你十分有害的。”

他诉说的话，对我和自1949年以来生活在中国，经历了时局变迁的人来说并不是新鲜的。它是已被人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句话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里说的。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和他的宣传机构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来描述在中国的共产党统治。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由毛泽东控制的专政，直到他在1976年逝世。毛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是1949年7月1日出版的，以庆祝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那篇文章论证了对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来说，将有大量的男女被怀疑是敌人，从而实际上预示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我认为审问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要提审员不问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事情也澄清不了的。在我与提审员的论战中，要去超过马克思主义是没有必要的。我自己的观点和评价很久前就形成了。我不相信人民应严格划分阶级，也

不相信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工具。我相信在多年的战争以后，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和社会各方面的团结以重建家园，而不需要不间断的革命。我不能改变这些观点。可惜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提审员看不到这些。他希望把我搞乱，削弱我对威胁和雄辩的抵抗能力。审问将是冗长和乏味的。因患感冒，我的心跳得厉害，我决定让他继续讲并听他说完。

一段时间的沉默后，提审员继续说：“要招供首先必须承认犯了罪。你必须承认你反对人民政府，而且对你自己犯了罪。承认犯罪就象打开了水闸，当你老实地承认你确实犯了罪，即使你借口不是与人民政府对抗，你的招供也容易象水一样泻出来。”

他停了一会儿，观察并寻觅我的反应。他说我“对抗”人民政府，的确我已经对抗了人民政府的一些法令，比如对无罪人民的大量逮捕，仅仅根据阶级出身就确定一个人是敌人等等。但我从未把这些想法告诉任何人，当然也从未按这想法做过任何事情。我仅仅希望当一种制度达到成熟和取得经验时，它应是完美的。提审员正试图向我灌输一个罪犯的情感，因为他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在某一时刻的什么行为是违反公民所在国家某些法令的情况很熟悉。他希望从心理上控制我，但我立刻看穿了他。我在表面上一点也不动声色。我心里想着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例如改进公共卫生、使无家可归的人重新安居等等。从整体上看，我认为我是一个人民政府的拥护者。我持有的这种对共产党统治的正面态度，支撑着我去抵制提审员

企图要我认罪的勇气。我在监狱度过的岁月里，这种态度和勇气给我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

提审员继续道：“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回顾你自己的生 活，检查你的家庭背景，寻找你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组织中的恰当位置。你站在哪一方面，是劳动人民和革命派方面还是阶级敌人方面？不需要我告诉你你也知道，你出身在一个封建家庭，你的家庭拥有大量的富饶的农田，世世代代剥削农民，靠剥夺他们创造的财富而生活。你的祖父、父亲和你的丈夫都是反动政府的老资格的官员。他们参与和外国帝国主义合作，剥削人民，反对共产党。虽然我们已向 你提供成为一个人民教育机构教师的机会，你却自己决定为一个多国商行工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上海已经十七年了，许多有着象你一样背景的中国人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并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而你干了些什么呢？你好象什么也没发生，傲慢地继续着你旧的生活方式，穿与资产阶级一样的服装，竟敢在公共场合讲英语，还与大量的外国人保持友好的联系。

“你以为你那不妥协的态度能够轻易地滑过去吗？无产阶级已经注意你几年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最近指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还坚持能对我们隐瞒任何事情吗？”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你老老实实地想一想，在没有根本转变你的立场之前，我们会让你离开这里吗？”

“你在这里已经近两个月了。我必须承认你的适应能力使我们惊奇。不管你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你必定已

发现监狱里的生活条件是相当艰难的。冬天正向我们袭来，在你的整个生活中，我不相信你在没暖气的情况下能度过一个寒冬。牢室将会是非常寒冷的。粗食经常使你难以下咽，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你的女儿怎样了？你非常想见她，你不是经常担心她发生了什么吗？”

他又一次不说话了。当我继续保持沉默时，他又说道：“首先，我们希望你写自传，差不多我国的每个公民都已写了，但我们在你的档案里却没发现你的自传。你要把每一件事情清楚地写下来，不能掩饰任何错误，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我们将核实你写的和我们已经掌握的关于你的材料。如果你遗漏了任何事情，我们会认为你不老实。要从你的家庭开始按年代的次序来写。我们将根据你所写的来评价你的政治立场和你的诚实程度。”

提审员拿着笔记本站了起来，递给我一卷纸。我收下纸后他说：“如果这些纸不够，值班看守还可以再给你，她还会给你钢笔和墨水。不允许打草稿，也不允许因为写错而浪费纸，你写完后要把剩余的纸交上来。”

他很严肃地看着我又说：“你要认真、仔细地考虑我今天讲的每一个问题，自传写完后就交给值班的看守，我们会再叫你的。”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看守出现在门口。我跟着他穿过长长的走廊回到了我的牢室。我无法知道提审过了多久，只感到已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了。我又饿又累，非常失望。

我的湿床单还丢在床上，就拣起一块肥皂擦起来。擦

好肥皂后就叫值班的看守：“报告！”

看守走近小窗，给了我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

“现在能洗我的床单吗？”

“洗衣房洗衣的时间已经过了，你得等下一次。”

“但床单是湿的，我已经擦了肥皂，让湿床单搁上一个月是不卫生的，”我说。

她没等我讲完，砰一声关上小窗走了。

下午，她却多次从观察孔看进来，来去几次后她打开小窗问我：“你为什么 not 写？”

“我怎么能写？我在为湿床单发愁呢，它会发臭的，我没有其他可用的床单了。”

也许是为了保证提审员希望我写的自传，她发了慈悲让劳动改造姑娘把床单拿去洗了。第二天干干净净的床单送了回来。

看守继续有规律地从观察孔看进来。为了装出在写自传的样子，我把毛的书放在膝盖上，上面再放一张纸，旁边放一只墨水瓶。这样做以后，看守就让我一个人呆着了。

在写自传之前，我必须弄明白他们命令我写它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审问人说的其他中国人已写了自传，这借口是没有根据的。虽然我从来没写过自传，但我相信我所在地区的公安部门已有关于我生活的详细记载，就象他们有住在那里的每个人的记载一样。显然，提审员希望通过写自传，来找出某些需要的材料，进一步地曲解我并证明他们的正确。

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现在并不是在上海穿传统中国服装不穿毛式服装，也不是仍与外国朋友有来往，或继续过舒适生活的中国女人，我已经是被单独地监禁起来了。当然，有的人遭受了红卫兵的折磨，很可能已被抄家，但他们不可能都遭逮捕。我所面临的更严重的情况，对我来说还是个谜。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老老实实地写我自己和我的生活，袒露内心的思想和立场是愚蠢的。此外，我知道有这种情况，当三番五次要某人写自传而发现所写不符合要求时，那么某人就会受到更大的嫌疑。显然，我能做的唯一事情是根据我的生活，按年代的次序写一份反映仅有情况的简单材料。如果将来再要我写自传，我提供一份相同的材料是没有困难的。

傍晚，气温急剧下降，刮起了大风。牢室的窗门发出卡嗒卡嗒的响声。穿过缝隙的风变得更加冷嗖嗖。我把几张手纸折叠成窄条状，嵌入缝隙来阻挡风的侵入。我那小难友的蜘蛛网已经被撕破。在过去，破网总是即刻会被新网所代替。而现在，小蜘蛛从天花板的角落沿一根长长的丝线下来，当它到达水泥地时，非常缓慢和艰难地在室内爬行。我蹲伏下来很近地观察它，想知道它将做什么。我的小难友看上去相当虚弱，每走一步都是颠颠跌跌的。小蜘蛛是得病了还只是受了凉？我担忧地看着它，看它从一个角落到一个角落，为的是寻找避风的掩蔽处，最后，它消失在水泥便坑与墙连接的角落里。在这角落的裂缝里，小蜘蛛织了一张很小的网，虽没有象以前织的那样漂亮那样好，但一层层丝线是很厚的，织成的很象一只茧。我想，

我的小难友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当我不得不使用手纸时，我小心地坐在一边，不致于打扰它。

第二天上午，我相当快地在提审员给的纸上写自传，下午就写好了，然后走近窗门道：“报告！”

我把写好的自传和剩下的几张白纸一起交给了她——走近窗口的值班看守。

“你已经写好自传了？”她怀疑地问，眼睛盯着我写满的五张纸。

“是的，我完成了，”我回答。

“这好象太短了，你是否把每一件事都写下了？”

“是的。”

“为什么这样短？”

“哦，这太短了？不管怎么说，我已把每一件事都写上了。”

她再也不说什么，走了。我有点期待即刻会有什么反应。当什么反应也没有时，我变得相当轻松愉快。整个傍晚，我观察着小蜘蛛，它已离弃它的新织的窝，又艰难地沿着房间爬行了，频繁地颠颠跌跌。最后，它朝着我的方向笔直地爬来。当它接近我的双脚时，我想知道为了温暖它是否打算爬上我的腿。但它通过我的脚消失在床底下了。我等待着它再出来，几小时过去了，却没出来。在牢室里或许床下是最遮蔽的地方，我的小难友已决定留在那里过冬。

第二天早晨，当看守叫我起床时，在我的双脚踩地前，我就小心地注视着水泥地，看看小蜘蛛是否在这里。当我

吃早餐薄粥时，我的眼睛在床附近的水泥地上不停地寻找，我希望在那里看到小蜘蛛重新充满活力地出现，但什么也没发现，只见扯破的网还在，一点没留下小蜘蛛的痕迹。我可以想象，当小蜘蛛在这里的话，它会认真地劳动、努力地生活，去重新制作蜘蛛网。小蜘蛛为了继续生存不得不服从它的自然本能，我也不得不这样。我在第一看守所的时候，我必须竭尽全力为生存而展开坚决、认真的斗争。

我的思绪被门上的开锁声所打断。一个男看守喊道：“出来！”

我带上毛的语录书，跟着他走了。一种与提审员展开激烈争论的欲望支撑着我，他派看守来观察我，我猜测是我的自传没达到他们预期的要求。

我被带进另一间审讯室，这审讯室与以前的完全相同。里面同样坐着那两个男子，只是他们的制服被露出领口和袖口的厚运动衫鼓起着。房间是冰冷和潮湿的。室外，来自西伯利亚的强西北风无情地袭击着城市，风吹打着窗门，呼啸着穿进缝隙来。提审员皱着眉头看着我，当他要我读毛的语录时，言辞尖刻，目光咄咄逼人，极不高兴。我知道，他正审慎地安排一个与我作斗争、使我感化的行动。

我置提审员那相当幼稚和使人好笑的态度于不顾，仍用前一天同样清晰、坚定的声音读着语录。“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

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我根据毛语录的小红书读着。

他并没要我坐下，却问：“你理解这段语录的意思吗？”

“对我来说它是相当清楚的。”

“讲一讲你是怎样理解它的意思的。”

“这段语录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都是很熟悉的，摘自1949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他警告中国人民保持警惕，因为他相信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是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的，要派遣走狗钻进国家内部进行分化和捣乱。”

“相当好！过去十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我们伟大领袖的告诫是及时的、正确的。”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你是怎么看的？”

显然，我不能很直接地说毛是一个妄想狂和过分猜疑的人。同时，我也不同意他说的话，因为他对政敌的活动缺乏认识。因此，我富有外交手腕地回答：“哦，凡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每句话，我都相信。他始终是正确的，是不是啊？”

提审员瞪眼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说：“坐下！”

我听到在我后面的木制小窗打开了。提审员查看我是否已注意到了那轻微的声音。我只是直视着他后面的窗门，显示出惘然若失的样子。我不希望他认为我是戒备的，对每一种声音都提防。提审员的举止使我意识到，他们不想让我知道有一个人在走廊里正听着对我的审问。

我写的自传在提审员面前，他拿起自传说：“你能把它

称为认真、尽力的自我检查吗？”

我不能说什么，继续保持沉默。

“你交出了一份关于你生活的统计记录，就象某个人写下一份日常消费的流水帐一样。你能把这样的东西称为自传？”他朝我的方向在空中挥动着这几张纸。

“这样写不好？我为以前从未写过自传而担心，”我似乎很单纯地说。

“你虽然没写过自传，但你读过很多自传，在你的书架上有中国和外国作家写的自传，”提审员说。

“是的，我确实读过很多重要人物的自传，他们都在这个或那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我自己说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在我丈夫去世后的九年里，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你只是一个家庭妇女？”提审员讥笑地问道。他有点嗤之以鼻，继续说，“你把时间化在缝纫、织补和烹调上了？不，你研究马克思主义，阅读每一种杂志和报纸，记下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保存党中央会议通过的决议文件。当红卫兵到你家对你采取革命行动时，他们发现你的书架上放满了政治书籍，你写字台的抽屉里放满了你手写的笔记。在你的卧室里有一个功率很大的短波收音机，你的保姆说，你经常在那里收听外国广播。你这样做难道是家庭妇女？一个家庭妇女关心的是她的家庭，你关心的是政治。无论作任何想象，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妇女。”

“我并不因为我的兴趣超越房间和我的家庭而感到羞愧。我想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是鼓励妇女学习马克思主义、

关心政治的。自共产党解放了中国妇女以来，我仅仅做了我认为应该是应该做的事，”我告诉他。

“在我们的领导和指点下，我们鼓励妇女学习马克思主义。如果你十分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提高你的政治觉悟，你为什么不参加宣传队？我们了解到你从未参加你所在地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活动，这活动是为了对生活在那里的妇女进行宣传。你对政治有兴趣，如果是因为你希望做一个好公民，那么在选举上海人民代表时，你为什么迟二小时才去投票？一个妇女的这种行为是认识到自己的解放？不要往你脸上贴金，使你看上去象一尊慈善的如来佛。为什么不承认你对政治的兴趣是为了某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不参加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宣传队，仅仅因为我自己能学习得更好。此外，他们常在下午活动，而我开始为壳牌石油公司工作后，参加宣传队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至于我晚去投票，我承认直到有人来提醒我，我只是忘记了。我认为我投不投票是无所谓的，我不知道所有壳牌石油公司的成员必须一起投票，因而比其他人明显地晚了。无论如何，选举只是一个由党指定的候选人，不管我是否投票，他肯定已经当选了。”我解释道。

“你胆敢蔑视人民政府的选举程序！你认为它是不重要的！对你来说，重要的是干帝国主义分子的肮脏勾当！”提审员狠狠地说。

“这是不着边际的控告，也是不负责任的控告，”我以摇摇头来对付他的暴戾。

他又拿起了那五张纸。

“我要你写一份自传，你就写了这些。为什么？因为你隐瞒了一些事情！”

“请告诉我据你看该讲什么，我不打算隐瞒任何事情。如果你想知道有关我生活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什么事情，我都十分乐意告诉你。”

“那好，自开始审问以来，这是你第一次表现出诚实。现在我希望你要意识到你的情况是无可救药的，必须彻底坦白。”

“你又在跟我打哑谜了。我说我很乐意把关于我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事实比雄辩更说明问题。我相信当你掌握我的全部实情时，你一定会认为我是无罪的。我没有做任何反对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事情。”

“我要你彻底、老实地回答我的所有问题，如果你想得到宽大处理，决不能隐瞒任何事情，”他警告道。

“我向你保证，我确实没有隐瞒任何事情，我充分理解人民政府的权力和提审员掌握实情的能力。实际上，我指望你搞清楚强加于我的诬告，恢复我的名誉。”

“我同意你的陈述，现在你可以回牢室去了。今天下午，你能告诉我关于你与英国间谍斯科特和奥斯汀的交往吗？谁能对把白俄双重间谍介绍给你们的总经理这件事负责？”

我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了，我想讲，但提审员用手势示意我沉默，他站了起来。

“现在什么也不要说，今天下午我们会给你足够的机会来坦白的。”

一个看守早已站在打开的门口，等着把我带回牢室。

提审员刚才说的话使我震惊，以致我都记不得我是怎样回女牢房的了。

看守并没坐在入口处的看守室的门口，而是站在冷风中等着我返回。她双手插在口袋里，拱着肩，双脚不耐烦地移动着。这次，从她看得见我的时候起，直到带我走在去牢室的路上，她不时地投来一瞥，好象在观察我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把我锁进牢室后，她继续在观察孔里观察我。从她的行为中我意识到，她是接受了提审员的指示来观察我的反应，这也是提审员结束与我的面对面接触把我押回牢室的原因。虽然当我听到提审员称我的两个英国朋友为“英国间谍”，称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的白俄秘书为“双重间谍”时，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知道我保持常态是重要的。如果我表现出任何一点激动的情绪，就必须会被认为是有罪。

我在脸盆里倒了些水，洗了洗脸和手提提神。然后，我拿起一本毛选坐在窗下，低着头不停地翻阅其中的每一页，想从中得到点什么并有所感想。那看守在观察孔前站了很长时间后走了，但一分钟后另一个看守又站到了他站的位置上。午餐时，我因为饿了因此饭和大白菜吃得相当快，一个来自厨房的女人收去饭盒后，我听到她对看守说：“都吃光了。”在犯人们象往常一样在牢室里来回走动十分钟后，看守一个牢室挨一个牢室地要每个人坐下，最后她来到了我的牢室，就站到了观察孔前。虽然她的动作声音很轻，由于我在拘留室就能辨认每一种声音，因而明显

地感觉到她在门外。我装着不知道她在这里，躺靠在卷起的被褥上，闭上眼睛假装睡了。白天睡觉是严重违反狱规的，通常会招致看守的愤怒，我过去经常听到看守训斥白天睡觉的犯人。而现在她明明看到我在睡觉却没有喊我从床上起来。

大约一小时以后，我又被叫到了审讯室。我必须读早晨读过的相同的语录。

“你是怎样结识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间谍斯科特的？他来中国前你认识他吗？你向他提供了什么情报？”提审员问。

“在向你说明我怎样结识斯科特之前，我想我应该指出，我认识的仅仅是一名英国外交官。”

“你可以指出你喜欢的任何事情，我们信不信则是另一回事。继续你的说明。”

“我第一次结识斯科特是在1961年9月某人举行的宴会上，我记不起男主人和女主人是谁了，”我说。

“宴会的男主人是印度总领事，我们有宾客清单，但那是不重要的。在印度总领事的宴会上你结识斯科特之前，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后来不久你去了香港。当你在香港时，又和另一个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间谍接触，他是一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空军军官。他在香港是一个很有名的英国间谍，虽然他伪装成一个商人。斯科特派你去接受他的指令吗？”

“在香港我遇到很多社会人士，我没有意识到他们中的某一个人是间谍。在遇到斯科特之前我的旅行就已经安排了，我每两年去一次香港。每个去香港的人要有一张公安部门发的旅行通行证，在我遇到斯科特好久以前，我就向我所在地的公安部门递交了申请书。”我说。

“你想要我相信你遇见斯科特是偶然的，但事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斯科特来上海恰恰在你去香港之前，你一离开上海他就返回北京了。在你从香港回来之前，他又从北京来上海逗留了几个月，当你乘坐的船由于台风而滞留在江上时，他上船来看你好几次，而你们刚刚在宴会上碰过头，所以这样的行为是不正常的。而且，当他在上海时，你们一起出去的次数相当多。和你一起出去时，他总是自己开车，而和其他人一起出去时，他就雇用司机。

“在上海的外国人对你在爱情上的堕落有种种流言，并不是我们指派观察你的人报告了你的这一动向。我们相信，你和斯科特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你故意制造一种假象以掩饰你与他的联络。

“英国人是傲慢的。英国的情报机构是不允许它的间谍与他执行任务所在国的女人发生爱情纠葛的。事实上我们了解到，斯科特在上海时与一个英国银行家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

“现在你看到了吧？我们已掌握了你这丑恶的买卖，你还想回避实情？你必须坦白斯科特要你干什么，实际上你为他干了什么！”提审员结束了他的控告，坐在那里瞪眼看着我。

“你的讲述在通常情况下听起来也是令人怀疑的，”我说，“我经常与斯科特见面，主要是因为他的社交生活十分活跃，兴趣十分广泛。宴会后他经常放映英国电影，由于我们没有机会看那样的电影，所以他那样做始终是有吸引力的。我记得有几次他邀请外国驻沪办事处的官员看这些影片。当然，来而不往非礼也，有一次我选择了一个瓷器作为还礼。我也举行过一次宴会，邀请包括斯科特在内的几个朋友，来欣赏我新收集到的唱片，他也因此得到了我给他的很多唱片。我收集了大量的唱片这情况，红卫兵肯定已告诉你了。我想，斯科特比在上海的其他欧洲人更能驾驭自己，这可能是因为他并不害怕讲中国话。至于他到上海恰恰在我离上海去香港之前，他又来上海恰恰也在我返回之前，这纯粹是巧合。当我乘坐的船由于台风而滞留在江上时，他上船不是来看我，而是看船长，另有一个来自上海的乘客，我想他是一个丹麦商人。他们在一起饮酒交谈，我没有加入其中。当外国船停在江里时，许多士兵和海关官员逗留在船上，你为什么不从他们那里查明他是否上船，来看船长还是看我？”我说。

“你与斯科特之间的关系比偶然的相识更密切，”提审员说。

“不管怎么样，你对我的案子的说明与事实有很大的距离，是不正确的。”

提审员瞪着我说道：“我劝你不要只承认你与斯科特有爱情而企图回避你的要害所在。一个中国妇女与来自西方的野蛮人谈情说爱也是背叛祖国的行为，要受到‘劳动改

造’的处罚。”

中国人因长期夜郎自大而蒙受损害。那些从不越出国界，不与其他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们，不文明、习性奇怪，他们经常把其他国家的人民叫做“外国人”，甚至“外国魔鬼”。在毛泽东统治时期，自欺欺人的闭关自守和党的宣传机构对资本主义的恶毒攻击，更加剧了中国人民自我陶醉的不幸状况。当邓小平打开中国的大门以进入世界舞台时，一大批意愿善良、十分富裕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参与投资和出主意，中国人民在治疗自己的创伤中觉醒，陷入羞愧和自责之中，为了成为真正的“文明人”，他们迫切希望做好每一件事情。

对提审员我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虽然我意识到他坚持要把我当作“间谍”，不达目的就遣送我去劳动改造是不会使他满意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问我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通常，党为了要找一个受惩罚的遭难者时，并不讲究采用什么借口。有时使用的借口是非常含糊甚至是莫须有的，因为惩罚是目的。我的案件的审判取决于提审员的态度，似乎我必须当作一个“间谍”受到惩罚，没有其他任何理由。为什么？直到很久以后我还弄不明白。

“我看你并不打算讲更多的谎话，现在坦白你和斯科特在一起时，他说了什么。”提审员说。

“你要我记住几年前的会话是不可能的，但当时我们交谈并不涉及任何重要的事情。我们谈论书籍、音乐、中国瓷器以及我们俩都了解的地方和熟悉的東西等等。”

“你们的谈话难道一点不涉及政治？”

“有时候我们也对时事交换看法，但几乎都是国际时事。斯科特是一名外交官，他不想对一个中国人评论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遇见的所有欧洲人，无论是外交官还是商人，对他们来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谜，这主要是因为共产党推行关闭政策，它用神秘的方法遮蔽着中国。也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当他们有机会遇见一个中国人并能和他们交谈时，他们很自然地就会提问题，但这些问题从来不涉及政治机密。作为一个中国人，帮助来自异国的人民了解中国，她的历史、她的文化遗产和她的志向，我相信是没有一点害处的。但共产党的激进派官员却不是用这种眼光看问题的。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不附和官方宣传方针的中国人，都对中国的制度怀有敌意，而每一个来中国的外国人，都企图寻找共产主义体制的错误。因此，他们总是怀疑在外国商行工作并和欧洲人有来往的中国人。

文化革命前，我是有安全感的。我不认识任何在政界有地位的中国人，对认为是国家机密的任何事情我是无法了解的。当我见到我的中国朋友和亲戚时，在敏感的话题上，提问题我也是无羁的，除非他们成了共产党员。（这种情况在文化革命期间改变了，当我的朋友和亲戚遭到盘问时，他们能如实地说，我对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兴趣。）

“斯科特是一名外交官，发现情况是他的职责。他要你干什么？难道他不要你为他发现一些情况吗？”提审员固

执地说。

“没有！我怎么能为他发现情况呢？我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那里是一个外国商行，我并不比外国人知道得多。”

“对一名外交官来说，不为他的政府收集情报是不可能的。”

“你认为他实际上是一名收集情报的外交官？”我问提审员。

“不必怀疑我们的情报。”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或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把他驱逐出中国呢？”

“他不知道我们知道的事情，那更好。我们把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我们知道他做的每一件事情。由于美国人不能公开地到这里来，这英国人不但服务于英国，也服务于美国。美国和国民党是紧密合作的，同样，英国也正帮助着国民党。”

他改变了干巴巴的讲话方式，提高声音继续说：“1962年，当斯科特第二次来上海时，国民党正准备反攻大陆，斯科特选定与你建立联系，是因为你与国民党有关系。”

“胡说！我与国民党从来没有关系。”

“你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你的阶级出身决定了你是赞同国民党的。我们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是洞察一切的望远镜和显微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我们能透过表面现象而把握事物的本质。”

我知道，1962年北京的官方宣传机构正宣传国民党欲反攻大陆，但我从来自国外的报刊杂志上没有发现有台湾已作军事准备的消息。我相信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是不会反攻大陆的。在1962年，美国未必允许作这样的冒险。可是那个时候在上海，我经常听到中国军队调动和面临台湾的福建省军事人员家属撤离的消息。不少人相信毛泽东已部署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而不是相反。我在上海听到的流言是，只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导致经济的崩溃和共产党领导集团内的纠纷，逼迫毛泽东把他的计划搁置了起来。

当我回顾那时是否有外国使团的人，包括斯科特在内向我询问台湾的情况时，我陷入了沉思。提审员正密切地注视着我，但他并不理解我为什么沉思。他打断我的思维说：“你坦白不坦白，我们已经有了你与斯科特会话的全部记录。”

“若是那样，你一定知道我们的会话从不涉及政治。”我说。

“你是明显地不准备马上坦白了，你需要时间去思考和回忆，我们也认为这样能坦白彻底。我们将给足够的时间为充分和老实的坦白作准备。你必须记住，从今以后你再想回避问题是徒劳的。现在，我们谈关于女间谍奥斯汀的事情，讲一讲你与她的来往。”

“你知道，奥斯汀太太是一个商人的妻子，我与她的接触纯粹是社交关系，我们一起打过桥牌，一起进过餐。”

“你介绍她与一个前国民党军官联系！”

“什么！他是谁？”我真的激动起来，显得十分惊奇。提审员正注视着我，显得轻松、随便。

“你带进奥斯汀房间的那个中国中医师，在开业行医之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

“我对他的背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他是一名非常好的中医师。奥斯汀太太信任我，她为没有孩子而担忧。她请欧洲医生看过，生理器官上并没有发现什么毛病。我为她惋惜，为她请教了医生，或许中医能帮助她。由于他说没有直接见到她难以确诊，我就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从医生那里你是很容易得到确认的。”

“红卫兵对他采取革命行动后不久，他自杀了。”

他因为与一个英国间谍有过接触，红卫兵就拷打他？天哪，我为什么要把他介绍给奥斯汀？我没能充分意识到在毛的中国生活的复杂性，我是多么愚蠢呵？只因对别人富有同情心和善良的意愿，却反而招来麻烦，正如中国的谚语所说的：“多做多麻烦，少做少麻烦，什么也别做，你就是个好公民。”我为什么不留心他人的经验？这个可怜人的死使我深感悲伤。

“除了带那个医生去看奥斯汀之外，你还和她一起到北京旅游，你们在北京干了什么，又见到了谁？”

“1959年，在北京的明朝皇帝的陵墓重新开放，1960年我去参观过。和外国人一起旅游，我能住较好的旅馆，而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去旅游时，我只能住三等客房。因此我和奥斯汀太太以及其他英国妇女朋友一起去了，对她们来说，有我和她们在一起也是便利的，因为我熟悉北京，

童年时代在那里生活过，我又能讲外语。”

“在北京，你什么人都向她介绍？”

“不，在北京我自己也不认识很多人。”

“你的弟弟是干什么的？我们知道他到旅馆来看过你。”

“我弟弟来的那天，两位英国夫人去卧佛寺了，我没去，我弟弟并不想见到她们。”

我的身后响起轻微的声音，象过去一样，提审员的目光从我肩膀上扫过去，然后看了看表。他与作记录的男子低语几句后对我说：“你可以回牢室去了，我们再叫你来时，将和你谈你为雇用你的公司所干的肮脏勾当，你们的办事处又为什么要雇用一个是苏联间谍的白俄女人为秘书。我想，你难以否认你已卷入你受雇商行的事情。”

在短暂的停顿之后，他继续道：“仔细考虑你与斯科特的关系，记住，我们已经知道他利用你收集情报，你对他讲了什么我们全知道。”

“我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能受他的利用？”

“可是，我们注意到他来上海看你，要么在你去香港之前，要么在你回来以后，如果他认为不值得是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看守打开了审讯室的门，提审员要我走。我意识到那个在小窗外听的男子走了以后，提审员没兴趣继续审讯了。

回到牢室后，看守仍连续不断地观察我。我内心很忧

虑，因为我感到那个可怜医生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希望我从未遇见过斯科特和奥斯汀。他们真是英国间谍吗？即使他们是，也不能成为我被关进监狱的理由。在上海的外国使馆人员和在外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受到家里的保姆、办公室里其他中国职员持续不断的监视。在公共场所，不仅始终有警察和穿着军服的哨兵，而且有衣着简陋的工人和积极分子，他们热衷于向警察报告任何异常情况。在世界其他城市能个人独处而不受干扰，在上海是不可能的。假如人民政府已经怀疑我与斯科特和奥斯汀之间的关系，那么上海的警察早已在几年前对我采取措施了，只是我还不知道这异常的情况。提审员在审查了我外国朋友的全部经历后宣布他们都是秘密间谍，这似乎是相当可能的。斯科特和奥斯汀是首先用来吓唬我的两个名字。我必须注意我的每一步，避免陷得更深。

自从我被关进第一看守所以来，我总是想知道我为什么遭逮捕。这是最使我迷惑不解的问题。谁是逮捕我的幕后人？他们是真的怀疑我已犯了罪，还是仅仅想通过吓唬我而向他们提供伪供？惠妮好象说过，由于壳牌石油公司关闭了在上海的办事处，这回要轮到受惩罚了，她说得对吗？

当我坐在牢室想着与提审员遭遇时，我无法回忆起那些我曾听到的对无辜男女判决监禁和劳改的所有案例。此刻，我自我振作的勇气没有了，真的有点被吓唬住了，我并不害怕把罪犯的罪名强加于我，而是担心为我自己辩护的能力不够。

傍晚，在每天祈祷的那段安静的时间里，我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提审员那严厉的声音还萦绕在耳边，干扰着我。我深感受屈和不愉快，就象上帝避而不睬我一样的难受。

入夜，自我入狱这么多天来我第一次做了恶梦。梦中，我站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咆哮的波涛越涨越高，把我卷走了，我陷于一片漆黑之中，彻底的孤独和恐惧使我发呆。

我本能地把被子蒙在脸上，因窒息而恐怖地喊叫起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电灯正照着我，我的眼罩已经掉到了地上，恐惧和忧虑使我觉得很冷。我记得看守常常眼睛盯着观察孔站在门外，罪犯只要稍有坐立不安，她就会干预，而这时她不在。楼上牢室门沉重的插销声告诉我，她那时在那里，把一个新入狱的罪犯关进牢室。

第七章 一月革命和军管

我等待着提审员再次传唤我，可是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也没有。从看守们在走廊里冲进冲出一片混乱的样子，我感觉到了一种紧张的气氛。我相信，监狱外肯定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通常，我总是站在门边，希望能听到看守们在走廊另一头的小房间里谈些什么，但现在我能辨别出的只是不寻常的、刺激人的高调话语。有时他们似乎在争论一些事情，而在其他一些时间他们的声音低得象耳语几乎听不见。即使监狱象死一样的寂静，我还是弄不明白他们交谈些什么。我无法想象我现实面临的威胁是什么。

十二月初，我第一次受审后不久，看守停止了每天给我送报。报纸在监狱里被认为是对囚犯进行灌输的重要材料。看守们也总是要我们仔细阅读报纸，而现在不给看了，这是非常奇怪的。等了几天后，我问了这件事。起先，看守不理我，当我再一次询问时，看守只是不耐烦地说：“你不知道正发生着一场革命？”

十二月中旬，冬天确实来了。阵阵刺骨的北风挟着冰雹向这个城市袭来，气温天天下降直到摄氏零度左右。我

塞入窗门缝隙堵风用的手纸折成的窄条经常被吹落到地上。尽管我已经穿上了毛线衫和夹上衣，但我的牙齿随着身体一阵阵痉挛直打战。在冰冷的囚室里，我呼出的气体顷刻变成团团白雾，我不得不跺脚和擦手以促进脚趾和手指的血脉流通。当看守唤犯人们作好室外运动的准备时，我想，他们也一定为在这样的冷天不得不离开火炉而怨恨。

尽管室外有风，与在潮湿的囚室里相比，只是稍暖一点，而且散步能增进我的血液循环，但大风把灰沙卷入空中，以致在室外时几乎睁不开眼睛。

突然，我看到所有的看守冲出岗亭，（这岗亭竖在站台上，在这之前他们在那里正监视着我们）疾步匆匆，很快就看不见了。这时，从街道传来的声音越来越响，就象有几千暴徒正冲入看守所一样。在岗亭里俯视着各放风院子的士兵，僵硬地举着步枪，朝监狱门口的方向伸着脖子，但没有离开他的哨位。一个邻近放风院子的女犯人，用一种激动的、足以使所有犯人都能听到的声音说：“这可能是红卫兵想援救他们被市政府关押的同志！”

即刻间，从某一放风院子里响起了一个年青姑娘的声音：“让我出去！让我出去！我是一个红卫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她一边急迫地恳求获得自由，一边用拳头在放风院子的重门上敲打。看守所门口的骚乱持续着，直到我们听到枪声，那可能是守卫看守所的士兵开的枪。我们能听到暴徒们撤退的声音。过了一会儿，看守们回来让犯人们到院子里去。很明显，红卫兵对看守所的突然袭击使得看守们相当震惊。当看守打开我的放风院子的锁时，似

乎相当温和，并不象平常那样喊“出来”，而是在门边等我走出来。

在那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看守们的行为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他们玩忽职守，经常不在岗位上。在某些时候往往连续几小时不见他们的影子，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值得庆幸的是，来自厨房的妇女继续为犯人供应食品和开水，那劳动改造的姑娘仍象通常一样为犯人们送冷水。轮到看守们值班时，他们聚集在小屋里，激动地展开着讨论。从我偶然听到的词句中，我断定他们正被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也能加入日益壮大的造反派队伍，他们正在建立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看守们放松了看管，对犯人们来说就象心头搬掉了一块重物。有时，我听到同监犯人的说话声超过了平时正常的交谈声，我甚至听到了格格的笑声。

自从十二月二日报纸停止送来时，我就开始在墙上轻轻地划痕以标记一天天的日子。当我已在墙上划了二十三划时，我知道到了圣诞节。虽然通常上床的时间已经过了，值班看守还不唤犯人们睡觉。当我正在难熬的寒冷中等待时，突然，我听到来自楼上某处年轻女高音的唱歌声，这歌声起初象是试探性的，后来越来越大胆，这歌名中国人译作“寂静的夜晚”。她那清晰、悦耳的歌声传入黑暗的走廊，在监狱的四壁回响。听到她的歌声，我十分欣喜并被深深地感动了。从她演唱这首歌的那天起，我知道她是一个惹怒了毛分子的专业歌唱演员。在那片刻，尽管我是坐在冰冷的囚室里听一个我看不到的犯人唱“寂静的夜晚”，与任

何一年圣诞节我出席的音乐会相比，我都得到了更多的满足。一旦确准看守们不在，不会来阻止，这姑娘就唱得很优美，没有丝毫神经紧张的痕迹。监狱变得很静，监狱里所有犯人都屏息听着她的歌声。

当她歌声的最后一个音符还在天空回响时，水泥地上响起了看守的脚步声。他们从一个囚室到另一个囚室催促着问：“是谁？”“谁在唱歌？”“谁在破坏狱规？”没有一个犯人回答。

元旦后几天，走廊里的扩音器打开了，所有的犯人被要求静坐着听一项重要的通告。一个男子的声音读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通告。

它声明红卫兵和城市的革命派，经北京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批准已采取行动，于一月四日夺取了上海的政权，推翻了“反革命”的市委和市政府。市委和市政府长期“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方针，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追随修正主义路线”。

后来的报纸文章中揭露了这样的事实，这次突然事件的“英雄”以前是一名纺织厂的保卫干部，叫王洪文，他成功地把全市的群众革命组织统一成一个组织，称之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则是这个组织的领袖。王的靠山是张春桥，他长期勾结毛的夫人江青，是北京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在上海的代表。最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左翼作家姚文元结成了死党，即臭名昭彰的“四人帮”。

只要不是阶级敌人，任何人都能参加一个革命组织，成为一个革命派。这些组织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赞同毛

分子的积极分子手中。

这人也读了国务院的一个文件，文件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但强调工人们不要放松生产。这个国务院文件是总理办公室签发的，给了毛分子激进派空前的革命行动一件合法的外衣，周恩来总理支持和赞同造反派令我震惊。我绝不相信他真的会同意他们的行动。可是，我认为他关于不要放松生产的告诫，至少是在狂热气氛中为大家注入了一帖清醒剂。直到我出狱后，我才知道周恩来当时正承受着激进派的巨大压力，他们一直企图把他从总理的职位上驱逐出去。只有通过熟练和巧妙地把握形势，始终使自己的行为与毛的计划相一致，才能使他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以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

听了突然事件的通告后几天，看守递给我一张上海《解放日报》，它在新的革命出版者的主持下复刊了。在套红通栏标题下，宣布红卫兵和革命派已接管了报纸。自去年十二月二日以来，经过持续的斗争，终于成为推翻市政府的一个序幕。

仔细地读着报纸的新闻和报导，我了解到，对造反派来说决定性的胜利只是两名市政府的高级官员已被说服转而对造反派效忠。在一个控诉前市委书记和市长的群众大会上，对着长时间高声欢呼和喝彩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二个叛徒急于得到毛分子的认可当众打他们以前同事的巴掌，以表示他们坚定地站在毛这一边。（马天水和徐景贤这两个官员，是四人帮统治上海的代表，直到毛逝世和四人帮同时被捕。1982年，他们两人因受四人帮的指使所

犯的罪行包括谋杀罪被判长期监禁。不久，马天水发疯了。）

由于上海市政府被激进派推翻了，我那迅速解除困境的希望也破灭了。我意识到我的情况必须等上海新政府所有部门包括公安局改组之后，因为第一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尤其当新的掌权者遇到公开和隐蔽的抵抗时，更是这样。我也想，上海新政府要平稳地生存下去，取决于造反派能否迅速地接管我国的其他地方。但从大量痛斥中国其他城市官员的文章中，我能想象在其他地方造反派和红卫兵遭到了比在上海更有力的抵抗。

1967年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支持左派的号召。它也包括毛说过的一段语录，即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个军事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从这样的说法中我明显地意识到，在中国其它地方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无法接管很多的地方政府的。但是，军事干涉并不能立刻产生预期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面对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哪些是由毛主义积极分子领导的，哪些是由毛泽东希望打倒的党的官员领导的，军队不能很好地区分，因为两方面都声称忠于毛的路线。而且，许多军队领导又是地方的行政官员，诸如西藏和新疆。那些兼职于地方的军队领导人，他们声明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就把枪口转而对准红卫兵和造反派。激烈斗争的结果是更多的流血。在许多地区，各种自称左派的造反派袭击军队的兵工厂时，军队盲目地采取行动而导致犯

很大的政治错误。可是，当混乱平息时，在国家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情况是，能得到军队帮助的某一方造反派夺取了政权。

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夺权中，由于军队的支持起了极明显的作用。因此军队的主要指挥员国防部长林彪的威信大大提高。他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大量见诸于出版物。这是确确实实抬高他的地位的预兆。他被认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这一句话把他的地位提高到党的领导层中的第二位，仅次于毛。周总理在一些场合和新闻照片上，在林彪之后，处于第三位。林彪及时清洗军队司令部中他可能的对手，在关键职位上安插他的挚友。报纸对成功地揭露了一群前军队最高司令部中的反毛将领作了报导。总参谋长，海军、空军司令，和军队后勤部长的职务，都已换了一批新人的名字。由造反派控制的出版部门对这一变化在出版物上向林彪致以衷心的祝贺。

在上海，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一个一个地接管城市的其他机构。每天报纸披露的事实，不仅有他们不得不与强烈的反抗和捣乱作斗争，他们想以此达到接管和替代的目的，而且有他们自己为争夺一官半职而分裂成派别的冲突。在城市的每一地区还在发生着战斗。各机构的控制权频繁地交替。城市处于连续不断地动乱之中。暴徒们的呼喊声从街道传入我的囚室。在放风院子里，我能清楚地听到广播喇叭里的互相斥责声。从暴徒狂怒的声音中，我想象得出死亡和毁灭的可怕情景，我也更为我女儿的安全担忧。

面对动乱和流血，造反派头头们似乎并不想控制它，而是助长它。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题为“我们的手被敌人的血弄脏，这是一种荣誉”的文章。另一天，报纸上出现了一条林彪的指示：“在所有的革命中，伤亡总是难免的，因此，我们不必夸大形势的严重性。在这次革命中，有不少人自杀或被杀死了，但与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甚至遭受自然灾害期间所蒙受的伤亡人数相比，这些伤亡还是比较少的。因而，我们得到的比失去的大得多。”这些无情的话语使我为女儿的安全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了。

在我又拒绝进食的一天傍晚，一个看守来到了小窗边，并打开了它。

“你怎么了？病了？”她问我。

“我为我女儿担忧。能带她来这里和我一起留在这囚室里吗？”

“不行！她没有犯罪，为什么要监禁在监狱里？”看守答道。

“我也没有犯罪，我却要监禁在监狱里。”我告诉她。

“我没有时间与你辩论这件事，你到底是不是犯了罪，我不知道。事实上，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我也知道得不多。但因为你已经在这里了，你只好等待。某一天会有人处理你的问题的。你的生活并不贫困，每晚能睡足八小时，又有饭吃。我们下班后还得开会，也不能睡足八小时。”她砰的一声关上了小窗走了。

看守的行为使我惊讶。一个看守作为一个普通人向我

透露她内心的秘密，这是第一次。她一定是情绪很坏，在发脾气。我断定是共产党领导层内的斗争挫伤了看守们的积极性。既然已被选择在监狱这样敏感的岗位上当看守，他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党和党的领导。当他们了解到，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他们的许多上级官员并不比普通人和他们中一些在中国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工作的人更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对理想的信念如果不是完全破灭，也必定是十分沮丧。他们对他们的工作失去了兴趣。当看守不在时，监狱里充满了犯人们的叫声、喊声、相互打斗和敲击地板的声音，监狱渐渐地演变成一个十分杂乱的场所。一天晚上，我被一种低沉的笑声吵醒了，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声音来自走廊阴暗处的另一单人囚室。如果说是值班看守的话，她也并不尽力阻止这个犯人。

我开始更密切观察看守，并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我注意到几个戴着红袖章较年轻的造反派出现时，许多看守看上去显得不愉快和小心翼翼。这些较年轻的看守装模作样地来，十分傲慢地去，一副专横跋扈的神态。他们摆出掌权者的样子，不仅大声命令犯人，而且对其他看守也用一种指挥的口气说话。

1967年，当上海处于混乱之中时，第一看守所的管理也渐渐地溃散了。到了秋天，看守分裂成对立的派别，在他们自己中展开了斗争。当允许犯人在门外运动时，我看见他们内战的标语涂写在墙上甚至铺在庭院的人行道上。在囚室里，我经常能听到女监看守们熟悉的声音，她们叫喊着与另一种声音辩论。我甚至还不止一次地听到在

一起扭打的声音。争论点似乎是毛泽东的政策是什么，在官员中谁是该打倒的“走资派”。

看守的责任经常落到了监狱的行政人员和提审员身上，因为他们被称作“知识分子”，造反派组织拒绝接纳他们。在文化革命期间，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不是党员，都被斥责为“臭老九”。其他八类敌人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第九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包括有社会地位的教授、研究员，也包括学校教员、技术员和行政干部。“臭”这个字作为一个中国俗语，也意味着“狂妄自大”，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掌握了卓越的知识和技术的人，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他们的名誉、地位受到社会的尊重，造反派称他们为“臭老九”，是显示对知识分子和中国尊敬知识分子传统的藐视。

我在看守所的第二个冬天刚来到时，得了重感冒，虽然年轻的狱医给了我阿司匹灵片，但一直未能根治。当感冒转为支气管炎时，我的身体会随一阵阵咳嗽而颤抖，特别在晚上囚室变得极度寒冷的那些日子，更是这样。一天晚上，我穿上二件毛线衫和一双长袜用被子全身裹着躺着取暖，仍不能控制持续的颤抖。半夜以后，监狱早已寂静了，在这冰冷的囚室里，不管我采用什么姿势躺在这简陋的床上，咳嗽和喷嚏始终不停。为了减少我喉咙的刺激，我喝了一些杯子里的水。冰冷的水却使我的喉咙更难受了，我只得用被子蒙住头来捂住咳嗽的声音，想用被子的温暖使我的咳嗽缓和一点。

我听到小窗被打开了。这声音与通常看守猛击窗的声音不同。然后我听到一个男子的温和的声音：“到这里来！”

我从床上起来，穿好裤子，把棉衣披在肩上，想知道深夜那男子会要我干什么。当我走到小窗旁向外看时，我感到惊讶，我以前的提审员手里提着一个热水瓶站在那里。

“你有杯子吗？传出来。”他说。

我把杯子递出窗子，他在杯子里倒了一些热水。

我等待他继续审讯已经一年多了，这一次也许是问他的好机会，因而在阵阵咳嗽的间歇我说：“你们准备在什么时候搞清楚我的案件？”

一阵犹豫以后，他说：“造反派准备好时，他们会唤你的。在现在的成败关头有更重要事情要做，你一定要有耐心，现在喝热开水吧，这会使咳嗽好一些。明天向医生报告，他会给你一些内服药片的。”

他好象在表白，他不再处理我的案件了。我想知道，他是否还认为我有罪，还是始终认为我确实有罪。我突然想到，当他知道一个人是无罪的但又必须去搜寻这个人的罪行并把这作为他的工作时，作为一个提审员他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我很快喝了热开水，正好又是一阵咳嗽，这些水都呛了出来。

“不要紧，不要紧！我会多给你一些热开水的。”那提审员又打开了小窗。和他在一起值班的还有另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子。他称这男子叫梁所长。

“我能借一个拖把擦地板吗？”我在咳嗽稍停的间歇问

道。

“你可以明天再擦。地上脏了吗？除了水还有什么脏东西？”梁所长问。

我俯视着地上，确实，从我嘴里喷出的仅仅是水而已，且已经被水泥地吸干了。梁所长一定是个很出色的干部，他知道一个犯人的胃里常常是空空如也。在红卫兵和造反派将他降职当值班看守之前，他毕竟是第一看守所的所长。

他们俩一直站在那里，直到我又喝了一些水，然后他们关上小窗走了。

我回到床上并思忖：文化革命必然会产生一些奇怪的现象，看守所的所长和提审员从他们自己的热水瓶中倒热水给犯人喝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人道的行为是同他们的信条直接相抵触的，提审员曾告诉我，第一看守所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也许，当红卫兵和造反派扩大他们革命行动的范围时，他们正疏远着可能的拥护者，把知识分子推向敌人的阵营。

第二天上午，医生给了我一些磺胺嘧啶片。但在晚上，当囚室变得不堪忍受的寒冷时，我咳醒后就一直睡不着觉。那天半夜二、三点钟，我听见门外悄悄的谈话声。那晚是过去审问过我的一个女提审员担任值班看守。她给了我安眠药并要我睡觉。现在我听到了她与关在我对面囚室里的妇女交谈的声音。虽然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监狱很静，我还是能听到她们交谈的要点。我震惊地发现，那关在囚室里的妇女是一名公安局的官员，是提审员

以前在公安干部学院时的学友。她们正谈论着在毛的妻子江青号召红卫兵和造反派“砸烂公、检、法机构”之后，上海公安局机关内的激烈斗争，她们说，一些人跳了楼，另一些被打死，还有一些人被送进了医院……显然，公安局处于混乱和一点不能发挥作用的境况之中。

听了她们的交谈以后，我断定由于党内毛派分子为了生存，斗争更加隐蔽和你死我活。文化革命会是一个长期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受到毛和军队的支持，激进派似乎打赢了。但除非把遭罢免的干部都杀死，这是不可能的。否则这些干部一定会等待机会卷土重来。与此同时，他们会尽其所能，来搞乱激进派的每一步行动。我认为形势是极端的错综复杂，在今后一个非常长的时间里，必定仍然是动荡不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犯人们正准备上床，值班看守又来告诉各囚室的犯人，安静地坐着听广播。通过高音喇叭一个男子的声音宣布，第一看守所已经被军队接管了。

“所有的犯人注意了！革命形势大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真正拥护者，已经排除一切障碍，推翻了这个城市的反动的市政府！我们现在接管整个国家，将继续消灭所有的敌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我们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我们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有人说我们制造了动乱，动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

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用动乱来搞乱敌人是不会错的。有人说我们杀死了太多的人，胡说！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我们只杀了很少的人。事实上，我们杀的人太少了。还有一些敌人潜伏在阴暗的角落。不要低估我们的决心或轻视我们消灭敌人的能力，我们是造反派！我们不怕动乱和流血，这是革命的正常结果，这只能使我们自己受到鼓舞，而使敌人胆颤心惊。我们甚至不怕天塌下来，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会把它再支撑起来的。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对我们说过：‘砸烂公、检、法机构’，我们已经行动了！上海公安局及其所有从属机构现在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这个看守所以前被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所把持，这里的犯人受到如此好的待遇是荒谬的。你们一天吃三顿饭，生活比贫下中农还过得好。这证明公安局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在贫下中农和反革命分子之间，更爱反革命分子。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反革命分子。从现在起为了节约粮食，你们的口粮将削减，你们不劳动，一天吃两顿足够了。你们与其吃米饭，不如吃甘薯和其他粮食，你们不会饿死。但如果你们饿死了，革命是不会遭受损失的，在中国有的是人，我们是不会怜悯几个反革命分子的！”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但其中一些人一直还没有坦白。你们希望从网中滑出去，这纯粹是异想天开，如果不坦白，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会毫不留情地碾碎你们，这是对你们所有人的一个警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

严，检举立功者受奖。’今晚，我们就要在这里处理一批重大案件，以体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策。”

片刻的沉默之后，他一个一个地念着那些由于没有坦白罪行而被判处死刑的囚犯的名字。他逐个介绍了他们的年龄、住址、职业和“反动的”家庭出身，宣布他们所犯的罪行，并都归结为“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罪行只不过是公开声明反对文化革命，贬低江青、林彪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讲话。然后，那男子提高嗓门喊道：“押下去，立即执行！”

他的声音简直是一种残酷无情的咆哮，丝毫没有人性。想到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种人的手中，我不禁感到悚然。

被处决囚犯的名单一个个念完后，紧接着的是判决终身监禁、监禁二十五年或更长年份的名单，所有“严惩”的案例是做给那些不全部坦白或坦白不适当、不真实的囚犯看的。最后，他念了给予“从宽”处理的名单，因为这些男女囚犯不仅坦白了，而且还因检举别人而立功受奖。一个妇女由于检举了其他几个阴谋逃往香港的人而被立即释放。另一些检举者则判处三至五年徒刑。

扩音器被关掉后，那男子威胁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震惊的事情。想到这个人现在主宰着第一看守所，和我的命运，使我不寒而栗。那天晚上结冰了，天似乎更冷了。当我等待看守叫我去上床时，我的身子一阵阵地颤抖。我想，其他犯人大概也是又怕又冻，无论什么地方都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走廊尽头的门传来砰的一声响，我听到回响在走廊里

的皮靴声，沿走廊排列的囚室的一扇扇的小窗打开又关上了，有人在叫：“你怎么样？”“你已经坦白了？”“你什么都交代了？”沉重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为可能有不愉快的遭遇而紧张。脚步声在我的囚室外停住了，关闭的小窗被打开了。我听到刷刷作响的纸张声，一个男看守在说：“就是这一间。”

“出来！”男看守比平时更严厉地吆喝着，或许想给军管的军官留下印象。

通过打开的小窗，我只能看见一双黑皮靴和穿制服的空军军官的下半身，见不到他的脸或头。但在我的头脑里描画出一张“满脸横肉”的反面人物的面孔。我们相信一个人的面孔能反映他所过的生活，一个有恶意的人，他的脸往往布满不善的“满脸横肉”。不知怎么的，想到这些，我勇气倍增，无论他说什么，我都能应付。

“你为什么 not 坦白？”这声音就象从广播里听到的一样。

“我没有犯任何罪，我怎么坦白？”我重复着。

“胡说！你是一个英帝国主义的间谍，你想要被枪毙吗？”

“我盼望看守所的新领导在调查事实和发现我无罪后释放我。”

“你在梦想！你以为我们是傻瓜？如果你不坦白，你就永远不会被释放！你没听说其他一些没有坦白的人的情况吗？他们死了。”他激动地叫道，“死了！你听说吗？”然后他对看守说了一些话，看守拿出他的一串钥匙开了门。

“出来！”看守叫道。

我走出囚室，不知道穿空军制服的人会对我做什么，在朝门口方向的过道上，他已经走了一段路。我跟在看守的后面，就在我们跨步前，忽然听到头上轰的一声响，楼上一片混乱，几种声音在呼叫：“报告！报告！”另一些人在喊：“快来！她出血了！”

从另一方向传来低沉而歇斯底里的笑声，转而变为尖锐刺耳的叫喊。昏暗的光线下，过道里一片阴影呈现出阴森恐怖的样子。那男看守突然停下，把我推进牢房，哐的一声上了锁，就快步跑上楼去。

我听见几个看守跑到我上面囚室脚步声。“把她带出来！”那个空军军官的声音在上面叫喊：“你胆敢以自杀威胁无产阶级专政！你以为把头撞在水泥便坑上就能逃脱交代？你的行为就证明你是有罪的，你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接着，传来一位姑娘的哭泣声和含糊的话语，继而被一群人声所淹没，之后是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一个女看守走来，命令所有的人去睡觉。当她来到我囚室前时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站着？”

“我在等候提审，”我答道。

“不审了，睡觉！”她说。

看来在头顶上面发生的这场动乱中，我被忘却了。我想知道的是，如果楼上那位姑娘不选择在那时，把头撞向水泥便坑，等待着我的会是怎么不幸的命运。尽管她所使用的方式并不能完全摆脱对她的迫害，但是却表明在听了广播后，她的心情是多么绝望。事实上，在第一看守所里，企图自杀是很少成功的。我听说实际上自杀成功的只

有一个人，他是上海市副市长的儿子，一位年轻而富有才干的外科医生，姓宋。据说他是用力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然后扎入自己的动脉。这情况在毛去世以后才透露出来，是一帮造反派把这位年轻医生投入这个看守所的，并严刑拷打，逼迫他揭发他父亲。

第二天，直到上午犯人们才得到食物，干饭和水煮卷心菜。下午，从小窗中推进了一份煮山芋，以后的日子里就被用水煮的发了霉的山芋干代替了。自从我发觉要吃下这种食物并且消化是不可能的以后，在那些日子里，我唯有用这顿早中饭来填饱肚子了。过了一段时间，人便处于一种永久的饥饿状态，唯一的感受是腹中空空，我的身体渐渐消瘦了，视力也退化了，象洗衣服那样简单的劳动也会耗尽我的体力。

一些看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戴着造反派袖章的新看守。清晨、中午、晚上，我都听见他们彼此高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并朗诵毛的语录。报纸的报道把这一项所有中国人都目睹的新仪式称为：“早请示、午对照（即以毛主席的教导对照自己的行为）、晚汇报。”显然，每个人都得在毛的标准像前进行这一形式。所谓早请示是读几段小红书里的语录；午对照是重复读书里同样的段落；晚汇报也还是看那本书里的东西。简而言之，除了婴儿以外，每一个中国人都得这样每天三次读毛的语录书。报纸曾发表文章讨论：当一个人星期日单独在家时，是否也应该那样。结论是：一个人不应忽视进行这一仪式，即使在他生病躺在床上时。对我们来说所幸的是，这种荒谬、

愚蠢的活动仅仅是那些经审核过的“群众”的特权，而不允许在狱中的阶级敌人享受。

军管恢复了秩序。看守之间不再有殴斗或争吵发生，他们准时来接班。但是，军管也产生了一种令人心寒的气氛。看守们不再象以前那样彼此谈笑。如果一个看守单独与犯人们处在一起，他或她似乎显得比较轻松。但是，一旦两个看守一起值班时，他们倒象是处于戒备之中。似乎彼此都害怕别人会把自己的行为汇报给军管当局一样。

除了改变了犯人们的开饭时间外，还有一些新的安排。每天早晨，所有的犯人都要收听广播，首先听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紧接着是上海广播电台，常常还通过广播喇叭对犯人们进行训话。在这种时候，会宣读一系列受到“宽大处理”和遭到“严厉惩罚”的人名单，用以促使我们其余的人坦白。每逢广播喇叭开着时，看守们就在囚室外走来走去，以确认犯人们是否正在收听。

在我囚室门外刚巧有一只广播喇叭，喧闹声震耳欲聋。在看守监视时，我无法用手捂耳挡住噪声。又轮到了一个星期日，我请求给我一把剪刀，剪碎了一条小布条，用破碎的纤维揉捏成两个小球作为耳塞，在有广播时使用。虽然耳塞无法完全阻止那噪声，但可以减弱到可以容忍的程度。

我不时被唤到审讯室，接受好斗的看守们的特殊训话和审问，那些人似乎博得了军管当局的信任。我注意到，接受这类待遇的仅是一些经过选择的犯人。我无法知道我是否属于那些最令人痛恨的阶级敌人，或者是最负隅顽抗

的人。看守们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辱骂我，称我是“劳动人民的卑鄙的剥削者”，或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攻击我的家庭出身，我与壳牌公司的关系，攻击我“抗拒再教育”，不愿意坦白自己的“罪行”。他们连珠炮似地发问，却根本不等我作出任何回答。他们告诉我，不久我就要被枪毙，我将在这个看守所里度过有限的余生。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一旦我走进审讯室，看守们就会喋喋不休地发问，而我除了听之外，根本无需作任何事，在几次类似的程序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他们之所以如此表演，唯一的目的是把自己标榜为真诚的造反派，而我被弄到那里仅仅是作为他们表演所必需的一件舞台道具而已。我敢断定，由于处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怀疑一切的气氛，当久经考验的党的领导人突然间被作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暗藏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而遭到谴责时，我可以断言即使是这些表面上非常自信的部队看守们也整日感到惴惴不安。

一天，犯人们被允许外出活动。当我走出女监房大门时，看见前所长梁和其他几个男子正在掘花坛。这场面并没有使我感到有多少惊奇，因为在这以前，我在报上读到过一篇报导，说是毛讲过鲜花和观赏性植物会软化人的斗志，削弱群众的革命精神。该报导还说，在前皇宫——中南海，毛的私人花园里仅生长着一些苹果树和向日葵，那是由于它们有实用经济价值。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对毛的个人崇拜是如此狂热，以致他讲的每一句话，无论是多么无关紧要，都会被乐意运用和贯彻。相反，凡

毛未曾指示的事则一概不能去做。

在远处，我看见其他男女在洗刷车道和把一桶桶的水提到厨房。从他们的外表及干活的笨拙样子，我知道他们是一些象梁所长那样在看守所里的知识分子，正在接受劳动改造。毛说过，人的知识愈多，就会变得愈反动，除非他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来洗刷自己。

数年以后我才听到，在文化革命期间，成千上万的男女被勒令放弃他们在城市的工作，去农村定居，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那些允许留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则被指定在其单位里干普通工人的活，那里的情况是，医院里的医生刷便盆，大学里的教授扫厕所，艺术家和音乐家则去砌砖和修马路。他们一边干这些活，一边还得参加以坦白自己的“罪行”来进行自我污辱的斗争会和政治轮训班。的确，在文化革命期间，毛对知识分子的污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忍地步，这完全破坏了中国传统上对学术知识的尊敬。那时，无论在中国何处，凡被发现不读毛选四卷而读其他书的人，要冒着被加上反毛罪名的风险。

我来到放风的院子里，看守要我用手拔去地上的草。由于时值冬季，只有向阳面的墙角处一小块地上长着草，但是地冻得硬邦邦的，不用工具去除草是一件慢活。当那个看守转回来时，他踢了一下我脚旁拔下的草，吼道：“这就是你干的？你可没把草根挖出来。”

“我实在无法挖掉这些草根。”

“你~~有~~两只手，用手指就能拔掉这些草根，你可真够懒的！”他又朝那些草飞起一脚，弄得草四处飞扬。

当我站起来时，眼睛一阵发黑，感到头晕眼花，可我还是竭力控制自己摇晃的身体，跟着看守返回囚室。

走廊里有两个卫兵，我的囚室的门敞开着，我看见一个部队的女看守正翻查我的物品。我的被单、被子、毯子已散落在肮脏的地上。她正把我帆布袋里的其他物品兜底翻出。瞧见我时，就猛地一把抓住我棉袄的前襟，粗鲁地拉进囚室。

“把棉袄的钮扣解开，”她喊道。我一解开，她便一把从我背后扯下棉袄，扔在地上。她用手推着我的双肩，把我推到囚室墙角，并把我脸扭向墙壁。我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不住地咳嗽。

“把裤子脱掉！”她查了我的棉袄后又叫了起来。

“请让我先穿上棉袄，再脱去暖和的裤子，我已经得了重感冒。”

“你还是弱不禁风、娇生惯养，监狱的生活怎么对你一点没有用处，是不是？你根本没有一点点改变，我才不相信你把衣裤脱了会冻死，脱下来！”

我在她翻查裤子时，不住地咳嗽和打喷嚏。查完，她把我的衣裤扔在地上，走上来搜身。然后，她站到我床上把糊在墙上的手纸撕下，毫无顾忌地在我床褥上踩来踩去，她用脚把落在地上的眼睛罩移动了一下，便一脚将它踢出囚室，尔后锁上了囚室的门。我听见她去打开隔壁的囚室门，对那儿的犯人吼道：“站过来！”

我拣起棉袄、裤子，穿好后，就不得不坐到床上去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等到剧烈的心跳缓和了一些，才去收

拾散落一地的物品，并尽量把它们拍干净。第二天，米饭送来了，我用了一些作浆糊，又在墙上糊了一张手纸，真是作了一点牺牲哪！现在每一粒米饭对我的生存来说都是十分宝贵的，可要再做一只眼睛罩就只有到星期日借上针线才行。

搜查犯人的囚室成了监狱的日常工作，进行不定期搜查的是那个部队的女看守或一些象她那样的人。于是我在墙上不知糊了多少次手纸，做了多少眼睛罩，甚至每次手纸要用多少饭粒，我都可以算得刚刚好，一粒也不多。

由于一整夜咳嗽和剧烈的头痛而不能入睡，次日，我几乎起不了床，我挣扎着来到窗口，喊了一声：“报告！”

过来开小窗的是一位温和的看守。

“我觉得我病了，我可以看医生吗？”我请求着。

她取来了体温表，放入我口中。几分钟后，她取出看了看，对我说：“你在发烧，体温很高。”她给了我两片阿司匹林，让我多喝些水。我在等着医生，可医生却没有来。在那个看守快要下班时，我再次请求给我找位医生。

犹豫了一会，她说：“医生到农村去劳动接受再教育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允许他回来，也许有人会来替代他。明天再说。要是你感觉不好，现在就可以去睡觉。”说完她又给了我两片阿司匹林。

允许我躺下算是不错了。但我头痛欲裂，伴着一阵阵寒颤，我身体不停地哆嗦，我知道我的体温正在上升。

我听见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两个看守彼此交替呼喊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接着，夜班看守沿着走廊向

我的囚室一头走来，并沿途审视着囚室中的犯人们。她走路轻快，只在每间囚室的观察孔前停一会儿。

“什么？已经躺下啦？你倒知道怎样享福，是吗？起来！还没到睡觉时间。”她一走到我囚室这里就叫喊起来。从她的声音中，我便知道她就是那天中午搜查囚室的看守。

“我病了，那位刚下班的看守叫我睡下的，”我主意已定，除非她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否则就睡在那儿。她没有进来找麻烦。一会儿，我听见她在楼上大声叱责另一名犯人。

第二天，一个年青人来给我看病，我告诉他，我在发烧，而且咳嗽快有两个月了。他诊断道：“你可能得了肝炎，看守所里正在流行肝炎，我会给你验血的。”

对此诊断我大为吃惊。即使没有任何医药专业知识的人也会知道，我这是支气管炎，并可能进一步引起了肺炎，而决不是肝炎。肝炎症状与我的完全不同，这个年青人是什么“医生”？我屈身从开着的小窗口打量着他。看上去他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农村小伙子，顶多只有二十岁。我明白了，他根本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医生，让他干这份工作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必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于是遵循这一教导未受过训练但政治上可靠的工人被派去干技术工作。这个年青人只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毛的指示“在医生的岗位上学习当一名医生”。

那时，在报上有许多这类事件的报导。未受过训练的医院公务员在掌握了毛的教导后，成功地施行了手术。手术期间，急于要证实毛教导魔力的造反派留在手术室，在这种未经训练的“医生”与病人的病作斗争时，重复着小红

书里的语录。然而，毛本人或者其他激进派领导看病除了他们自己的私人医生，却要找那些共产党接管中国以前在西方大学里受过教育的医学专家，这些被驱赶到农村从事繁重劳动的专家，往往很快被专用飞机接到北京。

年轻的“医生”带我进入看守们的房间。房间里很暖和，我停止了颤抖。打开仪器包取出注射器后，他要我脱掉短上衣、卷起袖子，他把针刺进了我的手臂，但没能进入我的静脉。试了几次之后，我的皮下出血了，胳膊异常地痛。他显得很急躁，前额冒出了汗珠，手在发抖。

我为这可怜的家伙无法胜任工作而感到遗憾。我知道，如果我不使他镇静下来，他会使我的胳膊遭受更大的伤害。

“我的静脉非常细，所有医生为我打静脉针都很困难，”我说。试图增加他的自信心，使他的手很快稳定下来。

他似乎是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我一下。我屏住呼吸，他又试了一下，终于探到了静脉，注射完毕。

几天过去了，我发烧仍很厉害，已感觉不到囚室里的阴冷。看守要我躺在床上，劳改姑娘被允许一天进来两次，在看守警戒的目光下，带给我一点流汁和热茶。我长时间地处于半昏迷状态，昏睡中做起了奇怪的梦，我的灵魂仿佛已经超脱，它通过囚室的铁栅窗漂浮着。

一天早晨，那个年青人回来时对我说：“你没有肝炎，但得了结核病，许多犯人都有结核病，穿上衣服，去医院做一次X光检查。”

虽然我相信我不会患结核病，但乐意接受去医院的意

见。

中午，一个女看守打开了囚室门，让我出来，我的身体虚弱，脚步不稳，但她没有吆喝我或推我快走。在看守所门口，一个男看守拿着一副手铐等着。女看守摇了摇头低声说：“病得太厉害。”我不知道那女看守的意思是认为我病得这么厉害不可能在中途逃脱，还是认为我病得这样他们应该给些照顾，好歹，那男看守收起了手铐。

一辆黑色的吉普车停在第二道门里面，女看守和我进入了车子。

与十六个月前的夜晚我被驱车带到这里时的景象相比，看守所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地方现在显得五颜六色，沿着车道的柳树边安置着红色的木板，上面是毛的有关镇压阶级敌人的语录，语录上的大字是用黄漆写的，这木板恰好对着入口处，也许，这样能让那些用车押来看守所的犯人引起恐惧的感觉。战士的营房上有一面用红布做的大旗，上面用白漆写着三句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写着美国总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台湾国民党领导人名字的人物模型，穿着西式服装，绑在插在地上的木杆上。战士们举起刺刀，谴责着他们。当一名军人从别人后面冲向前去，一刀刺进模型时，在场的战士吼叫道：“杀！”

天气阴沉沉的，上海的街道上冷冷落落几乎没有行人。从看守所穿过市区到提篮桥监狱医院的很长的驱车途中，我只看见少数人裹着冬天的棉上衣，迎着呼啸的西北风在人行道上挣扎着。尽管我病得厉害，由于我能较长时

间地看着城市的街道，也能对因文化革命所引起的变化有一个力求仔细的观察机会。不由地，我希望通过观察能对我女儿在新环境下的生活状况得到一种暗示。

到处是毁坏的迹象：烧焦的大楼和损坏了的窗户，连根拔起的灌木和被丢弃的车辆，一些破烂在风中旋转，灰溜溜的、弯着腰的人群在垃圾堆里满怀希望地挖掘着。交通灯停止了操作，口号和语录覆盖了我们经过的每一幢大楼的墙，一些公共汽车和卡车的两边也涂上了口号和语录，有的口号是用粉笔写在人行道上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代替了警察在街上巡逻。一些满载着头戴钢盔、手握铁棒、喊着口号的造反派的卡车在我们面前驶过，也许他们正外出执行镇压对立派的革命行动。画在木板上的、几米高的毛的巨幅肖像竖立在街道旁，这些画像与在其下面瘦弱的、脸色苍白的、懒洋洋的行人形成了可笑的对照。

提篮桥是上海一个地方的名字，那儿设有上海最大的监狱。那时，“提篮桥”三个字被用来表示监狱本身。整个监狱非常大，占了许多亩土地。犯人一般先关押在市里各看守所里，判了刑后再转到这里来，考虑到政治犯去劳改营不合适，因为他们年老多病不堪承担体力劳动，或者他们有些专门的技能可以为监狱办的工场所用，所以在这里的政治犯处境比普通犯人要好些。没有人知道在这庞大的监狱里关着多少人，可以肯定的是，有二万多男女犯人在各种工场里劳动，产品从纽扣到初级计算机都有，其中有些出口到国外市场。

监狱医院设在提篮桥监狱内。我注意到，这里比第一

看守所警戒得更加严密。吉普车要经过两个检查站，在那里要仔细检查证件，才能驶入由许多战士看守的沉重的铁门，来验证的看守腰带上有一把左轮手枪。

监狱看上去非常凄凉，整个地方没有一棵树和其他植物。监狱里有许多工场，传来马达飞速旋转的声音，有一排作审讯和管理用的房屋，上面都醒目地贴着书写的布告和醒目的标语口号，内容是揭露阶级敌人，鼓励悔过自新和努力生产。在远处，高而陡峭的围墙中，座落着六幢大楼，窗子都用黑色的木板挡着。我推测，这些大楼就是囚犯住的地方。

看守带我进入医院大楼，大楼的内墙贴满了口号、语录和有毛的肖像的宣传画。无论谁来做这种宣传工作，都会做得十分虔诚，甚至在玻璃窗格子里也画上了毛的像，也有人在他的像下勾了一颗红心，旁边恭恭敬敬地写着“忠”字。

在监狱医院的候诊室里，虽然没有人被疯狂的野兽吞没，给熊熊的大火烧焦，或者让滚滚的浪涛淹没，但这里仍是一幅地狱的景象。这里是贫穷、痛苦的地狱，人人衣衫褴褛，满脸痛苦和烦闷，只是无望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不论是由于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所造成的，或者是又病又饿，他们好象都已经度过这样的阶段，即医生的医术已不可能使他们痊愈。我听说在提篮桥监狱，死亡率很高，现在目睹的事实，显然使下一次的高死亡统计数直线上升。

除了条凳上坐着一些佝腰屈背的人之外，另外一些人

裹着打补丁的被子躺在停放在水泥地上肮脏的帆布担架上。我右前方的担架上躺着一个秃顶的老人，要不是阵阵痉挛和半张着的口中尚存一丝呼吸，他好象已经死了，深凹的眼睛紧闭着，蜡黄的脸上皮肤绷得很紧。

因为所有的窗都关闭着，房间里充满着消毒剂和人体的腐臭相混合的气味，显得既污蚀又窒闷。我闭上眼睛，不再注视这凄惨的情景。在我按次序等着看医生时，我尽量屏住呼吸。

“1806号！”一位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喊道。护士穿着白色的长大褂，大褂由于穿的时间太久和不断地洗，白色已变成了灰色。

我跟着护士进入了诊室，在那里女看守带我来到一位中年女医生旁边。诊室的中间是一只火炉，上面水壶里的水开了。火炉周围是一些小桌子，桌子后面坐着医生，正在给病人检查。房间里的男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脱衣服，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问答每个人都能听见。那时我想，这种粗鲁的做法也是正常的，因为犯人根本就没有被当作人看待。但是，我释放以后发现，所有上海的医院的服务水平，在文化革命期间都降低到与这差不多的低标准。

当我急于思考如果医生要我脱衣服，我最好怎样回答时，医生给了我一支体温表，我放进了嘴里，她要我做的事对我来说还算是走运的。看了体温表后她对女看守说，“她最好在这里留几天，因为她的体温非常高。病房在十四楼，我想她是走不上去的，最好用担架抬上去。”

“请让我走走看，”我恳求她。这种要我躺在肮脏的担

架上的建议是不能忍受的。

医生的脸有了皱纹，两鬓已经灰白。她温柔的目光是善良的，充满了理解。也许她体会到了我不愿接触肮脏的担架，于是对看守说：“你可以用一下职工使用的电梯，这比等担架要快得多。她病得很厉害，可能是肺炎。”

看守和我去了十四楼的病房。她警告我不要与任何人讨论我的案件，并告诉我等她陪其他生病的犯人再来医院时，从看守所给我带来脸盆和毛巾。然后，她把我交给了一个短上衣上别着劳动改造标记的青年姑娘。几步外站着的一名士兵，正注视着我们。

病房是一个有五张床的小房间，门旁边的两张床已睡了人，我占了最里面靠墙的一张床。中间有两张空床，这样我与另外两个病人就分开了。劳动改造的姑娘要我脱了衣服躺下。

我发着烧和疼痛的身体又一次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了，这是多么好啊！布床单既不白且粗糙，但相当干净，虽然病房里很冷，被子却是厚的。我脱去上衣和裤子，穿着毛线衫和长袜躺下了。劳动改造姑娘拿来了另一条被子，又铺在床上。很快，我就睡着了。

以后几天，我一直神志恍惚，有时我能感到周围一切的存在，但大部分时间在我梦的世界中神游。当我重新又能集中思维时，我发现我的手臂被绑在床上，打着静脉针，连着一根长长的橡皮管一直连接到在我床边高高的架子上挂着的瓶子，我在接受静脉输液，液体通过橡皮管一滴一滴地滴入我的手臂，那个劳动改造的姑娘把一支体温表

放入我嘴里量体温，她发觉我已完全清醒了，就把我手臂松了绑，把针拔出来，将所有器具都拿走了，虽然我神态似乎完全恢复了，我仍觉得软弱无力，昏昏欲睡。

过了一会儿，她给我拿来一碗汤，“喝了它，”她说道。

虽然我的手臂有点僵直，但我还是很稳地拿起碗，从枕头上抬起头，喝着汤，味道很浓，我发觉是一碗豆浆，放了很多糖。由于我很长时间没有吃糖了，一开始我还未很快觉出甜味来。

我看上去好多了，已不眩晕了，头脑很清醒。我把手放在额上，感到正常，并带着一点汗湿。那个女青年回来了，拿来一只针筒，里面装满了乳白色的药液。她让我转过身去，我支撑着，想起遇到那个女卫生兵的经历，她非常熟练轻巧地给我注射，一点也不痛，她拿着针筒的样子就象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她款款而行，只有经过训练的护士对自己的技能颇具自信，才会这样行走。我敢肯定，她原先一定是一个职业护士。我很奇怪也不无惋惜，是什么原因使她到这个监狱医院来接受劳动改造。

晚饭时，她给我送来一碗煮得软软的米饭，一盘蔬菜上面还有一整条葱烤红烧黄鱼。鱼很小，不到六英寸长，但比我记忆中的任何佳肴都好吃，我把它全吃完了。我的洗漱用具都放在床边一张椅子上，便盆和便壶都放在地上，我竭力想支撑起来，至少草草梳洗一下。

等那女青年把空碗碟拿走之后，一个看守把笨重的铁门锁上，回到不远处他自己的房间里去。另外一张床上的一个女人过来与我闲聊。

“你神志不清有六天，他们认为你要死了，你现在觉得好些了吗？”她瘦得象根竹竿，瘦削的双颊，毫无血色，皮肤干燥，但一双眼睛还闪烁明亮，她身上一件棉衣补了又补，压低着声音说话还不时朝门边瞥上一眼。

我点点头，对她笑笑，能有她作伴令我愉快，但我还很虚弱，没有闲谈的兴致。她坐在我床边。

“你刚被移送到提篮桥？你什么时候收到判决书的？”她问我。

想起那个女看守警告我不许与任何人谈论我的案子，我只是笑笑一声不吭。

“不用害怕，我不会去报告的。要知道，在这儿犯人们都互相保护。”她告诉我。停了一会儿，她问我：“你得了肺结核？这儿是结核病房，所以这儿伙食很好。但我明天就要回牢房去了，因为我已不再咳嗽咯血。等我情况恶化，重新又咯血，他们会让我再回这儿来休养和打链霉素。他们并不能给我们治愈，但也不让我们死。”她叹息道。

“我很难过你患了结核病……”我不禁对她充满了同情。

“在这种地方几乎每个人早晚都会得这种病的，这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之间传上这种病。一间牢房关三十个人，人挨着人睡觉，怎么能避免患病呢？况且吃得这么差，活又很重。”

“你们还干活？干些什么活？”我十分惊讶地问道。

“做缝纫。一星期干六天，每天做十个小时，我给羊

毛衫锁纽扣洞和缝纽扣，这些羊毛衫都是出口的，所以做工一定要好。一个月只给几元钱买块肥皂和一些手纸。不许我男人再给我带钱，我有三个孩子。”谈到她自己，不禁使人感到抑郁。她低沉着头，差点声泪俱下。但她还是坐在我床边，我想她虽然想要有个人与她说说话，对我来说，这么长时间的单独监禁，有她在身边也使我感到无比欣慰。

“我在工厂里做会计，我丈夫在这个厂里做技术员，我的工作是一份好差使，但我不小心丢了。”她说道。

“你是否在钱款方面犯了什么错误？”我问她。

“没有，肯定没有这方面的事。我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有人检举我，我受到批判，但我反抗。我非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认错，反而说得更多，我太没有经验了！支部书记火了，就把我也列到我们厂反革命名单上，我就被抓起来，判了十二年。”

“你没有向上一级法院上诉？批评支部书记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十二年可是判得很重。”

“这有什么用？上一级法院只是把情况再告诉支部书记，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合作的，你知道老百姓是这样说的，‘官官相护’嘛。”

“那么，你在这儿已经呆了很长时间了。最苦的日子已过去，你很快就可以和你家人团聚了，”我想安慰她几句。

“不会很久了。但愿再见到他们时，我的孩子还认识我，我丈夫没有跟其他女人有什么瓜葛。”

“探监的日子他们没有来看你？”据我知道，一旦犯人判决后送到提篮桥，家人就可以一个月一次来探望他或她。实际上在各个看守所呆了很长时间的犯人常常作些伪供以便能早些判刑这样就能见到他们的家人。

“没有。我一判刑，就要他们与我断绝关系，这是能使我丈夫继续工作和养护那几个孩子的唯一的出路。你是知道的，反革命家属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我丈夫与我非常相爱，我们俩没有正式结婚。当我告诉他与我离婚，再也不要来看我时，他失声痛哭，并对我说，他将假装与我离婚，实际上将等着我。”

我为她感到异常悲痛，但我无法用适当的话来安慰她，使她减去些内心的痛苦。她又重新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她换了一个话题。

“你真是幸运遇到了个好大夫。据我知道，她医术很高明，是从美国的一个世界上有名的医学院毕业的，她心底很善良，待人很好。当我第一次到这儿来时，她跟我们一样还是一个犯人。她释放后，重新回到这儿工作。听说她是自愿回来工作的，在这儿呆过的人要重新回到外面世界上去是很难的，外面的人不愿意与一个劳改释放犯一起共事的。任何一个上司都不敢给释放犯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也没有希望给释放犯提拔，释放犯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总是挨批判的靶子。一旦成了反革命，永远就是反革命。你为此服刑，以后还得受累，你家属也将受到牵累。我见到我们厂里其他人就是受到这种待遇。现在我也成了其中一份子，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儿重新回到外面的世界中

去。”

这位女大夫原来竟是提篮桥的一个犯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真叫我大吃一惊。我从未想到，在她慈爱的面庞背后竟有如此悲痛过去。确实，在她的目光中总有一种特别的表情，不仅仅是慈爱和理解，常常是一种对生活的特殊的感受，使她变得非常明智和忍耐。

“人民政府号召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从美国回到中国为人民服务，她就是为了响应这一号召从国外回来的，我知道她在那儿有一份好职业，但她放弃了，毅然回国。在我第一次到这儿来时，她讲话直爽得就象一个外国人，当然这给她惹了不少麻烦。”

1950年初期，中国人民政府通过在海外的代理人和拥护者，在美国的华人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个热潮，鼓动他们回到中国“以帮助民族振兴”，但这个热潮的真正目的是要吸引一批物理学家回来帮助中国造原子弹，但总是以一般名义来号召，以避免引起对北京的真正目的的注意。于是强烈呼吁生活在各国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激发他们爱国热情，有大量各方面的专家作出响应。他们放弃优裕的工作条件和舒适的生活，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到中国，但结果发觉并不是真的需要他们。共产党干部对任何有所谓“海外关系”的人都心有疑虑，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存有偏见，给这些回国者增加了不少困难。由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他们不可能重返美国，他们只得在中国忍辱负重。少数几个幸运儿设法去了香港，但大多数人留在国内，按照党的意愿，接受随便什么工作。一次接

一次的政治运动，总有许多人遭难。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那些侥幸苟活到1966年的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厄运。只有在为中国核力量计划工作的物理学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这是一部悲惨的故事，是对人权的漠视，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政治目的牺牲个人的又一例证。

我们都默默地坐着，各自陷入沉思。其他床位的病人都开始咳嗽和发出呻吟。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开门的声音，坐在我床边的犯人感到一阵紧张，她对我说了声晚安就跑回自己的床上。

我躺着，睁着眼睛不能入睡，我想到我的女儿。这时她在哪儿？她好吗？面对文化革命错综复杂的形势她能安然渡过吗？我祈祷上帝保佑她。

第二天早晨，我能下床了，但我还是很虚弱。当我稍作运动，心就怦怦直跳，以后，我每天走上几步，直到能很轻松地在病房里散步。由于营养和医疗，我渐渐变得强壮起来。

病房里只剩下两个人了，另一个女人病得很重，从未离开过病床。我走到她床边，她没法睁开眼睛，似乎根本不能觉察我的存在。在她枕头边有一只容器，里面都是痰和血，她看上去象一具僵尸，除了咳嗽，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吃饭时，劳动改造的姑娘用调羹一口口喂她吃。

我从来不问那个劳动改造姑娘任何问题，她也从不说话，但是我们相视一笑，互相交流友好的感情。虽然她给我拿来有营养的食物，我发现她自己只有一般的米饭和白菜

或煮洋芋。她穿得很少，好象总是有些冷，嘴唇发紫，拱着肩。我想给她一件我自己穿的毛衣，趁她不在房里时，我脱下毛衣，当她来时我一言不发递给她，因为外面有看守，她非常害怕不敢接受。她紧张地看着房间另一头一个跪着的女犯人，把毛衣推还给我。

一年之后，当我病了又回到医院时，她已不在那儿。我多希望她现在是在上海一所普通医院病房里工作，款款而行，拿着针筒，看护着病人。

又过了一周，我的体温正常之后，医生对我说，我必须回到第一看守所。她柔声说道，双眼充满了慈爱，似乎从我身上她看到了什么值得爱的东西，但我自己却未意识到。我觉得，在这个女性身上有一种神圣纯洁的东西，我不能相信，象她这样的人重新回到医院来工作是因为释放之后无法与外面世界和谐相处。我相信，她回来是因为她知道犯人们需要她，虽然从世俗的眼光看，她的境况并不值得和崇高，但她找到了她的生活中已失去的东西，她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由于她的遭遇，她显然成了完美的人。

几天之后，当看守将其他犯人带来医院时，就将我带回第一看守所。

第八章 党派斗争

自从1967年冬天生了一场肺炎以后，我的体质很快垮了下来。由于长期缺少营养食品、阳光和新鲜空气，使我的身体不可能完全恢复了，相反却使身体衰老的进程加快了。我发现，我的脑力也变得差了，以致无法长久地集中精力思考一个问题。我自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进行有逻辑、有分析的思考。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赤贫能把人变得目光呆滞、面无表情。事实上，我知道自己身上已出现了脑力和体力衰竭的所有症状，这些症状会导致身体彻底垮掉。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完全与世隔绝产生的心理影响也在吞噬着我。我经常感到绝望，有时虽然饿得要命，却连仅有的已经少得可怜的一点饭菜也咽不下去。

监狱外的形势总的来说仍然很乱。已经是1968年了，尽管实行了军管，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抢和武斗还是持续了很久。看来，毛泽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把红卫兵和造反派发动起来之后，已不能控制他们了。只要外面政治

形势不稳定，看守所里也就难以维持正常的秩序，没人认真来管我的案子，我被扔在囚室里等着。我真的害怕在我的案子弄清以前我就会死在牢里了。

有一天，劳动改造的姑娘给我们发了凉水以后，我几乎不能把盛满水的脸盆从小窗口端到平时放脸盆的地方，尽管只有几步远。我的双手抖得厉害，心也在狂跳，脚步摇晃，我只好把脸盆放在地上，坐了下来。

我坐在床上，大口地喘着气，心想：如果我要活着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话，我就该订出规定，锻炼身体和思维能力。受了我这一决定的鼓舞，我猛地一下站了起来。突然眼前一片漆黑，我不得不又坐了下去。可是自那以后，我设计了一套徒手操，从头到脚活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一天做两次。最初，这种体操使我筋疲力尽，我只好经常停下来，歇上一阵子。我还得不时地提防那些窥探的眼睛，因为饭后除了在牢房踱步几分钟之外，别的都不允许。尽管如此，我还是设法每天做操。几个月之后，我居然恢复了一些体力，人也觉得有劲多了。

关于脑力方面的锻炼，开始我想背诵毛的一些短文，这些短文能使我更好地理解他的军事思想，并且在对付审讯时，能把他的语录运用自如。在毛的文章里，我最喜欢他的那篇《论游击战》。文章中他提倡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争取主动，这样，一支即使人数少、装备差的部队也能重创或打败装备精良的部队。尽管毛是一个可憎的独裁者，在他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杀害了成百万的中国人，被他监禁的就更多了，在他那灾难性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几度把国

民经济引向崩溃的边缘；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卓越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家。尽管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方面的论著不够成熟，但是我认为，他对于游击战争方面的论著是一篇杰作，是经过清醒的思考，根据共产党军队的经验写就的。可是归根到底，一天好几小时地学习毛的著作，对于我这样一个他的受害者来说真是一件苦事。因为它不断地提醒我毛的邪恶势力，这股邪恶势力眼前正主宰着我的命运，而我却无力征服它。

于是我改为背诵上学时学过的唐诗。使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能把在脑海深处沉睡了几十年的诗句再挖出来。把原以为已忘记了的诗歌回想出来，这真是一件乐事。当我把诗句拼凑成一首完整的诗，我象完成一项任务似的感到愉快。唐代伟大诗人们的不朽诗句不仅锻炼了我的记忆力，而且把我从身居囹圄的残酷现实带入了美和自由的境地。

我不断地努力，保持自己的心智健全。不过仍然有些时候，饥饿和痛苦折磨得我不想再有生还的希望了。这时候，我只好求助于和看守干上一仗，来激励起自己的斗争精神。

“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道。

“想要干什么？”看守拖着脚步走过来，嘴里懒懒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没命地叫喊。”

“我还得等多久政府才来审理我的案子？把无辜的人关在牢里是违法的，也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实际上，在毛的四卷著作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论述，可是我确信这个识字

不多的看守没有通读过毛的著作。

“嘘！别叫了！政府到时候会来审理你的案子的，又不只是你一个人！”

“可是我已经来了很久了。我要见提审员！”我故意提高嗓门说。

“轻一点！不许叫喊！提审员忙得很。”我知道得很清楚提审员这个时候根本不在工作。她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可我们俩都装作不知道。

监狱里显得特别静。我们俩的声音在大楼各个角落都听得到。我知道其它的囚犯都在倾听，反正他们也没事可干。我也清楚他们或许愿意听到别的囚犯提出不服，就象我听到别的囚犯敢于和看守顶嘴一样受到鼓舞。

由于知道别的囚犯都在倾听我和看守的谈话，无形中我把自己和他们联在了一起。我不再感到孤立。他们沉默的赞许使我受到鼓舞，虽然由于用力喊叫我已经筋疲力尽，但我仍振作起精神说下去。

“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犯过罪。我从没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你们没有权力关押一个守法公民！我要求你们给我平反，向我赔礼道歉！”我用尽量响的声音叫道。

“你疯了吗？给我住嘴！”看守愤怒地叫了起来。

“我没疯。把我关起来的人才疯了呢！”

“你闹事想受罚吗？”

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另一个看守走了过来。她说：“你现在闹事就是犯了罪。”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摆事实，讲道理。’我只

是遵循他的教导，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就要说。”我大声争辩道。

“出来！”

这时候看守把牢门打开，把我带到监狱远处的一个角落房间里，在那里我们互相喊叫，别的犯人听不见。直到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才住了嘴。有时候，我的耐力比看守的耐心维持了更长时间，于是，她们就用暴力使我住嘴，不是打我的身体，就是踢我的大腿。她们叫我“疯老太婆”，还经常悲叹我疯病又发作了。但是，她们哪里知道我激怒她们的真正目的。在我六年半单独监禁的日子里，我好几次故意造成象这样的局面。当痛苦压倒了我，使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时，我就故意找看守干上一仗。

虽然我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腿上至今还留着她们用重磅皮靴踢的伤疤，但是干完一仗后，我的情绪常常可以安定一阵子。之后，心中的烦闷又会渐渐积累起来。我相信，我需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即使是与看守较量也比完全与世隔绝要强。而且，斗争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它比耐心忍受痛苦更能使人振奋，当然中国人最具有忍受痛苦的美德。正是这种美德，使我的很多朋友和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熬了过来。可对我来说，只有通过这种积极的斗争，才激励了我的意志。

八月六日那天，天气特别闷热。报纸来得很晚。我听到给女牢送报的一个男看守对值班的女看守说：“重要新闻！”我不知道是什么新闻。但是我不得不等着，差不多要到睡觉时分，报纸才能传到我的牢室里来。

我注意到报纸的头版刊头是套红的，上面用大字标题写着，前天毛泽东给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教育学生的工人农民送了一篮芒果。这篮芒果原先是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来中国作官方访问时送给毛的。报纸报导了工人们在收到毛的礼物后欢腾欣喜的情景。报导说，工人农民热烈欢呼，喜泪交流。他们唱起毛的语录歌，宣誓永远忠于他们的领袖。

虽然我并不知道几天前，毛曾召集了北京的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搞打砸抢，声明和他们脱离关系，但是我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这一公开行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毫无疑问，工人和农民已被派驻清华去约束年青的革命派。清华是全国有名的大学之一，那里的红卫兵组织特别好战，难以驾驭。给在清华的工人农民送礼，而不是送给清华的红卫兵，显然这是给红卫兵的一种警告，叫他们不要反抗派去管教他们的工人们。

以后几天，报纸上说全国各地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都登有宣传队开进大专院校的照片。虽然取名叫“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但里面没有农民，工人也很少，主要是穿便衣的军人，还有一些党的干部，这些人被毛派领导例如毛的妻子江青和国防部长林彪认为是忠于他们的人。

虽然共产党自1949年执政以来，在中国的极权主义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独裁，但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总是小心地藏起兵刃，用说服教育的方法造成一种民主的现象，而不是使用武力压制。他们爱用政治教育的方法使人民大

众服从他们的意志。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武装起来造反时，才调集部队进行镇压。用工农宣传队来遏制红卫兵的反抗，用非军事手段来恢复秩序，而不是再次使用奏效快的方法，出动一队队的士兵镇压，这说明毛泽东是多么想维护开明君主执仁政的形象。

就在认真对待红卫兵的同时，北京的毛分子领导们正着手组织各个省、各个直辖市的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各省、各直辖市的政府机构的新名词，同时还要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报上经常刊登指导性文章，希望组织工作尽快完成，迎接党的第九届代表大会的召开。我料定篡夺了权力的毛派分子急于取得正式的地位，想被选进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而把那些罢了官的老干部清除出党。这样，对他们手中的权力将不再有威胁了。

渐渐地，又到了秋天。每下一次雨，气温就下降几度。我原以为坚持做一套脑力操和体力操，已经控制了体质的迅速下降。因此当新的警号出现的时候，我的确大吃一惊。每次经期我的血历来就流得特别多。但当两次行经的相隔时间日渐缩短，乃至十天左右又来经了，而血流量日渐增多，好几天不绝时，我开始害怕了。可是想起那个没受过培训的卫生员和以前发生的事，我便不敢求医了。痛苦又一次压倒了我。我经常做恶梦，醒来时大汗一身，气喘吁吁。

十月的一个夜晚，当我还在和体内的痛苦抗争的时候，看守再次从一个牢室走到另一个牢室，命令大家坐起

来，静静地收听广播。喇叭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宣布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开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中国共产党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

刘少奇，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的领袖，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三十年代初期，当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领导武装斗争时，刘少奇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地下共产党。当毛泽东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双重职位时，刘少奇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们俩亲密合作，没有迹象表明刘想篡夺毛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也是刘少奇在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会议上在他的总书记报告中提出来的。可是在一九六〇年，当毛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时毛泽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让给了刘少奇。人们都在传说当时在中央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然后毛被迫在七千人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难堪的自我检讨。

刘少奇立即做了一系列的政策改变，来挽救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当他的经济政策在毛的政策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刘少奇成了党和人民越来越爱戴的领袖，使毛的影响和重要性相形失色，毛不由地警惕了起来。他小心地策划除掉刘，因为刘威胁了他的地位，毛不但害怕他所信仰的并为之努力的一切将会丧失，而且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将会失去。

尽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

人物出现，这一场历时整整十年的大战实际上是以毛泽东和刘少奇为代表的两条路线的搏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虽然毛泽东把刘少奇迫害至死，看上去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赢了，可是当毛死后，邓小平把中国引上了自由经济的道路，这一政策就是刘少奇曾在二十年前试图推行的。邓小平的政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当时在国内或国外其它地方都是难以想见的。

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刘被宣布为“叛徒、特务和工贼”。但是却没有证据来证实这一指控，而且，正象在共产党中国过去的一贯作法一样，受害者是不允许为自己辩护的。再者，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不是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开除刘少奇，严格说来也不合法。但是在毛的权力鼎盛时期，他完全可以无视这些小节。

自从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了反对刘少奇的决议后，全国的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批判他。每天报纸上都登满了列举刘少奇“罪状”的文章，其中最大的“罪状”是他反对伟大领袖的方针政策。报纸还报导了全国各地召开群众大会，人民“坚决支持”这一决议，对刘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我猜想受左派控制的报刊其主要目的是想威吓那些同情刘少奇的人，把他们的嘴封住。因此，尽管报纸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全国人民都痛恨刘少奇，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很久以前我已经和许多同胞一样，学会怎样阅读共产党的报纸了。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中国，我很清楚全国绝大多数非党人士对此也许并不关心，因为他们无论对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没什么特殊的感情。而党内

人士，除了极少数毛派分子，多半对这一事件感到难堪，因为它暴露了共产党政治的丑恶本质。

寒风又一次从北方吹来，夜里结在铁窗栏杆上的霜到了早晨变成了发亮的露水。这时一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第一看守所，协助军管会搞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们的到来，没有象从前军事接管看守所时一样，在喇叭里正式宣布一下。不过当犯人们出来放风时，我看到监狱的院墙上贴着一条条欢迎宣传队的彩色标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一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用来欢呼“工农宣传队”开进任何一个单位。

几星期之后，犯人们又开始被叫出来审讯了。听着熟悉的铁栓开关牢门的响声，我心里充满着希望和期待。我请求看守允许我写一封信给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心想或许她会拒绝。没想到她居然给了我一张纸、一支蘸水笔和一瓶墨水。我措词谦恭地写了一封信，要求调查我的案子，还运用了毛的红宝书里的语录，应用毛的语录是那时一种惯例，目的为了表示笔者正确的政治立场。我把信交给看守以后，就一心等着中断了好久的对我的审讯。

一天，我又来了月经弄脏了内衣裤。我正洗着，一名女看守从观察孔里看见了。她打开了小窗对我说：“你怎么搞的，裤子上都是血迹？”

“我只是来了月经。”

“怎么有这么多血，有什么不正常吧？”她打开牢门走了进来。厕所的沟里满是带血的厕纸，我正想用洗裤子的水冲掉它们。“为什么不报告你的情况？”她站在那里端详

了我好一会儿，然后离开牢室锁上了门。

过了一会，她带着那个年青的医生来了，他好象又干起了他的行当。

医生问了问我的年龄，说：“你可能要绝经了。不过你也可能生了什么东西。你必须去做妇科检查，可是监狱的医院里没有妇科医生。我给你打一些止血针。”

他打的针起了作用。不过我还是常常担心生了什么东西，也许是恶性的。我从来没有比那时更急于想离开第一看守所。

那是一九六九年寒冷的一月。自一九六六年年尾对我最后一次审讯后已经两年多了，情况终于有了些变化。

一天，我正坐在床上，两腿上象以往一样放着一卷毛主席著作，两个劳改姑娘走了进来。在她们身后，那个曾搜过我房间的女军人看守站在门口，两手叉在肥胖的腰间监视着我们。另一名看守在她的身后暗影处徘徊着。两个劳改姑娘把双层床上面一层的東西搬到边上，我原先把那一层当书桌的。然后她们把上层床架子搬到窗户边上。

“拣起你的东西来吧！难道你以为你的老佣人会来帮你拣吗？”那个女军人看守挖苦地叫道。

我把我的东西放在下面一层床上，这时劳动改造姑娘们拿进一卷铺盖和一个脸盆。接着一个三十出头的女犯人走了进来。她象所有的犯人都得做的那样，低着头，慢慢地走进来，手里拿着几件衣服。

劳改姑娘出来以后，看守就把门锁上了。

由于被单独关押久了，我象一个在沙漠里迷路的人渴望喝水一样，渴望与人接触，相依为伴。对于新来的犯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振作起精神，准备对她表示欢迎。但是我想起毛派分子一贯告诫人们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于是我还是坐在那里低头看书，一面掂量着这意想不到的变化。自从看守所实行军事接管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里的工作进程看来慢了下来。没有几个新犯人进来，事实上，我听出楼上放风时犯人的脚步声稀疏了，因此我感到监狱里的人数在逐渐减少。新来的犯人看来不象是由于关不下而到我牢里来的，我等待事态的发展，好让我有个头绪。

新来的人在床上整理东西，不过她不时地朝我偷看，似乎想对上我的目光。

“你到这儿多久了？这地方很差，是吗？他们打不打人？”最后她终于走过来，坐在我旁边，轻声问我。

我对她话里的意思感到很吃惊。她不象一个刚被抓进来的人，还不习惯失去自由或饿过肚子。她的脸色苍白，微微带青。只有被关了很久的犯人才有这样的脸色。她的头发稀疏发黄，象稻草一样干枯，那是食物中缺少蛋白质的缘故。她的衣服罩在饿瘪了的身上，和我的一样显得空空荡荡。她用一对毫无光泽的眼睛望着我，那眼睛充满了绝望和恐怖。

“我们不能说话，这是不允许的。”我对她说。我瞥了一眼窥视孔，看到一对黑眼睛，随即又迅速地消失了。我心想，当她坐到我床边来的时候，那看守为什么不打开小

窗骂她一顿呢？

晚饭时，她很快吃完了她的那份红薯。看到我只挑了几块放在杯子里吃，她抓起饭盒把其余的都倒在她的碗里。一面吃一面还喃喃地说：“我们不该浪费粮食。”

我不反对她吃我余下的那份红薯，这使我更加证实了一点，她最初问的一些问题，装得好象是刚被抓进来的，其实她是在撒谎。她饥饿得要命。

如果我原先就熟悉关押犯人的做法，我当时就会立刻怀疑她来干什么。但是直到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公安局有条原则，一个牢房决不关押两个犯人。在非单独囚禁的牢房里最少也要关三个人。因为监狱当局认为，三个人要比两个人更难密谋行事。

我坐在床上，等着看她接下来想干什么。可是她除了使用了我的肥皂和厕纸，并不想再同我说话。

第二天早晨，新闻广播以后，她又走到我身边坐下。

“我真恨这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你说呢？可恶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你家也被抄了吗？”

我经常从广播里听到，有人批评文化大革命，或批评红卫兵的行为，被判了长期徒刑，我知道这种批评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我奇怪她怎么敢如此放肆地表达她的感情。当然，除非看守叫她这么做，为的是怂恿我同意她的观点。于是我回答说：“你不该抱怨。为什么你不读读毛主席的著作而坐在这里闲谈呢？如果看守看到我们俩在谈话，会处罚我们的。”

我环视四周，发现她并没有一套毛主席著作。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毛的著作已成为每个中国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同他的衬衫和裤子一样重要，同时也是保护自己的必备品。有没有毛主席著作，被认为是检验一个人政治上可靠不可靠的标准。而且，我记得监狱规则中有一条规定：所有的犯人都得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我刚来到看守所的当天晚上，他们让我大声朗读的。那么那人进监狱时怎么没让她带毛选？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她被匆忙地从别的牢房搬到我的牢里来，还来不及收拾齐她的东西。这也许就是前一天晚上她不得不用我的肥皂和厕纸的原因。

“你的毛选呢？你来看守所以前她们没叫你带吗？她们怎么会忘记这一点呢？”我故意大声说。她脸红了。我把我的毛选借给她，可是她把它们推开。

“我不想读他的书。我恨透了他。是他毁了我的家。我认为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好得多，你说呢？”

我下意识地望了望观察孔。没有人在监视我们。她居然赞扬国民党，这罪名如此之大，以致我更加确信她是军人看守派进来的，也许是哪个毛派积极分子急于想给我定罪。于是我说道：“你不要乱讲，要知道我会告发你的。”

但是她对我的提醒不予理睬，还是想引我说话。“一九四九年以前你住在上海吗？国民党是不是好得多？”她坚持问道。

“我真的不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当时我在国外，”我说。

“你在国外住过，多走运！我恨透了生活在共产党中国！我们一点也没有自由。你恨不恨共产党？”她又探问道。

“我是个天主教徒。一个天主教徒只可爱人而决不可恨人。我们甚至愿意饶恕冤枉过我们的人，”我对她说。

我看得出她对于我说的，我愿意饶恕冤枉过我的人抱怀疑态度，因为她不以为然地笑了笑。然后，也许是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她突然叫道：“我也是个天主教徒！”

“那好极了！让我们一起念‘主祷文’吧。我们在天之父……”她没有跟着我念，只是茫然地望着我。

“你既然不是天主教徒，就不要装着是。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会教你念主祷文的。”

她摇摇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告发我宣扬宗教。我知道她还不够聪明，不知道派她进来的毛派分子要是听见我教她祈祷，会象听见我说共产党坏话一样地高兴。虽然共产党曾声称，允许中国人民信仰自由，但是传播宗教，即谈论宗教，教人家宗教仪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也是绝对不允许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对无论以哪种形式出现的宗教，一旦发现其处罚都极严厉。红卫兵最初的行动之一差不多就是砸烂庙宇或教堂，处罚尼姑和和尚。

那天下午，还是那个一脸凶相的女看守打开了牢门，叫了声与我同牢的那个人的号码，“出来受审！”她喊道。

我焦急地等待着，看看他们定不出我的罪后又会怎么样。几小时后，她回来了，揉着眼睛，做出一直在哭的模

样。我总是忍不住看到眼泪汪汪的人。由于我没上他们的圈套，她肯定吃了苦头，我不由可怜起她来。但是我也不去安慰她，因为我不想给她机会再引我不当心说错话。但奇怪的是，她看上去不想再和我说话了。

第二天，她整整一天都没想跟我说话，而是两眼望着窗外，象在想心事。不过，有几次她以为我在埋头看书，我发现她在望着我。

下午，她又被传去审讯了。回来时又是用手擦着眼睛。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她没有回牢里来。厨房里的女人来发晚饭时，只给了我一份红薯。我向她替同牢的人再要一份，她只是摇了摇头。不过，我在我的杯子里还是替她留了一些红薯。

这时喇叭响了。看守一个个走到我的小窗口，看看我是否端坐起来收听广播。喇叭里宣布了当天下午对一些犯人作出的判决。有一个死刑被宣布“立即执行”。那犯人的号码正是与我同牢的那个姑娘的号码。广播里说她是一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多年来一直隐藏在我们中间，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挖了出来。曾给过她坦白从宽的机会，但她拒不交待，妄想蒙混过关。现在她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被“砸得粉碎”。

我先是感到震惊；每次广播判处谁死刑都很可怕，我抬起头来，看到窥视孔里有一只眼睛在观察我。我忽然明白那姑娘既不是什么间谍，也从来没被定过这个罪名。如果我听广播时流露出害怕和紧张，毛分子就会认为我有罪。因此我两眼直望着牢门，似乎我正轻松地靠在被子

上，认真地收听广播。

喇叭关掉后，那个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了过来。

“你听见宣布判处死刑了吗？”

“听见了。”

“你对和你同牢的犯人的案子怎么想？”

“既然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那么她也就该死，”我不以为然地说。

“你应该把她的命运和你的处境联系起来考虑，”看守指出道。

“我没见有什么联系，她真的是间谍，我可不是。我希望人民政府查明我的冤案，根据惯例为我平反，”我回答道。

“你一点都不现实，”她说。

“我不同意你的话。相信人民政府，难道不现实吗？”

她关上小窗，但仍留在窥视孔旁监视我。我拿起一册毛选，坐在床边我经常坐的地方，静静地看起书来。

就在睡觉前，两个劳改姑娘走了进来，拿走了先前与我同牢的那个姑娘的东西。她们把两个床叠在一起后就走了。这一切说明那个姑娘的确还活着。那夜天气很冷，那姑娘需要被子，否则就要冻僵了。她们不得不为她来拿一下。

既然看守们对她很信任，交给她引我上钩的任务，她肯定是一个她们认为可以随意操纵的犯人。也许看守们答应过如果她能引我说一些错话，她们会给她一些好处。当她失败后，她们又改变策略，假装判她死刑来吓我一

吓。

劳改姑娘走后，那个军人女看守走了进来。

“站起来！”她走到离我很近的地方，气势汹汹地吼道。

我刚站起来，她反手抽了我一记耳光，我疼得眼泪都涌了上来，但我眨眨眼睛，硬把眼泪压了下去。我就站在那里，两眼直视前方，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她根本不在旁边一样。她又打了我一记耳光，还用大头皮靴踢我的腿。

“站好了，你该受罚。你很聪明，是不是？帝国主义分子把你培训得很出色，是不是？好吧，你滑不过去的。无产阶级会把你摧垮的。给我站在那里！”

她“砰”地一声把沉重的牢门关上锁好，踏着很响的脚步沿着走廊走出了女牢。

夜班看守来了以后，她照例把每个牢房都检查一遍。当她来到我这儿时，不由地问我：“你干吗站在这里？”

“别的看守罚我站的。”

“哪个看守？是值日班的那个吗？”

“不，是另外一个。”

“你在胡思乱想。睡觉去！”

她好象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事件。也许陷害我的阴谋只是看守所里几个毛分子策划的。“我不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对自己说。不过我很高兴，不必整夜站在那里了。

刚才有一脚踢在我的脚踝上，那里是没受到棉裤保护

的地方。伤口一阵阵疼痛，皮也踢破了。我穿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一双晾在潮湿的牢房里又没干。我怕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一面问自己，一面用眼睛扫视空荡荡的牢房和我那些可怜的随身物品。当我看见那支牙膏时，我断定牙膏里一定会有某些抗菌的成分。于是我在伤口上涂了一层薄薄的牙膏，上面再盖上一块布，是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然后我用仅有的一块手绢把脚踝包起来。

由于脚踝太疼，我一晚上都辗转难眠。经常从乱梦中醒来，不是梦见我的脚跛了，动不了了，就是梦见那个女看守一次又一次地踢我。

饥寒的折磨，无望的等待，对自由不断的渴望，对女儿的悠悠挂牵，还有刚才那个女看守对我的虐待，迭加在一起，使我感到无比愤怒。当我第二天早上起床时，我已不再感到抑郁了。我觉得我体内象有什么东西快要爆炸了。我对自己说，在我目前的这种情况下，那些有教养的美德，例如忍受痛苦，饶恕他人，甚至具有有一点幽默感等真是太难得了，我都做不到。毛分子们正千方百计想把我搞垮。我也必须认真对待，粉碎他们的阴谋。

尽管我睡得不足，感到很累，但是我还是瞪大眼睛醒着。我的脚踝肿了起来，疼痛难忍，可我仍迈着急促的大步在牢房里走来走去，急于想和毛分子们干一仗。想到毛泽东怎样对待我，怎样对待我的朋友以及所有那些我所不认识的难友，我越想越气。我发誓要以某种方式来回击毛分子。

牢门突然打开了，就好象上帝很快满足了我想和毛分

子较量一番的愿望。“出来受审！”一个男看守对我叫道。

我敏捷地拿起毛的小红语录本，跟着他穿过走廊，一瘸一拐地快步走着，竭力想跟上他。

这时喇叭里正广播《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文章，解释毛最近发表的一个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我跟随着那个看守走过监狱牢房时，广播员恭敬的声音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喇叭跟随着我。广播员对毛充满敬意的言词使我想起毛的令人生畏的权力，它象一块覆盖中国的巨毯，随时准备盖下来闷死他选中的人。我暗暗提醒自己，要小心，不要说任何被认为是反毛、反共产党或人民政府的话。如果我说了，我就会成为“反革命”，毛分子就会赢了我。我的策略必须坚持说负责审理我案子的官员误解了毛的政策，而政策本身是对的。如果有必要，我就撒谎并且声称我站在毛一边，甚至尊敬他，就象其他许多中国人一样，为了生存，每天都这么做。光是反击还不够，还必须反击得好，以智取胜，我这样提醒自己。

审讯大楼的入口处挂着一条沉重的门帘，是用蓝棉布棉毯做成的。门口的小房间里看守已不再懒散地坐在椅子上，而是立正站着，还有全副武装的战士在走廊里巡逻。一些穿着蓝色制服的人从审讯室进进出出，这些审讯室的门都关着。看情形那天的工作刚刚开始，我是属于最先被叫来的。想起昨夜发生的事，我知道今天的遭遇将不会愉快。毛分子一直希望引我说错话，然后威胁我。但是他们没成功。我一面提醒自己要警觉、要勇敢，一面急着想听

听他们想说些什么。不管他们说什么，多少会暴露他们自己。他们暴露得越多，我就越有机会找出他们从我这里到底想要什么，为了什么目的。当时我还有很多事情弄不明白。

看守把一扇审讯室的门打开，叫道：“进去！”

审讯室的墙壁粉刷过了：室内显得明亮整洁多了。窗户的两边各挂着一条红布标语，上面用白漆写着：“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墙上贴着一幅很大的毛的标准像。

五个人面对着门坐着，其中一人穿着军装。我试着估计他们的背景和身分。自从一九六三年国防部长林彪废除了军衔制以来，所有的军人都一律穿上宽宽的、不合身的军装，象以前的游击队一样。很难断定那个圆脸年轻人的级别，他正叉开双腿，坐在这阴森的审讯室里。不过我看见他穿的军装上有四个口袋。这说明他是一个军官，因为士兵穿只有两个口袋的军服。其余四人穿着普通的、褪了色的蓝色毛装。有一人年纪比别人大得多。他的脸上皱纹很深，他把手放在桌上。这双手布满了茧子，是一双工人的手。我猜想那穿军装的年轻人是军管会代表，那个老工人和旁边的一两个人是“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代表，而还有一个人可能是接管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代表。

我看看屋里的那五个人，心里明白他们都是从一九四九年共产革命中得到好处的人。我不指望他们对于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态度会和我一样。我也明白那个老工人对于共

产党掌权以前的日子也许只有悲惨的记忆。而其余的人年纪这么轻，根本记不得什么。因此，他们很可能把我，一个旧时代官员的遗孀、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一直闭关锁国，与西方世界完全隔绝，因为我知道这些人把西方世界一概斥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他们受了官方的宣传，这些宣传对西方国家都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主要对象是美国，尤其在朝鲜战争和最近的越南战争期间。想起我必须打破这堵偏见和愚昧的铁墙才有生路，我的心都凉了。不过，如果我想自由地走出第一看守所，澄除对我的指控，我只有试一试了。

进屋后，我站在犯人的椅子旁，手里拿着“小红书”，等着他们指定语录叫我念。提审员指了指墙上毛主席的像片，挥了下手说：“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鞠躬，向他请罪！”

向毛请罪？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表示反抗，打乱他们的程序。“我没有犯罪。没什么罪要认，”我仍然直着身子回答说。

“什么！你胆大包天，居然不肯向我们伟大领袖鞠躬！你好大的胆子！在中国每一个人早晨晚上都向我们伟大领袖的像片鞠躬，你敢拒绝？”提审员欠起身子严厉地叫道，其余的人都用惊异和责备的目光望着我。那天上午我第一次感到心情舒畅。

“你们误会了。我只是说我没有犯什么罪，也就没什么要认罪。我没说不愿向毛主席像鞠躬。当然我可以向毛

主席像鞠躬，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我语气平静地说，这时我觉得轻松多了。

“那就鞠躬啊！还等什么？”提审员一面叫道一面坐回到椅子上。

我向像片鞠了一躬。我的反抗没有白费。在以后的几次审讯中，再也没有人提到要我认罪了。每次我走进审讯室，提审员只是无言地朝像片的方向挥一下手。

提审员指定让我念的语录和上次的一样。这段语录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被引用。“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敌人。”我念道。“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文革期间也经常引用这一段语录，它反映了军队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党内的权力不断扩大。

我在犯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在我前面，一两米开外，是审讯桌外部的面板，白漆过了。面板上刚写上一些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墙上毛的标准像的两边，还写着一些标语，勒令犯人坦白认罪。桌后坐着提审员。

我听到身后的一扇小窗被轻轻地打开了，提审员的目光穿过我的肩头看了看小窗，微微点了下头，才开始说话。

“你写了一封信，要求面见工宣队。你是否准备彻底坦白？”

“我要求工宣队调查我的案子，排除对我的错误指控。我知道工宣队代表毛主席。我期待着你们执行毛主席的正

确政策，分清好人坏人，我已经被关在这里两年多了。把一个无辜的人监禁在看守所里还不够长吗？”我说道。

“你在这里是呆了两年多，但是你的态度一点也没转变。你仍然妄想蒙混过关。你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吗？现在的形势和你上次受审的时候大不一样了。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刘少奇的决议吗？就是他也难逃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罗地网。你还能逃得过去吗？”

“我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我只要求你们拿出事实来，”我说。

“我们对你会拿出事实来的，就象我们对刘少奇那样。他是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台湾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豢养的特务。他是头号‘走资派’，也是所有你们这些人的后台老板。现在你必须彻底弄清楚，我们已揭露和粉碎了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个阴谋。”

“谁想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对他说。

“所有你们这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你们是真的或潜伏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刘少奇和他的阴谋集团就是混进共产党领导阶层里的特务，”提审员说。

他这番言论如此可笑，对刘少奇的指控如此荒谬，以致我听了十分反感。毛泽东和其他一些左派领导人无视中国人民的理解力，竟要他们相信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反对刘少奇的决议。我（不无）蔑视地望着在我面前的这些人，因为显然他们也没有资格参与毛的卑鄙阴谋。这时，我有一

个欲望，就是想激怒他们。我装出傻乎乎的样子，说：“我总是对刘少奇主席怀着极大的敬意。我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否象他们说的那样有罪。也许是弄错了。人们都知道他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而战斗，并且冒着生命危险。”

我高兴地看到，我这番听来很天真的话起到了炸弹的作用。他们全站了起来，向我叫道：“你竟敢为共产党的叛徒说话！”“你竟敢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的行为，作为革命派的代表来说，算是恰当的。但是奇怪的是，只有一个青年工人和军官显出真正气愤的样子。其余三个人都好奇地瞪着我，觉得很有趣，而决不是愤怒或谴责。我觉得他们听到我为刘少奇说话暗暗有些高兴，同时又奇怪一个被认为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居然对罢免一个共产党领袖反应如此强烈。

当我发现在这些看来是左派热情的支持者里，还有一些人对刘少奇寄予同情，我决定把这段对话拉长一些。“我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也没有反对毛主席。谁敢这样做呢？我只是提出反对刘少奇主席的证据可能不确凿，”我说。

“住嘴！不许你把一个叛徒说成是‘主席’，”青年工人激动地叫道。提审员正盯着看他面前的文件，记录员和他一样。老工人似乎觉得这场面很有意思，嘴角上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不许你把中央委员会罢免的人称为‘主席’，”提审员说。

“我说惯了，”我说。“十六年来，从报纸上，从每天的广播里，从政府的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里，都称他为刘主席……”我一眼瞥见提审员用眼瞪着我，青年工人站了起来，就停顿了一下。

“刘少奇，”我继续说，“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位革命英雄，他对共产党许多方面的工作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培养共产党员等等。我在毛主席著作中发现有好几处赞扬刘少奇的地方。如今很难一下子转过来，把他说成是十足的坏人。也许他只是犯了个错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希望毛主席会原谅他。他们毕竟是多年的亲密战友吧。”

“你是在做梦！毛主席决不会原谅他！”青年工人说。

“那么，国外一定正在笑我们呢。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怎么会突然间成了变节了几十年的叛徒呢？很难相信他骗过了所有其他的领导人，包括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本人。这样做没有意义。毛主席不感到失面子吗？”我问他们道。

“我们不在乎国外的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会说什么，不管怎样，他们不会说我们好话的。在中国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干他们的事，”青年工人继续热烈地说道。“为刘少奇辩护就是一个罪名。他是反革命，你也是！”

“我不是反革命，这我知道。我支持人民政府和共产党。我很尊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要求你拿出证据来，证明我曾做过反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事，说过反对他们的话，”我用平静但坚决的语气说。

“你想用欺骗手段蒙混过关。这就是你在玩的花招吧。你算什么人，敢向人民政府提要求？即使你没犯过罪，你也是一个肮脏的剥削者，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不管怎样，我们有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你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提审员一拍桌子大声说。

我生气极了，对他们厌恶透了，我走上前去，在他面前也拍了一下桌子。他们都站了起来，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

那个当兵的从枪套里拔出手枪，对着我大声说：“你想干什么？”

我在屋子中央，和他面对面地站着。我说：“如果你拿出具体证据证明我有罪，你可以打死我。”当我们俩怒目相视的时候，屋内一片寂静。

“安静！安静！我早听说了，你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又发作了吧。要理智一点。坐回到你的椅子上去。如果你敢再站起来，我就把你锁在椅子上。”提审员伸着手臂命令我坐回到犯人的椅子上去。当兵的一面收起手枪一面仍然瞪着我。

在刚才的冲突中，唯一保持冷静的是那位老工人。他用一种近于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也许他开始明白我的确是无辜的。

我回到犯人的椅子边坐了下来。提审员重又摆出威严的样子，教训了我一番。

“为一个被中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开除的人辩护，罪行十分严重。光就这一点，我就可以判你好几年徒刑。但是

鉴于你无机会跟上文化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事物没有及时的理解，这一次我们原谅你的错误。

“革命派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领导下，决心把所有隐藏在我们中间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挖出来，不管他职位多高，伪装得多么巧妙。你必须毫不怀疑这一点。去掉你的幻想，必须明白你是逃不过去的。”提审员说。

“我对形势完全了解，并且觉得惩罚真正的敌人很对。但是你不能把无辜的人看作敌人，他们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我请求你对我的案子作一次彻底的调查。如果你真的找到证据，证明我撒过谎、犯有反对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罪行，那么你可以判我死刑。但是如果你发现我的确是无辜的，人民政府就必须向我道歉。你必须把道歉的文章登在报上，让每个人都看到，”我认真地说。

“你想要道歉？”青年工人冷笑道。“你算什么人？你自己看得太高了吧。”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我不是一个官员，但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

“你刚才说的话是修正主义的论调。难怪你为刘少奇辩护。他的确是你们的后台老板。人是不平等的。人被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取得胜利的阶级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被征服的阶级头上。只要阶级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提审员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会无视法律，惩罚一个无罪的人，仅仅因为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吗？”

“为什么不能？如果有必要惩罚谁，我们当然会这么

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希望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让他们自食其力。如果他们中间有谁抗拒或反对我们，我们当然就把他们消灭。总之，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为符合他们的目的和利益制定法律。”

“哦，看来这样就使事情简单得多了。既然你已把我定为资产阶级分子，而我又年老体弱，不能自食其力，为什么不打死我把事情了了？干吗还浪费时间进行审讯呢？”

“我们要你坦白认罪，因为还牵涉到其他人。你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毫不关心你是死是活，”提审员轻描淡写地说。

他说还牵涉到其他人。他指的是谁呢？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迷惑。

“牵涉到谁了？你是指从前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吗？”

“不，当然不是！他们和你一样完全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为你开方便之门的人，他们使你、或一些象你一样的人，得以为帝国主义效劳，挖社会主义墙脚。”

“你指的是谁？是指刘少奇吗？我向你保证从来没见过他。”

“刘少奇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但是他已经无关紧要了。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举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们揭露出来。他们的政策使你能够为帝国主义效劳，进行反对中国的肮脏勾当。”

真是不可思议！看来他们迫害我，批判壳牌公司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持排外态度，拥护阶级斗争的原则。问题比

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看出，他们的目标是党内的一些官员，他们曾推行一些政策，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如果他们能让我、或其他一些象我这样的人承认是外国间谍，他们就可以声称，允许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给外国间谍机关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安全的合法处所。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成了共产党两条互不相容的路线斗争的人质。如果我争辩和反抗的话，我就在为党内的一些官员辩护，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这种稀奇古怪的情况实在太荒谬了！象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只有画家本人才看得懂。

提审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现在，把你的思绪回到一九四九年，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的前夕。国民党在什么情况下命令你的丈夫留在上海的？他们有没有命令他钻进人民政府在内部搞破坏？”

“我丈夫留在上海，是因为他希望人民政府能够把中国从长期的战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面中解救出来，为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国家。我和我的丈夫都是理想主义者，也很无知，我们不懂得阶级斗争。那时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经常传阅毛主席写的文章，我们有一些朋友，都是大学里的教授把文章传给我们看。这些文章都没提到阶级斗争。毛主席谈到了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和各界爱国人士的合作的愿望，”我指出道。

“那个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是为了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瓦解国民党。推翻国民党以来，那个政策自然就不再需要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团结次要的敌人

以反对主要的敌人。当我们打败了主要的敌人，次要的敌人中就有一个成为新的主要的敌人。这样，斗争就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我没什么可说的。提审员已对毛的统治哲学作了概括。这都是我自己的错，谁叫我早先没明白这一点呢？过了一会儿，提审员问道：“你丈夫有没有和谁讨论过留在中国的计划？也许他和他的一些外国朋友商量过？”

“没有，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一九四九年的时候，我和我女儿还在香港。我丈夫要我们回到上海，我回来以后，他才对我说，他决定留在中国。看来他是受了一些大学里的老朋友的影响，他们都是民盟会员。你知道，民盟是支持共产党的，和共产党密切合作，在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官员中，帮助和培养了对共产党的友好感情。我知道有很多知识分子当时都决定留在中国，这都是由于民盟领导人的努力，”我说。

“民盟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的领导人妄想在中国建立民主议会，他们是带有荒唐念头的梦想家。没有军队，政治家能获得什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大多数民盟的领导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活该！”

“他们在一九四九年的确帮助了共产党，”我提醒提审员。这些民盟领导人的命运，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例子。毛泽东惯于用人，而当他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无情地抛弃他们。

“情况变化了么……”提审员又开始解释辩证唯物主义了。

“我懂了。这又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例子，”我急忙说道，省得他再对我作一番解释。

“我们得出结论，你丈夫是按照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命令而留在上海的，为了混进人民政府的外交部。”

“当解放军开进上海的时候，有个叫章汉夫的人接管了我丈夫在上海的办事处，他后来成为在北京的外交部副部长。当他就要去北京就任副部长时，他要我丈夫参加人民政府，和他一起到北京去，到外交部工作。我的丈夫谢绝了他的邀请。如果我丈夫想要混进外交部，为什么他在一九五〇年拒绝到北京去呢？”我问道。

我一面在回答他的问题，一面想起是有几个前国民党的外交官员，到北京去在共产党的外交部里工作了。后来有一个以前驻缅甸的大使，被作为反革命关了起来。其他的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遭到了迫害。我曾经深深感谢我死去的丈夫当初拒绝了章汉夫的邀请。

“章汉夫是肮脏的刘少奇集团的成员。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以后，他出卖了共产党的秘密。他现在已被逮捕。”我对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感到震惊，因为我知道章汉夫是周恩来总理的追随者。

“事实仍然是这样，当他还是外交部副部长时，他请我丈夫上北京，在人民政府的外交部工作，我丈夫拒绝了。你可以查阅档案。如果我丈夫想混进外交部，他会拒绝去工作吗？”

我的话是如此简单地合乎逻辑，以致于那个提审员也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抓住这个机会想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掉。

“事实上，我的丈夫留在上海，而没有跟着国民党去台湾，正是表现了他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但他却违抗了他们的命令。倒是台湾的国民党应该来抄我们的家，抓我们进监狱。他们如今没有能力这样做，而你们替他们这样做了，那么，到底谁在为国民党效力呢？”

听到说他们为国民党效力，这些革命派觉得这个侮辱简直不可容忍。我看到提审员的脸“刷”的一下变白了，额角上的筋暴了出来，他竭力压住自己的火气。而那个当兵的站了起来，重又拔出了手枪。

“住嘴！”他叫道。

那个老工人却用一种调解的口气说：“你可以把你的观点说出来，我们伟大的领袖说，‘摆事实、讲道理。’我们允许你为自己辩护。但是，不许你诽谤革命派，说他们为国民党效力。”

提审员看了看表，对旁边几个人耳语了几句。然后，他对我说：“你现在回囚室去吧，我们下午接着再审。”

犯人一天只给两顿饭吃。我在第一顿饭开饭前被叫去审讯，此刻我又饿又累。我一站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我不得不抓住椅子的扶手来保持平衡。我的双腿发软，怕是迈不稳步子离开这里。但是我不想让旁人把我走不稳步子看作是紧张引起的。因此，我指着肿起来的脚踝说：“我要提出抗议，昨天晚上有个看守走进我的囚室用脚踢了我。”

“胡说！”提审员说。“看守是不允许对犯人拳打脚踢的。”

“这个看守肯定做了。”我跟着男看守蹒跚地走了出去。

我饿极了，恐怕吃不上一天只有一顿的米饭了。晚饭吃土豆，总使我消化不良。但是当女牢值班的女看守领我回囚室时，她告诉我，我那份米饭被裹在毯子里保着温。“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一些开水喝。”她说。

尽管她属于比较好的看守，我也一直认为她是比较“温和”的一个，但是对我这样好的照顾还从来没有过。

我发现装米饭和卷心菜的饭盒包在一条毛巾里，裹在毯子里，还没完全凉掉。看守拿着热水瓶来到小窗边，在我杯里倒了很多热水。我坐在床边，一面吃着饭，一面整理着上午的印象。

提审员肯定是他们五个人之中受教育最多、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从他那自信的样子看出，他一定是一个识时务的党员干部。不能断定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毛分子。但肯定已为毛分子所接受，要不然不会让他做提审员。那个老工人不是真正的毛分子。我猜想他被选进工宣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有名望的老产业工人。这种人放在工宣队里可以起装饰作用。作笔记的年轻人看上去没什么重要，他只是作为秘书参加；也许这是他的工作。当我为刘少奇说好话时，从他的语气和表情上也看不出什么真正义愤的样子。那个青年工人和那个军人才是真正的毛分子。他们的样子和行为很象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他们出身贫寒，接受

了许多政治熏陶，以致他们已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最奇怪的要算女牢值班看守的举动了。上午我做了什么使她对我友好起来了？我一边嚼着卷心菜的老叶，一边思考着这个问题。我所做的唯一的、被认为是非同一般的事，就是为可怜的刘少奇辩护了几句。是不是因为我说了作为一个监狱看守不能说的话，她才奖励我的呢？

中国人历来很重视人际关系，这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共产党也不例外。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下台后，所有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也都被贬黜了，不管你和他的关系多么远。既然整个公安局受到了革命派的批判，那么在第一看守所里也必然有一批人，他们的命运与刘少奇联在了一起，他们对他是表示同情的。如果我为刘少奇辩护，赢得了较好的待遇和照顾，那么这样做还是值得的。改善我的生存条件是最关心的问题。不过，当我出于正义感冲动地为刘少奇辩护时，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一情况。

当天下午，我又被传到审讯室，提审员向毛的像片挥了挥手。我鞠了一躬。然后他挑了一段毛的语录叫我念：“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我念完后，提审员说：“你继续谈吧。说说你丈夫在什么情况下加入英国间谍机关的。”

“我丈夫从没加入过任何间谍组织。壳牌公司是国际上有名的石油公司，”我说。

“但它的上海办事处是一个间谍机关。”

“不是的。”

提审员从桌子里取出一叠文件，默念起来。其余两个工人紧紧地盯着我看。每过一会儿，提审员翻过一页时，他就朝我看看，不满地摇摇头，好象他在文件上发现什么关于我的叙述使他很吃惊。我知道他在装假，他在看的文件也许是谁也看不懂的天书，于是，我毫无表情地等着他再次开口。

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文件说：“你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要比你的觉悟高得多。他们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已交代了所有的问题。”他指了指文件，继续说道：“这是他们的一部分交代。这些交代都是一些科长写的，其中包括你以前的总会计师，他交代了你们办事处间谍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很有趣呵。”

“那么好吧。既然你已搞到了你所要的东西，干吗要逼我作假交代呢？”我说。

“每个人必须自己交代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只能实事求是对你说。壳牌公司是一个贸易公司。它与政治毫不相干。它之所以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是因为它想和中国发展贸易。随便怎么说，壳牌公司呆在上海是经人民政府允许的。我和我丈夫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民政府的干部都鼓励壳牌公司在上海留一个办事处。”

“的确是这样。党内的‘走资派’妄图庇护一个外国间谍组织，这是很明显的，”提审员说。

“我劝你说话谨慎一点。是国务院允许壳牌公司留在

中国的。”

有一点我没有提到，这个允许壳牌公司总部留在上海的指示是周恩来总理签了字的，提审员一定也知道这一点。我不禁想到是不是周总理也是毛接下来想搞掉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只要周仍然担任总理职务，他们就决不敢公然指控他。

“壳牌是一个跨国公司。象这样的公司，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是资本主义最坏的企业形式。它剥削很多国家的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看，这样的公司必然是最反共、最反动的。解放以后是决不应该让它留在中国的。”提审员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认为，当美国对中国实行石油封锁的时候，允许英国石油公司留在中国这种做法极其聪明，也很微妙，它造成了敌人阵营内部的分裂。还有比这更聪明的吗？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懂得了他一贯提倡在敌人内部造成分裂和磨擦，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有效的策略，”我说。

青年工人插进来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不需要外国公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我们不拒绝外援，但是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并没有排除接受友好方面的援助。”

“你不能把和壳牌这样的公司做生意，说成是来自友好方面的援助，”提审员说。

“多年来壳牌公司没和台湾做过生意，也没在那里设

办事处，对人民政府还要怎样友好呢？”

“你的确很会说话。开始你为刘少奇辩护，现在你又为一个反动的跨国公司辩护。即使你从来没犯过其它罪行，你今天在审讯室里说的话就足以判你的刑了，”提审员说。

“我说的都是事实。你说的都是凭空捏造的不实之词。你还算是一个觉悟高的革命派，代表着人民政府，而我却只是一个落后的老年妇女。”

听了我这番话，提审员气得又拍了一下桌子。“你别忘乎所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审讯室！”

“站起来！站起来！不许坐下！你污蔑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受到惩罚，”青年工人激动地插了进来。

我站了起来。

“交代你丈夫在什么情况下参加英国间谍组织的，”提审员说。

“如果你硬要这样说，我简直不能回答你。”

“你很小心，是吗？帝国主义分子把你培养得很好，啊？你竟然不作一点让步，”提审员说。

老工人说道：“回答提审员问你的问题。我们暂时把间谍组织的事放一放。”

“对极了！先做调查，后做结论，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对他们说。

提审员又拍了一下桌子，大声说道：“要你来教训我们？你太无礼了。看来你忘了你是囚犯而我们是人民政府

的代表。”

“我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也要讲道理，遵守法律，实事求是处理我的案子，”我说。

“这也正是我们想要做的，而你却拒绝交代。”

“要我作假交代是不负责任。我不相信一个假交代能迎合政府或任何个人的需要，这只会引起误会。我从来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为帮助你们澄清事实，我很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我将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我撒谎或企图掩盖事实，你们可以重重地惩罚我。事实上，我很愿意为此签字立据，如果你们给我张纸，”我说。

秘书和提审员商量了一下，就递给我一张纸。我走到审讯台前，写了以下几句话：“我是一个爱国人士和守法公民。从未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如果人民政府的调查员发现我曾想向国内任何一个人打听属于机密的消息，我愿意接受死刑的判决。如调查下来我完全是无罪的，人民政府必须为我彻底平反，包括在报纸上刊登道歉文章。”

我签上名，写下日期，把纸递给提审员。他念过之后就传给别的人看。老工人拿出一副老光镜，小心翼翼地擦了擦镜片戴上。他一边读着我的誓言，一边点着头。他指了指犯人坐的椅子说：“坐下吧，坐下吧！”

那个军人和青年工人不愿读我的誓言，青年工人冷笑道：“你象打扑克的人一样会装假！”

提审员把誓言递给秘书，他把它收归档案里。

“你丈夫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的？”提审员问道。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壳牌公司有个政策，即聘请驻在国人做驻该国办事处的总经理，”我告诉他们说。

“难道不是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丈夫能比英国的经理更容易搜集到情报吗？”他问道。

“我丈夫唯一比英国经理优越的地方，就是他在与人民政府的进出口公司代表谈话时不用带翻译，”我对他们说。

“你丈夫到香港去了好几次，你们俩在一九五六年都曾到英国和欧洲去过，”提审员说。“我们对你们的欧洲之行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从英国间谍机关总部接受了指令。”

“你在把事情搞混。我们到伦敦是去拜访壳牌石油公司的总部。然后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到海牙去了，因为壳牌公司的总部有一半设在那里。我丈夫和董事们讨论在中国的贸易前景。北京的进出口公司和化工公司都急着想要他跑一趟，他们想向壳牌公司购买很多东西。贸易前景看来十分乐观，英国的专家还受到邀请来中国，帮助中国的企业搞研究。但是我们回国不久，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接着是大跃进运动，一切都停了下来。当初非常热情的北京的干部们不再能作决定了。正在路上的壳牌公司的专家不得不中途返回，一切都做不成了。”我告诉他们。

“你怎么弄到护照的？谁准许你去欧洲的？私人一般是不允许去国外的，”提审员说。

“我丈夫是到上海外事局申请我们的护照的。我们被准许出境，因为我猜想政府认为他这次去对中国的利益有

帮助，”我说。

我记起当初我陪我丈夫一起去北京，进出口公司把他请去，讨论关于由壳牌公司向中国提供农药和化肥的事宜。毛泽东想大大提高中国的粮食产量，来证明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合作社于一九五五年成立，是他搞农业合作化的第一步。在我们返回上海的前一天，我丈夫到进出口公司去作最后一次拜访。有个人，曾与我丈夫进行过一星期愉快的商务谈判。他告诉我丈夫说，我们的护照已经批下来了，在上海外事局，等我们去拿。然后他用一种机密的口气说：“总理亲自批准签发了你的护照。”一般来说，党员干部对于象我丈夫这样的党外人士，只透露最起码的消息。我们认为，这个干部提到周总理亲自批准派我们出国，是为了鼓励我丈夫从伦敦的壳牌公司弄到所有中国公司想买的东西。

提审员断言我们伦敦之行是“去英国情报机关总部接受指示”。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而且我们加以供认，那么总理批准给我们护照就等于给我们的间谍活动开方便之门，这还是客气的说法。那些毛分子是否希望人们怀疑周恩来总理？这一切好象是十分牵强和荒谬的。但对刘少奇的指责同样也是牵强和荒谬的。提审员要我坦白，是因为还牵涉到别人，有的干部还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指的人中是否也包括周恩来总理？我只能猜测。我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对自己说。不过我觉得林彪或毛的妻子江青想把周恩来打下去倒是可能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江青恨周恩来，而林彪则把总理看作他实现野心的障碍。

提审员的声音又把我带回到审讯室。他说：“你们那次出国对中国毫无用处。”

“我丈夫在北京见到的干部对他说，他若是能从壳牌石油公司取得中国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为中国服务。他们还说跟外国人做生意对中国是有益的。”我对他说。

“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政策，是违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提审员说。

“我们党外人士怎么能知道？对我丈夫和我来说，人民政府就是政府，而代表政府的干部乃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人。”我说。

“你把你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活动都如实写出来，并交代你们所泄露的情报。”

“我丈夫访问了壳牌公司在伦敦和海牙的办事处。他见到了几名董事和一些与远东地区有关的人员。他还看了一些工厂和设备。我们一起看了些老朋友。”

“你们跟英国的政府官员见了面吗？”

“见了，我们有些老朋友是外交官。”

“他们问了你们中国的情况吗？”提审员问。

“在反右运动之前的1956和1957年，中国的情况是很好的。我们很乐意跟他们谈这些情况。经过多年战争之后，通货膨胀首次得到控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人民满意，生活安宁。他们都知道。”

“你们一定跟他们讲了些他们原来不知道的东西，你必须交代一切。”提审员说。

“我们可能对他们讲些什么呢？你只要查一下我们在

国内的社会关系，你就可以发现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个能了解重要情况的人。既然我们不可能进入政府机关偷窃文件，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只能来自我们的朋友。我们不认识任何了解重要情况的人，我们又怎么可能对英国朋友泄露什么重要情况呢？”

“你没有资格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得由我们来判断。你给我把你们1956和1957年欧洲之行的详细情况都写出来，将你们所见到的人以及与他们的谈话都写出来，然后我们来判断你们是否对他们谈了重要情况。”

“这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事。我怎么能记得十年以前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并且，我丈夫到办事处去或参观石油设备和工厂时，我没有一起去，我怎么能告诉你他讲了些什么？你们又怎么去核实我写的东西？你们总不能到英国去外调吧？你们应该做的是去调查我们在中国的关系，以弄清我们在国内是否有取得秘密情报的来源。我向你保证我们不认识任何有可能向我们提供能称为‘情报’的人。”

“是你在负责调查还是我在负责？”提审员火了。

我当然知道他想找我的错。一份清白的交代经过断章取义和鸡蛋里挑骨头以后也会变得可疑的。特别是在写一些生活琐事时我很少警惕。所以我就说：“当然，是你在审讯我，并且如你自己说的，你是人民政府的代表，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过看来是浪费时间。”

“如果我们能揭露帝国主义的特务，多化点时间我们不在乎。我们相信在中国的所有的外国公司都有双重身份。”

他们做生意赚钱，因为钱是资本家的上帝，但他们同时也为他们的政府搜集情报。”

“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放弃颠覆中国的企图，因为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现在很强大，他们无法用军事手段来消灭我们，所以他们寄希望于内部的异己分子。你们都是在他们的大学里接受过训练或在他们的办事处工作过，是他们潜在的同盟军。英国是侵略中国的第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它还霸占着香港。它虽然承认了人民政府，但在联合国里却跟着美国投票阻挡我们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是公开地支持国民党，而英国则在耍两面派的把戏。这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它有欺骗性。”提审员说。

“你在夸张。”我对他说。

“你最好别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否则对你更不利。”提审员说。

显然，跟他辩论国际关系是毫无用处的。我就不再吱声了，听他再说些什么。

“在你写交代之前，你必须纠正对刘少奇的看法。你应该认识到‘走资派’已经完蛋了。已被揭露出来永远不可能再上台，我们还要进一步将那些还隐藏着的‘走资派’揪出来。我们伟大领袖的决策必将取得胜利。所以，你唯一的出路是交代一切并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你如果以为中国有可能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情况，而你们这些有国外关系的人将再次受到‘走资派’的保护，那你将犯很大的错误。”提审员说。

这天的审讯使我很高兴，因为有机会让我讲话而我认

为我已澄清了一些问题。现在我决定利用他给我的机会进一步为刘少奇辩护。我认为看守所里除了毛派分子以外还有一些拥护刘少奇的人，我想弄清我的看法是否正确。

我装成傻乎乎的样子问：“说实在的，我还弄不懂刘少奇主席犯了什么错误，毛主席为什么要处分他。毛主席在他的著作中有好几个地方赞扬了刘主席，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数过。我真希望毛主席能宽恕刘少奇主席。你们难道不认为这样做对党和国家有好处吗？并且，不是刘主席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说法并号召党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吗？这当然说明他很尊敬毛主席。”

“不许你称叛徒为主席！”

“不许你为刘少奇辩护！”

他们喊了起来。

等他们安静下来之后，我说：“刘少奇若是确实有罪的话，我当然不敢为他辩护，不过我怀疑党中央作出判断所根据的那些材料是否可靠。你们知道在逼迫之下是很容易做假交代的，我想这是常发生的。”

我是有意这样刺他们的。这是对他们给我的迫害的一点小小的报复。实际上我所说的话触及了一个敏感点，从他们脸上露出来的害怕表情和从他们立即让我闭嘴的方式上，我肯定他们知道（或至少是怀疑）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是毛分子捏造出来的。

（1976年9月毛去世以及他的遗孀江青随即被捕以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正式告诉中国人民，江青和国防部长林彪是怎样成立专案组来捏造刘少奇的罪证的。文

件说，江青和林彪挑选出来的毛分子把刘少奇手下的人都抓了起来，加以严刑拷打，逼他们提供伪证。为了向江青和林彪证明他们是忠实地执行了指示，刘少奇专案组的成员把这些人被拷打时的哭喊声录了下来，放给江青和林彪听。)

“闭嘴！闭嘴！你是个疯女人！”提审员喊道，显然我坦率的讲话把他吓坏了。他马上又说：“刘少奇有罪，你也有罪！”

“我没有罪，这我能肯定。至于刘少奇主席，我感到他也没有罪。”我说

“闭嘴！闭嘴！闭住你的嘴！不许你再说话。”提审员命令道。

我听到后面砰的一声响。这时，在犯人椅子后面那小窗外的人不再悄悄的了。看来，在窗外听着的那个人对这场戏感到厌倦了。他砰的一声把窗关上，来显示他的不高兴。提审员立即站起来匆匆走了出去。

他回来后没有再坐下，而是给了我一卷纸。

“回囚室去，把你们去伦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写出来，将你们见到的人和跟他们的谈话写出来。要作详细交代。”

一个看守已等在门口，我跟他走了。

我不在时，监狱方面给我发了热开水，还保着温。与上午的米饭一样，这种仁慈和关心是不寻常的。他们对我这样仁慈是否由于我为刘少奇辩护？或是毛分子认为这种仁慈的姿态有可能使我感动而听从他们？当我坐在床边喝

热开水时，脑子里在这样想着。在正常情况下热开水不算回事，但在监狱的囚室中，特别是在严冬，它的滋味十分好。

突然，囚室门上的小窗被推开了，那年轻医生在窗外对我说：“过来！”

“你的踝部怎么啦？”他问道。

真令人吃惊！我从未听说过未经犯人要求而医生自己来看犯人的。我经常听到女犯人用焦急恳切的声音反复请求医生来。看守这时站在门外。我向她说明我的脚踝受了伤，好象有点发炎，她就打开了牢门。医生走了进来，他检查了我的脚踝并压了压肿胀的肉。

“没有骨折，只是表面有点发炎。我给你一点 绷带和药膏。”

不久，值班看守递给我一支金霉素药膏和一卷绷带。我正为得到如此特殊待遇而发愣时，我的晚餐送来了。我一看，是米饭和白菜，而不是平时的山芋。当我吃完饭把饭盒和筷子交给厨房里来的那个妇女时，她轻声地说：“是医生吩咐让你吃米饭的。”

脑子里把一天所遇到的事以及审讯的情况仔细地想了几遍以后，我觉得高兴。新的提审员是党的干部，但不象第一个那样是职业审讯员。我感到，他在这种环境下还不算太不讲理，至少他听取了我的发言并且全部记了下来。即使我知道毛分子会千方百计地要我交代并没有做过的事，我认为，有可能某些尚不是死硬的毛分子到时会认识到我是无辜的。当我准备上床时，我觉得我的情绪已经

好久没有这样安定了。可是，一整天紧张的审讯和跟提审员的辩论，对我这个脆弱的身体来说是负担太重了。那晚，发生了最严重的出血。在短时间里，囚室里所有的卫生纸和毛巾都用完了。到处都是血，连水泥地上也有。我很害怕，就喊看守。她立即找来了医生。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并让我绝对安静地躺在塑料床单上。第二天破晓，我被救护车送进了监狱医院。

第九章 连续不断的迫害

老式的救护车，在一边手摇铃响亮而连续的丁当声的伴奏下，快速驶过上海的街道。我躺在车板的担架上，一个女看守坐在折叠式的座位上，救护车内一点也不清洁。我的眼睛一直闭着，既是为了避免看见看守，她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我身上扫视，也是为了使自己独身处于思索之中。

我深深地感到失望，就象长时期等待审问一样，我的身上又开始不停地流着血。我怀疑自己是否生了一个恶性肿瘤。我想到了死，它似乎并不可怕。在这一切以后，我的死是我的生活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总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我的死只会被看作是生命长河中的一个间歇，因为我会继续活在我的女儿和她的孩子中，一代接一代，不会结束。但想起我的女儿，我的心就疼痛和担忧。她现在生活得怎么样？文化革命后她又会有怎样的将来？

救护车猛地一震，突然停下来。我听到远处扩音喇叭广播着毛的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当担架抬出

救护车时，我看见一个看守正指挥着在医院前的一群剃光了头的年轻男犯人。他们都扛着铁铲、铁锹和箩筐，毛语录的小红书是用细绳挎在他们的肩上。他们好象正在监狱医院后的某处“深挖洞”。毛的指示对他们来说，总是必须立即执行。但他们看上去十分憔悴，以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去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低着头，那凄惨的外表和沮丧的神情，使我马上联想到我就象他们一样，一个没有任何权利、根本不能把握自己命运、似乎并不存在的人。我把头转过去，不想看那灭绝人性的悲惨情景。我第一次为能独自呆在没有一面镜子的囚室而高兴，我能继续沉浸在自尊的幻景之中。

我被送进了外科病房。在小房间里，邻近的两个床的距离还不满一尺。我的床边是门，冷风通过门吹进房间，但要驱散血、尿、消毒剂和没洗过澡的人身上的汗臭等气味是不可能的。床的另一边是一个处于半昏迷状态正在呻吟的妇女，很明显，她刚从手术间回来。我想知道为什么把我安排在外科病人之中，这样的安排是否意味着狱医打算动手术。这情景使我非常不安。因为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共产党国家中，囚犯得到医疗服务理所当然是最差的。

不管怎样，在头几天里，仅仅是给我注射，出血得到了控制，由于能在床上休息，吃到好一些的食物，我感到有些力气了。一天傍晚，我的晚饭里出现了一只已变得发软、棕色的小香蕉，对这么一个小得可怜的香蕉会引起我的激动，使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在吃香蕉中我获得了一点愉快。

几天以后，我出血停止了。一个女医生来病房看我，

她在1967年冬天我得肺炎时给我看过病。她把我带到一间小办公室，告诉我她正设法请市医院的一位妇科医生给我作检查。但那时上海的各医院，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控制，拒绝为“阶级敌人”治疗。

“你认为我患的是什么病？”我问她。

“可能是一只瘤或者只是处于绝经期。”

“会不会是一只恶性肿瘤？”

“没有经过活组织检查很难说，”她说。

“我不怕死，”我说。“但在我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能死，我不能让嫌疑的阴影遗留给我的女儿，这将毁了她的幸福。另外，我渴望再见到我的女儿，我十分想念她。”我的声音颤抖着，说不下去了。

她同情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在所有写给第一看守所的报告中，我会强调你需要增加些营养。”

“医生请告诉我，我能为延长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我问她。

“吃下给你的一切东西，即使是最难咽的食物也有一些营养，要保持乐观。”

痛苦是如此吞噬着我的心，以致我都不会哭了。但当医生低声说“愿上帝保佑你”时，她的眼中噙满着泪水。

一个星期以后，我被带回第一看守所。那以后我每天二顿饭，上午十点钟的那顿在饭和白菜上还加了一小块肉或鱼。通常肉相当肥，有时皮上多半长满了毛，鱼从来没有新鲜的。但我记着医生的话，吃下了一切东西。

看守所的年青医生给我开了用钱购买维生素药丸的证

明，钱还是我当时存放在看守所的。一个男看守拿来了我的银行存折，并为我买了鱼肝油和维生素B复合药片。对我牙龈出血十分有用的维生素C，在上海买不到。

与看守待我的较人道的行为相反，好斗的毛分子毫不隐瞒对监狱当局给我额外食物和维生素决定的不满，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喊我或粗暴地碰我。当我因活动或受审离开囚室时，他们就重重地推我，使我绊跌，掐我的手臂、踢我的腿。如果我向他们要求允许添加维生素药丸时，他们就会拒绝给我并叫道：“你把维生素药丸当饭吃？”或者“你把这地方当作疗养院了？”

温和的看守则毫无疑问地服从医生的指令，每当我给他们看我没有多少维生素药丸了，他们就会为我买一些，但每次只买一瓶到二瓶。可是，被当作“刘少奇修正主义分子”的极少数看守，当他们值班时，每次会为我买几瓶。有一、二次，他们甚至在买了维生素药丸的同时，也买了袋装葡萄糖粉，在其他看守看见之前，通过小窗口迅速递进我的囚室。

从监狱医院回来后，有一天，值班看守递给我一支钢笔和一瓶墨水，她说：“接着写你的坦白！提审员等着要。”

我拾起提审员给我的一卷纸，那不是1966年冬要我写自传时给我的那种空白纸。每一张都有一条专门的毛语录，在纸的上方有红线圈成的一个长方形，写着“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纸右下角，通常是被监禁人签名的地方，写着“犯罪分子签名”。

一看到“犯罪分子”这侮辱性的词语我就很生气，并决

定不在它的后面签我的名。可是，经过几分钟的考虑后，我想出了利用一切机会来回击毛分子的办法。

在铅印的毛语录的下面，我画了另一个长方形，框上面同样写上“最高指示”，方框里面，我写了毛的另一段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语录，虽然小红书中没有，但很容易记住。语录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然后，我写了1956年我和已故丈夫在欧洲旅行的经过，其中有我们参观过国家的目录，我能想起的活动和我们见到过的人的姓名，包括相互交谈没有政治意义的一般话题。将近写完时，我突然记起来在英国期间碰到的两件重要的世界大事。它们是匈牙利事件和1956年的埃及战争。对第一件事，我不能很确切地评论，为了免于受罚，我只写了第二件事，作为和朋友交谈的一个话题，它不涉及到中国和共产主义。在纸的下面，印着“犯罪分子签名”几个字前，我加上了“没有犯任何罪的”几个字，然后签了我的名字。

我把这纸交给了值班看守。就在那天下午，我被叫去审问。

除了那个军人外，在审讯室里还是过去那几个人。每一个人都怒容满面，当我决定为自己不是犯罪分子而和他们争辩时，这样的场面是我预料的。我没有等提审员的暗示，立即向毛的画像鞠了躬。提审员规定我读的语录是，“对那些代表地主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必须用专政的力量来镇压他们，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提审员的面前是我写的那张纸。我坐下后，他瞪着我同时猛击桌子。然后，他又猛击一下桌子并叫道：“你在这上面干了些什么？”他指着纸，“你以为我们在和你做游戏？”

我保持沉默。

“你的态度不端正，”老工人说。

“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态度，你永远出不了这个地方，”青年工人说。

没等我说话，提审员就站起来，把我的交代扔到地上，纸张都散开了。他说，“回到你的囚室去重写！”

一个看守出现在门口，他叫道：“出来！”

我跟着他回到了囚室。给我的那卷纸和以前给的一样。第一张纸在顶部一个同样的红色长方形圈中印有语录，下面有“犯罪分子签名”的字样。既然我已开始这一系列行动，我就必须把斗争进行到底。我毫不犹豫地写了与上次相同的语录，并再次在我的署名前加了“没有犯任何罪的”几个字。我重写的交代和第一份不完全相同，但我有极好的记忆，或多或少有些相同。第三天，我把纸交给了看守。我又一次几乎立即被叫去。提审员再次把我的交代扔到地上，弄散了纸张，叫我再写一份。

这样又重复了一次。那以后提审员对我说：“你疯了？或许我们应该送你到精神病医院和疯人关在一起。”

“我不是疯子。如果你们对我写的不满意，请指出我的错误，我会乐于改正的。”

“你为什么在印的语录下加一条？为什么在你的署名前加上形容词？”提审员问。

“我只是想在纸上更准确地反映事实，”我说，“我想提醒你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应该改正我们的错误，我希望你们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改正你们在我案件中的错误。至于在我的署名前加了一句话，这是合适的，我没有犯过任何罪。如果你们一定要称我‘犯罪分子’，那么，我是一个没有犯任何罪的犯罪分子。”

“你不坦白你的罪，反而把时间花在狡辩上，”提审员答道，不再叫了。

“我从没犯过任何罪。如果你们坚持我有罪，你们必须提供证明。”

“我们当然能提供证明，但我们想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这样你能争取宽大处理。”

“我不是已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过你们，我从没犯过任何罪？不是已经发誓，如果你们能证明我犯了罪，就可以枪毙我？”

“你是在虚张声势！不要着急，时间到了我们会枪毙你的，”年青工人激动地说。

“回你的囚室再去写交代，”提审员说。

秘书给了我另一卷纸，我跟着看守回到了囚室。

当我看这卷纸时，我发现第一页还印有毛的语录，“犯罪分子签名”这几个字在纸的底部已没有了，其他所有的纸都是空白的。我又一次写下我的交代。两天以后，我把它交给了值班看守。

对于没有和毛分子打过交道的人来说，象我这样的受迫害者坚持反击可能会被认为是没有好处和毫无意义的，

但毛分子实质是恃强凌弱者。如果我允许按他们的意愿来侮辱我，他们就会得寸进尺。我在看守所的生活甚至会变得比过去更加无法忍受，此外在审讯室里，我讲的每一个字都被记录了下来。作为一个持久的乐观主义者，我希望有一天会有人受命调查我的情况，我说的话能帮助他得出正确的结论。

几天过去了，每天我都等着提审员来叫我继续受审，但始终没有再来叫我。一天早晨，一个军人男看守和一个踢过我的军人女看守来到我囚室的门前，“出来！”他们踢开门叫道。

当我弯腰去拿毛语录的小红书时，女看守走进囚室粗暴地推我，这是没有料到的举动，我几乎被推倒。

“你去的地方不需要带这个！”她把书从我手中抢去，扔到床上。然后她把我手臂扭到背后，男看守进来，把一副手铐铐在我的手腕上。女看守又用力推了我一把，我绊了一下，当我恢复平衡时，她又推了我一把。

“快点！快点！”她叫道。

我跟着看守出了女监狱，穿过院子向大门走去。提审员、青年工人和另一个人正等在第二道铁门边，停在车道中的是一辆坐着一个驾驶员的白色轿车，发动机正响着。

“进去！坐在中间，”提审员说。

我爬进车的后部，坐在中间的座位上，由于我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我只得笔直地坐着。我最初的感觉是对车子座位的柔软感到吃惊。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坐有弹簧的软椅子了。

提审员和年青工人坐在我的两边，另一个人和司机坐在一起。汽车沿着车道缓慢地行驶，渐渐加速，开出了监狱。

他们要带我到哪里去？是要象他们威胁的那样把我关进精神病医院？我想他们不会用这个借口这样对待我，因为我怀疑，他们要在黑暗掩盖下的监狱地区，对我执行最严厉的措施。转而又想，一旦杀死我，他们就没有希望从我这里榨出更多的东西。让我活着，但让我活得很艰难，可能是他们的目标。我想，精神病医院更象看守所，我要在一所精神病医院里继续斗争就很困难，精神上发作的尖叫和啼哭是会被制止的。可是，不久我发现，汽车没有朝着座落在郊外的一所精神病医院的方向开。

通过车上丝窗帘的飘动，我能看见我们正经过上海的商业区开向西郊。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稀少，熟悉的街道引出了我记忆的流水，我们穿过与我家只有一街之隔的十字路口，那里是第一医学院。1966年夏天，当我开始卷进文化革命的时候，在夜晚微弱的光里，我遇见从门口出来的惠妮至今，似乎一生过去了。我想知道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去了干校？我在报上读到过这些干部学校。

汽车缓慢开进了技术学校，在那里，我参加了对我们的前陶总会计师的第一次批斗会。1966年9月27日晚上，我也是从这里被带到第一看守所的。现在已是1969年3月初了，对我毫无根据的叛国的控告还套在我的头上。

几个人站在栅栏内晒太阳。其中一个人打开汽车门，带我进一个小房间，在我后面的另一个人把我的头往下

压，以致我能看见的只是在我前面走的人的两条腿。我一进房间就听到了锁门声，我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在布满灰尘的地方仅有孤零零的一只木凳，窗上贴着纸，我看不见外面。从天花板到地板都被大字报覆盖了，还有更多的大字报堆积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墙上的大字报看上去不是最近写的，有一些已经撕破了；所有的大字报都贴得很随便，互相重叠着。当开门让我进去时，一阵风把几张大字报吹落到地上。

我坐在凳子上，眼光在大字报上徘徊。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些草率地贴在墙上的大字报，是针对我来的，因为它们都是过去的半年到二年期间用过的旧大字报，现在再次贴出来无非是为了削弱我的斗志罢了。大字报的署名是那些壳牌公司的前职员。有些大字报是一个人写的，另一些是几个人署名的。大字报的内容是痛斥壳牌公司、我已故的丈夫和我。列出的“罪状”有许多，有些是对事实的歪曲或曲解，另一些则是纯粹想象出来的。我的朋友和在我丈夫死后来的三位英国经理的名字都被列入“外国情报官”，我被怀疑与他们密切合作。斯科特和奥斯汀的名字也出现在几张大字报上，我们办公室的秘书，那位俄国妇女则被痛斥为不列颠和苏联的双重代理人。

我闭上眼睛，以挡住这些讨厌的谎言。等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想我应该设法搞清楚外面在干什么，当我听到脚步声时，我敲了门。

“你想干什么？”一个男子的声音问。

“我可以到厕所去吗？”

一个妇女开了门锁，她领我到后面的另一个院子里。我们穿过宿舍区，挤过几排床铺才进入厕所。后来我知道，1966年以来壳牌公司的前职员都被禁闭在这里，边接受无休止的灌输边写坦白，同时还参加体力劳动。我听到在远处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会上致词，我想住在宿舍里的所有人都出席了会议。

当我走出厕所时，我没有被带回满是大幅报的小房间，而是来到会场。1966年，在这里开过壳牌公司前总会计师和我的批斗会。走在我后面的男子又一次用手把我的头往下压，两个妇女抓住我的手臂用力向前扯，迫使我走快，手铐勒进了我的手腕，很痛。她们的好斗实在是表现得过份。在中国，妇女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常这样做。

我被带到房子的前面，象一只口袋似地半扔半丢在地上。那男子把他的手压在我的头上，那样我就不能环视了。当我坐在地上时，他坐在我的右后面，他的手仍死死地压住我。

就在我坐下前，我从眼角中看见房子的地上坐满了人，这种安排有侮辱性，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只有奴隶、有罪的犯人和战争中的俘虏坐在地上。房里的人呼着口号，这些口号长期来我十分熟悉。他们喊着要我灭亡的口号整整有一分钟。我听到了房子里引人注意的脚步声。当口号的嘈杂声消失时，一个年青男子的声音出现在会场上。

“她在这里！”他尖声叫道。我想象得出他的一只手指指着我的头，“我们把她带到这儿来，就是要揭露她

是什么人。我们要让她明白我们知道她所有的秘密，你们所有人也卷入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同样有罪，因为从这个世纪以来你们也为这个剥削中国人民的商行工作；这商行还是一个为帝国主义收集情报的间谍组织。但你们犯罪的程度，根据你们在商行中的职位和为帝国主义分子工作的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职位越高，罪孽越重，安排做的工作越重要，罪孽越多。我们造反派是非常公正的，如果你有30%的罪孽，我们不会用50%来惩罚你。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它是建立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基础上的。

“在过去的二年半期间，我们结合体力劳动给你们每个人上了再教育的生动一课。你们中的许多人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你们能摆脱胆怯心理，走到前面来揭发敌人，但你们中的另一些人仍然在犹豫，你们象一支牙膏，挤一下，出来一些，挤得重一些，出来得多一些，不挤就不出来。好吧，如果你们继续保持消极的态度，我们就会尽力挤直到牙膏挤完。

“我们打算很快就让你们中的一些人回家，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要记住，只有那些我们认为改造得较好的人才允许走。另一些人将继续接受再教育。何时可以回家，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

讲话人的声音就对着我，我想，它是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年青人的声音，可能是一个工人造反派，因为对毛分子的绝对崇拜而有了点地位。这些造反派是文化革命的最

狂热的支持者，因为文化革命为他们个人的提升提供了梦想不到的机会。他们追随毛分子领袖，如江青那样的救世主，江青则把这些智力平庸、缺乏才能的人提拔上升。

从讲话人的话语中，我知道房间里坐在地上的人大多数是我的办事处的前职员。现在讲话人叫他们“揭发”或“批判”我，以拯救他们自己，他们不得不顺从。但我也知道，这种“揭发”“批判”事先都有安排，发言人是经过选择的，说什么是指定的，他们讲话的草稿都经造反派批准。甚至在文化革命前，在中国一个人如没有事先得到所在单位党委的批准，是不能公开发表声明的。在19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和1978年9月的“民主墙”期间，党鼓励大家说和写大字报，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党没有或没能审查每一次讲话和每一张大字报，人们超出了党要他们说的范围，形势一下子就控制不住，党只得又施加压力。

那些我过去每天见面、一起工作了八年以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重复我在小房间里看见的大字报上所写的内容。他们用犹豫和恐惧的声音说着谎话，从他们十分拗口的用词中，我知道，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羞辱和痛苦。我深感悲哀。伎俩高超的毛分子和造反派把我们所有的人迫害到了如此的地步。但我听得很仔细，从毛分子灌进这些人嘴里的话语里，我努力揣测毛分子的意图。

地板很硬，在我后面的男子用手把我的头使劲往下压，我觉得头颈很痛，就改换我的姿势，伸直一条腿，然后把头搁在膝盖上。我只看得见坐在我左边的那人蓝上衣

的一角，其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我不想东张西望，似乎愿意低下头，我后面的男子逐渐松劲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壳牌公司的前职员对我的批判变得越来越荒谬，对任何一个有一些知识的人来说，他们的话都是愚蠢和不可信的。所有的揭发和批判，就象在演出一个关于间谍的戏剧，不但演技差，而且没有一个确定的主题，也没有开头和结尾。

我听到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在叫我们的前总会计师陶发言。

在我旁边，我只看得见蓝上衣角的那个人站了起来，我想知道为什么毛分子把他安排在我旁边。

陶会计师用颤抖的声音说：“众所周知，我在文化革命初就被捕，被带到第二看守所。在那里，提审员和看守很友善地给我再教育，帮助我提高社会主义觉悟。逐渐地我认识到我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罪行的严重性，心里就产生了争取宽大处理的愿望，在那个时刻，好心和达理的造反派带我回这里并允许我的家属来看我……”他明显地为感情所动，不能继续说下去了。

“我的大儿子是党员，我的媳妇也是党员。我的儿子能受到较好的教育，完全是党和人民政府为他提供了机会，我的整个家庭永远感谢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无法描述当我见到我的妻子、儿子、媳妇和小孙子时，感到多么的悔恨……”

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中断了发言，啜泣着。

会场里死一般的沉寂。春天的太阳把窗栅栏的阴影投

射在我前面的地上，我看着它在地上移动。现在我知道会还要持续多久，我变得疲劳和饥饿。但我提醒自己不要松懈警戒，不知为什么，我认为陶的所作所为是造反派为我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但我毕竟没有一个受党特别教育的孩子。

当陶继续讲时，他似乎竭尽了全力，但他的声音仍不象他想要表现的那样坚定。“我的妻子、儿子和媳妇对我说过，造反派对我说过，代表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干部也对我说过，他们引导我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要坦白，和过去划清界线，我要回家和家属在一起，彻底坦白是唯一的出路，”他又中止了一会儿，好象很难再继续下去。然后，他却猛地用一种响亮和坚定的声音说：“我是英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我通过这女人的丈夫、已死的陈总经理介绍参加英国间谍组织，他死后，这女人成了我的上司。在文化革命开始时，她警告我不能坦白，并许诺如果我坚持到底给我一大笔钱。”

无论是否否认还是与陶争辩都是没用的，但我必须让这样的滑稽戏停止。我猛地抬起头，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反应是任何人不曾预料到的，由于惊呆，出现了片刻的沉默。然后，几个男子冲到我的身边，我后面的男子又把我的头往下压，另一个叫道：“你笑什么？”

又一个说：“你还敢笑！”

人们骚动的声音从房间的后面传来，甚至掺杂着抑制的笑声，片刻前紧张的气氛象爆破的气球，顷刻瓦解了。

嘈杂声中，掌握会议的年青人对着我吆喝道，“你为什么笑？回答我！”

“如果你们上演滑稽戏，你们一定会期望观众发笑，这是正常的反应，”我答道。由于我的头向下压着，我只能对着地说话。但我说得响亮，口齿又清楚，所以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话。我想在这些前职员面前表示，不必害怕毛分子。

“把她带出去！把她带出去！”年轻人叫喊着，然后他带领房里的其他人高呼反对我的口号。

我被强制地拖出房间，象一只口袋一样拉过院子并推进等着的汽车。一个女造反派用手压在我的嘴上，阻止我讲话，那男人也没有放松他在我头上的压力，我被按在汽车的后座上，处境艰难，那妇女蹲在座位的边上，那男子蹲在前后座位之间狭窄的空间里。此刻，虽然我头昏眼花，仍十分庆幸打乱了他们精心布置的斗争会。我想，如果我坐在那里默不作声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他们还会授意陶控诉我，揭发我，千方百计来证实他的谎言。我想毛分子让我坐在他的身边是有意图的。

当我回到囚室时，很不幸运，发现是军人女看守当班。无须说，她不让我吃饭，也没有取下我手腕上的手铐，她一开门锁，就将我用力一推，我蹒跚地进入囚室，瘫倒在床上。几乎在同时，走廊里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在车里押送我的那个男看守回来传我去受审。

看守走得极快，要跟上他很困难。当到达审讯室时，

我上气不接下气，心急如焚地跳着。

小房间里至少有八个人，四个人在面向毛画像沿墙的椅子上坐着，其他人围在提审员的周围。

提审员朝画像挥动手臂，我鞠躬时几乎失去了平衡，地板在晃动，我闭上了眼睛。

“继续站着！”某人说，但他的声音好象来自遥远的地方。

“你自己解释一下，你为什么笑？”另一个声音在远处说。

我想说话，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一定是饿昏了。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我被一个女看守支撑着坐在地上，手腕上的手铐没有了，左手的袖子已被卷起，一个年轻的医生站在我边上，正拧出注射器的针头。他向提审员点了点头就离开了审讯室。女看守把我拉起来推到犯人坐的椅子上后也离去了。

我的心仍急剧地跳动着，嘴唇干燥，但我感觉好了些。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难道没看见别人比你想得通？他们改变立场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边，他们坦白了一切。你打算怎么办？你是否也准备那样做，承认你的犯罪行为？”提审员问。

这时我感到有些力气了，医生给我注射了什么？是不是葡萄糖或其他药剂的静脉注射液？可能是一种兴奋剂，现在我完全醒了，准备斗争。

在我回答提审员的问题前，有人打断道：“你笑什么？”

你为什么笑？没有什么可笑的事情。揭露一个帝国主义的间谍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这是带我到技术学校开批斗会的青年人的声音。

我感到吃惊，他不象是个我凭声音和语词而曾经猜想的青年产业工人，他上身穿一件军官服，但没有红领章，他的裤子是深灰色的，这料子是至少每米30元的高级精仿毛织物，抵得上一个工人20天的薪水，他的头发抹着油，黑皮鞋擦得锃亮，左手腕上戴着一只金表。他是一个二十五岁左右并有着一副自命不凡样子的青年人。我弄不清他是谁，在文化革命期间怎么还敢如此讲究穿着，他这种穿着是要被痛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难道他不怕被当成阶级敌人？

几年以后，我了解到他的外表是部队高干子弟的象征。军服上装是表示穿戴者和武装部队有联系，因而可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父亲的地位给了这些年青人不同于那些企图掌权的造反派的特权。他们通过家庭的关系，可不同凡响地直接登上权力宝座，顷刻，他们又成为共产主义中国的恐怖分子，专门参与抢劫、强奸、赌博和组织黑社会等活动。

这些部队高干子弟是中国最大的“后门”人物和“有路子”的人。他们能安排任何事，从房子、工作到进出口贸易，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父亲的老朋友的网络而不通过国家的官僚机构就把事情办好。甚至那些渴望和内地关系密切的香港商人，也不得不贿赂这些摆架子的青年人，经常通过“工作”的幌子使他们能自由出入香港这个英国殖民

地，把黄金、银元和古董走私出中国，把电视机、录音机和手表走私进中国。

“回答！回答！”穿着考究的青年人叫道。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提审员，只见提审员正盯着前面的纸，似乎青年人接管了审问我的工作惹恼了他。

“我笑是因为滑稽，”我对他说。

“滑稽什么？”他问。

“你们安排的整个事情都滑稽。”

“你自己解释一下。”

“那好。你们看到了吗？陶在说谎，很拙劣的谎话，但你们却相信他还打算让他回家，那不是滑稽？”

“陶没有说谎。”

“他没说谎？你们认为他确实是一个间谍？假若是那样，你们不判一个间谍死罪或其他严厉的惩罚，却让他回家，岂不更滑稽？”

“再不要提陶的事。你自己怎么样？你不想回家？”

“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人民政府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和北京的《人民日报》上公开道歉，但我不要说谎，我所要达到的一切只是忠于事实。”我说。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穿着讲究但又相当愚蠢的青年人，他是意识不到我笑只是为了打破他们精心安排的批斗会的。突然，他站起来用激动的声音叫道：“低下你的头！低下你的头！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用一双探照灯一样的眼睛盯着我！”

坐在他旁边的人，显然是个奴才，迅速站起来走到我

面前，伸手把我的头往下压。

“看着对我说话的人是我的习惯。如果我使你神经过敏，我道歉。你难道愿意我背对着你坐？”由于给囚犯坐的椅子固定在地上不能移动，我就转身面向墙上的毛的画像，我从眼角瞥见提审员，他正咬着嘴唇克制着发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不是英国间谍？打不打算坦白？”年青人问。

“我不是什么间谍，我没什么可坦白的，”我对着墙坚定地说。墙上毛的画像俯视着我，当我凝视毛的脸时，我发觉他的脸看上去似乎表情仁慈，但实际上是自我欣赏的假笑。我不知道，这么一个孤家寡人怎么能造成遍及中国的灾难，我想，在我们自己的品性中一定缺乏某种东西，才使毛显露他的邪恶的才华成为可能。

“你是一个间谍！”年青人愤怒地叫道。

“我不是间谍。”我摇摇头。

“我们有你是间谍的证据。”

“那么，请出示证据，”我又一次转过来面对他。

“今天上午你没有听到你的职员揭发？”

“那不是证据，只是在胁迫下为揭发而捏造的空话。”

“你不用担心，我们会拿出具体证据的。一、二、三、四……这里有一个你所作所为的相当长的单子。只是到了那时，你要争取宽大处理就晚了。”

“一个真正的间谍不应该得到宽大处理，不论他是否坦白，一个真正的间谍应该枪毙，”我声明着。

提审员站起来接过了话题：“你现在回囚室去，仔细

考虑今天上午批斗会上你听到的每一件事，它们不会全是谎话，有些是严重的问题。你的处境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他起身走出审讯室，看守来带我回囚室。

当我走近女监房时，我看见一个围着白围裙的妇女从厨房出来，她推着一辆很大的手推车，车上一层一层地装着给犯人的盛着新鲜山芋的盒子，二个劳动改造的姑娘在帮她。显然，这时也正在给其他狱室发饭，盛饭和白菜的二个盒子在山芋的黄棕色中显得很突出。我一回到囚室，一份饭菜就从小窗口推了进来。

现在我的牙龈出血相当频繁，在进食前我不得不用清水洗洗嘴，不这样做食物就有血腥味。咀嚼变得越来越困难，白菜通常又韧又硬，吃一顿饭要化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还没等我吃完饭就要交回饭盒和筷子，他们允许我在监狱商店买了一把塑料调羹。现在，我坐在床边，把饭和白菜舀进一只杯子，冲洗着铝盒和筷子，准备还给厨房来的妇女，并用塑料调羹开始吃今天唯一的一顿饭。我边吃边回想白天发生的事。

尽管受虐待又戴着手铐，但我觉得今天一整天没有浪费。我知道了公司前职员的情况，在敏锐的观察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困境。对他们中如此多的人屈服于压力，我感到遗憾，可以想象那压力一定很大。写我的大字报上没出现名字，也没有在批斗会上发言的另一些人，我倒为他们担心，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对陶总会计师来说，我感到他的行为是多么卑怯。但我相信，我只得宽恕他。他那啜泣声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这是到了穷途末路的痛苦灵魂的哭喊。

天气明显地暖了些，我不再颤抖了，我不知道要不要洗掉身上的羊毛衫并收藏好。我感到我应该保存好我的冬衣，正象监狱商店的藏货一样。上帝才知道我要在拘留所里呆多久，事实上，我和毛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我决不能死。

我上床后不久，值班看守来到小窗口。她轻轻地推开窗子，低声说：“你想洗一次热水澡吗？”

真是出乎意料的好提议！囚犯每月才允许有一次热水淋浴。在冬天，天气太冷，在囚室内不能用冷水洗澡。从上次热淋浴后我计算着到下一次的天数。那天下午，当我从审讯室回来时，我注意到整个傍晚女看守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淋浴房，看来现在她们都洗完了，看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用完留在管子里的热水。

我跳下床，抓起肥皂盒和毛巾，跟她来到淋浴间。我站在喷嘴下，冲洗头发和身子。自从有一次我勇敢地捍卫她们的前领袖刘少奇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一些看守的态度有了变化。我从淋浴间出来，悄悄地走回囚室，一会儿，看守来上了锁。

第二天下雨了，它既不是隆冬的雨，刺骨的寒冷，滴水成冰，也不是酷暑的倾盆大雨，它是温柔的毛毛雨，湿润了泥土，唤醒着花草和树木，它预兆着春天的逼近。我喜欢春雨后泥土的清新，它充满了希望和憧憬，今朝花蕾初绽，明日绿叶成荫……冬天的消逝，相对好些的食物、维生素药丸以及一些看守宽容的态度，这一切，使我变得

不象过去那样紧张了。我发现，我经受得住生存的折磨，我不必为将来过多担忧。

我异常快活的感觉持续到第二天，以致在我又被叫去审问时，我走的步子相当轻快。这次，审讯室里只有穿着考究的年青人和青年工人坐在台后。

我进房间后，看守关上门。年青人抬起手臂指向毛的像，我鞠了躬。他要我读的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是否更热爱英国？”他问。

“我是中国公民，当然更热爱中国，”我回答。

“如果撇开公民身份，你还更热爱中国？”

“我的血管里流着炎黄子孙的血，当然更热爱中国，我是爱国的中国人。”

“1940年你在美国吗？”

“是的，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在那里，你是否发表过演说？”

“是的，我作过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演说。”

“我们有你同时作的其他演说材料，是赞扬英日战争的。你是在纽约的电台中演说的，听讲的是你前燕京大学的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已坦白并提供了这种材料。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也讲过。总之，当你回到重庆后，你宣传了国民党电台的论调。你说英帝国主义分子是很勇敢的英雄，他们坚持斗争直到赢得最终的胜利。是英国政府让你为他们

做宣传？1940年你已被英国收买？回答我！”

“我是从英国坐英国客船到纽约的，电台采访了许多乘客，记者曾问我有关英国的一些问题，很自然，我真实地作了回答，”我说。

“你为英国做宣传。”

“在战争期间，英国和中国站在同一边。”

“不是在1940年，是指英国后来帮助日本期间。你能拿出什么证据来消除这样一个疑问，即早在1940年你就是一个英国间谍。”

“胡说，我只是在英国的一个中国访问者。当时正值英国单独抵抗希特勒征服全欧洲计划的时候，面对敌人强大的优势，我为英国人民的勇敢顽强，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

“听你说的，现在你还在附和英帝国主义的宣传路线。我们认为你更热爱英国。”

“你完全可以按你想想的去考虑，但你必须证实对我的控告。”

“我们会证实的，我们将证明你声称的爱国主义是假的，目的是掩盖你邪恶的行为。”

他从台子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小文件夹，在翻着看，我只能看见它的背面，我想知道他神经高度集中地在看什么。突然，他把文件转向我，我看见里面夹有一张五十年代初期我和一个瑞士朋友跳舞的黑白照片，那时在上海还有法国俱乐部，有一个失业的摄影师，以一元钱一张为俱乐部的宾客拍快照并提供照片。为了帮助这个人，我们都

买了照片。当红卫兵来我家时，这些照片在贮藏间，他们一定拿去了许多。我的瑞士朋友是一个会许多花式跳法的出色舞伴。在照片里，他正在教我新步子，我们两个都在笑。

“你能说这是爱国的行为？”年青人严厉地说，好象他已抓到了某些严重的把柄。

“跳舞和爱国有什么联系？”我实在迷惑。

“你和一个外国人跳舞，看上去又相当快活，那就是明显不爱国的行为。”

“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我对他矛头所向相当吃惊，但立刻恢复了，考虑如何把争论转向对我有利。我继续说：“我不知道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但我必须接受你高水平的判断，因为你是一个有知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派。可是，如果说我不爱国，至少我是有用的，那是给予我的极高评价，你不这么认为？”

“你是什么意思，你是有用的？”

“是的，你刚说过和外国人跳舞是不爱国，我可以通过和我的瑞士朋友跳舞使他不爱国，因为在他眼中我是外国人。如果通过简单的跳舞行为我能使其他人不爱国，不正是有用吗？从这点上可看到这种可能性，即你可让我和全世界中国的敌人跳舞，让我使他们不爱国。那样，不用开一枪，他们都不爱国了。还有什么人能比这样做更有用？”我真有点乐不可言了，以致我难以说清楚最后几个字了。

但年青人没有被逗乐，他的脸气得通红，指着审讯室的门叫道：“滚出去！滚出去！我要枪毙你！”

当他吆喝我出去时，看上去预示着凶兆，我赶忙逃出房间，但走廊里没有带我回囚室的看守。我等着，尽量憋住笑，我认为在那冷酷的地方发笑是不理智和不慎重的。他们可能以为我确实是一个疯子，有理由把我送进精神病医院。

可是，用嘲笑使某人的威信扫地是不值得的，第二天对此我就十分清楚了。

就在囚犯的早中饭前，我被唤到了审讯室。准备工作后，还是那个年青人递给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在某页，上面印有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对一群国民党将官广播的一封信。信是毛泽东在1948年12月起草的，当时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包围在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附近的长江北岸，它指出国民党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敦促国民党将领投降。

“继续站着，高声读信，”年青人命令。

我大声读着全文，读完即把书交还给他，他说：“再读一遍，让字字都印进你愚蠢的头脑里。”

我又读了起来，当我第二次读完时，他说：“每个字都印进去了？要明白你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你就象那些国民党将官被包围了，没有办法可寻！唯一的出路是投降。”

我没有说话，他瞪了我一会又喊道：“再读！”

当我读完，我们相互盯着，然后他不耐烦地叫道：“再读！让字字都印进你那花岗岩脑袋！”

那天，我在审讯室里一连站了几小时，一遍又一遍地

读，直到我头昏眼花，我的嗓子嘶哑，腿肿得很厉害。到了近黄昏，我极疲倦，我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了，我读每一个字都十分吃力。从这时起，我已经记住了全文，我不用看书，能闭着眼缓慢地背诵出来。逐渐地我捧着书的手臂垂了下来，不知何时我停了下来，显出踌躇的样子。年青人喊道：“你打算投降了？”他在等我回答。见我没有回答，他又喊到：“再读！”

当我最先开始读时，青年工人盯着我，现在，我看到他已失去了兴趣，头放在交叉的手臂上，似乎在打盹。他们两个轮流出去吃饭。我却不得进食，饥饿和干渴使我变得迷迷糊糊了，我的嘴相当干，声音变成微弱的喃喃声了。尽管这样，每次我背诵完后，年青人就喊道：“重读！”

直到天黑我才被允许回囚室，虽然我很难确定我站在审讯室读毛起草的信有多久，但至少在七小时以上。一整天没有给过我任何食物，仅在早晨我到审讯室前和夜晚回囚室后喝过水。为了给自己一些营养，我吞了一把鱼肝油胶囊和复合维生素B药片。

除第二、第三天晚饭时间我被允许回囚室外，这种例行公事继续了三天。除此之外，在第二、第三天，准许我在下午饭开饭时按时回到囚室，女监房的值班看守和年青人串通起来，她延长夜晚运动时间，同时，她站在我囚室门外监视着，看我在囚室里一圈一圈整整地走一个小时。在我睡觉以后，值夜班的看守反复来到我囚室的门前，乒乒乓乓地打开和关闭小窗或用沉重的靴子踢门来打扰我睡觉。尽管在夜晚被吵醒几次，基本上我还是睡熟了。

第三天下午，我的身体又要再次病倒了。我想，这一点两个青年人知道的。黄昏时分，他们两人问我：“你打算投降吗？”

我想讲话，但我相当虚弱，喉咙太干，仅发出一种嘶哑的声音。

“说清楚！你打算投降吗？”穿着考究的年青人问。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集中了全部的气力说：“没罪！”

“你当该被枪毙！”

他情绪激动地离开房间并砰地关上了门。我在囚犯的椅子上坐下休息，等着看守。

青年工人皱着眉迷惑地盯着我，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在想些什么？你寄于希望的又是什么？”

我没说话，一个看守进来带我出房间。

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但我没有再被唤去。每天我多次想起这一连串的审问，想起我和所有的提审员、包括穿着考究的年青人的交战，我一遍又一遍仔细回味他们问我的问题和我的回答。我做得对吗？否则我又该怎么做？我得出结论，尽管有时他们好象在努力证实过去发生的事情，但很明显，所有的提审员都企图发现我有罪，提出引诱我回答的问题，从中发现可用来反对我的东西。同时，他们用一次次的审讯来显示他们在权力上压过我，想最终吓得我投降。这种审讯对解决我的问题没有一点帮助，唯有增加我的痛苦。事实上，一连串的审讯并没能从我那里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

随着天气的暖和，我的体质似乎稍微有了些好转。我

清洗了冬天用的毛线衫和短袜，并拿出来晒，我洗了棉衣领子和袖口并把它们翻过来，准备来年再穿，准备在这里长期呆下去。我告诉自己，我活得下去，我仍有希望。哲学家老子曾经说过，物极必反。我一定要等着，我每天运动，化几小时背诵诗歌。我常常坐着把毛的书放在膝盖上，好象我正全神贯注地读他的文章，但实际上我的头脑里充满了李白和杜甫的诗句。

1969年4月1日，我被逮捕二年半后，等待已久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了。报纸发表了林彪作的重要的政治报告，报告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狠抓阶级斗争的胜利。在1500名代表中相当多的是来自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他的支持者。在新党章中，林彪被正式称作毛的接班人。林彪和江青成功地在297人的中央委员会中安插进他们的同伙，许多著名的党的老干部落选，只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等极少数人还维持着他们的位置，但是有影响的革命老战士大大地减少了。报纸上最新刊登的照片上，毛站在当中，他的左边是林彪和江青之类的毛分子领导人，他的右边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少数革命老战士。

在九大召开期间，报纸每天都报道老百姓拥护和支持九大的情况。在看守所，从早到晚强迫囚犯听各种报道和新闻公报，包括长长的代表名单。熟悉的名字没有出现，新的名字出现了。这反映出党的领导层正在形成新的权力联盟。在林彪作政治报告的那天，所有的囚犯都从睡梦中被唤醒，穿起衣服，听报告录音。

一天早晨，我正安定下来吃饭时，囚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男看守喊道：“出来！”

我不理他，同时不加咀嚼一口接一口迅速地吞下饭。

“出来！”他再次喊道，但没有进来。

当我把饭扒进嘴里时，连筷子也掉了。我决心不管面临什么，总要在胃里贮存进一些食物，我觉得他们有意选择这种时候审讯我，使我吃不上饭。

“出来！”他第三次喊叫并走进囚室。他老练地拿下我手上装有食物的杯子放到桌上，“回来你再吃，”他说。

我迅速用另一只杯子从脸盆里舀满冷水，喝了几口，冲下留在食道里发硬的饭粒。

“快点！你太慢了，”他说。

“请出去，我要解手。”

他只得离开囚室，值班的女看守进来监视我。我洗手和擦嘴。当我拿起毛语录的小红书，善良的女看守摇摇头并低声说：“带它没用。”我把书放回床，跟着她出了囚室。

那好斗的女看守冲进走廊，气喘喘地叫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慢？”

我跟着她出了女监房到了院子里，另一个男看守拿着一副手铐等着。女看守把我的手臂反扭在后并在手腕上铐上手铐。然后她猛力一推使我蹒跚地向前，当我刚恢复平衡开始正常走路时，她又是使劲一推。这样一推一颠，我到了看守所的前门。还是那辆白色的轿车停在那里，司机在他的位子上坐着。他的手放在方向盘上，不时地发出喇叭声，直到他看见我走来。那穿着考究的年青人来回踱

着步，那老工人站在附近。

当他们看见我时，两人走过来，从年轻人的脸部表情中我知道，由于我不妥协，今天他们将惩罚我。他咬牙切齿地说：“唤你去参加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和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庆祝会，务必注意你的行为，抛弃你的傲慢态度！否则，造反派将把你撕成碎片。”他的肌肉有些松弛了，似乎他对造反派将把我撕碎的预言感到满意。

“在这第一看守所里，我们有对待犯人的狱规和条例，我们对你是相当宽大和克制的，出了这个门，情况就不同了，造反派群众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你最好小心点，说话不要出轨。其实，你最好是驯服和顺从，否则他们会杀死你。已经有许多人被那样杀死了，”那老工人说。

他们真的关心我的生命？我想不是。他们显然想避免由于怕我在批斗会上不驯服而出现意外情况。我想可能高级官员要出席这个会，他们想给这些人留下好印象。

“你弄清形势了吗？”年青人问我。

“如果我不被激怒，我不会反击。”我告诉他。

“也许在我们去之前应该好好地教训你一顿，”他说，捏起拳头，在我眼前挥舞。

“你应该清楚，从现在起我不是那种受肉体暴虐默不作声的人，你越激怒我，我越要反击。”

“那好，我们会让群众教训你的，你最好当心，如果你反击，他们会杀死你。”

“你是说如某人问我问题，我必须保持沉默？”我想把情况弄清楚。

“是的，就低头承认你有罪。”

“要我承认不真实的事情我宁愿去死。”

“那就保持沉默。无论他们对你说什么，你只要保持安静，”老工人说，他似乎明显地比两个青年人温和些。

“那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将保持沉默，但那并不意味着我承认有罪。”

“你是否有罪不是由群众决定的，”老工人要让我相信。

年青人把我带进汽车。我坐在后面的座位上，旁边是老工人和另外一个男子；年青人坐在司机旁边。当汽车开上街，另一辆轿车紧跟着，里面坐着参加最后几次审讯我的提审员。

四月，在上海是美好的季节，工业城市里受污染的大气被沿街梧桐树的嫩叶净化了，变得很清新。在冬季以后一切有一种更新的感觉。由于汽车的窗子开着，棕色的丝质窗帘在微风中飘动，所以我能看见街上的一些东西。车子正穿过市区向北前进，在交叉路口我们频繁地受到庆祝党的九大闭幕的游行队伍的阻拦。到处是大红横幅、彩纸标语，锣鼓和毛的像，就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游行一样。但我注意到，现在参加游行的群众，看上去和三年前激动的人群很不相同，我发觉过去的热情和兴奋没有了，人们看上去显得厌烦。他们的步子又慢又拖拉，喊口号的声音又软又低，一些人就象根本没加入。似乎在狠抓不忘阶级斗争近三年以后，他们变得疲劳了，更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他们完全失望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孩子是红卫兵，自从昔日的红卫兵被分配到农村去以后，他们

不得不给在乡下的孩子带去食物和衣服。另一些人可能发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和减产，对他们已经穷困的生活状况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往常，上海的街道挤满了闲逛的人。但在这个春天，除去游行的人，极少有闲着的旁观者。我感到迷惑，因为我不能想象红卫兵和造反派是怎样强暴地把人们赶离街道的。在派别内战期间，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战斗，流弹已使许多人受到了伤害。

当汽车到达城郊各大学和军事机场所在区域时，空军的游行队伍朝我们走来，队伍的末尾是穿着军装的女兵分队，这些姑娘年青苗条，引人注目。她们比有关空军电影剧本中的女子更有魅力。在我释放以后，当林彪事件正式公开披露出来并作为批判的目标时，我知道了关于这些年青姑娘的一些事情。林彪让他25岁的儿子林立果从专为高干子弟开设军事院校毕业后就当上了中国空军司令部第二号人物。那些林彪的追随者们从全国各地挑选美女给林立果送去，仿效古代皇储的选美，真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了。这“选美”计划是以给少女在部队提供工作为诱饵，因为在部队的军人有较高的威信又保证有较好的待遇。为了她们家庭的特殊考虑，姑娘们急切地登记了。决不会意识到她们是为讨好林立果的欢心而被选上的。然后，她们被带到上海，那里有一个林立果精心建立的秘密据点，以检查身体为借口挑选少女，那些不中林立果心意的姑娘就安排在空军工作，这就是我看到的参加游行的女兵。

汽车转进由红砖砌成房屋住区的大门，没有标牌表示

此地的性质，也没有哨兵守门，当准许我们二辆汽车进入后就关上了门。气氛相当的神秘，我决定密切注意观察一切。看来，他们好象不想让我知道带我来的地方的性质。

穿过整齐的草坪和已绽芽的柳树，汽车在一幢楼前停下，两个身穿蓝色毛式制服、戴着造反派红袖章、样子结实的妇女等着，其中一个打开了汽车门，老工人跳了出去，我正准备下车时，另一个妇女伸出她的手粗暴地把我拉出来，然后两个妇女用手夹着我的手臂把我架进房子，好象我要逃跑似的。我们来到一个小房间，把我推到一个角落。

“面向墙壁！不准动！”一个妇女喊道。

我听到两个妇女重重地坐下，没说一句话。似乎过了很长时间后，我听到门被打开，一个男人的声音提到了食物，低声商议后，其中一个妇女离开了小房间。在她回来时，另一个妇女出去。全部时间里我都面向墙站着。

在一片寂静中长时间地等着，在心里默数到第一百以后，我就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转到另一只脚上。突然，门又被打开了，就象中国高干家里的仆人对他的主人说话那样，一个男子带着敬畏和神秘的声音说：“来了！”这意味着某人来了或到了。从传话人声音的语调中可知，来的是一个重要人物。

两个妇女象闪电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又夹着我的手臂，把我半架半拖地拉出小房间。我们经过冷冷清清的篮球场，沿着树荫夹道的小路进入另一幢楼。我的脚几乎不着地，我的腋窝被这两个妇女的象铁一样的手指掐伤了。

我们进入约聚集着一百人的会场，与会者分两边面对面地坐着，当中留有空间，第三面有一凸起的讲台。一群穿着便服的人围成半圆坐在台子后面，第一看守所来的人加入在他们之中，墙上挂着普通的红布用白颜料写的文化大革命的标语，上面写的不外乎是宣布毛分子的伟大胜利和党内“走资派”的彻底失败，历史性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注意到，毛的正式接班人林彪的像，出现在毛的标准像旁边。

房间里的陈设雅致、整洁，显示着这幢楼属于预算阔绰和较高级别的机构，这就意味着只能是部队机构。我观察了到会的人，觉得这里人的穿着似乎比街上的普通人来得好些，有许多人穿着毛料和涤纶的上衣和裤子，并不象在上海一个普通会议上的一片蓝棉布。

两个妇女把我押到对着讲台的麦克风前，其中一个把我的头往下压，我只得看着地板，目光之内只见从麦克风引出的三根缠绕的电线。我想，一根电线一定通向电源出口，另一根电线通向哪里呢？有没有可能另外房间的人正在收听这里的批斗会？他们会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神秘的方式？或许他们不想让我看见他们？我瞥见在半圆台后，除了我所在地区的警察和上海工商部门负责外国商行的女青年外，还有几个政府官员。记得过去在邀请我参加的上海少数西方代表团的外交招待会上，我曾看到过的一个副市长和一些外交部的官员。现在上海市政府被夺了权，他们一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者。因此，对此情形唯一能解释的是，林彪的人接管了对我的调查。听批斗

会的人是穿军服的，他们不想让我看的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的军人服饰。

房里参加会议的人挥动着小红书，喊着口号，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接着喊“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似乎不仅反映出在党的九大后林的地位的提高，而且证实了组织这个会议的人是他的亲信，急于助长对林彪的个人崇拜。

两条腿进入我的视域，在我前面讲话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他向参加会议的人介绍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我已经注意到，每次造反派叙述我的生活经历时，我都变成了一个富人，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堕落和奢侈。现在，滑稽戏又达到了荒谬的地步。既然要我不反击且保持沉默，与早在1966年的批斗会相比，我显得相当放松和超然。可是，当发言人告诉参加会议的人我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时，参加会议的人从他们的座位上跳起来，围住我用叫喊和辱骂来表达他们的激怒和愤慨。

这样的中伤是难以忍受的，我本能地抬起头，那两个妇女突然把我的手铐猛地往上一拉，剧痛撕裂着我的肩关节，我只得让身体向前弯、头向下冲来减轻这极大的痛苦。在批判、谴责我的间歇，她们也让我保持这种姿势，只有当人们再次呼喊口号时，才允许我的手臂垂回原处。以后，我了解到这是所谓的“飞机式”，是造反派发明的，想以此来折磨执拗的被害者，迫使他们在奴性的屈服中低头。

另一个人接着发言，他声称我违抗代表共产党的造反派司令部的命令，不愿坦白。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强调我

没有犯罪，将被解释为反对党的挑战行为。参加会议的人甚至更加激怒了，或许不服从党的命令比一个间谍有更重的罪孽？在我被推倒在地之前我已没有时间考虑答案。然而，在我旁边的妇女用她们强壮的手臂又把我拉起来，我被恢复到早先在麦克风后的姿势。

第三个人发言，他痛骂我捍卫刘少奇。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少奇和大量的“刘是敌人确切无疑”的宣传后，刘对每一件他决定的事都称是他做的，刘少奇与每一个不想卷入政治旋涡的人一样，以生硬来表示他的愤怒。当一个人想要表现不真实的感情时，他就会趋向夸张，这些参加会议和发言的人都象舞台上的演员无一例外。两个妇女总是时时准备再次把我拉起来，有一、二次她们甚至冲着我把手臂抬起又向下甩。

不久参加批斗会的“演员”进入了歇斯底里状态，他们的口号声淹没了发言者的声音。某人从背后猛烈地推我，我颠跌并撞倒了麦克风。一个妇女想扶起它，却被电线绊倒，把我也拖倒了。由于我的手臂被手铐拴在背后，我倒下去的姿势很笨拙，我的头被压到了地板上，另外许多人跌倒在我们的身上，每个人似乎都在喊叫，就象到了地狱一样。几分钟过去了，最终我又被拉起来。

实在太精疲力尽了，我盼着会议早一点结束。但讲话在继续，似乎坐在讲台上的每个人都想作贡献。他们不再痛骂我，取而代之的是，每人都竭尽最动听的词句和过度奉承的语言竞相为林彪唱赞歌，以表现他们对林彪的耿耿忠心。我想，在附近房间听着的人，一定是林彪的忠实代理人。

突然，我后面的门开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叫道：“走了！”这意味着某人离开了，两个简单的字产生的效果竟象电闪一样，发言人讲到一半的话停住了。既然重要人物或在另外房间听的人已经走了，就没有更多继续表演的必要。一些“演员”已经跷起了腿，另一些“演员”正整理他们的手提包和衣服。发言者匆忙领着他们喊口号，只有少数人响应，他被大大忽视了。似乎人们不再对我生气，尽管他们没有笑，瞥向我的眼光是漠不关心的。我只是他们参加的这些批斗会许多斗争对象中的一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要求做。现在结束了，当一个男子擦我而过时，他后面的一些人甚至伸手扶稳我。

房间立即空旷了。我能听到许多离开座席的人出楼时的闲聊声：“真是扫兴得很，是吗？”“到哪里去吃晚饭？”“天不下雨吗？”等等。他们的谈话听起来和电影院或剧院散场观众离开时没什么两样。

就象一只气球爆破放出了气体，紧张的气氛消散了。两个妇女让我等汽车，这时她们允许我自己走。对于她们，演出同样结束了。

“庆祝”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持续了几个星期，每隔几天我被带到不同的批斗会上。有时没象第一次组织得那样好，当“演员”的情绪相当激烈时，我吃了不少苦头。以后，我又被唤到审讯室，提审员问我是否准备坦白，我还是说：“我没什么可坦白的”，或“我没有罪”，或简单地保持沉默。那以后我还被带到另外的批斗会上。这种从一个批斗会到另一个批斗会整我的做法称作“车轮大战”，这是

一个使人头脑麻木的痛苦过程。一天接一天，我的双耳充满了愤怒的谴责声，我的眼前全是模糊的、带着敌意的面孔，我的身体因受了粗暴的虐待而疼痛不堪，我感到自己不再象一个人，只是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有时我的灵魂似乎离开了躯体，超脱地旁观着所发生的一切。尽管我不再思考和推测今后将会怎么样，使自己超脱起来，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糊涂过或害怕过。

我亲身经历“车轮大战”。尽管在那时是充满痛苦的，但和许多遭受同样经历的人相比，还是相当侥幸的。

19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人们开始叙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我遇见过一个形容枯槁的老人，他用幽默的口吻谈了他的经历。他告诉我，斗他“超过了一百次”，造反派经常用一块很重的铁挂在他的头颈上，这种办法是用来惩罚拒不自愿低下头的斗争对象的。只是当他告诉我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在批斗会中死去时，他才动了感情。我向他问起给被害人造成极大痛苦的“飞机式”时，他却并没引起很大重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种办法对所有的斗争对象都使用。

第十章 弟弟的忏悔

当一连串的批斗会告一段落时，夏季已到我们中间。在又潮湿又闷热的七月来到之前，六月的上海有一个月的雨季，一般叫黄梅季节。在那些日子里，牢室的天花板上布满了潮气，水泥地也因潮湿变得更黑了。一场倾盆大雨之后，阴沟里的水泛了出来，通过墙基渗透进牢室来，在墙角形成了阴沉的黑水潭。发霉和腐烂的臭气弥漫在整个牢室，使人感到窒息。我收藏在一边的棉袄、夹裤，甚至是头天晚上放在地上的鞋子都长出了绿色的霉斑。

当时我总是急切地盼望天气暖和些，因为天气一冷我就会止不住地打抖，我只得把所有的衣服都披在上来保暖。我的关节因潮湿变得又肿又疼，早晨若是刮风下雨天，我的关节僵硬得使我从床上起来都很困难。同时，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不刷牙时也一直在出血，我不得不用一个手指按压牙龈把血挤出来。在吃东西之前，我都要用清水洗一下嘴巴，即使这样，发炎的牙龈接触到带咸味的食物，仍疼痛得全身颤抖。因此我只得在每次吃蔬菜前先用冷开水洗一洗，尽量去掉盐。当我的牙龈疼痛更严重

时，那个青年医生给了些磺胺药品让我消炎，他告诉我监狱医院是没有牙科的。

我的已经非常艰难的处境现在又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维持日益衰弱的体质而斗争，生命对于我从来如此苛求和毫无意义。尽管肉体的疼痛使我全身不舒服，我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刻平静，因为我正在经历的一系列审问再次有可能弄清楚我所关心的事情。每隔几天，我就被叫到审讯室，那里的工宣队员一个接一个地盘问我和有关的亲戚及朋友，要我对他们中的每个人写冗长的书面材料，解释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所写的材料必定要与我的亲戚和朋友所写的材料核实，提审员和工宣队员将通过比较来怀疑我的诚实，发现新的内容，因而写得正确很重要。一旦我说的同别人说的相抵触，情况介绍得不详细，提审时，不满和恐吓就会象暴风雨般地袭来。另一些时候，则催促我提供证据，以便证明我的亲戚和朋友中的某些人是有罪的。从那以后我了解到，人若被怀疑有问题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但回答和提供亲戚及朋友的有关问题，却给了我帮助他们机会。从我知道的他们的职业性质和过去的生活情况中，我一般能猜测在文革期间他们会面临哪一类问题，我回忆和搜寻他们的所作所为，为的是帮助他们提高在革命家眼中的地位，对那些不得不说的内容，则用毛分子可接受的语言搪塞一下。

我这一代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我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近代历

史是一个文明社会在一个世纪中走向衰弱的记录，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我们的责任。共产主义革命可以为中国带来进步的动力，这对我们来说是朴实的信条。所以我们中的许多人在1949年左右，留下或回来了。因此，当我回忆时我能真实地说出我的亲戚和朋友对中国的深爱以及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但造反派对这一切却置若罔闻，而是专挑缺点和错误，更有甚者，毛分子搞乱民族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在一个政府下的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如果一个人在国民党统治下为中国的科学文化作出了某个重要贡献，共产党执政后，却被认为是维护反动统治、不为中国服务而有罪。这种观点是多么心胸狭窄和荒谬！我经常为此与提审员辩论，可是，不久我发现，我并不能消除掌握我命运的少数毛分子的偏见，但我也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观点。

在雨季，一系列的审问开始了。常常在我被带到审讯室时，脸湿了，湿透了的乱蓬蓬的头发，短袜和鞋子象在水里浸泡过一样。我没有雨衣，有幸的是，天气还比较冷，我穿了几层衣服，因此我的身上还没有完全湿透。审问一直持续到热天。夏日的炎热和因下雨潮湿滋生的蚊子令人难以忍受。有时，有一些明显有来头的人和提审员一起向我提问题，要我提供材料，这样我就知道我的朋友和亲戚象我一样遭受着审问，我为他们担忧并仔细观察陌生人的言语和态度。如果他们看上去还算温和，似乎还讲点道理，我就比较宽心一点；如果他们看上去愚蠢而蛮不讲理地威胁，我就很忧虑。

在秋季，我度过了一段极度紧张的时期。那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来询问我关于该院导演黄佐临和他妻子丹妮的情况。他们是我和丈夫从伦敦学生时代起的好朋友，上海解放前，黄已是一位著名的导演了。这对夫妇相信共产党，即将解放时他们被要求留在上海，他们立即同意了。因此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时，黄被任命为团长并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他们的艺术生涯辉煌，一起在上海舞台上推出了许多创卖座率最高记录的剧目，包括翻译了莎士比亚喜剧和欧美近代作家写的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作品。他们经过大量的努力，使中国观众意识到，在其他国家是允许剧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他们的社会的。在党领导人和文化部眼里，黄被看作是创最高票座纪录的导演。文化革命中很明显，他同那些紧跟“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文艺路线的人是不同的。

在把我带到审讯室询问黄佐临的情况前，我已在报纸上读到了许多批判他的电影的文章。五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制作了一部歌颂共产党人攻占这座城市的影片《战上海》，这部影片在技巧上也相当成功。它刚推出时，曾获得过很高的评价。而现在的报纸却连篇累牍地说黄在影片中将保卫城市的国民党守军美化成英雄，藐视共产党的战士，批判者声称他在描绘城市的破坏和人民的痛苦时，反对武装斗争，尤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他成了铺天盖地而来的革命大批判的牺牲者。

黄佐临这样一个有效和出色地为共产党服务的人，却

成了重点攻击的靶子，象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是共产党领导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要黄担任职务、发展黄入党的人都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老仇敌。在那时，江青只是一个二三流的电影演员，她正为出名奔波。而他们都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左翼作家和演员的骨干力量，也是刘少奇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员。很显然，他们当时并不重视江青，认为她只是一个德行缺乏、才能平平的妇女。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了权力时，就把这些当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作为刘少奇集团的成员加以痛斥和逮捕。自“牵连”成为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后，打倒任何官员经常导致打倒他们的部下。

提审员旁坐着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军管会的代表，我在木椅上坐下读完提审员指定的毛的语录后他就问：“你知道买办黄佐临吗？”

从他的问题中，我推测他们在黄的个人行为中找不出任何错误后，正在挖他的背景。

“买办”是一个在外国商行和中国官员之间起联络作用的人。买办制度原本是上世纪末清皇朝为了控制外国商人的一种发明。在引进现代商业方法后，三十年代起这种制度逐渐消失了。象壳牌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商行，在老买办死后就没有雇用新的买办。中国共产党把当过买办的人看作是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解放军占领上海后，这些划为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人都遭受监禁或罚以重款。在天津的黄的父亲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他死于中日战争。

“我知道黄佐临，著名的电影和话剧导演。”我答道。

“他同时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穿着制服的人民艺术剧院军管会代表说，“我们完全知道你，你是一个顽固的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间谍，你想回避我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到意外。”

“黄佐临有严重问题，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如果你想包庇他，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你的处境将会变得更坏。如果你理智清醒，愿意与我们合作，就作为你对文化革命的一个贡献。”提审员说。

“我说实情，”我说。

“如果你说实情，你就说他是一个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军管会代表说。

“黄佐临的家庭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买办。”我说。

“他父亲死后，他接管了他父亲的工作。”那个代表说。

“买办制度早就已被废除。当他的父亲死后，买办这一职位也就不存在了。”我告诉他。

“这是什么？！”那个代表把一个文件扔到台子上，提审员把它递给了我。这是一张盖有黄佐临印章，表明他有一大块土地的天津市地契。我看契据上有数字编号，意识到它是从壳牌石油公司的业务档案里取出来的。

“那是一张旧地契。”我说。

“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它表明黄佐临是壳牌石油公司的一个买办，这一事实他向党隐瞒了。”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全部经过。”我说。

“从头开始。”提审员说。

“我不知道日期，它是在国民党政府宣布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之前，所有在租界的外国商行把他们的地契都换成他们的买办的名字，壳牌石油公司也是这样做的。黄的父亲去世后，他继承了家庭的财产所有权，这是在战争中发生的。当时天津在日本占领下，黄佐临不在天津，壳牌石油公司也不在那里，珍珠港事件后，地契制度就停止实施了。我猜测，有某个黄佐临的代理人在他父亲所有财产的契据上盖上了他的印章，包括属于壳牌石油公司的土地的地契，那并不意味着黄佐临是一个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

“由于黄的贡献，壳牌石油公司给了他报酬。”来自人民艺术剧院的军人说。

“我对那些一点也不知道。”我回答。

“你的丈夫作为壳牌石油公司的总经理，报酬的款额是他决定的。”

“他没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我说。我应表明我没有金钱交易方面的知识，他们就会知道我并不能对控告黄有所帮助。我的丈夫也确实没告诉过我壳牌石油公司要给黄一笔钱，以表示壳牌石油公司对他父亲的感激之情。何况土地早已在1950年共产党政府领导的土改运动中被没收了。壳牌石油公司这种慷慨之举不符合共产党宣传的外国剥削者的本性。

“你在说谎，你的保姆说你和你丈夫在一起时每一件

事都交谈。”

“他可能认为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说，“当然，我们不会讨论在他办公室发生的每件事。”

“我们不相信你。”

“那随你的便，我不知道给黄报酬这方面的任何事情。要了解的话，你们可以查公司的业务档案，或者问公司的会计科。”

“我们已经那样做了，你以为我们会忽略这类事？我已经掌握了你丈夫支付报酬的全部证据。”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我也一无所知。”

“我们想要你承认黄佐临是一个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他为公司效劳而得到了报酬。你是壳牌石油公司最老的中国职员，你能够证实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黄佐临属于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反动的阶级，他将被驱逐出党。你和你丈夫是他的朋友，你很了解他，你要提供反对他的有价值的材料。”军人说。

被驱逐出党，对一个党员来说是最大的毁灭，他再也不能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了，他的社会地位只是比反革命稍好一点，将一直受人歧视，他的家庭，包括他的孩子及孙儿都要受牵连。黄佐临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全部身心和才能，却遭受这样的命运，使我深感悲惨和不平。而对这种情况，我强硬地说：“就我所知，黄佐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忠诚党员，他从不是一个买办，在他父亲死后，壳牌石油公司在天津不再有任何买办。”

“你不与我们合作，”提审员说，“你不想为自己争取一

个立功的机会。”

“我只能忠于事实。”我说。

他们变得很生气。人民艺术剧院军管会的代表红着脸，失望和厌恶地盯着我。提审员说：“我们要你写一个黄佐临是买办的材料，写下有关他你知道的每一件事，如果你想包庇他，对你来说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如果你提供了有用的材料，你就为文化大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再回忆他对你和你丈夫说的每一件事及他的意图，他是一个阶级敌人，你应该揭发和批判他，这是表明你立场的机会，如果你揭发他有功，我们会认为你在改造中有了进步。”

“如果你想为自己争取立功的机会，就必须批判黄佐临。”来自人民艺术剧院的军人强调着。

他们的话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我信奉正直。但这却是他们为迎合政治运动鼓励说谎的堂而皇之的声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屈从于这样的压力，这种胡言只能坚定我只说事实的决心。

我写下了我所知道和回忆起的有关黄佐临的生活及反映他思想观点的每一件事，其中包括他对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进步的坚定信仰。由于我没有说黄是天津壳牌石油公司的买办，他们把材料退还给了我，并用严厉的处罚威胁我。虽然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审问中受到威胁和警告，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写材料，但我始终坚持我的看法，决不屈从他们的要求。几星期以后事情不了了之，那个从人民艺术剧院来的人，由突然地出现又突然地消失了。

几年后，我被释放出狱，了解到造反派一直没能把黄佐临定为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也没有把他开除出党，黄仅仅作为刘少奇集团中的成员而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和他的妻子受到多次批斗，强迫参加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包括严冬酷暑在建筑工地挑泥运砖……，黄的身体垮了，他的美丽的妻子成了老妇人。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黄佐临和他的妻子重新恢复了职务。

在毛泽东统治的中国，生活中最厌恶的一个行为是党要求群众在和平时期中相互揭发，在政治运动中相互痛骂。这样做的结果是严重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丈夫和妻子互相提防，父母与子女不和，由于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各种形式受到抑制，人们不再想有朋友。这样做也是鼓励保守和伪善，为了保护自己，个人都不得不保持沉默，如果受逼迫而说话，那么通常保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唯一方法是说谎。

当逼迫和催促我提供反对其他人的揭发材料时，这些人也正受逼迫和催促提供反对我的揭发材料。通常情况下，我能猜测我的亲戚和朋友在提审员提及我的问题时说了和写了些什么。要辨别一个人是保持清醒和镇静，还是变得恐慌和糊涂是并不困难的。到了1969年底，由于一份来自北京我弟弟的“坦白”，使我的处境进入了一个相当困难的时期。这再次说明，高压也会把一个完美、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搞垮，使他分不清事实和捏造了。

在欢呼和庆祝声中，毛泽东发表了一段新的指示。这

指示套红印在报纸上，出现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权威性的文章中。毛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继续，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继续。”

在这一段名言发表后，一个清除国民党残渣余孽的运动开始了。每天，报纸刊登大量揭露国民党的秘密代理人、隐藏的国民党军人以及台湾国民党统治的支持者的消息。在短短的时间里，有大批的敌人被揪了出来，竟然会有这么多的男人和女人暗里向往国民党！在我看来，在宣传共产主义的年代里，反对以前的国民党似乎是浪费精力，人为制造这种极端紧张的气氛，是为了阶级斗争的升级，为对可疑分子和一切正直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提供借口。任何一个人若要证明自己无罪，唯一的方法是尽可能地表现出支持毛和共产党，高喊革命口号，在自我牺牲的精神下不要报酬地拼命工作，对阶级敌人格外仇恨。官方报纸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警惕周围邻居和同事的反常活动和态度，加强对阶级敌人的监督，在狱中更是如此。

我对再次提审并不感到惊讶。迫害我的人为了表明紧跟毛的指示，是不会让我逃脱新一轮阶级斗争的。归根结底，我是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一个寡妇。

我刚走进审讯室向毛的画像鞠完躬，提审员就让我读毛的最新指示，我读完后他要我再读一遍。然后提审员说：“我们要揭露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你就是其中的一个。”

室内还有另外两个人，突然其中较年轻的一个叫道：

“坦白！”

“坦白什么？”我问。

“不要假装镇静和无罪，坦白你和国民党的关系！”

“我和国民党没关系。”

“你是国民党的一个忠实的支持者。”

“我十分怀疑国民党会同意你的说法。”我说。我边说边观察这两个人。从他们的衣服和短发式看，我想他们来自北方。中国人应该讲普通话，即在北京方言基础上的国语，可是这个象北京人的青年，讲话中常夹杂着一些当地土话的语调。我疑惑为什么这两个北京来的人会参加对我的审问。在一系列的审问初期，我已仔细讲述了我的家庭成员，包括在北京生活的弟弟和结拜姐妹，并向提审员提供了全部书面材料。

“你是国民党的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否认是没有用的。”

“你拿出你控告的证据。”我说。

“我们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不会从那么远来上海问你。”两人中较年长的一个说。他似乎地位高些，他的外貌和谈吐象几乎没有受过教育的产业工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成员。较年青一个看上去象学生。

“你在国民党党旗前拍过照片吗？”提审员问。

“可能有过，我记不确切了，”我答道。我想他们问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很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那时我的已去世的丈夫是中国驻澳大利亚堪培拉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

“你怎么会不记得！你不能简单地声称记不得了而逃避问题。”北京来的青年人说。

“这件事时隔太久了，”我说，“如果有这张照片，那么来过我家的红卫兵应该有的，他们拿走了我所有的照片。”

“它不在那里，你一定事先已经毁掉了照片。”年纪大一点的人说。

“为什么我会毁掉那样的照片？当我们住在澳大利亚时，人人都知道我已去世的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外交官。”

“你在讲些什么？谁问了你那些日子的事情？”提审员不耐烦地说。

“你不是问我在澳大利亚那些日子的情况吗？”我问他。

“废话，我们问你现在，解放后你拍过一张站在国民党党旗前的照片吗？老实回答，坦白每一件事！”来自北京的年青人向前一仰，对我叫道。

我很吃惊，共产党执政后的中国怎么可能有人在国民党的旗帜前拍照？我说：“中国解放后哪儿还有国民党的旗帜？它在哪里？”

“再不要纠缠旗帜了，就坦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它是不是表明你对国民党的忠诚？”提审员问。

“解放后我从没在国民党的旗帜前拍过照片，”我断然声明，想结束这一次荒谬的审问。

“现在不要这么肯定，你要为此遗憾的，你将失去获得宽大处理的机会。”年长一点的北京人说。

“你最好采取严肃的态度，别人已经坦白了，我们掌

握我们讲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揭露所有国民党的支持者，你是逃脱不了的。”年轻的北京人说。

“我不知道你们所谈的指什么，我不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果我是，为什么我现在不在台湾？”我反问他们。

提审员与另二个人低声地交谈了几句，然后对我说：“现在你还是回牢室去，想想这件事的原委，你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是知道人民政府政策的，你应该明白，只承认我们已经证实的事是没用的。”

我被带回了牢室，一直苦苦思索这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几个人显得这么严肃，他们的指控一定是听了诬告，这是某个存心不良的人的阴谋。我已经被控告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为什么又突然转向了？

三天以后我又被传讯。他们又逼我坦白，我给了他们和上一次一样的回答。他们警告我再仔细地考虑问题，又把我带回了牢室。在三个星期中，每隔二三天我就被带去受审，审讯室的气氛变得相当紧张，但我仍无法猜到他们所注意的到底是什么。

这期间对我的压力在增加。看守不再给我防止牙龈发炎所必需的磺胺药，情况急剧恶化，我的牙龈和嘴唇都严重发炎，以致吃不进给我的食物。我请看守给我粥，可以不用咀嚼就吞喝进去，以获取维持生命的一点养分。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牙龈的疼痛上了，以致我在审讯室时要注意交谈的内容都相当困难。我能够理解，一些囚犯在这样的条件下屈服了，道理很简单，是肉体的痛苦瓦解了他的精神力量。我告诫自己，不管怎么疼痛难熬，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

毛分子趁我要吃粥之机减少了配给我的食量，膳食时间我能喝到的是不到半碗的汤水，面上飘浮着可数的米粒。这样饮食几天后我昏倒了。一个善良的看守叫来了医生，他给我注射了一瓶葡萄糖静脉注射剂，还叫看守送我到监狱医院去。我不知道医生和看守单独说了些什么，只见医生给了她一张处方。我被带回牢室后，看守又给了我消炎用的磺胺药，吃饭时给我的是稠稠的稀饭和一片馒头。

我再次被叫到审讯室，提审员要我把毛的最高指示读三遍，我读完坐下后，他问我：“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的话你完全理解吗？”

“我想我能理解。”我答道。

“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想，毛主席要每个人知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不是局限于文化领域的简单革命。”我答道。

“那是对的，二个继续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它不是新的斗争，而是已在进行的相同斗争的继续。”我解释着。

“涉及到国民党的部分是什么？”

“文化大革命同样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它是从1927年开始的。”

“是的，既然你明白那些，你应该认识到形势的严重

性。国民党是我们的敌人，它被我们的军队打败后，在美国的保护下盘踞在台湾，所以反对国民党的斗争还将继续，直到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旗帜下解放台湾，收复领土。我们伟大领袖决定解放台湾，我们的林副统帅坚信我们会成功的。但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台湾问题是下一代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失败主义的态度。我们伟大领袖相信台湾问题在我们这一代就会有结局。我们有象林副统帅那样身经百战的军队领导人，以前打败过国民党，现在仍能领导我们的军队取得胜利，所以台湾问题现在是一定要解决的。反对刘少奇集团‘走资派’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的阶级斗争有联系。现在我们已彻底摧毁了刘少奇集团及其权势，再次紧密团结在我们伟大领袖的周围。我们要解决国民党问题，就必须揭露在我们中间所有国民党的同情者，以防止敌人组成第五纵队。为了使国民党的渣滓不能搞破坏，必须隔离并密切监视他们。”提审员说。

“你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一名高级官员。”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补充道。

“不是高级，只是中级官员。但无论如何，当国民党去台湾时他选择留在这里。”我指出。

“不少国民党官员是那样做的，其中一些人是受国民党指派，故意潜伏在这里搞破坏的。因此，我们要彻底审查这批留下来的每一个人。”

“我的丈夫担任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时，他的任职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同意，相信那时党已经全面

审查过他的情况。”我告诉他们。

“那还不够，当时政府同意的人可能是一个走资派，我们造反派必须审查每个人现在对党的态度，”提审员说。

“早在长征前中华苏维埃的日子里，我们的军队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发动攻势前，我们伟大领袖已系统地阐述过一整套对付阶级敌人的有效方法。那时我们把主要的阶级敌人关进监狱，就象现在文化革命期间做的那样，另一些敌人则交革命群众监督，现在也仍然那样做。”年轻的北京人明显地是一个学生，急于表现自己的有关毛泽东著作的知识。他查阅了毛在1936年写的一篇题名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它表明了在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战役的军事交战前毛的意见。

“你应该明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时你自己所处的位置，根据你的家庭背景以及你丈夫与国民党的联系，你在国民党那一边。”年长的北京人说。

“我担心你是完全错了。我根本不卷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我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得不互相打仗而惋惜，在这过程中无辜的中国人民遭杀害，国家的财富遭破坏。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希望两个政党和平和团结，共同为国家美好的将来而努力，”我声明。

“在打垮国民党以后，我们会完成统一大业的。”那个学生说。

“如果按你说的，你不是国民党的同情者，不卷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为什么你有在国民党旗帜前拍的照片？”提审员问。

“对你们所说的我一点概念也没有，我尽了最大努力去回忆、猜测，但实在不能做到。为什么你们不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那一定是有些误解了，”我诚恳地说。

“回想一下1962年，在1962年里发生了什么？”提审员问。

“除了那一年我失去了我的母亲外，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就对了！”两个北京人异口同声地说，“你必须交代事情的全部过程。”

“你们是指想听关于我母亲的死？”我对他们表示怀疑。

“是的，说出全部经过，坦白一切事情。”提审员说。

我感到迷惑，吃不透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就把我母亲死的情况告诉他们。

“我母亲的邻居打电话叫我回南京，到了南京后我发现我的母亲在一次中暑后就不省人事了，那时正逢七月，气温持续在摄氏35度左右，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急忙把她送进医院，进医院初她变得好一点了，继而肺炎日趋严重，死于心力衰竭。”

“你的几个弟弟也到南京来了吗？”

“是的，他们是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的。”

“在你母亲死后你干了些什么？”

“作为最年长的，我安排她的葬礼。”

“你沉溺于迷信，又一次证明你确实是一个反动分子。”较年轻的男子说。

“迷信”是共产党官员提到任何宗教礼仪时习惯使用的

字眼。

“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为她安排了一个佛教徒的葬礼。”我说。

“你一定做了非法的事。大跃进运动后，和尚被驱散了，佛教寺院全部关闭了，但你却设法请了一些和尚为你的母亲举行葬礼。”提审员说。

“我是在南京佛学研究所的帮助下才请到和尚的。”

“只允许和尚为来自东南亚的外国访问者表演佛教仪式，对中国人是不允许的。”

“因为我再三乞求，他们才答应帮助我。”我说。我记得我是怎样和南京佛学研究所的人长时间磋商的，我对我的要求会得到正式允许也缺乏信心，为请和尚，我捐了一大笔款子。最后，该所同意派六个和尚到我母亲葬礼上背诵佛经。

“在你母亲的葬礼上你恢复迷信是有罪的，你的弟弟和弟媳没有阻止你，也同样有罪。你还把你在美国姐妹的名字刻在你母亲的墓碑上，她们这些生活在国外的叛徒的名字竟和你的名字刻在同一条线上。所有这些事实证明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分子。”那年青人说。

“我在美国的几个姐妹同样是我母亲的女儿，把所有子女的名字刻在墓碑上，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那些我们以后专门谈。现在告诉我，在你母亲葬礼后你干了些什么？离开墓地后你到哪里去了？”提审员问。他们三人现在显得很激动，二个北京人有意盯着我。

“我们回到她家，整理她的遗物。”

“在回她家前你去过哪里？”

“什么地方都没去，我们直接回她家了。”

“你母亲葬礼后你去过孙中山纪念馆吗？”年长的北京人问。

“没有，我们都十分悲痛和疲劳。”

“交代！”年轻人突然猛拍桌子道。

“你想要我交代什么？我母亲的葬礼没有任何政治意义。”

“你母亲的葬礼没有政治意义，但你和你弟弟到孙中山纪念馆在国民党旗帜前拍了照，这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时，也就是1962年，国民党打算反攻大陆，你们想以此发誓你们对国民党的忠诚。”年轻人说。

我真想对这种荒谬的断言发笑，但我知道形势十分严峻，对这些无知的人辩解是徒劳的，由于体质极差、饮食缺乏，我只有一点微弱的力气。每次审问期间，我的嘴又疼痛得厉害。我的过分的疲惫使我虚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对他们首先强加于我的荒谬说法无可奈何，但我必须坚持与他们交谈为自己辩解。

“请讲道理。首先，你们是否确信在孙中山纪念馆有一面国民党旗帜？如果在国民党离开南京后那里没有旗帜，你们就知道我们不可能在旗帜前拍照。第二，即使那里确有一面旗帜，你们的断言也是正确的，我在万一国民党返回大陆时，能出示这样一张照片，给国民党留下好印象，就这么简单。既然他们知道我和我的丈夫在1949年留在大陆，没有随他们一起去台湾，他们会接受我们对他们的尽

忠？国民党官员不是傻瓜，他们不会对我的动机产生很大的怀疑？”我说。

“他们会相信你的，你已经是国民党的一个代理人。”年轻人声明着。

“如果我确实已经是国民党的一个代理人，我就没有必要向他们证明我的忠诚，你们对我的断言是自相矛盾的。”

两个北京人同时叫道：“你必须坦白在南京孙中山纪念馆你和你弟弟在国民党旗帜前拍照这件事。”

“你们可以去问我弟弟和弟媳，他们会告诉你们没有这件事，我们根本没去过南京孙中山纪念馆。”

“我们是问了你在北京外贸学院的弟弟，起初他也想否认一切，但当造反派让他看清了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后，他坦白了一切。他说去孙中山纪念馆是你的主意，他还说用的是你平时拍照的照相机，你在上海把底片冲洗好后给他寄了一张。你还敢否认它吗？”年轻人叫道。

我的心往下沉了。当然，这纯属捏造。毛主义分子对我不幸的弟弟做了什么，使他说出那样的谎话？我能想象，在我弟弟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前经受过的极大痛苦。在这种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我得到了毛的小红书的帮助。我把它高举在手里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在这种情况下，我请求你们遵照他的教导，亲自到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去看一看。据我所知，孙中山纪念馆由南京的一个政府部门管理，让外国访问者参观。在国民党离开南京这么多年后，那里绝对不会再有国民党旗帜，请你们亲自去看，如果发现有国

民党旗帜，回来惩罚我，我是逃脱不了的。”

在两个北京人直盯着我的同时，提审员站起来说道：“你现在可以回你的牢室去了，仔细想想这件事。”

我想，他可能最终明白了我的话和我的决心是符合逻辑的，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让两个北京人亲自到南京去看一看。我希望他们就那样做。或许他们在孙中山纪念馆没发现国民党旗帜，他们就会返回北京汇报。可能事情最终确是这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再被提审。

在文化革命期间，造反派用公费旅游遍及中国的各个地方，以“调查他们控告的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游览观光、访亲会友，他们中的一些人，或延长预定的路程，或迂回绕道，到著名风景地去。上海是中国购买日用品的最合适的地方，造反派都想来上海或路过上海。那二个北京人来上海时，他们已经过了南京。我想，他们可能是故意不在南京停留，核实在孙中山纪念馆有关旗帜的事情，因为如果发现那里没有国民党旗帜，他们可能不得不返回北京而错过来上海的机会。对我的每次审问最多仅化二小时，余下的时间可自由支配。由于车旅住宿费是由工作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支付的，因而他们享受了一个月以上的免费度假。事实上，让那些疯狂的造反派外出旅游，是用来鼓励他们对毛主义领袖们尽忠的额外津贴。

孤独地呆在牢室，不禁使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这奇怪的插曲。起初，我对我弟弟在压力下的所作所为很愤慨，但当我想起他自五十年代初期以来的生活，我愤怒的感觉消散了，他的困难逼得他忍耐了许多年，受迫害达到象他

这样程度的人，在文化革命中是不得不屈服的。我心中对这个不幸的人的伤悲和同情代替了怒气。我只能想象，为了让我弟弟坦白，尽可能多地揭出国民党的同情者，那些造反派不惜捏造事实并强行灌进他的脑子里。在他们得逞以前，我弟弟的推理能力可能已遭损伤，在正常情况下，他既不愚蠢，也不背逆。

五十年代初，我弟弟是对外贸易部著名青年经济学专家中的一员，这些青年专家是共产党从他们正进行研究的英国和美国各大学邀请回来的，他们的工作是分析和撰写世界经济状况方面的报告。他被授予高级职称，给了较好的待遇。可是不久变得很明显：尽管他的工作受到外贸部干技术工作其他专家的赏识，但他没有满足党的要求。这样，通过他所在单位的党委，控制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他写的报告并没有证实党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已近末日，就要灭亡。那些年，对我弟弟来说是不幸的，为了试图在他了解的事实和为迎合党的路线违心说谎之间找到折衷的办法，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沉默的人，极少讲话和微笑，除非在他完全和党的路线一致时。但无论他试图怎样去适应，去努力，党支书总是生他的气。有一次，有人生硬地对他说：“我绝不允许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乐观态度的报告从这间办公室散布出去，如果你还要写这种东西，你是在颠覆党。”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党支书意识到这是一个除掉我执拗的弟弟的机会，他们抓住的问题无非是，他在英国毕业和工作，一个短时期内担任过一个老资格国民党部长

的私人助理。在许多斗争会上，他遭受到连续几小时的折磨，又被几个月隔离在办公室里，不许回家。一群党的积极分子轮番连续对他盘问，从早到晚，没有睡觉，他们称之为“疲劳”战术。由于找不到我弟弟反对党的证据，党的积极分子不能很顺利地把他打成“右派分子”。但无休无止的折磨毁坏了弟弟的身心，他的笑脸消失了，头发变成了灰色，神情恍惚。那时，他只有37岁。

我弟弟意识到他的办公室已不需要他了，他要求调动工作。由于没能把他打成右派分子，他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迁怒于他，说他太傲慢，需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呆一段时间，以提高他的社会主义觉悟，他被遣送到北京郊外的乡村去养鸡。那里的生活条件是原始的，一个月只允许回家一次，使他感到欣慰的是远离了党的官僚主义者。他认真地对待养鸡工作，不久就取得了好名声，他养的鸡比别人的肥，蛋也生得多。每次他回城探家后返回乡村时，总要带回一捆书和改进他工作的各种试验设备。农民们成群结队地去他的住处，渴望得到他的指点并和他商议他们的问题。这情形得罪了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催促外贸部把我弟弟遣送到别处去。

在大跃进运动失败和接着发生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毛分子被迫作了一些退让。通常，面对这样的实际困难，党向知识分子作了一些让步。外贸部没有前例地问我弟弟想干什么，我弟弟请求给他一个英语教师的工作，他即被派到外贸学院的英语系担任教授。他对他的新的工作倾注了以往做其他每一件事同样的热情。文化革命期间，

他已经成为一个在英语教学上公认的权威，他为青年教师培训辅导，同时还出版专著和发表专业文章。

以后，我被释放出狱后，试图和弟弟联系。但他拒绝和我通信，他说由于我以前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仍然是个“危险人物”。直到1976年冬天，在毛逝世和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才邀请我去拜访他。我发现，作为一名教授在文化革命中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他和他的妻子同样在一个干校里干体力活，那里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无心去问他是受什么迫使说我们去过孙中山纪念馆并在一面国民党旗帜前拍照，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会责备他屈服于压力。长时期来他受到的折磨太多了。

外贸学院在关闭了几年之后重新恢复，他和其他教授们忙于把英语系再次办起来。在这样长的时间后，他似乎乐于去做值得做的一些事。他的系总是有不少和他来交谈的人。我不想再提及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这件事，可是就在我启程离开他之前，他突然自己提出了这件事。

他说：“你在1962年是不是寄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寄给你的是一张母亲的照片，这照片是在上海的万象照相馆放大的，”我告诉他，“那是我在1962年里寄给你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那确实是母亲的照片吗？我记得是从你那里收到过一张照片。造反派坚持说这是我们在孙中山纪念馆一面国民党旗帜前拍的照片，他们看上去相当确信，并能告诉我，我们做了些什么，我记不起这件事了。由于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我的脑子里就有了这样的画面，最终，他们

所描述的对于我来说好象是发生过的事了。”

“不，”我生气地说，“没有这回事，我们从未去过孙中山纪念馆，造反派在说谎。他们想捏造事实，说明我们对国民党的忠实，这样他们就可以惩罚我们。”

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臂上，心平气和地说：“别这样激动和生气，和他们生气没有用。他们的话就是最终的结论。如果他们说某一件事发生，它就发生，抵抗是没有用的。我从我的亲身经历中学到了这一点，我相信你在监禁中也学到了这一切。”

“绝不是这样，我没有学到这一点，更何况我也不愿意去学。”

“你会学会接受这一点的，我们都不得不这样。我看到这发生在许多人身上，它发生在我身上，也将发生在你身上。”

“我不愿让它发生在我身上。”

“听到你那样说，我很遗憾，深深地遗憾，我担心你将受到伤害，而且是十分严重的伤害。”

我的弟媳走进房间告诉我，送我到机场的出租车正等着。当我和我弟弟说再见时，我在发抖。是因为我对我们不得不生活在这可怕的制度下生气？还是因为我对我们为维护尊严只能盲目反抗而悲哀？我不知道。在出租车里，我转身向我弟弟挥手，他已经走进去了。不知怎么的，我想，我使他失望了。我不愿做一个聪明的中国人，这种人为了自己的生存而随风倒。

1984年3月，当我弟弟作为北京外贸学院的一名访问

教授，来到美国国际管理大学的“大鸟园”时，我离开亚利桑那州又去看了他一次。我发现他现在是一个患肺气肿的老人，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足足大十岁。但当他告诉我，他最终被恢复了经济学教授的名誉，并到美国作中国新经济政策的演讲时，他的眼中又闪动着幽默。我问他，在三十多年时间里党的政策象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假如再摆到左的一边，将会发生些什么？他只深深地感叹，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是一个相当倒霉的人。每次周期性的变化从开始到结束要折腾掉许多年，但愿又一次变化来到时，我不会再活着看到它。”

第十一章 种种折磨

在我弟弟被牵连以后，提审员不断询问我的亲属和朋友们的情况。一系列的审问持续了7个月，直到1969年年底，以后就不叫我到审讯室了。我焦急地等待，几个月过去，仍然没有恢复审问的意思。我只好向看守提出去见提审员。

“你打算说什么？”看守问。

“我想问问我的问题何时可以澄清。”

“他并不能为你澄清问题，他的职责是向你提问题和收集材料，政府会对你的问题作出决定。”

“那么政府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作出决定？我已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身体又不好，需要药物治疗。”我说。

“你身体很好，我们给了你药和特殊的食品。”

“我身体不好，而且一天不如一天。最近我已好几次出血，牙龈也痛得很厉害。我被迫服用的磺胺药损坏了我的肾。你知道，我只有一个肾，做手术时医生已警告我不能摄入太多的磺胺。”

看守沉默了一会说：“你目前的困难是你自己造成的，

我们不得不继续把你关在这里，因为你至今没有交代。”

“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们希望我交代些什么呢？你们已经审查了我的一生及所有与我有来往的亲戚和朋友。现在政府已掌握了我的全部材料，谁又能凭什么认为我在哪个方面有罪呢？”挫折和失望使我提高了声音，但看守只是关上小窗，一走了事。

在过去几个月一系列审问的过程中，我曾天真地认为，在对我的生活和行为审查以后我会被释放。现在我不明白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搞清楚。看守告诉我要等政府作出决定，这给我的印象是共产党的一贯作法就是如此。我弄不懂的是哪一级政府部门可以对我的问题作出决定，还需要等多长时间。如果不曾对此满怀希望的话，我也不会如此失望。对目前形势的分析使我重新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沮丧之中。

1969年至1970年冬天，我生活的悲惨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回想这几个月的狂风暴雨，彻骨的寒冷，持续的疼痛，使我惊诧的是，我竟然活了下来。一天，我让看守买肥皂，她给了我一块不起泡沫的东西。看守告诉我，现在肥皂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仅分配一块。当我因为不得不常洗内衣而提出多买一些时，看守发火了。她向我吼道：“什么时候你才能扫除那种想比别人多得一些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许多地方每户人家每月才能买一块，而你已经幸运地一人得到一块了。”

用稻草做的草纸被用旧报纸、细绳和旧布做的草纸所取代，在硬得象纸板一样的草纸上，这些组成物的痕迹清

晰可见。就连这种更差的草纸，也是配给的。允许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生素片常常已经失效。在我的饭碗里只有一小片相当肥的肉。日用品的短缺似乎也影响到了看守们，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瘦了很多。以往常常昂首阔步的那个好斗的看守现在看上去也行动迟缓，面容憔悴。无疑，国家正处于又一个经济危机阶段，这是每一次政治动乱的必然结果。

报纸报道了农民如何“自愿地”减少他们已经很少的配给，农村党组织如何努力提高公社交给国家的公粮。这是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而导致饥饿和物资短缺的“困难时期”的重演。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报纸不断宣传一些提高产量、减少粮食和日用品消费的英雄。然而，上海《解放日报》仍用半版篇幅刊登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被称作“修正主义者”的文章。文章的主题是用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军事理论来批判强调军事技术和现代化武器重要性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两位已被撤职和贬黜的军队领导人，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及前总参谋长罗瑞卿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从广播中我们得知，报纸上载文指责这两位前军事领导人认为决定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由于他们几年前就已下台，遭到红卫兵和革命派的迫害，继续批判他们的观点只能说明党和军队的领导阶层中仍有人持这一观点。

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营养缺乏把我的脑力毁坏到了可怕的地步，持续的审问，使我深深陷入沮丧。我因肥皂和草纸不足不能保持清洁而情绪低落。即使报纸上党和军队领

导阶层不同观点甚至是激烈争论的明显迹象也没能把我从冷漠中唤醒。每天我坐在木板床上，斜靠着卷起的被褥，过度的疲倦和病痛使我失于了活力。

早春，我肺炎又发作了，又进了监狱医院。恢复极慢。五一节前，我被送回第一看守所，这时天气已经转暖，不过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好在暖和的天气使生活变得容易忍受一点。我感到我已渡过了又一次生命危机，奇迹般地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被允许到户外活动，我看到围墙外面的法国梧桐树上长满了嫩叶，感谢上帝赋予了我生命的奇迹，使我及时地恢复了体力。

随着九大的召开和各省和直辖市党的委员会的成立，党对生活中各个方面的牢固控制又重新建立了起来。对我来说，要通过报纸了解监狱围墙以外的事变得非常困难。在文化大革命正处高潮的那些动乱年代里，对“走资派”的猛烈攻击常常意味着在党的领导阶层内部发生着争斗。为显示毛政策的正确，常常是些无党派人士的革命作家不时有意无意地给人民透露一些情况。现在这样的文章已从上海《解放日报》上消失。这时出现的批判文章，我敢说是出于一些党的职业宣传人员之手。他们用相同的陈旧语言，过时的口号，以共产党人惯用的手法描述当时的忧虑情况，但无论怎样忧虑，他们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对自己提出批评。

从报纸上所刊登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中，我发现党内高层中又一次权力斗争的迹象。名单中少了陈伯达，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制定计划的激进领导人之一。紧接着就出

现了不点名的批判文章，矛头所指是一个自称为“小小老百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重要人物名字未经说明地突然消失总是意味着他的失宠。文章暗示被批判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曾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陈伯达正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寻常的事态发展使我感到迷惑，因为中国人知道陈伯达是毛的忠实追随者并长期担任毛的机要秘书。事实上，在中国人们经常私下传说许多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文章出于陈伯达之手。尽管陈不象其他激进派领导人（如江青、林彪）那样追求显赫的地位，但人们知道，他是毛所依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的杰出人物之一。

我从第一看守所出来很长时间以后，我曾向一些朋友和熟人打听陈伯达下台的原因。1970年8月底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领导成员的组成。其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讨论是否废除由于刘少奇的下台而空缺的国家主席这一职位。陈伯达提议保留这一职位并提名林彪作为主席人选。毛对一年零四个月前召开的九大会上林彪的权力迅速加强，已有所警觉，他不愿再给林彪更多的权力和地位。毛公开宣称他赞成废除国家主席并建议设立一个礼仪上的国家首脑——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激烈的辩论中，毛谴责陈伯达的建议是一个妄图恢复文革前状态的反革命行动。

其他人告诉我，中央全会讨论的另一个议题是尼克松总统作出表示以后的中美关系可通过第三国谈判，美国愿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周恩来总理已使毛相信，如使美国

承认北京而不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则共产党中国可在联合国得到大部分国家的承认。这不仅可以使共产党中国得到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而且可以使台湾的最终解放变得更加容易，少付出代价。林彪和陈伯达都表示反对建立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的任何活动。他们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美国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要敌人。

不过，所有为我提供消息的人都认为陈伯达的下台是毛对林彪的警告。这一行动对那些认为自己被毛所用的日子不会太长的军队领导也起了作用，它最终导致林彪从毛手中夺权阴谋的失败。无论如何，以后形势的变化说明九届二中全会是比较重要的会议，它结束了短暂的林彪时代，标志着与周恩来总理相比林彪权力地位的严重恶化。

1970年，当我还在看守所的牢房里时，我已认识到陈伯达下台的重要性，我盼望着可能带来某种希望的事件发生。在这一年的秋天，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毛一旁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参加国庆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尽管毛时常与一些国家的重要来访者站在这个地方，但斯诺是得到这一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斯诺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老朋友，他在三十年代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为中共在中国的合法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我知道，毛说任何话、做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含义，而且含义常常很微妙。我反复思考他在国庆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成千上万举着他的画像、高呼他的口号、歌唱他的语录的狂热的红卫兵时，请一位美国人站在身边的意义。

国庆节后不久，报纸报道了北京已与加拿大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互相承认领土和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加拿大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承认北京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我认为毛是在利用同加拿大建交向美国发出信号，我相信如果美国同意放弃台湾，毛准备与其和好。与加拿大建交是毛向美国表明友好的一次良机。我变得异常兴奋，满怀希望。中共将采取靠近西方的行动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相信。

冬季再次来临了。但这次它没使我情绪低落，从文革开始以来，事情好象第一次开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一片梧桐树叶吹进了我的牢房，我拾起这片黄树叶看了很久很久，它表示着希望，是一个好兆头。

我在牢房中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平静的心情代替了忧虑，苦难已到了尽头，美好的生活将重新开始。

但我想错了。

1971年元月的一天下午，我又一次被带到审讯室。这次审讯是如此意外，以致我跟在看守后心剧烈地跳动。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雪。到了审讯室门口，看守突然猛推我一把，我摇晃着进入室内。我看到里面有好几个看守。刚一进去，他们就围着我催逼，大声地辱骂我。

“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个说。“你是工人、农民肮脏的剥削者！”第二个喊。“你是反革命！”第三个骂道。

他们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人人都满目仇恨，象排练好

了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对我进行凌辱。文革中，我已熟悉了他们的这种形式。为了表现忍无可忍，他们把我从一个看守面前推到另一个面前，象球赛中的皮球。为了保持平衡，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在我恢复理智以前，一个年轻的看守突然抓住我棉衣的前襟，把我拉到他面前，他的脸离我只有几寸远，我从他眼睛的闪光中看到是虐待狂式的满足。他咬着下嘴唇以示他的决心，然后将我狠狠地一推。我蹒跚地后退，撞在墙上。在我倒地之前，他又将我拉过去，再次推向墙壁。他极为熟练地快速将我这样拉推了好几次。此时，其他看守不停地冲着我叫骂。我已经被弄得晕头转向，耳朵嗡嗡作响，头象裂开一样，身体在不住地颤抖。突然，胃翻腾了起来，我呕吐了，从我口中出来的液体喷到了看守的手和袖口上。他狂怒起来，低声咒骂着，一把将我推向犯人坐的椅子上。

我的心好象从喉咙里跳出来，气喘吁吁。我瘫倒在椅子上，闭上眼睛，试图恢复平静。突然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耳光，一个看守喊道：“你交不交代？”

另一面颊又被狠狠地击了一拳，几个人在喊：“你到底交不交代？”

我一直闭着眼睛，不理他们，这是我用来反抗的唯一方式。

一个看守从后面抓住我的头发，将我的头猛地拉起。我被迫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五双紧盯着我的眼睛。他们似乎简单地认为肉体的痛苦会使我改变思想。我想，凭借野蛮行为达到目的的人必然相信野蛮的力量。如果这些日夜

看守了我这么多年的人仍然对我一无所知的话，他们也太愚蠢了。然而我清楚，他们这样做不过是在执行别人的命令。

其中一个多次折磨过我的好斗的年青女看守说：“你是打算坦白交代还是想受到更多的惩罚？”

当她看到我仍然沉默时，又打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把我的手臂反剪到椅子背后。刚才推我撞墙的那个看守抓住我的手腕，给我戴上了手铐。

好斗的女看守说：“这副手铐正是用来对付你们这些顽固不化的人的。你得一直戴着它，直到你愿意坦白交代的时候。如果你现在交代，我们马上就给你打开。如果你明天交代，我们就明天把它取下来。如果你一年不坦白，就得戴上一年手铐。如果你永远不交代，那你就得戴着手铐去见阎王。”

“想想吧！好好想想你现在的处境！”一个男看守叫道。

另一个男看守说：“怎么样，准备坦白了吧？只要说声愿意，我们马上就把手铐取下来。”

“说话！说！”几个人一起在吼。

我盯着他们，用我那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什么也没做错，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大声点！大声点！”他们在喊。

尽管我说话的声音较低，但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一定有人在走廊里听，他们想让此人听见我的回答。从我坐的地方看不到犯人椅后面的小窗是否开着，不过我注意

到，当他们将我推向那里时，曾朝此方向瞥了一眼。

我尽力坐好，用清晰的声音说道：“我是无罪的。你们搞错了，我没有什么好交代的。”

我身后的小窗砰地一声关上了。或许是在把我带出去之前要让外面的人有时间走开，我的这些折磨者等了一会。当我站起来时，那个好斗的女看守走到我背后，把我双手铐得更紧。

夹雪的暴风吹得正紧，雪花在昏暗的天空中飞舞。走出审讯室时，一阵狂风把我的身子刮得摇晃起来。一个看守吼道：“跟我走！”

他没有将我带回女牢，而是走到监狱角落的一栋小房子前。他打开门，拧开昏暗的电灯，我发现这里比监狱的其他地方更差，地板和墙壁上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穿过走廊时，陈积起的污垢物从天花板上直往下掉。看守打开一扇小门的插销，喝道：“进去！”

屋里很暗，我等他开亮电灯，他却在我身后把门关上了。看守站在外面问：“愿不愿意交代？”我没有回答，他便“咔”地一声销上门离开了。

我站在黑暗之中，力图辨认屋里的东西。一股霉味直冲鼻端，我明白，这间小屋没有窗户。然而，房门很不严实，一缕微弱的光线透过空隙穿进小屋。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模模糊糊地看到肮脏的地上铺着一块木板，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水泥便坑。整个房间总共只有五平方米大小。一件软东西掉在我的额头上，我因吃惊而感到恐慌。由于手被铐在后面，我无法将它拿掉。我使劲摇头，

它从我脸上滑到了上衣上。我想没有几种昆虫可以生活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它一定是从天花板上落下的蜘蛛。

心仍跳得很快。尽管房内有股令人作呕的气味，我还是慢慢地作着深呼吸以平定情绪和心跳。感到好点后我坐在木板上在黑暗中打量着房间，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没有发现其他人在此呆过的痕迹（如大便或呕吐物）。我觉得十分疲倦，将头枕在曲起的膝盖上，闭眼休息。关在这个水泥盒中的唯一补偿是这里没有窗子，冷空气和风吹不进来，与那间牢室比起来，这里还暖和一点。

这副手铐与我以前戴过的不一样。用手指摸摸，的确不同于那种圆形手铐。它又笨又重，有一条方边，勒得我手发胀，手指也变得僵硬起来。我试图在手铐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一下双手。

“你打算交代吗？”

忽然出现的声音吓了我一跳。这看守是一直待在外面还是刚刚来？我怎么一点也没察觉？

仅有的一点力气已经耗光，我没回答他，仍将头枕在膝上休息。我试着回忆过去美好和愉快的经历以分散注意力，但无法做到。丑恶的现实就在面前，完全不可抗拒。

看守们不时地轮流来问一遍相同的问题。我听他们的脚步声，有的鬼鬼祟祟，有的并不想减轻脚步声。他们打开楼门进来时，我听得到狂风怒吼和看守跺掉脚上积雪的声音。他们是被派来看看我是否已屈服于新的折磨的。有的问过后还逗留一会儿，有的则并不等我回答，问过就走。

除了看守以外，听不到其它任何声音。这一天我肯定

是这栋房子的唯一居住者。如果还有别的犯人的话，我一定早就可听到叹息或呻吟声了。

我不知道在这里坐了多少时间，在一间黑洞洞的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屋里，时间的流逝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是毫无意义。我只感到腿脚麻木和头痛。我忍住不动直到看守不再出现。一个看守在离开时关掉了走廊上的灯，我想他们大概要去睡了。不过在站起来之前，我还是等了一会。由于地方太小，我怕碰到肮脏的墙壁，不敢走动，只好原地踏步以恢复双腿的血液循环。双手被铐在背后这么长时间，手臂疼痛异常，手也开始发烫。我试着上下运动双肩以减轻手臂的痛苦。

站了一会后，我又重新坐下休息。在我低声祈祷时，我可能趁空睡了一会儿，也可能只打了个盹。然后再站起来，重复新发明的运动。我虚弱极了，本来天生就好静不好动，而现在只得强迫自己作简单的运动，因为这是在狱中坚持下去的最好方法。以前我从未经历过单独囚禁的恐怖，但在这个晚上，我算是尝到了它的滋味。我感到呼吸困难，墙也好象要朝我倒下来。为了防止陷入恐慌，我快速站起，在有限的空间里尽量多地活动身体，做慢速的深呼吸直到再次平静下来。

改变恐惧心理状态的最好方法是主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即使只是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也使我的心理很快感到好转。如果只是情绪低落坐在那里，任凭思想的野马奔腾，思维很容易出现可怕的混乱，就不可能再对付看守。我虽然又饥又渴，但一想到吃喝后不得不使用满是灰

尘和污垢的水泥便坑，就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长夜漫漫，我感到，自己象是被埋进了一只地层深处的水泥棺材，手开始变烫，极不舒服。我试着把手握成一个拳头，但极其艰难。我明白，手肿了，它们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我害怕这些残忍和无知的家伙，由于迫切需要从我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会无意中把我搞成残废。我知道在政治运动中，共产党的官员为达到某一目的，会不顾一切后果地采取行动。为培养盲目服从，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毛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由于他们不希望出现犹豫不决和勉强服从的人，他们会夸大所做的任何事情。如果哪个受害者受到迫害者预料以外的伤害甚至致残，那他只好自认倒霉。这种事情我见过多次。对我来说手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手残废了，文革过后我可怎么维持日常生活呢？

我依次紧握每一个手指，发现它们还没有失去知觉，但肿得相当厉害。我不知道究竟还要被铐多久，也不知象这样无水无食还能活多少时间。记得一篇文章中讲过，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人可以活七天。象我这样虚弱，我想大概只有五天好活。无论如何才过去了24小时，还用不着为生命担忧，问题是这双手。怎样才能减少手可能出现的危险呢？肿胀是因为手铐铐得太紧，阻碍了血液循环。那个好斗的女看守在将手铐铐紧时，她应该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如果她不曾将手铐加紧，现在我或许还会好受一点。给我戴上手铐的看守并没有铐得这么紧，这可能是他只得到把我铐上的命令，没有得到铐紧的指示。若是那

样，或许哪位温和一点的看守会劝说他们放松一些。我决心等早上看守来时，让他看看我的手，要求他放松手铐。

我终于听到看守的脚步声，看到门周围出现一线光亮，我站了起来。

“你打算交代吗？想好了没有？”这是一个男看守的声音。

“我想跟您谈一下。”我说。

“很好！你到底还是想通了。”

“不，不，我说的是我的手，与交代无关。”

“你手怎么了？”

“手肿得厉害，手铐太紧了。您能把它放松一点吗？”我问。

“你感到不舒服了，是吗？很好，那你为什么不交代呢？如果你交代了，手铐就可以取下。”

“你可以把它放松一点吗？”

“你为什么不象其他犯人那样坦白？这是你自己造成的，并不是手铐的错。”

“请看看我的手，它们肿得厉害。”

“对此我无能为力。如果你交代，我会打开门带你出去，我所能作的就这些。”看守说。

“您能否报告您的领导，我手肿得相当严重？”

“不行。如果你答应交代，我会带你出去。”

再说下去似乎已无济于事，我重新坐到木板上。

“你是否打算坦白？”他又问了一遍。这次他等了好长时间才离开。

看守对我手的状况并不感到意外。他当然知道手铐的厉害，我也肯定不会是被这样铐的第一个人。他或许会报告其上司我已对双手的情况感到焦虑和不安，由此他的上司会认为我已经要挺不住了。他们决不可能给我放松手铐而使迫我就范的时间拖延。要引起看守的同情是不可能的，我只有祈求上帝的保护了。

“过来！”一个女看守的声音。

我站起来时，她已到了门旁，她一定进来得相当快。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她平和地说，象是与另一个看守说话，而不是通常看守对待犯人的那种尖刻腔调，“你不是一个愚蠢的人，为什么你不做明智的事情？为什么要用固执惩罚自己？”

我不置可否。

“你在担心自己的手，这很对。手对于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象你这样要写作的知识分子。你要尽力保护双手使之不受伤害，如果同意交代，这很容易做到。”

我仍没有说话。

“你知道，他们要一直让你戴着手铐直到你坦白，他们会说到做到的。你要明白；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开玩笑。”

我依然保持沉默。

隔了很久她又说：“好了，你仔细思量一下我说的话。这是我给你的忠告，我很同情你。好好想想。”

听到她离开的脚步声，我又坐回木板。

我为自己的愚蠢而气恼。我怎么会认为他们肯放松手

铐？我已在他们面前暴露了弱点，他们会为此而高兴，以为我会因顾及双手而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我告诉自己：忘掉手，如果被弄成残废，那就认了这一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双手残废或根本就没有双手的杰出人物。我想起1957年和我的丈夫在荷兰时，曾买过一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双手的老兵的画。据说他是用脚趾夹笔作画的。我一直把他的画看作是人的不屈和智慧的象征。这幅画在红卫兵洗劫我家时被毁，再也见不到了，但它的思想鼓舞着我的斗志，帮助我正视经过这些折磨以后失去双手的残酷现实。

其他看守也步那个女看守的后尘，纷纷赶来。他们给我讲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彻底交代的好处。他们知道现在我为手而不安和忧虑，所以并不马上离开，充满希望地徘徊于门外，等待我的回答。这么长时间没有吃喝、睡觉，我感到虚弱，萎靡不堪，肠子咕咕乱叫，腹部一阵阵抽痛。但我仍坐在那里，头枕膝盖，等着他们离开。

白天特别冗长，我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步骤。终于门打开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叫道：“出来！”

院子里冰冷而新鲜的空气令人惊叹地使我头脑清醒，我感到有一股生命的波涛在支撑着颤抖的双腿。看守又把我带到昨天挨打的那间审讯室。

那个好斗的女看守和给我戴手铐的青年男看守坐在桌子后面审问人的位子上。我进入房间，朝毛的画像鞠躬后，好斗的女看守让我背一段语录。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说。这是我首先想到的毛

的语录。在这种场合，这一段倒很合适。

“这一段语录是让你这种人用的?! 这话是毛主席对革命战士说的。”那个女看守愤慨地说。

就这样他们没有让我再背其它语录。我倒是还为他们准备了一段：“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如果他们还让我背下去的话。

“你现在怎么想？”男看守问。

“我什么也不想。”我答道。

“不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你的手受伤了，希望手铐能放松一点。”他说。

我没有说话。

“你应该想想我们为什么给你戴上手铐，这完全是你的错。难道我们会把这里所有的犯人都铐起来吗？当然不会。你如果觉得戴手铐不舒服，你应想想为什么会戴上它。如果你交代了，手铐就会拿掉，这完全取决于你。”他说。

“你打算交代吗？”女看守问。

见我仍不回答，她发火了，对我吼道：“你应该受到惩罚！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象你这样又硬又蠢的犯人！”

“难道你已经丧失了理智，失去保护自己的信心了吗？你真是愚蠢透顶，象一个撞石头的鸡蛋。你只会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男看守说。

要是在一两年以前，我会大声与他们对抗并从中得到乐趣。而现在我病魔缠身，精疲力竭，无法再与他们计较。

他们相互看看，又看看我身后的小窗，然后站了起来。

“带走！把她带走！让她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男看守叫喊着。

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一个看守会提到上帝使人惊讶。不过这也是出于毛泽东的语录。对怀疑会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进行政治灌输，通过在干校的体力劳动使其接受再教育，对这些做法毛说过，共产党的目的是改造他们而不是消灭他们。他还说：“如果有人坚持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也并不困难。”自从这句话发表以后，“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被广泛地用来形容那些不愿改变自己看法或拒绝接受党的观点的人们。

一个看守用力打开门，尽管头晕目眩，我还是努力使自己走稳，跟在他后面出去。寒风吹在身上象刀割一样，我冷得浑身打战。看守把我押回原来的牢室，经过女看守室时，我看了她们的钟。在那栋小房子的水泥箱子般的房里，我被关了差不多整整24小时。

打开牢门，看守对我说：“现在你得在这里继续服刑了。”

前一天，当我被带至审讯室时，饮用水刚刚发下来，现在它还盛在一只绿色的搪瓷杯里，放在桌边。我弯下腰，用牙齿咬住杯盖上的小圆顶，把杯盖取下来放在桌上，再用牙齿衔着杯沿，慢慢蹲下身来，然后倾斜杯子，让水缓缓流入嘴里。用这种方法我喝了好多水。然后，我走到水泥便坑旁，背对便坑，蹲下身体，用被铐着的双手移开盖子，再尽力用手拉下便裤，坐在以前用两条毛巾连成的

“位子”上小便。用力将手移至胯边解开裤扣时，手铐深深地勒入了肌肤，疼痛难忍。

我坐在床沿上，房间里非常冷，而且似乎越来越冷。不过这间熟悉的牢室并不象我待了24个小时的那个水泥箱子那样肮脏和令人窒息。当送饭来时，那个厨房女炊事员象平常一样将一个铝饭盆从小窗中推进来。我拒绝了。尽管饿得慌，但我简直不知道手被铐在背后该怎么吃饭。

没人来问我是否打算坦白，不过我知道自己仍在他们的监视之中。我发现看守正通过观察孔偷看着。到了睡觉时间，看守叫每一个牢室的犯人上床。她来到我这儿时，象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说：“睡觉了！”

背对着床，我把被子和毯子打开铺在床板上。对于一个长时间没有进食的人来说，这是一件迟缓而吃力的工作，不过我还是做完了。铺好以后，我侧身躺下，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一边的肩膀和手臂上。手臂很疼，极不舒服。我试着用肚皮贴在床上俯卧，并把脸偏向一侧。我发现在坚硬的木板床上这样睡是不可能的，因为全身重量都压在胸脯上。这样折腾了一阵后，只好又起来。无论如何，我是无法用毯子把自己盖起来的。我是在手被铐在身后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杂技动作的。战栗一直没有停过，屋里冷极了。最终我发现，躺下睡不行，得试着坐着睡觉。我横坐在床上，靠在草纸糊过的墙壁上，闭上眼睛，希望能打个盹。

这个夜晚十分寒冷，连窗棂都结上冰，落在窗户上的雪花都不再融化。在室内，微弱的光线透过朦胧的空气，

呼出的气体立即会变成一团团白色的雾气。我身体冷得嗦嗦发抖，腿脚冷得发麻，必须不时起来活动以保持四肢的血液流通。在室内活动时，为减轻手腕上手铐的重量，我得用手指提着手铐。手铐好象越来越紧，我的手象是放在火里一样。只走一会我就感到疲倦，必须坐下来休息，而我又太冷了，不得不多活动一会儿。靠在墙上休息时，我或许有时能睡一会，但漫长的黑夜是凄惨的，难以忍受的。

然而，难熬的黑夜还是过去了，就象生活中任何事情都有个终了一样，不论它是多么的可怕或令人不愉快。黎明的曙光照进牢室，外面传来看守的喊声：“起床了！起床了！”

紧接着，一位在“劳动改造”的姑娘把皮管插进小窗口给里面送洗脸的冷水。她并没有看脸盆，而是朝室内张望，好奇地看着我。我把身子转过去一点使她能看见手铐，她迅速关上小窗跑掉了。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不洗脸已经算不上什么。我拿着空杯子背对窗口接饮用水，用老办法喝水时，空荡荡的胃里一阵剧痛，它在抗议用水充饥。

第三天，腹中的饥饿感奇迹般地消逝了，但身体却更虚弱。我的目光已无法注视某一物体，监狱里惯有的声响在我耳中也变得愈来愈模糊。

当天晚上，我靠墙坐在床上，用手指提着手铐以减轻其重量。尽管冷得发抖，但已没有力气再起来走动了。

犯人们都睡觉以后，小窗被悄悄打开了，门外传来耳语一般的声音：“过来！”

我怀疑是否又有看守来劝说我交代，但她声音很低，甚至于有点隐秘，好象怕别人听到一样。

我费力地走到门前，看见一位老看守，她正低头看着我踉跄的脚步。

从一进监狱我就发现，这个看守比较人道。她那小脚妇女独特的走路方式首先引起我的注意。裹脚是中国的一个老习俗，在一些落后的农村，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30年代。即使废除束缚，这种妇女的脚也已受到永久性的伤害不可复原。她不是上海本地人，操着华北农民的口音。我想她肯定是那种在共产党军队席卷华北时被解放的乡村妇女，她即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并成为一名党员。她以注重实事的态度尽自己的职责，不象其他看守那样喜欢对犯人大喊大叫。天气变冷时，如果她值夜班，我常听到她从监狱库房中拿来被褥，提供给那些没有足够铺盖的犯人。我最后一次由于缺少食物而昏倒时，是她把我送到医院，让医生签字说明我需要配给更多的粮食。毛分子以减少食物配给向我施加压力，而她不是那种人。

“你为什么不吃飯？”她问。

这是多么傻的问题！难道她不知道我戴着手铐？我想。

“你知道，他们不会因为你不吃饭就简单地打开手铐，如果你饿死了，你会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对那些在问题弄清以前就死去的犯人通常是这样做的。”她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吃饭。”我说。

“这并非不可能，好好想想，会有办法的。你有一把调羹。”

她说得既同情又关切。我决定请求她把手铐放松一点。紧紧被铐的双手一直烦扰着我，我的精神为此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全部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手上。

“我的手肿了，非常烫，整个身心都因此而受尽了折磨。您能把它稍微松一松吗？”我问。

“我没有打开手铐的钥匙，钥匙是由头头保管的。明天试着吃点东西吧，腹中有了东西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她说。

从走廊另一端的入口处吹来一阵冷风，说明来了另一个看守。她悄悄关上窗，走了。

回到床上我想，她说得对，我应该努力吃点。死倒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我的思想会变得如此糊涂，会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但是我怎么吃东西呢？看守说有一种办法，让我好好想想，还提醒我有一把调羹。我的眼光偏向桌子，看到塑料调羹和迭放整齐的干净碗。一种方法在我脑中形成，我决定明天试试看。

那个看守告诉我，打开手铐的钥匙由头头掌握的。放松手铐是没有希望了，必须设法减轻手铐的重量。手铐不仅影响手臂，而且也影响到了双肩。我背对着床，极其困难和缓慢地把被子卷起来，然后推到墙边。我背对墙坐在床上，把手放在柔软的被子上，立即感到一阵轻松。

尽管仍然饥寒交迫、痛苦不堪，但已想好吃饭的方法

以及如何克服可能遇到的困难，从而使我获得了新生的希望，漫长的黑夜似乎也过得快了。

早晨，当看守唤犯人们起床时，我站起来活动腿脚。用手指提手铐时，觉得手铐上有什么又粘又湿的东西。一看被子上，全是血和脓的印迹。是手铐磨破了我的皮，勒进我的肉里。我一阵震栗，真怕双手因此致残。

当厨房女炊事员端着盛饭的盒子过来时，我背对着门，她便把饭盒放在我手里。我把饭盒放在桌上，因为上海的大米有粘性，我就用调羹先把饭淘松，然后把饭和蔬菜盛至桌面的毛巾上。每盛一次，手铐便深深地勒进肉里。我浑身疼痛，泪水盈眶，不得不停下来息一息。我咬牙坚持，直到桌上有了一堆饭菜。然后转过身来，弯下腰，象动物那样用嘴舔着吃。

这样重复了几次。收饭盒的妇女来时，没有立即打开小窗要，而是站在那里看我吃力地把饭往外盛。由于疼痛和害怕伤口感染，每盛一次我都得停下来作深呼吸。我干得很慢，不过她说不要紧，尽管她平常总是性急火燎。当我眨着眼挤掉因疼痛而流的泪水时，我真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但我还是继续吃了，因为我想活下去。吃掉差不多一半饭后，我把饭盒还给了那个妇女。

傍晚饭送来时，我发现那个厨房女炊事员已帮助把饭淘松了，只需把饭盒翻过来，大部分饭就可以倒出来。

我可以吃饭似乎激怒了毛分子，看守们又跑来威胁我，要我坦白。但他们避免提到“手铐”两字，好象不愿让其他犯人知道他们在我身上的所作所为。每天的食物使我比原

先多了些力气，但行走能力却下降了。由于手铐的影响，我的脚也象手一样，又肿又疼。鞋子变得太紧，难以忍受，只好踢掉。好在是布鞋，可以当拖鞋来穿。我的脚连我这虚弱的身体都支撑不住，只能蹒跚跛行。手腕被手铐磨得鲜血淋漓，被子上的血迹与脓迹也越来越多。要么是天气骤然转暖，要么是我在发烧，因为我已感觉不到冷，无论是动手还是抬脚，感觉到的只是钻心的疼痛。

一天，我从小窗接饮用水，拿杯子的手抖得厉害，一半水倒在了我披着的外衣和便裤上。

“你手伤得厉害，头头还不知道。你干嘛不哭叫？你不哭叫，他们就不会知道你的手伤到什么程度。”女炊事员在关窗前小声对我说。

尽管中国人通常抑制情感的表露，只在丧葬时表示深切的悲痛，或在抗议笼罩着死亡的不公正行为时，也会嚎啕大哭。看别人哭叫总是使我感到窘迫，就象看到谁在剥光他自己的衣服一样。我从小就受到不外露感情的训教，对多少年强忍眼泪的记忆，使我渐渐地把流泪看成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应哭喊以引起人们对这将要残废的手的注意吗？不！不行。首先我就学不会如何发出那种拖着长音、口齿不清的嚎啕，这种哭法太原始，接近于动物的叫声。其次是不愿做会被看成是祈求他人怜悯的任何事情。“头头”下令给我戴手铐的目的就是要折磨我，他相信我会受不了，最终会为了求生而出卖自己。最好的回击方法是不让他们看出我不能忍受痛苦。所以我没有接受女炊事员善意的劝告。

好几天过去了，手铐可能通过我的神经系统影响我的思维，我间断地失去了清醒的意识，忘记了自己在哪里。我不再记得自戴上手铐至今共过去了多少天，生活对我来说是一条无休无止的痛苦道路，我必须尽我所能地跋涉前进。

在我清醒的时候，我试着做些简单的算术以加强自己的大脑功能。我一遍遍重复着：“二加二等于四，四加四等于八，八加八等于十六，十六加十六等于三十二……”但只过一会儿，我便不行了，加不上去了，我重又回复混沌状态。看守们还是来，不过他们所说的话我已听不清楚，对我失去了意义。

又过了几天，我连到门前取食物和水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们送来时，我想拒绝，但是否说出口我不得而知。那个女炊事员或许在鼓励我吃些东西或喝水，但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只看到她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什么。我任凭自己的意识飘飘荡荡，已搞不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脏乱不堪的地上。

“起来！起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咆哮着，“你在装死！这是痴心妄想！”

我的手臂依然反剪着，只是手铐被取下了。

“起来！起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振作一下精神，看看周围，发现房门大开，好斗的女看守和给我戴手铐的男看守站在旁边。女看守手里还拿着那副黄铜的脓血斑斑的手铐，她似乎很感厌恶，只用两个指头提着那副手铐。

“不要以为我们会放过你！”那个男的说，“有许多其他办法会使你清醒的。我们决不会允许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的人离开这里。”

那女看守朝我虚弱的身体狠狠地踢了一脚，然后，他们便锁上门扬长而去。

我躺在地上，筋疲力尽，无法动弹。尽管手铐已经取下，但我的全身仍处在难忍的肿痛之中。我慢慢地把左臂提起来，想看看我的手。手的样子令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过了一会儿，我坐起来，细细地察看双手。两只手都肿得很大，连小臂也肿了起来。手腕被手铐勒过的地方，脓血仍在不断渗出。指甲发紫，似乎它们马上就会掉下来。我碰碰每只手的手背，麻木没有知觉。试着把手攥成一个拳头，也做不到，因为手指已肿得象胡萝卜。我向上帝祈祷，快点帮我恢复手的功能。

过了会，我想站起来，但腿已支撑不了我的体重，我不得不强忍着，才没有叫出声来。我终于挪到了床上。我的袜子被干结的脓血紧贴在脚上，我用麻木而肿胀的手指，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它剥下来。脚也象手一样，肿得可怕，每个脚趾下都有大个的水泡。泡破了，脓干了，把袜子粘在脚上，我实在不能把它们完全脱下来。我不能行走的原因是一些小泡还没破。很明显，得把水泡刺破，把水放出来。同时，我还需要纱布，还得给手腕上的伤口上点消炎药以防止感染。我站起来，但脚上无法忍受的剧烈疼痛几乎迫使我立即又坐下来。但是，我克服了要坐下来的欲望，战栗地站着。必须在房间里活动，而且开始活动得越早越

好。我把一只脚向前挪两三寸。将重心换到这只脚上，再把另一只脚向前挪两三寸。终于我到了门边，靠在门上，我招呼值班看守。

“报告！”我声音很低，但门上小窗几乎立即就开了，看守肯定一直站在门口，通过观察孔在监视我。

“什么事？”

“能找医生吗？”

“为什么？”

“我的手腕和脚受伤了，需要一些药和纱布。”

“医生对受惩罚的犯人不给治疗。”

“是这样？那么能不能给一点防止感染的药膏或红药水？”

“不行。”

“伤口会感染。”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要一点纱布包包伤口行吗？”

我把手举到窗口，让她看手腕上的伤口，但她把头转向一边，不愿看。

“能给一点纱布吗？”我又问了一遍。

“不行。”

我发火了。“你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履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说。

“革命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对你而言的。”她说。

“是吗？不是对我而言是因为我并非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我没做过任何反对人民政府的事情。革命的人道主义

可以给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在战争中给受伤的日本俘虏药物和绷带，毛主席著作中讲过。”我以讽刺的语气说。

“你给我当心点！你还象以前一样的好争辩和死不悔改，根本没从手铐中得到教训，看样子象是还没戴够。你要再嚷下去的话，我就再把你铐起来。”她威胁着退回看守室，没有再出来。我知道她没有资格决定再给我戴手铐，只是吓唬人而已，她也知道我明白这一点。

看来除了自己处理手脚上的伤口以外别无选择。我想，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找到防止感染的办法。我拖着脚走到桌子旁，喝了点水。外面传来女炊事员推车进楼的声音，车上是给犯人供应开水的两只大保温桶。我等在门旁，她给了我丰盛的一份，几乎装了大杯子的四分之三。我把这些水倒到脸盆里，用一块干净毛巾小心翼翼地清洗了手上伤口的脓血，然后在这有血迹的水中洗了脚。皮肤碰到热水的感觉很好。我很想喝水，但我知道清洗伤口更重要。

坐在床上擦脚时，我在想有什么东西可以撕开做绷带用。这些年来，由于不得不经常把已穿破的衣服撕开来用作刚有点破的衣服的补丁，我的布衣服差不多都用光了。正在搜肠刮肚之时，我看见晒衣绳上的枕套，这是被带到审讯室的那天早上洗的，已经干了。这是最后一个枕套了，不过我以后可以不用枕套，睡觉时把枕头放在床单下面。我抬手取枕套，使人惊愕的是竟然够不着，因为手臂不能举过头。手被铐在背后这么长时间，肌腱已经麻痹，得通过锻炼恢复手臂的功能。但这需要时间，眼下只好让伤口敞着。

劳动改造的姑娘来送冷水，我端着脸盆接，她一看到我的手由于不再能承受更多的重量而发抖，就停了下来，这时脸盆里连一半水都没有。我往喝水杯里倒了一点，剩下的洗脸。接着我想梳头，由于右手够不着头顶，只好用左手托着右臂的肘，将头前倾，靠头部的左右移动来尽力把头发梳光。我很想用海绵擦擦身，把内衣换了，但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擦身又怕感冒。不过即使想洗，也已没有力气和干净水了。

女炊事员送来了晚饭，铝饭盒盛了满满一盒米饭和水煮卷心菜。当我将饭倒入杯子时，发现在盒底藏着两个熟蛋。

在我还没来得及向她表示任何感谢之前，她没有象平时那样打开小窗收饭盒，而是站在外面象是生气了一样喊道：“你总是这么磨磨蹭蹭！吃完了把饭盒交给晚上值班的！我不能老是等你一个！”

坐在床上吃饭，每吃一口都感到有股力量流入身体。吃完饭，洗了杯子，我站起来活动手臂。我是多么渴望能够着绳子上的枕套并马上把手腕上的伤口包起来。我一次又一次将手臂抬起放下，一次比一次抬得高一点，尽力使肌腱伸长。尽管脚很痛，但我仍坚持活动，直到精疲力竭。稍事休息，我又开始活动。

晚上的值班看守送来了当天的报纸，并把饭盒收去。看看报纸的日期，我发现从被带到审讯室并戴上手铐至今才刚刚十一天，但对我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十一天啊。

看守在唤犯人睡觉。这是十一天来我第一次能整晚睡

觉，但我久久不能入睡，太紧的手铐影响了我的神经系统。我浑身疼痛，无论取怎样的姿势，都感到痛苦，极不舒服，连毯子和被子的重量似乎也压得我难受。由于在发烧，感觉不到冷，我索性把毯子拿掉。我尽量放好手脚，避免伤口的脓血粘到被子上，但我马上发现，这不可能。

给犯人紧紧地戴上这种特制的手铐是毛时代中国监狱里用于虐待犯人的常见形式之一，有时还会加上脚镣，甚至会把犯人铐在窗子的栏杆上，使其不能吃喝或解手。这样作是为了使人情绪低落，以达到摧毁人的信念的目的。在我自己被关押以前，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不敢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但在我也有被捕经历以后，我已成了这种特殊分子的一员，所以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遭遇告诉我。然而，由于人民政府声称已废除了一切形式的刑罚，政府官员称此方法为“处罚”或“劝服”。

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我的手才能重新举过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手臂才能重新伸直。手腕上手铐几乎勒到骨头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伤疤，直到今天还在。这是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迹。在手和指头的肿最终消去以后，我的手背仍有两年时间没有知觉。由于手神经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损害，以致用针把手背刺出血也感不到痛。甚至到现在，13年过去了，每当天气较冷或较潮湿时，手仍会发疼。冬天，即使是在暖和的房间里，我仍不得不戴上手套。打扫卫生、打字和提稍重一点的东西，如果时间稍长一点，右手有时会变得软弱而无力，拿不起任何东西。我的右手比左手伤得更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裤

扣装在左边。大小便时，必须用力将手伸向左边，解开裤扣，这样手铐勒入右臂肌肤就更深一些。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因为中国妇女的裤子通常是在右边开口。左边开口的裤子是定做的，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以前我穿的裤子就是这样。我想这是提审员可以列举的我顽固坚持旧的生活方式的另一个例子。

一些朋友事后惊讶地问：“在你戴手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扣上裤扣？”我认为在那种环境下我可以不扣裤扣，但我会因此而陷入可怕的士气低落状态，这不利于我的斗志。回过头来想想，我以为那些年能活过来的主要原因就是毛主义的革命未能击溃我的斗志。

相比而言，我脚的遭遇要好一些。虽然打开手铐以后脚还肿痛了几个星期，但并没有留下后遗症。在拿掉手铐后的头一个星期天，我借了一根针，刺破水泡，把水放出来。这样，即使在水泡痊愈以前，我也可以不必忍受剧烈的痛苦而慢慢跛行。

打开手铐后的第二天早晨，看守叫犯人们到室外活动。我向看守请假。

“今天我可以不去吗？我脚肿了，穿不上鞋。”我说。

她看看我的脚，见我拖着鞋子。“你可以就这样出来。”她回答。

“到操场这一段路我走恐怕有困难，脚很疼，这一次我可以请假吗？”我又要求一遍。

“不行，你必须去，今天每个人都得去。”

她打开门，站在那里等我。我每走一步都极度痛苦，身体发抖，动作迟缓。

“请问我今天不去可以吗？”走了几步，我又问。

“不行，你今天非去不可。”她说。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今天非去不可？今天难道有什么特别？我一边慢行，一边在想。看守极有耐心地跟着我走出女监楼。我的牢室在走廊的尽头，所以我总是楼里出来最晚的一个。

突然，那个好斗的女看守冲进院子，对我叫道：“你为什么这么慢？走快点！我们不能整天都等着你！”

我仍旧拖着脚走，尽力忍住疼痛，走快一点。跟着我的看守也在斥责我。

“你是在演戏！赶快，赶快！你能不能快点？走快点！”好斗的女看守叫喊着匆匆朝操场跑去。

“我不能再快了，而且走得慢也只耽搁我自己。”我对另一个看守说。

“别在意，尽你的努力就是了。”她似乎根本就无所谓。

终于到了操场。这里不象在牢室边上，可以看到围墙以外的树木，而是在一圈环形平台的包围之中。站在平台上，看守可以监视下面操场上犯人的活动情况。平台上的岗楼似乎关着，看守们都站在露天。操场的门一锁上，我就靠在门上以减轻身体对脚的压力，因为它们正处在疼痛的煎熬之中。我想一直这么站到放风结束。

“走起来！”那个好斗的女看守站在我身后的平台上叫

喊着。

我已精疲力竭，所以没有理她，依然靠着那扇重重的大铁门站着。

“你在那儿干吗？走起来！”她又叫了一遍。

“我走不动，脚实在疼得厉害。你看见我的手腕了吗？我的脚也是这样，伤得很严重，现在还在出血出脓。”我太气愤了，就对着她大喊起来。我以为她会冲下来揍我，因为犯人不允许当着其他犯人的面说出自己的情况，而我的声音很大，足以使操场上每个人都能听清，但她并没有因此而惩罚我，似乎这正是她希望听到的，她压低了音量，“那你就站到操场中间去。”

我跛着走到操场中间，面对她站着。

“转过去！面向那边！”

她为何要让我转过去？或许是她想让别人看到我，而又不使我看见她所站的平台上发生的情况。这忽然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头头”，也站在平台上。但我看到的都是些熟悉的面孔，那个人可能躲在岗楼里。岗楼有玻璃窗，如果他在里面，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手腕上的伤口的，我想他是来证实我的手确实被手铐弄伤了。我刚才对那女看守说的，相当于是对我情况的描述，这也许就是她没有发火的原因。她要向“头头”表功，我的手脚受伤是她出色工作的结果。但为什么“头头”不露面呢？他为什么要躲在岗楼里？我把身子微微转过去一点，想用余光看看岗楼。过了一会，三个穿军上装的人从岗楼里出来，那个女看守与他们一起消失在台阶后面。在外面还没

站到十分钟，他们就让我回牢房。回去的路上，没有人再催我走快了。

带我出来的那个看守跟在后面，当她打开牢门时，我让她看我手腕上的伤口，这些伤口又一次为血和脓所遮盖。

“请看看这些伤口。我需要纱布以防止感染，您能帮我把绳上的枕套收下来吗？我想把它撕开用做纱布。”我说。

她二话没说，走过去收下枕套，交给我。

1966年我刚进看守所时这个枕套就已不新，现在它更是脆薄得象纸一样，没费多大劲我就把它撕成布条，做了两副绷带。

监狱里静极了。我回来以后，一直没有听到看守唤其他犯人放风的声音，放风已停止，就象是从未发生过一样。我想，所谓的放风无非是安排那三个军人看看我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什么例行的活动。

开水送来时，我洗了伤口并把它们包扎起来。脓血很快从布头中渗了出来。我不可能马上换绷带，因为在这样寒冷潮湿的牢室里，晒干它得化很长时间。显然得设法使绷带干得快一点。我想，可以用盛有热水的杯子作熨斗，把湿绷带包在杯子外面，一旦送来开水，就用它把绷带烘干。这样一天至少可以换两次绷带，如果睡前洗一次绷带，先用毛巾吸去些水份，那么第二天早晨就能干。用这些办法，我尽量做到每天换三次绷带。

开水发下来后，我把湿绷带缠在杯子外面，看着蒸气

从绷带上冒出，布条的颜色一点点变淡，我高兴极了。

以后的几个月中，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照料伤口上，对于报纸，只是大概翻翻。不过我还是发现，很少有火药味较浓的批判文章了，大部分文章是宣传共产党中国将取得她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我还发现，林彪的名字出现的次数在下降，而周恩来总理的名字比几年前出现得多了。

由于身体虚弱，伤口愈合得很慢，好几个星期过去，最靠表皮的伤口才开始结痂。同时，我的老毛病肾炎和出血症又开始复发，这迫使我去见那个年青医生，对于腕上的伤口也注意得少了。

很多看守在她们值班时都来检查我的伤口，她们中的大多数对此并不加评论，少数好斗的毛分子对我说，这是我应受的惩罚，真是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我不再被叫到审讯室了，因为我简单一生中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已被仔细审查过。我想，毛分子可能会以其他方式再来折磨我，但我并没有去猜测这会是什么方式。

第十二章 出狱

在我注意着我身体众多的苦痛并等待着1971年毛主义分子的下一个运动。春夏来复去，金色的秋天又降临人间，一年之中最主要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就在秋天十月一日举行，这是国定假日。从人民政府接管国家之日起，国庆节的庆祝活动就日趋升级，每个人可得到额外的食品配给，有机会去公园免费参加游园活动和购买到国营商店短缺的消费品。

这天主要的大事是在各个城市举行由当局组织的大游行，彩车上展示着统计图表、宣传画表明去年一年中取得的经济和文化的成就，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家庭妇女列队行进，高呼着由共产党中宣部为庆典特意审定的口号，表示誓死忠于人民政府。游行队伍都经过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精心安排和检阅。

在北京，游行在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城楼两边有特设的看台，都是外国贵宾和外交官。入夜有精彩的焰火晚会。

数百辆彩车组成的壮观场面给人以深刻印象，成千上万的男女群众徒步行经检阅台，红旗如海，口号声声，人们高举着毛的标准像象征着毛的权力和成功。对这位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刻，游行队伍行进中有那么多张脸，带着崇敬的目光仰望着他，雷鸣般的声音，祝愿他万寿无疆(历史上曾用这样的字眼来祝愿皇帝)。

10月2日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毛的笑容可掬的照片，在中国人人人都知道对于毛泽东这个来自韶山的农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是他个人的最重大的日子。因此，1971年10月1日竟没有任何庆祝活动，确实令人大吃一惊。当早晨的广播中没有什么特别新闻时，我就感到意外。下午我焦急地等着报纸，报纸一到，我见除了头版刊登了毛的标准像，以及10月1日国庆节用红字套印外，也没有报道有任何领导人出席的活动或特别事件。当我还在为这异乎寻常的出格情况感到迷惑不解时，一个看守突然推开了小窗门。

“把语录本交上来。”她命令道。

这看来是个很奇怪的命令，一刹那间我还以为大概我一时疏忽，犯了什么错损坏了这本书，她准备利用这点处罚我。我连忙取出语录本，匆匆瞥了一眼，见它完好无损，就交给了她。随即关上我的小窗门后，听见她又命令其他牢房的人交出语录本，这时，我才明白，她得到命令从所有的犯人手里收缴语录本。

直到晚上命令我上床睡觉时才把书还给我，我认真地检查一遍，想看看究竟为什么她要收缴这本头等重要的书。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她把书的前言撕掉了。这本毛的语录是由人民解放军首先出版和推崇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后命令用它作为文化不高的战士学习毛泽东思想之用。

语录的前言是林彪亲自写的，在前言中他赞扬毛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特殊的情况”。他要求解放军战士学习毛的语录并在日常工作中应用，这样他们就可“把毛泽东思想溶化在血液中”，成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前言的字里行间没有任何可以认为是反对毛的词句。事实上充满谄媚恭维之词，但在文化革命期间人人必须会背诵这些令人读来难以启齿的话语，我觉得前言被撕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此人已经失宠。按照共产党的惯例，一旦某人失宠，他的名字和写的东西的记录都要抹去。显然看守奉命收缴语录本并作出处理，使我确信林彪已经失宠，这令我十分惊讶，我手持这本小红书，默默站着，若有所思。

“为什么还不睡觉？”是门外看守的声音。

我并不想与她谈关于发生的一切我之感想。我很快铺好床就睡下了，但那天晚上我久久难以入睡。

在看守把我的语录的前言撕掉数天之后，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告诫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人物，没有指名道姓。对西方人来说“睡在我们身边的人”通常指自己的配偶，对中国人来说，指的是与自己很接近的人。在刘少奇

遭批判的时候，曾经这样来暗指他。这表明毛并不知道与他很接近的林彪是想谋害他的敌人，其他的文章谈到，此人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毛曾经很信任他，口头上他拥护毛，背地里在策划谋害毛。文章里还一再提到党的历史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部队的战斗史，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林彪个人的历史都很熟悉，因为当他俨然是毛泽东的当然接班人时，曾一再宣扬他的光辉历史。至此，我已毫不怀疑林彪已被驱逐，虽然当时我对他和毛泽东之间的斗争的详细情况还一无所知。我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全神贯注地推敲报纸上每一个字，我不无宽慰地注意到负责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林彪的党羽的名字消失了，由于第一看守所是上海市公安局管辖下的监狱网的一个部分，因此此人也是拘留所军管会一个最高级官员。如果我的估计正确的话，在背后策划对我进行迫害的势力是林彪在上海的军队里的代表人物，那末我有充分的理由庆幸林彪的下台对我有利。此外，我告诫自己必须继续注视事态发展。我觉得还未到高兴的时候，我还不清楚因林彪倒台而形成的权力真空将由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还是由周恩来为首的老革命派来填补。

十月底，一个晚上，看守又叫犯人们安静收听特别广播，扩音机打开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开始滔滔不绝地向犯人们说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他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宣布尼克松总统在第二年要访问中国，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扩大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从而使至今对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政策的美国，认

识到这种政策是不足取的。

“尼克松，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即将访问中国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如果中国羸弱无力的话，他会决定来中国吗？当然不会！尼克松之所以决定来中国向我们的伟大导师表示敬意，是因为他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的伟大导师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和考验，中国是不可战胜的。不要忘记，美国是世界上最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头号敌人。美国总统的来访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反映了文化革命的伟大成果，表明资本主义阵营的腐朽没落，社会主义阵营蓬勃向上，日益强大。

“开始，尼克松要来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认为：我们将欢迎的这个人是一个反对越南的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压迫者和长时期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物。但是我们的伟大导师胸怀宽广，他说‘让他来嘛，我们以礼相待，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如果他承认过去的错误，并且诚心诚意地要改过，我们表示欢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给人以机会，如果他诚心悔过的话。’我们的伟大导师是何等英明啊！他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接待尼克松。以后几个月里，我们要对我们所有的同志进行形势教育，帮助他们认清，接受尼克松的访问，并没有抛弃我们的原则，而是美国政府放弃他们错误的政策。尼克松的来访是我们的伟大胜利。

“联系这些情况，我想警告关在第一看守所的许多人，把你们关在这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你们对帝国主义、资本

主义世界崇拜得很，藐视社会主义中国，你们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并且相信终有一天资本主义会重新统治中国，美国总统的即将来访是在给你们上课。请仔细想想，如果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被赶出中国大陆，如果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没有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如果美国军队没有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尼克松会远涉重洋来到北京向我们的伟大导师表示敬意？”

讲话拖得很长，得意洋洋地重复着美国总统的这次访问，讲话的要点即在于此。在我从看守所释放之后，我才知道，在尼克松来访前，对广大公众也作了同样的宣传解释，每个工厂、公社和居民委员会都进行了讨论，对即将的来访作好准备，并借此机会制造这样的印象即毛泽东现时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我对中美关系的新的转机有点自鸣得意，并坚信这对于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权力平衡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周恩来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党的领导阶层内稳健派的力量看来会占据上风。真是如此，我的劫难也快要结束了。但是，凭我的经验知道，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慢吞吞的，等到北京上层政策的转变影响到象我这样的人所处的下层常常要经年累月。我也很清楚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在上海有强大的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她的助手的张春桥还是市委第一书记。

生活在绝望之中多少年了，现在我却被这形势新的发展深深地触动。几个星期来，我关注着报纸上的新闻，期

待着。看守们也显得特别认真，就象1967年一月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接管上海市政府的那些日子里一样，我想大概害怕林彪的垮台造成剧烈的政治动乱。

冬天还是降临了，我绒衣肘部和长裤的膝盖处的破洞已无法再缝补了，我的棉袄和被子都破了，有些地方连棉絮都没有了，打满了补丁，剩下两层布片。仅有的一件衬衣也缀满补丁，已看不出原来是什么布做的。显然，假如我还要在看守所活过冬天的话，我必须再要一些衣服，我曾经多次请求给我取些衣服来，总是落得个无声无息。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试，看看形势的转变是否会带来些许不同的反应。

“报告！”我在门口叫着。

“你要干什么？”一个卫兵冷漠的脚步声在我牢室门口停下，小窗门打开了。

我把绒衣递出去给她看上面的破洞，说道：“天越来越冷，我的衣服和被子都破了，一点暖气也没有。请你看看这件衣服，全是洞。我还需要一件棉袄和被子，另外还要一件衬衣，请你看看我的衣服，你看我确实需要一些御寒的冬衣。”

“你在这儿已经多久？一共还有几年？”

“我在这儿已经是第六个冬天了，是1966年9月进来的，红卫兵给我的衣服和被褥都是旧的，这么多年没有换衬里，已经一点没有暖气了。”我说。

牢房过道的尽头透过一缕微弱的光，在这儿我已被囚禁了这么长时间，我仍坚信要活到这一天，我将迎着这线曙光重见天日，可能我的声音显得太急躁，把她惹得恼火

了，她关上窗就走了。

尽管这些人冷漠如常，我已毫无惧怕，我对每一个值勤的看守重复着要求给我暖和的衣服和被褥。最后其中一个看守终于忍不住说道：“行了，行了。我们已经知道你要些衣服，已经在考虑你的请求了。”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冷。我决定再试一次。

“报告。”我喊道。

“你要干什么？”一个看守从紧闭着的门外问道。

“我能见见提审员吗？”

“做什么？”

“我想请求要些衣服。”

“你还没有拿到衣服？”那看守打开窗洞。通过窗洞望去，就是那个我戴着手铐时催促我吃饭的年纪较大的女人，自从那天晚上，我没有再见到她。

“我的冬衣都破了，请你进来看看，假如我得不到暖和些的衣物，我怕今年冬天是挨不过去的。”我说。

她没有锁门，进来检查了一下我的衣服和被褥。随后说：“我会向上级报告的，眼前要不要先借些囚服穿？”

想到要穿囚衣，不禁使我不寒而栗。不仅因为想到这些衣服会满是臭虫，而且这样的话我就放弃了我仅剩的一点尊严和独立。

“不，谢谢你，我不想借囚服，我只想能获准用我自己的钱买一些新的冬衣，我的钱现在都在政府手里。”

她好象在考虑这些问题。于是我补充道：“我的钱在抄

家时都被红卫兵拿走了。其中有一个老师对我说，假如这些钱不是剥削来的，政府会替我保存好的，我没有一升工厂，也没有一块土地，我把这情况告诉那个老师，他对我说，我的钱是不会充公的。”

“我会报告上级的。”她答应说。

几天之后，我被叫到审讯室，见不到那个年纪稍大些的看守的踪影。坐在提审员座位上的是那位好斗的女看守，那人在提审我时，总是拿着一枝铅笔，身边站着两个女看守，包括那个我认为温和些的。那个好斗的女看守看上去使我既惊讶又失望。难道北京新的形势并没有给第一看守所带来任何变化？在这个女人的手中，我还有什么希望？难道我的要求能获得些微的同情？

向毛的像鞠躬行礼，再念一段语录之后，我坐到犯人的位子上，等着她对我的要求会如何发落。当她用一种平和的、几乎是充满善意的语调对我说话时，我毫无思想准备。

“你是想要一些冬天穿的衣服？你还没有穿棉衣？”

“衣服都穿破了。”我说，为了证实这点，我撩起蓝布外衣，露出棉袄的衬里，上面都是一个一个洞，一簇簇棉花从洞里露出来，我又举起袖子给她看。

“行了，行了！把衣服穿好。”她说。

“我的财产都交给政府了，我想请求批准用我自己的钱买一些急需的衣服。”我说，特别强调“我自己的钱”这几个字。

“政府哪一个部门掌管着你的钱？”她问道，“你有收条吗？”

“红卫兵抄家时把我的钱拿走了。他们没有给收条。”

“你不可以用‘抄家’这样的说法来形容红卫兵采取的革命行动，他们是遵照伟大领袖的教导破四旧对剥削阶级采取行动。”她说道。

“我不是剥削阶级分子，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只有靠工厂的利润和股票的利息或向农民收租生活的人才是‘剥削阶级分子’。我的钱都是每个月合法挣来的工资和继承的遗产，是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在一年前，我这样说的话，她肯定会暴跳如雷。现在她只是不理睬我的说法。

“到你家对你采取革命行动的红卫兵的老师对你说过政府哪一部门掌管你的钱吗？”

“没有，他们只是说这些钱要按照毛主席的决定来处理。”

“被红卫兵没收的全部财物实际上都被冻结了，在主席没有作出决定之前，是不能动的。”她说。

“我在中国银行还有外币存款。”我说。

“外币存款也冻结了。”

“那末，借一架英文打字机给我，我给香港的银行写封信，让他们给我汇些钱来。”

“这是不允许的，你不能与国外任何人取得联系。”她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会写些什么呢？”

“信寄出之前，你可以原原本本看一遍。”

“你可以用密码把信息送到国外，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你的要求向上一级领导汇报。尽管

在天气实在冷的时候，会给你弄些衣服来。现在你就回自己牢房去认真学习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书。”

我被送回牢房去了。在审问的过程中，那个好斗的女看守自始至终用心平气和的声调说话，甚至还带点同情。这种变化是令人惊异的。我猜想她是属于那种“紧跟党的路线”的共产党员的典型。中国人民把这种人叫做“变色龙”，他们会根据形势象“变色龙”一样随机应变。这样的党员才能生存并取得成功。他们从不对党的政策提出问题，总是紧跟不误，忠实执行。他们是些没有思想的机器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个人的意志。随便哪个党的书记都可以任命他们去另一个单位任职并成为最出色的干部。只要这个书记是党的权威的代表并有权提拔他们，他们就无条件地唯命是从。但一旦这书记失宠，他们也总是首先起而声讨之，他们是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造就的新的一代成功者，因为随便党的政策如何变幻莫测，他们都能明哲保身，成了中国的年青一代竞相仿效的榜样。使得中国社会的本质就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星期后，一个男看守把一只好大的包袱放在我牢房的地上，等我在收条上签了字，他就锁上牢门离开了。我把包袱搬到床上，打开包袱不禁叫我猛地一惊，我发现包袱里有一件棉袄，一件羊毛里子的皮袄，二件绒衣和一条羊毛裤，这些衣服都是红卫兵 1966 年抄家时允许我女儿留下自己穿的，包袱里还有一条她用的棉被，衣服里面还包着几条毛巾和她喝茶用的杯子，其中有一条佳能牌玫瑰色洗脸毛巾，是我从香港带回来的，我被关到第一看守所时，

她就在用这条毛巾。而且这条毛巾就象 1966 年时一样完好如初。我仔细翻着那件海蓝色毛料面子、栗色丝绸夹里的棉衣，这是 1966 年新做的，现在仍崭新如初，我拿起白瓷杯子，手不禁阵阵颤抖，杯子里面有一层淡淡的棕色的污垢。没有洗干净，茶叶都干了。我检查了每一件东西，他们给了我不祥的预兆，我的心不禁越跳越快。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心头掠过，我不能想象在我被捕后不久，我的女儿就会有有什么不测。她可能已经死了，否则这些衣服怎么会几乎没有穿过一样，这毛巾好象没有用过仍象新的一样。她的死，一定是如此突然，如此意想不到以至于她连洗一下刚用过的杯子的时间也没有，我两脚止不住剧烈地颤抖，只得赶快坐下。

第一看守所允许犯人的家属在每个月五日给犯人送些衣服和肥皂、毛巾之类的日用品，在我被监禁的漫长的日子里，曾听到看守所其他犯人带来一些包裹，而从未有人给我带来什么，开始我也奇怪，怎么我女儿从不给我送些东西，以后我认为她是个共青团员，因此她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在我对通过每月一次的包裹与我的孩子保持些微联系的念头还未完全绝望之前，我是多么盼望她能不顾一切地来到监狱门口，加入长长的队伍，排上几个小时，递上一个包裹。而现在在我内心深处已经隐隐感到我之所以从未收到她的包裹是因为她已经死了。

“报告！”我奔到门口，想从看守这儿知道一点真相。

“你想要什么？”看守打开窗洞从外面望着我。

“你刚才给我的这些东西，是我女儿的衣服和被褥。”

我说。

“是的。”那看守回答说。

“我女儿出了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她回答说。

我凑近窗洞望着她的脸，她显得十分平静如常。

“这些衣服显得与1966年一样新，过去这几年难道她没有穿过？”

“我怎么知道呢？她可能买了新衣服，她不是有工作吗？她有工资，可以买新衣服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你肯定知道我女儿还活着，目前过得很好，是吗？”我多想知道得多些，更肯定些。

“你如是这个意思的话，我可没有见到她。”

“但你确实知道，不是吗？”

“为什么你认为她没有活着呢？”看守关上了窗洞门走了。

难道是我疯了？监狱生活使我变得无端猜疑，神经过敏？我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每件东西，当我触摸到她的每件衣物时，越来越确信无疑，她已经死了。是的，这堆东西已明白无误地强烈地提示她已不在人世。当然我还需要有确切的证据，因为我惯于面对事实，对一切不能理解和无法解释的事情都值得怀疑。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存有一点希望，驱使着我抛弃这样的念头：她已经死去。也是这种信念使我顽强挣扎着苟且偷生。对她这样年轻健康的人来说还不该面对生老病死，不管我看到什么我仍然努力地安慰自己，她还安然无恙。

撒落在我眼前的一件件东西异乎寻常地使我无法解释，这一切都似乎在告诉我，自从我入狱后，时光突然停滞不前，那海蓝色棉袄看上去还是新的，但我翻开丝绸里子看到腋窝部位是皱的，衣服口袋里有一条手绢，这又表明她穿过这件棉衣，但显然穿了至多不会超过一个冬天。焦虑和不安时时在我心头回旋，我尽力设想着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从看守所说的情况她好象还安然无恙，尽管她未说出什么特别的情况，一个念头闪入脑海，我又走到窗口。

“报告！”我叫着。

没有人走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喊着，虽然我听到看守们在走廊尽头自己的房里交谈，但仍然没人走过来。当值夜班的看守过来叫我们睡觉时，我想跟她说几句。但是她没有走近我的牢房，只是远远地在那儿命令大家都上床睡觉。

我无法入睡，越发焦虑不安，第二天一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呼唤看守。

“报告！”

毫无反应，我决定等值日班的看守来巡视。她一走过来，我就喊道：“报告。”

她很快就走过来。“什么事？”那看守问道。

“昨天那位看守带给我的那些东西全是我女儿的，这使我很不安。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女儿好象根本就没有穿过这些衣服。红卫兵当时只给我们一人留了一件棉袄，为什么在这几年冬天她没有穿这件棉袄？为了证明我女儿还活着还很好，我请求你告诉她亲笔给我写几个字来让我看看。”

“看守所在押的犯人是允许与家属联系的。”她说。

“那么只要她写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一段毛主席语录或者只写她的名字。”我力争着。

“不，这是不允许的，我已经告诉你，看守所押的犯人是不允许与家属联系的。”她肯定地说。

“但是我在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说。

“这点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以后几天，我对每一个值勤的看守都重复着我的请求，我越来越意识到，我的女儿真的死了。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或是托辞推诿，或者干脆一言不发。有一两个看守在拒绝我想看看女儿的手迹的要求时显然很不安，说话时避开我的目光或干脆看着地面。

我的思绪紊乱，悲痛之极，我渴望能知道真相，但又害怕这一切会是真的，我一会儿意识到她已经死了，一会儿又认为是因为自己长期囚禁变得神经过敏和消极厌世。

经过几个星期的焦虑不安，吃得很少，几乎夜夜不能入睡，我瘦得不象样子，发着高烧，说着胡话，我被送进监狱医院，尽管看来我将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我的生命竟还这么顽强，竟然又活过来了。圣诞节前夕我又被带回第一看守所。

经过这么多年的监禁生活，我经常面对上帝，感到他的存在。在牢房的一片昏暗的氛围中我才感受到超然万物之上的神灵的神秘，在悠然轻闲的生活中，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对于真理和正义最终必将获胜的信念又恢复了。重新激起我斗争的勇气。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但坚强的信念支撑着我，使我经历了穷困，疾病和苦难仍然能安然无

恙。同时，我所经受的一切也增强了我的信念，使我坚信上帝永在。上帝又来到我的身边。

在看守的眼皮底下，白天我无法公开地祈祷，我能独自一人默默祈祷的唯一办法是低着头装着读毛泽东选集，但我痛苦的心灵发出对上帝的呼唤，我默诵着我女儿的名字。我又重新体验从1942年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她降生之后充满欢乐的年月，一直到1966年9月29日夜晚，我被带到斗争大会上逮捕入狱，被迫母女离散。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她出生后每一阶段所给予我的种种欢愉，我知道我是幸福的，上帝予我特别的恩宠，赐予我可爱的女儿，我日复一日地祈祷着，越来越多地记起她活着的日子，越来越少地想到她会悲惨地死。渐渐地我恢复了宁静，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但问题是，希望仍固执地萦绕在我心中，我愿在我有朝一日走出第一看守所大门时，还可以见到她好好地活着，我清楚在获得释放前和释放后还有许多事要做，斗争并没有结束。对我来说迫切要做的事是搞清楚我女儿究竟出了什么事，如果可能我要制止施之于她的一切错误。失去梅萍我的生活将会充满悲哀，但我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来到北京，报纸腾出整版篇幅报道这次访问。刊登了他抵达时，在欢迎宴会上以及毛泽东在居所与他会见时的巨幅照片，当看着毛握着美国总统的手笑容满面时，我想这个时刻确实是毛泽东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个时刻，受屈辱遭摒弃的年代已经被彻底铲除，我敢肯定，他之所以热衷于与美国总统的会见，不仅仅对

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次有意义的会晤，而且对他一生的死敌，台湾的国民党也意味深长。

所有的报道和照片中，周恩来的形象也很突出，报纸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去上海，美国总统从那儿启程回国。报道说美国总统启程的时间稍稍推迟了，暗示在发表公报的最后关头，在措辞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发表的文本包括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承诺意味着美国将不可能承认台湾独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最最担心的。从共产党中国方面则宣布将来统一中国的两个部分将不诉诸武力。这个公报是共产党中国的一个决定性胜利。显然，共产党中国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对客人予以殷勤的款待，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付出了。与美国恢复邦交的政策看来是无比正确的，我认为周恩来总理个人的地位，加之他那成功而娴熟的外交手腕大大地促进了这一进展。

于是阶级斗争的调子稍有收敛，代之而起的是较和平的气氛，报纸的调子也不再杀气腾腾，就是那些看守们的所作所为也变得合乎人情了。三月份，我被带到审讯室，提审员是我刚到看守所时审讯我的那位，现已恢复了职务；他一切从头开始，就好象中间这段时间不存在似的。要我另写一份自传，然后，他又问我有关我的家庭、亲戚朋友，以及我个人的生活和活动。总之把我在1969年工宣队审问时已经陈述过的所有事情再重复一遍。当我显得有点不耐烦，并提醒他这些问题我都已经回答过时，他只是说“你必须再回答一遍”。我并不觉得他企图设圈套让我说出

什么有矛盾的话来，以便置我于死地，更象是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者与工宣队的审讯者是为不同的主子服务的。

一系列的审讯持续了几个月，我已说不清楚我给带去审讯室多少次，也不知念了多少段毛主席语录。没有太多的吆喝和申辩，但我体力不支，疲倦之极。觉得这样无休无止的审讯太长了。

1972年秋天的一天，提审员拿出一封信件，显然是从我的档案里拿到的，就问我，是否是我写的。我见上面有我的署名就说“是的”。

“这是你非法活动的证据，但同时，也可能仅仅是政治错误。”他说。

我大吃一惊。“我是不是能再看一遍信？”我问他。

他把信递给我，我见到这信是1957年10月我丈夫死后不久写的。那时我已去壳牌石油公司办事处接管工作。由于没及时去银行更换印章，所以中国银行已拒付公司支票。我记得那天早上我接到一只电话，是壳牌石油公司在香港的总经理打来的，他告诉我已任命一位总经理来继任我已故丈夫的职务。香港的总经理第二年三月份前不能来上海，他说：“伦敦方面想要知道这项安排对你是否合适。”我告诉他一切非常好，我将通知上海市政府的工商局。然后他请我列一份他们来中国所需带的生活必需品单子，以便新任总经理和他的妻子可以带来。他们特别想了解是否要带面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是吃大米的。

由于那时我们的秘书是一个英国妇女，我想她最了解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忠告，于是我让她列了一张清单，附了

一张说明在我署名的信里，由于她非常乐于帮助自己的同胞，就列了一张相当长的单子，包括了许多物品，从纽扣到去污剂。即使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封信也是完全无害的。

“从这封信中我看不出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说。

“没有政治问题？你泄露了有关上海粮食供应情况的情报。”

“真的？让我再看看这封信。”到这时候我才醒悟，他只是受人指派来找出一些把我关押的借口，以便在释放我时，可以有所交待，以免承认我是无罪的。我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不喜欢承认错误的，因为他们自称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他把信又递给我说道：“读一读关于粮食定量这一部分。”

我念道“上海政府给每人每月二十斤粮票，可以买大米，也可以买面粉。这些粮食是有余的。”我问提审员：“这有什么错误呢？”

“这是泄露关于粮食供应情况的情报。”他说。

“每个人粮食都是定量的，包括所有住在上海的欧洲人，这不是什么秘密，这是每个人都知的事实，还有什么可泄露的呢？”

“你的信是寄到国外去的。”他说。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上海的欧洲人回到他们自己国家时就不会将这些情况告诉外国的亲人？回国作短期探访的华侨又会怎样呢？难道他们就不知道自己家人的粮食定量情况？他们都会在离开中国后把这些情况遗忘了？”

“那是他们的问题，这封信是你的问题。你是不是同意你写的这封信？”

“这封信实际上不是我写的，但我对此负完全责任，因为信是我署名的。这封信是我在负责一切事务时从公司发出的。我对你的这一观点不敢苟同，提到每月每人定量二十斤大米或面粉这样一个事实就算是‘泄露机密’？”

“泄露粮食供应的机密是非法的，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个政治错误，由于你对一些规定不了解。”他说。

“胡说！这不是什么政治或者其它什么错误，假如是有规定的话，请拿给我看看。”我感到异常生气。但他并不理会我的话就结束了审讯。

冬天来临了，犯人们一天又有三顿饭了，我中饭可吃到鱼或肉。但是我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全身各部分都越来越差，而且贫血很严重。当我出血不止无法控制时，由一位穿便服的火气很大的女看守带我去第一医学院中山医院作检查，大概事先已经约好，我一到妇产科，就在其他候诊病人之前进了医生诊室。

令我惊奇的是这位“医生”只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青女子，她戴个革命造反派的袖章，毛毛糙糙地给我简单检查了一番，然后她告诉看守，我患了子宫癌。对她的话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认为她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她只是一个边干边学的医生，就象我过去遇到过的只是一个年轻的护理人员。但是看守和其他人显然都相信她。我的医疗待遇改善了，一些看守看到我时，眼里流露出怜悯之情，在我被释放之后我才知道，从我去了医院之后，负责我的案

子的干部就开始热心地四处为我找房子了。最后决定给我二间房间和带有一个浴室的套房，因为我已没有孩子能来照料我，我需要有个保姆照料，了却余生。

1973年3月27日，中饭后，正当我在牢房里踱步时，一个看守打开小窗说道：“收拾一下你的东西。”

“我所有的东西？”我问她。

“是的，所有的东西，不要遗忘什么。”

接着牢门很快打开，两个劳改犯走进牢房。这是两个姑娘，她们把我的东西都收拢了，搬了出去，一个看守站在过道里说：“出来！”

我环顾了一下牢房，整整呆了六年半的“家”，我的脸盆和毛巾已经拿走了，牢房已显得有点异样。我注意到我贴在床边墙上的手纸，我想假如我把这些纸也撕掉的话，这里就不会留下我的任何痕迹。但是我决定还是把它们留给下一个不幸的女子，她要来占据这间牢房。当我站在这间牢房里最后看上一眼时，我仿佛又觉得手腕上那冰冷的手铐，记起我所遭受的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楚。在我与一切抗争时，万能全智的上帝赐予了正义，在共产主义国家正义已成了稀罕之物。

“出来！你在那儿干什么？你还没有呆够吗？”看守喊道。

我随着她到前面院子，走进一间房子，1966年我到看守所来时，就在这儿登记的。房子里空无一人，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

那年青的医生随后走进房间，他半倚在桌旁，一副散

漫的样子，说道：“我将告诉你，你的疾病情况，你出去之后可以告诉自己的医生。”他说了几个医学名词。

“非常感谢。”我说。

“行了，你很快就可以获释了，很高兴吧？”那位医生问我。

“是时候了，你说呢？六年半对一个无辜的人来说关的时间够长的了。”我说。

他顿了一下进而又说，就象没有听见我说的话：“我想在你离开之前给你说几句话，这对你有好处。你在这儿期间，表现得并不很好，实际上，在看守所这么多年，我们从未见过象你这样的犯人，如此好斗不驯。在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之际，你一定要努力控制自己，不要触怒群众，上海已不再是文化革命前一样的城市，你对无产阶级一定要尊重，否则你会吃苦头的。你是个有病的人，你不要再让人送回这儿来，行吗？”

我没有再说什么，他又呆了几分钟就走了，我并没有很认真听他说。占据我脑海中的只是想我是否能看到我的女儿还活着。

二个男看守把我的衣包彻底搜检了一遍，他们查完后，我被护送到一间审讯室，走进审讯室不用再向毛的画像鞠躬和念语录了，提审员只是指了指犯人坐的椅子，我就坐下了。

还有一个我过去从未见过的人坐在他身边，那人说：“你出狱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给你宣读人民政府下达的有关你的案子的结论，听完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

提出。”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两张纸，然后对我说：“站起来听候决定。”

我站了起来。

他念了我的名字和个人其他的情况如年龄、出生地点。然后他继续念道：“上述人犯于1966年9月27日被拘捕入第一看守所，原因如下：一、1957年10月，在一封寄往英国的信件中，她泄露了上海粮食供应的情况；二、她包庇卖国贼刘少奇，反对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刘少奇的决议。罪行是严重的，本应从严处理，但是鉴于她政治上落后无知，决定给予她改正错误的机会。经过在第一看守所六年半的教育，她在认识上有一定的进步，有悔改的表现，因此决定取消拘押，以示宽大，准予释放恢复自由。”他念完之后，抬起头看着我。

我面露愠色，不禁义愤填膺。对他们的伪善和恬不知耻我嗤之以鼻，我内心深知，真正的罪犯不是我面前的这个人，而是我们都必须在此生存的罪恶的制度。我告诫自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斗争，我望着他坐了下来。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你没有觉得要感激吗？马上就可以获得自由了，你不觉得高兴吗？”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和颤抖，说道：“我不能接受你的决定，我将仍然留在第一看守所，直到对我的案子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合理的结论应该是承认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没有犯任何政治错误。对我的错关要赔礼道歉，彻底平反。另外必须在上海和北京两地的报纸上公开刊登

声明道歉，因为在这两个城市我有很多亲戚朋友。照你刚才宣读的结论，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早在刘少奇受到批判前我就被关进第一看守所，你怎么能够预计我会站在他一边为他说话？至于所谓泄露粮食供应情况的情报，只是你们为了挽回面子而捏造的罪名，你们也都很清楚，我从未泄露过任何东西。”

他们面面相觑，然后，提审员说道：“第一看守所不是敬老院，你不能一辈子呆在这儿。”

“我不会一辈子呆在这儿的，我将呆到对我的案子有了正确的结论，如果你明天下这样的结论，我明天就离开。”

“我们已经知道你的意见，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允许你发表意见，我们会注意到这点，我们将把它进一步转告上级机关。现在你可以走了。”另外一个人说道。

“不，我一离开这儿，你们就会完全忘之脑后，这个错误的结论就会放进我的档案，我不能出去。”我说。

提审员站了起来，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犯人会拒绝离开看守所的，你一定要想想明白，随便怎样，一旦政府要你走你就必须走，你的家属今天一早就已经在等你了，你还想要耽搁多久呢？”

他是说我女儿在外面等我？呵，我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突然，两个女看守走进房间，她们一边一个把我架到二道门。

远处，在一辆蓝色的出租汽车边上伫立着一个年轻的女子的身影，她比梅萍矮些，我心不觉一沉，我认出来了，她是我的干女儿何安。

第三部

为正义而斗争

第十三章 梅萍，您在哪里？

我仍站着，望着监狱外的路，那全副武装的卫兵已远远落在我的身后，只见我的干女儿何安张开臂膀向我走来，只有她一个人。

“梅萍已经死了！她不能来接我了。梅萍，死了，她已经死了……”我耳边轰鸣，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尽管我心灵深处急于想知道究竟为什么梅萍不在了，但极度的悲伤使我虚弱得无法迈动我的腿，何安搀扶着我，等候出租汽车。

“梅萍在哪儿？”

我怕听到回答，但我还是要问。

何安没有回答，只是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不敢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梅萍死了吗？”生怕这话会变成事实。

汽车驶过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们静静地坐着，从第一看守所释放出来，并没有使我感到有什么解脱，只是回到原先的“看守所”重新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

出租汽车停在一扇窄小的黑色的木门前，周围是水泥的墙，何安付了车钱，敲了敲门。一个穿着蓝色棉布外衣

和一条肥大的裤子象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开了门，帮我们把东西提进去。

一个小园子，原来一定象花园一般的，现在满地碎砖破瓦，除了孤零零的一棵榆树在瓦砾堆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到处野草丛生。眼前的这幢房子看上去破烂不堪，底下的房间没人住，露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进门是一个小小的前厅，楼梯和前厅刚扫过，并用拖把拖过，但墙壁仍是灰蒙蒙的。我们上楼去，何安把我领到一间大房间，房里有一张床，铺着干净的床单和一条花被，一只五斗橱，一张小书桌还有台子，四张椅子和一个轻便的靠椅，家具完全是那时专为新婚夫妇设计和成批生产的标准式样。

“这二间房子归您了，是公安局给开了证明，让我为您买了这几样家具。”何安拥着我，大声嚷着：“喔！您能回来了，这就好了！”她用双手捧着我的脸，看了好长一会儿。我知道问起梅萍的事，令她很难启齿，需要等合适的时间，但她不对我解释梅萍的失踪，就证实了我的猜测，梅萍可能死了。我感到压抑和痛苦。但我还是等待着适当的时候再提起这件事。

“他们给了我5000元，是你的钱，我一分钱也没有动，我想你需要一些钱维持生活，所以我不敢化钱粉刷墙壁，窗帘也将就着用。”何安解释说：“妈妈是和我一起去接您的，但就在我们等汽车的工夫，她接到通知去参加小组学习会，听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大概您也已经知道这事了吧？”

“我想，林彪可能是失宠了吧！报纸上已经见不到他

的名字了。”

“他已经死了，他想逃到苏联，中途飞机失事。现在周总理成了仅次于毛主席的人物，所以一切又都有了转机，因此您才能获释。喔，能见到您真是太好了！只是……”她话还没有说完就泣不成声了。泪水泉涌般淌满了面颊，她低着头，不愿我看到她如此伤心。

她刚要告诉我关于梅萍的事，保姆端着两杯热茶走进房间，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何安很快抑止住悲伤，抹掉眼泪，好象生怕让保姆看见似的。

“这是阿姨，”何安介绍说，“她来照料你，她睡在另一个房间。”

“谢谢。”我从保姆手里接过茶杯。她看上去五十来岁，是一个强壮的小女人。皮肤很粗糙，有一双有力的手，她把杯子递给我时，打量了我一眼。

“要烧点热水洗个澡吗？”她问道。

“不，谢谢了，等一会儿，我要洗的时候会告诉您的。”

她离开房间，把门关上后，我问何安：“还允许雇佣人吗？”

“为什么不行呢？有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谁家里有人病了或者有个小孩需要照顾，雇个保姆，谁也不会说三道四。公安局来人关照过，要找个人照顾您，他说您病了，需要手术。他说得很严重，您现在的样子要比我想象的好些，但您真是瘦得可怕。”何安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头注视着我羸弱的身子。

“不用担心，只要有东西吃，马上就会好起来的，您是怎样找到这个阿姨的？”我问何安，我怀疑这个保姆是公安局派来的。

“是我妈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来的，不过，”何安压低声音说，“她与陈妈不一样，对她说话要留点神。”

我点了点头。

“我想现在政府对你会优待些，北京的情况有些变了。你现在有二个房间带有洗澡间，昨天，我在帮你挂窗帘时，房管局绿化处还来了个人告诉我，要在花园里为你种几棵树，还问我知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树呢。”

就是因为我有二个房间外带一个洗澡间，房管局派人在花园给种上几棵树，何安就把这些事与人民政府会“优待”我联系在一起。因为在中国，政府是我们命运的主宰，中国人民对政府机关的每一个细微的暗示都很敏感，把它看成是我们每个人在当权者眼里占有什么位置的标志。

何安看来很轻松，微笑着。于是我决心要问她梅萍的事。“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梅萍究竟出了什么事？”

她用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我，仿佛要确信我能否承受得了她要对我说的一切。最后她决定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那时我不在上海，你是知道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正好从音乐学院毕业。记得那年8月我来参加梅萍的生日聚会时，正在等待学校分配工作，12月我被分配到贵阳。我刚到贵阳，就接到通知要去贵阳附近的一个农村公社接受再教育。到了1967年的夏天，妈妈给我来信说，梅萍她已经自杀了。”

事情已经很清楚，梅萍她已经死了，当我在第一看守所看到她的衣服时我已经怀疑了。但我还是不顾一切固执地抱定着一个信念，就是希望在我挣脱囹圄后，能看到她还活着。而现在，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我还不如死在监狱里，就永远不会知道梅萍已离我而去，我会更少些痛苦。我曾经在逆境中挣扎，抗争，那时我多么想活，生命对我来说是如此宝贵，而现在刹时变得毫无价值了！我深深陷入寂寞之中，我感到茫然，何安的手臂挽着我，我们一起为梅萍而悲泣。

他们是怎样逼迫梅萍去自杀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一个好端端正当豆蔻年华的女子怎么会走这条路。

“有人曾告诉我，在电影制片厂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的自杀者的名单里就有梅萍的名字。昨天公安局的人对我说过，明天电影制片厂革委会的代表会来告诉你的。”何安对我说。

“宣布她是为什么要自杀的吗？”

“我出席了那次宣布自杀者名单的大会，通告总是说某某人自杀是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也就是说不了了之。”我说。

“是的，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事实真相，也不会有人敢把真相告诉你。”何安补充说。

我暗暗自语，我一定要寻根究底，这可能需要时间，但不得到梅萍自杀的真相，我决不罢休。当然，我必须谨慎从事，如果那些当权者知道我的意图，就会设法阻止我，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的打算，包括何安。

“你现在上海工作？”我问何安。

“不，是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回来的，他们写了封信给我在贵阳的单位，准了我一个月的假。这是约两个星期之前的事了。开始公安局让我妈妈为你准备些东西，但她一年前有过心脏病发作，去商店排长队她受不了，这样公安局决定让我回来操办这些事。我很快就得返回贵阳，孩子们也离不开我，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何安带着幸福的微笑从皮包里拿出一张全家的合影给我看。

“恭喜了。”我说。

照片上一个漂亮的五岁的女孩，一个可爱的男娃娃，以及她和她的丈夫都对着我微笑着。

“他叫李通，是从北京戏剧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工作的，那时贵阳市文化局一片混乱，一些主要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派’，造反派互相打派仗，争权夺利。分配来的大学生没人知道让做些什么，只是把我们一个个送到农村公社劳动，接受再教育。李通和我很快就成了朋友，在贵阳市郊公社的劳动是很艰苦的，当地都是山脚岭坡的梯田，每天我们都要挑着水扛着肥料，在几百级土台阶上上上下下好几回。农民们对我们也很凶，他们不喜欢我们，他们抱怨我们会吃掉他们原本就很可怜的一点口粮。但他们又不敢不接受我们，因此他们非常不高兴。不管我们怎样拼命地干活，他们总嫌我做得不够。我实在害怕，有时我甚至想我总有一天会累死，再也回不了家了。李通常常来帮助我，保护我免遭一些人的刁难。他是一个编剧，知道很多古老的民间故事，他那幽默而美妙的故事，常常使我留连忘

返。”

我重新注视照片上的李通，一个瘦弱的男子，看来不很强壮也不出众，但他的眼里闪烁着光，总带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照片里何安站在他的边上，一张圆圆的脸，娇小的身材，十足温柔的女性，看起来就好象一个孩子。

“与李通在一起你很幸福？”

“喔，是的，我们在一起很幸福，他照看孩子们，也照看着我。你知道，他正在写一部讽刺文化大革命的戏剧，名字叫‘疯狂’。”

“太好了！但如果稿子落到造反派手里的话就糟了，我想你们住的房子也是政府分配给你们的吧。”我提醒他们他是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李通说他一定要写，除非砍了他的头。不过我们单位的造反派对他很友好，不象会来搜查我们的房间的，李通是他们的笔杆子。这些造反派受教育很少，连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会背诵毛主席语录，但从不谈他的著作。他们要李通帮忙写讲稿，从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中引经据典，让听的人觉得造反派有水平。当他们与其他造反派打派仗时甚至要李通为他们出谋划策。”何安告诉我。

“那末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何安哈哈大笑，几乎说不出话来。“李通说凭他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消灭这些造反派的，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打派仗中去互相残杀。”

我愕然了，无言以对。当了解了李通的家庭背景，我

明白了他的痛苦与他家庭的不幸，他的一个哥哥是个忠诚于共产党的中学教员，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的姐姐自杀身亡，他父亲因为曾是地主，受红卫兵冲击，一次把他装进麻袋，足踢脚踹，心脏病发作而死去。

“我想你们不再去人民公社了吧。”

“是的。在毛主席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时，我们被召回到贵阳，一切突然变了样，造反派对我特别优待，因为我是生在澳大利亚的，他们认为澳大利亚与美国是一回事。”说到这里，何安哈哈大笑。

“每个人都必须紧跟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造反派总是紧跟北京的。美国乒乓球队的访问等于告诉他们中国要跟美国搞好关系了。这样，他们就决定要优待在美国出生的人，有人说，北京政治局里打个呼噜其他地方就刮一阵风。”

“那么现在你们做些什么工作？”

“我在贵阳市歌舞团担任钢琴伴奏。”

何安的妈妈来了，我的老朋友老得我几乎认不出她来。劫难的磨折和深重的失望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她拥抱着我，百感交集。“喔，能见到你太好了，你看上去比我想象的要好些！”

思绪把我带回到澳大利亚悉尼的日子，这是二十六年前了，我们二个幸福的年轻妈妈，肩并肩地散着步。在我们前面二个穿着有花边的裙子的小姑娘奔跑着，举着玩具小桶和铁铲在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沙滩上寻觅着，要建起沙垒的城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就生活在一座用沙垒起的城堡之中，它很快就要崩溃了。何安的父亲在中国驻悉尼总

领事馆工作，我们那时都期待着回到中国。

何安的母亲也想起梅萍，她对我说：“你要坚强些。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我们都无能为力，多想想你今后的生活。不要过分悲伤，这样对你没有好处，一定要想开些。”

接着她给我讲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遭遇。她所受的种种屈辱和迫害。与千百万曾经为旧政权服务过或在外国生活过的人们所经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她告诉我那时她被准许从学校退休，何安的父亲仍在银行工作，因为他们没有被划为资产阶级，仍然可以住在自己的家里，红卫兵几乎把他们的书都烧了，抄走了一切“值钱的东西”。

我谢谢她帮我准备了住所。她说：“有周总理掌权，事情就会越来越好。确实有许多人被释放了。”

“有许多人被关进拘留所了？”我问她。

“喔，是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企业的高层人士都被监禁了。据我们知道的就有香港上海银行的一号人物，我们的邻居有一个亲戚在渣打银行，这两个人就被关在第一看守所，一个去年年底已经释放了，另一个也快了，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在红卫兵抄家时死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吓坏了，从他们公寓六楼跳了下去。”

她说话的时候我正想着她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对你来说最要紧的是治疗，可是现在医院看病的那些医生全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你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大夫，公安局的人告诉我们你患了子宫癌。”

“我不相信患了癌症，”我告诉她，“容易出血的毛病我早就有，大约好多年了。现在并没有怎样坏下去，如果是

癌症的话，我应该感到痛的。”

“这就好了，我也希望不是癌症。但还是需要一个好一点的医生帮你检查一下。”

“这样的医生能找到吗？那位在第二医学院的老大夫郭青医生没有出什么事吧？”

“我知道郭医生病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的折磨太多了，让我想想还能找哪位医生，看来我们也得要走走‘后门’。”

“什么叫后门。”我问她。

“这是走捷径的窍门，也就是说你想看医生或想买些什么你迫切需要的东西，就可以通过朋友或熟人来办，这比从正常的途径办要快得多。”她解释道，“当然走后门的话，就得多花些钱，要给那些办事的人送些礼物，但不要送钱。现在很多情况下要办一件事，这是唯一的一条路。”

“这不是非法的吗？”我问她，“我记得共产党对这种行为是反对的。老百姓也非常害怕这样做，文化革命前，除了享有非常的特权，谁也不敢为自己谋私利。”

“所有的法律，规章制度都被说成是‘走资派’反对人民的工具。再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我想可以这样说，你假如是拿进些什么来就是非法，而贡献出什么来，就是合法。老百姓常常走走后门，看来是拿出去东西，所以每个人都可这么干。”

阿姨进来送些吃的，我到洗澡间去洗手，六年半第一次从镜子里端详着自己。一张毫无血色的脸，瘦削的双颊嵌在干枯的白发中，一双眼睛倒显得特别明亮，这是长期

保持警觉的结果。脸变得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六年半是很长一段时间，经历了这段岁月，我已经老了。我再次端详自己，我多么希望能看到自己丰满的脸颊，看到我的双眼带着静谧和安详环顾这世界，而不是忧虑和恐慌。

何安和她母亲已坐到桌旁，阿姨为我们准备了一顿好饭。有鸡汤，炒肉丝和嫩绿的青菜。煮的米饭软软的，我已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佳肴了。但我一点胃口也没有，牙龈肿痛使我不敢咀嚼。我喝了些鸡汤，胡乱吃了几口饭。”

“看来在找妇科医生之前，我得先找个牙科大夫看看。”我说。

“我陪你去找我表姐，她是第六人民医院的牙科大夫。”何安提议说。

“你最好先跟她联系一下，约个时间。”何安的母亲提醒道。

“是的，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她，然后再告诉你，她怎么安排。”何安对我说。

何安与她母亲走后，我帮阿姨一起收拾碗碟，通过狭窄的楼梯拿到厨房，然后我顺便去看了看阿姨睡的那个小房间，房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和她的一些杂物，没有任何其它家具，窗上也没有窗帘，显然何安没有这么多钱安排二个房间，我从自己房里拿了张椅子放在阿姨的床边。

我叫正在厨房里的阿姨为我烧些热水，我要洗个澡，我已经注意到那澡盆上有一圈黄黄的污渍，但无法搞干净。另外，晚上十分冷，我也没有办法让澡间暖和一些。

在上海要洗个澡是十分麻烦的事。首先为准备足够的

热水阿姨要烧开好几壶水，把热水瓶都灌满，然后再用一个大锅烧热水。在等水洗澡间隙，我发现书桌抽屉里有何安遗留的一些纸和信封，就写了一封短信给梅萍的朋友和老同学，他是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我认为对梅萍的死他最有可能洞悉一些内情，我让他可能的话给我打个电话。

我听到阿姨上楼来了，她端着一大锅开水，步履蹒跚，我赶快拿过从看守所带回来的搪瓷脸盆，让她把锅子放在脸盆里面，免得烫了手，然后我们一人一边把水抬进洗澡间。

再没有看守的催促，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用完了一大锅热水外加六个热水瓶的水。出了洗澡间，我站到阳台上，望着隐在朦胧的路灯光下的街道，才感到自己的存在。

分配给我住的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很大的房地产中的一幢，位于一排排样式一样、同样颜色的房子的尽头。站在阳台上看去是一式同样的房子，房子前花园篱笆外是一条六呎宽的水泥小路，与其它房子隔开，走到阳台一头就可以看见紧邻的花园晾满衣服的竹竿。过去这儿住的大都是上海中产阶级的家庭。从1949年以来，城市人口已经翻了一番还多，政府新盖的房子很少，毛的政策就是重点发展内地城市，而上海是沿海地区。现在这儿每一幢房子都挤着好几户人家，合用一个厨房和洗澡间，共用一条过道。有生以来，我还从未如此生活过，我真担心，有朝一日会有一条过道一直通到我房间的背后。

尽管天还不是很晚，街上已经连个人影都不见。我只感到身心与精神疲乏之极，于是关了门，倒在铺得干干净

净的床上。何安和她的母亲在时，我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似乎有一重负压迫着我的胸口。而现在她们走了，又没有看守在监视着我，阿姨也已经睡着了，多少年来第一次真正属于我自己的瞬间，一阵悲痛袭来，禁不住泪如泉涌。

第二天早晨，有二个电影制片厂的人来找我。他们自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委会的成员，正式通知我，我女儿是在1967年6月16日自杀身亡的。

“公安局通知我们，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你被释放了，我们知道你很快就要进医院，所以就直接到你这儿，正式向你宣布你女儿的死因，这样她的案子也就了结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整个会面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讲，另一个人只是坐在边上。令人奇怪的是他说我是因健康原因被释放的，我不想与他们说清这个问题。因此我只是说：“我想要了解我女儿死亡的详细的情况。”

“她是在1967年6月16日凌晨，从南京路上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大楼的九楼窗口跳楼自尽的。”

“她怎么会上海体育运动委员会大楼上的呢？”

“是造反派把她带去审问的。”

“为什么要审问她呢？”我问他。

“这并不重要。”他避开我的问题，说道。

“这当然很重要，她就是这样被逼死的。”我坚决地说道。

“不，她不是被逼死的，是自杀，完全应由她自己负责。”那个人冷冷地说。“再说你女儿死后很久，1968年

工宣队才进驻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你们进驻前或进驻以后，电影制片厂有没有对她的死作过调查呢？”我问道。虽然对这个人的盛气凌人的态度感到很气愤，我还是很冷静，很注意礼貌。

“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他很不耐烦地回答，“有这么多人自杀，有这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解决，再说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自杀就是企图对抗再教育和改造，是对社会主义犯罪。自杀就是反革命，虽然在他们死后，我们没有这样对他们。”

“你能肯定我的女儿是自杀的吗？”我问道。

“我们接管电影制片厂时，她的名字列在自杀者名单里，你女儿的骨灰现在寄存在火葬场，如果你想取骨灰的话，要先到电影制片厂来开个证明。”

“尸体火化之前，一定要经法医验尸，这不是法律规定的吗？”象这样地谈论我的女儿，简直会使我发疯，但我必须保持镇静，我要追根究底，“我要看法医鉴定报告的副本。”

“你难道不知道你女儿是在怎样的年代自杀的，那时一片混乱，法律、秩序都完全被破坏了。”那人冲着我发火，“在那个年月，每天自杀的人何止成百上千。”

“那你的意思是说，在她火化之前没有进行过验尸？”

“我们也不知道验还是没验，实际上除了知道她是自杀的以外，对她的死，我们了解的情况也很少。”

“我要正式向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委会提出请求，对我女儿的死进行调查。”我对他们两个说。

他们瞪了我一眼，一声不吭，然后起身准备走了。另

一个人从他的皮包里取出一只大信封和几本厚封面的笔记本放在桌上，我还认得这些是梅萍的东西。

那个一直在说话的人说：“信封里有一笔钱，这是电影制片厂支付给死亡职工家属的抚恤金，这几本本子是你女儿的一部分日记。革委会让我们发还给你。”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走出房门，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在电影制片厂听人说，你女儿是一个好同事，好职工，很可惜由于她的家庭出身，她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两个人下楼去了，阿姨跟下去把大门锁上。

我站着凝视着梅萍的几本日记，可我又不敢打开，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会得到莫大的慰藉，但同时，心灵的创伤正在噬咬着我。茫然若失的感觉压抑着我，不敢去读，我思索着电影制片厂派来的人说的那些话，从他不多的话语中，我已明白了一些梅萍的死，我从未如此狠下决心要搞个水落石出，我坚信最终我会了解事情的真相，我拿起刚写好给梅萍同事孔的信让阿姨帮我寄走。

阿姨下楼去拴了前门，我想应该去配把前门的锁，另外房门也要配一把。看来有许多事要做，墙壁要粉刷一下，大门里的砖砾要搬掉，再要买些家具。我担心，我是否还能回我自己的房子去住。政府可能会说，那房子给你一个人住太大了。如果我必须在这儿住一段时间的话，我想还需要在楼下走廊尽头再有一个洗澡间。此外要有一间我自己独用的厨房。这样就可避免住在楼下的人随便上楼来用洗澡间，也可省得阿姨在后楼梯上上下下端食物和

水。为了清静些，避免与楼下的人太多接触，我还得在后楼梯装扇门，砌堵墙将前厅隔成两半。这样我需要材料，需要劳力，还需要一大笔钱，但是我哪儿去弄这么多东西呵！

当我登上楼梯，转个弯就进了我的房间，我发现我前面几幢房子有几个邻居倚在窗台上，透过走道那儿扇没有窗帘的窗户看着我。一到晚上，开着灯，随便什么时候我一走出房门，就象玻璃缸里的金鱼。如果房门洞开的话，那些人倚着窗台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房间，我决定要给这扇窗装上窗帘，这又得化一大笔钱。

我听见有人在敲大门，阿姨不会这么快回来的，我跑到阳台上向下望去，下面有一个穿着工人模样的人，大声叫道：“我是房管局绿化处的，我来跟你谈谈在花园里种树的事。”

我下了楼，给他开了大门。

“你就是新来的房客？”他问我。

“是的。”

他在花园里走了一圈，踢了踢碎砖瓦：“种树前你要把这些垃圾都清理干净，否则周围全是这些东西，树长不活。”

“这是房管所的事情啊！这些垃圾在我搬来之前就有的。”我告诉他。“再说，我也没有能力把这些垃圾都搬走。”

“那我前几天看见的那个年纪轻些的妇女呢？她是你的女儿？”

“不，她不住在这儿，我的女儿已经死了。”我在这儿住多久，就要不断地应付这样的问题。每当我说起这些，我的心一阵紧缩，仿佛看见我美丽的女儿躺在南京路的血泊之中。

尽管我努力保持平静，但泪水止不住流下我的脸颊，我拿出手帕，转脸擦了擦眼睛，我不愿意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面前失去常态。

那人则转脸不看我，耷拉着脑袋，低声说道：“我会报告我们单位，看看能不能派几个年轻人来把这些垃圾运走。”说完就走了。

下午何安来告诉我，她已经与在第六人民医院工作的牙科大夫表姐说好，第二天早晨帮我检查一下牙齿。

“这就是叫‘后门’，我们不用清早就去排队挂号，我把你的名字等都告诉我表姐，她会帮你填病历卡，明天她一上班就把你的病历卡放在上头，就好象你是挂号窗口前第一个病人，这样我们一去就可直接就诊了。”何安告诉我。

“这样做有问题吗？我不想给你表姐惹麻烦。”我不无担忧地说。

“不，没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这样干。每个医生都有一批‘后门’病人，共产党员，政府官员也都带自己的亲戚和朋友‘开后门’。”

看来，在我被关押期间，整个中国发生了变化，这个改变并没有如文化大革命预期的方向来引导我们的民族。第二天早晨当我随何安一起去看她的做牙科大夫的表姐

时，一切正如何安所言。尽管候诊室里挤满了许多病人，连座位也没有，我们照样径直走进她表姐的诊室。另有一些“后门”病人也有其他医生招呼，更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表示异议，其他病人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好象心甘情愿让我们插到他们前面。尽管他们已经等候了好长时间，而我们才刚到。

当我问何安为什么他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处之泰然，何安说：“他们虽然在医院的牙科没有‘后门’，但可能在其他地方有‘后门’，在另外的场合说不定我们得排队等候而他们可享有优先的待遇。”

“那末，一点没有‘后门’的人又怎么办呢？”

“他们该设法去找‘后门’，只要有朋友和亲戚，总可找到‘后门’的。”她告诉我。

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后门”这事物，以后当我教授英文而不要任何报答的时候，也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应用“后门”这一法宝。由于中美恢复邦交和进口了大量英文的科技资料，需要大批英语教师。一批雄心勃勃的青年男女，希望能做一名代表团的翻译，出国访问，以及那些想移居国外的人都想学习英语，要我教英语的书信如潮水般涌来。

当北京决定解冻外汇管制，并鼓励日益枯竭的海外侨汇时，我才省悟，我也需要很大一笔侨汇去购买日常必需品，因为这些东西只有持有侨汇在华侨商店才能买到。为了取暖要买煤、为了修房子需要木料，我才花了我所有的外汇的百分之二十就如愿以偿，因此有一部分没有乱花闲置

了好多年。我有那么一笔归我的钱，就不必为经济担忧，而且能酬谢那些对我“后门”洞开的人。

这都是后话。现在当何安领着我走进她表姐的诊室时，当着这么多候诊室里的人，我实在感到局促不安。

何安的表姐检查了我的牙齿，告诉我，由于长期来不注意，我牙龈发炎已很严重，用一般的治疗已没用了。她说：“虽然你的牙齿还是完好的，但还是要全部拔掉。”

她看了看我虚弱的身子，补充说：“每天来拔牙，你看来不能忍受。同时我给你开个买牛奶的证明，另外能办到的话，每天还要吃几个鸡蛋。等你身体养得好一些了，我可以很快给你拔完。”

我们走出医院后，何安陪我一起去商店买了我需要的钟。商店外面有一个老头坐着一张矮凳，面前是一个磅秤，过路人只要给三分钱就可踏上磅秤给自己称称体重，我也去试了一下。发现连衣服一起才85磅，要比我原先轻了足足30磅。从此以后，我总是定期到这老头的磅秤上来称一称自己，一直到我离开中国。

等我健康状况有了好转，牙科医生就给我每天拔一个到二个牙齿。等全拔完了，医生告诉我，在装假牙前，一定要等牙床恢复，结实一些才可以装全口假牙。这可叫我很失望，因为没有牙齿我说话也说不清，吃东西很困难，除非喝些流汁。当我从镜子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实在很沮丧，我索性戴了个大口罩，在家里也如此。

何安来告诉我，由于我现在已完全好了，能独自去外面走走了，她要回贵阳去和丈夫、孩子团聚。对于她给予

我的帮助我真十分感激，想到她要走了又不免黯然。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孔来看我，我们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对于梅萍的死，他也无法告诉我再多的情况，但他不相信官方的所谓是自杀的说法。

“我与梅萍相交有很长时间，那时我们都才十来岁，她不象会自杀的那种人，究竟把她带到体委大楼去干什么？是谁把她带去的？我敢肯定这不是电影制片厂的造反派，因为他们如要审问她可以在电影制片厂审。”

“会不会因为几年前曾是女子划船队的，所以把她带到那儿去？”我问道。

“不，不会的，上海体育运动委员会已经解散了，这幢大楼是由上海民兵的一个组织接管。我听说在那儿有一个秘密房间，这地方已臭名远扬了。”孔说。

他从椅子上立起身来，一直走进阿姨房间里，想肯定一下她听不到我们的谈话。

当他回来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时，我焦急地问他：“你是说那儿有刑讯室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当我再追问他时，他说：“梅萍不是被带到那儿去的唯一的人，她是在秘密的情况下死的。”

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不仅仅呈现出梅萍躺在南京路上血泊之中，而且见到她瘦弱的身子满是严刑拷打留下的伤痕。一阵痛楚，令我毛骨悚然。

“听到她的死，朋友们都难过极了。”孔说，“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但现在什么也做不成，政治形势还是不明朗。”

“周总理不是已在北京掌权了吗？”我问他。

“林彪死后，周总理的地位是加强了，但是江青及其一伙还在那儿，在没有取得最高权力之前，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林彪自我爆炸前他们甘居麾下，因为在文化革命早期，他们与林彪关系很密切，可是周总理病得很重，一些从北京来参观电影制片厂的人说总理患的是癌症。”

“喔，那太糟了。”我说。

“原来的党中央书记邓小平已恢复名誉，这几天里就要正式公布，他将当总理的副手。周总理可能想让他来接替总理的位置，但是江青一伙想要让他们的人来接周总理的班。”

“毛主席的意思如何呢？最后不是要他来决定的吗？”

“他会下决心的。但是会不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呢？听说他也病得很重。江青想把他与其他领导人隔绝，不让直接接触。这真是一个变革和动乱的年代。我枉为一个演员，我所有的时间都在上政治说教课或是在农村公社度过的，我从没有机会演出，我想我这一辈子完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我还有很多方面不能理解，不久前，何安曾给了我一些红卫兵的刊物读，我觉得很有意思，你也能借些给我看看吗？”我问他。

“我也有一些在家里，我想你会觉得有意思的，因为这些刊物不受检查，揭露了大量党的领导阶层的权力斗争。当然这些红卫兵刊物原先的目的是想揭露‘走资派’，但无意中却揭露了整个党的领导阶层，老百姓中传播的小道消息要比刊物上说的更坏，你不知道，这些红卫兵刊物登的东

西大部分是造反派言过其实的东西。我会挑选一些你感兴趣的给你带来。”

孔告辞了，我送他到楼梯口。天花板上墙粉斑驳掉了下来。“何安怎么不把这地方先粉刷一下？”他问我。

“没有这么多钱，从我的钱里他们只给了她5000元安排一切。”

“你得写份申请要求多发还一点钱，趁现在政策比较松，过几个月情况又会紧张起来。”

“是不是那些掌管着我的钱的官员想利用这个机会叫我屈服，教训教训我呢？”我说，“我宁愿向我的兄弟去借些钱也不愿意去跟那些掌管我们钱的造反派接触。”

“好吧，下星期六我带两个朋友一起来帮你粉刷一下。”孔提议。

“不，不能让你来干这活。”

“我们都是梅萍的朋友，帮这点忙是应该的。”

“那叫我怎么感谢呢？那几位我还不认识呢。”

“说不定那个时候你也会帮他们做些事的。至于我，多少年来我在你家一直受到款待。现在做这么一点事，就算是我的一点报答吧？”

孔和另二个青年，都是梅萍制片厂的，化了整整一天把二个房间、阳台、走廊都粉刷了一遍，他们自己从电影制片厂带来工具和梯子，总共化去了15元钱，买了些涂料。他们告诉我，用公家的工具干私人的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习以为常。孔还为我带来了一叠旧的红卫兵刊物。

何安的母亲给我找了一个女大夫，吴医生。她同意帮

我检查一下身体。何安的母亲告诉我，这个医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受过长期的良好的训练。她已接替我过去认识的郭清医生担任第二医学院妇产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女儿的朋友。每星期四她要给门诊年轻医生去解决一些疑难病例。下个星期四让她替你看一下，我朋友的女儿会请假陪你去医院，把你介绍给吴医生，免得先要通过门诊那些年轻医生诊治。”

“我不能麻烦你朋友女儿为我请一天假去看吴医生。能不能让我自己去找她呢？”

“她很想见见你，我告诉她你在英国大学里呆过。她更热心了，她想等你身体好些后教教她英语。”

我明白我已一步步地陷入了“后门”这个网中，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想通过正常途径，那末我不仅需要从清晨起就到医院门外去排队，而且也看不到象吴医生那样年资高些的医生。星期四，我去见了吴医生，她告诉我根本不是癌症，我只是患了“内分泌失调”，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紧张和不正常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她婉转地提示是监禁生活的缘故。她建议我作子宫切除，这样要比长期治疗要好。如长期住院，说不定政治运动再来，医院工作一打乱，治疗也就受到干扰。我心里很明白，就象孔一样，她也预计到会有更多的政治斗争，现在比较安定的形势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一周以后，手术进行得很成功，我在医院要住三个星期，病房拥挤不堪，一共有二十五个病人，有些是患癌症。床之间仅隔一步之遥，她们日益瘦弱的身躯和痛苦的呻吟

使我压抑，仿佛在看看守所看见和听见的，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的时候，一刹那间我以为我又回到了监狱医院去了。

在住院期间，我收到了中国银行的通知书，所有的外汇帐户都解冻了。经济上重新松动使我感到分外独立，我给何安和他的丈夫送去了迟到的结婚礼物，并邀请他们和孩子到上海来过春节。

回家后我又找过牙科大夫装了假牙。口里多了副假牙，实在感到不舒服；令人不能忍受，真想把假牙扔掉。我觉得好象有二块木板夹在我嘴里，都快要噎死了。牙科大夫告诉我晚上把假牙取出来，让牙龈松弛一下，但我决心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戴着，我想快些适应，缩短这难受的时间，晚上因不舒服不能入睡时我就服安眠药。

那时我已有足够的钱，就着手开始改善房子的环境。我在后楼梯下安了扇门，把洗澡间的设备拆装到楼下的贮藏间。走廊尽头的原先洗澡间里，我重新安了管道，接了煤气灶。房管所的三个工人来帮我装修，自然我也付给他们钱，那些管子以及装楼梯下的门和铺洗澡间用的瓷砖，都是靠孔和他的朋友们帮忙搞来的，这一切又都得“走后门”。

那些工人是房管所的正式工人，有固定的工资，为我干活没有额外的收入。这样，这些工人干活一般都是吊儿郎当偷工减料，磨磨洋工，但如果给他们钱的话是犯法的。要使他们卖力干活的有效办法，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要给点“刺激”，就是说要塞些高级香烟，精心烧好菜好饭招待，外加葡萄酒、啤酒。孔、阿姨，还有他们一批朋友

帮我到处排长队，或“开后门”采购这些东西。等一完工，我给这三个年青人每人送了一份礼物。我对他们说，我很想砌一堵墙把大厅隔开，可是我没有办法弄到砖块，他们也没有“后门”能弄到砖，但答应只要我能搞到砖，他们三人就用业余时间来帮我砌墙。

一天下午我正在房里缝制阿姨房间的窗帘，三个居民委员会的大姐来找我。

“我们是这个地区居民委员会的，我叫卢英，是管你们这一组的。”一个大姐作了自我介绍，她又指着一个胖敦敦的妇女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支部书记。”

第三个妇女说：“我是她的助手。”

我连忙站起来表示欢迎，请她们坐下，阿姨端上茶水。

每个街道都有居民委员会，它实际上从属派出所，受其指导，居民委员会直接与居民打交道，有什么情况就报告派出所。这个组织的职责就是组织每周一次的居民政治学习，管理幼托机构，分发票证，分配生孩子的限额和调解邻里之间的纠纷。有时居民委员会的干部甚至要协助派出所对付犯罪、抓获罪犯，因为对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底细他们最了解。

居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干部是领取退休金的退休工人，在居委会的工作一般是没有报酬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退休金很低，才有些额外补贴。这些大姐（有少数男人）对居民有很大权力，对每个人作出鉴定写入保存在派出所的档案内。事实上居民委员会组织使得派出所可留在幕后，对全体公民进行严密的监视。

我们都坐下后，支部书记憨然微笑着对我说：“听说你搬到我们地区住，我们来看望你，我们也想请你参加学习小组的会议，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下午。”

“谢谢你们，有劳来看我，应该我到你们那边去报到的，但我一直在忙着看病治疗，安排生活。”我客气地说。

“你的病好些没有？是什么病……”那位书记支吾着没说下去。

“并不严重，手术还是很顺利的。”我说。

“你不是患的癌症？”那位副书记还不够老练。

“喔，不，没有这么严重。”我说得很快，我相信可能早就有人，可能是警察，与看守所联系过，也听说我患的是癌症。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很惊奇，但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似乎很坦然。

“你能不能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会，一星期二个下午。”卢英问道。

“我很高兴参加，但我能请二个月的假吗？这样我能从手术后恢复过来，医生很强调这点，下午我必需休息，直到我完全康复。”

那位书记站起身，走到阳台上，她惊呼起来：“多宽敞的阳台呵。”她看了看洗澡间又惊呼道：“你自己的洗澡间？”她甚至打开碗橱门，朝里张望，又惊呼起来：“多大的碗橱呵！”随后她又坐下，对我说：“这么大两间房间你一个人住！这是对你特别的优待。”她认真地看着我，似乎

征求我的同意。

“一般来说，一个单身的女人得不到这么大的地方的。”她的副手补充说。

她未能很好地说服我参加学习小组的洗脑会议，因为他们声称是自愿参加的，尽管她很不高兴我向她请求给我几个月的假期。这些党的干部要人们顺从他们的意愿，否则就象犯弥天大罪似的，他们对这样的做法已习以为常。

“我很感谢政府所作的一切，我想请你们向有关当局转达我的谢意。”我说。

那位党支部书记和她的助手都赞许地点着头，很赞赏我的话。

“当然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能住回我自己的房子里去，你知道政府有关私房的政策吗？”我想我最好还是提醒她一下，由于政府占用了我的房子，而给了我这么小的房间是完全不相称的。

一丝笑意从她脸上消失了，她很不自然地说：“我怕对这个问题不够清楚。”

卢英说：“你一定要快些好起来，参加我们学习小组的活动，以提高你的社会主义觉悟，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分子来说更需要学习，我就住在这地段，离开你这儿才三幢房子，我会经常来看你身体情况的。”

“那就太好了。”我客气地说。

“我只有一间房间，和我儿子、女儿一起住，我们这

幢房子里还住着另外三家。”卢英告诉我她家的居住情况，想更生动地说明，政府对我是相当特殊的了。从她说话时的腔调和脸上的表情我体会她对我一个人住这么大地方并不十分满意。她是我们这地段的头头，我还要常常应付应付她的，但愿她不要找我岔子。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根据党给予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待遇，而形成不同的层次。文化革命前我未和群众打成一片。老赵代表了这幢房子与居委会的大姐们打交道。象我这样的公民是由上海党的书记处的统战部门来管的，对我非常客气，对我以及象我这样的人以特殊的待遇有助于在外部世界眼中塑造人民政府宽厚待人的形象，因为经常有国外来宾来看望我们。但文化革命改变了这一切，现在我也成了群众的一分子，从第一看守所被释放，到我最终离开上海这段时间的生活使我有机会深刻了解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遭遇。

我的客人们站起来准备告辞了，但支部书记还有最后几句话要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会有助你端正态度，正确对待你所经历的一切。”

我没再说什么，在这儿我还能说些什么？难道让我说我很喜欢看守所的生活。她会相信吗？她看来是想等待我的回答，当我继续保持沉默时，副书记看了看卢英，卢英说：“喔，对了，我还给你带来布票，棉花票，线票和香烟票。油票、肉票和豆制品票我前几天已经给你阿姨了。”我谢谢她们，目送她们朝门口走去。按理我要送到大门口的，但她们一定不肯，要我留在房间里，叫阿姨送送她们，

锁上大门。我想可能她们有什么话私下对阿姨说，我不便坚持送她们下楼。

我把茶杯送回厨房后，就回到房间继续做我的针线活。

阿姨回来了，她问我：“你已经把茶杯送回厨房了？”

“是的，但还没有洗过，我想快些把窗帘缝好，赶在黄昏前，可以挂到窗上了。”我告诉她。

阿姨在空中挥了挥她的双臂，不无感叹道：“你一点也不象他们说的那样。”

我不知道这个“他们”指的是谁，但猜想不是派出所的警察，就是居民委员会的什么人，我想最好对此保持沉默，一笑了之。

“你真是个好人的，刚从看守所这种可怕的地方回来，身体又这样差，你就帮我端热水。你看我房里没有椅子，就端了一张给我用。你化了这么多钱，设法把厨房挪到楼上，免得我上上下下，来回奔波，你取回外汇存款，就马上给我加了工资，现在又忙着给我做窗帘，你的心地太好了。”

“谢谢你，阿姨，我想我也没有为你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你可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不想看你倒下去，你觉得文化大革命如何？”她问道。

我相信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居民委员会的大姐让她来探问的，大姐们则又是派出所要她们报告我的举动。

“喔，从我个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不幸，因为

我去蹲监狱，我女儿死了，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当然这场革命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我打着官腔，我知道居民委员会的大姐们就是喜欢听这些。

她拍起手来，感叹道：“太好了！你真开通！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告诉支部书记呢？她一定会为你如此开通的表现把你想得好些。”

“她们并没有问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说。

“你忘了，支部书记不是要你端正态度吗，明天早晨小菜场看见她，我会告诉她你说的这些话，她每天早晨要给她孙女送牛奶。”阿姨告诉我，随后就去厨房准备晚饭。

阿姨头脑单纯，她无意之中等于告诉我，她是在什么地方向支部书记汇报我的情况，看来我虽然从看守所释放，但还受着监视。只要我还在上海生活，就不能放松警惕。

晚上，当我独自一人安坐在我的房间里时，第一次萌发了这样的念头：我必须离开中国。只有避开这充满政治斗争和时刻叫人提心吊胆的氛围，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我女儿已经死了，上海已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虽然那时想要离开中国的想法显得多么不切实际和不可能，我知道我还得忍受一切，为实现计划而作努力。

大概是上帝让我睁开双眼，望见那遥远的地平线上处处是青山。

第十四章 水落石出

我经常作恶梦，梦见我女儿受尽酷刑，横遭鞭笞奄奄一息惨死在血迹斑斑的暗室。我的心不禁颤抖，仿佛在黑暗之中，眼前一派可怖的景象。我决心要去一趟南京路，仔细去看看上海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大楼，我深信还有精力，我最终必须迈出这痛苦的一步，亲自去看看这个地方，梅萍就是在那儿死去的。可能的话我还要作一番调查，我不能把我的打算告诉阿姨，因为她可能会去报告居委会的大姐们，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我通常出去散步的时候改为坐汽车去南京路，这样我开始逐步拉长我散步的时间，渐渐地我一出去就是二个多小时。

“这些日子你散步的时间好长啊！你真的变得强壮了，气色也好多了。来，坐下我给你泡杯茶。”我回家时，阿姨迎着我大声说着。

当每天长时间的散步已变成常规后，阿姨对我一直不在家已习以为常，我想，实行计划的时机到了。

南京路是横贯上海的一条主要街道，起于江边的市中心，一直到城西近郊。1949年5月共产党部队接管这个

城市之前，上海体育运动委员会大楼是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总部，位于南京路中段，面对人民公园即过去的跑马厅，从我住处坐公共汽车到那要半个小时。上海的公共汽车总是挤得满满的，我没法再往里挤，就站在门边，身子都快要压扁了，紧挨着我的一个女人正好抵住我的胸口。她一定能感到我心脏怦怦的跳动。我十分紧张，害怕我会被人认出来，我的理智在促使着我必须去，但我的感情却催促着我回去。汽车到站了我却犹豫了。许多人在这站下车，蜂拥而下的乘客把我也推下了车，我发觉已站在人行道上。

我独自一人走着，在混杂的人群中，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满是人群的街道的另一边的楼房。毗邻体委大楼的是国际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这两幢建筑都建于30年代，至今还是上海的标志。这些建筑都被红色大字横幅覆盖了，上面写着文化大革命的口号“政治挂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等等。在秋风中飘动。屋顶上霓虹灯光拼出一条醒目的口号“将革命进行到底”。周围的人群见我抬头四处张望的神情就象是从外地来的，对上海这个都市感到万分新奇。没有人特别注意我。我用眼光搜寻着体委大楼的每一层，每一个窗口，我的脚步踌躇不前，密集的人流粗暴地推拥着我。

在人民公园门口，男男女女带着他们的孩子排着队购买公园门票。有些人在等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我站在他们中间，眺望着马路对面的大楼，我数到第八层，没有第九层，只有微微倾斜的屋顶，为了避免太引人注目，我慢慢地踱来踱去，仿佛在等什么人，已有点不耐烦。我继续眺

望着，我完全看不到有第九层的窗口，据说梅萍就是从那儿跳楼的，我全神贯注于我的发现，思索内在的含义，一边在人民公园前徘徊。我兜了一圈，转弯时见到体委大楼侧面有九层楼和一些窗户。这些窗口根本不朝向南京路，下面有几幢低矮的二层楼房，窗口很窄，并钉着好多铁栅栏，铁条条间的空隙是否能容一个人挤过，我站在街上看去也不得而知。

我自己现在看到的与人家告诉我的完全不一样，我需要时间仔细回想一番，于是我买了张公园门票，走进公园，在公园河边有一个安静的角落，能看到马路对面那幢大楼的屋顶。我注视着这些狭小的带着铁栅栏的窗口，我女儿之死的真相究竟如何？我敢肯定，实际的情况要比他们告诉我的复杂。阳光令人感到温暖，微风轻拂着秋叶发出沙沙响，我能听到街上嘈杂的车辆鸣叫，人声鼎沸，但沉浸在哀伤中的我，感到异常孤独，就好象独自一人在与世隔绝的荒岛上。

我能穿过街道，敲开体委大楼的大门，去探询一切吗？我喃喃自语，不敢肯定。一个小女孩踏着辆小三轮车从小路那边拐过来进入我的眼帘，她的母亲尾随其后。小女孩踏得太快，母亲就叫着“慢些！当心！”但这孩子仍踏得飞快，一双黑色的眼睛调皮地回头看她母亲。她们从我面前经过，消失在灌木丛后。

我离开公园走向公共汽车站时，只觉得街上每一个年青的妇女和每一个小姑娘都好象是我的女儿梅萍，我的心一阵紧缩，只感到无比的凄凉和无助，比之我在监狱中所

感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辆汽车疾驶而过没有停站，我驱使着自己，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站在体委大楼旁的小巷的弄口。我见到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矮凳上织毛线。

“你是住这儿的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仍织着毛衣，有几个人从这小巷子走过但没有人朝我们这儿看一眼。那房子紧靠着体委大楼的墙，倚墙而筑占了这小巷一半的空间。

“你在找什么人吧？”那姑娘抬眼看了看我并问道。

“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撒了个谎，“据说在1967年有一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年青女演员从这幢楼房的窗口跳下自杀，你知道这件事吗？”我指了指她身后的体委大楼的楼房。

她抬头望了望，摇了摇头说，“不是1967年，是文化革命开始的那年，不是吗？以后这幢大楼就整修了，周围都搭了脚手架，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我们才搬到这儿来的，工人们在这个巷子里干活但没有干完就扔下走了！”

“我一定是记错了。”我说完就匆匆离去，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并非象人们所说，我的女儿是不可能这样自杀的。

我顺着反方向在南京路上走着，我发觉越走离家越远了，一辆公共汽车驶来，我赶忙上了车。经过一路颠簸，重又回到我住的街道。当我打开前门看见有两辆自行车停在花园里，楼下房间里传来阵阵嘈杂声。

在门廊处遇见阿姨，带来一个消息，说是楼下空房已

分给一家姓周的人家，阿姨一五一十告诉我周家的事。但我没有听她说，我还全神贯注于我在南京路上的所见所闻。

我女儿的死还是一个谜，我并不比过去更接近事实，但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我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拷问，是死在他们手里的。假如她不是自杀而是给谋杀的，那末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找到凶手，看着他受到惩处。在中国对于谋杀罪将处以死刑。在我的脑海里，原先的情景：梅萍躺在南京路上，在六月夏天的清晨，惨淡黎明的微曦之中，在这条繁华的路上唯一的片刻凄凉之中，现在已消失了。但是在梦中，我总是独自一人，看到她毫无血色的脸和枯槁的形容，听到她凄惨的哀号和呻吟。我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仇雪恨。

几天之后，周家搬进来了，当我正在踌躇着是否要下楼去会会他们说几句友好的表示欢迎的话，周太太已上楼来看我了。她是一个与我差不多年龄的女性，一头染过的黑发，仔细抹了发油，插了把仿玳瑁梳子，嘴里叼着一支香烟，我请她坐下，阿姨给她端来一杯茶，外加一个茶杯托权充烟灰缸。

“我女儿燕与你女儿梅萍是在一个学校的，”她非常友好地说，“她们是好朋友。”

“你女儿也在上海与你们一起生活？”

“燕是我的大女儿，她在北京解放军歌舞团。因为我丈夫是资本家，红卫兵强占我们的房子，我们被扫地出门住到汽车间。你能想象吗？我们一家七口都挤在汽车间里，

打水，上厕所都要走二百多公尺路，红卫兵要我扫弄堂，我丈夫也不知道给批斗拷打了多少次。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资产阶级家庭，我们并不是很有钱，解放那年我丈夫只是开了井雪花膏厂，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她显得很激动，不停地吮吸着烟。

“大概因为你女儿在部队工作，你们才能幸免于难，你们家算是‘光荣之家’吗？”我问她。有儿子或女儿在部队里的家庭，就称作“光荣之家”，就可享受党给予的特殊的优惠。

“红卫兵可不管这一套，但现在又得到承认了，我们的情况好些了，这儿几间房间就分给我们住。”

“希望你们在这儿过得愉快。”我客气地说。

她拍了拍我的手说：“我光顾着说我自己了，你经历过的日子比我还苦，你被关进看守所，你美丽的女儿没了，当我听说梅萍自杀的消息，就写信告诉在北京的燕，我们都很悲痛。”

我不愿意跟她谈起梅萍，至于我究竟发生了什么，是无须多解释的，我无言以对。

她笑了笑，将烟在茶托里掐灭了，又另外点了一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喷云吐雾，接着说：“我上来想跟你商量一下关于电费的事，我喜欢什么事都事先讲清楚，这样比较好。你说呢？免得产生误会，我女婿是个电工，他见这幢房子只有一个电表，我想这幢房子你住一半，我住一半，电费我们就对半开，不知你同意吗？”

还没等我回答，阿姨走了进来，大概她在走廊里听见

了我们的谈话。她说：“喔，周师母这不合适，应该按照每家用电的人数来分摊电费，你们有七口人，我们才二人，应该把电费折成九份你们付七成，我们付两成。”

“不，虽说我们有七个人，但我们的地方才这么点大，电费应对半付。”周太太对阿姨很不满。

“你们人多，要用的电灯也就多，对半摊不太合适。”阿姨据理力争。

我决定暂不表态：“我们去问问人家是怎么摊的，我去找卢英，她是我们这一块的领导，她也与其他人家合住一幢房子，我们可以去问问她。”

“不会有什么满意的答复的。除了你，其他人分配居住的面积都差不多，你住得比别人要宽敞。象这样二间房间分配给其他家庭总要住六、七口人。”周太太有点激动地说。

她把烟头扔在茶托里，站了起来：“我让我丈夫来跟你谈。”她离开房间，边嘟哝着下楼去了，也不等我开口是否愿意见她的丈夫。

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如此着急地谈电费事，我在这儿住了已几个月，每个月电费从不超过几元钱。

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一会儿门又被推开了，周先生走了进来，他看去是一个浮华的男子，才发胖，有一张毫无生气的脸，几乎是同时，阿姨也回到房里来，站在我身边保护着我。

“听我妻子说你不想负担你该付的电费部分，是吗？”周先生毫不客气地问道。

他连门都不敲就粗鲁无礼地走进我的房间，我也就没有站起来表示欢迎，仍坐在书桌边。

“以后，谁如果想见我的话，应该先敲下门，不能连门也不敲就闯进来，一个自重的人举止应该文明。”我告诫他。

他胀红了脸，看去一脸的不高兴：“你想谈谈怎样来摊派电费吗？”他问道。

我肯定地说：“不，对谈论付电费的事我实在厌倦了，下个月我将付一半电费，以后什么时候我另装一个电表，就不会有什么争执，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会如此担忧。”

他不请自便地坐到椅子上，脱口而出：“你还不明白，什么叫担忧，都是因为钱啊！红卫兵把我银行里的存款都冻结了，我又不工作，我和我妻子，一个月只有12元生活费，（按当时汇率折合3英镑）我孩子中一个还没有工作，另一个一个月只有40元，我们还要抚养孙子，他父母在东北，那里吃的东西很缺，我们还要给他们寄食品。”

我站起身，暗示谈话该结束了，我说：“真对不起，考虑到你们的困难，以后我负担一半电费吧！”

周先生一脸苦相，喃喃说道：“我不是来乞求施舍的。”就离开了房间。

等到周先生佝偻的身影离开了房间，我很为周先生一家感到遗憾，贫穷竟使世风如此每况愈下。

第二天，我向房管所申请允许买个电表，但我的申请

犹如石沉大海，每当我去询问这事就被告知正考虑我的申请。

一天，一个帮我迁装洗澡间的工人遇见我，他说：“你就别想得太好了。想要装电表的话最好是去走‘后门’。”

几天之后，我外出时，周太太那个做电工的女婿招呼我，他好象是在花园里专等着我。他说可以通过“后门”帮我搞一只电表，但开价却是市场价的好几倍，我们作了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市场价的二倍成交了。

“你卖给我的电表是你工作单位的存货吗？”我直接了当地问他。因为我敢肯定这电表是他从单位里偷来的，在共产党的国营企业里，由于党的官员们疏于管理，偷窃属于政府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收入少得可怜的工人认为对于他们的低收入来说这是额外的补偿。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了公开的秘密，工人们戏称这是“共产主义”，翻译成中文来说就是“均田均产”。

“你干吗要知道这电表是从哪儿来的呢？你不是想买一个电表吗？”这个年青人毫不客气地说。

我有些犹豫，万一买的真是一件赃物。

“我会帮你装好的。”他说。

“装电表你要我付多少钱？”我问他。

“我确实想为你免费安装，因为你对我们太好了，但是我从政府那儿拿到的钱太少了，我需要挣些外快。你看六元钱不算多吧？”他问我。

我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个实在不讨人喜欢的人，他看上

去很聪明，尽管营养不良和一副病态，我相信，他只是象我们这一类人中的一个受害者，如换一个环境，能有机会获得正当的生活，他会成为一个懂得自重的年青人的。

他期望着我，我说：“好吧，就六元。”

阿姨看不惯周家的一切，对我对周家的态度，她认为是软弱，感到很生气。她预言周家这些人今后会得寸进尺，她声称：“你对他们这种人还不了解。”

周太太的孙子是个顽皮的孩子，才六岁，还没进小学。他非常捣蛋，没有规矩，每天好几次跑上楼来，蹦蹦跳跳地进我的房间。特别是我不在的时候，他打开我的抽屉，随心所欲。有时我散步后回家，发现他用我的笔在桌子上胡乱涂画。有时他带个皮球，对着我房间干干净净的墙壁踢。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奔进奔出发泄他多余的精力，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象在打仗。当阿姨烧饭的时候，他就自说自话地拿东西吃，如果阿姨在桌上放了一点零钱的话，只要这孩子曾在房里，可以肯定钱就会没了。我好几次跟周太太谈到这些，她总是说：“我告诉他不要上楼来，但是我实在很难管得住他，我有很多家务活要干，还要烧饭。”

一天早晨，我打开房门，突然发现楼梯脚有谁在打呼，往下一看，只见周太太那个待业的儿子正从床上爬起来。晚上，趁我睡着的时候，周家已经抢占了前厅，变成了卧室。床靠着他们一边的墙，在我这一边是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对着我的门只留了一条过道。宽不过一英尺，甚至在楼梯最后几级处放了几只箱子。我叫阿姨去看

看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要下去同周太太大闹一场，我制止了她。

早饭以后，我到房管所办公室去。

“我是太原路1号的居民。”我告诉那位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

“我知道，我认识你。”他说。

“我很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想问一下，房管所分配给我住的地方究竟多大？”

“楼上的房间都归你住。”他说。

“楼下前厅呢？”

“楼下前厅和花园一家一半，你的房租够付半个花园和前厅。”

我谢谢他告诉我这些情况，就回到家里，周太太正在平台晾她洗好的衣物，我对她说：“我看到你的儿子现在睡在前厅里。”

“是的，是不在房间里。”她不在意地回答，仍晾着衣服。

“我刚去了房管所办公室，证实了这前厅的地方一半归你们，另一半归我，请你告诉你儿子把他的东西挪到你们那一边，不要挡了楼梯口。”

“他留了让你上下楼梯的地方，你只是个瘦瘦的人，上下楼还要多大地方？”她很不高兴。

“问题不是我需要多大的地方，而是多大的地方属于我的。请你告诉他把东西从前厅我这一半地方搬走。”我说得很坚决，边走进前厅。

“我们有七个人，我女儿要来探望我们，房里我们再也没有地方安一张床。”周太太说。

阿姨站在阳台上听我们的谈话，我走进房间时，她悄悄地对我说：“我们应该砌堵墙，否则是没有办法防止他们强占你的地方。”

“但我们到哪儿去买砖头呢？”我说。

“你是不是能准我几天假，让我回苏州老家一趟，看看是否有人要出售旧砖。”

“当然可以，你可以回老家去看看。”我很高兴阿姨会提出回家去几天。虽然她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但她难得到其他地方去。

阿姨走后，早晨我早早起身，提着个菜篮去菜场，虽说才只有五点钟，天还很暗，去菜场的路上已是人头济济，人人都紧裹着外套涌到菜摊前。到处都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从老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嘈杂的人声。

由于我和阿姨已经把分配给我们的一小份肉和蛋都吃光了，我希望能买到个鸡，因为鸡是不定量的，可以做个汤吃，另外我还要弄些蔬菜，我每月定量配给的豆制品，豆制品票过期就作废。我还要去取牛奶。由于鸡比蔬菜更少，我首先去鸡摊排队，这儿已经排着长队，除了排队的人外，还有许许多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象破盒子、旧帽子、小凳子和洋铁皮罐头，跟买菜的人一样排成一条队。队伍朝前移动几步，边上的妇女也把这些破烂玩意儿朝前挪几步，就好象它们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从我周围妇女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在队伍里放一样东西，就占了一个位子，如有了朋

友或熟人就可以排进来，这样做一个人同时就可以占二、三个位子，实际上就好象“后门”一样，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办法。我在你排的队伍里占一个位子，你也在我排的队伍里占一个位子。当摊前开始称东西时，那些人就会跑去告诉在排另外一个队的朋友，让他赶快来抢购。那朋友就赶快在第二个队伍里放个什么东西占好位置，然后插到第一个队伍里抢购。大家对这种事都默认了，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东西成了一种叫人精疲力竭的要严密计划的行动。

等轮到我，已经排了几乎一个小时的队，鸡篓子里只剩下五只鸡。

“你的菜卡呢？”营业员问我。

“鸡也要定量了？”我感到惊奇。

“快点，快点，其他人都等着，把你的菜卡给他看一下。”是排在我后面的那个女人的声音，有点不耐烦，我被推搡着往前。

我赶快从钱包里拿出菜卡给那个营业员看。

“怎么？你一家就二个人？你只能买一只二斤重的鸡，现在我这儿剩下的都是大鸡，明日请早吧！小一点的鸡卖起来很快的。”那营业员已经去招呼排在我后面的女人了，“把菜卡拿出来！”

我只好走了，决定去排队买蔬菜。鸡虽没买到，但我也没有感到什么遗憾。因为我实在站队站得太累了，对周围的女人的尖叫声也实在厌倦了。如果买到鸡的话还得加入另一个长队等着杀鸡和清洗内脏。我想，看来就是再美

味的鸡汤也不值得我花这么大的精力。

当我顺着人流向蔬菜摊走去时，听到我背后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叫着“太太，太太”。这称呼是在高级阶层中下人对女性主人的称呼。我确实很奇怪，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肆宣传后，还能听到这样的称呼，也很奇怪谁会是这个“太太”。那声音似乎一直在我身后，不一会，我过去的一位老花匠站到我的身边，他两眼含着泪花，声音都变了，说道：“你还活着，你还活着！你看上去还不错，可是梅萍……”

有人好奇地看着我们，有几个还停下来听我们的谈话，我赶快把我的地址给了老花匠并让他早晨晚些时候来看我。

我对买吃的已毫无兴趣，买了个面包和一听果酱以及一些酱菜。我想这些东西够我混一天了。这样我取了一瓶牛奶后就回家等候我的那位老园丁。

见到这位老人使我多么高兴，从我被释放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寻找他，我这儿还有他的钱，在我被送进看守所时，我袋里正装着他的养老金。

他同样也非常高兴能见到我。我亲自把他迎进我的房间，他穿了一身新衣服，满脸微笑。

“在菜场遇见你真叫我高兴，这些年了我还该付给你养老金。”我告诉他。

“喔，梅萍早就把这些钱给我了，她来看过我，在你进去之后。”他实在不忍说出“监狱”这个字。

梅萍的工资很小，我知道红卫兵在她的储蓄户头下只

留了很少的钱，不会超过几百元。她一定是把她手头的钱都给了这位花匠，对她的所为我感到自豪。

“对梅萍的死你知道些什么吗？”我问这个老人。

“我听说她是自杀的，除了给我送钱来的日子，我从未见到她。”那老人低沉着头，“但老赵看见过她，我曾在路上遇到老赵，他告诉我他常常能见到梅萍。”

“你能为我找一下老赵并告诉他来看我吗？”

“行！我还能找到那个厨师，他们听到你还活着并且过得不错会很高兴的。”

“你知道老赵和那位厨师还在工作吗？”

“是的，他们两个都还在干活，我知道厨师在一家工厂，老赵在一所学校当看门人，你知道红卫兵拷打他，把他一只胳膊都打断了，打得很惨，留下终身残疾。”我那老花匠说。

我很吃惊，替老赵难过。我问花匠他自己是否还在工作。

“我已经失业好几年了，种花被认为不算反革命，也该算是坏事，不过现在看来世道有些变了。我现在有时还能有些活干干，甚至区公安局也找我给他们种些花，大概一切都会变好的，你说呢？”这个老人被颠倒过去的一切搞得迷惑了，已不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不敢断定是否还能让他来我的花园做些什么。尽管房管所园林队在这花园里栽了树，但还是显得荒芜空荡，他似乎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说道：“从现在起，我常来帮你收拾花园，怎么样？这里除了几棵树什么都没有，那

篱笆也该修剪一下。”

“那就太好了！你能搞到花秧吗？种一片草地行不行？”我满怀希望地问他。

“我怕种草不大可能，我在家里用盆子养了不少花，你知道我不种点东西，手就发痒。红卫兵到处横行的那年头，我把养花的盆子都藏在床底下。”他呵呵地笑出声来。

当我陪他下楼去花园时，周太太也在那儿，我把花匠介绍给她并告诉她打算在这儿种一些花。

“只能种在你那一边，我们这一边不要花，你不知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反对种花的？”

周太太根本不知道形势已经变了，但我也多想多事来说服她，因为形势是很容易再变回去的，我只是问她：“那么，你那边的篱笆是不是要修剪一下呢？”

“我可付不起花匠的工钱，我没有外汇，也没有海外关系，我们没有多余钱请花匠。”

二天后，阿姨回来了，带了只篮子，装了一条大鱼，一只肥鸡和一些鸡蛋，都是她在苏州“走后门”弄来的，照她的习惯，喜欢从后门进屋。周太太正在厨房，看见阿姨和篮子。

“你在苏州黑市上买了些什么？”周太太问阿姨。

“谁说我在黑市上买东西？这是我男人和儿子送的，这不管你什么事。”阿姨很讨厌有人用这种胡说八道来迎接她。

我听见阿姨的声音，走出房门去迎她，阿姨走进厨房

并对我说：“那个女人真是讨厌，在菜场你能弄到这些东西？你能买到蔬菜？”把篮子放到厨房桌上，阿姨去洗澡间了，我从篮里拿出鸡蛋，考虑是不是拿些下去送周太太，在黑市上买东西是违法的，但实际上政府早就对这种行为放任不管了，因为干部们知道没有办法能制止。

我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卢英出现在楼梯口，我过去迎接她。

“已经好长时间没来这儿了，你身体一定好了能参加我们学习小组会议吧！”她一边在房里一张椅子上坐下，一边说道。

“很感谢你这么关心我，我一天比一天好了。”

“很多人都希望你来参加学习的。他们见你出门，散步都走得很快，知道你好多了。”

“是的，现在我身体确实好多了。”

“我们现在在批判林彪，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妄图暗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你最好下星期就来参加学习。”她带着权威的口吻肯定地说。

“好吧，下星期我一定来。”我妥协了，因为我不能再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我只好如此。

当阿姨从洗澡间出来后，卢英对她说：“我听说你回去过。”

“我去了几天，回家去看看家里的老人。”阿姨说道。

“你在黑市上买东西了？”卢英问道。

“当然没有！苏州也有居民委员会，我带回的一些东

西都是我家里送的，我有几个亲戚在农村，他们抓了只鸡，在河塘打了几条鱼。这些东西是他们送给我男人的。”

“你知道在黑市上买东西是犯法的，任何人看到这种行为都有责任向我们报告，当然了，你确实没有在黑市上买东西就好。”卢英对阿姨很无礼，因为她无法证明阿姨确实是在黑市上买这些东西使她丢了脸，为此她很生气。

阿姨走了出去，卢英转身对我说：“顺便说一声，我听到这儿周围很多邻居议论你的穿着，他们说你对穿着太讲究了，你的衣服不仅都很贵，而且全是新的。”

“实在说，我并不喜欢穿新衣服，如能把我的旧衣服还给我，我就太高兴了。但很遗憾，我不知道如何能得到它们。红卫兵抄家时，把我们的衣服都抄走了，大概你能帮我找回这些衣服吧？”我对卢英说。

她显然感到难堪，因为她已忘了红卫兵把我的衣服都拿走了，但她并不打算勾消对我的批评：“以后你买衣服，应买些用海军蓝卡其布做的就跟大家一样，这样你才象我们中的一份子，不要显得与众不同，总穿那种灰色的毛料衣服。”

卢英走后，阿姨和我都认为一定是周太太向居委会报告阿姨的事，多半对我的衣服有风言风语的也是她。

我问阿姨砖头的事怎么样了？

“我家老头子会慢慢设法搞的，等凑齐了会告诉我们的。”

下个星期天，老赵和厨师两个来看我，询问了他们的

工作和家里的情况之后，我有点迫不及待想探询梅萍的事。

老赵说：“你被造反派抓走之后不久，他们给梅萍一间房间住，这幢房子是同济大学陈教授的，那位教授已被红卫兵通令和全家搬到顶楼去住。房子余下的房间都分配给其它家庭，梅萍也分到一间。每隔十天左右我就去看她一次，她过得很好，只是一直挂念着你，陈师母告诉我，梅萍是半夜里被一群造反派绑架走的，陈师母认为这些造反派不象是电影制片厂的，她说她下楼来听见梅萍拒绝跟他们走，但最后这帮人逼着梅萍走了。”

“跟梅萍住在同一层的其他人怎么样？”我问老赵。

“我也试探过，但没有一个人肯说一星半点的，看来他们都有些怕。”

我问了老赵这幢房子的地点，他写下来但告诫说：“你可不能去那儿，你找不到什么线索的。我有这么个感觉，这些人都已被告知，不许谈论这件事。”

“最好你不要自己去打听这事，如果公安局听说你在做调查，就坏事了。”厨师说。

“你刚才说那位陈教授是同济大学的？”我问老赵，因为我想起惠妮的丈夫亨利也是同济的教授，她可以介绍我结识陈家。

“是的，是陈师母自己对我说的，梅萍是一个大好人，梅萍也常常对我说陈师母对她很好。”

“你知道我的朋友黄教授和他的太太出了什么事没有？”

“他们也是多灾多难，被红卫兵关押过，不过现在都好了，只是黄师母病得很重。”

“他们还住老地方吗？”

“我想是的。”

老赵和厨师还告诉我亲爱的陈妈已经死了。

“你是不能想象 1967 年和 1968 年上海是一副什么样子。”厨师说，“红卫兵和造反派都发疯一般，他们在城里到处横行，随心所欲地打砸抢和抓人，私刑拷打，用难以想象的残忍手段杀人。任何人出门上街都不安全，在车辆不够用时，他们甚至动用救护车去抓人。有多少人被逼自杀！许多人都去公安局请求进监狱以便得到保护。”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梅萍曾告诉我她要与沈凯结婚了，但他们想等到你释放后再办。她看来很自信，认为你很快会释放的，因为她说她知道你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你要我帮助找一下沈凯吗？”老赵说。

“你知道他的地址？”我问他。

“1968 年他曾给我地址并要我一旦有了你的消息就告诉他。”

1968 年是 5 年前了，沈凯还会记住我吗？我非常想马上见到他，因为看来在梅萍被绑架之前的那段关键的时期，只有他知道梅萍的生活。

“请你去找找看，告诉他我的地址。假如他已经结婚了，不要在他的妻子面前提到梅萍的事。”我告诉老赵。

然后我请老赵帮我去电影制片厂开了一张证明，并且到火葬场帮我领来梅萍的骨灰。

几天后，卢英又来通知我，星期二下午居委会学习小组开会并要我一定参加。

“带一个小凳子，会场里没有这么多板凳。”她提醒我。

星期二下午，我穿了件蓝色棉布外套，一条灰色法兰绒裤子，我希望我这件蓝色外套会给卢英挣点面子，因为我接受了她的忠告。但我这件外衣是请我的老裁缝裁剪的，做得特别合身，与其他中国妇女穿的一律规格粗制滥造的外衣很不一样。我想要让卢英看看我是接受她的忠告的，但我并不想鼓励她太多地干预我。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来暗示对她的权威有所不恭，于是我肯定她也不认为她要来喜欢我。大概这就是对付象卢英这样的人的最好的办法。

居民委员会办公室是一幢与我住的地方类似的房子。楼下三间房间可打通辟作会场。房里三分之二的地方都满了，全是些走路跌跌撞撞的，穿着一律蓝色衣服的人们，还不断有人来到房里加入到人群中来。无数毫不掩饰的好奇的目光向我迎来，这使我相信，在第一看守所劫后余生的经历使我身价倍增。

与我一起去开会的周太太领我穿过挤满人的房间，走到靠窗口一组大姐中，她示意我把小凳子放下，坐在她们中间，没有人向我们打招呼，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好象生怕不小心流露出面部表情会受到株连。以后几个星期，我一直参加这一小组学习，坐在这儿的妇女都是所谓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扫地出门的，是无产阶级不欢迎和受怀疑的人。我们和其他人坐在一个房间里，尽管我们与其他人是不同的，尽管房间没有分开，但我们一组

与工人们坐的地方总隔开一定距离。

这种隔阂并不是党或警察下令形成的，这是所谓“阶级”的政治宣传的结果。在过去的许多年中一直向人们灌输这概念。几个星期后，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发觉会已经开始了，我情急之中靠门边放下凳子坐在一群无产阶级中间，他们就象触电似的，两个靠我最近的工人赶快把凳子从我附近挪开，这样在挤满人的房间里只有我单独坐着。与其说是羞愧还不如说是感到好笑。趁发言者暂停一会儿喝水的功夫，我提着凳子大大方方地穿过人群，到周太太和其他一些太太们的中间，现在无形中已成了我的一伙了。虽然表面上仍毫无表情，只是点点头表示欢迎，并投来赞许的一瞥。

会议室里布置着我很熟悉的文化革命的标语，令我想起批判我的斗争会。但房里也贴有许多很大的图表。火药味就不很浓，都是吹嘘由于文化革命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文化革命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增长，这些当权者们，习以为常地沉溺在冠冕堂皇的谎言之中，结果除了真理受到愚弄再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实际上这些图表意味着居民委员会支持文化革命和毛的政策，是支部书记和她的同事们在表明其政治手腕的高明之处。

正对着我们前方，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幅声讨林彪的标语，林彪现是我们批判的靶子，大张的白报纸画着连环漫画，列举了林彪反毛主席和反党的罪行。

会议开始了，全体起立唱东方红，这是一首颂扬毛泽东就象东方升起红太阳的歌曲，自从文化革命以来已取代

了国歌的地位。当大家坐下之后，一个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是什么干部的男人，对林彪的罪行作了一番恶狠狠的抨击，他从长征时说起，列举了林彪在军队里的所作所为，到林彪企图谋杀毛为止。他所说的与我们在文化革命中林彪如一颗明星在升起的时候被灌输的东西截然相反。我们原先所知道的林彪的一切善行，都成了罪行。林彪的一切美德也都变成恶贯满盈。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一切罪行都昭然若揭。一些男人都在悠闲地抽着烟或打着瞌睡，妇女们则编织毛线或做着针线。人们到这儿来是因为要他们来并且不得违抗，对人们来说并没有受到什么认真的教育，结果是一场空。参加学习小组会议的结果，谁也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也没有成为反共产主义者。

在这个男人讲话结束之后，有几个听报告的群众站起来表示支持发言者的观点。在这种场合不管发言者的职位有多低，他似乎就是党的化身。所有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发言的居民都从口袋里掏出稿纸照念，每篇发言的内容都经过居民委员会的认可。

会议最后每个人都站起来高呼口号表示我们一致声讨林彪，虽然听说他的死是符合我的愿望的，但我没有加入呼口号的人中，实际上从我们这个角落只发出零零落落的几声。大概跟我一样其他人都觉得我们并没有被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我们只是旁观者。我们匆匆走出会场隐入11月份萧瑟的，渐渐朦胧的夜色之中。我们都快步流星地朝家里走去，不象来开会时那样慢慢吞吞。

在我家门外暗淡的路灯灯光下，我见到一个高个子的

年青人站在那儿，当走近时，我认出来他是惠妮的儿子。他变多了，从一个壮实的少年成了一个看上去较文弱的青年，但他的特征还是能辨认出来。我把他引进房间询问他父母的情况。

“收到你的信知道你在看守所里还活着，都很高兴。妈妈急着要来看你，她病得很重，患的是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无法治愈。我父亲也不太好，他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这个青年人默默地说，神色黯然。

“告诉我你母亲的病究竟怎么样？没有找一个皮肤病专家看看？”我问他。

“她患的叫硬皮病，皮肤变硬萎缩，内脏器官也受影响，不能吸收营养。”他说，“她住了好几次医院，但除了给她静脉输些营养外，没有一个医生能拿出什么办法。”

“我明天去看她。”我告诉他。

“我母亲变了很多，她看上去与过去大不一样。”

“你自己怎么样，还有你的两个兄弟？你们都还在工作吗？”我问他，

“文化革命爆发时，我在大学里，被派到四川，由于那儿闹饥荒，我得了结核病，被允许回城来。我的两个弟弟被派到农村当农民，林彪事件之后，他们也被批准回城了。一个现在在一家商店当送货员，但最小的弟弟没有工作。”

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空气又潮又冷使我的关节炎疼痛难忍。第二天几乎使我无法起床，早饭以后穿上雨衣和套鞋，带了把大雨伞，在排水道很差劲的街上跋涉，溅起

一片片泥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朝惠妮住的公寓走去。由于一心一意地要去看惠妮，连经过自己旧日的住宅都没有注意到。当我到达目的地，收了伞我想我已经到了要去的地方。

在过去了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到惠妮僵直的样子令我吃惊。她那曾经是那么美丽的面庞至今还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的记忆之中。但现在被这可怖和神秘的疾病残忍地破坏殆尽。当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在死亡的边缘了，没有儿子的帮助，她已无法移动一下她虚弱的身体。我必须俯下身让她能看到我，我才能听到她颤抖的声音。

她的眼光告诉我见到我她很高兴。但很快就蒙上了一片阴影，她喃喃地说：“梅萍她死了，我的孩子的前途也完了，1949年我们是可以离开的，不是吗？我们太傻了，留在这儿。”她合上眼睛喘息着使尽全力对我说。

我把她的手握在手心，这手已骨瘦如柴，冰凉冰凉的。“我们并不知道，别这样想，我亲爱的朋友！”贴着她耳朵我对她说。

她叹息着，我把她的手放进被窝里，站在那儿强制住自己的泪水，不让它流下。我不敢再加重她的悲痛，望着被子下她那枯槁的形体，她儿子示意我走吧。我弯下身去吻了吻她面颊，她张开眼睛翕动着嘴唇慢慢地艰难地吐出几个字：“想办法出国吧！你还可以做到。”这是她留给我最后的遗言。

走出她的公寓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漆黑的过道里，我不禁暗暗抽泣，为着惠妮，为着她的孩子们，

为梅萍，为我自己，也为成千上万个受到毛主义残忍迫害的无辜的男男女女。“喔，上帝呵！为什么要作践我们的生活呢？”我发问道。

当听到有人拖着沉重的步子上楼的声音，我赶忙擦干眼泪。我已能感觉到这人的气息，一个老人站到我的面前。他是惠妮的丈夫亨利，他一头银发，瘦削的脸拉得很长，带着失望的表情。我叫着他的名字迎上去，开始他好象已经记不起我了，一会儿仿佛记起来了，但他没有一丝微笑，只是点了点头说道：“一定遇到很多麻烦吧，但你却活着，太好了！”我问他惠妮的病情，正如他们的儿子已经告诉我的。当我问他自己的情况时，他摇着头叹了口气，最后他告诉我由于心脏有病，他现在已被安排作翻译工作。在此之前，他干的是体力活，我问他是否知道同济大学陈教授，梅萍在他住处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我知道他，但目前不要去找他或他的妻子！”他劝告我，“等到形势好一点，到那时他们才能毫无拘束地与你交谈。”

“形势不是在好转吗？”我问他。

“喔，是的，是已经好些了，你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活下来了，你确实很顽强，你能等到那一天。”

12月初，阿姨的男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已替我弄到了一些砖头，二位农民兄弟答应用木船把这些砖头从苏州运到上海。然后泊在允许木船下锚的地方靠岸，问题是船到时我是否能找一辆卡车去运这些砖头。我让阿姨去找一下孔，我已经与他商量过。晚上，孔来了，他说他可

以介绍一位在电力公司工作的青年，他是开卡车的，专门运送修路灯的修理工。

我让阿姨的男人回去并带去购砖头的钱款，等有了我的消息再将砖头运来上海。他量了一下前厅的宽和高，计算了一下。肯定砖头的数目是足够有余的。但他告诉我要设法搞些铁条铺放在地板上，以便能承受砖墙的份量，防止地板裂开。

虽然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要把墙砌好，但我想重要的是要确信周家是不是会反对我的计划。要使计划合法，我必须得到房管所的批准，最好的办法是给房管所写一份申请，有我和周太太具名。

我和阿姨一起谋划对付周家，我每天下午散步的时间改到每天清晨。阿姨去菜场也不走后门而是经过前厅走前门，经过在睡觉的周家儿子的床，我们总是象无意似地把门留下一道缝隙，这样，一股冷空气就对着他睡觉的角落吹。有时他不得不起床关门。但一个、半个小时之后，他发现门又打开了。他如果抱怨我们，我们就千打招呼万赔不是，但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把门留下一道缝。两个星期之后，当我认为已经造成了足够深刻的印象，我就请周太太上楼来喝杯茶。

“我有一个想法，我打算造一堵墙把前厅一隔成二半。这样你儿子就可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在早晨我和阿姨出去时不至于让你儿子睡在风头里，不知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当然很好，但这得化很多的钱。”周太太说。

“砖头、水门汀和劳力所需要的钱都由我来支付。”

“真的吗？我觉得让你来做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但你确实比我们的钱多。”

“如果你们同意，我是很乐意这样做的。”

“当然，这是个好主意。”

“我要给房管所写一份申请，”我告诉她，“我们一起具个名，然后明天早晨我去把它递上去。”

她在我写的申请上签了字，为了防止我的申请陷入官僚文牍的无底洞里面丢失，我想到了帮我装修洗澡间的年青的工人们，我想他们可以打通房管所的路子，我问他们是否愿意业余时间为我再修一堵墙，挣一些外快。当他们显得很有热情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弄了些砖头，并且写了份申请。我想请他们在我把申请交给房管所之前先帮我对办公人员说些情。我给了他们一条高级香烟，让他们决定是否把香烟送给房管所人员，还是留给他们自己。他们说：“毫无问题，由我们找房管员说，他跟我们过去属于同一个房管所造反组织，他不会回绝我们的。”

在他们给我暗示以后，我就把申请交给房管所办公室。那房管员很爽快地在申请上盖了公章。带着这个证明，我到指定的商店买到了水泥和铁条，请孔的朋友小冯用电力公司的卡车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回家。

小冯把检修工送到需修理路灯的地方，就来了。我在家门外等他，马上跳上车坐在他边上。在他必需去接那些检修工之前就可以把我的东西取回来。我问他卡车走的里程和汽油的消耗是否要受检查。他哈哈大笑起来并告诉

我，所有的规章制度都已被文化革命砸烂了，然后他说：“别忘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人民，你和我都是人民的一份子。”为此，他接受了我给的一条香烟，因为这样他可以去分发给检修工抽。“我想他们在工作地点等我。”他解释道。

我派阿姨再回家去安排运送砖头，我让她给我写封信，告诉我他们水路运砖头的日期，路上要二天时间，我会与小冯一起安排好，去讲定的地点等船。

那天船预定到达的日子，小冯开着他的卡车一早就来接我去等船，由于船到达的确切时间不能预计。我带了些三明治作午餐，当我们俩在一起大嚼三明治时，我问小冯那些检修工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已经安排另一个卡车司机来照看他们了，这样我们就可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当然，我应当感谢他的同事以及那些检修工们。既不能送钱，那只有送些礼物，这样就不至于不合法。我并不认为象这样使用电力公司的卡车是合法的，但我也没有问过小冯，我只是认为在什么是合法与什么是不合法之间有时是近在咫尺，有时则有一道鸿沟。当我显得有点不安时，小冯说：“不用担心，毛主席说过‘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们认为正确的政治思想的重要与经济的不重要一样。”

“那我们应该高呼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表示我们拥护正确的政治思想。”我开了个玩笑。

打消了我的顾虑，小冯摇了摇头并说：“不需要，支部书记听不到的，”然后他望着我并问道，“你真的在第一看

守所被关了六年？”

“是的，真是这样。”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关进去吗？”

“他们诬陷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

“不，你之所以被关进去是你不了解中国，我想你最好还是快些学，你的旧观念太多了，什么合法呀不合法呀，不必要的担忧。”

“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为我自己的私事用卡车，我感到不踏实，我不觉得这样做是对的。”

“在中国我们有公共财产，对不对？什么是公共财产呢？属于公众的每一样东西，对不对？谁是公众呢？我们就是，对不对。”小冯有点激动起来。

我不知道他是认真的或只是开开玩笑。

下午我们看见两个农民划着一条小木船，阿姨就站在船头正缓缓地靠到桥头破破烂烂的岸边。我朝阿姨招手，她也朝我招手，小冯倒车去装货，等船泊定了，我看见堆在船里的砖头都是很破旧的，目光所及没有一块完整的。许多砖头都在路上碎成了碎片，我担心这些砖头有什么用。但是阿姨的男人跳下船对我低语道：“好的都藏在下面，免得惹人注意。”

两个农民、小冯、阿姨、她的男人和我都发疯似的把砖头装到车上，待一装完，我马上付给两个农民钱，他们立即要动身返程。

桥边还有几艘木船靠了岸，成群的人在上上下下装货，大多数人都是大包小包，大筐小筐的，多得都顾不过来。

许多人一条扁担两头篮筐里装满了各种货物，我敢肯定这些货物大多数是销到黑市上去的，这些人都专心一致于自己的事，顾不上考虑合法还是不合法。也没有一个人注意我们的行动，但不管怎么说一直到卡车驶离了这个地方，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不管是不是正当，我总有负罪的感觉，我希望再也不要到这码头来。

回到家，我们就卸砖头，垒在花园的一角，周家全家都跑出来看热闹，但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帮帮忙的，虽然我已经精疲力竭，但想至少还得请小冯、阿姨和她丈夫一起去饭店好好吃一顿。小冯兴致很高，一杯杯地干上海啤酒和绍兴黄酒，庆贺我们的成功。我对他的全力帮助表示感谢，如没有他的帮助，我实在束手无策。此时，他举起酒杯为自己干杯，说道：“工人阶级万岁！”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随后他喧喧嚷嚷地大笑起来。小冯显然是一个对什么都看穿，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中的一个。

我实在太累了，睡下就鼾声大作，第二天早晨当我去花园看看那些砖头时，发现不少砖头遗失了，周家告诉我晚上他们听见有声音，猜想多半是有人翻墙进来偷了砖头，但阿姨告诉我遗失的砖头实际上是周家拿走的，并藏在他们房里，等隔墙一修好，周家就可用这些砖头在他们的平台一头砌一个台阶。

我去房管所找那些年青工人，他们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开始砌墙，每天晚上从5点半一直干到11点，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这样三个晚上他们就干完了。

阿姨早有预见地从苏州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给他们做一些可口的饭菜。阿姨上床后，我给他们送咖啡，蛋糕和香烟，坐在楼梯上与他们闲谈，殷勤款待，虽然他们含糊其词，但基本上他们与小冯的观点有共同之处，对工作和公家财物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用的工具都是房管所的，当我提出要支付一些钱时，他们都笑我并戏称我是“对中国一窍不通的外国人”。

有了隔墙，我遂了心愿，能安安静静地休养身心。圣诞日整整一个早晨我祈祷圣的恩德和赐福，但对我女儿的死，我不能理解，也不会平静的。但我不得不日复一日地活着，再也得不到她。

有这么多人，大多都是陌生的朋友，来帮助我，使我恢复健康，重新有个安定的环境。虽然我给他们送了礼物，尽我所能回报他们的一片好意，但我清楚我所给予的与我所得到的有多么不相称。他们为我所化费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医生和牙科大夫，是很多很多的。他们这样对我并不是为了有利可图。相反，当他们为了帮助我而敞开“后门”时，他们把自己置于何等危险的境地，甚至会引出严重的后果。尽管当权者们对请客送礼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开“后门”是非法的，政府的政策是说变就变，党的官员们总喜欢秋后算帐。

总之，他们之所以来帮助我，是因为他们出于对一个饱尝了不公正的待遇、失去了唯一的孩子的女性的同情。我的悲惨的遭遇触动了他们的心。多少年来，官方的宣传机器一再谴责人道主义是颓废的人性，鼓吹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完全臣服于阶级的关系。但我个人的经历表明，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仍保留着仁慈、善感和同情心。尽管面对残酷的现实，在政治体系的重压下，他们不得不撒谎和伪装。

尽管夸尽海口，许下弥天大愿，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给了他们新的发展的机会。中国人民仍在与生活的贫穷和物资的匮乏作斗争，文化革命几乎造就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境况，面对这一切，至少年青的工人们是采取蔑视和玩世不恭的态度。

十五章 与众不同的学生

元旦过后没几天，我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公共汽车到福州路去，那里是一些大书店的集中地，我先去了外文书店想找几本英语教科书，能回来教我的一些学生，元旦之后就要给他们开课了。除了孤零零一个营业员和我，整个书店几乎空无一人。靠墙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的只有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和俄文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北朝鲜金日成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的全集。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书籍。靠近进门处有一些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报纸堆放在一个肮脏的角落。我看到有一份“大不列颠工人日报”，几乎已经是二个月以前的报纸了。

我走近营业员并问她：“我能不能买到几本英语教科书？”

她摇了摇头。

然后我去了最大的新华书店，这是销售出版物的官方机构，想买一本唐诗三百首，我想校一下我在监狱中凭记忆曾背诵的那些唐诗是不是正确。

新华书店稍有点生气，有一小群人站在技术书柜前，营业员在忙于工作。

不少人在买儿童连环画，这是一种图解的故事宣传品，内容不外乎描写革命英雄的生活，镇压地主恶霸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书店正中最大的部分陈列的是毛的书。有他的选集和诗词集，有平装的也有精装本，充斥了书架。我记得在看守所时，曾从报纸报道中获悉，正印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有1亿5千万册，毛主席语录有七亿册。这样，每个中国的家庭可拥有一套选集，每个中国人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此外，书架上还有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金日成和恩维尔·霍查的全集。尽管只有一个女营业员负责这么多全部装得满满的书架，但她却没有一个顾客。

书店的一角，看见在一块写着“文学”的牌子下，只有寥寥几本书躺在书架上，连书名也看不清。我问营业员：“有没有唐诗三百首？”

她摇了摇头说道：“没有，不会有的。”

从她坚定的语调中我省悟到“唐诗三百首”一定被彻底禁止了。对于我竟然问有没有这种书，她可能觉得我有点傻。

指着她身后书架上躺着的那几本书，我问道：“这些是什么书？”

她一声不吭，拿起一本书翻转过来，使我能看清书名。是一本《欧阳海之歌》。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战士的事迹，他为了救一头骡子，被一列飞驰而过的火车压死了，他的这种

自我牺牲的勇气和精神归功于他刻苦学习毛的书，从而产生大无畏的精神。这本书受到毛主义领导人，尤其是江青的推崇，再版了数十万册。作者也因此九大被推举当上了中央委员。

“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有没有其他的书？那本呢？”我指了指下面书架。

她不慌不忙地取下一本给我看。还是这本书的另一种版本。

“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书呢？”

“还有雷锋日记。”她说。

雷锋是另外一个解放军战士，作为毛主义的民族英雄和自我牺牲的典范。在文化革命前，要求全体中国人民用毛的书的教导来武装自己，就在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雷锋受到高度赞扬。雷锋日记中的一些章节如“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报纸的文章中和被党的领导人包括林彪都广泛的引用。雷锋的榜样被军队中的毛主义者，用来作为有力的例证来证明政治说教要比现代化的武器和战斗技能更重要。推崇后者的军队领导人在文化革命期间不断地受到清洗。

“我已经看过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书？”我问她。

她又摇了摇头。

我走出新华书店，乘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家，我想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称作为文化大毁灭更恰当些。

由于我买不到英语教科书，就不能教一些初学的学生，只能接受一些已经学过英语并且自己有书的学生。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或晚上上课。我一共有了六个学生，课余我们总喝上一杯茶，一起聊一会儿，学生们给我带来一些报纸上看不到的消息。大多是通过我的学生，我才能对那个时期多变的政治形势保持了解。

我的学生中有一个最有意思，他和我在一起有好多年。在文化革命开始的几年，这个年青人还曾经是红卫兵的一个头头，他叫达德。他个人的经历是很不幸的，他的父亲在他还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抛弃了他母亲，远走高飞去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什么消息。他们只有很少几个钱，他母亲带着他们三个孩子，多年来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一直到他母亲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找到一份教授英语的工作。她的工资很小，尽管如此，他们不再靠变卖财物换些食物维持生活了。虽然他们家很贫穷，但是她母亲的一个妹妹在五十年代早期与共产党部队的将军结婚。在那个年代，建国初期，许多共产党的领导抛弃了他们做农民的妻子，而与有吸引力的城市姑娘结了婚。

他家与军队望族的关系和他对任何富人的深恶痛绝使他很快出了名，取得了领袖的地位，他变成了自己就读的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以后又成了市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凡是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他都参与：抄家劫舍，严刑拷打，大打派仗，滥杀无辜。当我们在进行英语对话练习时，我让他用英语叙述故事，他就用一种平铺直叙的语调讲述他在文化革命期间的行为，就象在与人谈论天气如何如

何，对他自己干的一切既不感到自豪也无羞愧之意。我认为达德是不道德的，我也奇怪，他母亲是英语教师，为什么还要跟我来学英语。有一次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他只是耸了耸肩膀说道：“你不该这样直截了当地向人家提问，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得到可信的答复，不管是什么样的答复。”

达德告诉我，当他的那位与将军结婚的阿姨，在林彪授意下被活活打死后，他已经丢掉了在红卫兵组织中的职位。这一切发生在第九次党代会林彪成了毛泽东的正式的接班人之后。他的阿姨，一个有长期党龄的老党员和众多殊荣的战斗英雄，只是由于对嗜好海洛因成瘾的林彪是否适合作毛的接班人公开表示怀疑。

“我能否相信你刚才告诉我的一切呢？”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是的，肯定可以，因为相信这一点对你毫无害处。你可以信任我，因为我不再是红卫兵的头头，我的阿姨也已经死了。但我也可以告诉你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都是愚蠢的。”他径直说出这样富有哲理的话，俨然是一个老资格的哲学家。

他的名字达德是道德高尚的意思，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可以对行善或行恶如此无所谓。由于聪慧和自我教育，他是极端清醒的。事实上，是他自我的极端的膨胀促使他时时不断地对我津津乐道他所了解的有关党内上层的权力斗争。他迷恋任何形式的争斗，当他谈起党的领导者们的政治阴谋时，他会激动不已。对别人他幸灾乐祸，对弱者仅

仅因为其总是失败而嗤之以鼻。他梦寐以求的是成功，而不管这成功靠什么手段去攫取。很难知道他之忠诚之所在。有一次我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呢？”

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当然是站在我自己这一边。”

一天，他在我的书桌上看见一本红卫兵刊物的油印本，“干嘛看这样幼稚可笑的玩意儿？”他有点倨傲地问我。

“我想知道文化革命中当我被关押在看守所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一切来龙去脉。”他大言不惭地说。

“你就不怕这样做会惹出麻烦。”

“怎么会呢？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如果你要去告诉其他任何人的话，你就会跟我一样引起麻烦。”

“如果当局获知这一切，怎么办？”我问他。

“只要我们两个人中谁也不对人说，谁又能知道呢？你的房间并不是公安局的猎物。”

“你敢肯定？”

“当然罗，我敢肯定你还不至于重要到要给你安窃听器的程度。要知道这玩意也是供不应求的，只须给你安个眼线就足够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达德之所以成为我的一个学生是经过精心谋划才成功的，这点是我以后才弄明白的。我最先是给梅萍的一个朋友授课，他是已解散的上海交响乐团的一个小提琴手。他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母亲是我燕京大学的一个校友。她来求我，能否收她的儿子做学生，因为这个青年人想移居美国。

他有个阿姨在美国当教授，为他出国提供了条件。因此我认为这个年轻的提琴手迫切想学英语，但叫我惊讶的是他上课时很不专心，也不做家庭作业。实际上，他常常干脆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来上课。

有一天，我又等他，不由我渐渐来了火，这时达德来了，他作了一番自我介绍并说：“我是代张来向你表示歉意的，公安局刚把他叫去，要给他办护照，因此今天他不能来上课了。”

他在桌子对面坐下，打开了自己带来的书本并说道：“我很抱歉来打扰你，我想自学英语，不知道能否请你帮我解释一下这段课文？”

我看了看，那本书是温斯顿·丘吉尔写的《酝酿中的风暴》。

“这本书你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我问他。

“这是借来的，”他说道，特别强调“借”这个字眼，“有全套但我只能借到一本。”

“你是红卫兵吗？”我问他。

“喔，是的。”他对我笑了笑并说：“正象大家所说的，你机敏过人，我还听说你英语是上海讲得最好的。”

这书实际上是他与其他一些红卫兵抄家时偷来的，其他的几卷大概都给付之一炬了。

几天以后，那位小提琴手向我告别，达德也一起来了。那位小提琴手请求我收达德做学生，顶替他的位置。

阿姨对达德的态度总是十分友好，当她给我们端茶来时，与她对我的其他一些学生的冷漠态度判若两人。阿姨的

神态以及达德成为我的学生所用的手段都使我对这个瘦瘦长长的年青人的兴趣骤增，他似乎对我为他化费这么多时间很感不安。除了规定给他上课的几个上午，他几乎每天要找种种借口来看我，他告诉我，因为他正在“待业”，所以空余时间很多。“待业”这个词是人民政府常用的“失业”的代名词，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存在失业是毋庸置疑的。他还说他希望能帮我做些什么，以报答我免费为他授课。

他常陪我去逛商场，帮我排队，秩序混乱时，他帮我分开众人的拥挤，因为他能从其他买东西人的头上一眼望见柜台里的商品。他可告诉我哪些是我需要的，有时，甚至伸着长长的胳膊，抢在其他顾客之前从售货员手里接过商品。如果走了几家店都买不到我想要的东西，他就帮我设法从“后门”去买，乘公共汽车，他保护着我免受拥挤之苦，用他的肘弯把别人推开，给我留下一个空间以便我上下车。当他为我辛苦了一天，我对他表示感谢时，他总是说：“我很喜欢跟你一起去逛商店，你总是选购一些最好的东西，这使我感到很满意。”

很快，我发现他对高级商品有兴趣，但对高级饭店却不敢问津。这样在他陪我一起逛商店时，我设法让他挑个饭店去领略一下真正出色的饭菜。第一次，他还问我：“你想去一个最好的饭店吗？”

“我带你去随便哪一个你喜欢的饭店。”我告诉他。

“不考虑价钱？”

“不考虑价钱！”

他叫了足够四个人饱餐一顿的食物，并且一扫而光，

我明白了，他之所以这样瘦是因为缺乏营养之故。我很为他惋惜，尽管我意识到可能他是那些盼我早死的人安插进来的密探。

我是想利用达德这个人的，不承认这点是虚伪的。假如他真是某些人安插进来，以便我能始终受到监视，那末他必然要装着言谈不慎、行为不羁而使我对他不起疑心。达德好象知道我女儿死的真相，有适当的时机我会去询问他。那个时机务必是使他不至于因泄漏了秘密而损及他自己的利益，同时，我想我也要利用他来转达我自己的意愿即希望能有象他一样的公民的地位。

早在我有可能离开中国之前，我就力图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没有保姆我就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听到达德对孔说到我：“她讨厌做任何家务活，甚至连米饭也不会煮。”这样我敢肯定他视我为寄生虫，对其他人他也会这样表示他的轻蔑。实际上，我故意要造成我希望留在中国的印象，因为我需要有人来照料我。这样可能最终会有助于我取得去美国探望我姐妹的护照，那些有权给我护照的人可能会想，几个月后我肯定会返回中国的，因为不能想象没有保姆我怎能生活。

1974年初，我从手术后恢复了健康，居住环境有了改善，我似乎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欣慰之中，教授英语又使我摆脱了对我女儿死的哀痛，我感到已很久未有过的安详和轻松。

春节到了，阿姨告诉我原先被造反派先是削减后又完全取消的节日优惠配给的商品又恢复了，商店里不用配给

的食物的品种也多起来。看来，尽管有极左派的阻挠，邓小平和他的副手们为恢复中国的经济所作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党的十大以来，中国的政治风向显然在向右转，越来越多被称作为“走资派”的原先党的高级官员恢复了职务。

我的学生带来的一些消息谈到对一些顽固的造反派要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如逮捕入狱等。有一个学生告诉我，新近复职的铁道部长到了苏州，整顿铁路交通，这是连接广东、上海到北京的铁路大动脉的要害地段。造反派占据了 this 要害地段，使交通瘫痪，拒绝执行铁道部的命令。铁道部长万里召集了群众大会，当着一些造反派追随者的面，谴责造反派头头的罪行并逮捕法办。一个党的老一辈干部能采取如此果敢的行动，使长期以来受压抑的人民受到极大鼓舞，拥护他及他的行动。不幸的是，同样也促使极左派看到他们苦心钻营攫取的地位被削弱从而加快地部署下一回合的争夺。而老一辈的党的干部也不愿认真地摒弃文化革命，他们力图从毛的陈旧的著作中找出片言只语来证明他们恢复秩序和正常生活的努力是正确的，以免被斥为反对毛的政策。

春节庆典按传统习惯要祭典祖先。在我孩童时代，庆祝活动要持续整整一个月。从新年前十五天就开始准备，一直持续到阴历十五元宵灯节。尽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变得异常简朴，合家团聚代替了祭典祖先。中国人对春节欢庆活动还是很认真地筹备。新年里，家家户户要大扫除。阿姨和我化了好几天时间打扫房间，把橱里的东西

都清理出来，给地板上蜡，擦拭家具和清洗窗户。新年新岁我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新衣服穿，也并不是人们买不起，而是因为布票是定量配给的。我尽我所能给阿姨做了件棉袄，比她平时穿的要时新得多了。我们两个到处排队去买食物，好招待我们的客人。按照习惯，我期待着我所有的学生都能来向我贺年，一些人可能会带他们的孩子一起来，我用红纸包了一些压岁钱。阿姨看到我准备压岁钱，显得有点不安，问我居委会的大姐们是否会对我复活这种旧习惯有所异议。我告诉她我只给那些估计不会告诉别人的人发压岁钱。

由于归还了外汇存款，我显然要比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要阔绰得多。我决定对所有的人都要慷慨大方甚至对周家我也买了个大奶油蛋糕和两斤巧克力作为新年礼物。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又感到无比的哀伤，当人们合家团聚共庆佳节时，我则形影孤单。过去每逢新年与丈夫及女儿一起欢度节日的情景，时时萦绕在我脑际。但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真正的感情，我宁愿让造反派们认为，对女儿的死我已归之于命运的安排。

春节前二天，何安和她的丈夫及孩子回家来与家人一起过节。见到她聪明绝顶的丈夫我很高兴，也很想听听他对北京的权力斗争的一些见解。他们的两个孩子也很可爱，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完全不会感到政治阴云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何安很幸运，能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在中国有许多年青人被分配到远离自己故乡和亲人的地方

工作。遥遥数千里，一年只有一次短暂的“探亲假”。党对中国的年青人实行如此残忍无情的政策还美其名曰“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和“为人民服务”。这种口号的伪善是显然的，事实上，党的官员和他们的子女很少被要求作出这种牺牲。相反，他们可得到特殊的照顾，与他们的配偶在一个城市里工作。

我释放出狱的消息很快在梅萍的朋友中间传开了。在假日期间，很多人都来看我，包括那些在享受探亲假的年青人。他们的话题大多是调动工作。他们都急于想跨入当时已到处都有的“后门”，以便能调到靠近自己爱人的地方。那些已经开始有门路的人，在我这儿会面时，就急于互相交流信息和经验。从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几乎在中国的每个角落，那些党的基层干部普遍受贿堕落的情况。

文化革命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的社会更纯洁，推动社会主义，但结果是党的一部分干部，信念颓废，对于这个问题我问梅萍的一个朋友她是怎么看的。她是从武汉回来探亲的，正在设法调动工作，她丈夫在上海，她想调到上海附近地方。

“首先，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提拔上去的党的新干部从来就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她说道，“他们只是把文化革命看作是个人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以求实现个人野心。重新上台的党的老干部们，在很久以前参加共产党时曾是理想主义者，但现在，由于文化革命期间受尽耻辱的经历，使他们完全清醒过来。他们感到党对待他们是不公正的，在过去战争年代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毫无价值，

他们现在关心的一切就是在未来的权力争斗中他们自己的政治仕途和为他们自己的子女们谋个舒适的生活。”

“当你给干部送去贵重的礼物或钱财，以便能获准调动工作时，有没有想过这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当然，这有一定风险。但我是豁出去了，随便怎么说，我想象这样的情况是查不胜查的。说不定哪一天，党的上层领导会追查下来，但现在他们正忙于互相争斗，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我们的谈话被达德的到来打断了，他是自告奋勇替我去蛋糕店取我为客人定制的新鲜烘烤的馅饼和蛋糕的。当然，我明白这只是为了能每天来看我，以便确认是谁来我家作客的手段，当他从厨房里端来蛋糕时，我正陪着梅萍的朋友下楼去。我帮她拿着孩子的衣物，孩子安然地在她怀抱里睡着了。当来到大门口时，她见周围没有人就悄悄对我耳语道：“当心你这个学生，据我看他象个便衣警察。”

“他只是一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跟他说话一定要小心。”这就是她临别的赠言。

沈凯，就是我女儿打算与他结婚的年青人，找到了我的地址。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来看我了。他告诉我，自从学校关门之后他不再当数学老师了，他已调到一个设计精密仪器的研究所。

“1966年当梅萍告诉我你被捕入狱时，我和我的父母都觉得我应该与梅萍立即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搬到我这儿来，不用孤单单地一个人生活。但她不同意，她坚持要等

你出狱，她说她不能在你不在的时候结婚。当然，那时我们都认为文化革命一年内就会结束的。”沈凯说。

“在她死之前，你经常见到她吗？”我问他，见到这个温文尔雅的年青人我感到很伤感，如果我女儿不被无缘无故地杀害的话，他就是我的女婿了。

“一星期我能见到她二三次，我们都想尽量多些时间在一起，您知道我父亲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被烙上阶级敌人的家属的印记，再说我是个教师，属于‘臭老九’一类。梅萍要参加电影制片厂的文化革命，在厂里她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平白无故的一伙面目不清的人把她诱骗走了。”

“请把这一切都告诉我。”我请求他。

“大概是6月16日，我想请她到我们家吃饭。下午我去接她时，梅萍借住的那家教授的妻子陈师母告诉我，梅萍已在那天凌晨自杀了。我连忙赶到电影制片厂，但看来没有人知道一点儿消息。然后我又赶到火葬场，但他们不让我看记录，因为我不是她的家属。那里的一个管理人员见我悲痛欲绝，几乎快要发疯了，就告诉我，‘那天早晨有一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年青的女演员的尸体被送到火葬场来。’”沈凯悲痛地哭起来。

“你相信她是自杀的吗？”我问他。

“不，肯定不是的，说是她自杀的那个地方我去看过，根本就不可能。”

“你为什么没有谈起过脚手架？”

沈凯警觉地望着我并说：“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谁

告诉你的？你一定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了解这些。”接着他又补充说：“如果那些对梅萍的死负有罪责的人知道你并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他们就可能要设法危害你的生命。你千万要小心，这些人是极端残忍无情的。”

“我知道，我不会跟人谈起的。”我让他放心，但问道，“你知道是谁把她骗走的？”

“我不敢肯定。但我认为一定是负责调查你的案子的那些人干的。然而不管是谁，他们是在执行上海某些领导的命令。”

“你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你知道，文化革命开始阶段，体育运动委员会与红卫兵的关系很密切。造反派占领了那幢大楼，但已消亡的体育运动委员会仍在那儿保留了一层楼存放档案。我是从一个人那儿知道这些情况的，他就是按照上头的命令把梅萍骗去的那伙人中的一个。”

“你认为你能否安排我与那个体委的人见面？”

“这对你会是很危险的。”

“为了了解事实真相，我准备冒一切风险。”

“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儿。你为什么不能等政治局势更明朗一些呢？”沈凯看来对我的要求有点勉为其难。

确实，梅萍的死已经过去多年了，人不能永远沉浸在悲伤之中。沈凯再也没有来看我。以后几年，我听说他已经与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了，那个高干之所以同意女儿与一个右派的儿子联姻，是因为那高干自己在成为鳏夫之后，

想娶一位年青的女人作妻子。他认为一个与他要娶的新夫人的年龄相仿的没有结婚的女儿会使他很尴尬。我也理解为什么沈凯要与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姑娘结婚，过去已发生的一切，使他自然地希望将与他结婚的女人再不要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除此之外，与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也使他不再烙上右派儿子的印记。这个包袱从他还是一个孩子时起就沉重地背负着。

沈凯的来访使我感到无比悲痛。我告诉阿姨，我要在房里休息休息。阿姨去打扫厨房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在敲前门，周家全家都出去了。我叫阿姨，她走到阳台上去看看是否有谁来看周家他们。

阿姨从阳台上回来对我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他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这儿，我要下楼去吗？”

“请吧！”我告诉她。很奇怪，这位客人会是谁呢？我赶紧整理了一下床铺，使房间里显得整齐些，然后下楼去看看来的谁。

“郑太太，你不认得我了吗？能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那人边说边上楼来。

凭着他的声音和熟悉的身影，我认出了他，使我记起了，来者是吴先生，我丈夫的一个老朋友。自从1966年夏天，文化革命刚开始时，他意想不到地来看过我一、二次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那双手已有些起皱，小手指上绑着绷带，除此之外，他的变化很少，我热诚地欢迎他，想到他在1966年给予我的好心的忠告。

引他走进我的房间后，我请他坐下。

“我真是非常高兴能再见到您，您看上去气色很好，恕我直言，在如此环境下您要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吴先生说。

“您和您的一家都好吗？你们还住在原来的地方？”我客气地问他。

“喔，不，就跟所有我们这样的人家一样，我一家也被红卫兵扫地出门。”吴先生告诉我，“尝到了我的一份苦果，但对过去的一切不堪回首，我们必须向前看。我们都还活着就值得庆幸，当然，我们都有一些亲人未能活到今天。梅萍的事我都知道。我也经历了失去亲爱的妻子和可敬的母亲之苦痛。在文化革命那些最恐怖的岁月里，她俩都死于心脏病发作。医院拒绝给她们治疗，因为她们是资本家的家属，我又在受审查。”吴先生叹息道，片刻功夫热泪几乎夺眶而出。很快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擤了擤鼻子。

“您怎么会知道我的地址？”我问他。

“这真是巧合，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碰到您家的老佣人老赵，听说您获得自由，真叫我喜出望外。今天整个下午我都有客，但最后一个客人刚走，我就骑着自行车来了。”

“您还在工作？”

“是的，虽然我可以退休了，但在家中我已无立锥之地，还是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好。一到晚上我疲惫不堪，睡得死死的，我现在住在我岳母家，红卫兵给她留了一间房间，我把它隔了隔就搬去住了。我岳母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很高兴这样就能照料她。”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了？”

“有了我这个资本家的父亲，他们自然都被分配到其他地方去工作了。我最大的儿子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女孩子。”

“在1966年的夏天你来我家作客时，你好心给了我一些忠告，我非常感谢您。当我关在看守所时，常常会想起您说的那些话，您对现在的政治形势怎么看？”

“当然是非常之好，但是谁也说不上能维持多久。”

“您认为最高层会有更多的权力斗争？”

他看了看半掩着的房门，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明天您能陪我一起去南市吗？听说那儿老花店又开了，有水仙花球。”

“明天我不能去，明天上午我有个学生要来上课，下午我要洗洗衣服，阿姨请了几天假打算回苏州去，前些日子她干得很辛苦。”

“明天下午，我可以来帮你洗衣服吗？我还有一天休息。因为除夕晚上我去加了班。”吴先生说道。我不想让他来帮我洗衣服，但我知道，他还想和我谈谈。我发觉如果我还想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就只能跟他一起走一趟。

“洗衣服大概可以放一放，我们还是去花店吧，如能买到一些水仙花球就太好了。”我说。

见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吴先生不由得笑逐颜开。我已忘记了有多少中国的男子都喜欢女人去做他们想要做的

事。我只是无意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一起去花店。但看来这样已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他刚跨进我家门口时更显得亲密了一些。当他要离开时，他不仅仅无缘无故地长久地握住我的手，甚至鼓起勇气要给我一些钱。

他从外衣口袋掏出皮夹，说道：“我知道象我们这样的人得到的生活费都很拮据。我在日本的表兄弟每个月定期给我寄钱来，我能否分些给您呢？”

他这样做真叫我大吃一惊，顿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把皮夹子递给我，又说：“收下吧，您如能收下，真使我感到莫大荣幸。”

“非常感谢您的一片好意，您要帮助我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并不是依赖政府所发的生活费，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我完全没有困难。”我连忙说。

他似乎有点沮丧但一会儿就恢复常态，他说：“我对您一直充满了敬佩之情，很难想象能再见到您使我多么高兴，您历尽磨难而安然无恙，这真是奇迹。您实在是一个无比坚强和充满毅力的女子。”

我谢谢他的一番善意的话语，送他下楼，当我站在花园里，目送着吴先生推着自行车走向大门口时，我意识到，周太太正隔着窗户注意着我们，看来在吴先生上楼时，他们已外出归来了。

“明天下午2点半我来叫您。”吴先生说道。

“好吧。”我说。

周太太对我的客人如此感兴趣，当阿姨从后门出去倒垃圾时，她凑近阿姨想打听什么。我估计周太太上午就会

去报告居民委员会的大姐们，她们就都会知道有一个男人在休息天来看我。在中国，封建主义的幽灵仍在徘徊，虽然男子与妇女在同一个地方一起工作，但在私生活中他们不能成为朋友。我敢肯定，吴先生的来访必定会成为闲话的资料。

南市是上海的旧城，城墙很久以前就被毁坏了，但城隍庙荷花池上的九曲桥和湖心亭，因仍保存着白底蓝花瓷的英国式餐具而著名。城隍庙现在成了一个商场，狭窄而四通八达的小径，成千上百家小店和摊子，出售各种各样物品，从假发到供医学用的活的青蛙。人们常说，在城隍庙除了棺材你可以买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这儿也有许许多多餐馆，供应各式特色食品，是在其他地方尝不到的。商场的中心，靠近荷花池是一座明代风格花园，叫“豫园”。园内有奇美的人造假山和许多亭台楼阁，围成独特的庭院。豫园没有受到红卫兵的破坏，因为1853年这儿曾是一个反帝革命组织“小刀会”司令部的秘密所在地。

城隍庙附近的大街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节日期间满是来逛商场的人群。我和吴先生下了公共汽车，穿过几条马路，朝商场的的一个入口处走去。这儿的人太多了，我们几乎被人群簇拥着。当我们来到花店时，连一株鲜花都未剩下，但是花店里还是挤满了男女老少。货架上摆着宜兴茶壶和茶具，人们有的在购买，有的只是看看。另外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瓷的塑像，动物、瓷瓶和瓷花瓶，价格也公道。在文化革命初期，这些东西都被红卫兵禁绝和破坏殆尽，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我买了一把宜兴茶壶，淡褐色的陶器

制品，雕饰着传统的山水花木。还买了一只青磁花瓶，经改装后可当台灯。

我们走出商店后，吴先生说：“您一定很累了，我们是不是到豫园去找个地方坐坐。”

我们到达豫园入口处时，发现许多人排着长队买票，另外一条队伍里的人手里都拿着门票，等候入园。有一个戴着红色袖标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维持秩序，有多少人出园，才能有多少人被允许入园。

“我们何不坐车去中山公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安静的去处坐一会儿，现在这种时候，那儿不会有许多人。”吴先生建议。

大概是由于多少年来离群索居的生活，一旦处在人群之中，就感到紧张和疲惫，尽管周围的人对我毫无敌意。这样，那荒芜的公园，那裸露的枝干，那结着薄冰的小湖，一派萧瑟的冬景反而令人心旷神怡。吴先生买了两角钱的门票，我们漫步进了公园。尽管没有风，但二月的天气还是呵气成冰，没有众人的簇拥显得更加寒冷。我和吴先生象所有的上海人一样穿着冬装，紧裹着一层层衣服，但当我们沿着小径漫步时，寒气仍刺痛着我的脸。一簇常青的灌木结满了红色的浆果，映入我的眼帘。我们走到那儿发现在一丛假山后面有一张坐椅，看来是一个好地方，让吴先生告诉我他想对我说的一切。着实令人很难想象，世上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为了能无拘无束地作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我们必须如此小心翼翼。

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后，吴先生问道：“你有过痛苦的

时刻，其实我不应该再提起您在看守所里令人不快的日子，但我只是觉得您是否发现，为什么您会成为受迫害的对象？”

“我想是因为我在壳牌石油公司工作，他们认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是一个‘间谍组织’，还认为我已故的丈夫和我是英国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未拿出任何证据对我起诉，只是逼迫我招认。”我又重新记起了大声喝问、严刑逼讯的日子，想起我必须竭尽全力对付的一切。

“从他们讯问您的问题中，您没有辨别出什么实质的东西？”

“我以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一切只是所谓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影响的结果。”我告诉他。

“这是对的。我想对我将告诉您的一切，您会感兴趣的。”吴先生说：“在1967年一月革命之后，红卫兵和造反派接管了我们厂，造反派把原来党委书记贬为一个普通工人，还指控他是‘走资派’，他被划归到我一组里。您知道，文化革命前我们两个相处得还是很好。那时我分管厂里的技术工作，他是党委书记，而现在我们两个都成了苦力，吃午饭间隙周围没有其他人，他就很坦率地与我交谈。这个过去的党委书记告诉我，您之所以被捕是由于所谓的‘里通外国’。”

“你们的书记怎么会知道的呢？”

“在您被抓之前，红卫兵曾到我们厂来问我关于您的情况。那时，那位党委书记还有权，他那时也在场。你的女儿梅萍作为一个电影演员还是有些名气的，她死得这么

惨，引起满城风雨，因此，那位党委书记常常把您的情况与她的死联系起来。”吴先生说。

“你们那位书记还跟您说了些什么？”我问他。

“有一个政府部门被怀疑与这个阴谋有关，就是被指责为阶级敌人的保护伞的统战部。统战部长是周总理的一个部下，在一次批斗会后，他神秘地死了。据说他是面对着煤气开关自杀的，但是，发现他的尸体时，窗户是开着的，房间里只有很少量的煤气。”吴先生说。

“那末说他的自杀是捏造的！”我想到了我的女儿，显然我会发现事实真相的。

“他的家属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北京，周总理的养女，人民艺术剧院导演孙维世也被投入监狱，并被折磨至死。原因只是因为江青把她视为死敌。著名的京剧演员马连良和程砚秋也被拷打至死，因为他们拒绝招认是国民党的特务。听说这两个演员是周总理从香港把他们请回来的，还作了他们的入党介绍人。还有很多的科学家，都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间谍，这些人也是周总理邀请回国的。只要这些人中间任何一个招认是特务，极左派就可以归罪于总理，即使没有事实证明他是这些人的保护伞。”吴先生说。

“您的意思是说，你们那位党委书记认为，继我之后其他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企业中任职的中国籍高级雇员之所以被投入监狱和受到逼供是因为有人或是林彪或是江青，想要利用我们招认的口供，去损害周总理允许外国企业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政策？”我问道。

“是的，我们这位党委书记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林

彪和江青俩把周总理视作是刘少奇被打倒之后，他们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在他们眼里看来，周总理是很难对付的，不象刘少奇。总理从没有反对毛主席，这样他们必须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周总理也不是孤家寡人，他背后有一大群党的领导和政府各部门的要员，在整个权力结构中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现在林彪已经死了，周总理成了毛主席之后最有权力的人物，他的地位是不是强大而稳固呢？”我问吴先生。

“是强大的，但并不稳固。因为江青及其一伙有野心。周总理现在身体有病，目前的问题是谁来接替他。”

“不是由邓小平来接替周总理吗？”

“这还是未定之数，邓小平不象周总理那样有儒将风度，他要速战速决。极左派领导已受到威胁，这就会加速下一轮的斗争。”吴先生说。

太阳偏西了，冷落的公园里显得更其寒冷。不远处，三三两两的游人漫步向出口走去，我觉得也该走了。吴先生问我是否愿意一起去餐馆用一顿晚餐，但我感到抑郁和疲惫，于是我们乘车回家去了。

在大门外，吴先生向我告别。他告诉我，一有空很想再来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象今天这样感到高兴万分。看到你身体很健康就好，不要过于忧虑，我会来看您，使您振奋，快乐的。”

我推开大门，发现周太太在寒风中站在平台上，我猜想她是听到我们的声音才出来的。

她从嘴边拿下香烟，说道：“在外面玩得很高兴吧？”

她大概希望我会告诉她我去了哪儿，这样她就可以去报告居民委员会。我强抑制住冲动，只是淡淡地说道：“您不觉得这样站着太冷了吗？”说完就上楼去了。

第二天，我的老朋友何安的母亲来了，那时我还在给学生上课，待课一结束，阿姨已经为我们俩准备好了简单的午餐。我们边吃边谈，她一再说到春节，要把话题引到有哪些客人来看过我，突然我省悟到她希望我告诉她有关吴先生的事。但是她怎么会知道吴先生来看过我呢？震惊和失望使我得出令人不快的结论：何安的母亲是受一些要监视我的人的指派来看我的，我不禁感到浑身发冷，我决心把一切都告诉她，免得有人认为我似乎想隐瞒什么。

“除了一些老年人之外，还有一个老朋友也来看过我。老赵在路上碰到他，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昨天我与他一起去了城隍庙还买了个宜兴茶壶和花瓶。”我说。

“他结婚了吗？”

“他现在单身一人。”

“你早就认识他？”

“他是我丈夫的朋友啊！”

“他现在干些什么？”

“他曾经开过油漆厂。”

“他对你有兴趣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不觉感到有点讨厌了。

“如果您能原谅我所说的话，一般来说，中国的男子是不会邀请一个女子与他一起外出的，除非是对她本人有

意思。”我这位老朋友说。

我对她说：“你不能回避这样的事实，他可能感到很孤单，能与我在—起他很愉快。”我在想，对于吴先生的来访最好只是有什么人看见了，而不要涉及什么政治的问题。“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老太太了，我想他也只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只是出于对我的一片好意。”我告诉她。

“你还是个很有吸引力的老妇人，令人奇怪的是，尽管你经历了磨难，你看上去仍要比你实际年龄年轻。我敢肯定，你这位男士朋友是很想要您与他结婚的，只要你给他机会。”

“我确实对吴先生不很了解，要设想我们的关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还是很不成熟的。”

“作为一个老朋友，我是很愿意你能再婚，在这个社会孤单一人生活是很不方便的。你需要有一个人与你一起谈论一些事情和照顾你。”我的老朋友非常坦诚地说。

她走之后，我拉下窗帘，躺倒在床上，我感到十分抑郁。我发觉我竟受到如此严密的监视，令我沮丧的是何安的母亲也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什么时候我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呢？对于吴先生他有什么打算，我一概不知。在休息的日子他只是愿意与我在—起，感到很快乐而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会与他或任何人结婚的。我仍盘算着—旦情况允许就离开中国，为着更好地活着。

由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上海公安机关又重新允许因私人原因出国。尽管等待的时间仍很长，而且有许多申请被拒绝。但从我被释放以来，已经听说一些人确实幸运地

得到护照，离开了这个国家。我还是继续着我在看守所所作的事情，每时每刻都留意搜寻报纸上是否登载毛的照片。这种迫切的心情比之在看守所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明白，除非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否则我是没有希望获准出国的。我要尽力保持健康，这样我就能活到这一天。

我听到在通往我们住所的水泥小路上有沉重的脚步声，随后有人在敲楼梯下的门，由于感到不快，不想见任何人，我并没有起床去开门。过了一会儿，我听到达德跟周太太在我的窗下谈话。

“阿姨不在家？”达德说。

“她去探亲了。”是周太太的声音。

他们站在花园里耳语了一阵，随后达德又敲起门，我还是没有起床去开门。

晚上，周太太上楼来，端着一盘她烧的鱼，她的孙子跟在后面。

“我知道你不会烧鱼，所以我烧了点菜给你晚饭吃。”她说道，但没有提起达德来访一事，这样我也不便说什么。我知道她只是用送鱼给我作借口，以便能上楼来看看究竟是因为真的睡得很熟没有听到达德来过，还是因为不愿意见他。

我给他的孙子几颗糖吃，并邀请他们坐坐，这孩子手上拿着一块民兵袖章，我逗他说：“你已经当上兵了！”

他举起袖章说道：“这是我叔叔的，他在达德叔叔手下接受训练。”

“达德是民兵？”我问他，虽然我很惊奇，但我尽量装

出若无其事的声调。

尽管周太太竭力想把孩子的注意力转移到糖果上去，孩子还是说：“当然罗，他还是连长呢。”

“太好了，”我大声说道，“我敢打赌，等你长大之后，也一定会象你叔叔和达德一样当上民兵的。”

这个孩子显然还要说出些什么来，我不想知道，因为周太太不仅有些局促不安而且还有些惊慌失措。她对孩子说：“你真是胡说八道，达德叔叔根本不是民兵。”

那孩子反驳道：“他就是，他就是的！”

周太太赶忙站起身，对我说了声晚安，带着孙子下楼去了，一边还在嘟嘟囔囔责备小孙子把一切事情都说出来。

由于民兵是军队的后备军，控制在林彪在上海的亲信手里。林彪死后，民兵的控制权落入江青的同伙手中。1974年和1975年，极左派领导人作了很大努力扩充和加强上海民兵队伍，希图发展为自己的嫡系部队。

如果达德是民兵连长，他就不会象他宣扬的那样是个待业青年。因为民兵成员都是从工厂和政府部门的积极分子中挑选出来的，我认为达德不象是个工人，因为他如此爱看书，一双手又是白净白净的，他一定是上海政府某一部门的积极分子，换句话说他的主子就是江青在上海的同伙。我很高兴最终搞清楚了达德的真实身份，他与警察或其他什么组织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或对我的处境来说这已没有什么两样。长时间以来我已怀疑他比表面上要复杂得多。

时光在流逝，春天又来到了上海，从第一看守所出来已整整一年了。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当然我的物质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关节炎，我看上去没有健康问题。

清晨，我站在阳台上欣赏下面的花园，房管所栽种的杉树长得很快，那枝条上已绽开了点点嫩绿的芽胞，用不了几天，就会展开片片嫩叶。我的老花匠种了两畦月季花，花坛上种满了各式各样的春花，在阳台的柱脚下他还种了些攀缘蔷薇，还搭了花架，可以爬藤，越来越多的麻雀到花园筑窝。清早，我就能听到它们在树上啾啾的鸣声。

天气渐渐热起来，阳台成了我的居室，我在这儿给学生上英语课，常常在室外用餐。在阳光下坐在一盆盆素馨，百合花，羊齿草和其他花草之中。这些花草都是我自己搜集的或是学生们送我的。在我的收藏中，引为自豪的是一盆美丽的盆景，那雕饰的扁平的花盆，点缀着假山和青苔。我终于借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我把它抄在一本练习本上背诵了一遍又一遍，试试我的记忆力，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吴先生还不时地来看我，我发觉，当我们坐在阳台上时，周太太就会正好在我们下面的平台上。如果我们呆在房间里，阿姨就在周围转悠。

八月的一天，黄昏的阳光游移着，傍晚的时候，气温还很高。吴先生来约我一起出去吃饭，由于阿姨已准备好了晚餐我就邀他留下，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饭菜都备齐

了，我们坐在阳台上吃着，黄昏中淡淡的夕光，微风轻拂，吴先生显得非常兴奋，与我讲述他在杭州度过的童年岁月。阿姨把桌子收拾干净后，达德上楼来了，他来看我总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这次他给我送来一袋甘美的无锡水蜜桃。他说等到第二天早上送来的话就要烂了。我把他介绍给吴先生。天已暗下来，阳台上没有一点光亮，阿姨从我书桌上拿了一盏台灯放到窗台上，她还递给达德一个大盘子，把桃子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盘子上，那些桃子一个个都没有伤疤，熟得恰到好处。我从来也不曾从商店里买到过比之更好的桃子，即使是在文化革命前也未买到过。

“你从哪儿弄来这些桃子的？”我问他。

“我的‘后门’多得很，虽然我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我可是一个‘走后门’的博士。”达德开着玩笑，随后他去厨房洗桃子去了。

达德的突然出现，显然使吴先生很扫兴，他变得沉默不语。消磨了一会时间，吴先生就告辞了。我陪他下楼送他出了前门。就象往常一样，每当达德跟我在一起，周家的人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似乎有达德在，他们就不必再注意我了。

当我回到阳台上，达德对我说：“他是个资本家，是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他的举止我能判断出来，跟所有的资本家一样，总有一点爱财的铜臭味。”达德有点激动。

“我看，你好象还在做红卫兵头头。”

“不，在我当红卫兵头头时，只是个头脑发昏的盲从者，现在我是个马列主义者。”

“你是党员吗？”我问他。

“现在还不是，但不远的将来总有一天我会入党的。”

“既然你对资本家们如此深恶痛绝，为什么你还要跟我学英语呢？你没发现我与资本家一样可恶？我不也散发着一股铜臭吗？”

“你不一样，事实上我觉得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资本家，你对钱太不注意了。对你来说主要的问题是你太天真，过于轻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所谓的仁慈，博爱，宽恕等愚弄人民和麻痹他们革命精神的腐朽的说教。”

“对资本主义国家你究竟了解了多少？你从未去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太可惜了，不过我也不想去。”

“假如有机会的话，你是否想去呢？”我问他。

“当然罗，我要去的。在美国或在欧洲国家我会努力工作创造我自己的生活，我会过得很好。”他充满憧憬地说道。

“你把我弄糊涂了，不多一会儿之前你还在想要加入共产党，现在你却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就要出国，大概你是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闹一场革命吧？”我问他。

“当然不会的。我要加入共产党只是因为我必须留在这儿。假如我能出国去资本主义国家，我就要努力成为一个资本家”他迫不及待地说，大概他认为我会傻到这种

地步而相信他的这套逻辑。

“什么！我还以为你痛恨资本家呢？”

“现在我恨他们，但如果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就不恨他们了，不是吗？”

“假如你成了自己所痛恨的人物，你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安吗？”

“为什么我要感到不安呢？你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吗？”

达德走后，我坐在阳台上久久地思索着这个确实很奇怪的年青人，在我的一生中从未遇见过象他这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他确实非常聪明，也很努力，如果他有机会在自由社会生活和工作，他可能会干得很出色。我不认为在中国他会有什么前途，即使他成为一个党员。他自高自大狂妄得很，是个个人主义者。由于他阿姨的死，他失去了跻身无产阶级上流阶层的进身之路。

第二天下班之后，吴先生又来了。于是我和他一起去了闹市区的一家餐馆，待我们坐定之后，吴先生说：“你的那个学生看来享有政府高级官员的物品配给待遇，我认为他带给你的那些水蜜桃没有市革会、市委副书记以上级别的人是弄不来的。”

“你不相信他可以通过‘后门’搞到这些桃子？”

“不，根本不可能，象这样的水蜜桃不管前门还是后门都没有卖的。是专供高级官员享用的，根本不用付钱。”

“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不能告诉我要知道的真相。”

“问题是为什么要他把这些桃子带来给你。”吴先生很

担忧。

“可能这只是突然来看我的借口。他必须要带些不易得到的，而且没有冰箱不易保存的东西。”实际上我知道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吴先生在的缘故，但是我不想告诉他使他警觉。

“你认为你受到监视吗？”

“是的，我肯定，这只是一个例子罢了。”

“对你进行这么严密的监视是不正常的，释放你的时候，他们对你怎么说的？”吴先生问我。

“没有说些什么，没有说我是无罪的，只是对我说我受到了再教育，在思想上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我还记得在看守所审讯室里的最后一次谈话。

在吴先生认真思考我说的那些话的时候，我还记起电影制片厂的来人对我说的话。

“那个上海电影制片厂来的人说，是因为健康原因把我释放的。”我告诉他。

“真的吗？他是这样说的？你认为如果你没有病的话，他们还会让你呆在那里吗？”他一连串地发问。

“他们认为我患了癌症。”

“大概你的问题还没有结案，所谓的阴谋也没有作出任何结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你还要进行如此严密的监视。”吴先生说。

“如果他们想找什么借口把我再送回看守所的话，他们不会得逞的。”我说。

“你有没有尝试与伦敦或香港的壳牌石油公司取得联

系？”

“没有，我认为只要这儿政治形势尚不明朗，我无法试图与国外取得任何联系的。”

“那末如果他们试图与你取得联系呢？”

“我已经考虑过这点，如果我收到国外任何人寄来的信，我会把它交给公安局，请示他们我是否要有所反应。”

“这是明智的。政治形势并不妙，江青在企图复辟，你是否注意到近来报纸上有关她的活动的报道很多？我也听说毛主席比过去更信赖她。”吴先生告诉我。

“为什么党内的权力斗争要连累我们屡遭不幸？我们连党员都不是啊！”我无望地呼叫。

尽管很热，餐馆里还是坐得满满的，整个餐厅人声鼎沸，我和吴先生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

夜晚又闷又热，我建议还是走回去好。不要再去挤公共汽车。马路上人很多，我们在人群中通过，许多人坐在小凳子上乘凉或睡在躺椅上。人们的房子都住得很拥挤，不得不到马路上来喘一口气。从共产党接管城市以来，上海的人口已从四百万增至一千万，政府提供的住房只增长了一点点，又不允许私人建房，结果就造成了几家人家合住一幢房子，几代人数世同堂。一间间房间被隔了又隔；在路灯微弱的灯光下，上海入夜的街景一派萧条的景象，夜色象一所帐幕笼罩着一切。

吴先生说政治局势恶化的分析是正确的。1974年下半年，江青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在来自北京的报纸上出现。这意味着权力的增长，她以毛的名义或以她自己作为政治局委

员和革命领导人的身份会见外国领导人，她以主人的身份请外国来宾观看革命样板戏，和他们讨论问题。几乎每天出版物的显要地位都刊有她的照片或关于她的活动的报道。

“批林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通过她控制的报纸和所有主要刊物直接左右着这场运动。由她的同伙姚文元组织的毛主义的写作班子，源源不断向报纸提供批判文章，全体人民通过成千上万个学习小组被动员起来投入这场批判运动。成篇累牍的文章对孔夫子的哲学思想很少予以注意，却强调了一个很少有人了解的事实，即孔夫子五十岁时曾在鲁国做官，有一段时间曾担任宰相的职位。毛主义的秀才们一再鼓吹，孔夫子是反动的保守派，是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显然很清楚，江青的批孔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周恩来总理的运动。古代大儒这一名词成了身患重病的总理的代名词，批孔的文章进一步推崇与孔子同时代的另一家激进的学派法家思想，把儒法两家的斗争与当代“革命派”和“走资派”的斗争等同起来作比较。

对领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感到厌烦的中国人民，包括基层的党员都站在总理一边。关于江青的谣传到处传播，毫无疑问编造了许多关于她的不光彩的传闻。她是如此不得人心，关于她纸醉金迷、伤风败俗的私生活的传闻光怪陆离，成了老百姓饭后茶余的闲话资料。但令人担忧的是毛泽东看来偏袒他的妻子及其激进派领导人。大家认为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加速扭转文化革命的方向的试图已引起了毛的警惕，他害怕着自身的声誉和文化革命中所鼓吹的一

切会一败涂地。

随着批孔运动政治气氛的越来越紧张，文化革命的扩大化又复活了，有几个学生害怕学英语将被视为不轨退出了上课。居民委员会也加紧了活动，要求百分之百地出席学习小组会议不再允许在会上打毛衣。越来越多的人被组织起来支持批孔运动，林彪集团已不再提起。阿姨提醒我，外出时只能穿一件棉布外衣，这样就不太惹人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她与那些带些鸡蛋和家禽到城里来卖的农民打交道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冬天来临时，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提醒我这样一个现实，我将陷入重新投入监狱的危险。

这些年来看过我的梅萍的朋友中，有一个年轻的农村妇女叫陈兰，梅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之前，曾经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到上海郊区马陆人民公社去体验生活，就住在陈兰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两个姑娘成了好朋友。在农村时，梅萍教她读书写字，她了解在她狭窄的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如此辽阔的世界。她知道了冰淇淋和香波之类少女们的爱物，使她眼界大开。陈兰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母亲突然患病，是梅萍救了她的命。那天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梅萍驾着从生产队借来的船，通过曲曲弯弯的河道及时把她母亲送到县医院，做了急诊手术。从此以后陈兰家把梅萍看作亲生女儿，两个姑娘也成了结拜姐妹。

陈兰来看我时，给我带来一张很大的照片，是梅萍与她及其他几个村里的小姐妹一起照的。陈兰满含泪水说道：“这张照片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但我知道，您所有的照片都

丢失了，我想您更需要它。”

我告诉她，我再去多印一张，然后把原照片再还给她。但是我化了好几个月时间，也找不到一个照相馆愿意做这样一笔小生意。我正打算到苏州河对面城市的另一头去试试看，有哪个照相馆肯印，听见楼梯口有人在敲门。阿姨已下楼去开门。一会儿听见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她女儿的朋友。”

一会儿阿姨走进我的房间，后面跟着一个长得很结实中等身材的年青男子。

我把在看的照片放下，站起身。

“我叫刘兴，是梅萍的朋友。”这个年青人作了一番自我介绍，随后他拿出一盒包装好的礼品继续说：“我听说您已经从看守所出来了，我想应该来看看您。我能为您做些什么，这是一盒长白山人参，在上海是弄不到的，我去东北出差，就为你带来一盒。”

一盒长白山人参是很贵重的礼物，要化去一个工人整整一个月的工资，我不知道他给我如此贵重的礼物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我说：“我非常感谢您给我人参，但我从来不吃人参的，您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我去上海电影制片厂革委会询问，是他们告诉我的。”

显然这是个谎话，中国官员从来不会如此对待一个人的。不知为什么，我总不相信他是梅萍的朋友。他的谈吐举止都不象我的女儿结交的那类年青人。为什么他要来看我呢？他想要我些什么？我怀着好奇想探个究竟。同时我内心深处总有这样的感觉，他可能是那些对我不怀好意的

人派来的。

“阿姨，麻烦您给客人倒杯茶。”我走到房门口招呼在厨房里的阿姨。我好客的态度使我的客人感到自在了些。他笑了笑，显得轻松些，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将礼盒放在桌子上。

我也坐下并问他：“文化革命前你到我家来过吗？我已经有点记不起来，是否见到过你？梅萍好象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你的名字。她一般总是跟我谈起她所有的朋友。”

“你们是一对亲密无间的母女，不是吗？大家都知道。你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跟您讨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屈身向前以一种神秘的姿态说道：“我知道有人能帮助您抓住那些谋杀者，那些人并不想要钱或什么报酬。他们感到对不起您，只是想要帮助您。”

这真是一个出乎寻常的问题。在文化革命中一切是非被颠倒了，这点在批孔运动中，通过官方的宣传，又反复被肯定。对我来说，如试图对我女儿的死有什么表示的话，显然很快就会把我重新投入第一看守所。因此我立即说道：“我已无意对任何人有所指责。对我女儿这样的死我是很悲痛的，这完全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必要的。这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

“您真豁达大度！作为她的母亲，你有责任为她的死而复仇。”他说道。

“我相信她的冤仇总会昭雪，一旦时机来临，政府会进行调查的，我完全信任人民政府。您还没有告诉我您是什么时候在哪儿认识梅萍的。”

“我是在马陆人民公社与她认识的，她住在一户农民家里，我经常去她那儿玩，一起闲谈。”

“您那时也在马陆公社？”

“是的，我在那儿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就是在那时与她认识的。”

正如他所宣称的那样他真的是梅萍的朋友？他真的是在马陆人民公社认识梅萍的？我想我可以证实一下。我说：“既然您曾在马陆人民公社并且在那儿与梅萍认识，那你一定知道陈兰，这个姑娘与梅萍非常要好。”

“喔，是的，当然罗，我经常看到她们在一起。”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拿起梅萍与一些农村姑娘的合影，递给他：“有人给了我这张照片，我从来没有见过陈兰，您能告诉我这些姑娘中哪一个是陈兰吗？”

他仔细审视着照片，指着一个站在我女儿边上用一条胳膊挽着我女儿的肩膀的姑娘。真是猜得太妙了，但他指的那个姑娘并不是陈兰，陈兰站在最边上，并不是紧挨着我女儿。

他的错误，至少证明他并没有在马陆人民公社与我的女儿相识。那么他来是为的什么？或者他还想要得到些什么？由于我未加否认，他认为他的猜测是正确的。出师告捷使他信心十足，说道：“我会常来看您，您会真正了解我的。我对国际事务很有兴趣，我相信可以从您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当然您也可从我这儿了解很多东西，因为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如果您确实不想直接会见我刚才跟您提起

的那些人，我可充当您的联络人。”

“您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您不知道反对那些与我女儿的死有牵连的人是很危险的？他们都是造反派，有一些权势人物作后台，不是吗？”我问他。

“我爱梅萍，自从我知道她已经死了，我无法抑制对她的思念。对谋杀她的凶手，我之痛恨并不比您轻些，只要能为了她的死而复仇我愿去做一切。”他说道，摆出一副令人可笑的诚恳和非常悲痛的样子。

“您爱梅萍？那您一定非常了解她，真叫人奇怪，她怎么从未跟我提起过您。”

他的脸一下子红了：“我只是在心里深深地爱着她，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能见到您真是太浪漫了，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等待政府为她的死平反昭雪，不管我们如何义愤，但我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利去随心所欲。”

“现政府是绝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他们是谋杀者的后台，这还不清楚吗？我们怎么能寄望于他们呢？”他不无激动地提高嗓音，我并没有吞下他设下的诱饵，大概令他很失望。

“请您轻声些，您不能恶意诽谤政府，说政府是谋杀者的后台，这可是反革命言论。我不能容忍我的客人在我的家里这样谈话。”我用很严厉的语调制止他。

“你是个谨慎的人，我们私下谈谈是无关紧要的，尽管您不说，但梅萍与您本人身受的一切，一定使您痛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您完全错了，我是不会去恨共产党或人民政府的。但我会认真思考您所说的一切，如果我的想法有所改变的话会与您保持接触的，您是不是能给我看看您的工作证，这样我可以确认您的身份。可否抄下您的地址？”我问他。

“不必看我的工作证，我把地址抄给您。”我要求看他工作证，令他感到很窘。

“如果您要我信任您的话，必须给我看看您的工作证。”我坚持说。

他很不情愿地拿出工作证递给我，我戴上老花镜，审视一番。发证单位是一个工厂，工厂没有名字只有数字代号，在中国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工厂都从属于军队，工作证上还盖有“保密”字样的骑缝章，看来他是在一个兵工厂做保密工作的技术员。

在监禁期间，我抱有绝大戒心的是，我从未与任何一个了解政府机密的人交往，与在军队工厂里干保密工作的人有接触，不仅会使我离开中国的愿望不能实现，而且也会为一切强加于我的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方便之门。

我打开房间门叫阿姨，她来后我对她说：“我想请你来作个证明，证明我对我的客人要说些什么。”

我转过身来，将他的工作证还给他并说道：“刘兴，我不允许你再来看我，我是有‘海外关系’的，而且还被错认为是帝国主义特务，作为一个保密工厂的科学工作者，你来看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回工厂以后，必须立即向你们的党委书记汇报，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一定要原原本本地向他汇报你对我说了些什么，以及我对你说了些什么。”他只

是站着，显得很尴尬。

“阿姨，这可是件严重的事件，你不能再对这个年青人敞开大门让他进这座房子。”

我将房门洞开又对刘兴说：“由于你是作保密工作的，我猜想你一定是一个党员，令我惊奇的是你对这些事情都不懂，我要向公安局报告，现在请走吧！不要再来。”

他一言不发地走了，我发觉他的那盒人参还留在桌子上。我让阿姨去还给他，但他已经骑着自行车走得无踪无影了。

我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很愤慨，我的出走计划要遭到破坏。阿姨给我送来一杯茶，并说道：“不要生气，这不值得。”

过了一会儿，达德莽莽撞撞地上楼来，气喘吁吁地说：“喔，您在家，这太好了！”

“你知道我在家里很好？”我对他说。

“出了什么事？你在生什么气？”他佯装很奇怪。

“你完全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把那盒人参递给他并说道：“把它拿回去，告诉他们收起这套愚蠢的把戏。”

“您如果不想要的话，我都可以拿走，但我不会去告诉任何人停止他们愚蠢的把戏的。为什么我要去告知呢？为什么不让人们玩弄把戏呢？为什么不大笑一场呢？为什么要害怕这种把戏呢？你难道没有这点涵养？揭穿这些把戏，使那些人做起来不舒坦。”达德带着冷嘲热讽的语调说。

“这太不光彩了。”我说。

“为什么要认为任何人都是诚实的呢，你已历尽沧桑，你应该知道诚实只是自杀。我们这个时代，不诚实就是最

好的策略。”

“请走吧，达德！我还没有发疯，我不想听你的胡扯。”
我告诉他。

“我只是想要让你振奋起来，好吧，明天待你好些了我再来。”他走了，把那盒人参也带走了。我完全不敢肯定他是否会物归原主。我下意识地感到：他会把人参拿回家重新把它当作礼品送给他的母亲。达德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十六章 毛泽东之死

刘兴的来访不是孤立的事件，在他之后又陆续有许多来访者都声称是我女儿的朋友。只有很少几个，我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中没有一个文化革命前在我们家里见到过。他们总不是一起来，一次来一个。有的晚上来，大部分时间谈有关梅萍的死，我预感到又将是一个睡眠不足的夜晚。

“阿姨，你能不能记住，不要再对这么多人敞开大门，尽管他们都声称是我女儿的朋友。他们所有人谈论的总是她一定是死在谋杀者手里，我应该如何为她复仇等等。日复一日，都是一样的内容，我听得实在有点厌烦了。”

“只要我还呆在这儿，我就不得不去开门，我也知道，这么多人来访使您心烦，你跟他们谈话之后，看上去总不太舒服。但是我又有办法呢？我想，你最好还是把我解雇算了，你已能很好地照料自己。”她说，显得有点不快。

“你能找到工作？”我问她。

“坦白说，我还是喜欢与你在一起，我大概不可能找到另外的工作，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她说。

我并不想解雇她，但她显然已被告知要接纳所有的来访者，只要她在这儿一天，她就不能拒绝开门。我必须另想别法。

“如果我替你付房租，你能找到住的地方吗？”我问她。在上海住房短缺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我有个表姐，新近守寡，她可以接纳我，房租我们一起分摊，你是不是想让我睡到外面去？”

“太好了，就这样办吧。你去与表姐一起住，只要早晨来一下就可以了，我付给你同样的工资和房租，怎么样？”

“这样安排很好。下午和晚上你可以清静些，如果你不去开门的话，谁也不能怪罪我。”她很高兴地说。

那个周末，阿姨与她表姐作了安排就搬过去住了。我取了块硬纸板，包了张红纸，用绳子扎好，然后在中间贴了张白纸，四周留了条红边。在白纸上我写了以下几句话：“由于年事已高，健康不佳，需要休息。所有来访，如未事先约定，一概谢绝。政府代表，一应公事，随时恭候。”我署上自己的名字，用一条红丝带把这告示牌挂在楼梯口门外，把门上了锁。

第二天早晨，当我打开门去花园时，见到我那块精心制作的告示牌被撕碎了，扔在地上。周太太正在平台上，我捡起碎片质问道：“是你家什么人把我的牌子撕碎的？”我问她。

“喔，不，不会的。我们从来不走近这房门，你知道，每当我上楼来看你，总是从后楼梯上来的。”

她那个待业的儿子也走出来表示支持他母亲的说法，

“一定是昨天晚上有人翻墙进来，我们晾在平台上晾衣绳上的两件衬衣也丢了。”

“有好几家邻居也有失窃的情况，你忘了。在上次学习小组会上，支部书记还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呢？”周太太插话道。

我根本不相信有小偷翻墙而入，于是我问他们：“你们丢了东西是否报告了派出所？”

“没有，”周太太的儿子瞥了他母亲一眼，接着说，“但是我们肯定要去报告的。”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告。”我说，瞥了一眼手表，已经八点敲过了。

“不麻烦你了，等会我就去。”周太太的儿子说。

“我现在就去。”我说。

我拿着碎片朝街头的派出所走去，我想，我有兴趣要弄个明白，究竟警察有没有介入纠纷。如果派出所插手了，我们这地段的警察老李就知道内情，通过见面时留意观察他的反应，我就可窥知一二。

街道派出所设在过去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商人的私人住宅里。这个商人在共产党接管前就逃到香港去了，这幢房子是这地段最大的一幢房子，有一座非常吸引人的花园，我踏上台阶走进房里。很大的房间被隔成许多小间，在前面一间，有两个穿着制服的一男一女坐在柜台后面，房间四周散放着几张桌子和板凳，有个年纪大些的男子，手里拿着户口簿，在为从外地回家的儿子登记户口。

我站在柜台边上等着，直到那位女民警问我：“你有什

么事？”

“我是太原路1号的居民，我来找老李同志，他是负责我们地段的。”我回答说。

“是他叫你来的吗？”

“不，昨晚发生了一些事，我是来向他报告的。”

“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参加学习小组会议，改个时间再来吧。”她说。

“我可以等他一会。”

“可能要很长时间，有时要开一个上午。”

为了不再耽搁，我说：“如果允许的话，等一会我倒没关系。”

她不再说什么，我就在一张板凳上坐下了。不时有人来办出生、死亡、来客和离去的登记。我观望着户籍民警的日常工作，不时抬头看看墙上的钟。那天上午，时针似乎走得特别慢，但我还是决心要见到老李。十一点刚敲过，里间的门打开了，一个穿制服的男人走出来。

“告诉老李，这儿有个太原路来的居民要找他。”那个女民警对他说。

这人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老李走了出来。他长得很魁梧，举止随便。与其他大多数民警不一样，在他脸上见不到横眉竖眼的样子。从他举止看不出对我有什么反感。我确实比较喜欢老李，而且视他为一个踏实、正派的人。在平凡的外表后面，他是很机敏、聪慧的。有限的几次到我寓所访视，他总是彬彬有礼。我知道他只要匆匆看一眼房间，就能知道个大概。显然他与那些在人民共和国刚成

立后出生的年青的警察们是大不相同的，那些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我的居室，在我的地毯上吐唾沫。

老李进来时，我站起身以示敬意，他让我坐下，自己在桌子对面找了个位子坐下。

“我住在太原路1号。”我作了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老李有点不耐烦，瞥了一眼钟：“你来找我有何事吗？”

“我是来向您报告，昨天晚上有个小偷翻墙进了我们住所。”

“丢了什么东西了？”

“楼下周家说他们丢了两件衬衣。我只是这块牌子给撕毁了。”我把告示牌的碎片放在桌上。老李把碎片拼在一起，一边念，渐渐眉头紧锁。

“这是什么意思？你干什么要这样写？”他看来真有点迷惑不解。我发觉他确实不知道来访者如流的情况。作为一个部门，派出所并没有插手骚扰我，但我还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背后有个别官员参与，最有可能的是那些在文化革命中爬上去的毛主义革命造反派。整个1970年，中国每一个政府部门，毛派的革命造反派和官复原职的老干部一起共存，他们互相敌视，互不合作，因此往往一事无成。已经是老牛破车式的机构显得更加臃肿不堪。文化革命中推上领导岗位的造反派决定的事，复职的老干部往往对此一无所知。那些被复职的老干部于文化革命中丢官去职时丧失的全部权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大多数情况下，复职的干部虽说已经重新被封上了原来所有的头衔，但他们

只是一尊偶像而已，革命造反派仍我行我素，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有许多声称是我女儿的朋友的人整天来找我，来谈论她的死，我实在疲于应付。我已是老太婆了，动过大手术，我需要休息。”我告诉他，他点着头，若有所思。

“为什么小偷要撕毁这种东西呢？”老李指着桌上的碎片问我。“这不象是小偷干的。”

“周家说这是小偷干的。”我对他说。

“好吧，今天下午我会去找周家谈谈的。”

对他表示感谢后，我就回家去了。

看来，老李对我宾客如云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我肯定谁在幕后策划骚扰我之后，忽萌发一股勇气。老李并没有禁止我挂告示牌，这样我决定另做一个，再挂上去。

我回去后，阿姨已经来了。我告诉她我刚才去了什么地方，并给她看这些碎片。她说：“这一定是周家撕的，根本就没有小偷翻墙而入，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谎话。”

“为什么周家要这样做呢？”

“一定是有人叫他们干的。”她悄声回答，似乎有些害怕，虽然谁也不可能听到我们的谈话。

“是谁指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问她。

“谁知道呢？”她说。但我认为她是知道的。

从此，我有了平静的下午。第二块牌子做好后，没有再被弄坏。闭门谢客，没有人再上门来了。

第二天，阿姨走了之后我的决心受到了一次考验，何

安的母亲上门来了。我想，她见到告示之后就会走的，但是她没有走，相反一边敲门一边呼唤我的名字，对老朋友也漠然置之，这使我为难，但我必须这样。她又叫了几声就走了。

又过了一天，我外甥女带她的孩子一起来玩，她是我死去的姐姐的女儿。文化革命开始时，她还是个少女，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受到很粗暴的待遇，结果，她变得非常胆小怕事，神经过敏，生怕得罪了革命造反派。因为我曾进过看守所，她难得来看我。春节也要我派阿姨去请才会来。因此，我很奇怪会是她在门外叫我，但我只能漠然置之，过了一会儿，她也只好走了。

我怀疑何安的母亲和我的外甥女都是被派来试探我的决心的。但我不能肯定，我决定去看看我的老朋友。

待我向何安的母亲解释了为什么我不能给她开门的原因后，我问她：“你看到我们门上的告示了吗？”

“看到了，但是……”她有点吞吞吐吐，对着我不知所云。

她无法说出是有人叫她来的，她感到为难，多半也有点害怕，怕我会无意中说给什么人听。她低沉着头，看来异常难堪。

过了一会儿，她说道：“能允许人家来看望你是不是更好些呢？你可以常服些安眠药。为什么要有抵触情绪呢？难道你不害怕？”

“不，很难说清楚，我并不是害怕。我们必须反抗，否则我会因激怒和受挫而死。”我告诉她。就在说话的时候，

我胸中升起一股怒火，因女儿的死，我痛恨毛主义者，千万倍于我在看守所时的感情，抵触与反抗他们的意志至少可给我些安慰。

何安的母亲对我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你知道我是非常爱你的。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所言所行，不要超出一般的言行标准，生活在现时环境下，我们不可能总是我行我素。”

“喔，是的，你不必担心，我完全清楚。”说完我就告辞了。

她陪我一起到街上：“我会对其他人说，我病得很重无法来看你，你不介意吧？我确实有严重的心脏病，这你是知道的。”

“当然可以，不能见到你，我会很伤心的，但是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不想使你处于难堪的境地。”

“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我，希望这样的情况不会很久，请多加保重。”她说完如释重负。

我仍然固执地把任何没有预先约好在下午来看我的人拒之于门外。达德从不跟我谈起告示牌的事情，他总是小心从事。想要在下午来看我时，他总事先与我约定。二个星期之后，来访者都绝迹了。

可是，对我的骚扰却并没有停止，只是从我的房里转移到街上。一天，我散完步回家，突然有一群小学生对着我齐声嚷道：“特务，帝国主义特务！帝国主义走狗！”

我不理他们，自顾自走着。有两个胆大一点挡住我的去路，对着我大叫大嚷。我不能与这些孩子斗气；把他们

推开，于是我停下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跟我来，我们一起谈谈。”

他们一下都逃散了。我到居委会去诉说这种情况，他们对我说，除非我能说出这些孩子的名字，否则他们也无能为力。

如此日复一日，这些孩子几乎就象在那儿等着羞辱我。我一次次变换散步的时间，也没有用。他们总是在那儿。此外，不远处总有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人，等孩子们一开始叫嚷，他就骑上车子消失了。

虽然这些孩子很叫人讨厌，那些过路人对我也侧目而视，但我仍没有取消每天的散步，只是不理睬这些孩子们，自顾自散步，只当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

半个月之后，阿姨发现有人用粉笔在我们前门口写着“这儿住着一个狂妄自大的帝国主义的特务。”她气愤之极，要用湿抹布去擦掉它。

“阿姨，不用去管它。”我对她说。

“这太欺负人了。”她说，“走过我家大门口的路人会怎么想呢？”

“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事至今日，对这种情况大家都司空见惯。文化革命开始的几年，不知有多少人家的门上写着这样的东西。”

下午，在惯常的时间我出门去，看见又是那个男人推着辆自行车，在对面人行道上。他离我很近，能看清他三十岁左右，一头浓密蓬乱的黑发，还注意到他自行车座垫套子是鲜明的黄色。他看见我出来，跨上自行车就走了，

我关上前门，没有在意门上的粉笔字，就去散步了。

几天之后，一场倾盆大雨把大门上的粉笔字冲洗得毫无踪迹。以后，孩子们渐渐厌倦这种游戏。最有意思的是达德，他不会对我写在我前门上的字句视而不见，但他照样来上课，对此毫不介意。

我很高兴有了几天平静的时光。1975年3月27日是我从第一看守所释放二周年。我坐在阳台上，在春日和煦的阳光下编织着毛衣，读读唐诗，度过了一个宁静的日子。下午，想起了在我的那个小小的囚室里所度过的岁月，回忆起那特别的看守，不断的审讯，我又仿佛感到我曾经顽强地忍受着的饥寒交迫和严刑拷打的痛楚。望着手腕上留下的深深的疤痕，将永远留着，直至我死。虽然，我看来不会再被投进牢房，但绝不意味着反抗迫害的斗争可以停止。我的敌人还在我的周围徘徊着，我还必须时时保持警觉。

外出对我来说已变得十分沉闷不快，于是我取消了下午外出散步的习惯。以后两天，持续持续下着濛濛细雨，天一放晴，我很想活动活动。

“今天你出去散步吗？天气真好！”阿姨走来问我。

“喔，是的，今天当然应该出去走走。”我告诉她。

“那把旧拖畚已坏了，你是否可以去杂品店用旧拖把柄去换一把新的拖畚？”

“一定要把旧拖畚柄带去吗？”

“是的。拖畚柄现在奇缺，假如不带旧拖畚柄去，就不给你做新的。”

与经常一样，三点钟我带着拖畚柄动身去合作商店，有几个邻居家的妇女在那儿做临时工，挣些外快。我没有注意到有谁在尾随着我。当走下人行道准备过车辆繁忙的马路时，突然不知什么东西从我背后向我沉重的一击，把我撞倒了，仰面朝天正好摔倒在公共汽车车道上，只听一声尖锐的刹车声，有人过来把我拖到路边。公共汽车慢慢地碾压过去，把我的拖畚柄也压断了。售票员从窗口探出头来嚷道：“怎么不看看清楚，怎么走路的？你想找死啊！”随后，汽车又慢慢发动起来，扬长而去。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快，如此意外。我都糊涂了，心狂奔乱跳，两膝不住地发抖。

“是一辆自行车撞了你，那人没有停车。”救我的那人说。

“你救了我的命，怎么来感谢你呢？”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听起来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不，不用谢。幸亏公共汽车及时刹车。你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有没有骨折。”这个好心人说。

“我想没有关系，只是一场虚惊。请你陪我去一次，我要谢谢你，送你一些礼物，这是我的一片诚意。另外，你是不是能陪我去派出所报告这件事情。”我说。

“你没有抓住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民警是无能为力的。另外，我现在要去参加一个会。”

“你看清楚那个撞我的人吗？”

“没看清楚，但我注意到他的自行车座垫颜色很鲜明。”

“是不是鲜黄色的座垫套？”

“他坐在座垫上，我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我眼前一闪。”

“他是不是长着一头又浓又密的黑发？”

“是的，你认识他？”那人问我，“他是你的仇人？”

“不，我不认识他，但我过去见过他。”

“好吧，我要去参加会议了。你还是小心些为好，他是故意撞你的。路上很空，完全可以避开。出事后他又很快骑车逃走了。”

我一再向那人表示感谢，他随即消失在人群中。

我支撑着回到家里，吃了两片阿斯匹林就上床了。这时只有四点多一点，睡了约一个小时，醒来发觉整个身子僵直象块木板，只感到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动弹。我艰难地挨下床去，到洗澡间，我想用热水洗个澡可能有好处。但是阿姨不在，我无法准备洗澡水。

夜显得特别长，我辗转难眠。终于挨到早晨阿姨来了，服侍我在床上吃了早饭，听到我遭致的不幸，她非常难过。她猜想一定是有人故意撞我的，而且感到她自己也有责任，因为是她让我去那儿的，整个上午她都强忍着悲痛。

阿姨在为我准备洗澡水，我躺在床上读着唐诗。突然我想起吴先生说过，那天下午晚些时间他要来看我。虽然我最好还是躺着，但还是不得不起来，整理了下房间，那时我已没有办法通知他不要来。经过红卫兵的革命行动，那时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有私人电话，要打电话就必须用公用电话，管电话的人记录下打来的人的电话号码，而且还

可以旁听所有的通话。管电话的人如不在的话，电话就常常锁上不能使用。

吴先生四点钟来了，我给他沏了茶，给了些饼干，这是阿姨在厨房里已经做好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了，差点被公共汽车压死。我原想他会对我表示同情，告诫我要当心或者可能只是表示遗憾。谁知他带着非常严肃的神情盯着我并说道：“让我来照料您吧！如果您允许我来陪伴您的话，我将万分荣幸。”他显得神情紧张，语无伦次。

他的意思是否是向我求婚？我不敢肯定。我沉浸在周围发生的一切之中。他激动地抓住我，对我的沉默感到难以为情。

他急忙又说道：“您认为结婚只是年青人的事吗？我冒昧的请求可能使您感到吃惊？”

“喔，不，完全不是这样，我认为老人完全可以考虑结婚。我敢肯定，能作您的妻子肯定会使许多女人感到自豪和幸福。对我来说，虽然非常感激您，对您的请求我受宠若惊。但我曾对先夫许下誓愿，将永远做个郑太太，直至我生命终结。”

他充满友爱的脸上渐渐漾起深沉的笑容，把我的手握在他手中，不无惋惜地说：“我不会再了解其他女人，我将等待……。但是请不要为我担心！我应该尊重您的意志，对您的丈夫忠贞不渝。对他我始终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感情，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轻轻捏了我一下，随后就松开了手。

令人局促不安的一瞬间过去了。我没有直截了当地回

绝，使吴先生丢脸，这不是中国人的方式。

那天下午之后，吴先生仍然经常来看我。他总是很讨人喜欢，也很殷勤周到，只是来访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最后恢复到与过去一样，只在春节期间来看我。1978年，他特意赶来告诉我，他已平反并恢复了原来的职务，担任工厂的副经理和总工程师。他整天忙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以来积留的问题并努力恢复生产。

“我一天要干十六个小时。我希望能再年轻一些，再多做一些。有这么多事情要做，有这么多东西要学，我已经大大落伍了。”他说道，看上去欣喜异常，似乎比他实际年龄猛减去十岁。

1980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之际写了封信给他向他告别，他立即赶来看我，并告诉我他一直认为我希望离开中国。但我并不认为吴先生真正了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以我这样的高龄，在陌生的国度开始我新的生活，而不是留在自己的故土，建立一个圆满的家庭，安居乐业。

在六十岁年纪，能得到一个值得尊敬的男子的求婚，对我来说，虽未如愿以偿，也很感高兴。第二天早晨，达德来上课时，尽管我手和脚还很痛，但心境很好。

我没有锁门，刚吃完早饭就听见他通通通的脚步声上楼来了。我看了看钟，达德早到了二十分钟。

“今天你来得早了。”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对他说。

“我有件令人激动的事想告诉你。”他笑嘻嘻地走进房间，“不用太久，我可能就要去北京了。”

“真的，你已经找到工作了？”我问他。

“还没有，但是我可能会有一个了不起的机会。”他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想要一杯茶和一片面包吗？”我知道达德总是饿着肚子来的，就问道。

“来几片面包，太好了。”他走进厨房，回来时拿了整整四片面包，一转眼功夫就吃光了，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没有吃过早饭，但我没有问他。

达德从书包里拿出一本书并问我，“你认为我们今天还要学习吗？”

我见这本书是埃米莉·波斯特写的《礼节》。“你为什么想要学习这个呢？这书的内容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但是，要派驻国外做外交官的中国人必须除外。”

“我明白了，”我说。“这就是你的令人激动的新闻？是因这个原因你要去北京？要去外交学院受训当一名外交官？如果真是如此，值得庆幸！”

阿姨一到立刻就到我房间里来了。“今天你好一些了吧？”她焦急地问道，“身上还痛吗？”

“谢谢，阿姨，我好多了。”

她擦了桌子就离开了房间。达德问我：“你生病了？”

“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了，差一点被公共汽车压过，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我说。

达德脸胀得通红，气愤地说：“我怎么会知道呢？你认为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令人不快的事情都有我在背后策

划吗？”

“不，我并不认为你是他们的后台，这似乎太抬高了
你。”我对他说。达德第一次显得犹疑不决，似乎感到羞愧。
因为我了解他从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确实认为你是知
情的，有人经常会把情况告诉你。无论谁是所有这一切事
情的幕后策划者，都将信任你。”

“你不明白，你认为人们都是无拘无束的，其实不然，
世界并没有被分成好人和坏人两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好
人经常会被迫做坏事，而坏人也可能做好事。你从不知道
我为你所做的一切，这没有关系，我只想说不是一块石
头。你待我很好，我觉得，除了母亲外，你对我的一片好
意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好。难道你认为我会指使什么人
用自行车把你撞倒，让公共汽车把你压死？”达德用有些异
样的声调说。

“我的天！你已经被我同化了。假如你不知道就有问
题了。你如不再受到信任，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不是
吗？”我带点挖苦地说。

达德问道：“你敢肯定这不是意外事故？”

“路上很空，他完全可以不撞上我。公共汽车恰好
在这个时候驶来，可能是个巧合。”

从达德的表情，我认为他知道那人是谁，犹豫片刻，
达德说：“假如向你提些微忠告，你不会生气吧？”

“请说吧！”我说，一边仰靠在椅子上，洗耳恭听。

“你是否发觉有些身居要职的人看不惯你我行我素的
脾气，他们认为你藐视他们。这些人希望人们害怕他们，

尊敬他们，对他们奉若神明。但他们认为你嘲笑他们。为什么不能将你的这种轻侮态度稍有收敛呢？有时，做到这点还是容易的。”

“我怎样才能‘容易地做到这点’呢？”我问达德。

“对一些事情要处之漠然。请不要生气，看看你挂在门外的那块告示，在中国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在英国，可能一个人的居室是他个人的城堡，但在中国则不行。你不许别人随时随地来看你，并在下午打发阿姨出去，人们自然就要奇怪，你究竟在忙些什么？你是否知道，阿姨搬出去后，房管所就要再安排一户人家来住？”

“没有洗澡间，再搬一户人家来总不至于穿过我的卧室去洗澡间，这行吗？”我问达德。

“你对上海人如何生活实在缺乏了解。”达德说，“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多少家庭住在没有洗澡间的居室里，房管所之所以没有再安排一户人家进来，是出于特殊的考虑，这点你想必明白。”

“你使我糊涂了，为什么一方面我受到骚扰和迫害，另一方面又要给我特殊的优待呢？”我问他。

“我只能劝你不要用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形势。政府各部门有很多人有权来处理一些事情，他们不会总是认可的，尤其是目前阶段。形势非常复杂，只是请记住，有一些人觉得有负于你，他们知道你是受害者。对你女儿的死，他们深感遗憾。还是驯服些吧，政治斗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你已经受了不少苦，为什么不能再忍受些呢？”

“好吧，聪明的达德，我会照你所说尽量驯服一些。不过，这样生活就将变得索然无味。”

“不，生活不会索然无味的，会发生许多事情。”达德说。

“就象达德要去外交学院准备做个外交官一样。”我乘机换了个话题。

“我不是去外交学院受训。江青同志说过，外交部必须改组，要派一些忠于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年轻人进去。她说‘要掺沙子，搬石头’。外交部长长期以来在陈毅和周总理的控制下，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独立王国。现在无产阶级要开进去占领这块阵地。”

“到北京后，你打算直接去国外吗？”我问他。经达德提醒，我想江青是想要接管外交部。

“这我就不清楚。江青同志想在每一个驻外使馆都安排几个革命造反派，但还有阻力，这将是一场斗争。但有毛主席支持，她会达到目的的。上海提出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希望能被选上。我的英语要比名单上其他人好得多。”

“我希望你能被选上，达德，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转机，比起整天与那些革命造反派周旋，混迹其间要好得多。从我的眼光看，他们与一群流氓无异。”

达德脸又红了，但这次他没有再为他的同志申辩和试图说服我。

我们化了一上午时间一起学习了《礼节》一书的基本要点，达德离开时，怀着对美好的未来的无限期望和喜悦，

为激进派干了这么多年，他相信会得到回报的。

1975年间，新闻刊物上鼓动的批判运动就象大海潮涌一样，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甚嚣尘上。群众性的批判古代先哲孔夫子的运动刚趋平息，又有新的批判对象被提出来，激发群众的注意。毛主义就是用这种称之为“不断革命”的方式建立的，并要使这种革命热情持之以恒。

一天，上海《解放日报》，这张一共只有四版的报纸用了整整一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长文，批判由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摄制的一部描写中国生活的影片。在我们学习小组会上也念了这篇文章。安东尼奥尼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定了罪。我们之中谁也不知道安东尼奥尼其人，也不知道他来过中国还拍了部电影。何况这部影片从未在中国任何一家影院上映过，没有一个中国老百姓看过这部影片。我认真地读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转载的这篇长文和其他成篇累牍的表示支持其观点的文章。我渐渐明白了对安东尼奥尼的批判，矛头是针对允许他来中国拍这部影片的人。文章断言安东尼奥尼将其每一个镜头对准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和阴暗，是反映了这个人的反动思想。是这个人使安东尼奥尼有可能这样去做。更有甚者，这部影片还曾被一些中国驻外使馆电影招待会上放映。中国的政治运动总是从旁敲侧击、指桑骂槐逐步展开的。不久我就了解，对安东尼奥尼的攻击，真正的目标是针对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是他们允许安东尼奥尼拍这部电影，并且理所当然地要对驻外使馆的行为负有全责。

一天，除达德外的我的另一个学生告诉我，长期以来

作为江青的助手，又是政治局委员，上海的党魁张春桥说：“我们宁愿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于是，在农业领域的激进派按他的名言，宣称“我们宁愿要社会主义的歉收，也不要资本主义的丰收”。其他领域的激进分子也都不甘落后，于是“我们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准点”。在这样的气氛下，工人们都生怕多干活，农民们都懒于种田，火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甚至赶大车的车把式都随心所欲地放慢速度，以便能“社会主义的误点”。已经很脆弱的经济，又陷入困境。通过控制的舆论工具和在社会文化大革命期间日益发展起来的激进组织的传播流言蜚语的网，毛主义的领导者们，成功地破坏了邓小平他们将中国经济恢复到原先水平的一切努力。

报纸上醒目的标题，广播喇叭里每天反复喧嚷的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激进派指的“文化大革命的案”，就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受到批判，但是这个铁案由于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已被翻了过来。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任何不合激进派口味的事情都被扣上“试图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名。他们利用这个口号阻止任何进一步解放老干部的努力。中国人民又重新过上俯首贴耳，蹑手蹑脚，提心吊胆，唯唯诺诺的生活。

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的进程是周恩来总理的首要目标，并且已被人民代表大会所采纳。不顾激进派的宣传攻势，邓小平为了继续努力使中国的生活正常化和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又重新恢复高考制度。但是按照毛的思想，参加高考的考生

必须首先在工厂或农村公社劳动锻炼。作为对于邓恢复高考制度的回答，激进派大力宣扬一个名叫张铁生的青年英雄，他是从辽宁省被发现的，由毛的侄子毛远新一手提拔。据新闻报道，张铁生考试时交了一张白卷，在考卷背面写了一段短文批判“过去的走资派”企图将中国拉回到文化革命前去的努力。他斩钉截铁地宣称“我们必须迎头痛击右倾翻案风”。

张铁生成了英雄，激进派领导人鼓动中国的年青人起而仿效之。他被派去全国各地游说，告诫人民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何等重要。由于毛泽东的侄子，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是江青的亲密伙伴，中国人民立即明白了张铁生玩的整出把戏是由激进派领导导演的，这个年青人只是秉承他们的意旨行事。

就象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一样，看书学习等等又重新遭到禁止，除达德外我仅有的另一个学生，是一个软弱的女孩子，她被吓坏了。我让她就在自己家里学习，经常来我这儿作客，这样我就可以帮她批改作业。我又告诉达德不要再定期到我这儿来上课。

一天傍晚，我正在花园里趁霜降前给月季花最后一次剪枝，周太太那个有工作的儿子正在前门送客人。他回来时问我，是否可跟我说几句话。我请他上楼来谈。

“你看到刚走的那个人了吧？他是王洪文副主席的好朋友。1967年1月王洪文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打倒市政府和市委时，他是王的亲密副手。从那之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只要王洪文来上海，总是请他去喝酒赴宴。”

他边告诉我这些情况边留意着我的反应。

显然他渐渐想把话题引到其他方面。于是我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

“对了，王副主席邀请他去北京住些日子，他有能力来帮助你。只要在王副主席面前帮你美言几句，你的一切问题都可解决。”他说。

“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呢？”我问他。

“就拿一件事来说，你还没有完全平反吧。还有你女儿死得莫名其妙。我想你是想要为你女儿报仇雪恨的。所有这一切只要王副主席一句话就可办成。”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朋友可以让王洪文副主席来帮助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我问他。

“翻文化革命的案是不行的，但如果王副主席对什么事有兴趣的话，就不必这样提法，可以说是‘甄别’、‘平反’，或诸如此类的提法。当然，为此你只要付一些钱，但不会超出你的能力。你的钱都在人民银行里，他们知道你究竟有多少钱。你也可以付一万元这样一笔小数目，就可以得到去香港的出境签证。”这个年青人说道。

这位著名的、曾经震撼上海市政府和市委的一月革命的英雄，现任中国共产党副主席的王洪文竟腐化堕落到如此地步，真令我大吃一惊。同样我也深知，假如我陷入到这一圈套中去，会处于何等危险的境地。于是我对他笑笑，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说：“你真是太好心了。你愿意通过你的朋友给予我帮助，使我非常感谢，但是目前我没有去香港的打算。至于我的平反和我女儿的死，我寄希望于人民

政府。我想一旦时机成熟，政府就会办一切需要办的事。为我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去麻烦王洪文副主席这样重要的人物，于我深感唐突。”

“你还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已经变了？”他显得有些不耐烦和激动，说话时提高了声调大声嚷嚷，“如果你不与某个当官的有些私下的默契，政府才不会为你做任何事情！”

我望着敞开着房门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把声音放低些。随后我说：“我相信人民政府，这总不会错吧，你说呢？”

“你这样诚实，是糊涂了吧！”

他风驰电掣般地出了我房间，飞快地奔下楼梯，把扇大门碰得砰砰作响，出门去了。对于我的拒绝，断了他的财路，他感到失望和不快。我想，他提供给我的可能只是腐败堕落的一个实例，但我也不能排除这只是一个圈套。使我参与“试图翻文化革命的案”，从而再给我栽上反革命的罪名。

几天之后，达德来时我对他说起：“自从那次我带你去饭店吃饭后已经有多年未去了。”

“现在我们不必去饭馆。随便哪个饭店，名菜佳肴都从菜单上划掉了，只供应外宾。”他告诉我。

“真是太糟糕，今天我们只有卷心菜和面条，对了，我想你今天在我这儿吃午饭吧。”我知道达德最讨厌吃卷心菜和面条了，他孩提时生活贫困，每天吃这些东西糊口。

“你是不是想要我来帮你烧一顿饭。”他问我。

“菜场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我说。

“我可以通过朋友弄到东西，你喜欢吃些什么？”

“随便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并递给他三张拾元的票子。这比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还多。

第二天傍晚五点钟，达德带来了鱼、虾和一只鸡，还有一瓶绍兴黄酒和两瓶啤酒，我让阿姨留下来帮他忙。他们两个整治了好几碟美味，确是一顿丰盛的晚宴。达德喝着绍兴黄酒，吃着菜肴，舒坦地坐在我仅有的一把便椅上，后来又喝开了啤酒。

他懒洋洋地说：“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厨师吗？”

“你是个出色的厨师，我向你表示祝贺！现在你吃饱喝足了，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

“呵，我该为这顿晚宴付帐罗！你是知道的，我很乐意告诉你一切。”达德拉长了声调说。

“我想要领教一下有关目前的形势，你不必告诉我你不便说的任何事情，只是想听听你对形势的分析。”我告诉他。

“我已经对你说过，斗争已经到了严重阶段，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究竟是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争取更大胜利，还是倒退到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上去。”

“什么叫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

“邓小平在干的就是。”

“我认为宣传、打击的目标是对着周总理的。”

“周总理病了，这你是知道的。邓小平就是他的一条臂膀。问题的关键是由谁来接周总理的班，是邓小平还是张春桥？总理本人和一些老一辈领导人如陈云和叶剑英想

要让邓小平来接班。当前的运动就是要让各族人民深刻理解，如果让邓小平当总理，他就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达德对我说。

“王洪文副主席怎么样？他准备接毛主席的班？”我问达德。

“喔，不！他只是为江青同志作嫁衣裳。毛主席还健在，她就不便担任副主席，一旦毛主席逝世，她就是接班人。江青同志自己想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让张春桥做总理。”

我在心里默念，我的上帝，千万不能使之实现！但对达德我不能表示这种观点，我转而告诉他，周太太的儿子想要为我办的一些事。

“你同意他了？”达德站起来问道。

“不，贿赂政府官员是犯法的。”我对他说。

“假如你同意了的话，你将既得不到去香港的签证，又收不回你的钱。已经有许多人落入他们的圈套。”达德说道又呷了口啤酒。

“那些上当受骗的人怎么样了？他们不去上告？”

“这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自己犯了行贿罪。”达德会心地笑了，将酒一干而尽，又拿出第二瓶啤酒，开了瓶。

“做这种事真是太卑鄙了。”我说。

“不要太天真了！只要金钱还能买到吃的，穿的，用的，人们就永远想要捞钱。当然，身居高位的领导是不会受到处罚的。刑不上大夫——刑法管不到高官显贵，这是中国

的传统。你该明白！”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不能改变这种传统？”

“谁来改变？让高级干部自己来改变？好一个良好的愿望！”

达德默默地喝着第二瓶啤酒，喝完之后，他起身向我道了晚安就跌跌冲冲地向门口走去。

但是，他突然停下，漫不经心地说道：“我想你大概已经知道，周总理因患癌症在北京医院已奄奄一息。”

“这是真的？”

“是的，是真的。他一死，就从权力之争中被排除，有许多案子……。比如象上海的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的阴谋案。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大概有人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有另外一些……。随便怎么说。”他在空中挥了挥手臂：“统统都要撤消！”

“为什么只是撤消而不是甄别，平反？”我急忙问他。

达德突然象没有喝过酒似的，振作一下精神，还显得很清醒：“一旦是由高层定的罪名，就永远不会甄别、平反的，只能撤消。你不必寄希望高层人士会承认有冤假错案，或犯了错误，不是这样吗？”他没有等我回答就怡然自得地走出房门下楼去了。

望着达德的背影，我默默地站着，一时间，我被他带来的消息震惊了。我本该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所谓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的阴谋，不公正地把我也连累进去的案子要撤消了，这意味着我的烦恼可以结束了。我将开始正常的生活，但是，所有这一切又使我感到茫然。我想起我那

虚掷的时光和我女儿的无辜遇害。就在这同一时刻，达德所说的消息增强了我离开中国寻求美好生活的决心。我知道，如果案子只是“撤消”，而不是甄别，平反，那末一旦政治气候适宜，又会旧事重提。因为定冤案的是毛主义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绝不会承认错误，于是象我这样的无辜的人们，其余生就必须在一片黑暗之中度过。

1975年谣言纷起，使人无所适从，有人说毛泽东到医院去探望周恩来。传小道消息的人说，当周提议让邓小平接替他总理的职位时，毛装作没听见周微弱的声音。另外有人告诉我，毛和周两人都快要不行了，江青和她同伙希望周先死，于是他们不给周作治疗，想促使他早些死去。还有人说，江青和毛的侄子毛远新已经完全把毛和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隔离了，不让他们见到毛。传闻都绘声绘色，据说是从政治局一些决策人物包括毛派和非毛派人物中传出来的。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了，从1949年起，他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共产党领袖人物，富有传奇色彩。对中国人民来说，他的高风亮节同历史上和传说中极少的几位辅宰名相一样，虽然对于毛的灾难性的政治运动如大跃进和文化革命，他往往只是起着调和作用而不是公开反对，但长期深受运动之苦的中国人民，却把这视作“明智”之举。他们只是暗暗庆幸，只要周恩来在，就有一线光明的未来。由于周不屈不挠而豁达大度，机敏过人而不闪烁其词，许多见到过他的人都认为他不象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事实上，

如认真地审视他的一生和言行，从他所作出的决定，已发表的言论和著作，都证明从他年轻时加入共产党起就已决心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且从未动摇过这一理想。他与激进派的区别仅仅在于，他相信在国外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外国资本可以为其达到终极的目标所用。

在中国，道听途说的消息比报纸传播的快得多，即使是最简单的报道，如没有几个官僚的首肯，就绝不会见诸报端。一个心脏病专家被紧急召回总理病榻边，地方官员不同寻常地会集，某个重要的活动被取消了，由一个下级官员来代替接听电话，等等，种种迹象都告诉人民，总理已经去世了。当上海的《解放日报》终于披露了这一消息时，群众想要了解的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报纸如何来报道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这往往反映了北京方面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阿姨气喘吁吁地上楼奔进我房间，手臂上还挂着菜篮子：“周总理去世了！”她喊出声来。

她递给我一块黑纱，继续说道：“我设法弄到黑纱。布店门市部都几乎卖完了。有谣言说，上海市革会不让群众为周总理佩黑纱，他们不再供应更多的黑纱。大家听到这个消息都涌到布店，抢购黑纱。”

应我们地区党员的要求，居民委员会组织了纪念周总理的追悼会，会场里布置了居民们制作的花圈，上面的花全是用各种颜色的手帕做成，因为商店里彩色皱纹纸都卖完了，上海市革委会又不准增加供应。卢英的儿子帮我们这一小组送的花圈用稻草编了个圈框，我和周太太提供花

圈上用的冬青树叶。

追悼会开得很成功。一个卧床不起的老妇人让人用椅子抬来，还有一些老人都是由他们的孙儿们搀扶着赶来。人们都是自觉自愿的，感情是真诚的。许多人失声痛哭，用颤抖的声调念诵的悼词，充满了真情实感。仪式很简单但十分感人。这是我第一次出席这样的会议，会议的出席者都是自觉自愿来的，而不是由谁指派的。

那天晚上，梅萍的朋友孔来看我，并告诉我从电影制片厂得来的有关周总理去世的一些新闻。他说，那天上午有个与激进派很接近的人刚从北京回来，那人说，刚听到周恩来的死讯，江青就不禁声称：“至今为止我一直被禁锢在牢笼之中，现在我可以大声疾呼了。”

“我觉得从文化革命开始，她一直在到处发表讲话，你怎么看江青的这番话？”我问他。

“天知道她还要说些什么，除非让她实现成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野心，”孔说，“整个国家已谣传四起，从安排谋杀邓小平到全面内战。”

“我想很快就会宣布周总理的继任者吧？”我问他。

“迟迟不宣布就意味着斗争仍在进行中。上海正在筹划派一个代表团向政治局请愿，让张春桥接任。据说一些接近张春桥的人都已准备好了标语，旗帜，一旦正式宣布张春桥接任，就亮出来，他们认为将获胜。”

“邓小平怎么样了？目前他还是第一副总理呀。”我说。

“当然老一辈领导人都支持他。”孔说。

“在这场斗争中，军队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是的，叶剑英是军委的头头，不过听说有几个军区司令倾向江青及其一伙。”

以后几天，受激进派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仅仅腾出极少篇幅报道了中央委员会追悼周恩来大会及周恩来逝世的有关消息。直到为周送葬的纪录片在全市各大影院放映上海的人民群众才看到首都人民是怎样排着长队等候在北京医院外面，那儿停放着周的遗体，人们要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有一百万群众冒着北国一月刺骨的寒风，站立道路的两旁默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场，摄影机镜头记录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些还是怀抱着婴儿的妇女，一个个都哀痛悲切，望眼欲穿，喃喃地祝祷。摄影机镜头无法记录下所有的感人场面。

北京人民群众不顾天气严寒，在寒风中肃立目送周恩来的灵车缓缓驶过。这无疑是在向激进派发出这样的信息，人民群众鄙视他们，是他们害死了周恩来。电影结尾是一架飞机在大地上空飞翔，上海人民才知道，周恩来的遗愿是将他的骨灰撒遍祖国的江河山峦。周不愿在专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建造的八宝山公墓占一穴之地，使得传说纷纭。有的说激进派已谋划要亵渎他的墓穴，有的说周本人不愿与康生和谢富治这两个江青的同伙同流合污。

周恩来死后，江青变得异常活跃，不断地在公众场合露面。对走资派试图翻文化革命案的批判运动仍在继续。同时由激进派控制的出版物成篇累牍地刊登吹捧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女皇帝的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宣扬汉朝的吕后（公元前241～前180）和唐朝的武则天（公元624～705）。

这两人都在丈夫死后继承皇位。把她们当政的时代描绘成一派昌平盛世，以证明女性统治者的德政。对于江青为篡权接毛的班所作的舆论准备，中国人民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拭目以待。为了表达内心的不满和蔑视，人们到处传播关于江青腐化、糜烂、堕落的生活的小道消息，随意地添油加醋，凭空想象。一次，在居委会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派出所干部告诫我们，不许传播有关领导人的谣言，如果听到这些谣言必须报告派出所。虽然他没有提到任何领导人的名字，每个人都知道谣言大都由江青而起，也是她在企图阻止谣言的流传。

农历三月清明节一般在阳历四月上旬，中国人的传统都要为祖先上坟以寄托哀思。自从1949年共产党接管后，清明节成了悼念先烈的日子，那天要组织学生去革命烈士陵园敬献花圈。1976年清明节前几天，人们都涌向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给周恩来的花圈和鲜花。孩子们将一朵朵白色的纸花，结在纪念碑四周的冬青树树枝上，以寄托对“周爷爷”的哀思。

周恩来没有子嗣，在中国这被认为是极大的不幸。有人说，中国人民也都相信，当有人提议让周再娶个年青的妻子，为她生个孩子，周拒绝了。并说：“所有的中国儿童都是我的孩子。”为此，中国人民赞颂周恩来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与此相反，其他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革命胜利后就抛弃了原来的妻子，在城里另外找了年青女子为妻。

花圈堆积如山，北京城内外还有成千上万个花圈从工厂，从人民公社不断送来。工人和农民排着庄严肃穆的队

伍，怀着哀痛和敬仰的心情追念周恩来。男女老少向已故总理庄严宣誓。人民英雄纪念碑层层台阶和周围都摆满了花圈，人们久久不愿离去。许多人长途跋涉赶来瞻仰这一情景。有人在高声朗读献给周恩来的诗篇和誓言，有时还用自己制作的扩音喇叭。许多人在聆听，许多人在抄写贴在花圈和花丛中的诗词和祭文。许多孩子在冬青树上结上一朵雪白的花朵，把冬青树都完全覆盖了。清明这一天估计就有几十万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各种仪式，表示将忠于周恩来及其为之献身的事业。青年们慷慨陈词，要完成周恩来未竟的事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振兴中华。花圈仍源源不断地几乎有铺天盖地之势送到广场。献给周的诗词除了对这位前总理的一片颂扬之词，渐渐地，越来越多地将激进派领导人和已故的总理进行对比，并表示担心中国的政权将落入谁人之手。

这样的示威活动逐渐波及其他城市，开往首都的列车都带着花圈和诗词来到北京，车厢外面刷满了反对激进派的标语口号，列车乘务员都不愿洗刷这些醒目的标语口号。于是，到达北京站的每列列车都成了反对激进派领导人的活动宣传栏。

这种群众性的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很快发展成反对激进派包括毛泽东本人的群众示威，虽然没有提到毛的名字，但将他比作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历史上秦始皇是个残暴的统治者，焚书坑儒，阻碍中国文化的发展。诗词的字句不再隐晦曲折，锋芒直接指向江青及其一伙。天安门广场成了北京青年必到之地，他们不再仅仅安于抄抄诗词

和静听别人的念诵，而是大胆地嘲笑激进派，发表反对他们的演说。

这种情况在共产主义中国是前所未闻的。过去所有的示威都是由政府组织用来表示对官方政策的支持。在极少数情况下，中国人在外国使馆外进行示威活动，也总是在政府直接指挥下进行。文化革命期间，除了在一个短时期内，事态一度失控。即使红卫兵也是由毛主义的党的积极分子控制的。激进派领导人一直警觉地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事态发展，最后决定采取行动。在四月五日生死攸关的夜晚，北京市长、江青的亲信命令北京民兵包围了天安门地区。由江青一伙控制的警察和民兵部队带着棍棒和手枪开进广场，将群众驱离人民英雄纪念碑。群众被驱散后，部队就开火了。他们搜抄诗词，上交书记处，谴责这是反革命宣传，罪该万死。天安门广场被封锁了。北京清洁工人化了整整二天时间冲洗遍地的血污、搬运尸体。

事后好久我才知道，毛泽东已病得很重，江和毛远新作为毛与政治局的联络员告诉他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声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是企图打倒毛泽东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声称邓是走资派，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在这紧要关头，毛口授了指示，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要求政治局通过罢免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并指定政治局较年轻的委员华国锋出任总理和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实际上已指定华国锋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病重年高，近乎奄奄一息，毛还是敏锐地感到，假如指定张春桥做总理的话，国家就将陷入一场内战之中，

共产党将不可避免地分裂。

华国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他的家乡山西作为一个游击队战士的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对中国人民来说，他比较不为人熟悉，经历也不突出。文化革命前不久，他被任命为毛的家乡湖南省的省委书记。文化革命开始时，他也被作为“走资派”受到批判，但由于发现他维护毛的个人崇拜，并且在毛的亲属生活的县分搞水利建设取得成功，很快他就复职了。华的无可争议的个人品格，使他成了激进派和老一辈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人物，作为一种妥协，他被选中了。显然毛认为由华掌权，他本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就万无一失。

政治局决议很快就通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第二天就见报。通过居民委员会学习小组会议，人民群众都知道了。天安门广场事件被定性为企图制造混乱的反革命事件。此后，官办报刊杂志不再提及这一事件，但是有关这次大屠杀的怵目惊心的详细材料通过口头传说在全国传播开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幸存者，凭着记忆记录下许多诗词，很快有了手抄本在人民群众中秘密流传。

任命华国锋担任政府和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使得政治局表面上获得暂时的平息，但争权夺利的斗争仍在进行着。由于谣传有人在策划谋杀邓小平，因此公众都关注邓小平是否还活在人世。在他行踪不测之时，有人告诉我曾在广东见到他还活着，处在军队的监护之下。

“自从邓小平从官场销声匿迹，奇怪的是对他的命运的关注却有增无减。”一天在与达德闲聊华国锋等事时，我说。

“人民希望他象过去一样东山再起。”我的学生这样告诉我。

“这可能吗？”我问他。

“天晓得！”达德说。

我的这位学生由于天安门广场事件而变得安份守己了。虽然还是带来一些消息和看法，但他从不与我谈起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此外，华国锋的任职也令他困惑。在他给我一些有关华国锋个人的背景材料时，不愿引伸开去讨论有关他的任命。他那惯有的玩世不恭的神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不是焦虑就是深思的表情。

我们早就读完了那本《礼节》，反复研读了短篇小说集。当我打开书时，达德突然神色焕然，对我说：“你愿意见见我的女朋友吗？”

“你有女朋友了？以前怎么没有告诉过我？”我惊呼道。

“我想等到我们订婚后再告诉你。”

“那你们已经订婚了？”

“差不多了。她父亲仍然反对我们的婚事。我想他是嫌我太穷。”达德说，看上去有点沮丧。

“他是个头面人物？是高级干部？”

“不，他原是个资本家。”达德说，他凝视着我。从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忧虑，似乎生怕我会说出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来，但实际上，我却感到十分惊讶而无言以对。

“对了，你知道，一切已成定局，我不去北京了。他们从上海选了两个人，都与北京的某些高干有关系。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懂外语。我想，对我来说最好的结局是到一

所中学当个英语教师，然后结婚，在上海定居下来。我母亲也认为这样最好。”生活的经历给了他猛然一击。我想他已对与激进派在一起是否有他的前程，表示动摇。

“你能留在上海真是太好了！你一定要非常爱那位姑娘。要承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联姻可能受到的连累。”我说。

“这可不能说是连累，政治局已通过决议，将发还所有在十年前被红卫兵冻结的私人在银行的存款和利息。她父亲将拿到很大一笔钱。他已经跟孩子说过，等钱一发还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而不是等他死后才分。当然我并不是因为钱才跟她结婚的，但她父亲却认为我是为了钱。”

几天以后，达德带着他的女朋友来看我。她二十八岁，比达德大二岁，并不很光采照人，我可以说不很漂亮，但文静而明理，显然深爱着达德。达德的绝顶聪敏和蓬勃的气质深深打动了她。我向她表示祝贺，并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请我出席他们的结婚典礼。她有点害羞，说道：“还没有肯定，现在我父亲还不答应我与达德结婚，并不是因为他没有钱，而是因为他是造反派。”

达德连忙说：“我打算去做个教师。外国语学院要举行考试，为中学招一批英语教师，我母亲已经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

七月，一场里氏八级地震摧毁了华北工矿业城市唐山。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因为国家地震局被卷入一场新的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工作完全陷入瘫痪。唐山整个城市百分之八十遭到破坏。有一百万以上的居民死亡或重

伤。受地震影响的地区还包括北京和天津，虽说这两个城市灾情不算很严重但房屋倒塌，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有关地震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国家。同时，对政府的腐朽无能，无法应付事态的扩展的流言也不胫而走。当时，根据老百姓的经验，通过观察动物和昆虫的表现，又真真假假地预告在很多地方要有新的地震。于是城市居民都建起了临时防震棚，可权充避震之用的棚等如秋风落叶般铺天盖地，挤占了每一块空地。人人都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绝望地等待灾难降临。在上海，居民委员会组织了地震演习，并告诫大家睡觉时不要关门，有次来了假警报，我和周家一家都穿着睡衣睡裤在花园里等着终于没有出现的地震。一直到九月，毛泽东去世，人民的注意力才转向这件大事。

其间，达德已通过了中学英语教师的考试，被派到离我家不远的一所中学，教一批十二岁的学生。经历了当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头头的兴奋的生涯，达德找到了一种新的平淡无奇的漫漫生活。虽然，我们常规的上课已经结束，他仍不时来看我，一起聊聊。他视我为一个理想的听众，并且深知，我不是任何政治派别的一员，他说的话不会传到党员耳朵里去，这些人对他的政治生涯攸切相关。毛去世后不久，他就来看我。那天下午，天安门广场上召开了毛泽东的追悼大会，参加的有工农兵的代表约50万人。华国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在会上致悼词，在他身边有穿着军装的副主席王洪文，还有江青，穿着一身引人注目的黑色丧服，从头一直盖到脚。我们居

委会组织大家到有电视的居民家中观看大会实况，我被告知到楼下周家去看。

看了北京的电视节目后，还观看了电视转播上海悼念毛的大会实况，由马天水主持，他是上海市革会的头头，张春桥的副手。在文化革命前，马是上海市副市长，在所谓一月革命之后，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推翻了原来的上海市政府和旧上海市委，他加入了激进派。数年之后，马天水已成了激进派领导人信任的干员。张春桥驻留北京期间，他掌管着上海的日常事务。上海的追悼大会是在人民广场举行，紧接在北京的大会之后。

周太太家的电视很小，但她把音量开得很大，使房间里每个人至少能听到讲话声。一般情况下，按共产党的惯例，马天水的讲话不能说是逐字逐句完全照搬但也必须与华国锋发表的讲话一致，令人奇怪的是我注意到马天水的讲话在两个重要地方与华国锋的讲话不一样。其一，马说“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去办。”华国锋没有提到“既定方针”之类的话。其次，华国锋引用了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期间作的一段著名的语录，即“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马天水则没有提及。

电视节目结束后，对周太太表示了感谢，我上楼去了。不久，达德就来了。他是在学校里看的电视节目。

“为什么马天水的讲话与华主席的讲话不尽一致？”我问他，“马天水说的‘既定方针’是什么意思？”

“‘既定方针’当然是指的让江青同志做毛主席的接班

人。”达德说。

“你的意思是说，在毛主席逝世前，他已经这样决定的？”我问他。

他只是耸了耸肩。

“如果毛主席要让他的夫人接他的班，为什么他要给华国锋写条子‘你办事，我放心’呢？”我问他。

“我们中有谁真的看到这条子呢？”

“报纸上有复印的。”我提醒他。

“你敢肯定这是毛主席写的？你敢肯定没有其他条子？”达德问我。

“显然不是伪造的。”我说，记得报上登的虽然是一副颤巍巍的手写下的难以辨认的字迹。

“你知道，毛主席临终前一段日子已无法说话，他批写了许多条子。”达德说。

“我的天，那就是说一切都在未定之数。”我不禁失声惊呼。

“真得感谢我未来的岳父的固执，使我结束了造反派的生涯。我现在已超世脱俗。”达德说。

“曾有人说你是民兵连长，你们与民兵组织有联系？”我问他。

达德对我的问题很惊奇，一时间，我认为他会否认一切，但他很快恢复常态，尴尬地笑笑说：“我猜想是周家对你说的。作为一个教师，现在我已成了知识分子，完全没有当民兵的资格了。”

“在你是待业青年时，怎么会有资格的呢？”

“这个，我实际上不是一个待业青年。”

“你告诉过我是的。”

“这只是一个谎话，有人要我欺骗你。”

“你在政府部门工作？”

“可以这样说吧，我只是一个联络员，临时联络员，你可以这样称呼。你曾经不是跟我说过，在一个平凡的岗位上，一个平凡的人，常常被称作小人物？对了，我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小人物。”

“那你是处理所谓外国企业和政府部门间谍阴谋案的小组里的一个小人物？”

他点了点头。

“你真的相信有什么阴谋？”

“一开始是的。”达德带着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道，“你还不知道？一些我所信任的人告诉我，他们掌握了你和外国公司的确凿证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了解了你，我相信所有的一切只是一场阴谋，与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你成了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其中也包括我。我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虚度了我一生的多少时光。我成了凌驾于我之上的人的工具。”

“现在，你已完全解脱了，案子了结了，你也成了一名教师。”

“确实如此。”

“他们怎么会大发慈悲让你走的？他们不忌讳你要与一个出身资本家家庭的姑娘结婚？”

达德不禁哈哈大笑，说道，“你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些

人。对他们来说，不必操心为我谋一个工作是很高兴的，我的作用已尽，他们巴不得把我甩了。他们中一些人还真嫉妒我将与一个有望得到大笔钱财的姑娘结婚。你想，为什么人们都想要介入政治斗争呢？当然是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得取好的职位，意味着有优裕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在中国，一个人除了卷入到政治斗争中去外，是无法步步高升的。”

“请你告诉我，我女儿是怎么死的，是谁杀害了她。他们只是为了钱才这么干的吗？”我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强忍着悲痛。

他略显踌躇，然后说道：“没有人告诉你说她是自杀的？”

“我不相信。你觉得我应该相信这是事实？”

“她的死并不是预谋的。据我知道是他们做得过火了，事情完全是意外的。”达德说，过了几分钟他补充道：“我很遗憾，请相信我，对发生的一切我感到万分遗憾。”

“你的意思是说，绑架她的人，并没有得到授权杀害她，但却杀了她？这就是你想说的？”

达德点点头。

“那末为什么要绑架她呢？”

开始，达德很不愿意告诉我，踌躇再三他才说：“按照惯例，有些人认为她会被迫揭发你的情况，因为你在看守所表现很固执，拒绝招认。”

“谋杀她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他们都散在各处。”

“他们现在还身居政府要职？”

“我不能再告诉你更多情况，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

“我打算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要求对我女儿的死进行调查，我要送这些人去受审。”

“这是毫无用处的，他们会受到保护，你会被驳回。结果会比不了了之更坏。如果你写了起诉书，他们就知道你不相信官方的所谓是自杀的结论。”他对我说。

“他们是否会怀疑你告诉了我一些实际上你并没有告诉我的事情？”

“他们会的。”

“我想，你必须停止再来看我。”

“是的，你是对的，大概我不能再经常来了，既然如此……”达德没有说完，但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迄今为止，他来看我是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而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他确实应该停止来访了。

“我还有几个鸡蛋，你留下吃午饭吧？我给你炒几个鸡蛋吃。”

“我很高兴留下，非常谢谢。”达德说。

我们在一起吃了午饭，帮我收拾碗筷后，达德向我告别。我从抽屉里取出400元钱，说道：“达德，能认识你我很高兴。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年青人，我祝你生活美满幸福。这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你可以用来购置些日用的东西。”我把钱递给他。

他一言不发，显然觉得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感情。默默站着，过一会儿，他收下我的钱就离开了。

第十七章 平 反

多少年来，一直期待着毛泽东的死，在我身陷囹圄时，我曾如此炽烈地祷告，希望这愿望成为事实。现在，他真的死了，我倒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人对我女儿的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期待着他将受到正义的评判，但这将会遥遥无期。

我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政治风云，一方面我又开始教一个残疾姑娘学英语。每隔一天上午她来我这儿学习。她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跛子，被正规学校拒之门外，跟她母亲学习读书写字。她母亲是一所大医院的护士。每当我们学习结束，她总是有礼貌地向我道谢，然后支着拐杖慢慢地走下楼去，出门上街，步行着回家去。

当关注着她与自己的残疾作斗争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中国铁板一块似的生活。她的不幸使她游离于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命运之外，免于卷入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之中，健康如常的青年们包括我的女儿则在他们的伟大舵手的引导下，在充满失败和痛苦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上，努力奋斗着，想要成为毛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

命途多舛，如我女儿的死；而其他人包括象原红卫兵达德，则成了牺牲品。由于残疾，我的这位学生未能进学校学习，这样也逃脱了中国痛苦的劫数，结果她令人宽慰地被人遗忘和幸免于难。

我的学生希望象达德那样在一所中学做一个中学教师，能自食其力。

“我不能终生依赖我的母亲，她很快要退休了，我当教师得到的工资可以大大地减轻她的负担。”在她请求我帮她准备教师考试时，她对我这样说。

给她上课已经成了我的主要工作。但我在注视着、等待时机向人民政府呈递投诉状，要求对我女儿的死进行调查。我已草拟了投诉状，尽量用社会主义中国的习惯用语来书写，一遍又一遍的审核，遣词造句，反复修改。问题是我能在什么时候，向哪一个组织呈递这份投诉状。

10月8日的早晨，象往常一样，六点钟我就醒了。打开通往阳台的门，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蔚蓝的天空飘浮着几簇白云，从阳台上往下望去，我看见我那个残疾学生正站在大门外，她一看见我就打着手势要我下去。

我轻手轻脚地下楼去，走到大门前开了门。这么早我的学生就来看我是很不寻常的。我想最好不要惊吵了周家。我跨出门外，她就走近对我悄声说道：“我在这儿等您一会了，我不想让周家知道我来过，所以我没有敲门。我有一个当民兵的兄弟，昨天晚上突然被紧急动员令征召回厂，要有一场战争了，我想应该来提醒您呆在家里！”

我扫视了一下街上，看到一片静寂荒凉，我问她：“战

争？与谁打仗？”

“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有几个人到我家来告诉我兄弟立即跟他们走。他们对我母亲说，民兵已处于紧急动员状态，要我们不要把这情况告诉任何人。但我和母亲都觉得您孤身一人，应该来提醒您一下。”

我谢谢她，一直看着她一瘸一拐地离去才回到自己的住所。

我学生带来的这个消息确实令人意外，很难想象在这种时候，会有哪个国家来攻击中国或者中国会挑起与哪个国家的武装冲突，然而她告诉我民兵已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我有个上海产的半导体收音机。晚上，逢到天气好的时候，我用耳朵贴近半导体收音机仔细听的话，可以收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节目。我把收音机带到洗澡间，把门窗紧闭，把水龙头打开以便遮盖收听短波时发出的噪音。我打开收音机，由于没有天线，什么也收听不到。当阿姨回来时，我就问她菜场上的情况，她如往常一样抱怨东西短缺。我又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地电台广播，想听听是否有什么通告之类的广播，但我未能听到。随后我取出笔记本，整个上午都在抄写和背诵唐诗，这样我才能从周围紧张的气氛中超脱。

一天终于过去了，一切相安无事。晚饭后，听到周太太在花园里叫我，我到阳台上，她告诉我，居民委员会通知去开会，马上要去。我急忙拿了个小凳子与她一起匆匆穿过街道。

房间里都是人，气氛很紧张。居民委员会很少在晚上

召集开会，大家都感到要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如往常那样交头接耳和哈欠连天，就是一批瘾君子也都戒了烟瘾。

大家都到齐后，街道党委的一个中年工作人员站起来向我们念一份政治局的决议，要点是10月6日守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已采取了“革命行动”，隔离审查江青和她的三个亲密伙伴，即所谓的“四人帮”。（中南海是满清皇室的冬宫，现在是党的政治局成员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文件中说，采取这一行动的决定是由党中央代主席华国锋作出的，并得到国防部长和共产党高级政治家叶剑英的赞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决定，逮捕“四人帮”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防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破坏。文件声称当毛主席还健在时已经察觉了“四人帮”的问题，并且申明一定要解决。依我所见，发文件的目的是先发制人，在毛死后仅仅二十六天，就对他的遗孀采取了惩罚行动，采取行动的人又是毛活着的时候与江青一起共事者。文件的字里行间明确地申明，华国锋逮捕毛的遗孀只是遵照毛的指示办事。

决议并不长，宣读完之后，有人告诉大家，由于时间已很晚了，下次再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回家了。既听不到欢呼又没有嘘声，大家都默不作声。与来时一样，我们都匆匆离开会议室，面部毫无表情，低着头，免得眉目之间流露出感情。大家缓缓地走着，以免显得过于兴奋。因为大家都还心有余悸，都摆出一副木然无知的神态。刚听到的消息实在太出乎意外，几乎令人不能相信。对党的政策

的突然转变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但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变。为万无一失起见，最好不要过早作出反应。况且众所周知，上海还控制在激进派手中。甚至，给我们念文件的人就可能是江青的代理人。上海人都乖巧得很，他们不会不合时宜地欢呼雀跃，给自己带来危险。

周太太和我一起回家，一路上都保持沉默，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当我们推开前门，看见她当民兵的儿子正站在平台上。

“你已经回家了。”做母亲的问道。

“是的，事情已过去了！”做儿子的回答。

进门走进我自己的天地，锁了门踏上楼梯时，我露出了微笑。走进房门的时候，我不禁万分感谢上帝。但我告诫自己不容过份乐观。显然，“四人帮”的被捕是党的领导层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华国锋打算放弃毛的政策，我十分怀疑他还懂得其他什么治理中国的办法。整个晚上我寝卧不安，思索着未来，斟酌上诉信，请求为自己平反，调查我女儿的死因。

第二天早晨周太太告诉我：“卢英来过了。今天下午二时，我们都到居民委员会办公室集合拿旗帜和标语，要举行全市大游行，支持政治局关于逮捕四人帮的决定。”周太太通知我说。

过去我从未参加过游行，我很讨厌成群结队。举着小旗、呼着口号在街上游行。我厌恶混在一群乌合之众中间。我觉得如果不是克制忍让，委曲求全，我绝不会违背自己的初衷的。这些年来我养尊处优，保持着我的矜持，因此从

未有人要我参加过游行。这次却要我去参加，我突然发觉难以违背众人的意志。当我正犹疑不决、考虑着如何恰当地拒绝参加时，周太太已有些不耐烦，又说：“你当然要去参加的，每个人都去，你一定知道，没有人会支持四人帮的。”

“我觉得一刻不停地走几个小时，我可能坚持不了。”我说，我确实有些行走不便。

“只要求我们这些老太婆在我们自己地区游行，用不了一个小时，是卢英对我说的。”周太太说。

达德告诉我，上海的一批激进派很讨厌我。假如他们转而反对四人帮的话，就会反过来指责我是四人帮的支持者，因为我拒绝参加上海人民支持逮捕四人帮的大游行。这样不就成了天大的笑话？那些见风使舵的党的积极分子们，在党的革命进程突然转折关头是很善于估计形势的，他们中很多人都懂得如何适应新的方针政策，摇身一变为新路线的卫士，自然还要找几个替罪羊。我发觉我别无他法，只好去参加游行，但愿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居民委员会的大姐们必须通宵赶制旗帜和标语。二点钟我赶到居民委员会办公室去时，桌上已堆得高高的，参加游行的都可人手一份。卢英让我加入我们这一圈子人的队伍，这个队伍最短，也最安份守己。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几乎都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比起那些退休工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和待业青年们，我们更有理由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我们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有一丝笑容。我们曾受尽侮辱，任人打骂，并一再被告诫，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社会并不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从未感到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新社

会仅仅是宽容我们而已。我们很清楚，在一个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眼里，我们是腐朽的象征，是一切危险思想的渊藪。于是我们必须永远与其他人隔离，即使游行时也不例外，要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另编一队。因此，表面上我们麻木不仁，形同木偶，实际上出于洁身自好的目的，我们都越来越感到必须事事处处小心谨慎。

游行开始了，我们的队伍被安排在最后，经过居委会办公室门口出去时，每个人拿到一面粘在小竹竿上的标语。少数标语上很简单地写着“打倒江青”几个字。到了街上，一个年轻的积极分子让我们稍停片刻。他对我们说，他走在队伍边上，根据一张纸上的内容领呼口号，我们就跟着高呼。随后，一些年青人举着红旗，拿着锣鼓排到游行队伍的前列。经那个年轻积极分子的示意，我们四人一排开始游行，跟着他高呼口号。到了市中心，工人和年青人的队伍就与我们分开，和其他游行队伍衔接起来，我们仍然绕着我们居住的地区兜圈子。

遇到附近居民委员会的与我们一类的人组成的队伍，我们走的都是一些偏僻、冷清的小路，既不引人注目，也不激起反响，大概是因为没有革命热情之故，我们的示威游行显然是不成功的。过了一个多小时，那位年青的积极分子就让我们回到空无一人的居民委员会办公室，游行算结束了。不等进一步的命令，我们赶忙放下标语，如释重负般逃回家中。

“你知道吗，内战差一点打起来。”等回到我的世外桃源，把大门关上之后，周太太对我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问她。

“民兵已紧急动员起来，发了武器，准备开赴北京去营救江青，但是起事的风声泄漏了，正规部队包围了城市，我儿子说，民兵一触即溃，只好投降。”

“仗没有打起来真是万幸。”我说。

“确实，经历了文化革命，我们的孩子还去为江青送命，不也太可悲了吗？”她说。

不久就听说，市里的激进派领导人都会被解除了职务。有人说，这些人都会被监禁起来进行审查。另有人说，他们几乎都被关在一处写交代，这些揭发交代材料对公开审判‘四人帮’很有用。这些流言传开后不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市委都任命了新的领导人，这些人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都跟华国锋差不多，在运动一开始，红卫兵横扫一切时，他们都受到批判，但很快就“站到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一边”，重新得到起用。所谓“站到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一边”，即意味着揭发和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此后，就被委以高位，成了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的战友，任命这些人象征着华国锋在短短四年执掌大权的过程中，没有触动激进派的根本，政策也没有真正的改变。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了，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四人帮的运动。在这次党代会上，华国锋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他不仅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还当上了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了中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公开场合，他的画像已跟毛泽东的并排挂在一起，在报刊杂志上已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区别于“伟大领袖”毛

的头衔。显然，一种新的个人崇拜正在形成。党和政府内残存的激进派，小心翼翼地推波助澜，他们看准了华国锋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保护伞。

党代会重申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华国锋信誓旦旦，要完全执行“毛主席的政策”，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同时，党代会任命在逮捕“四人帮”中作出贡献的8341部队司令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为了回报他为江青倒台所作的贡献。据说，“四人帮”中有三个人是接到通知去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在到达会议厅时被逮捕的。但江青拒绝出席会议，汪东兴到她家中，亲自给她铐上手铐。

华国锋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由于在权力阶梯中处于较低的地位，而且至今在党内和社会各阶层中鲜为人知。他既得不到来自平民百姓的支持，又没有一整套可以信赖、委以重任的辅佐班子，没有这样的权力基础，他无法有效地进行统治。

1977年，地方武装力量和造反派都各自为政，瓜分权力，以各自的方式随意图解毛泽东思想，对北京的指示阳奉阴违，中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同时，经济上的不景气使国家陷于瘫痪，在耳闻目睹了十年期间党的领导阶层的短兵相接，以及对一个接一个的领导人物的甚嚣尘上的批判之后，人民群众丧失了对共产党的信心。

“四人帮”的被捕犹如掀掉了紧紧捂着的盖子，一锅沸腾的水很快就到处满溢开来，满腹牢骚的人民群众纷纷要

求整顿。出现了个人和团体的示威和抗议。群众围聚在政府部门外面，有时通宵达旦等待懒散政府官员的接见。政府大楼遭围攻，被下放到农村去的愤怒的青年们要求返回城市的权利。公共建筑物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披露了一些人的个人悲剧，要求伸张正义。群众如饥似渴地读这些大字报，又添上更多的大字报，叙述他们自己的遭遇。

在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华国锋作出了两点让步，同意叶剑英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请求，恢复邓小平的职务，任命他为副总理，并且答应对文化革命以来的所有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

我到处走访，给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写了无数上诉信。整个1977年我都在活动。在检察机关办公室，指定接待和倾听公众申诉的低级官员接待了我，并耐心地听了关于我的遭遇的陈述。每次他们都让我把所说的一切笔录成文，再呈报上去。但无论是人民法院还是公安局，都音讯全无。一时间，我感到束手无策。我曾经在这些机关外面遇到过很多群众，他们的处境也并不比我好。

1978年3月，一个从公安局来的人在派出所老李的陪同下来看我。

待坐定之后，那位穿着一身褪色的毛式制服的中年男子，倾着身体，微蹙双眉，率直地望着我：“我是从公安局来的，你给公安局和检察院写了许多上诉书信，是吗？”

“是的，我递呈了一些上书。”我说。

“不是一些，”他摇摇头，“是许许多多！”他双眉锁得更紧，又说，“为什么你写得这么勤？难道你不相信人民政

府？难道你毫无耐心？”

那男子有点急躁，老李只是两眼盯着地板。两个人谁也没有碰阿姨端来的茶。

“从我被非法监禁以来，已过去了十一年，我女儿被杀害也有十年了，我想，我的耐心够好的了。我可毫不隐讳地对你说，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但是，经过文化革命，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对那些口头上声称代表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已丧失信心。”

“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再写上诉信了，你的案子在适当的时候会复查的，因为党和政府的政策就是要对文化革命以来的一切案件进行复查。”

“我还要等多久呢？”我问他。

“你知道在上海有多少案子需要处理吗？全市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他们的死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四人帮’及其同伙有关。被捕的人更是数倍于这个数目。许多人还被关押着，我们首先要赶快审查这些案子，释放无辜的人。然后，我们要审查那些已经释放，人还活着的案子，比如象你。在这之后，再涉及一些人已死去的案子，比如象你的女儿。有许多人在努力工作，甄别所有的案子，你一定要耐心等待，最终总会处理你和你女儿的事。”

他说的似乎振振有理，我不信处理复查案件会面临这么多的问题。

“今天你化费这么多时间来看我真是太好了，我对你和你所代表的政府表示感谢。应该说，你的来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新增强了我的信心。你与过去十年中我必须与

之打交道的工作人员大不一样。”

“当然是不同的，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平反的。”那人说。

“如果你自己有过受监禁的体验，你一定会理解我是什么样的感受。”

“当然罗，我很理解。但是当你想到你个人的损失和受痛苦时，也要想想其他人的损失和痛苦，想想那些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党的领导人，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许多在悲惨的境地中死去的人。也要想想那些与我一样的干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入党，一直为党工作，任劳任怨，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是因为不合‘四人帮’的意，就被栽上反党的罪名，锒铛入狱。你知道吗，刘少奇夫人只是最近才刚刚被释放出狱？你一定要抛却你个人的恩怨，看到总的形势，眼光要放得远些。”他对我说。

望着坐在对面的这个男子，我感到好奇，不知他现在对党是怎样一种感情。他一身陈旧的蓝布衣服，袖口都磨光了，脚上穿一双黑布鞋，一张清瘦的脸，穿着举止表明他的生活很艰苦。象这个人一样甘心献身的中下层干部是共产党力量的基石，一旦对党的信任发生动摇，党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统治，不管北京政治局制定的政策如何正确有致。政策的成功与否，毫无疑问将取决于象这个男子一样的执行政策的干部。

“我很高兴你到这儿来。我一定不再写任何上诉信，我会耐心地等待你跟我取得联系。”我告诉他。

这人看来很高兴，他圆满完成了任务。当他们两人告辞走时，我送到大门口，看着这位从公安局来的人骑上他

的一辆“老坦克”——自行车走了。

这位干部的来访使我重又安心了。看来我的上诉信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也将获得平反。我也明白，由于党的政策的变更，我起码能得到平反。经过改头换面的不合法的做法仍无所顾忌，事实上，报刊杂志以及有关复查文化革命以来所有案件的文件，从不提及“合法”这个字眼。“四人帮”是因为反党的罪名被捕入狱的。政府和人民并不是依据他们违反法律，而是他们违背党的政策，企图实现自己的野心。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独立于党的政策之外的法律。

几个月之后，1978年夏天，在我女儿被造反派杀害之后十一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派了三个人来看我。

“我们今天来是代表电影制片厂新成立的党委向你表示慰问。我们对你女儿，我们的同事郑梅萍的死表示哀悼。”一个自我介绍是人事科科长中年男子说道。

一位退休女演员，曾是梅萍在电影学校时的老师，握着我的手，满含泪水对我说：“我们大家都十分悲痛，你能了解我们大家对你的一片深情。”这位红极一时的女演员，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此时望着我，似乎有一架照相机在手，准备记录下这一幕情景，虽然在此之前我从未见到过她，只知道她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妻子。

第三位是一个年青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梅萍电影学院时的同学。我是代表制片厂所有她过去的校友来表达我们的心意，”

我请他们坐下，阿姨端来了茶。那位人事科长对我说：

“黄康是电影制片厂复查办公室的。我们厂一共有二十九人死亡，还有许多人，包括一些一流的艺术师被打成反革命，进了监狱，要复查这些案子有许多事要做。”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对她的死谁要负责？你们知道吗？”我问他们。

那个叫黄康的年轻人说道：“我们想取得公安局的合作，一起来办她的案子，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电影制片厂外的人。”

“你认为调查要多久？”我问他。

“我们工作都很认真，政府的政策也很清楚，我们一定要甄别一切冤案，有错必纠。”黄康说。

“今天我们来就是转达电影制片厂的慰问，并转告对你的关切。”副厂长的妻子说道，“如果你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得到制片厂的补助。”

在我从监狱释放这么许多年之后才提出给我补助，实在是有点假情假义，但我相信这是党委书记授意她这样说的。我很有礼貌地回答：“非常谢谢大家，我没有什么困难。”然后我提醒他们三个，说道，“我希望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押上审判台。”

“真正的罪犯是‘四人帮’。我们必须把矛头对准他们。”人事科长提高了音调，这是中国的官僚们在处境尴尬时惯用的。

“这是对的，但具体执行谋杀的人也应该受到惩处。”我说。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女儿是自杀的。在没有得到相反

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肯定她的死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人事科长显然不想听我说我女儿是被“谋杀”的。

可能黄康已经看出我变得十分气愤，赶快说道：“我打算很快再来与您谈谈，你看什么时候比较合适？”

“随便哪一天下午都行。”我告诉他。

他们起身告辞，那位副厂长的妻子再次对我女儿的死表示哀痛之情，不管她是真心，还是在演戏，我不禁与她一起痛哭失声。

黄康来看了我几次，我渐渐明白他的来意是要我接受电影制片厂已经准备齐全的平反证明。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张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没有明确指出我女儿是怎么死的，尽管文件已不再坚持自杀的提法，称我女儿是“受迫害致死”。我敢肯定，有人想要偏护杀害我女儿的凶手。我力争要电影制片厂澄清这一点，但看来是徒劳的，黄康只是告诉我，政治是很复杂的事情，要把许多事搞个水落石出的时机还不成熟。

当我还在与上海电影制片厂争持不下时，公安局的代表又在1978年10月来访问我，来了三个人，其中包括曾与老李一起来让我不要再写上诉信的那个人。

那人指着一个约五十岁的矮个子男人对我说：“这是韩科长，”转而对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说：“这是小李。”

“我们代表人民政府对你在文化革命期间被错判，错关入狱向你表示歉意。同时我们也对你女儿受迫害致死表示哀悼。”韩科长以官方的语气说道。

我请他们坐下。小李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我们的谈话，

一切官方的正式的拜访都要记录在案的。

“我很高兴你们今天来访。我想用不着道歉，对人民政府我毫无怨恨之意。我很清楚是‘四人帮’的爪牙篡夺了政府的权力，把许多无辜的百姓，包括我本人在内投入监狱。我现在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我女儿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并没有受到审判。”我说。

“你一定要相信人民政府和公安部门。”第一个人说道。

“我们今天来主要是讨论你本人的平反问题。”韩科长说：“我们看了你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记录，在维护已故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方面你表现得很勇敢，你敢于直抒己见，即使是老资格的党的干部听了你说过的话也会胆战心惊，他们也不敢这样说。政治局决议很快就要为刘少奇主席恢复名誉，听到这个消息，你一定会很高兴。”

“我非常高兴掌握国家命运的大权重新回到紧跟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的领导人手中。”我一本正经地说。

第一个人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纸放在桌上：“这是为你平反的证明的草稿，我们想在正式定下来之前听听你的意见和建议。”

证明中写了我的姓名，年龄和其他一些项目，指出我是在1966年9月27日被捕的，经过文化革命冤假错案复查委员会的调查，证明我是完全无罪的，根据人民政府的政策，应该为我平反。我对他们说，我对文件的措词是满意的。

“这个文件正式定稿后会交给居民委员会在全体居民会议上宣读。”韩科长说。

“居委会很快会通知你的银行存款解冻，将发还存款，

还要计利息。”第一个人说。

“我只要本金。因为国家经济也有困难，我不愿再接受额外的大笔利息。”我对他们说。

“你一定要接受，这是政府的政策。”韩科长对我说，随后笑了笑换了个话题，“你知道吗，我是几个月之前才平反和恢复原来的工作？我被关押了三年，要知道，我连你在第一看守所得到的特别饮食都没有。”

“我早就说了，对自己的遭遇我并不抱怨，在第一看守所的六个半年头，我有许多时间学习和思索，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对公安局没有尽最大的努力解决我女儿的案件，没有使杀人凶手受到严惩，我是确实感到非常失望。”

我一再申明这点想直接引起韩科长注意，但是他避而不谈我女儿的事，继续说道：“在看守所里给你相当的优待，有特别的饮食、医疗护理等等，文化革命中你如果留在外面的话，大概活不到今天。”

这真是妙语惊人，我想，他大概是想让我对党和人民政府把我投入监狱表示感谢，看来所有的党的官僚们对来自百姓的恭维之词是百听不厌的，即使明知这些媚词并非肺腑之言。一旦他们需要粉饰太平，即使事情一团糟，他们也会千方百计找出些优点来。如我能按他的意思，说几句同意他的话，可能更顺理成章吧，但从我身受的磨难，从我女儿的死，我不想过份违背自己的意愿，我仍保持着沉默。

他是在等着我说几句，真是令人难堪的时刻，最后他们只好告辞。

我送他们到大门口，开门时我对他们说：“对你们今天的来访，我再次表示感谢，我期待着你们通知我，什么时候我的平反决定最后下达，另外，我也想再重复一下我的请求，要严惩对我女儿的死负有责任的人。”

1978年11月，在我被捕那天之后12年零2个月，我正式得到平反，宣布我是被错抓错关的受害者。在居民委员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平反决定，随后将我在银行的存款发还给我。不久，上海电影制片厂为二十九名受迫害致死的职工接连举行了追悼大会，除了我女儿外，其他人中包括了几乎所有了解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当蹩脚演员历史的老演员，其中有拒绝让江青出演她梦寐以求的角色的导演，有比江青才华出众、事业成功的女演员，还有与江青有过罗曼艳史的男演员。

梅萍的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举行，有二百多人出席，其中有他生前友好和同事，上海文化局和电影局也派了代表。这两个单位和电影制片厂都以局长和厂长的名义送来了花圈，孔以及梅萍其他一些校友来帮助布置追悼会大厅，虽然上海近郊那时刚复苏的鲜花还未长成，他们还是设法弄到许多。使大厅前方布满了鲜花，正中放着梅萍一幅放大的遗像，装在黑色的镜框中，大厅四周摆满了常青的花木和用纸花扎成的花圈。

追悼仪式简朴而隆重。梅萍的老师、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夫人念了悼词，她历述了梅萍的简历，她二十四年短暂的一生，强调了梅萍已取得的杰出的成就和为其他人所作的一切。这位老演员用充满深情和真诚的语调念着，令

听者不禁潸然泪下。仪式进行中不时传来抽泣声，淹没在低沉的哀乐声中。致悼词结束后，由干部在先，每个人依次上前向梅萍的遗像鞠躬致哀，随后与我握手表达对梅萍之死的深切悼念。

一切很快过去了。孔陪伴我坐着电影制片厂派来接我的那辆车回家。我们甚至还没有离开大厅，在我们后面要用同一个大厅举行追悼会的单位已经在从卡车上往下搬花圈。孔对我说，火葬场所有的厅堂都已预订到1980年，为了一天中能举行尽可能多的追悼会，每个单位只许占用二小时，以后数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例得到甄别，越来越多的死者得到平反，如果几个死者是在一个单位的，就一起为他们举行个追悼会。

孔捧着梅萍的遗像上楼，送进了我的房间，然后就告辞了。阿姨给我端来一杯茶，我让她离开房间，只想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儿。

那天晚上，我辗转不能入睡，房里一片黑暗，我记起那逝去的岁月，仿佛又见到我女儿成长过程中不同的阶段。从澳大利亚堪培拉时胖乎乎的婴儿，一直到在上海长成一个美丽的少女。我有一种失败的感觉，我竟无力克服种种障碍使她的冤案得以昭雪。对她的死我内心充满自责之情，因为是我在1949年把她从香港带回上海。我扪心自问，我曾看过如此众多的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籍，怎么会还看不透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第二天早晨，报刊报道了电影制片厂追悼会的消息，在去世的演员名单中有梅萍的名字，结果我获平反的消息

也传开了。从第二个月份十二月起一直到新年期间，有许多人来看我。当我的生活是一片黑暗中时，这些亲友们都与我和女儿保持着一段距离，唯恐避之不及。现在都出来声称自己是我的最可亲可近的人。他们对我说，他们一直担忧着我的一切，为梅萍鸣冤叫屈，有几个还提出要与我们一起生活，以便照顾我。同时还有些人要他们的子女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试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向我表示过。当时我们被遗忘和抛弃，可能对他们来说不用为此感到内疚。因为一方面他们中一些人同样也有他们的难处，另一方面正如生活在毛泽东黑暗统治之下的千百万中国人一样都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态度，他们认为我是能理解的。

即使不算被红卫兵劫掠去的大笔钱款，将银行的储蓄归还给我，这笔钱就多得不可能化掉。通过居民委员会的书记我了解到妇女联合会计划要重建幼儿园和日托中心，这些机构都被红卫兵破坏殆尽。对年青的有孩子的双职工有益的事业还是值得赞助的，我给了书记60,000元的捐款(按1978年的兑换率约折合40,000美元)，我还拿出一笔钱送给丈夫和我自己的亲戚，在我出狱后给了我帮助的青年，我过去的老佣人和壳牌石油公司一些职工的遗孀。这些职工都死于文化革命中。政府抽出这么大一笔现金还给人民群众，就需要在市场上投放一些家用设备等货物，如从日本进口的电冰箱和电视机，或组织旅行社提供去名胜古迹观光旅游。自然价钱是很可观的，比如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电视机价格2000多元。上海人宁愿节衣缩食，热

望能买上一台，那些落实政策归还了大笔钱财的，就可大肆挥霍。

1979年元旦，中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形势的发展激起一股狂热的学习英语热潮。早晨我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见到年青人坐在板凳上，在草地上，在亭子里朗读英语课本或大声拼读英语单词。美国之音的日常英语广播课程更成了大热门，年青人都争相购买接收性能好的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广播。收听英语课之后的特别英语新闻节目的人也突然大增。政府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制止这种趋势，即使有人并不是学英语也公开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在共产主义中国收听外国广播一直是受到禁止的，即便是在文化革命前。我们中一些人偷偷听了也不敢公开谈论，但现在，人们不但收听美国之音，还公开谈论听到些什么。在学校里英语教学成了学生的第一外语，甚至从8岁开始就上英语课。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一见到那些过去骂我“特务，帝国主义特务”的小学生们，我总是用“Good morning”或“Good afternoon”跟他们打招呼。

新年伊始，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党支部书记来看我，并请我去担任英语教师。

“我是来邀请您到我们系工作的，现在极需大量教师，教我们的年青人学外语，尤其是英语。我们系要扩大，需要增添教师。”他带着会心的笑容申明，很高兴地获悉他和他的系科一夜之间声名鹊起。

我已经听说原壳牌石油公司的博士应邀去外语学院教授英语，但我无意自己卷入进去，也不想妨碍自己最终要

离开上海的计划。没有职业使我更有机会获得护照，没有人可以借口某些工作脱不开身而拒绝我的出国申请。由于我已打算谢绝他的要求，我想应该格外客气些，使他心情舒畅。“我很荣幸您的光临。”我说，“您是系的支部书记，事务繁杂，百忙之中抽暇亲自来看我，其实您完全可以派个人来。我确实万分荣幸，但是我怕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不能胜任全天的工作，我的经历很不寻常，而且动过大手术。”

“这些我全知道。”他说，“我已经与公安局核对过。”

“如果与公安局接触过，您该知道我最近才获平反，有很多个人事务要安排。”我告诉他。

“你不想再为人民服务？”他问我。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广为宣传的口号，这句话引自毛泽东 1944 年为纪念共产党员张思德而写的一篇文章。无论什么时候，一旦共产党想要某人做某事，而那人又不想干时，干部们就会责问道，“难道你不想为人民服务？”

想指责我不想为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我已想好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你能不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教几个学生呢？”

“你的意思是进行个别教学？”

“是的。”

“我怕这样的安排我们从无先例，你如果不去学院教书，我们怎样来计算该给您多少工资呢？”

“我很乐意这样做而不计报酬，就象你刚才说的，为

人民服务嘛。”

对我的建议他略考虑了一会儿，说道：“我必须与我的同事讨论一下你的建议，决定好我会通知你的。”

他告辞走了。

我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提出一个他不可能接受的变通的办法，从而把球打回到他的一方，并且不使他丢脸。与其我回绝他，不如让他回绝我，这是对付逞强好胜者的唯一办法。

新近开馆的美国总领事馆就座落在淮海路上，离开我每天进行太极拳锻炼的小公园才几幢房子。清晨，在我去公园和回来的路上，总可以看到在领事馆大门外面有人排着长长的队伍在耐心地等着申请签证。我的一些学生总带来一些消息，有关他们的亲戚和朋友得到护照离开了中国。年青人中间议论的热门话题不再是江青有多少姘夫或者是在文化革命中有多少无辜的百姓遭残杀。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都以交换学生计划的名义，将自己的儿女们送到美国去。中国欢迎外国客人，海外华侨到中国来探亲访友。他们带来许多日用消费品作礼物，给自己的亲属提供资助，并让那些在文化革命中失去进大学机会的人能出国受教育。出国，尤其是去美国成了老老少少引为自豪的事情。

1979年中国的政治形势非常好，虽然华国锋仍然是党和政府的首脑，但邓小平已经在扩充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多的“四人帮”的同党被逐出党的领导阶层。全国一派安定和充满希望的气氛，使人想起毛泽东采取文化管制，针对

知识分子进行反右运动前的五十年代中期。

我想，随便怎么说，我必须趁党的政策还没有重新收紧之前取得护照。问题是我该向当局提什么恰当的理由去国外。我提出的理由一定要十分充分，以便能获得批准，因为只要有一次拒签记录在案，对我将来再度申请就很不利。

一天晚上，收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节目时，我了解到中国正在向美国申请得到最惠国待遇。我苦思冥想，努力回忆着我曾在什么地方看见过的一条消息，即在美国议会有一条重要原则，阻挠家人团聚的国家不得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条规定是针对苏联的，因为在那里有大量俄国犹太人在等待批准去以色列。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注意到这种情况。关掉收音机后，我真要感谢上帝，那天晚上远隔重洋传来的声音是如此强，如此清晰，否则我就听不到这条消息，在中国的报刊上是不会报道这类新闻的。

我有两个妹妹在美国，共产党军队接管中国大陆时，她们正在美国念大学，以后她们都相继在美国结了婚，定居下来。两个妹妹中小的那个在1935年我离家去英国时还是个小孩子，我们已经四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我另一个妹妹海伦与她丈夫在两年前曾回上海短暂停留。此后，我与她时常有书信来往。想到这儿我连忙坐下提笔给她写信，请她给我来封信，邀请我去加利福尼亚看望她们，以使“合家团聚”。海伦看来对我们情况很了解，她很快就给我寄来一封措词恰当的信函，并以她们两人署名。

三月初，来自南太平洋的暖流降临上海，和煦的春风

唤醒了街道两旁蛰伏了一冬的梧桐树。我满怀希望地向徐汇区公安局走去，那儿特设有护照和旅游申请办公室，当我到达时，才发现整整早了一个小时。

虽然这时才六时三刻，办公时间是八时开始，已经有一大群人在等候了。七时半铁门准时打开了。我发现我排在队伍前三分之一处，整个队伍已沿墙蜿蜒成了一条长蛇。随着前面的人进了接待室，队伍在慢慢向前移动。我排在一个年青女子后面，好不容易挤了进去，外面院子里还留着长长的队伍。偌大个接待室挤满了人，许多人紧挨着坐在一条狭窄的板凳上。走廊上也一个接一个地站满了人。每个人都耐心地等着。八时，办公室一开门，大家都按着次序，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入。有些人出来时手里拿着表格面露笑容，有些人出来时两手空空，看上去不是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在我前面的女青年已占到了座位，她往前一挪动，我恰好坐在她边上。

“你想到国外去？”她低声对我说。

我点了点头。

“哪个国家？”她问道。

“美国。”我压低声音说道。

她顿时笑容满面，“我也打算去那儿，去看我父亲。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1949年，我出生前一个月他就离开了。”

“他让你去的？”

“是的，他在那儿开了个饭馆，他说假如我想去他饭馆工作，他可以帮助我。”

“你在上海有工作吗？”我问她。

“不，我在待业。文化革命期间我们日子不好过。因为我母亲没有跟我父亲离婚，红卫兵说我母亲是美国特务，她在干校死了，但现在她已平反了。”她含着泪说道。

“愿你在美国能够愉快。”我说。

“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可以肯定我的继母不会喜欢我。你觉得政府会同意我出国吗？”她不无忧虑地问我。

“喔，是的，我想大概不会很困难的。”

“你去过美国吗？”

“去过，很久以前了。”

“要在那儿生活，你觉得我自己该做些什么准备？”

“如果能找个老师的话，好好学学英语。”

她点了点头说道：“我现在正在努力学呢。”

我们一边闲谈着一边往前挪动着位置，已经靠近里间的门口，又等了一会儿，我前面的女青年进去了。不久她就出来了，面带微笑，她朝我微微弯下身子，悄声说道：“我拿到了。”一边给我看手中的申请表格。

“下一个，”房里传出声音，我走了进去。

一个很强壮的中年妇女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前面是一张椅子，桌上一本空白的本子和一支笔。除此之外，房内空无一物。我想，她看来心绪不佳。整个上午要接待这么多人，都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急于出国的人，这一定令人厌烦。

“你怎么样？”她对我嚷道。

我在她前面的椅子上坐下说道：“我想申请到美国去看

我的妹妹，其中一个我已经有四十四年没有见面了。”

“你为什么要去看看她们呢？”她说。

“为了团聚。等了许多年了，我们一直想能够团聚。”

“她们不能到上海来看你吗？有许多人从美国来探亲访友的。”她说。

“我的一个妹妹曾经与她丈夫来过，但另一个我已经四十四年没有见面的妹妹非常忙，她抽不出空回来。”

“你是什么单位的？”她问道。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没有工作。”

“你原来是在什么单位工作的？”

“文化革命前我在一个外国企业工作。”

“你的名字？那个外国企业的名称叫什么？”

我告诉了她，她在本子上记了下来。

“文化革命中我被错抓了进去，但现在已经平反了。”

我对她说。

她皱起眉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略有所思。我知道她有点左右为难，对我如何处置，她自然不想犯错误。我怕她拒绝，这样就无可挽回了，于是连忙说道：“公安局的首长们都了解我。韩科长和局里其他干部曾到我家来过。你何不让我填了申请，让他们根据政府的政策决定同意或不同意，行吗？”

考虑了一会儿，她说：“行吧，我给你申请表格，填好交来时一定要有必需的证明。”她告诉我。

“我有一封我妹妹的邀请信。”我对她说。

“还要把平反证明和户口簿带来，”她说，仍然看着我。

听我提到韩科长，她的声音显然温和了许多，她一定很奇怪我怎么会认识她的上司，她在考虑对我的态度是不是太粗鲁了些。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边拉开了抽屉，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

我向她道了谢就离开了。在接待室里，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注视着我，看我是不是拿到表格。以后我才从一个学生处了解到，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关心。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原来每天发表格的份数是有一定限制的，从接待室里出来拿到表格的人越多，给外面等着的人留下的表格也就越少。

我一回到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那女人错给了我一张去香港旅行的表格，我必须回去另换一张申请表，我赶快回去，我向外面排队的人说明了原因，他们都善意地让我先进去。

当我告诉那女人错给了我一张表格时，她显得有点慌乱，她没有说什么就给我换了一张。

第二天早晨，我仔细填写了表格并附上必需的一些证明交了上去。我并没有寄希望能在一年之内从公安局听到回音，在1979年公安局签发一张护照大概总要这么长时间。我还知道在文化革命前有一些人为了得到去香港的批准足足等了几年。但随便怎么说，我还是值得庆幸的，那个女干部没有拒绝发给我申请表格。假如她一口回绝的话，我除了打消申请出国的念头外，就毫无办法可言。她在公安局里的地位虽然不算高，但是她被授予的权力却大得惊人。

第十八章 别了，上海

在我递交了申请去美国的护照的表格之后几天，阿姨给我拿来一封公函，是“清理抄家物资办公室”寄来的，这是政府的一个特别的机构。信中邀请我去见面。周太太和她丈夫也都收到同样的通知。通知周太太是要归还她几件珠宝首饰，要她丈夫到一个仓库去，在那儿堆放着积满灰尘的书籍中，找找看有没有他的书。在密不透风的仓库里放了十多年，书都霉烂了。他捡起一本在手上，马上就散落了，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难闻的气味。他两手空空地回到“清理抄家物资办公室”，同意在一份声明放弃所有被抄物资的证明上签了名。周太太同样写了收到珠宝首饰的收据，清单上开列着“三只戒指，一枚胸针……等等”，但没有注明是什么样的珠宝首饰，她问工作人员她的真钻和真玉的戒指时，那人却要她提供证据，证明红卫兵抄家时确实有这些东西。

显然抄家物资没有得到很严密的看管，文化革命十年中，有许多人轻而易举地得到这些东西。现在，政府命令将抄家物资归还原主，地方部门就不得不做做样子，表明

在认真执行，于是就组成了这个办公室做些工作，邀请我们来参加。一旦汇拢了足够多的收到一些毫无价值的物品的收据和放弃权利的声明，将抄家物资归还给合法主人的工作就认为是圆满完成了。

正当我对能归还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不寄什么希望时，收到了政府部门的一封不得不引起我重视的信件，于是在约定的日子我准时赶到那儿。一个女干部接待了我，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是否有兴趣一起去仓库找找书和唱片。

“可以肯定，我所有的书都被烧毁了，至于唱片，很少有几张还会是完整的。我无意再要回了。我可以签署一张声明。”我对她说。

“我确实有些关于你的好消息。”她特别强调了“你的好消息”。

她在书桌上文件夹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一叠纸，然后对我说：“你的一些瓷器找到了，因为装瓷器的盒子上有你的名字，现在在仓库里。上海博物馆有兴趣从你这儿收购其中十五件，这十五件现在在博物馆，你可以去仓库把这封信给他们看一下。”

她递给我的信是一份证明，证明保存在有我名字的盒子里的瓷器是属于我的。

“1966年8月30日红卫兵来抄家时，一些没有装盒子拿走的瓷器还在不在？”我问她。

“假如没有做什么标记的话，要找回来就很困难。”

“那么我的那些白玉藏品呢？”我问她。

“非常值钱的玉石或一般的玉石制品清单与珠宝是分

开列的，我们还在设法清理。”她显得有点不耐烦。我想，如再提这些东西她一定有点不高兴，她大概认为能帮我找回这些瓷器我一定会很满意的。

“我之所以询问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也装在那几个有我名字的盒子里。”我解释道。

“你会找到一些的。”她说。

“非常感谢你帮我清理瓷器，这工作一定是很辛苦的。”我对她说。

“上海博物馆帮我一起搞的，他们想与你联系一下，想从你那儿收购几件。”她说。

我的一些瓷器能够安然无恙真使我喜出望外，一回到家就跟小冯联系请他帮我把这些东西取回来。看来1966年红卫兵抄家时，我跟他们据理力争，试图保护这些瓷器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几天之后，小冯开着电力公司的卡车送我去位于市区另一头的地下仓库。我向保卫人员出示了信件之后，获准进入阴暗的洞穴一般的内室，值班员让我们在一条积满灰尘的长桌边等候，微弱的灯光下，已经有一些人在那儿。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在这空气稀少的房间里不安地来回走动。

东西给搬出来了，摆在桌子上，让我们去认自己的东西。有一些卷轴，扇子，几只大小不一的装满东西的盒子，都用绳子捆在一起。所有的东西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黑乎乎的灰尘，这是上海这个工业城市特有的煤烟灰。一个人捡起一把古董扇子，扇面是明朝一个著名画家的一幅价值

连城的画，扇子都已霉烂，他不禁长叹一声，听上去就象在呜咽低泣。一个妇女站在他身边，大概是他妻子，嗫嚅着意思是将这把目前已变得毫无价值的扇子扔掉，但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拿出手帕，非常爱惜地把扇子包起来带回家去。

回到家，小冯帮我把盒子搬上楼，拿进我房间后就告辞了。一股气味实在难闻极了，我把每个盒都打开，把瓷器取出来，然后把破烂肮脏的盒子都放到外面阳台上。我发现一些花瓶、碗和盆子都成了碎片，有几个是打碎后再重新粘合起来，所有的瓷器都编上了号码，在一些光洁的釉面上写了一些难以辨认的字迹。在一个明朝青瓷大盘上，造反派写了几个字表示他们对富人的仇恨，称收藏者是吸血鬼。看到这些精致的瓷器被毫不在意地糟蹋，我的心都在颤抖，但我知道，如果不是有人在某个场合说服了红卫兵把这些东西运进地下仓库的话，这些瓷器早就粉身碎骨了。

我在浴缸里放满了温水，撒上一些肥皂粉，在浴缸底部铺了一条浴巾，把瓷器放在上面洗涤，打碎过的瓷器在水里都成了碎片。我弯着腰在浴缸里一件一件用软布擦去上面的记号。房间地板上铺一条被单，将洗过的瓷器放在上面，摆满了一房间。全部洗完后已经夜深，我敢肯定，收藏品仍然完整无缺的只占原来的一半也不到，其中一尊德华观音沾满了黑墨汁，但没有打碎，洗过之后，又重新显露光采，象原先一样美丽，我把它放在书桌上，愉快地坐下把玩，就好象与一个老朋友久别重逢。

我查看了博物馆想要收购的十五件瓷器的清单，发觉

其中包括我所有剩下的宣德年间蓝花白瓷和一只我特别喜欢的苹果绿雍正年间的花瓶，上面塑着一个向上爬的蜥蜴，沿着一股清泉，似乎要从花瓶上流走。上海博物馆还想要一个贞德鸡油黄瓷盘和一件最出色的宋代定瓷，上面雕有几朵睡莲。

是答应博物馆的要求收购他们已选好的十五件瓷器，还是拒绝呢？文化革命前，我在写遗嘱时，曾和女儿商量如何处置我的珍藏品，她曾建议将藏品作为礼物送给上海博物馆。她的死以及文化革命期间对文化遗产表现出的虚无主义态度，使我感到，博物馆是政府的一个附庸机构，听命于政治的压力，将我的珍藏留给这样的博物馆，想到这里不禁令我心灰意冷。但从另一方面讲，我已决定要离开中国，我的收藏一件也不可能带出去，是否留给博物馆不都是一回事？于是我决定还是让博物馆把想要的十五件瓷器拿去，这比给那些对这些珍品一窍不通的官员，随意开个价钱收购去要好得多。我还可以向博物馆要求些东西，与瓷器配套的红木底座都没有了。如果在离开上海之前我还有兴趣欣赏自己的珍藏品的话，我就必须要有一些红木底座可以摆设瓷器，我决定向博物馆要求替我做几只底座，作为十五件瓷器的交换，无论怎么说这都不是公平的交易，但我确实需要底座，又没有其他办法能得到。

上海博物馆带了个信给我，想跟我见次面。我去了那儿，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态度出奇地好。他们把我的十五件珍品都拿了出来，放在崭新的盒子里，衬着雪白的绸缎，一件件都分外洁净美丽，光彩夺目。他们让我一件件取出来查

看一番，然后我们一起娓娓而谈，犹如局外的鉴赏家评点色彩或造型的奇特，翻转过来鉴赏印记。当他们认为对我十分彬彬有礼的态度，足以给我造成一个文明良好的印象，使我乐于接受一切条件时，就转而谈手中的这笔交易。一位看上去与其他几位有些区别的人对我说：“博物馆的工作开支有一定限制，收购一些珍品时我们都要慎重选择，你的藏品中有许多出色的珍品，我们决定按年代的久远，向你收购十五件。”

“当然，你们可以把选好的十五件瓷器拿去，与其让它们放在我的玻璃柜里，还不如放在这儿让许多来博物馆参观的人欣赏。”我说道。

他们一个个都眉飞色舞，那个说话的人不住点头，对我所说的话表示赞许。

“假如你们答应我的条件，我把十五件瓷器作礼物送给博物馆。”我补充说。

“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那人问我。

“对博物馆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告诉他，“我想请博物馆的木工替我做一些底座，这样就可以将归还给我的瓷器摆放在房里，便于好好欣赏，当然所用木材的费用和人工费由我支付。”

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对我的条件有点惊讶，随后都会心地哈哈大笑。

“这很容易，我会派木工到你家去量尺寸，你想做多少呢？你想给每一件瓷器都做一个底座？”那人问我。

“不，当然不能要你们做这么多，我想可能一共需要

十到二十个。”我说。

“完全没问题。”他欣然应允。

“你有这样的设想，愿将十五件珍品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你是否能给我们一份正式的信函作凭证呢？”另一个人说。

“当然可以，等木工来时让他带回来，木工明天能来吗？”

“我去找木工，你可以亲自跟他谈谈怎么做。”那人边说就离开了房间。

他把木工带来时，那老头对于增加这些额外的工作似乎显得有点不大高兴。

“我现在手头上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嘀咕着。

“让这位老同志在工作的时间去给我做额外的工作，我觉得不太合适，也会耽误他给博物馆做的工作。能不能请他在业余时间来帮我做，我付给他报酬？”我提议道。

“这样做不行。”那位博物馆工作人员肯定地说，显然他不能允许这样做。他既然已经答应了给我做些底座，就要那个老木工先把手里在为博物馆做的活放一放。我们讲定那木工第二天来我住所量尺寸。

“下个星期我们要举办一个展览，展出我们最近得到的一些珍品，所有在这次展览会上有展品的人作为博物馆的朋友将应邀出席预展和酒会，我们希望你能光临。”那人说，递给我一份烫金的请帖，上面已经写上我的名字。实际上他们早就确信我会把十五件珍品送给他们，由于上海博物馆是政府的一个机构，说是要收购只是一种礼节性的安

排而已，至少我曾听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怒气冲冲地跟我说到有一个医生拒绝出售收藏的唐朝的瓷枕。

这次特展就在上海博物馆底楼大厅举行，出席的来宾除了捐赠展品的私人收藏家，还有他们的妻子。大量政府官员也在博物馆人员的簇拥下，浏览这些光彩夺目的珍品。每件展品边上都有一张卡片，写着展品简介和捐献者的名字。我的十五件瓷器展出了四件，包括那个十六英寸直径饰有葡萄图案的宣德蓝花白瓷大盘，还有饰有蜥蜴图案的雍正花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陪我浏览展品并解释说，由于场地有限，只能从每个收藏家的珍品中取几件展出。”

出席的来宾中级别最高的官员是上海市副市长张承宗，他同时还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他的周围一大群随从和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呼后拥，准备随时回答他的提问，等每个人都参观了展品之后，就邀请我们在空旷的大厅里早就准备好的椅子上入座。张副市长作了讲话，赞扬了私人收藏家的爱国精神，增加了上海博物馆的收藏，他还特别对一对年青夫妇表示欢迎。他们是从美国来的，代表他们的祖父出席这一仪式。他们的祖父在文化革命中死了，未能亲眼目睹他自己的珍藏在这儿展出。讲话之后，博物馆的代表请每一位私人收藏家走到张承宗的座位前，副市长站起来给每人一个装有奖章的金色镜框，另外有一个红色的封袋装着钱款。这个仪式进行时，一个博物馆工作人员悄悄走到我座位边上轻声对我说，以后要为我另外举行一个仪式，因为我无偿捐献我的收藏。仪式结束后，一辆特备的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华山路上新开的一家旅游宾馆，

宴会大厅里举行了精心准备的酒会。

那对从美国来的年青夫妇和一些与香港商人有联系的收藏家们得到特殊荣誉，与张副市长同桌，由于新政策提倡吸引外资，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人民政府的眼里顿时身价百倍。在政府能成功地与外国建立商务关系之前，这些人是很有用的，他们与香港以及通过与散居各国的华侨的关系可促进这种联系。我们其他一些人就随意找个位子坐下，每一桌都有一个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作东。坐在我这桌的我一个也不认识，都未作自我介绍或进行交谈，也没有一个人对放在面前的美味佳肴有多大胃口。我们都正襟危坐，耐心地等候宴会结束，但博物馆的人都一个个精神抖擞，他们举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互相致意。

那些收藏家对他们的珍藏仍依依不舍，这些珍品与他们的主人都有着特殊的感情的维系。吃饭时，我始终还惦记着送给博物馆的那些瓷器，虽然我并不为放弃它们而感遗憾，但我确实有点哀伤之情。我想其他人大概也有同感，虽然按价给了他们每个人一笔钱，但他们没有一个真的急需钱用，而且付给的钱只是市场价的一个零头。

当看到张承宗快要离席了，我们也都放下筷子，等张承宗与他的一群随从在门边一消失，我们就都起身与自己一桌的主人握手言别。随后，我们都挤进电梯。其他桌的人也取同样的方式。当我们到了街上，几乎淹没到人群之中时，我们才脱离了官场的羁绊，互相莞尔一笑，对周围的人道声再见。

一个星期之后，两个博物馆工作人员用一辆公家小轿

车把我接到上海大厦，这是专门接待外宾的宾馆。在专供官方用的顶楼大厅举行了给我颁发奖状的仪式。在一所宽阔的门厅边招待员把我引到一张桌子边，上面备着砚台和几枝毛笔。我在一本织锦缎封面贵宾簿上签了名，在我弯身在桌上用毛笔签名时，摄影师给我照了几张相。那两位工作人员在我之后也在本子上签了名，然后招待员拉开门，引我们走进会见厅。博物馆其他人员包括馆长都作了自我介绍，我见到我的邻居顾恺时医师夫妇也应邀出席宴会。顾医师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他夫人是第六人民医院的妇科医生，他把家中的青铜珍品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过了一会儿，张承宗副市长到了。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中间，早就给他留着的位置。招待员给我们端来了清茶，我们一边闲聊着天气，一边互相客气地询问身体情况。开始一阵寒暄之后，一个博物馆的高级官员带来了奖状镜框，把它放在副市长面前的咖啡桌上。张简短地致了辞，赞扬了我将自己收藏的瓷器捐献给博物馆的爱国行为，随后他起身拿起奖状，用两只手捧到我面前，我起身接下并向他鞠躬致意，然后他送给我一幅卷轴，说是上海博物馆赠给我的礼物，是对我的捐献表示敬意。我收下礼物又向他鞠躬致意。

从织锦缎盒子里取出画轴，展开一看是唐朝画家唐寅的名画“芍药仕女”的精美的复制品，原画是上海博物馆最珍贵的藏画之一。卷轴约长两公尺，宽二十八英寸。摹品与原作维妙维肖。这幅画现在装饰在华盛顿我公寓的墙上，我的朋友们都非常赞赏。

馈赠仪式结束，张承宗坐下后，我作了简短讲话，表示我为能丰富了博物馆的收藏而很高兴。仪式进行中摄影师拍了几张照，这些照片和有贵宾签名的本子以后都送给了我留作纪念。

招待员来告知午宴已备妥，以副市长为首，我们步入旁边一个餐厅围桌而坐。精心制作的佳肴是我在社会主义中国所见过的最奢华的。备有三种美酒，水果和甜食。副市长和大家都很客气，也很欢愉。宴请过程中，副市长告诉我他本人也被关押过，见我流露出惊讶和气愤的神色，他说：“你一定很奇怪，一个象我这样的老革命为什么被那些号称也是革命派的人关进监狱？要知道，政治是非常复杂的。”

受到副市长现身说法的鼓舞，其他人也都告诉我他们被隔离关押的情况，很快我就发现在围桌而坐的十个人中间，只有三个人幸免监禁之苦。

“所以，现在我们都得到了平反。”一个干部大声说。

由副市长带头，我们大家一起举杯感谢中国共产党使我们都获得平反。

看来上海市人民政府要把我的思想纳入正确的轨道。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颁给我奖状，没有象其他人那样给一个装钱的封袋，当然没有为其他人单独组织一个颁奖仪式也没有豪华的宴会。我想他们给予我通常给予外国政府高级来宾相同规格的待遇主要是因为我已申请去国外。他们想使我对毛之后的政府，对上海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副

市长不时地提醒我他本人也蹲过监狱，就是要我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不幸遭遇，他还试图要我觉得有过受监禁的经历，就与老革命和政府高级官员等著名人士为伍了。

第二天上午，每天四版的上海《解放日报》在一角登了我向上海博物馆捐献瓷器的新闻。报纸报道称这是爱国行为，并指出我没有接受任何财物。由于上海《解放日报》与所有其他报纸一样是受政府控制的，由政府决定该登什么。我觉得上海的官员们仍在继续努力使我心满意足。

这条消息一见报，刹时间我成了知名人士，我的朋友，邻居包括居民委员会的支部书记都来表示祝贺，竞相观看奖状。他们都要我把奖状挂在墙上，过去对我唯恐避之不及的人也都来祝贺我。卢英在几年前还批评过我的衣着，现在却称赞我仪表整洁，并问我这些衣服是在什么地方买的。从受尽侮辱和磨难的非人生活到今天，我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我个人毫无改变，只是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这股祝贺风平息下去后，上海妇女联合会的代表郝同志来邀请我参加妇女知识分子的学习小组，我欣然应允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我可以不再参加实在索然无味的居民委员会的学习小组会议，我也希望在妇联结识的一些妇女会有意思些，也志趣相投一些。

按照中国法律，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权利，但实行起来却大不一样。虽然在城市里妇女与男子同工同酬，大量的妇女仍从事一些传统上雇佣妇女担任的特殊工作，如纺

织工人，售货员，护士及教师。中国人传统的妻以夫荣的观念仍占上风。朱德元帅的遗孀是全国妇联的主席，各地方妇联主席和副主席都是其他老资格的党的高级官员的夫人或遗孀，因此联合会中做实际工作的如郝同志都是党的干部。与中国其他组织一样，妇女联合会也是政府的一个组织，指导和组织妇女运动。

“我们打算组织两个学习小组，”郝同志说，“一个小组主要包括解放前的女企业主以及原先在自己丈夫厂里工作的一些著名的资本家的妻子，另外一个组主要是女知识分子，在这个组里也包括一些为社会主义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的妻子。经过认真考虑，我们决定把你安排在后面一个小组，我们觉得这个组对你更合适。”

“我希望你能向妇联的高级人士转达，我很高兴受到邀请，我认为这是给我的一种荣誉。我期待着参加学习小组会议。”我很有礼貌地对她说。

“下星期三下午二时，我们两个小组一起举行首次会议，打算在北京西路上海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召开。以后每周的会议也借在那里召开。他们将给予我们一切特殊待遇。那儿还有一个给我们会员提供方便的‘内部’商店和餐厅。”她补充说。

她告辞了，我送到大门口。郝同志走后我关上大门，这时看见周太太从房里出来到花园里。

“是妇联的郝同志？”她问我。

“是的。”我说。

“她是来请你去参加她们的学习小组活动？”

“是的，可是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也受到邀请了，但我只参加区一级的，我想你是参加市一级的吧？”她问我。

“我也不知道参加的是哪一级。”我告诉她。

“假如是在北京西路上海政协开会，就是市一级的。”她说。

“这只是学习小组不同，级别上没有什么区别。”我说。

“喔，有很大区别。市一级可享受很多待遇，对区一级的就不开放。别的不说，你就可以进‘内部’商店和餐厅。你们可以弄到一般群众享受不到的东西，比如好烟。”她告诉我。

我快要走进我的地盘了，她还说道：“你之所以被邀请参加市一级的学习是因为你资助的幼儿园是市里第二大幼儿园。”

“你的消息真灵。”我冷冷地说。

“你可是许多圈子里议论的话题。有人说你做出一副姿态是想要买一张护照出国去。”她说，一边注视着我的反应。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识的那人认为人民政府是出售护照的交易所？”我问她，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实际上对她告诉我的话感到十分可笑。中国人都极端精明尖刻，他们信奉这样的信条：良好的姿态和友善的行为总是有自私的动机。

确实使周太太吓一大跳，她连忙说：“没有人说人民政府是出售护照的。”

“对了！这样看来，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护照，对吗？”我不容她回答就走进门去了。

我觉得周太太有点嫉妒我，因为从她看来我怎么能超过她。

政治协商会议是统一战线组织，是统一祖国运动的一部分。指定的代表对国家事务没有真正的发言权，从理论上说是“协商”，实际上只是对由共产党已经决定的事情附和一声赞成。上海政协设在一幢大楼里，过去这儿是著名的“张家花园”的一部分。上海的其他一些宫殿式大楼常常是外国殖民统治时代的遗迹，但是这幢大楼有幸沾了革命的光。1911年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前，孙逸仙的一些支持者经常在这儿召开秘密会议。原先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湖和许多亭台，现在早已无踪可寻。增加了许多建筑。大楼本身，底楼改成了会议大厅，楼上有许多会议室。进门回廊处成了“内部”商店，花园一角有个餐厅。这两个地方均由国家经营管理，是非赢利的单位，为代表们提供便利。

我离开上海之后，遇见了许多欧洲人和美洲人，他们总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是个平等的社会。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共产党的政府控制了物资、社会服务的机会，以不平等的方式分配这些东西。“内部”这个词就是说对某些阶层的干部提供物品和服务，少数不是这个阶层的人也可享用。这些人总因这个或那个原因，政府要给予他种种优待。我听说过“内部”这个名词，意思是对一些高级干部，尤其是军队的高干提供物品和服务，他们可以优先选购，

把一切好东西鲸吞。虽然政治局委员的工资比普通工人高8至10倍，但是供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物品和服务是不用付钱的。为此，他们甚至可以跟其他国家的国王和总统们的生活比美。这些特权可以扩大到他们的家属包括子孙们。甚至他们死后，家属仍可享受。

参加妇联学习小组的妇女们在政府眼里并不是真的很重要。上海政府给予我们的这点小恩小惠只是顺应政治潮流，即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大团结的新政策动向和四个现代化，“对外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些海外关系。政府对我们施以仁慈，目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亲友的支持，并在西方民主主义者心目中造成克制容忍的形象。即使是这样的“装腔作势”也是有限的，我所得到的优惠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我还是成了亲友们羡慕的对象，他们迫不及待地求我替他们在“内部商店”买东西，或者从餐厅给他们带点难得买到的食物。很快我就发现参加学习小组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麻烦。以后当我最终离开上海时，能摆脱这种困境成了我的一大乐事。

对我被邀请参加妇联学习小组，阿姨感到很自豪，她认为至少我得到了尊重，不仅仅回到了我这一阶层中去，而且受到政府的看重抬举，进入了特殊人物阶层。在首次开班那天，她早早为我准备了早饭，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以确定我穿的是她认可的衣服。

“我觉得蓝灰色的好，你穿很好看。”她提议道。

“海蓝色的不好？”我从橱里拿出一套海蓝色套装。

“不，蓝灰色更好，看上去年轻多了。我觉得你能把

头发染一下就好了，一头黑发的话，就显得更年轻。”

我把海蓝色套装放回衣橱里，拿出那套蓝灰色的，她心满意足地笑了，走进厨房去，“明天跟我讲讲情况。”她说道。

大概有七十个妇女出席了学习小组的开班典礼，都是中年人或老年人。我们坐在一个宽大、洁净的会议室里，高敞的窗户使室内光线充足，阳光明媚。每个人一杯用带盖的茶杯盛的绿茶，妇联的一位副主席对我们表示欢迎，给我们讲了一通四个现代化的大道理。她说，四个现代化是已故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的主要目标，以后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首肯，接着她又赞扬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并且促进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就象所有的演讲者一样，只是用与北京领导人同样的腔调，与党的决议中用过的几乎同样的语言，重复着同样的思想观点。

这位副主席五十刚刚出头，一身黑色套装，十分时髦。在我们恰如其分地鼓掌表示欢迎之后，她向我们介绍下一位发言者。这位发言者要向我们讲讲她的美国之行，她刚与丈夫，一个过去的资本家，一起去了美国。她首先向大家致歉，她的嗓子哑了。她解释道，从国外回来之后做了许多场报告就失声了。从她报告的内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要请她来演讲。她不仅描述了美国的生活，并不是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妙。吸毒，酗酒和昂贵的医疗费用等等，而且她还告诉听众，尽管在美国有收入可观的工作，但她丈夫还是决定回到中国，继续在他已交给国家的那个工厂当一名总工程师。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

化的进程，为使中国富强起来贡献一份微力。她讲话结束后，我们都诚心诚意地鼓掌致谢。

显然她的讲话是政治宣传，是政府要人民听听的。当然我并不认为其目的是为了恶语中伤美国。对于美国总领事馆外面等候签证的长队，政府可能感到难堪。她的讲话对出国移民热不啻有降温作用。实际上报上已经登了一些年青人的故事，他们移居美国后才发现无法找到工作或适应美国社会，失望之余他们回到上海。使他们惊喜不已的是他们的支部书记把他们当英雄一般欢迎，并仍然做原来的工作。这些故事结尾都千篇一律，那些年青人都立志为四个现代化努力工作。

作为妇联组织的学习小组的一员已经有一年多了，与遍及全国的学习小组一样，我们学习党的文件和讲话。参加政协的代表团，听取一些著名人士的报告，内容广泛，从文化事业说到国际关系。我们也经常光顾商店和餐厅，但总有所节制，这样就不显得象在抢购物资和热衷于享受给我们的一点特权。

我这一个学习小组有三十二个人，平均年龄60岁不到一点。学习小组的领导是副市长夫人，已经七十岁了。郝同志是妇联来的两个党员干部中的一个，主要是掌握会议，控制会议的进度，随时引导大家讨论，不要脱离预先设想的轨道，但这位副市长夫人是个有经验的主席，我们这些人也很清楚，该怎么做。学习小组的活动总是很顺利，从不使郝同志和其他妇联来的年轻干部有些微为难和担心。

在居民委员会的学习小组会上我从来不发言，但在现在的会上，我每次都必须说些什么才好。我们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一个五十岁年纪的作家，由她念我们要讨论的政府文件，随后围坐在一个大会议桌旁的我们都挨个有所反应。过分性急抢先发言与不发言一样，会被看作是鲁莽。谁第一个说，谁就可能说错一些话，但谁如最后一个说，就会发现一切好话都已说尽。

读完文件后一般总有几分钟冷场，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本子，好象正在认真考虑刚才听到的文件，这时我们的主席，那位副市长夫人就补充几句，给我们一些启发，引导大家讨论发言，又静场一会儿，会有胆大一点的就呷一口茶，抬起头开始发言，其他人就跟着发言，每个人都补充一点什么。我总是想在讨论中间插入我的一些意见，但有时不能如愿。这样，我就希望能被人遗忘，只要在边上听听而已。但是郝同志或妇联其他干部总会问我：“你是怎么想的？”于是我不得不说上几句。在这种会上发言也是一门艺术。显然，一个人不能过于单纯，发言的方式和套路是有限的，同样一件事可以反来复去说上好几遍。我们大家都宁愿多提些疑问，也不愿提什么不同意见。

我逐渐对郝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她很少带有阶级偏见，这是党的干部与我这样的人民群众加强联系的障碍。我想借助她的帮助去查处杀害梅萍的凶手。她对我很表同情并介绍我去找新改组的市委统战部的一个女干部。一天晚上郝同志带着这位干部马同志到住所来看我。

等我讲完全部经历，马同志答应与上级讨论这问题，几天之后她与郝同志一起来了。

“我被授权来通知你，你女儿的问题将在适当的时候解决，上海有许多冤案，还有许多家庭吁请政府甄别平反，例如我们部的原部长本来怀疑是自杀的，但现在他家属提出疑问，并有证据表明可能是被谋杀的。类似这样的案例都是发生在许多年之前，很难甄别。即使你能证明你女儿不是自杀身亡的，仍须查明是谁或是哪些人干的。有谁愿意指控另一个人，而他们可能就在一个单位工作？即使有人准备站出来控告他人，我们能相信他吗？”

“事情看来确实是困难的，”我表示同意，“但是我也相信如果政府下决心去做的话，抓住罪犯也不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在不远的将来，对文化革命就会有正式的结论，从那之后，所有遗留的问题就会很容易解决。”马同志告诉我。从她的言谈中我明白了由于对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予以否定，残害犯人的造反派就不会受到批判，因为他们是以文化革命的名义行事的。马同志虽未明说，但在上海人人人都知道许多造反派入了党，同时都当上了干部，控告一个党的干部要比普通老百姓困难得多。

两位女士告辞了，我送到大门口。我感谢马同志光临并答应她一定耐心等待。

我没有看见周太太站在平台暗处，等我关上大门，她走下平台朝我走来。“你在谈你女儿的事？”她问我。

“是的，作为一个问题，我们谈起她的事。”我说。

由于我替周太太从政协“内部”商店带了一条高级香

烟，我们的关系变得亲近些了。

“对了，听我儿子说，对你女儿的死负有责任的那个人已被抓起来了，这人还与其他几个人命案子有牵连。”

“你儿子怎么会知道的？”

“好象是他在部队里的朋友告诉他的！”

她的话叫我大吃一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让她儿子上来见我。

晚上他上楼来了，但拒绝告诉我杀死梅萍的凶手，并且干脆否认曾跟他母亲说起任何有关梅萍的事。“我母亲记错了，她总是把事情搞错。”他说。

我没有再把周太太已经告诉我的那些话说出来，就当它是一些无稽之谈，我想如果这凶手已被抓起来，我也会有消息的。马同志一定会知道。事实正是如此，周太太儿子的消息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之后一个星期，文化广场就举行了公判大会，其他五个被害者家属出席了大会，据香港一份左翼报纸《大公报》报道，这凶手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香港时，一天早晨我打开报纸见到这条消息，顿时眼前一亮，我女儿的名字赫然列在受害者名单中。一阵激动过后我才明白公安局之所以审慎地等我出国之后才举行公判大会，是为了不让我出席。文化广场坐了一千多人，社会各界代表都照例应邀出席公判大会，受害者家属占了前排位置，请他们来表示同意审判结果。中国还没有废止死刑，根据中国的法律，罪行确凿的杀人犯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公安局的人都很清楚，处以死刑缓期执行，我

是不会同意的。我给公安局写的许多份上诉信中早就多次指出这点。他们一直等我离开后才举行宣判会，就是为了不让我对宣判表示抗议。直至今日杀害梅萍的凶手还活着，缓刑意味着他两年之后就可自由了。

1979年对邓小平和共产主义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接受了邓小平最喜欢的马克思的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为他的改革和重建中国经济的计划扫清了道路。他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并受到热烈欢迎，奠定了他作为世界领导人的地位。粉碎越南侵略者的中越边界战，使全体党员和民众都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团结在党的周围。战争也使那些至今还死守着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大多数军队领导人确信，中国的军事力量需要现代化，通过将华国锋的四个支持者驱逐出党的领导阶层，邓小平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虽然，华国锋暂时还是党中央主席和总理，但他已成了大权旁落的孤家寡人。

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已付诸实行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外国企业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不列颠石油公司是第一个在上海开办事处的石油公司。随后，我从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其他石油公司包括壳牌国际石油财团参加了沿海石油勘探。我已经日益有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护照，我信心十足，以至于停止了英语教学，但我真正离开上海还有整整九个月。

又是一年一度的春节，1980年1月，我决定要好好庆祝一下可能是我在上海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我邀请了

我的学生，那些帮助过我的年青人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吃顿“西餐”，和我一起观看焰火，阿姨和我要为三十多口人做汉堡包，奶油浓汤。我定制了三只鲜奶油大蛋糕作甜食，这是从一家先前是白俄开的，现在是国营的面包房定制的。那家面包房生产的蛋糕和西点仍非常好。客人们在我房里挤作一团，床都拆了可使房间大些，我们都坐在地板上享用晚餐，然后我们拿着大把大把买来的焰火、爆竹到花园去，在那儿我的客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时光。喧闹的爆竹声震耳欲聋，焰火喷放出彩色的火星和弧光，在夜空中形成一幅幅灿烂的图画。邻居们都打开了窗户，将身子倚在窗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欢乐。周家全家也都出来观看焰火。但我想，一定会有怨言。果真两天之后我在街上遇到户籍警老李，他问我：“那天晚上吵吵闹闹的，你在做什么？”

“庆祝春节放些鞭炮焰火呀。”我告诉他。

“有必要这样大吵大闹吗？”

“对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呀，我们还庆祝在越南的胜利呢。”

我遇见老李时正和一个年轻朋友在一起，等到和这个警察分手后，她对我说：“你有没有听人说过在越南的战争？”

“没有，他们怎么说的？”

“他们说邓小平命令打击越南是为美国的战败报仇雪耻，一切都是在他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卡特一起悄悄安排的。”她悄声对我说。

“这种话就象是‘四人帮’余党传出来的，不要相信它，也不要议论。”我告诫她。事实上从那时至今，因这些谣言邓小平还受到党内反对派的发难。

我那年轻的朋友说：“是的，你是对的，上海仍然到处是‘四人帮’的追随者，但人民是与邓小平在一起的，你看过历史故事片《甲午风云》吗？”

“没有，电影说些什么？”

“是这样的，当出现海军管带邓世昌的镜头时，观众就鼓掌欢呼，这是人民用隐晦的方式表示他们喜欢邓小平的作为。”她说。

我的年轻朋友对我说的话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几天后我独自一人去附近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正象她所说的，当出现海军管带邓世昌的镜头时，观众就情不自禁大声欢呼，并且象他的下属官员一样称呼他为“邓大人”。

春节前，我收到上海革委会寄来的一张烫金的请帖邀请我出席春节联欢会，地点在上海展览馆，追溯到中国与其北方紧邻苏联友好、合作的全盛时期，这座建筑就是中苏友好大厦。请柬可去两个人，这样我请我的年轻朋友陪我一起去，由于天气晴朗，春节期间公共汽车拥挤不堪，我们俩就不顾零度以下的寒冷步行而去。

我们到达展览馆时一辆辆小汽车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扬起一阵阵尘土，几乎把我们包围起来。展览馆外面停满了由女司机驾驶的小轿车，但是也有许多象我们一样步行而至的客人。看来在那个年月，上海城中该邀请的人都来了。我猜想我的名字是列在妇联提供的名单之中，因

为我在人群中见到几个同我一个学习小组的成员。

在门口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被允许入内，里面有暖气，非常热，一阵阵热风实在叫人受不了，因为在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对此就不习惯，灼热的空气象一股股热浪向我们冲来。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我们赶忙把大衣、夹衣、毛衣统统都脱了扔到一边，已有许多人在我们之先把衣服摆在那儿，礼服堆积如山。我那位年轻朋友迫不及待地要去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上海老百姓都知道有这个商店，只是苦于无法入内。她对我说，她曾对朋友、邻居炫耀，说要陪我来出席宴会，结果他们都来求她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为他弄些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日用品，这些东西在普通商店里是不可能得到的。

我对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会的，在去逛商店之前至少要在联欢活动组织人面前露一下脸。尽管急不可耐，她还是顺从地随我到处走走。大厅里有体育表演，剧场里在演戏，咖啡厅有小吃点心供应，到处都是人群，这样我们就能溜出去匆匆赶去商店，不致太引人注目。

当我们赶到那里时，不禁使我的那位年轻朋友大失所望。我们不仅发现早就有一大群人去那儿，而且门口有工作人员把门。我们必须排队等候，当终于进入商店时，她想要的东西几乎有一大半都卖完了。但是，我们还是买了几千元的东西，从开司米衣料到不锈钢平底锅。我们一人提四个包，都沉甸甸地装满了她的收获。我们步履蹒跚，几乎不能走到前门入口处去领大衣和外套，想叫一辆出租汽车都叫不到，又没有三轮车。我的年轻朋友只好打电

话到家里，请她的两个兄弟帮忙，骑自行车来接我们。在展览馆外寒风中鹤立等候她兄弟时，又走来了一些象我们一样提着大包小包的人，那些乘有女司机驾驶的轿车的人，一副高贵的样子，他们不必大包小包的受这份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内部”供应渠道。

节日一过，几乎在一夜之间，我们这条街道两边人行道上立起了许多临时房屋，比木棚棚好不了多少，都是用旧木料、竹子和碎砖破瓦搭起来的，傍着我们房子和花园的墙。人行道上的树木也圈了进去，或当柱子用，很快树叶都掉了，树就死了。每个棚屋都住着几口之家，没有盥洗设备，也没有厕所。开始，居民委员会通知我们不要把大门关掉，这样外面的人可以进来用花园里的水龙头，但是以后有几户居民报告遗失财物之后，在街道的两端安装了水龙头。每天早晨有一个年轻的女清洁工人来收每个棚屋的垃圾污物，那股臭气实在难闻。

周太太告诉我，在这条路上住进这么多人的决定是一个在文化革命期间曾升到区政府当干部的人作出的。这个女干部曾说过，她之所以选择我们这条街道让这些无处安身的人来住，是因为我们这条街住的都是资本家，过去都是阶级敌人。太清静幽雅了。在我们中间安插进这么多无产阶级，对我们只有“好处”。听到这种论调简直叫人目瞪口呆。我问周太太，为什么其他干部都不反对她。周太太说，“谁也不想得罪这位已当上干部的造反派，他们害怕有朝一日一切又重新翻过来。”

我们每家门口都搭了一个棚屋，开始还留了过道让我

们进出,但时间一长,空余的地方都渐渐被棚屋里的房客堆满了零星杂物,上面还盖着旧的塑料布和散发着臭气的草垫以防天气突变。门口的过道越来越窄,剩下不到两尺宽。小孩子对着大门撒尿,洗衣服的水淌得满地都是,从进门处流过。从早到晚,嘈杂的人声夹杂着好几个收音机播放的各种节目的声音,我们这条“太清静幽雅”的街道显然不会再有清静,也远不会幽雅的了。在花园里漫步,在阳台上憩息都变得不可能,但我和周家几乎都忍受了这一切,尽量忘却这些不顺心的事,不再抱怨。我们都很清楚,“阶级斗争”的幽灵仍阴魂不散。死守着毛的哲学思想的党的官员们是不会轻易转变的。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工作方式成了他们中许多人的第二属性,他们根本不知道还能用其他什么方式来履行他们的职责。除非党的领导层果敢决断,完全抛弃毛的哲学,否则坚持毛主义的顽固派不可能从领导岗位上清除,新鲜血液也就不能输入。这些心怀不满的党的干部竭力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来维护毛主义者的观点,破坏邓小平的新政策,指责邓小平的新政策是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背叛。时至今日,尽管邓小平的权力与1980年相比明显地上升,但党内的顽固派仍然是他面临的棘手的问题。另一方面,只要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一旦邓小平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中国的形势仍然可能面临突变。

我和周家都很明白,虽然我们都已平反,但我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并不是很保险的。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新邻居奉若上宾,甚至尽我们的一切所能去帮助他们,使他们生活更方便些。我们同意他们把食物贮放在我们的冰箱

里，把我们的拖把、扫帚借给他们用。甚至对那位造反派党员女干部感恩戴德，她毕竟没有命令将棚屋就竖在我们花园里面，如真是这样，我们也毫无办法阻止的。

大概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不是原资本家或阶级敌人的居民没有我们这么好说话，卢英通知我和周太太去谈谈，说居民委员会已正式告知每个居民，给这些无房户住的新住宅楼正在建造，一旦完工后，这些人就要搬回去，我们的街道就会恢复过去的样子。

从1978年起，我已见了许多国外来客，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和她的丈夫。我经过文化革命还幸存的消息在我的欧洲和北美的朋友中间传开了，他们开始给我来信。1980年7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艾迪斯先生的来信，信中说他打算来中国，8月将到上海，他问我是否能见见他。约翰·艾迪斯是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很深造诣。从四十年代起，我和我丈夫就认识他。五十年代他在北京英国临时代办处供职时是我们家的常客，以后数年间，他在老挝和菲律宾担任英国大使，我们仍保持联系。1965年他来中国度假，还到上海来看我。他是个精通中国瓷器的收藏家。他的收藏都已捐献给大不列颠博物馆，我总是很有兴味听听他对我的收藏品的真知灼见。

1972年，我还被关在监狱中，从报上获悉他就任首任驻华大使。1973年我被释放后，政治形势也不允许我与他取得联系。1974年，我又从报纸上获悉他已经离开北京辞职了。当然我是很愿意与他重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政府对我的所作所为有所误解，从而耽误我取得

护照的机会，于是我决定在给约翰回音之前去请示一下户籍警老李的意见。

我去派出所求见老李，他从里间出来，在我对面桌子后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过去的英国驻华大使的来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打算来上海，信里问我，是否能来看我。”我取出信逐字逐句翻译成中文，念给老李听。

老李听了我的翻译，一言不发。我问他：“你认为我可以见他吗？”

“这完全由你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那末我还是不要见他为好？”我又问他。

“如果你拒绝见他，他是不是会感到太奇怪？”老李说。

“那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见他？”我说，自然我想领会他真正的意思。

“关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见还是不见，完全是你的私事。”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政府的意见。约翰·艾迪斯先生是个大使，不是普通教师之类的人物，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对老李说。

“对你的私事我无法提供意见。”老李说。

“那好吧，这样的话，我写信给他说我不能见他。”我说。

“我让你不要见他了？”

“那我还是应该见他？”

“这完全是你的私事。”老李又说。

我突然恍然大悟。我要求老李给我一些指示是把他置

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我体会他是希望我见约翰先生的，但又不想说得太明白。于是我说：“好吧，我写信给他，告诉他我愿见他。”

老李笑了笑说道：“这完全是你自己的决定。”

“你觉得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的阿姨能够烧出一顿适合大使吃的饭菜？另外，你门外的那些棚屋又怎么办呢？文化革命前他到你家去过，对你现在的生活情况他会怎样想呢？”老李给我出主意时显得兴致勃勃。

“好吧，我请他去餐馆，谢谢你的建议。”我从板凳上站起来就离开了。

老李也站了起来：“我没有给你出什么主意，”他说，“这完全是你的私事。”

“随便怎么说，要谢谢你听完我的话，约翰先生8月份来的话我会来告诉你的。”我说完回到家就给约翰写了回信。

7月底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收到一封写着我名字的正式信函，是公安局寄来的，通知我去申请护照办公室，有事要见我。到了那儿，我发现在接待室里还有另外一个年青人，他显然有点焦躁不安，在长凳之间步来踱去，踢踢这条长凳又敲敲那条。见了我说：“你来申请过护照吗？”

我点点头，在这条长凳上坐下，他象根电线杆似地站在我面前，有点紧张地说：“你认为能取得护照还是觉得会遭到拒绝？”

“我想，很快就会知道的。”我说。

“假如遭到一次拒绝，还能不能再申请？”他问我。

“请你还是坐下来耐心地等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再申请，等轮到你进去时可以问一下。”我告诉他。

他坐下了，眼睛盯着里面房间的门。门一打开他就跳了起来，但是这次是叫我，显然他比约定的时间提早了许多就赶来了。

等关上门坐下之后，我把收到的公函放在桌上，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

“是的。”

“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他问。

“去探望我的妹妹们，为了合家团聚。”我说。

“你还打算去其他国家吗？”

“是的，照我的打算还要去探望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朋友。”我回答。

“你在国外认识很多人吧？”

“到处都有几个朋友。”

他打开抽屉取出我期待已久的护照说道：“你的申请已被批准了，这是你的护照。人民政府是希望家人团聚的。你可以到美国去探望妹妹，也可以去随便什么地方访问你的朋友。你见到他们后可以鼓励他们来访问中国，跟他们谈谈这儿新的情况和我们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告诉在台湾的亲友回来看看，他们将来去自由。”

“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可以请香港的朋友来参加投资，碰碰运气，鼓励任何一个人回来参观访问。”他说。

我点点头，拿起护照，看了下照片确信他没有搞错。

“你一到美国请向我们的大使馆报告并作登记。”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们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大使馆不在那儿。”我对他说。

“你去的地方没有任何中国的机构？”他看来不相信我。

“没有，我的妹妹都住在乡下。”我说完就离开了房间。

那年青人迫不及待地想进去，在门口与我迎面相撞，差一点把我撞倒。

我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取得美国总领事馆的签证，为了避免一清早去领馆外面排队，我想到了上海渣打银行的经理。他是英国人，对养鸟很有兴趣。对于一个不在外国业企工作的中国人破天荒地要去见一个外国居民，确实是个勇敢的举动，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斟酌了许多天后我还是冒险到圆明园路上的银行办事处去了。我和我已故的丈夫从四十年代早期就在渣打银行存款，但我们是和香港及伦敦的分行打交道，不过，到上海来接任的经理也不是不认识我们。文化革命前，他们曾来我家作客。这位年轻的英国经理感到很奇怪，他接待了我，对我表示欢迎并对我说，有人告诉银行在香港和伦敦的办事处说我在文化革命中已死去。他还告诉我美国记者斯坦利·卡诺在他的《毛和中国》一书中记载了我的死。我在燕京的同学韩素音在一篇自传中也有记载。

我请他立即通知香港分行，我还活着而且很好。我请他帮我与美国领事馆约个时间。他对我说，他与几个美国

领事馆官员住在同一幢公寓，这是人民政府为外国公民建造的。他很乐意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

二天后，我应召去美国总领事馆并获得签证。

8月初，在约翰·艾迪斯先生到达上海时，我已可以告诉他我已确定在秋天离开中国。在宾馆空荡荡的回廊中间，在房间的一头，一张桌子后面一个男人的注视下，我和约翰先生坐在软椅上，那人虽然坐得很远，完全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我还是没有多谈我被捕入狱和我女儿的死，主要与他讲讲我如何平反和梅萍的追悼大会。当我谈到我的瓷器都已归还，其中十五件已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时，他问我是否可以去看我住处给我留下的那些瓷器。由于第二天中午有个官方宴请，我就请他去东风饭店吃晚饭。这饭店就是过去的上海总会，是一个有名的英国公会，称作“东方第一酒吧”。我说：“等我们吃完饭之后再看看是否能安排出时间去我住处看看。”

“我很想看看最近几年你是怎样生活的。”约翰说。

当我去告诉老李约翰先生已经到了，我也已经见到他。老李问我：“你把你和女儿所遭遇的事情都告诉他了？”

“他对文化革命都非常了解，他本人就驻在北京，因此我认为即使让他知道我们发生的一切也不会使他感到惊奇。”我对他说。

“他个人了解的总是有限的。”老李说。

“我知道他有许多中国朋友，包括党的干部。我想他对中国确实非常了解。”

“他对中国友好吗？”

“是的，他对中国非常友好。如果不友好的话，现在怎么会请他回来？”

老李显然放心了。对他来说中国人民政府能把约翰先生当作朋友就说明他不同寻常。

“今天晚上我邀请他在东风饭店吃晚饭，我还请了渣打银行经理和两个中国朋友作陪，不知行吗？”我问他。

“可以，可以。应该另请几个客人表示对他的尊敬。他曾经是个大使呀！”老李说。

“但恐怕他吃完饭要来看看我的瓷器，我应该怎么对他说呢？”

可怜的老李大吃一惊。“这个……。”他皱起眉头，摸着下巴，沉思良久。我知道他是在想那些棚屋怎么办？

“要知道约翰先生在南京和北京呆过许多年，他肯定看见过比家门外的棚屋还要糟糕的东西。”我提醒老李。

“是的，是的，你说得对。随便怎么说，你是不可能找出恰当的借口拒绝一个朋友到你家来的。晚饭后带他来吧。你们什么时候来？”老李问我。

“大概九点钟，或再晚一点。”我告诉他。

那天晚上，当我带着约翰和渣打银行经理坐出租汽车到我住处时，我发现整条街上空无一人，棚屋外面没有晾任何衣物，没有一点无线电广播的声响，挡在我家门口的东西都搬走了，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约翰站在我家阳台观看我的花园时称道这地方真是宁静，他说：“你居住的环境”

境要比我想象的好得多。”我没有告诉他老李可能已经指示棚屋里的居民呆在家里并保持安静。

我在这儿记下约翰的来访，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老李的表现很有意思。在他能主宰我的生活时，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只有为了达到他自己的意愿时，才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所有中国党的干部对待民众都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象我们这位户籍警这样富有人情味，从本质上来看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这次旅行要去的国家的所有签证都办好之后，我通过上海旅行社在杭州附近的莫干山包租了一间房子，想上山去休整二个星期。待一切安排就绪，想到将离开中国再也不回来了，不禁感到悲凉。所有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故土都有一种亲近感，不管云游多远，不管离国多久，最终都想回来老死在故园。我们说这就是“叶落归根”，但是我已经决定不再回来了，不知将在哪片国土上了却残生。行期已近，我更觉凄凉，不禁思绪万千。在即将开始生活的新的一页时，我暗暗祈祷，反躬自省。

回到上海，妇联学习小组为我饯行，待妇联领导正式宣布我即将出国去探望我的妹妹后，我作了简短发言，对妇联给了我机会与这么些出色的女性一起参加政治学习表示感谢。我赞扬了她们的才智，爱国热诚和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从她们那儿我受益非浅。还有几位女士致了辞并敦促我将中国的新形势告诉在国外的亲友，并鼓励他们回来看看。郝同志告诉大家我已经订了新辟的上海至香港航线的船票，从我们小组中她请了几位女士同她一起去送我。

1980年9月20日我离开了上海，由于一般没有官方通行证的普通旅客都被挡在码头外面，只能派郝同志和另五位女士作为妇联的代表来送我。她们叫了一辆新从日本进口的面包车来接我。出国旅行允许带的行李和钱都有严格规定。我只有一只箱子和一只旅行包。手提包里只有相当于二十美元的港币，是从中国银行外币兑换部换来的。我在中国银行的所有存款和一切财物都只得扔在国内。

到码头时天上下起了毛毛雨，尽管郝同志出示了单位证明，还是不允许几位女士进旅客候船室。在霏霏细雨中，我向她们道别，她们就回到车上，祝我旅途愉快，姐妹们团聚幸福，但谁也没有提到我什么时候归来，我想她们都很清楚，我不愿再回到这个给予我如此惨痛回忆的城市。

等了好长时间，海关办公室才开门，一下子挤满了旅客，两个海关工作人员把我的箱子和旅行包彻底搜检了一遍，还看了我的手提包，点了港币的数目。一切完毕，我随其他人一起上了一辆大客车，把我们送到在顺水方向不远处抛锚的船上。

客车停在船舷旁，这时毛毛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夹着雷声和闪电。我既没带雨衣也没有雨伞，提着行李，滴滴嗒嗒淌着水，匆匆踏上跳板。船是一艘英国产的旧船，中国政府买来改装后跑香港——上海航线。我住的头等舱带有淋浴，洗个澡暖暖身子，换上干净衣服，然后走上甲板最后眺望一下上海。

轮船离开了码头，逆水而上以便掉头，透过蒙蒙雨帘，我望见壳牌石油公司的大楼和我原来办公室的窗口，

那过去的岁月竟然如梦幻一般。船渐渐加速，黄浦江一江春水渐渐远去。船驶入长江口时，暴风雨过去了，阳光透过淡淡的云雾洒下万道金光。

我一生中曾多少次从上海远航海外，就象现在这样站在甲板上，风吹拂着我的头发，望着隐约远去的国土，从未有过象现在这样的凄凉之情。1949年4月按我丈夫的愿望，我带着梅萍从香港回归，梅萍凄惨的死令我震惊。我知道，在历史的紧急关头，我作出了致命的决定，返回我们自己的国土，就是这个决定造成了如此的结局。我还苟活人世，真是内疚不已。我多么希望梅萍现在就站在甲板上，去创造新的生活。虽然自然的法则就是新陈代谢，生命仍将长青，除此之外，绝无他途，但我仍无比悲痛。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尾 声

当我手持壳牌石油公司我过去的业主为我买的头等舱机票登上喷气客机时，我重又开始了西方式的生活。

在香港，一个午后不久，我登上机舱坐定之后，一个有魅力的金发女郎，机上的空中小姐俯身问我“您要 Bloody Mary 还是 Screwdriver?”

当时我一定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站在她身边的一个年轻男子连忙说道，“您可能还是更喜欢香槟吧?”

事后我才知道所谓的 Bloody Mary 只是一种饮料的名称，而 Screwdriver 在这儿也不是指用来起钉子的旋凿。

见我结结巴巴地婉言谢绝，那位笑容可掬的空中小姐给我端来一杯淡淡的桔子水。

我几乎化了一年时间到处探亲访友，我想找个地方定居下来，加拿大是第一个给了我安身之处的国家，我住在渥太华，风景优美的首都。但是北方的天气，漫长的冬季和凛冽的寒风，对我的关节炎实在是个威胁，1983年我移居华盛顿，那儿气候与上海相仿。我在那儿买了一套公

寓，定居下来。等到我对新的生活：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超级市场挑选物品，用信用卡出入银行，等等适应之后，我开始了写作。

在华盛顿，每天我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生活，我可以到处旅行而不必征得什么人的允诺，物质是极大的丰富，生活设施是异常方便，在美国从“后门”只能走进人们的厨房。与旁人在一起时，我可以毫无顾忌地交谈任何话题，不必顾虑我的说法是否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我不必担心会有什么人对我的所言发生误解。在我新的生存空间，找不到象上海居民委员会卢英或户籍警老李这样的人物，在自由和轻松的氛围中，我感到精神焕发。我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各类有价值的书籍、期刊文章和新闻报道。一切使我有机会与其他意趣相投的人结社交友，在各种交际活动中，我也兴趣盎然。我生活得充实而繁忙，只是有时，我会感到一阵悲感时时袭来，暮色降临，一天又将逝去。每当我的精力处于低潮时，我发觉我竟如此抑郁寡欢思恋故乡，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我重又生机勃勃地醒来，去追求，去体验，去迎接新的一天。

写到我女儿的死和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痛苦的经历时，我心头的创伤常常使我不得不停笔去干些其他的工作，以使我的心恢复平静。但我还是持之以恒，有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向那些自由自在养尊处优的人们讲述我的故事，让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中国，我是怎样生活的。在英国，瑞士、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我的许多朋友都鼓励我，我特别要对我的四十年的老朋友，一位退休的报

界人士佩吉·杜丁表示谢意。1980年，当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拉乔拉，她的充满东方情调的美丽的居所探访她和她的丈夫蒂尔曼时，是她第一个建议我把经历写下来，在我的写作过程中，她自始至终给了我有益的启示和鼓励。

我的中国护照的期限已到了，我没有去换新证。美国移民局给我发了一张证件，以便我能出国旅行。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成为这个人民性格开放，热情的伟大的国度的公民，在这儿我找到了新的生活。美国对我是再适合不过的地方，这儿有劫后余生的犹太移民、在极权政体下曾囚禁囹圄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自越南的船民和来自专制国家的政治避难者。在这些人中间，我不感到孤独。我相信，如果上帝在为一切受迫害的牺牲者专门设有一片乐土的话，我的女儿梅萍也不会孤独。

在我决定做一个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时，我仍然关心着中国的形势，我时时关心着生养我的祖国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每当收到来自中国和香港的报纸期刊，我就迫不及待地阅读搜寻来自中国报纸采写的有关美国的栏目。我的一些朋友和邻人为我从各地搜集剪报。我也认真地研究我在上海的朋友给我寄来的公开发表的文件。1984年12月，我长途跋涉赶到香港去和我的一位获准出国短暂访友的亲戚会面。

听到来自中国的消息，自从执行新的经济政策以来，经济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增长，我感到无比欣喜。回想毛泽东时代荒废的年月和文化革命的疯狂，有多少生命无辜牺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听到已正式批判文化革命是一

场民族的大灾难，我感到欣慰。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们还是无法或不愿意明确地抛弃毛的政策，我又感到不无遗憾。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最大危害是党的威望扫地，统治权旁落。当毛泽东利用群众（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打击党的领导阶层中的反对派时，他让中国人民参与了他自己和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的权力斗争的闹剧，并作出取舍。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和批判，使得中国人民思索着什么是真理，皇帝是否真的穿着新衣。1976年，毛泽东死后，这个国家政治形势面临着大崩溃。显然，党如想要继续统治，就必须改变方向。

对于贫穷和失望的中国人民，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的诺言已变得毫无价值，过时了的革命口号已显得枯燥乏味，毫无生气。为唤醒民众激励热诚，党现在要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再创造宏伟的历史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报答，党向人民承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准和不搞政治运动。

自从邓小平执掌统治中国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占地球上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命运的主宰之后，已过去了四年多了。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经济政策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和旅游者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外国资本投入已达到几十亿美元。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人民的水平有了改善，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少数勤劳和善于应变的人成了中

国式的富翁。从1984年起，改革方案已在城市付诸实施。党的官员声称，再用三年时间，新的经济体制就将形成，这将包括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入，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国营工业企业将更多地受市场支配而不是受制于北京的僵硬的计划指令。主要在一些服务性行业如餐馆、裁缝商店等将试行小型私人企业。邓小平及其同事称这种新的体制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在推行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阻力，党内年事已高的老一辈革命家视邓的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背叛，其他的反对派则因为改革将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地位和权力，于是，破坏邓的一切努力的企图已超出了仅仅作些批判的范围。就是在这样一种尚不稳定的政治气候下，邓小平将继续坚定地推进他的目标。同时，他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势力，进一步巩固他的权力。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以来，邓小平已成功地以各种理由使成百万党的中层干部退出岗位，通过党内整风运动，从根本上清除了异己分子。1985年初开始，撤换了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重新任命了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首脑和党的书记。1985年8月，甚至尝试进行最困难的军队的改组，从各军区，军兵种撤换对他持最严厉的批判态度的司令员。1985年9月，通过党中央委员会一系列的会议，迫使一些身居高位的年事已高的党的领导人“自愿”地退休，让一些较为年轻的忠于他改革政策的党的干部取而代之。

虽然一些原毛派领导人已销声匿迹，但邓小平和他的梯队面临着来自另一方面的批评。这些人与那些原毛派不同，他们实际上支持经济改革，也不希望邓小平倒台，但他们警告说改革已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大门开得太大了，中央的规划与控制太松了，改革走得太远了。他们希望中国能吸收外国的资本、技术知识和设备，而不要吸收西方的思想和风俗。他们尤其害怕诸如民主和性解放等等思想观念的侵蚀，他们担心这样会威胁党的铁板一块式的统治，会削弱中国社会的道德准则，由于这些人在党的上层仍拥有令人生畏的力量，有的还是党的老资格的领导人，因此邓小平和他的梯队对此不能漠然视之。已经有迹象表明在许多部门要紧缩和倒退，但是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放弃的，尽管前进的道路将艰难而曲折。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为了保住面子而杜撰的。他们没有勇气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失败。他们希望通过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方法使国营工业企业恢复生机，他们想要使每月有固定工资收入，由党指派的官僚式的管理人员能具有象西方私人工业企业家一样的才能和责任感。他们要求工人们为奖金和增长很少的工资更勤奋工作和开展劳动竞赛，但福利要削减。他们希望每个人能在爱国主义精神驱使下，为国家提高生产率和利润，但同时仍保持礼义廉洁。面临大量的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工矿企业的改革不象农业改革一样产生太大效果。不用很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必将面临

痛苦的选择，要么完全抛弃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统治从官僚集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要么重新回到老路上去。

不断变革是共产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总是要求人民要大胆地实践，有时是自由主义的，有时是集体主义的。共产党统治的整个三十六年中，党的政策就象架钟摆似地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周而复始从未停止过。但是，今天共产党中国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她不再是孤立的，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

国际舆论和中国国内主张吸引外国投资和贸易的主要政治力量能够和最终会影响中国的进程，1984年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骤然瓦解，主要是由于国外反应不满，随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交往日益增长和加深了解，中国领导人正在抛弃狭隘的偏执。许多在西方大学学成归国的学生，将日益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现在已更加意识到她在全世界人民眼中的形象，并且急于树立好的榜样，一切希望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良好愿望将会如愿以偿。

译者的话

译罢《生死在上海》，作为亲身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中国人，我们为这位女同胞真切、悲怆的自述而感动。这本已超脱于个人身世感的回忆录，作为社会的良知，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去年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

作者郑念，是一位知识妇女，生于北京，三十年代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其丈夫原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外交官员。一九四九年，郑携女儿梅萍从香港回到在上海的丈夫身边，迎接解放。解放后，她丈夫曾一度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外事顾问，后担任英国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一九五七年因癌症去世。她接替丈夫继续在该公司任职直到一九六六年被捕入狱。“文革”中她身系囹圄六年半，林彪出事摔死后获释。而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的唯一女儿早已被迫害致死。作者孤身一人，心力交瘁。一九八〇年离开上海去国外，现定居于美国华盛顿。

在书中，作者对自己在“文革”浩劫中的遭遇，作了淋漓尽致的披露：从厄运降临到红卫兵抄家；从诱供、逼供到无休止的审讯、批斗；从莫须有地定罪到手铐、“喷气式”的蹂躏……书中展示了别有用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叵测居心和倒行逆施；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无知狂热和匮乏

理性；也表现了善良人们的友好情谊和患难相助。从作者不屈、智慧的斗争中，跃然纸上的是对人性、人格和民主、正义的执著追求，体现出强烈的人生自主意识和对“文革”浩劫的深重悲悯。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驱使下，作者把发生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的惨绝人寰的真实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对经历过“文革”浩劫的人来说，它提醒不忘这可怕的恶梦；对现时代的青年人来说，它提供了“文革”浩劫的一种史料，发人深省、促人反思。时间决不会倒流，历史的悲剧决不容重演！今天，此书的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作者得知，是会感到欣慰的。

此书在写作上也是具有特色的。作者通过清晰朴素的语言，洒脱简洁的笔调，把这些琐细和平凡的故事叙述得如泣如诉，同时，着力刻划了各种人物的神情百态，字里行间充满着浓重的人生意味。

在书中作者阐发了不少议论，其中不乏鞭辟入里之笔。但是由于作者处境所致，有的议论就显得偏颇了，对此我们不能苟同。相信广大读者是会作出恰当的评价的。

为尊重原作，直译是我们翻译的宗旨。书中的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词语，亦不更其意，没作任何处理，以便让读者了解作者的原意。本书由方耀光译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章，方耀楣译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章，郑培君译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章和尾声，全文由郑培君校核。

译者

1988年7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5 5 6 6

作者 = 请自己补充

页数 = 请自己补充

S S 号 = 请自己补充 S S I D

出版日期 = 请自己补充

出版社 = 请自己补充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部	革命风暴
第一章	在劫难逃
第二章	风暴前的宁静
第三章	毛的信徒
第四章	银铛入狱
第二部	拘留生涯
第五章	孤独的监禁
第六章	审问
第七章	一月革命和军管
第八章	党派斗争
第九章	连续不断的迫害
第十章	弟弟的忏悔
第十一章	种种折磨
第十二章	出狱
第三部	
第十三章	梅萍，您在哪里
第十四章	水落石出
第十五章	与众不同的学生
第十六章	毛泽东之死
第十七章	平反
第十八章	别了，上海